

普列汉诺夫评传



高放 高敬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並列漢諾夫評傳

楚圖南



高放 高敬曾 著

中國人民大學



1051280

普列汉诺夫评传

高放 高敬增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4.25插页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604,000 册数：8,200

统一书号：3011·177 定价：4.00元

前 言

在我国，人们对普列汉诺夫并不陌生，尤其是经常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钻研社会科学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学生，对他更是熟悉。在好多地方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很容易找到和马列著作排列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的几本名著。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集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是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思潮风云变幻。普列汉诺夫在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事件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深有研究的杰出理论家。

要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和马列著作，多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是有好处的。他翻译、注释、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多本原著。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马克思、恩格斯曾亲自为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写了序言，恩格斯喜读他的专著并给予很高评价，曾与他多次交谈和通信。现在保存下来的有恩格斯给他的书信五封，他给恩格斯的书信十四封。恩格斯在给

别人的书信中还多次提到他。他是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又是列宁的师长和战友，后来又变成列宁的主要政敌。列宁读过他生前出版的几乎全部著述，同他并肩战斗或者对垒战斗了近二十年。列宁对他的著述和活动评论尤多。仅就《列宁全集》第四版统计，论述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就有二百九十二篇之多，其中全篇专门论述的有三十二篇；论述到他的书信共有一百二十三封，其中保存下来的直接写给他的书信就有三十一封。此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文稿》第一卷至第十卷，论述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有二十八篇，其中专门论述的八篇；论述到他的书信共有三十六封，其中直接写给他的书信有二十封^①。而他写给列宁的书信保存下来的有四十八封。斯大林著作中论述到普列汉诺夫的计有十一篇。要了解他怎样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了解他怎样领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原著，要了解他后来怎样歪曲和背叛马克思主义原理，要了解马列大师们怎样评价他的著作和活动，就要了解普列汉诺夫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要学习和研究哲学、文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多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也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硕学鸿儒。《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他不朽的哲学名著；《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是他脍炙人口的美学佳作。三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是他费时多年的开山力作。其它如哲学史、艺术史、空想社会主义史、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他也都有名篇专著。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成的？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在各个学科领域他作出了哪些贡献？他的著作有哪些

^① 《列宁全集》第四版与《列宁文稿》合在一起，就是1958—1965年苏联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和从20年代起苏联出版的《列宁文集》的全部内容。

不足之处和差错？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要明确这些问题，就要了解普列汉诺夫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要学习和研究世界近代史，多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是有帮助的。他总结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变化，阐明了法、德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战争的经验，论述了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和发展。对帝国主义时代，他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工业资本的一种政策。他曾经谴责过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侵略行径和国际关系中的逞强欺弱，表示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甚至提出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抵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发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他心怀大志，寄望甚高，但飘摇不定，踉跄行步，终于失足跌倒。他最先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斥责日俄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又转向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立场，支持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参与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他矢志要以革命手段推翻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但是当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起来后，他又推行机会主义的策略；后来又以条件不成熟为根据，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世界近代史的看法以及他在世界近代史一些重大事件中的立场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具体分析，从此提高认识。

要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要多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他参加了筹建第二国际的工作和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活动，又是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成员，同德、法、英、瑞（士）、保、波等国的工人运动有广泛的联系。十九世纪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抬头之初，他第一个挺身而出，带头批判伯恩施坦主义，随后又写了大量著作，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各种形态——米勒兰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寻神主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后来他自己又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与伯恩斯坦之流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撕毁了第二国际的正确决议，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自相残杀。普列汉诺夫如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理论家堕落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引以为戒。

要学习和研究俄国近代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就更要多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他最先是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民粹派的领导人，后来转变成为俄国第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先从理论上给予了民粹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他创立了并且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工人和革命青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推动了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他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和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最初他曾经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孟什维克；后来又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当孟什维克堕落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时，他又同布尔什维克建立护党联盟，反对取消派；最终又同取消派妥协，转向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又拒绝参与孟什维克策划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叛乱。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上有过巨大功勋，后来犯过重大错误、复杂多变的人物，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具体分析，从中吸取教训。

普列汉诺夫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而且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中，曾经注意研究中国社会，并且热情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他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沙皇政府对华侨的迫害，赞扬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辛亥革命。在他的著作中，有过不少关于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國革命形势的论述。他的几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现代中国发生过较大的良好影响。所以，

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广大干部和青年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

总之，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烜赫一时的杰出人物，是欧洲思想界光辉灿烂的明星。他前期功勋卓著，中期摇摆不定，后期在机会主义泥潭中愈陷愈深，终于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的首领。盖棺论定，他是功过掺和、复杂多变的人物。盖棺犹未论定，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盖棺只是说明一个人事业的结束，然而时间的风雨将会对一个人毕生的事业不断净化，日益提纯。尤其是对普列汉诺夫这样复杂的人物的论定，要有一个过程，而难以一次终结。几十年来，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殊异，水平角度不同，加上政治形势多变，所以对他的评价不免高低起伏，左右偏颇，褒贬皆有，毁誉交加。一些孟什维克把他捧到九天之上，奉若神明；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把他踩入十八层地狱，当作牛鬼蛇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对他的评价也往往各有千秋，或者时有浮沉。如何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大量历史事实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稳定地评价他一生各时期、各方面的是非功过，具体、细致、恰当地分析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是值得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探索的一个课题。

本书主要是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的评传。至于他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是非功过，由于我们学识浅陋，加以篇幅有限，只能稍带涉及。

本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写法上基本上采取纪事本末体而不用类似编年体。以史为经、以事为纬，大体上按照他一生活动的历史顺序，依据若干大事划分专题，相对集中记叙并加评论，以传记为线索，以评论为鹄的。这种写法，各个专题之间时间上或有交叉，不是完全连贯的；然而便于读者对他一生的重大活动和主要思想获得比较集中的印象和比较完整的了解，也便于

我们对他的各时期、各方面的是非功过进行评论。在写作各个专题时，我们力图做到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同时，我们还通盘考虑到各个专题之间的联系和整个的布局。最后一章专写普列汉诺夫对中国的论述、在中国的影响，这似乎超出评传的一般范围；但是，我们认为，这也许可以体现出中国人写他评传的特点。书中章节的标题，大体上就是对他各时期、各方面活动的综合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历来众人评说不绝。本书是我们记叙普列汉诺夫一生活活动并作出评论的尝试，抛砖引玉，是所至愿。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酷爱学习和追求真理的学生	1
第一节 社会背景和家庭影响	1
第二节 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	7
第三节 在彼得堡炮兵军官学校和矿业学院	11
第二章 民粹派的青年革命家	18
第一节 参加民粹派的革命活动	18
第二节 加入“土地和自由社”	23
第三节 另组“土地平分社”	35
第四节 由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45
第三章 “劳动解放社”的主将 反击民粹派的先锋	53
第一节 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53
第二节 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	60
第三节 同民粹主义作斗争的功绩和不足	77
第四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和宣传家	84
第一节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84
第二节 为“劳动解放社”制定纲领	95

第三节	和列宁第一次会晤	103
第四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研究	112
第五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135
第一节	同恩格斯以及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 人的交往	135
第二节	参加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活动	146
第三节	同第二国际前期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160
第六章	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家	175
第一节	摧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体系	175
第二节	谴责米勒兰的修正主义的实践	194
第三节	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 经济主义	200
第四节	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追随者——“合 法马克思主义”	208
第七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221
第一节	协同列宁创办并主编《火星报》和《曙光》 杂志	221
第二节	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239
第三节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248
第八章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陷入机会主义	261
第一节	从支持布尔什维克到转向孟什维克	261
第二节	第一篇机会主义作品《不该这么办》的发 表	273
第三节	帮助孟什维克夺取《火星报》编辑部和 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	276
第四节	“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	284
第九章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特殊立场	292
第一节	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待日俄战争	292

第二节	抛出机会主义策略 退出孟什维克组织	298
第三节	起义前号召工人学会掌握武器 失败后又 说本来勿须拿起武器	313
第四节	在主要问题上充当孟什维克的“思想领 袖” 在个别问题上又同孟什维克有分 歧	321
第十章	对工会中立和工团主义的不同态度	344
第一节	坚持工会中立论的错误	344
第二节	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	366
第十一章	护党联盟的卫士 反取消派的援兵	378
第一节	同布尔什维克建立护党联盟	378
第二节	参加反取消派的斗争	386
第三节	同取消派斗争的功过	410
第十二章	同马赫主义和宗教神学战斗的哲学家	420
第一节	揭露马赫主义的唯心论实质	420
第二节	反对俄国马赫主义斗争的成绩和缺点	430
第三节	戳穿造神派和寻神派的邪说	435
第四节	剖析宗教的起源和本质	448
第十三章	学术成果丰硕的著作家	453
第一节	欧洲哲学史的宏儒	453
第二节	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巨匠	47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大师	508
第十四章	社会沙文主义的首领	538
第一节	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谬论	538
第二节	为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551
第三节	抵制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关于争取和平与加 强国际主义团结的倡议	557
第四节	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564

第十五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者	578
第一节	二月革命后返回祖国	578
第二节	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	586
第三节	维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595
第四节	否认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607
第十六章	政治悲剧适时终结 学术遗产久远生辉	614
第一节	既不参与反苏叛乱 又不改变陈旧观点	614
第二节	溘然病逝 隆重追悼	623
第三节	六十多年来对普列汉诺夫的纪念和研究	632
第十七章	瑕不掩瑜 寻根究源	656
第一节	纵观一生功大于过	656
第二节	攀登马克思主义高峰的条件	666
第三节	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原因	672
第十八章	热情关注东方邻邦 长期影响中国人民	680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论我国古代社会和近代革命	680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的事迹和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703
第三节	鲁迅与普列汉诺夫	725
第四节	瞿秋白与普列汉诺夫	745
后 记	762
插 图	照片八幅	

第一章

酷爱学习和追求真理的学生

第一节

社会背景和家庭影响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还是一个在沙皇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的国家。代表地主阶级的沙皇政府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对外穷兵黩武，积极扩张领土。一八五三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利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所取得的“欧洲宪兵”的地位，并趁土耳其（当时称奥斯曼帝国）衰落之际，发动了对土耳其的侵略战争，目的是企图夺取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半岛扩展势力。一八五四年，英国和法国为了自身在近东的利益而对俄国宣战。于是以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北岸、高加索半岛南端）为主要战场，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俄国的将领连一幅详细的军事地图都没有，俄军的补给又掌握在贪官污吏手中；英、法联军的大炮射程比俄军的远两倍；英、法的军舰用的是蒸汽发动机，俄国的军舰还是挂风帆的；英法能够架设铁路以运输军队和物品，俄国还是靠从农民手中征用来的马车。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腐败和无能，使俄国遭到惨

败，于一八五六年三月被迫签订《巴黎和约》，俄国被剥夺了在黑海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特权。沙俄的对外扩张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①，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炮声刚刚停息不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就诞生在黑暗、腐朽的沙皇俄国。他出生在俄罗斯中部邻近丘陵地带的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个小地主贵族家庭里。这个村子位于莫斯科市东南三百多公里，现为克拉斯宁斯基区。

“普列—汉（汗）—诺夫”这个姓氏的拼写，表明这个家族带有鞑靼人的血统（“汗”是“可汗”的简称，原是古代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父亲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曾经是一个骑兵上尉，在沙皇军队的参谋部当过参谋，参与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镇压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这个人办事认真，性情粗暴，刚愎自用，倨傲矜夸。他时常吹嘘说：沙皇的大王冠是由我们的小王冠组成的。一八七一年退伍后在一个新建立的地方自治组织机构中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他同时又是一个世袭贵族，家里拥有一百俄亩（合一百零九公顷或一千六百三十五亩）土地的庄园和大约五十个农奴。他的前妻的嫁奁比这些财产还多一倍。一八五三年前妻去世时留下三子四女；一八五五年他已四十五岁，又续絃娶了年龄相距一倍的二十二岁的玛丽娅·费得洛夫娜。她先后生了二子三女，普列汉诺夫居长。十二个子女的沉重负担使得家庭经济状

^①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是用旧历（即古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纪事，2月14日（旧历2月1日）开始改用公历。在19世纪时，公历比旧历晚12天；在20世纪时，公历比旧历晚13天。本书一般采用公历。

况日益拮据，负债累累^①。

普列汉诺夫的母亲玛丽娅·费得洛夫娜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侄孙女^②。她自幼丧亲后，在姨母家受到教养，长大后进唐波夫省贵族女子中学学习，享受公费待遇。一八四九年她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先后在省内扎顿斯克县和利佩茨克县的一些贵族之家担任家庭女教师。她思想开明，学识广博，性情温存，勤劳俭朴，是一个很贤慧的女子。

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思想、爱好、习惯、性格等各方面从小总要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普列汉诺夫十一岁之前在村子里度过了童年。一八六一年他不满五岁的时候，俄国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震动了全国的大事，这就是沙皇政府被迫于三月三日（旧历二月十九日）颁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雇佣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迫切要求废除人身依附的农奴制度。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可以随意买卖或者交换，甚至禁止结婚，虐待和杀害。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农民运动急遽高涨。一八五八年发生八十六次农民暴动，一八五九年增到九十次，一八六〇年又增到一百零八次。这些暴动不再和从前一样，只是反抗个别地主，而是指向整个农奴制度。沙皇政府为了防止革命，就被迫自上而下地进行局部改革。根据俄历“二月十

① 有关普列汉诺夫家庭的情况，详见塞·哈·巴伦：《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斯坦福大学1963年英文版（以下引用此书的材料简称：巴伦前引书），第4—6页。作者综合了俄国人写的有关普列汉诺夫早年生活的10本专著，但其中也有个别考证不周、叙述不准之处。

② 在有关的中文书中，有的译为外甥女，有的译为或写为侄女，均不确。

九日法令”，有两千二百五十万农民从地主手里赎回了人身自由，有四十六万一千个农民从地主那里赎回了小块“份地”。农民为此要交给地主二十亿卢布的赎金。农奴制度的废除尽管是很不彻底的，然而它毕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①，它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②这样一次全国性大变革不能不波及古达洛夫卡村。这里的农奴们（包括普列汉诺夫家的）也“解放”了，赎回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变成了自由人。这使得农民和地主表面上有了一点点平等地位，从而农民和地主的孩子也就缩小了距离，有时也能够玩在一起了。普列汉诺夫虽然是地主贵族之家的子弟，却不顾父母的阻拦，时常跑到村子里去和穷人家的孩子们一起玩，有时还到池塘游泳，一个车夫的儿子成了他童年要好的伙伴。古达洛夫卡这个村子座落在俄罗斯黑土地带平原的中间，四周环抱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普列汉诺夫常常成群结伙到林间原野、河畔田园，捉虫扑蝶、追逐嬉戏，受到大自然的陶冶；有时到茂密的树林里采蘑菇，或者在连绵的灌木丛中采莓果，在夏天农忙季节他也跟着哥哥们一起参加一点田间劳动。天真烂漫的多少接触一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童年生活使他热爱大自然、热爱故乡、热爱人民，使他从小不象一个贵族纨绔公子，倒有些布衣竖子的气息。他目睹农村里终年辛勤劳动的贫苦农民缺吃少穿、饥寒交迫，而悠闲寄生的地主贵族却饱食终日、花天酒地。尖锐的贫富对立在普列汉诺夫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对于普列汉诺夫以后立志革命，追求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真理，给予了最初的良好影响。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但是，对童年的普列汉诺夫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家庭。他的父母治家严谨，教子有方。

老普列汉诺夫望子成龙，要他长大后能出人头地，高升发迹，于是对少年普列汉诺夫要求十分严格。他使普列汉诺夫从小就养成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和独立料理自己事情的能力。他看见儿子无所事事时，就训诫他说：“为什么闲坐着呢？”并马上找来学习作业要他立即动手。他还经常用这样的格言教导儿子：

“活着永勉力，死去方休息。”^①这句话使小普列汉诺夫拳拳服膺，铭记在心，老父亲还注意督促小儿子锻炼身体。当他看见少年普列汉诺夫读书入迷之时，便为他的身体耽心，总要提醒他说：“若尔日，不要读这么多书，要留心别用坏脑筋！”^②他还让小儿子去游泳和骑马。还通过这些体育活动训练小儿子具有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严守纪律的精神。这个老骑兵上尉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教儿子骑马，时常叫儿子骑在烈马的背上，喊一声：“骑好！”就放开缰绳，让马飞奔而去。他母亲每次总是提心吊胆地向上帝祷告保佑他平安无事。尽管他有时不免摔下马来，然而终于受到了锻炼。比他大六岁的一个哥哥在假日里也通过和他作游戏的办法，培养他具有不畏强者的胆略。他哥哥还先后从牛角下和深水中救出了险些丧命的淘气的小弟弟。

当时俄国的农村小学主要是为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的孩子设立的，地主贵族之家的子弟多半是请家庭教师或者由父母自己指导学习。他母亲把心血都灌注在对普列汉诺夫的培养上，从小就给以细心、耐心、多方面的家庭教育，给他讲故事和传奇，

① 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7年俄文版（以下简称俄文版），第9页。

② 参见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新莫斯科出版社1922年俄文版，第7页。若尔日是俄文名字格奥尔基的爱称。

教他俄语、法语、算术和音乐等。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崇尚法国，社会上和学校里都以法语为第一外语，贵族子弟很多人都学法语。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在他母亲的精心培育下长进颇快。他母亲除了教他勤奋学习、博闻强记之外，在追求真理、向往正义、敏察事物、热爱生活、关心他人等方面言传身教，都给他以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身上一切好的，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但是有人认为：“他的第一个革命导师无疑就是他的母亲”^①，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并不具有革命思想。虽然他象父亲一样性格坚强，行动果断，可是也承袭了傲慢自负、孤芳自赏的毛病。他父亲在家里有一个藏书较多的小图书室，小普列汉诺夫也常常钻进书堆里，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增长了许多知识。一八六七年，普列汉诺夫十一岁的时候，他父母在利佩茨克县城买了五间房子，把家迁到县城居住。在家庭的教养下，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学识出众的孩子了。

由于受到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小普列汉诺夫想长大之后当一名军官，甚至幻想当统帅。他父亲由于厌腻军人的紧张生活，本来渴望他将来当一名文官，而他却鄙视文官地位低下，非要当个显赫的武官不可。于是父亲也就迁就了他的志向。当时，沙皇政府为了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办了很多军官学校。在离利佩茨克县南部不远的沃龙涅什市，就于一八五六年以原来的武备中学为基础，扩建举办了一所颇有名望的沃龙涅什陆军中学。普列汉诺夫的三个哥哥都曾在这所中学学习过，后来都成为军官。一八六八年夏天他也考取了这个学校。由于他人学前已达到了中学一年级的水平，所以一进校就直接被编到二年级学习^②。

^① 谢马什科：《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童年时代》，《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5期，第303页。

^② 巴伦的前引书误为1866年入学（见英文版第6页）。该校为6年制，普列汉诺夫在校学习5年，1873年毕业，所以应是1868年入学。

第二节 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

学生进陆军中学，按惯例必须接受一次特别的考试，就是“搏斗”。未满十二岁的普列汉诺夫被安排和一个大个子的高年级同学“搏斗”，经过一阵紧张的较量，大个子居然被击败了，两耳受伤，普列汉诺夫受到了老师们的夸奖。

他在陆军中学学习五年期间，兢兢业业，日以继夜，兴趣广泛，渴求知识。语文是打开一切知识宝库的一把金钥匙。学校里的优秀语文教师布纳可夫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曾因同情革命运动被沃洛果达专科学校解聘；他熟谙教育科学，要求学生严格。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普列汉诺夫的语文课学习得很好。老师还向他推荐俄国和世界的进步文学名著，他在课外饶有兴味地阅读俄国著名作家亚·谢·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年）、维·格·别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年）、尼·阿·涅克拉索夫（一八二——一八七八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三六——一八六一年）和德国诗人亨·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年）、英国诗人乔·拜崙（一七八八——一八二四年）等热爱自由、追求民主和同情人民的诗文名篇。这位语文教师给予普列汉诺夫很深刻的影响，指引他热爱文学艺术，教导他通晓文章轨范，帮助他掌握写作技巧。据说有一次布纳可夫读毕他的一篇作文之后曾经寄予厚望地讲过：“普列汉诺夫，你将成为一个大文豪。”^①正是由于中学时期在语文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普列汉诺夫以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时善于文起凤

^① 巴伦前引书，第7页。

云，笔走龙蛇。

陆军中学的学生并不局限于学习军事，他们当中许多人热心探讨政治和社会问题。普列汉诺夫不顾学校的规定，经常和周围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好奇地翻阅禁书，贪婪地嗜读俄国先进人士——康·费·雷列也夫（一七九五——一八二六年）、德·伊·皮萨列夫（一八四〇——一八六八年）、亚·伊·赫尔岑（一八一二——一八七〇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名著。他在陆军中学低年级时学习成绩斐然，然而到后两年因为醉心于泛读课外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不用心学习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以致使他的分数骤然下降。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深邃的作品和歌颂自由的热情洋溢的诗篇，是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良好教材，唤起了他对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憧憬，激发他去寻找革命的道路。尤其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一八六四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铁路》。诗中描写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被赶去修筑铁路，他们不论酷暑和严冬，一年到头老是驼背弯腰拼死拼活地卖命，把脚伸进没膝的泥潭中，连头发根都湿透了，筋疲力竭，忍饥受冻，住在土窑里，患着坏血病，遭受着包工头和官吏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识字的工头盘剥我们，
官吏鞭鞑我们，
穷困使我们倍受熬煎，
我们，善良的战士，
劳动人民的纯朴儿子啊！
历尽了万苦千辛。”^①

^① 《涅克拉索夫诗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第205—210页。

诗人刻划出工人们瘦骨嶙峋，脸色苍白，而包工商却“象一只熊似的肥胖、矮壮、满面红光。”诗人深信：俄罗斯人民会从这些吸血鬼手中解放出来，会用胸膛给自己铺平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总有一天，人民将昂首阔步前进在大道上，
频频高呼‘乌拉（万岁）！’
这样充满欢乐的美好前景，
难道是无法实现的吗？”^①

《铁路》这首深刻而形象地揭露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罪恶的诗篇，引起沙皇政府的极大恐惧。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因发表此诗而接到官方第二次要封闭该刊的警告。检查官指责这首诗是“可怕的诽谤”，是煽动人们“对最高政府”的仇恨^②。然而专制政府却无法禁止这首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热情讴歌劳动人民解放的诗篇广泛传播，它如此激动人心，经久不衰。到七十年代它还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里传诵。普列汉诺夫及其同班的一些同学深情喜读、反复记诵这首引人深思的诗篇，并且被它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多年后，普列汉诺夫回顾历史时写道：“我引述我个人生活中的一段回忆可以证明，涅克拉索夫以自己的诗歌唤起了并且表达了和他同时代的先进青年的进步意向。”“我当时是在陆军中学的最高年级学习。饭后我们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我们刚读完《铁路》，突然就响起了号声，召唤我们去上作战演习课。我们收起了书，就到军械库去拿枪，而刚读过的那本书中的一切还给我们留下强烈的印

① 《涅克拉索夫诗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第205—210页。

② 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936页。

象。当我们开始整队时，我的朋友索君（索洛弗佐夫）走近我跟前，紧握手中枪，低声细语地说：‘嗨，我要是能拿这支枪去为俄国人民战斗多好啊！’在仅离严厉的军事教官几步远的地方的窃窃私语，使我深深铭记不忘。以后每当我重读《铁路》时，都回忆起这些话。”^①他在陆军中学学习时，对学校校长的专横拔扈欺压学生，非常不满，常和要好的同学议论这些事情。尤其是他在三年级时，粗暴凶悍的陆军上尉特尔托夫调来担任该校校长，此人对学生实行体罚，随意鞭打，而且降低了伙食标准，同学们常为此义愤填膺，掩卷长叹。社会现实和学校环境促使年轻的普列汉诺夫容易接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涅克拉索夫的诗可以说最初激发了他的革命情绪。正是对进步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努力学习推动他去探索社会革命的真理。

普列汉诺夫在陆军中学读书时，还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吸引他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利用课外时间浏览了好多自然科学书籍，特别喜欢读英国生物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的著作。一八五九年问世的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曾经轰动了欧洲思想界和科学界。书中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了物种是不断变化的，论证了生物进化的原理，从而摧毁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他的这部名著启发普列汉诺夫去思考人类的起源和世界的由来这个根本问题。当时宗教迷信笼罩着黑暗的俄国，他父母都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东正教与天主教、耶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流行于东欧诸国）。学校里普遍开设有神学课，还要学祈祷、做礼拜、读圣经、唱赞歌，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力图用宗教对青年学生灌输迷信思想，麻痹他们的革命意识，不让他们探索科学真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89页。

理。普列汉诺夫在学校里，本来是很专心听老师讲解基督教的《圣经》的，他的神学课成绩考得很好。可是，自从细读了达尔文著作之后，他就时常把进化论和《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说教对照起来考虑。这就使他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于是每每向神学教师提出疑问；问得教师们张口结舌，无言答对。有时他还就人类究竟是猿人进化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的，同教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驳得神学课教师目瞪口呆，气急败坏。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宣布今后在神学课堂上不再同普列汉诺夫争论，并且严厉地训诫他说：“年轻人啊，不要争论啦！否则这神学课岂不变成了无神论课了吗？”普列汉诺夫能够迅速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勇于否定宗教信仰，敢于向神学挑战，这也表明他在学生时代就是积极追求科学真理的青年。

一八七三年八月，他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毕业了。从中学六年级毕业证书上可以看到，普列汉诺夫的学习总成绩在班上属于中等偏上。学校的考试成绩不可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学习水平。由于他在课外博览群书，在中学时期已经初步显露出儒雅不凡、博学多才的特点，因此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活百科全书”的雅号。

第三节

在彼得堡炮兵军官学校和矿业学院

中学毕业以后干什么？这时他还没有放弃将来当一名职业军官的志愿。一八七三年九月，快满十七周岁的普列汉诺夫和十个一起毕业的同学一起来到首都彼得堡，进入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军官学校继续深造。

彼得堡位于俄国西北部，波罗的海芬兰湾畔，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小村庄。从一七一二年彼得大帝以它为“西方窗户”，把首

都由莫斯科迁来以后，它就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第一次到达俄国第一大城市，使普列汉诺夫大开眼界，能够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他在首都既看到了沙皇富丽堂皇的冬宫，也看到了工人住的低矮阴暗的工棚；既看到了脑满肠肥的贵族官僚大摇大摆进出于宫庭，也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工人整天汗流夹背地在厂房里劳动。宽广而笔直的涅瓦大街，巍峨而别具艺术风格的花岗石建筑，安置有喷水池的公园，把全市许多岛屿连结在一起的蜿蜒曲折的桥梁……这一切都吸引住这位新从小地方来的年轻人。普列汉诺夫时常踟躕街头，留连忘返，甚至不想回兵营。无数新事物真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使他发现了并且思考了许多问题。

普列汉诺夫来到首都以后，他的同父异母哥哥米特罗凡千方百计地想把他引进贵族官僚的行列。他哥哥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士官生，在参谋部任职，结交了一批军官，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巧于钻营攀附，想取得高官厚禄。米特罗凡时常要他弟弟穿着华丽的礼服，周旋于上流社会，做个社交界的标致人物。有一次他哥哥带他去参加一个远亲、有名望的将军举行的晚宴。当这个将军以轻蔑的口吻称达尔文“是毛孩子”时，信服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列汉诺夫忍俊不禁，当而回击了这位“大人物”。他幽默地反唇相讥：“阁下，达尔文比你还年长呀！”使得这位沙皇的将军无言以对，十分窘困。还有一次，他随同哥哥乘马车奔驰在涅瓦大街，碰巧遇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威风凛凛招摇过市。米特罗凡赶紧叫弟弟低头哈腰，鞠躬致敬。然而他却昂首挺胸，依然故我，骄傲地反诘道：“为什么？我和他并不认识。”十七岁的军官学校的学生，竟敢顶撞声望显赫的将军，又目无至高无上的沙皇，这显示了普列汉诺夫内心里不满奉承谄媚之风，蔑视狗苟蝇营之徒；也显示了他决心不想步他哥哥的后尘，混迹官场，高攀权贵，以求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米特罗凡对他弟弟的这些表现

颇为不满，又听到他同情革命民主主义的言谈，更是蹙眉瞋目，怒形于色。从此兄弟之间隔阂越来越深。

在这所炮兵军官学校里，普列汉诺夫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努力攻读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著作。对革命民主主义理想的向往，加上对枯燥的军事训练的厌倦，对等级森严的官兵制度的反感，尤其是对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深切同情，终于使他放弃了将来当一名职业军官的理想。他在炮兵军官学校只学习了四个月，就以身体不好为借口申请退学，请求允许他转到普通的高等院校学习，很快就得到皇太子亲自“谕旨”批准。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他回到了故乡古达洛夫卡村。自从这一年的五月他父亲病死之后，家务和债务的重担落在她寡母的肩上。为了糊口养家，他母亲只好卖掉大部分土地。村里的农民们想买这些地，但出价比各处商人偏低。他母亲当然想把地卖给愿出高价的商人。普列汉诺夫在家听到这些情况后，基于同情贫苦农民的处境，就劝说母亲把地卖给本村的农民们。母亲如果不答应，他甚至扬言把商人运来准备买地的粮食烧毁；慈母终于被说服了，村里的农民高兴地买到了一些土地。当古达洛夫卡的农民们知道此事原委之后，都称赞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在家里呆了十个多月。他除了陪伴、安慰母亲之外，还给弟弟妹妹们讲故事，尽量启发他们不信上帝。在乡村，他得过一场重病——心绞痛，接着房屋又失火。他们仅仅拿出一部分衣物和书籍，只好又搬到利佩茨克县城去住。这半年时间，他主要精力用于复习功课，准备报考普通大学。他虽然对文学和社会科学甚感兴趣，但是这时有不少革命民主主义者都很注重自然科学，想用科学救国，并造福人民；加上这时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迅速，正出现工业建设的热潮；因此他想进工科大学，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可是，他的数学和物理只有中等成绩，

要下苦功提高；尤其是化学，他学得很少，更要加倍努力。

一八七四年八月底，他再次到首都彼得堡应试，九月考取了彼得堡矿业学院。他在参加升学考试时与后来成为俄国著名短篇小说作家和诗人的加尔洵(一八五五——一八八八年)认识，以后并结为知友。尽管由于租不起单独的房子住，学习条件比较差，他还是力排嘈杂，刻苦砥砺。第一学期考试结果，他名列前茅，特别是对化学课学习得津津有味，成绩卓著。于是入学才几个月，他就得到了叶卡特林娜^①奖学金，这是专门奖给学习优秀、家境贫寒的大学生的。从此，他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能够和一些同学合伙在校外租两间房子，在那里生活和学习。房间里还摆满了各种化学实验仪器，他也时常动手做实验。

除了自然科学课程外，他还继续学习法语，开始新学德语，广泛阅读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学艺术的书籍，以及各种进步报刊。漫步书林，开物成务，读书和思考已成为他精神上的享受，生活上的嗜好。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对于他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他回忆说：“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分析他的观点成为我的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②。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杰出代表，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作家。他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因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曾坚持绝食斗争，并且写出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长篇小说《怎么办？》。此书于一八六三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后不胫而走，出现了许多油印本、手抄本，迅速传遍了全国，强烈振动了俄国先进的知识界。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谁

① 叶卡特林娜二世(1729—1796年)，俄国女沙皇。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33页。

没有读过和反复读过这部著名的作品呢？谁没有迷恋过它，在它的良好的影响下变得更纯洁、更好、更有朝气和更勇敢呢？谁没有被主人公们的道德上的纯洁所感动呢？在读了这部小说之后，谁不思考自己的生活、不对自己的志趣和倾向加以严格的检查呢？我们全都从这部小说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以及对无私的劳动的
伟大信托……^①。

“自从俄国有印刷机以来直到如今，在俄国还没有一部印刷出来的作品取得象《怎么办？》那样的成功。”^②书中塑造了好些六十年代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指出了革命者应当怎么办、应当怎样去为人民的利益和光明的未来斗争，揭示了一个人如果不为别人的幸福奋斗他就不可能幸福的人生哲理。这本书成了俄国好几代革命者的生活教科书和行动指南。普列汉诺夫对它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揣摩、对照、思考。

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发下，他结合自己长期目睹沙皇专制制度的罪恶和工农大众的疾苦，时常思考俄国社会的前景和革命的出路问题，时常思考他应该怎么办？应该为人民做什么？他日益感到：不改变社会制度，不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研究自然科学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将来要成为一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信念严重地动摇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号称民粹派的革命团体，它的活动日益增强，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着重在首都的大学生中到处串连。因缘际会，机遇巧合，恰恰普列汉诺夫的同屋同学、外科医学院学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同

① 这两行诗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叶列莫施卡之歌》。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131页。

革命民粹派的小组有联系。他常常留这些小组的成员在屋里过夜，这样就使普列汉诺夫也认识了他们。当这些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粹派青年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象磁铁一样，对他产生了强大的难以想象的吸引力。终于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业，投入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中去。一八七五年，他就同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到一八七六年，他刚满二十岁，实际上是以革命为职业了。当时教过普列汉诺夫的著名化学教授李森科，后来还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普列汉诺夫放弃学业、投身革命活动深表惋惜，认为这是“科学的损失”。其实，当时俄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改变社会制度，他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需要。如果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损失的话，那么在社会科学和改造社会方面却有很大的收获。到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底，矿业学院当局竟以普列汉诺夫“学习跟不上”为理由把他开除出校。这样他就最终脱离了学校，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广阔的社会，踏上革命的征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岁以前是一个酷爱学习的学生，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时代是一个人由幼稚无知的孩子成长为谙知世故的成人的过渡阶段，是一个人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准备阶段。一个人是否在学生时代打下牢固的基础、养成良好的习惯、掌握灵活的方法，这对于一生的成就和贡献有很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中学到大学，上过三个学校（陆军中学、炮兵军官学校和矿业学院）。他认真学习俄语、法语和德语，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都十分喜爱。在学生时代他不让岁月蹉跎，时光虚度，尽情漫游在科学和艺术的海洋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勤于刻苦钻研，善于独立思考，长于文思论辩，敏于新鲜事物。这些优点为他日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在学生时代，他勇于摆脱传统观念，敢

于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志向。在反动统治的黑暗的俄国，他不信宗教神学，鄙视帝王将相，别具只眼；不当军官，不当工程师，两易其志；热衷科学和进步文学，同情劳苦大众；痛恨专制制度，向往革命民主主义。青年学生普列汉诺夫终于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思想影响之下，在革命民粹派直接引导之下，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

第二章

民粹派的青年革命家

第一节

参加民粹派的革命活动

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俄国农民世世代代进行了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了许多农民革命家。到十九世纪，随着俄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出现了三代革命家，即贵族革命家、平民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期。列宁于一九一四年写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曾把俄国近代革命运动分成这样三个时期：“一、贵族时期，大约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六一年；二、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三、无产阶级时期，从一八九五年到现在。”^①

俄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发轫，是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算起的。十二月党人是贵族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几乎全是贵族，大多数都是军官，受到西欧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影响，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制度。十二月党人主要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起义终于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巴·伊·佩斯捷尔（一七九三年生）、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一七九六年生）、米·巴·别斯土日夫-留明（一八〇三年生）、彼·格·卡霍夫斯基（一七九七年生）和康·费·雷列也夫（一七九五年生）五个人于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起被处绞刑。十二月党人的失败终于唤醒了俄国贵族青年赫尔岑，他决心要为十二月党人这些争取自由的先驱者报仇雪恨。一八三三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西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反对沙皇制度的学生民主运动，为此先后两次遭到反动政府逮捕和流放。一八四七年他被迫流亡西欧，这时正逢西欧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众说纷纭，流派林立，赫尔岑由于他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而通过他与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的结识，接受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并随即把它介绍、输进俄国。他曾经设想俄国可以利用农民公社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赫尔岑于一八五五——一八六九年在伦敦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北斗》，封面上就印有被绞死的五名十二月党人的半身像。一八五七——一八六七年他还出版了著名的《钟声》杂志。这两种革命刊物向俄国先进人士灌输了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激励他们奋起进行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斗争。赫尔岑成为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度等重大改革的思想先驱，成为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崛起的引路人。

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等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通过他们的著作、创办的期刊（《现代人》与《祖国纪事》）和建立的小组，积极鼓吹革命民主主义，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沙皇专

制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岑的设想，提出了以俄国现存的农民公社为基础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方案。

六十年代的废除农奴制等改革措施，只是掀开了沙皇专制制度坟墓上的石碑，整座占塚还远没有被刨掉。许多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依然原封不动。农民向地主交付的高价赎金要分四十九年还本付息，地主还建立了乡公所、法院等机构来统治农民，“被解放”的农民仍旧不时遭到体罚。六十一——七十年代农民骚动和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为了领导农民运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名为《土地和自由社》的秘密革命组织，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都设有分部，活动时间是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四年。由于他们没有深入农民群众，加上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所以成效不大。但是，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影响下，于七十年代中期在俄国出现了一种名为民粹主义的新的革命思潮。一批以青年大学生为骨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精粹、人民的救星，要解救人民的痛苦、解放人民而斗争。民粹主义一词是在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间流传开的，它反映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流派的特点。民粹派、民粹主义者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就是当时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主观上想象的斗争目标就是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封建制度，使俄国避免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失业、破产、经济危机等等祸害，直接建立西欧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可以循着自己的“特殊”道路。西欧有许多国家，这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相当尖锐，无产阶级的力量蒸蒸日上、茁壮成长。所以西欧的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而俄国这时资本主义还刚刚开始发展，工人多是刚撂下锄头、犁耙的农民。尤其是在俄国农村中自古以来便有了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农

民公社的形式。即使在一八六一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之后，农村中的大半土地仍然还归农民公社所有。即是说，农民用二十亿卢布从地主手中赎回的土地并没有归农民自己私人占有，而是归农民公社公共占有。由沙皇政府官僚和地主富农控制的农民公社制定出土地使用规划，然后定期分配给农民使用。农民对这些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民粹主义者幻想不要发展工业，就以这种形式上公有制的农民公社作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所以民粹主义这种思潮，可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赫尔岑早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就已为这种理论奠定了基础，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家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到七十年代才完全形成。

革命民粹派分子不再是把这种理论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之实践。他们决定“到民间去”，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开始了群众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一批批革命青年组成活动小组，换上农民的服装，穿上农民的木鞋，打扮成木匠、铁匠、泥瓦匠、小商人等等，纷纷下乡。他们要仔细考察农民的生活，具体了解农民的要求，立即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有一部分民粹派小组在城市工人中活动，首都的大学生有很多人成为民粹派的积极分子。如上章所述，有一些民粹派分子与彼得堡矿业学院的学生有联系，一八七五年普列汉诺夫从同屋同学那里认识了民粹派分子。在这里，他结交了比他大四岁的著名民粹派活动家谢·克拉夫钦斯基（一八五一——一八九五年），还有后来成为他的亲密战友的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一八五〇——一九二八年）和列·格·捷依奇（一八五五——一九四一年）等。他很快就加入了由比他大十岁的经济学说史专家伊凡·费多尔维奇·费先柯领导的小组，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这位老师给他们讲解政治经济学，并阅读一八七二年刚由德文译为俄文在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这时他只是初次接触到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过，初步的学习使他开始知道了应该首先从经济关系着手去分析一个社会形态，知道了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矛盾和罪恶，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当然，这时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还是民粹派那一套在推翻沙皇政府之后以农民公社为基础实行公共占有土地、公平分配产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一八七六年初，刚满十九岁的普列汉诺夫开始和首都的革命工人建立联系。工人中的民粹派小组成员多次在他房间里开会。不久他就参与工人小组的领导工作，和他们一起学习，探讨怎样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他还学会联络各地战友，保存秘密文件。一八七六年三月，在沙皇密探的搜查中他第一次被逮捕，然而没有发现什么“不轨”的证据，只经过几小时的审问就被释放了。敌人的迫害更坚定了他从事革命的信念，更促使他积极参加工人小组的活动。除了对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外，他还在工人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认真备课对工人讲解文化知识。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的斯·尼·哈尔士林（一八五七——一八八二年）和莫依先科。工人们欢迎他到家里作客。他同工人们谈得很融洽。同工人的交往给予了普列汉诺夫以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们给我产生的印象是极强烈的。我看到并且了解的唯一点是，所有这些无疑属于‘人民’之列的人们是很有觉悟的，我能够同这些人们交谈得这样真挚、诚恳，正如同自己熟人——大学生们谈话一样。”当然，这时他还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开导工人，而民粹派那一套落后的理论是不能满足当时先进工人的要求的。普列汉诺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听了我们的话，工人可以激起对政府的仇恨和满怀‘造反’精神，可以学会同情‘粗野的’乡下人，并希望乡下人能够一切如意。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明了他本身的任务是什么，即无产者的社会政治任务是什么。他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来

探索这个问题。”^① 纵然如此，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民粹派分子还是坚韧不拔地坚持他们这一套革命宣传工作。

一八七六年夏天，普列汉诺夫最后一次回乡探亲，其言谈举止处处都使人感到他已经成了一个要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者，这在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全家都为他担忧，他的母亲曾要求他改弦更张，埋头学业。他尽力解释说，他正是遵照母亲从小灌输给他要追求真理和向往正义的教诲，才自觉地抛弃学业、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听了这种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母亲无言以对，而只能怏怏嘟囔着：“可是这样下去你会死的！”^② 他不希望使慈母生悲，但革命决心坚如磐石，不可改易。他恳切地反詰道：“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考虑，那将是什么世道呢？”^③ 年终将至时，他返回彼得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中去。

第二节

加入“土地和自由社”

为了加强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各地民粹派小组的代表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初在首都彼得堡集会聚商，建立了一个名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的全国秘密革命团体，从一八七八年改称为“土地和自由社”。这个团体的名称就表明，它是要继承并发扬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领导的“土地和自由社”的革命传统。这个团体的创立人和领导人就是普列汉诺夫、马·安·纳坦松（一八五〇——一九一九年）、亚·德·米哈伊洛夫（一八五五——一八八四年）、克拉夫钦斯基等，成员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40、141页。

^{②③} 见美国学者巴伦于1959年夏天在巴黎访问普列汉诺夫女儿的纪要（巴伦前引书，第17页）。

共约五十人。他们认为：“在各个时代，俄国人民不论在何处并以何等规模掀起斗争，提出的要求都是土地和自由”，因此他们在纲领中主张“土地要成为耕者的共同财产；自由要成为人人能自理的普遍权利。”^①它改进了前一阶段“到民间去”的弱点，把零星的突击性的宣传变为在农村建立固定的据点，并且制定了严密的活动计划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的建立，标志着民粹主义运动由自发分散的活动进入统一集中领导的新阶段。

当时在民粹派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家有两个人：巴枯宁和拉甫罗夫。他们曾经被称为“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的双璧”^②。这两个人都鼓吹民粹派这一套英雄史观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具体主张又有所不同。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一八二三——一九〇〇年）出身于地主之家，一八四二年毕业于炮兵学校之后长期在军事学校执教，一八六〇年出版《个性论》。他在扉页上写着把此书“献给赫尔岑和蒲鲁东”，可见他是深受民粹主义始祖赫尔岑和法国无政府主义始祖蒲鲁东的影响。他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鼓吹革命思想于一八六六年八月被捕，随即被流放。在流放所他继续写了许多革命论文，尤其是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历史书简》一书简直成为七十年代上半期民粹派青年的“福音书”。他们争相传阅，尽管传得又旧又破，仍然难舍难分。许多人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一面细读，一面激动得热泪盈眶。普列汉诺夫开头也深受此书的影响。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认为“批判的思维着的个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和历史发展的中心，知识分子应该去解救大众的疾苦，一个有理智有道德的人应该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并为这崇高理想而

^①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原载1878年10月25日出版的该刊第1期，见《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俄文版，第323页。

^② 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第135页。

自我牺牲。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上述农民社会主义、建立在农民公社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本书曾经极大地激励民粹派青年涌跃到民间去宣传社会主义。拉甫罗夫曾被称为“宣传派”的思想领袖。随着“到民间去”宣传运动的衰落，许多民粹派青年急于要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于是被称为“暴动派”领袖的巴枯宁影响日益扩大。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出身于俄国贵族官僚家庭，一八三三年在彼得堡炮兵学校毕业后当过炮兵军官，四十年代到西欧后深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期间曾参加过布拉格和德勒斯顿的暴动，在起义中他曾经是“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①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引渡给俄国政府。他曾奴颜婢膝地向沙皇写了《忏悔书》。一八六一年从西伯利亚流放所逃到英国后又从事革命活动。一八六五年他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革命协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宗派组织，鼓吹依靠游民、流氓、刑事犯等实行暴动，妄图一下子消灭任何国家政权，实现个性绝对自由。巴枯宁本人曾先后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策划这种绝望的暴动。巴枯宁在《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一八六六年）、《革命问答》（一八六九年）、《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八七三年）等著作中宣传任何国家政权都是反动的理论，胡说：“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彻底消灭一切现存的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建立以自由、理智、正义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为此就要“破坏一切”、“摧毁一切”；他还鼓吹俄国的革命条件业已成熟，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用来燃起总暴动烈火的火星。他的这些观点和作法吸引了七十年代下半期大部分民粹派青年，在《土地和自由社》中占了上风。尤其是巴枯宁的新书《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成为醉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7页。

暴动的民粹派青年的新“福音书”。

“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建立伊始，就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召开会议，决定要在首都大街中心喀山大教堂前举行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会议委托普列汉诺夫来筹备这件大事。他换上工人的服装，在工厂区奔走、忙碌了一天，联络工人，组织队伍，准备如何开展革命宣传，考虑怎样对付敌人镇压。十二月十八日（旧历十二月六日），从清晨起就有一批批工人和大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到喀山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家工厂的整个车间的四十多个工人全来了。为了转移警察的视线，他们按事先的计划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假装是来到这里作礼拜的。当广场上已经聚集有二百至二百五十名群众的时候，有人提议为“上帝的仆人尼古拉”等人的健康祈祷。于是大家都俯首静默，并用右手在胸前划十字，为这些人祝福，祈求上帝保佑。当广场上一片寂静、众情肃穆的时刻，有一个戴着大学生帽子的年青人，仪表端庄，浓眉长睫，气宇轩昂，健步走上教堂的台阶，目光炯炯，以洪亮的声音向群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朋友们，我们刚才在给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和其他为人民的事业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健康而作祈祷。集合在这里的工人们，你们很久以前就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谁。这是个作家，他由于把‘救星’沙皇恩赐的自由说成是骗局而于一八六四年被流放去服苦役……。这种人——不仅是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很多很多……。”听众们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个年青人激昂慷慨的演说。许多陌生人都在细心打听这个讲演者是谁？原来他就是彼得堡矿业学院的学生普列汉诺夫。他挥舞着强劲的拳头，音调愈来愈激越，情绪越来越高昂。他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号召大家要象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成为把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战士。他在演说结束时号召说：“朋友们！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向整个彼得堡、整个俄国宣布我们同这些人完全团结一致。我们的旗帜就是他们的

旗帜。在这旗帜上面写着：“给农民和工人以土地和自由。”最后他振臂高呼：“土地和自由万岁！”普列汉诺夫的演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在听众的海洋里也激荡着“土地和自由万岁！社会革命万岁！”的回声。演说刚完毕，站在他身旁的十六岁的工人雅沙·波塔波夫立即摊开预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土地和自由”字样的红旗，带领群众沿着喀山大街进行了示威游行。这是首都工人第一次举行政治示威，它揭开了新形成的无产阶级参与政治斗争的序幕；这也是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组织政治示威，从此谱写了他的光辉革命斗争史的第一篇章。

警察当局早已紧急加派皇宫卫队在广场警戒。当普列汉诺夫正发表演说时，埋伏在教堂附近的警察就想下手捕人；只是由于人山人海紧紧地围成好多圈，警察的阴谋才未能得逞。普列汉诺夫刚演说完毕，民粹派工人米特罗伐诺夫机警地立即帮他摘下大学生帽子，给他戴上一顶大沿帽子，便于他很快逃脱，幸免于难。凶手们向游行猛扑过去，革命的群众边抵抗边撤退，结果还是有三十一人被捕。反动当局因没有抓到普列汉诺夫而恼羞成怒，第二天又到他的住宅搜查，而且到处继续追缉。为了保护普列汉诺夫，“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领导上决定遣送他暂时出国躲避。一八七七年初，他秘密地逃到国外，经过瑞士先到德国，然后又到法国。在柏林，他认识了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初步了解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几个星期之后，他来到巴黎。在这里他会见了好多俄国侨民中的民粹派战友。他特别带着介绍信去拜会他仰慕已久的民粹派大师拉甫罗夫。前面曾提到，拉甫罗夫是民粹派中“宣传派”的思想领袖，他于一八七〇年三月从乌拉尔山流放所逃亡到西欧，这时正住在巴黎埋头著述。普列汉诺夫经常到他家里求教，并从他摆满书架的藏书室里借阅在俄国看不到的各种革命书刊。拉甫罗夫一再开导普列汉诺夫要百折不回地坚持在农村开展和平宣传工作，要依靠农民和农民公社去实现社

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曾向他保证：回到俄国以后一定谨遵所嘱，力行弥笃。

在国外流亡七个月之后，他于一八七七年七月混在走私犯中秘密回到俄国。这时首都警察局仍在追缉他，正好他也想下乡工作，于是就转到远离首都的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他本来想找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业为掩护，可是未能如愿。他在萨拉托夫工厂的工人之间组织了地方民粹派小组，开展革命宣传，号召工人起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有一次警察当局偶然搜查住宅时逮捕了他。由于他巧于以假公民证为掩护，机智地骗过了愚蠢的敌人，只经过简单的审讯就被释放出来了。

看来在萨拉托夫已经难于立足，普列汉诺夫只好又回到彼得堡。这时首都的“土地和自由社”因许多成员被捕而频于瓦解，他回来后立即着手整顿并发展组织。一八七八年一月八日，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溘然长逝。“土地和自由社”决定参加葬礼，以表达革命知识分子对这位《铁路》作者的深切悼念，并利用这次机会进行革命鼓动，扩大自己影响。大家一致推举普列汉诺夫再次发表演说。一年前他在喀山教堂广场上的第一次政治演说已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正在彼得堡开会的南俄暴动派分子表示坚决支持“土地和自由社”代表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公开出席葬礼并献花圈。为了准备对付警察的逮捕并保护普列汉诺夫和花圈，民粹派分子甚至暗带了手枪。葬礼在沃尔科夫墓地举行，灵柩上摆满了花圈，其中有一个花圈的落款是“社会主义者敬献”，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伙革命民粹派分子专门定购的。当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演中说到涅克拉索夫作为一个诗人不比普希金低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等人众口一词地大声喊道：“他比普希金高！”接着普列汉诺夫发表了墓前演说。他强调了涅克拉索夫诗篇的革命意义，指出了涅克拉索夫用怎样鲜明的语句描写了受专制制度压迫的人民的苦难。他还讲到了

涅克拉索夫第一次在俄国合法刊物上颂扬了作为现代革命运动先驱者的十二月党人，最后他表示要发扬涅克拉索夫的革命精神，为推翻专制制度而奋起斗争。四十年之后，他回忆了这次民粹派分子参加葬礼的情况，并且忏悔了自己在对普希金的评价上“犯了错误”^①。因为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是第一个深刻揭露沙皇专制主义的伟大诗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密友；涅克拉索夫是继承并发扬了普希金以来的优秀革命文学传统。他们俩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者是贵族革命时期，后者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春兰秋菊，各有所长，很难说后者超过前者。

一八七八年上半年，普列汉诺夫主要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一月间奥斯特洛夫子弹工厂因资本家只顾压榨工人而不管安全，发生了火药库爆炸事件炸死六个工人，普列汉诺夫协同工人运动活动家哈尔士林等组织该厂工人参加了死难工人的葬礼，并且把葬礼变成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示威游行。普列汉诺夫执笔起草了传单：《致子弹厂的工人》。传单号召工人们不要期待沙皇当局的恩赐，而要起来同专制政府斗争。传单散发后深深打动了工人的心弦。满腔怒火的众多工人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反动当局派遣的警察动手捕人，在场的工人们奋起反抗，强大的人流象激浪向警察猛冲过去。普列汉诺夫趁机机智地救出了工人演说者，使他安全脱险，免遭逮捕。他后来追忆说：“子弹厂工人们对于警察的齐心协力的抵抗，无论是对彼得堡工人小组还是对‘反抗’的知识分子，都造成了良好的印象。”^②三月间，新新纱厂因资本家降低计件工资而自发爆发了罢工，并且建立了罢工委员会，要求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普列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7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160页。

汉诺夫积极参与了领导工作。他曾在工厂的大院里向罢工的工人宣讲：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同时，还起草了传单，在“土地和自由社”的秘密印刷所刊印后散发出去。在传单中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热情号召各厂工人积极支持新新纺纱厂工人的罢工，动员各厂工人募捐支援罢工者。他写道：“工人朋友们！现在新新纱厂的工人已经连成一片，始终团结战斗。你们需要支持他们……难道能让各种骗子欺负工人们吗？不能，你们要为他们募捐；现在你们帮助他们，而以后他们将帮助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住在天堂，你们也会要同雇主打交道，……大家要互相帮助——和大伙儿一起，就不至失败。”^①他提着沉甸甸的旅行皮包亲自把传单送到各个工厂。当他完成任务后路过一个工厂大门时突然被警察抓走，这是他第三次被捕。他仍然以随身携带的世袭贵族马克西莫夫的假身分证骗过了敌人，并且愤怒地斥责警察的专横。只经过一天，终于获释。工人们知道他平安获释后，都纷纷到他家里看望，向他倾谈这次罢工的经过和经验。在罢工的最后几天里，工人们曾涌向皇宫，递交了由“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代为起草的控告资本家的控诉书。其中严正地指出：“如果我们的这些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指望谁会来支持，而只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由于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战斗，使得在罢工中提出的经济要求部分地得到满足。普列汉诺夫随即就这次罢工连续向合法的报纸《新闻报》写了多篇不署名的报导，并作出总结性的短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这时他为了进行革命运动，经常仆仆风尘，四处奔波，餐风露宿，忍饥受冻。他自知“土地和自由社”的经费微薄，多是出于自由捐献，来之不易，所以他从不肯多花大家一点钱，自奉十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382页。

分俭朴。沸腾的战斗生活使他忘记了疲劳，置生活艰苦与生命危险于度外。

一八七八年春天，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受委托参与“土地和自由社”纲领草案的定稿工作。这个纲领提出“我们最终的政治和经济理想是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当前的要求就是平均分配土地、实行公社自治，为此就要进行组织工作和破坏工作，通过知识分子在工农中宣传鼓动，进而实现暴动^①。这个纲领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纲领，同时表明普列汉诺夫这时是俄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这年夏天，他受组织的委托来到顿河地区，宣传这个纲领，支持哥萨克人民为反对沙皇政府搞的地方自治局而开展的革命斗争。哥萨克人本来是俄国中部的农民，他们在十六世纪时因不堪农奴制度的残酷剥削而逃亡到俄国南部顿河两岸荒野从事耕种。当地人就称这些异乡人为“哥萨克”，意为酷爱自由的人。沙皇政府后来在他们当中招兵买马，不少哥萨克人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历次的战争中掌握了优异的骑术和武艺，成为著名的轻骑兵。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度改革之后，沙皇政府被迫在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治制度方面作了一点微小的改革，例如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局和市议会，准许在贵族之外还有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参加，给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点缀些“民主”的门面，以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一八七八年，沙皇政府也要在顿河地区建立地方自治局，当即遭到哥萨克人的反对。哥萨克人主张真正的民主选举，反对反动当局操纵选举，他们认为沙皇政府搞的自治局实则是大骗局。哥萨克人互相串连，集会议论，坚决反对在他们那里实行什么地方自治，甚至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普列汉诺夫到达顿河地

^① 详见《“土地和自由社”纲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第217—220页。

区后就尽力推波助澜，通过宣传争取了几十个哥萨克青年，使哥萨克风潮越闹越大。他强烈地希望“使静静的顿河骚动起来”。他以“土地和自由社”的名义起草了革命传单《致顿河、乌拉尔、库班、捷尔斯科等地光荣的哥萨克军队》，鼓动哥萨克骑兵们发扬光荣传统，奋起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他深感孤自一人无力把握几个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大量印刷这个传单，为了吁请更多的同志来加强这里的工作，他于十月二十七日匆忙只身返回彼得堡求援。可惜正赶上首都发生了大逮捕，“土地和自由社”的许多领导人已落入警察局之手。他艰难地接上了关系之后，领导上认为已无力再派遣人到哥萨克地区工作，连普列汉诺夫本人也被留在首都。他千方百计印刷出来的传单已无法运到顿河区。他还争取写了一篇关于哥萨克骚动的文章登在一八七八年末出版的《土地和自由》杂志上。然而，哥萨克的风潮终因缺少正确的领导而被沙皇政府平息下去了！

普列汉诺夫很快又转到首都工人小组中开展工作。两年多的实际工作使他感到要加强理论上的研究和宣传。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他发表了第一篇理论性文章《争论什么？》，在维护民粹派关于农民公社的传统观念的同时，提出了工人必然参加革命运动的新见解。一八七八年年底，他进而写成了第一篇正式论文《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一八七九年一月和三月出版的《土地和自由》杂志第三期和第四期上以社论名义发表出来。这篇论文表明：他对民粹主义观点已经开始动摇，但对马克思主义又似懂非懂。他在文中竟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什么“洛贝尔图斯、恩格斯、马克思、杜林组成为社会主义积极发展时期的一代杰出人物。”^①他一方面引证马克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57页。

思的话，认为依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社会不能跳过自己发展的自然阶段；另一方面又认为规律带有偶然性，各个社会经济阶段的更替不是绝对的。他的中心意思是以此论证俄国依靠农民公社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说：“当我国的多数农民保持农民公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祖国已经走上那种规律的道路，根据这种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它前进道路上必经的一站。”^①他竭力说明：“历史绝不是一个单调的机械的过程”，资本主义只有在“农民公社早已毁于对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斗争中的西方”，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先行者；而在公社“构成我们农民对土地关系的基本特点”的俄国，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所以，我的结论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军事的人民革命组织，以便尽可能地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人民革命的大变革。”^②普列汉诺夫在阐发民粹主义的传统观点时，提出了引人注意的新看法。他认为过去民粹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农村群众上，在城市中进行宣传的目的仅仅是想从城市工人中训练出几个到农村去的宣传员，“因此使我们现在得到一种非常不幸的结果。”他根据自己的切身工作经验，提出了“在城市工人中所费的力量虽少，但社会主义思想却深深浸入工人队伍之中。”可惜近几年来大工厂发生罢工时，我们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几乎丝毫都没有，有时简直一无所闻，有时他们虽企图行动，但他们的影响却非常微小。”^③他认为民粹派低估城市工人在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他说：“我们的城市工人虽然不象西欧工人一样与农村脱离了关系，但是我们的工人是人民中最活跃、最积极、最能帮助居民阶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52、66页。

③ 同上书，第69—70页。

层走向革命化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人与西欧的工人是一样的。因此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必将成为农民的宝贵的同盟者。”^①他建议自己的组织要大力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他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造成空前未有的、独立的、自信的和坚固的群众。从前因为没有这种方法，所以常被几十个警察把大批的群众驱散，吓跑。”^②普列汉诺夫这时虽然还信守工人是农民在社会革命中最可贵的同盟者这一民粹派的信条，但是，他是民粹派中开始觉察到工人重要性并在报刊上宣传这种观点的第一个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能达到这个新的认识，是与他两年来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活动有密切联系的，也是他善于思考问题、善于总结经验的一个突出表现。

普列汉诺夫的第一篇论文显示了他的才能，在民粹派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从一八七九年四月出版《土地和自由》杂志第五期起，他就成为编辑部的成员了。他经常结合报刊的理论宣传工作，在首都公共图书馆翻阅各种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的书籍，埋头钻研，反复思考，动笔撰稿、组稿、改稿。

到一八七九年，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已经因到处碰壁而衰落了。这些穿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以救世主的姿态下乡，他们同农民并没有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农民并没有由于他们的宣传而行动起来。真如“急雨渡春江，狂风入秋海，辛苦总为君，可怜君不解”^③。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被捕，另一部分人只好又回到了城里来。下一步怎么办？在民粹派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69—70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梁启超于1903年写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曾录此诗形容俄国民粹派。见《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405页。

个组织。

第三节

另组“土地平分社”

以米哈依洛夫、安德烈·热利亚鲍夫(一八五〇——一八八一年)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民粹派分子,对于“到民间去”的方针已经失望,甚至绝望。但是,他们丝毫不认识自己的英雄史观的错误,反而埋怨农民无知,责怪“农夫俗子”落后。既然不能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于是他们就决定放弃土地斗争,不要发动人民,自己单枪匹马、孤家寡人地盲干,采取个人恐怖的暗杀手段,指望通过刺杀沙皇、大臣等反动头子来消灭专制制度,迫使政府给予人民民主和自由。这些人被称为“政治派”。暗杀最初还只是作为民粹派分子的一种自卫报复手段,渐渐发展为一种主动进攻的主要手段。为了镇压“到民间去”的运动,沙皇政府到处搜捕民粹派分子。一八七七年有“五十人案”,一八七八年有“一百九十三人案”,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或流放。镇压激起了民粹派分子的暴烈反抗。一八七八年二月民粹派分子查苏利奇(女)枪击了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八月克拉夫钦斯基刺死了宪兵司令麦津采夫,接着戈利坚别尔格谋杀了基辅省省长克罗波特金。政治派陶醉于一时的个别成功,一八七九年四月索罗维也夫进而谋刺沙皇亚历山大,结果失败被处死刑。政治派不仅没有及时吸取教训,反而主张更周密地组织更多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千方百计要刺死沙皇。他们甚至在彼得堡建立了“暗杀沙皇同盟”,赌咒发誓要把索罗维也夫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但是,“土地和自由社”中的另一部分人不赞成个人恐怖的手段,认为这只会招来更严厉的镇压。他们仍然坚持原来的纲领和策略,要求平分土地,主张继续到农民中去进行宣传鼓动。这些

人被称为“农村派”。普列汉诺夫就是其中的主将。

一八七九年上半年，这两派经常在各个小组中争论得面红耳赤，嗓音嘶哑。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土地和自由社”领导上决定在交通比较适中的唐波夫市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派为了争取在会上占多数，由波波夫和弗罗连科事先到各地网罗同一观点的人参加大会，他们在普列汉诺夫的故乡利佩茨克还召开过十一人秘密会议。得知警察局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八月间代表大会乃移到沃龙涅什市举行。

会议一开始，政治派分子尼·亚·莫罗佐夫（一八五四——一九四六年）^①就宣读了奥辛斯基在基辅被处决前写的留给民粹派分子的遗书，其中号召同党坚持采取恐怖手段，一定会取得成功。暗杀派想用这个办法首先给大会造成一种压倒优势的气氛。随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在会上论证个人恐怖策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普列汉诺夫在多次发言中猛烈地抨击了个人恐怖的策略，批驳了米哈依洛夫所提出的暗杀会使专制政府解体并强迫它召开国会、提供宪法的谬论。他认为，杀死专制君主个人，只会以亚历山大三世代替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丝毫不会改变政治制度。所以在匕首尖上建不成国会。他坚信个人暗杀活动只会使沙皇警卫更加森严，镇压更加猖獗，从而使革命组织更容易遭受破坏，使革命者更难开展活动，其结果只能瓦解党和加强沙皇的反动统治。普列汉诺夫虽然极力申辩，然而他发现自己相当孤立，在会上得不到多少支持者。他愤怒地抗议政治派会前在他家乡搞的阴谋诡计和分裂活动。

会上还讨论了民粹派的定期机关刊物问题。本来已经出版有

^① 莫罗佐夫因革命活动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改为监禁，在狱中度过21年，后来在彼得堡高等院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十月革命后任列斯加夫特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起为科学院名誉院士。

普列汉诺夫参与编辑的《土地和自由》杂志，该刊一向宣传“到民间去”的思想。可是不久前又出现了一种《民意小报》，大肆鼓吹个人恐怖策略。普列汉诺夫在会上要求停办《民意小报》，或者两个机关刊物合设一个编辑部。可是也因人少和寡，未被采纳。

普列汉诺夫不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大会，第二天给大会寄去了抗议书，声明退出“土地和自由社”。随即动身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去了。他后来回忆当年的心情时写道：“从沃龙涅什到基辅去，带着一个惨淡的信念，就是当时我曾以为作为俄国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正在灭亡着。”^①他要赶到基辅去，还因为有他的新妻子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一八五六——一九四九年）在那里等待着他。普列汉诺夫退出大会赶到基辅与马尔科芙娜会面后，对她诉说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并商定要回到彼得堡重整旗鼓，另建组织，从头做起，坚持到底。警察已在跟踪他们，于是他们又弄到了贵族谢马什科的假身份证为掩护，重新迁到彼得堡，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一八七九年九月，普列汉诺夫就同刚从国外回来的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斯捷潘诺维奇等建立了“土地平分社”（又可译为“黑色土地平分社”，简称“黑分社”）的新组织，一共有二十二个成员。随即由普列汉诺夫起草了《土地平分社宣言》。《宣言》向沙皇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其核心是没收地主和官府占有的肥沃黑土，把它平均分配给农民，减免各种赋税和徭役。《宣言》表示：尽管有沙皇政府的种种迫害，“我们仍然决心为农民的‘土地和自由’而斗争到最后一息。”^②《宣言》号召全体劳动者，特别是农民起来斗争，并指出：“如果长官用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土地平分社宣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第227页。

暴力强迫你们，你们就一致起来反对他。不要听信那些来劝导你们的被收买的神甫。你们要村与村、乡与乡地进行串连，并同心协力地击退暴力。”^①这个宣言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由民意党印刷所印刷出来。这些土地平分派自信他们的主张会得到农民的支持，会激发农民起来举行暴动以推翻专制政府。建立组织后，他们就带着《宣言》，四出活动，以扩大队伍和影响。

为了筹备出版机关刊物，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初在彼得堡组成了《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任主编。他亲自为第一期撰写《编辑部的话》、社论和文章。为了印刷刊物，他们早在一八七七年就从国外购置了一切必需品，在彼得堡设立了一个技术相当先进、保密非常严格的秘密印刷所。可是，当该刊第一期在印刷时，由于叛徒扎尔科夫的告密，印刷所被警察破获。于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不得不转移到瑞士的日内瓦出版，其余的第三期至第五期在国内明斯克市出版。从一八八〇年初至一八八一年底，该刊总共只出版了五期。普列汉诺夫在《土地平分》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土地平分》一文被认为是纲领性的文件。文中继续把“土地和自由”作为土地平分派的奋斗目标，并从理论上作了详细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在本文中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并且论及马克思。由于“土地平分社”主张社会革命，他自认为该社就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他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最新成就”，社会主义者视经济关系为其它一切关系的基础，所以“主要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会经济制度”^②；所有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从释迦牟尼到卡·马克思”都“注意到了这些原理。但是只有我们一想到把这些原理

① 普列汉诺夫：《土地平分社宣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第227页。

② 同上书，第233—234页。

运用于我们祖国的实践活动，只要我们一谈到俄国进步的特殊条件以代替社会发展的一般条件，我们就会由这些原理的逻辑而成为民粹派革命者。”^①他自以为民粹派是把社会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实际上他既不懂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曲解了俄国实际，这种“运用”是没有什么科学性的。这时他接受的是巴枯宁的无政府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要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依靠农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不要现代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不过，体现在他的文章中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还是进步的，革命的；他反对个人恐怖策略，主张改革经济制度，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在首位，这比起民意党人来还是较为合理的，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只指出要摧毁当时俄国的国家制度，而并未说明用什么来代替它，显然这时他还信守巴枯宁派的民粹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自己也承认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是“被我们称之为革命民粹主义的结论。”^②

《土地平分》杂志的印刷所被破获后，警察局加紧了对普列汉诺夫的迫害。当局捏造种种罪名，硬说他参与个人恐怖活动，策划一八七七年基辅省奇基林斯克县农民的秘密起义，并且不惜以重金悬赏通缉，要把他捉拿归案。在这种情况下，一八八〇年一月初，经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要普列汉诺夫等人立即逃往国外。一月十五日，他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即将分娩的妻子，借助走私贩为掩护，越过国境，经过罗马尼亚到达瑞士的日内瓦。从此，他就开始了侨居国外三十七年之久的流亡生活。他先后在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居住和活动，

^① 普列汉诺夫：《土地平分社宣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第233—234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旧历二月）革命胜利后才又回到了俄国。

如果说他在国内时主要是一个民粹派的实际活动家的话，那末出国后由于脱离了本国实际和群众，就只能主要从事于理论活动，成为一个民粹派的理论家了。

一八八〇年一月，他在民粹派分子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年）等人主办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了《土地公社及其可能的前途》。此文是专门针对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一八五一——一九一六年）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柯瓦列夫斯基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运用很多统计材料，说明俄国的公社已经日益瓦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普列汉诺夫还站在正统的民粹主义立场，硬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理论对西欧来说是正确的，而对俄国则是不正确的。他还指望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能够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他建议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来拯救日趋瓦解的农民公社，他认为社会活动家的有意识的干预能够消除掉“敌视公社的势力的作用。”尽管全文是驳斥公社必然瓦解的观点，否认公社内部存在必然瓦解的因素，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许多外部因素会使公社崩溃，承认暴力征服、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国家立法活动和阶级斗争对于公社的破坏性影响，承认从原始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构成每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他已经预感到公社在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可能要瓦解。他这样写道：“及时地过渡到由公社经营土地，或者在同新兴的资本主义作斗争中瓦解，按我们的意见，对于当前一般的、特别是俄国农村的农民公社来说，这就是唯一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办法。”^①普列汉诺夫后来自己承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07页。

认：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第一次严重地动摇了我的民粹派观点，尽管我反对过它的论断”^①。他的妻子马尔科芙娜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过柯瓦列夫斯基这本书在他们思想上引起的强烈震动。她说：“不可能否认这些数字。我们共同阅读这本书，并且重视其中的每一个事实。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对这些事实热烈地加以评论，对此他没有异议。但是他坚信不幸（指因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农民公社瓦解——引者注）也许仍然能够避免。……格·瓦·全神贯注地阅读此书。看来，公社是否会存在、是否会瓦解，这对他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②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普列汉诺夫先后在《土地平分》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由他执笔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和个人署名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仍然坚持民粹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革命知识分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农民公社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平分土地的口号最充分地反映了农民的要求，知识分子主要要在农民当中着手“社会主义的工作”，不要醉心于搞政治革命，政治斗争只具有“次要性的意义”^③。他根据巴枯宁的学说，把国家看作是“农奴制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因此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强权，要求按照联邦制原则组织各个农民公社的自治。马克思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曾指明了“土地平分社”这些主张的实质。他说：“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会用令人讨厌的学理

① 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33页。

② 见罗·马尔科芙娜：《我们的生活》，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5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27、131页。

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①列宁认为：“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主义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攻击了土地平分派”^②。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土地平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普列汉诺夫确实已经开始对民粹主义的理论产生怀疑和动摇，并且已经初步脱离了民粹主义的巢臼。这表现在：他已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正破坏着农民的小生产，农民破产后已沦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已谈到在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他已意识到工人比农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所以不再热衷于任何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并且强调指出了“我们完全不否认在我们工业中心进行的革命工作的意义”^③。他虽然还认为政治问题对于人民并非头等重要，但是也支持争取人权的政治斗争，并且批评了巴枯宁完全否认政治斗争的观点。他还认识到：“社会主义政党如果在人民当中没有基础和影响”，那就是“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就是“在国家的社会生活进程中没有意义的一个虚数”。原来民粹派认为群众不过是“虚数”；现在他开始意识到：如果脱离了群众，自己就成为“虚数”^④。这表明普列汉诺夫到国外后由于接触西欧社会实际和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

除了《土地平分》杂志之外，土地平分社在普列汉诺夫的倡导下于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还出版了一种名为《种子》的供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31页。

④ 同上书，第126页。

人阅读的杂志。该刊前后一共出了六期：第一期是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于日内瓦，第二期至六期在俄国出版。刊物特别注重在城市工人中进行民粹主义的宣传。它号召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以争取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甚至还鼓动工人杀死政府指派的特务，尤其是欺压工人的工长和资本家。他深信“如果《种子》在工人中真正发行到一千份……那就会更快地用各种知识把工人武装起来。须知我以前就认为，只有工人才能多少严肃认真地参加革命运动。”^①但是，该刊只字不提俄国工人的政治斗争。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实际。到一八八三年九月他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向民粹主义宣战时，他还回顾到《种子》杂志并对它的错误加以批评^②。

“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除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少数人组成了“土地平分社”之外，多数人都在一八七九年秋建立了“民意党”，选出了热利亚鲍夫、米哈依洛夫、索·里·彼罗夫斯卡娅（一八五三——一八八一年）等组成执行委员会。民意党自命为代表人民的意志，按照它的既定方针，主要是从事暗杀活动，特别是作出决议，把暗杀目标集中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身上，要“猎逐这头戴皇冠的牲畜”。一八七九年十一月，民意党人曾密谋当亚历山大二世从克里米亚返回彼得堡的途中埋设地雷炸翻火车，但是没有成功。一八八〇年二月，又命工人哈尔士林装成木匠暗带炸药进入冬宫，准备当沙皇宴请王公大臣时炸毁宴会厅，结果在宴会厅的炸弹提前爆炸谋杀未成。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旧历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制造了惊动全国的暗杀案：民意党人格雷涅维茨基在彼得堡大街上终于投掷炸弹炸死了亚历山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1册，第208页。

②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6页。

大二世。可是，当天傍晚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就宣布继任皇位，专制统治更加残酷。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恐怖引起了专制政府白色恐怖的加强。大批民意党人被捕，热利亚鲍夫、米哈依洛夫、彼罗夫斯卡娅等领袖均被处死，民意党的主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民意党的残余分子以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表明只要新沙皇大赦政治犯，举行普选，召开议会，给予人民出版、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即可停止恐怖活动。在反革命暴力淫威逼迫之下，革命的民粹派分子已经向沙皇祈求开恩、请求饶命，准备洗手不干革命了。

有一些民意党人逃亡到西欧，准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普列汉诺夫这时正住在巴黎。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和巴黎俄国侨民区的集会上，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常说：“民意党刺死亚历山大二世也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我们应当把一八八一年三月的第一天看作是民意党末日的开端。”^①于是他企图说服民意党人，想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努力把聚集在拉甫罗夫周围的民意党人和土地平分派分子联合为统一的政党。民意党人这时准备出版《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普列汉诺夫为了同民意党人合作，竟不惜作了原则让步，他同意把“关于恐怖活动在同俄国政府作斗争中的重要意义”的条文写入土地平分社的纲领，以此为条件双方达成共同出版《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协议。他曾参与了该丛书的编辑工作，还写了《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一文。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科学社会主义名著《共产党宣言》曾于一八八二年被收入《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在日内瓦出版。尽管《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也出版过一些好书，但是民意党人并没有放弃他们那一套观点，他们还是反对进行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醉心于个人恐怖。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7页。

到一八八三年，民意党人又决定创办《“民意”导报》，普列汉诺夫参加了该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在该刊第一期上他发表了《阿·普·夏波夫》一文。这时他已经感受到“大的中心城市的生活”是劳动人民的最好学校，已经看到农民公社不可避免地要瓦解，并且把公社瓦解的内因提到首先地位。他日益感到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都已接近破产。他已放弃了原先主张的在国家制度上的联邦主义原则，但又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不应当摧毁它曾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国家机器，而应当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改变国家机器的形式并且利用它。”^①他幻想专制制度的国家能够逐步过渡为“人民国家”。

普列汉诺夫本来还为《“民意”导报》第一期准备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长文。可是，由于该文尖锐地批判民粹主义而遭到主编拉甫罗夫和列·亚·吉荷米洛夫（一八五二——一九二三年）的拒绝。经过反复磋商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普列汉诺夫终于结束了与民意党人的合作，退出了该刊编辑部，也结束了“土地平分社”的活动。

第四节

由民粹主义者转变为 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作为革命民粹派的活动家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可分四个时期：在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年，积极参加民粹派小组的活动；一八七六年底至一八七九年九月是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一八七九年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9页。

九月至一八八一年是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是他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

普列汉诺夫参加民粹派的活动基本上是在七十年代。但是，当时的民粹派尚未蜕变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还是革命的民粹派。尽管革命的民粹派坚持了唯心史观和错误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但它在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启发俄国人民的觉悟，开展争取工农解放的斗争，打击沙皇统治等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对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在批判其错误理论体系的同时，应当肯定其进步的历史作用。普列汉诺夫作为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一员，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出现在俄国历史的舞台上，他在这个时期积极参加并领导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不怕牺牲，艰苦卓绝。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比其他民粹派分子较早地认识到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例如，他较快地看到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并将在俄国人民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一直比较坚决地反对个人恐怖活动。

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革命民粹派的中坚分子，与一般民粹派分子的最大区别，就是他经过一八八二——一八八三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刻苦磨炼，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他到这时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如何完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呢？普列汉诺夫思想观点的形成和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从根本上看，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客观条件，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如上所述，自从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度废除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比之改革前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八一年间，纺织品的生产增加了三倍，铁路的修建伸长了十三倍多（由一千四百八十八俄里增为一万九千五百俄里）；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近代工业无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同一时期工人的人数

增加了一倍，一八八一年达到六十六万八千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当工人。农村中资本主义也发展起来，富农们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和收割机、打谷机等新式农具。农村中两级分化显著，多数农民破落以至破产，半数农民只有一匹马甚至连一匹马都没有。农民公社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小商品经济。实践使普列汉诺夫对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能够在农民公社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民粹派观点，由坚信不渝到怀疑、动摇。与此同时，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衰落，“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的活动没有成效并受到沙皇政府的压制，以及从事个人恐怖活动的民意党人受到严重摧残，这一切民粹派实践活动的破产也促使普列汉诺夫不得不深切反省。沙皇政府镇压的枪声和刑场上民粹派分子的呼声把他从民粹主义的迷梦中唤醒过来。

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他亲身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对于促进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八七〇年五月彼得堡的涅瓦纺织厂爆发了第一次大罢工，随后罢工越来越频繁。罢工促进了工人的团结，到七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工人小组和协会。在西欧先进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一八六四年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后来简称第一国际）和一八七一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俄国工人的组织性和觉悟性也有所提高。一八七五年在濒临黑海的敖德萨市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它以第一国际的规章作为自身活动的基础，要把工人们“从资本和特权诸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结果大约只存在一年时间就被沙皇政府取缔。领导人之一维·巴·奥布诺尔斯基（一八五二——一九二〇年）逃到国外，熟悉了西欧的工人运动，回国后与工人活动家哈尔士林一起于一八七八年在首都彼得堡建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上写明要仿效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这个组织只存在

两年，也被宪兵破获。这两个工人协会虽然也受民粹派的影响，例如把农民公社估计过高、有些人曾参与个人恐怖活动等，但是总的看来，它们要高出民粹派组织一筹。它们对于促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和革命斗争起了显著的作用，标志着俄国新兴无产阶级的觉醒，而且也加速了民粹派的瓦解。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建立表示祝贺，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①；他还曾经积极支持和帮助这两个协会开展活动。他和北方工人协会的创建人哈尔士林来往密切，对他印象深刻，认为“革命的热情、深思熟虑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一切都完满地结合在他身上。”如前所述，他从一八七六年起就经常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访问工人住宅，组织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撰写罢工传单和通讯报导评论等。除了首都市区外，他还与加列尔港、华西列夫斯基岛、奥布沃德运河等地的工人小组建立过联系。普列汉诺夫在“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中间被公认为“工人问题专家”。总之，由于参加工人运动，使他比别的民粹派分子较早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这是他毅然决然同民粹派决裂，把立足点移到工人方面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一八八〇年亡命西欧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统学习和刻苦钻研。前面提过，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七六年在国内参加民粹派活动时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那时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论着了迷，根本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过了五年，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日益发展起来，民粹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已到处碰壁，他亲身参加工人运动又受到深刻教育。究竟俄国社会和革命要走什么道路？究竟民粹主义这一套是否行得通？究竟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会起多大作用？究竟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真理？究竟它是否适用于俄国？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86页。

他亡命国外后，脑子里是带着这些问题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其结果就和他最初读他们的著作时大不一样了。

初到瑞士日内瓦时，他没有经济来源，买不起书，只能到处借书读。当妻子马尔科夫娜来到他身边，带来一笔钱，生活状况略有好转。他不顾瑞士书价昂贵，用重金购买他向往已久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甚至还托人从苏黎世书店给他寄来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妻子几次提醒他说：钱已所剩无几，很快就要不够买面包糊口了。但是，他认为书对于革命者是比较面包更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懂得法文和德文，这便于他直接阅读并领会原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偕同妻子在巴黎居住期间，还经常到图书馆阅览书刊。一八八一年秋，他回到瑞士居住。在这里，他仔细攻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对于促进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他写道：“关于我自己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我被《宣言》所鼓舞，并马上决定把它译成俄文。”^①一八八二年春末迁居到伯尔尼市后普列汉诺夫又一头栽到伯尔尼图书馆，在这里发愤攻读他在巴黎未能读到的两本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并且作了详细的摘要笔记。

后来，他回忆说：“没有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以怎样的热情贪婪地研读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其中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占首位。而我们越熟悉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对于我们以前的观点的弱点就认识得越明确，对于我们原有的革命经验就认识得越正确。”“马克思的理论正象阿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178—179页。

莉阿德尼的线^①一样，把我们从我们思想所陷入的矛盾的迷宫中引导出来了。”^②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于他思想转变所起的巨大作用。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参加西欧工人运动，与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交往，也促进了普列汉诺夫思想的转变。刚到瑞士，他就认识了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同他们来往密切，甚至住在一起。在巴黎期间，他对于这个欧洲革命的中心，在十九世纪爆发过四次革命的城市、巴黎公社的摇篮，更是倾心向往，诚心学习。他时常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细心倾听法国工人党领袖茹尔·盖得（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的讲演，注意他对哈佛尔大会刚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解说。他还通过他妻子给盖得夫人治病的关系，想办法认识了盖得。他曾经就许多革命理论问题向盖得请教，还细问过盖得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情况。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他参加了巴黎工人的行列，热烈欢迎从新喀里多尼亚岛大赦释放归来的巴黎公社的英雄们；接着，他又带着妻子挤进能容纳五千人的大礼堂，亲自恭听流放十年依然不减当年英勇气慨的巴黎公社巾帼英雄路易丝·米歇尔（一八三〇——一九〇五年）的演说。礼堂外边的大街上还聚集了数千人。这盛大的群众性集会和大会上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声，使这个来自异国的二十四岁的青年，还深切感受到当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普列汉诺夫被感动得激情满怀，热泪盈眶，这是喜悦、兴奋的眼泪。据他妻子回忆，她一生中从没有见过他如此泪流满面。一八

① 阿莉阿德尼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爱上了雅典王子提修斯。当提修斯进入地下迷宫，准备杀死怪兽，为民除害时，她给他一个线球。他把线头拴在迷宫的大门上，身带线球，经过迂回曲折之路，杀死怪兽之后，再顺着引路之线走出迷宫。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178页。

八一年一月，他们俩在巴黎还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路·奥·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年）的葬礼，亲自送葬到拉雪兹墓地，在这里又一次瞻仰了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的丰采。矗立在拉雪兹墓地的巴黎公社英雄墙，他更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多次来这里参观学习。这个当年硝烟弥漫的战斗圣地，比那驰名世界的香色丽榭，对于这个革命青年有着更大得无比的吸引力。在巴黎期间，他还结识了侨居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亲自出席他们举办的群众集会，阅读他们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学习他们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他还认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编辑格·亨·福尔马尔（一八五〇——一九二二年），向他了解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

总之，普列汉诺夫正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逐步发展、民粹派不断碰壁的客观条件下，经过他自己主观的努力，通过参加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的实践，通过认真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才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普列汉诺夫上进心强，能独立思考，思想开阔、解放，善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不狭隘、僵化、故步自封。这个思想特点无疑在他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末，普列汉诺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转变的呢？他完成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

他自己在一九一〇年写道：“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一八八四年，而是在一八八二年。”^①他这里显然指的是：在一八八二年初，他通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后来苏联学者一般都沿用这个说法。实际上，在他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仍然还保留有民粹派观点，他还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22页。

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正确理解西欧社会发展的情况下要“合理地对待俄国经济制度的特点。”^①更为重要的，他于一八八二年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中，还把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一八〇五——一八七五年）评定为“能够摆脱特殊的阶级观点”，“能够对社会现象采取不偏不倚态度”的经济学家^②。他在一八八三年春天写成的评论俄国历史学家尼·雅·阿里斯托夫（一八三四——一八八二年）《阿·普·夏波夫》一文中，虽然首次宣布在思想上同民粹主义决裂，但是还保留有民粹主义的观点，认为专制国家能够逐步过渡为“人民国家”。

我们认为，一八八三年他才从民粹主义者完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完成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他在这一年九月正式宣布与民粹主义决裂，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随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

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科学共产主义者。从一八八三年九月起，揭开了他革命斗争史、政治活动史的新篇章。

① 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337页。

第三章

“劳动解放社”的主将 反击民粹派的先锋

第一节

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团体“劳动解放社”

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土地分平社”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伊格纳托夫，聚集在日内瓦罗纳河畔的咖啡馆里，热烈讨论创立不同于民粹派的新的革命组织问题。与会者还有他的妻子马尔科芙娜和伊格纳托夫的弟弟伊利叶。首先要在是否应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问题上统一思想。普列汉诺夫主张旗帜鲜明地宣布建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他认为，我们不能长期隐瞒自己的信念，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我们的拥护者会逐渐多起来。

然而，查苏利奇忧心忡忡，她不忍心同以前的民粹派战友们决裂，同时又因为人少而对建立新组织缺乏信心。普列汉诺夫尽力鼓励她坚定不移地向前看。他还以沃龙涅什代表大会以后民粹

派分裂的历史为例，说明尽管人少，只要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几个人都表示支持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决定出版刊物。

但是要出版书刊是需要经费的，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提出了资金来源问题。捷依奇立即提议给俄国国内的革命者写信，进行募集。这个办法是需要相当时日的，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伊格纳托夫当场慷慨解囊，表示愿把父亲于一八七八年死后留给他们兄弟姐妹的遗产捐赠出来供出版书刊之用。普列汉诺夫感谢伊格纳托夫的资助。

既然大家对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思想认识一致，经费来源又得到解决，接着就要考虑即将建立的新组织的名称问题。普列汉诺夫主张叫“俄国社会民主社”，因为当时西欧已经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习惯上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意即要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任务。查苏利奇坚决不同意这个名字，怕因此脱离俄国广大革命者。当时在俄国，如果同社会民主主义发生关系，就要受到追查。普列汉诺夫耐心地加以解释。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为例，说明新的革命组织叫做社会民主党，会有利于在俄国有觉悟的无产者中间开展工作。尽管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正确，但是由于其他多数人都有查苏利奇的那种就心，于是就换了一个名字——“劳动解放社”。

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十月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曾经写道：“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①。他在一八七一年四至五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中又两次把“劳动解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作为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和奋斗目标^①。普列汉诺夫曾经熟读马克思的这两篇著作，并且把它们作为附录收入一八八二年由他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显然，一八八三年他们建立革命组织时是直接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取名为“劳动解放社”。现在看来，“劳动解放社”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因而不是科学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名著中，批评了德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包含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杂质，其中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这一要害问题，好几处空谈劳动的意义和作用。这时马克思才发现“劳动解放”这个提法是含混不清的。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导言中本来是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阶级性十分鲜明的著名原理，可是德国工人党在纲领草案中却把它修改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工人阶级应当解放劳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马克思说：“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②所以，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或者“劳动者的解放”。可惜，德国工人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正确意见，在一八七五年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仍然保留了原来这种不精确的提法。然而《哥达纲领批判》直到一八九一年才由恩格斯公诸于世，所以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三年时并不知道“劳动解放”这一提法是不准确的，而哥达纲领又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文献，无怪乎“劳动解放”竟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来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名称。几个月以后，“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已认识到这个名称不够鲜明，所以又在“劳动解放社”之前冠以“社会民主主义的”词语。

决定了名称之后，又讨论了“劳动解放社”的成立声明，后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来发表时叫做《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通告》公开宣布他们彻底放弃了民粹派理论，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通告》说：“土地平分社的旧同人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就是要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组成——‘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①《通告》指出“劳动解放社”有两项任务：“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适合不同修养程度的读者的原著作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二、批判在我们革命者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且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居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②。

“劳动解放社”刚成立时只有五个人参加，这就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没有正式参加“劳动解放社”，因为她已有两个孩子，得料理家务，还要去大学学习和从事医疗工作。但她还是尽力帮助她丈夫做了许多工作。

在“劳动解放社”这五员干将中，年龄不一，最大的同最小的相比，要相差七岁。年纪最大的是查苏里奇，当时三十四岁，阿克雪里罗得三十三岁，伊格纳托夫二十九岁，捷依奇二十八岁，普列汉诺夫最小，才二十七岁。他们的出身、经历也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本来都是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先后成为热情的民粹派革命战士，“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的战友。因此，他们都多次遭受到沙皇专制政府的迫害。偌大的俄罗斯，竟没有他们立足容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22—23页。

身之地，于是不得不亡命国外，继续寻求革命的真理。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们痛切认识到民粹主义的错误，宣布同它彻底决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他们五个人团结在一起，在异国他乡，共同计议，密切磋商，数语投机，一朝兴发，终于组成了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解放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为目标的革命团体。别看只有五个年轻人，却敢于挑起用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改天换地的重担。他们各自发挥特长，分别为“劳动解放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查苏利奇从一八八一年起就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系。“劳动解放社”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此外，她还写了不少政论和文学、美学、哲学方面的著作。阿克雪里罗得结识了许多被德国政府驱逐到瑞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时有交往。因此他较多地负责“劳动解放社”同国际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锻炼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捷依奇主要负责“劳动解放社”书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把革命书刊秘密运回俄国。从收集资金、组织排印、设立联络点、建立交通线，他样样都管，在“劳动解放社”中被公认为“大组织家”。只有伊格纳托夫不幸于一八八五年因肺出血病逝于法国的尼斯。在“劳动解放社”这五名干将中，普列汉诺夫虽然年纪最小，但是由于他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所以起的作用也最大。“劳动解放社”是他倡议成立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是他拟定的。“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由他组织领导的。因而普列汉诺夫当之无愧地成了“劳动解放社”的主将。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建立，揭开了俄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崭新的一页。它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劳动解放社”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向民粹派主义开火的战斗堡垒。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理论和思想斗

争的锋芒指向民粹主义，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扫清了道路。

“劳动解放社”是破天荒第一次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团体。由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亲自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迅速流传到俄国各地。“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确立。列宁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①

“劳动解放社”“因为躲避审查而在国外印行的著作，第一次引证一切实际的结论来有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②。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最早建立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它刚一建立时，虽然只有一个《通告》，还没有纲领，但普列汉诺夫很快为它先后制定了两个纲领草案。“劳动解放社”的创建，可以说是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初步尝试。它后来还参与了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在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建立之后，它已经成了该党的国外组织。列宁有时曾直截了当地把一八八三年“劳动解放社”的创建看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③。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④又说：“‘劳动解放社’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⑤“这些老一辈的同志”“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⑥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之间团结的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2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6页。

⑤ 同上书，第232页。

⑥ 同上书，第203页。

纽带,友谊的桥梁。“劳动解放社”把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与经验介绍给欧洲工人阶级,又把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和遗产传授给俄国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解放社”成员同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交往,加深了互相了解,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所以,“劳动解放社”刚一成立就受到欧洲好些国家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重视和欢迎。例如,法国工人党领袖保罗·拉法格(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年)就庆贺了“劳动解放社”的诞生。“劳动解放社”在美国的俄侨中还建立了分支机构,在俄侨中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活动,并与美国工人运动加强联系。例如它在美国的代表谢·米·英格尔曼(生于一八六八年)还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协会担任过书记。

“劳动解放社”代表俄国工人阶级最早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活动;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出笼后,它又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米勒兰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斗争。

“劳动解放社”自一八八三年建立,到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告解散并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共存在二十年。在俄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列宁对“劳动解放社”深怀敬意,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颂扬了它的历史功绩,称它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者”^①,赞扬它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深湛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视野、丰富的革命经验”^②。列宁恰如其分地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当时‘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只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只是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宣传运动和一八九五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第288页。

——一八九六年的罢工运动才使社会民主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牢固地、经常地结合起来。”^①“劳动解放社”没有完全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主要在国外从事理论上的活动，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俄国工人运动发展成熟的程度还不够。我们不能以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式建立来苛求于当年的“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在历史上还是取得了上述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归功于这个战斗集体，普列汉诺夫作为这个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然应当分享首要的荣誉。“劳动解放社”存在的二十年，恰好就是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活动的二十年，这也正是他一生最光辉的黄金时期。

第二节

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 批判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思潮从六十年代诞生起就具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倾向。但是，初期是代表农民革命要求的民主主义倾向占上风，所以尽管民粹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但是它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派别，还进行过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然而，到八十年代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妥协愿望的自由主义倾向压倒一切，于是它就由革命派堕落为改良派。这一方面是由于民粹派遭到沙皇政府的严厉镇压之后，害怕了，退缩了，投降了。他们放弃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转而鼓吹同沙皇政府妥协。从采取和平请愿到充当沙皇政府的参谋，上书沙皇，建议沙皇采取一些改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5页。

良主义的措施，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使古老的农民公社逐步瓦解，原来的公社社员已经分化为两个明显对立的阶级——多数贫雇农和少数富农。于是，民粹派也就不再可能代表广大的农民，唯心史观，同人民群众缺乏血肉联系，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使得多数民粹分子由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变成富农的卫道士。总之，革命民主主义的民粹派已经蜕变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列夫·吉荷米洛夫就是这样一个蜕变的典型代表。他曾经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后来是民意党人，“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于一八八八年向沙皇政府递交了请求赦免的呈文，并以俄文在巴黎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竟然在暴君面前卑躬屈膝，忏悔自己的过去，歌颂专制制度，辱骂革命人民。吉荷米洛夫就这样从反专制主义的理论家变成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一八八九年他从国外亡命回到俄国，充当反动报纸《莫斯科新闻》的主要撰稿人，后任主编。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理论愈来愈显示出其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妨碍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反动本质。正在这个时期，以前是民粹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原来的民粹派革命家中，第一个站出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谬论。

普列汉诺夫为了批判民粹主义，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等城市，就民粹派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多次讲演。更主要的是他集中精力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民粹派的理论著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硕果累累的时期。他的反击民粹派、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许多优秀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从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八年，他向民粹派连续发射了一颗颗密集的炮弹，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

是这四本书：《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于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一册在日内瓦出版。这本书以《共产党宣言》中的警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作为正文开始前的题词。他抓住了民粹派否认政治斗争这一要害问题，剖析了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揭示了民粹主义的理论来源就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俄国，阐明是否承认政治斗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只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反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必将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中，号召民粹派分子放弃错误观点，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普列汉诺夫的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很快就在俄国侨民中脱销。许多民粹派分子料想不到，普列汉诺夫这个曾是著名的民粹派骨干分子的人，居然回过头来对民粹主义杀回马枪。他们虽然感到词句尖锐，但是论证严密，论据充分，令人信服。一些顽固不化的民粹派分子由于本书的出版，咒骂普列汉诺夫是叛徒，攻击他背弃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思想。吉荷米洛夫诋毁它是“最无原则的思潮”的著作。拉甫罗夫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出版的《“民意”导报》第二期图书评介栏中发表文章，严厉斥责普列汉诺夫不该用小册子的大部分篇幅花费在反对民意党的论战上，诽谤“劳动解放社”是属于那些“自认为和‘民意’论战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的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的派别”^①。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给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24页。

民粹派的打击相当沉重，而且影响深远。此书到九十年代还被译为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还多次再版。列宁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曾经把它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他写道：“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 Profession de foi^①，‘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算是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 Profession de foi，一八八三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②。

普列汉诺夫出版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之后，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到此止步，而是再接再厉，勇往直前。一八八四年他写成批判民粹派的第二部巨著《我们的意见分歧》，一八八五年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三册出版了。这部著作顾名思义是集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根本意见分歧，也就是：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得起来？俄国的农民公社是否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俄国是否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自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民粹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批判了巴枯宁、彼·尼·特卡乔夫（一八四四——一八八六年）、拉甫罗夫的民粹主义观点，着重批判了列夫·吉荷米洛夫的民粹主义谬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主义时还联系自己，说明自己过去如何坚持民粹主义，后来又是如何认识到民粹主义的错误并坚信马克思主义正确。这种勇于解剖自己，通过自我批评再批评别人的方法，使得这部著作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普列汉诺夫在

① 信条，纲领。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写作这部著作时，曾经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一起讨论过书中的论点和论据，向他们宣读写出的部分原稿，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劳动解放社”的战斗集体对民粹派理论的批判。这部著作在国外出版后，大量地秘密运到俄国国内，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广为流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教育了一部分民粹派分子，使他们放弃了错误观点。

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刚一出版，查苏利奇就把它寄给恩格斯，请他审正。恩格斯在繁忙的工作中，尽力挤时间阅读了这本俄文新书。他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谈到读了这部著作之后，知道了意见分歧之所在；他十分赞赏普列汉诺夫在书中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处于十分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以及俄国人民的能量将由位能变为动能的巧妙比喻。他在信中对“劳动解放社”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并且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写道：“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①列宁在一八九四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称作为俄国“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②；而且还引述其中的正确观点，来批驳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

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四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在瑞士逗留后来到伦敦。他在这里写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原来打算把这部著作称之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秘密出版。后来，从俄国国内来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亚·尼·波特列索夫经日内瓦来伦敦，同普列汉诺夫商谈在彼得堡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58页。

著作的问题。波特列索夫读了普列汉诺夫这部著作的原稿后，认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只是有些词句过于尖锐。他建议作者作些修改，然而普列汉诺夫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是普列汉诺夫考虑到如果仍然用《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这样的书名，就容易暴露出作者是谁，不利于出版。于是他故意改成《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样比较深奥而不易洞察书的内容的书名，并署上别尔托夫的笔名，以便骗过书报检查官的眼睛。一八九四年十月波特列索夫带走了手稿，平安地到达彼得堡。这部著作很快于十二月二十日就已印好，到二十二日才交出版局审查；目的是赶在圣诞节来临前夕，便于检查官敷衍搪塞。果然迅速通过，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在彼得堡书店里出现。总印刷三千册，不到三周就全部售完^①。当检查官发觉应该禁止此书出版时，它早已问世并脱销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部著作，按其内容来说，应该称为《论唯物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从考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入手，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由来和形成过程：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派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的天性看成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最高裁判者，而陶醉于研究和设计完全符合人的天性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人类的历史，给人类历史的研究以崭新的面貌；但是他仍然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绝对观念，还是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总之，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家学派到十九世纪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都不能正确看待人类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

^① 见理查德·金德斯利：《俄国最初一批修正主义者》，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第76页。

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普列汉诺夫在书中着力批判了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尼·伊·卡列也夫（一八五〇——一九三一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指出了社会发展既有其客观规律，又给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阐明了民粹派企图以农民公社为基地来阻挡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民粹派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明要想争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的出版，在俄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沙皇政府下令严禁“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借阅”，然而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之中还是广为流传。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争先披读，辗转传阅，相互讨论，有口皆碑。当时在莫斯科进行革命活动的谢马什科在回忆录中讲到：“在这些年中我们得到了别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的公开印行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本书使俄国全体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教育。”^①此书甚至流传到流放所，在那里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捷依奇来信说：“别尔托夫的小册子是我国文献中的杰作……它给我送来了很久没有享受到的快乐，从而我衷心感谢它的作者。非常生动活泼和对所有的人都通俗易懂的叙述方法，在我们的作家中没有见到过的渊博学识，还有，材料的安排——这一切都非常好。”^②捷依奇写这封信时并不知道书的著者别尔托夫就是他一向敬重的老战友普列

① 谢马什科：《难忘的形象》，见《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页。译文有修改。

② 捷依奇1895年4—8月给斯捷凡诺维奇的信，苏联科学院保存的档案。转引自恰根、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59页。

汉诺夫的化名。所以这段好评确是发自肺腑的感受，而决不是偏爱或恭维。当然，捷依奇在信中还抱怨，由于书中带有“论战的狂言暴语”而使他感到“苦恼”。这只是表明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还同旧的民粹派藕断丝连。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刚一问世，当时寄寓伦敦的维拉·查苏利奇立即就给恩格斯送去。恩格斯认为此书“出的很适时”，并且为它“博得了喝采”而感到由衷的高兴^①。他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兴奋地谈到阅读此书的感想。他说：“维拉把您的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②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③。

正当《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在彼得堡公开出版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经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努力争取，又得到瑞士当局的允许，再次从伦敦迁回日内瓦。《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出版，使普列汉诺夫一家的生活处境有所改善，还清了债务，添置了必要的衣服和家俱。此后，西欧许多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断约普列汉诺夫写稿，稿费收入使这位没有固定社会职业而以革命为职业的作家的家庭生活有了保障。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八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另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了民粹派分子约·伊·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9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

勃利茨(一八四八——一八九三年)、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鼓吹的个人的感性或理性等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究底必须到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的唯物史观。同时，书中还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哲学原理阐明了个人在历史上是如何起作用的。首先，他从自由与必然相互关系的哲理入手，指出个人只有在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才能得心应手地推动历史前进。其次，他从偶然与必然相互关系的哲理展开，分析个人的才能、性格、体质等偶然因素如何在历史上发生作用；但是偶然性不是脱离必然性而孤立存在，“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诸必然过程交叉点上出现。”^①最后，他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相互关系的哲理进行总结，说明个别是指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特殊是指某个民族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般是指各民族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精辟地论证了“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②此书叙史论理，史论结合，有的放矢，战斗力强。他着重阐述的这些哲理，既是针对民粹派夸大自由意志、偶然因素、个人特点等等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错误观点，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个人怎样才能历史上发挥作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应该把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一颗晶莹透剔、光彩夺目的明珠。

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例如《评列夫·吉荷米洛夫著‘为什么我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不再是革命者’》、《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等等。此外，他在日内瓦、苏黎世、伯尔尼等地俄国侨民中作过多次分析批判民粹主义的演讲。这些言论在粉碎民粹主义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普列汉诺夫在专著和文章中详尽地批驳了民粹派的各种谬论，最主要的是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普列汉诺夫批驳了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在俄国发展的谬论。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出现纯粹是“偶然”现象，而且是一种没落和倒退的现象。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公式硬套到俄国头上，就是想把俄国劳动人民推进资本主义的铁箍^①。普列汉诺夫指出：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制定革命路线和策略的重要前提。他说：“那末，俄国是‘必须’还是‘毋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呢？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之正确提出有极大的重要意义。所以俄国的革命者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是不足为奇的。直到最近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坚决否定的回答。”^②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农奴制度废除以后的俄国经济状况，列举出俄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工厂和工人人数的增长以及个体手工业和农民公社的解体等事实，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这是社会的进步，而绝不是倒退。他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情景。他说：“农民对‘新农奴法’^③的反抗都被用鞭笞和刺刀镇压了下去，‘新’的俄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38页。

② 同上书，第139—140页。

③ 指1861年旧历2月19日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因为它只是局部改良而并没有真正废除农奴制度，所以被称为新农奴法。

国已为货币投机的热潮所席卷。铁路、银行、股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亚历山大二世是资产阶级的沙皇，正如尼古拉是军人及贵族的沙皇一样。”^①可见，民粹派想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绝对办不到的。普列汉诺夫通过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情况的详细考察，响亮地回答了民粹派提出的俄国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学校的问题。他指出俄国不仅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学校”，而且必然将在这个“学校里毕业”^②。普列汉诺夫嘲笑了民粹派力图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把它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去的荒唐幻想。他说：“从农奴法取消之后，俄国就已经显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主观主义者清楚地看到这点，他们自己也肯定：旧的经济关系在我们这里以惊人的而且日益增加的速度瓦解着。可是这不要紧——他们彼此互相说道——我们把俄国放上我们的理想的小舟，它便会离开这一道路，便会到辽远的王国去。”^③民粹派思想僵化，闭门造车，逆历史潮流而动，还要自命为革命者。普列汉诺夫忠告民粹派，“如果要使自己成为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革命家”，那末“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头脑革命化，而为了这样做，他们应当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要站在历史的前面，而不是请历史老嫗在原地踏脚，等着他们为她开辟新的、更直更广的大路。”^④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第二，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否认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依靠农民公社就可以推翻沙皇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民粹派认为农民公社是“俄国社会主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313页。

③ 同上书，第790—791页。

④ 同上书，第63页。

组织的始基”^①，“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堡垒”^②，俄国农民“在本能上，在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③，它可以乘农民公社这“三匹马驾的车迅速地 and 不可遏制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狂奔”^④。普列汉诺夫指出，农民公社绝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堡垒，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的扩大，它已经日趋瓦解。他说：“农民这一等级更快地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少数的剥削者和多数的劳动者。”^⑤占有较多地的土地、农具、耕畜、种籽的大多数社员迅速发财致富，成了公社中的富农；失去土地、农具、耕畜、种籽的大多数社员，不得不靠受人雇用和借高利贷过活，组成了农民公社中的庞大的贫苦农民队伍。普列汉诺夫引用别人的话，生动地叙述了农民公社瓦解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景象：“这是多么不同的景色！这边是一片屋舍，显而易见的是一片破旧而盖着草的两窗屋。……那一边，对面是一些新的三窗屋，它们中间还有广大的胡同，屋顶是木板做的，而在他们中间甚至还闪烁着绿色的铁屋顶，烟筒上还有风标。第三处是象蠕虫一样弯曲的长列房屋，和殷实富农的大屋并排的，还立着比地面稍高象棚子又象狗窝的屋”^⑥。民粹派把农民公社瓦解的根源归结为国家的干预等外部原因，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这一谬论，明确指出农民公社瓦解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于农民公社内部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摧毁了农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民粹派还妄想通过开办农民银行、实行公社租地等措施来挽救农民公社的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③ 同上书，第183页。

④ 同上书，第291页。

⑤ 同上书，第313页。

⑥ 转引自上书，第280—281页。

解。普列汉诺夫嘲讽了民粹派这种反动幻想。他打比喻说：“正如希望被拖到岸上的鱼可以活得长久和蕃殖一样的奇怪。问题不在鱼是被什么钓饵钓上来的，而是鱼的呼吸器官能否适应周围的大气。现代货币经济的气氛破坏我们古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摧毁了它。”^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农民公社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已经由全体社员生活的靠山和支持者，“由从前的保卫生产者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一变而为现在的助长资本主义剥削的强有力的工具”^②，成了贫苦农民破产的根源。他的结论是：农民公社“不能推动俄国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③。民粹派把农民公社当成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纯属无稽之谈。

民粹派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是“历史上的不幸”、“病害”、“溃疡”，而且捏造说在俄国一亿人口中，工人阶级只有八十万人，只占极少数。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说的这个工人数字不是全俄国工人的数字，只是统计得极不完全、极不精确的加工制造业工人的数字。他认为俄国工人人数虽少，但由于其阶级地位决定，它是俄国最革命的阶级。他说：“无产阶级是这样一种炸药，靠了它的帮助，历史将炸毁俄国专制制度。”^④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出现决不是什么不幸，而是大幸，它是俄国最有前途的阶级，是俄国革命者希望之所在。他说：如果硬说有无产阶级化的溃疡的话，那末应该说“‘无产阶级化的溃疡’本身就会产生自己的药剂。”^⑤ 他明确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他说：“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只能由我们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担任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02页。

② 同上书，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382页。

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207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52页。

靠自己自觉的努力才能达到。”^①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明，俄国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首要的问题是建立自己的政党。他说：“尽可能迅速地组成工人党，是解决现代俄国所有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成功和胜利，其他的道路只有导向失败和软弱无力。”^②普列汉诺夫指出农民虽然在俄国人口中占多数，但由于它同落后的小生产经济相联系，它在日益分化，因此它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他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现时差不多所有我们革命家所宣传的那种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出来。”^③同时，他也强调指出，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相反，每个革命者都应当积极把农民组织到革命运动中来。他说：“那时我们的革命力量将作如下极简单的分配：到乡村去的是一切那些因为职业关系而不得不到乡村去的人。不消说，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同时有可能住在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人们，就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工人中间，努力从他们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大军的先锋队。”“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是为了城市的利益而牺牲乡村，也不是为了产业工人而忽视农民。它规定自己的任务为组织城市中社会一革命的力量，以便把乡村吸引到具有全世界历史的运动的河床中来。”^④

第三，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民粹派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代替历史发展规律，他们妄图阻止资本主义发展、拯救农民公社的思想根子在于迷信个人的力量。他们硬说唯物史观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

①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82页。

② 同上书，第401页。

④ 同上书，第405页。

种学说^①。他们荒谬地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杰出的“英雄人物”、“批判地思维的人”，即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只能盲目地跟着他们这些“英雄”走。“英雄和群氓”这一提法就是民粹派理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于一八八二年最先创造使用的。他们把群众比喻为无数的零，只有在零以前填上他们这些英雄的数字，才能变成实数，零才能有积极意义^②。

普列汉诺夫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只讲经济因素，同时它还肯定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且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孤立的个人无所作为，只有组成为社会，人才能创造历史。他说：“但历史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它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③又说：“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是历史的主人公。”^④他高度颂扬了欧洲各国人民在各国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满怀激情地指出：“是谁砸烂了巴士底监狱？是谁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和一八四八年二月进行了街垒战？是谁的武器在柏林打败了专制制度？是谁在维也纳推翻了梅特涅？是人民，人民，还是人民，也就是说，是贫穷的劳动阶级，即主要是工人……任何的诡辩都不能从历史上抹掉这个事实：在西欧各国争取本国政治解放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而且也只有人民。”^⑤针对民粹派的英雄史观，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他首先指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他说：“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37页。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3页。

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1页。

⑤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405、406页。

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每个杰出人物，都是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的要求，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阶。”^①“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关系，或是接受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所以他在这种场合移动他的表针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既不能把时间加速，也不能使时间倒退。”^②普列汉诺夫对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历史上真正重大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他们是社会机构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③他进一步指明了伟大人物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应具备的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④，也就是“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⑤“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⑥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派以为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同时，并未否认知识分子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正确地指出：“官僚的国家，资产阶级、贵族需要大学，最后，无产阶级也将需要它，无产阶级没有高等的科学教育就不能管理归他们支配的生产力”^⑦。

第四，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以个人恐怖活动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机会主义策略。民粹派宣扬英雄史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8页。

②③⑤ 同上书，第373—374页。

④⑥ 同上书，第366—367页。

⑦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63页。

观，因此必然拼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张用个人恐怖活动代替政治斗争。他们硬说《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不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此为他们反对政治斗争的理论辩护。民粹派还诬蔑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认为传播这些理论之有害于俄国，不亚于英国输入鸦片之有害于中国^①。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认为《资本论》的作者不重视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是重复蒲鲁东和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攻击。他分析了进行政治斗争与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系，指出各个阶级在经济上的利害冲突必然导致为争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政治斗争，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政权是实现社会经济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他说：“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②他从强调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角度给革命下了个定义：“所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长剧中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之将成为自觉的，只是因为它成为政治的斗争。”^③任何一个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最后都要发展到夺得政权，凭借掌握的政权去打击反动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为了争取彻底解放，也必须把一般政治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任务。他说：“但是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象天和地那样远的。这特别可以用来说工人阶级的专政，它的任务，在现在，不仅是破坏社会的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是消除现时存在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并把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

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职能自觉的组织起来。”^①普列汉诺夫认为，同民粹派反对政治斗争的谬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俄国工人阶级只有不断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解放。普列汉诺夫阐明，无产阶级要开展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就必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理解自己的解放条件和斗争任务。普列汉诺夫深刻论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他指出：“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②他推崇革命理论的威力，蔑视民粹派分子从事个人恐怖活动的炸弹的威力。他有一句名言：“在爆炸冬宫时（指一八八〇年哈尔士林在冬宫爆炸杀害沙皇的密谋——引者注），也应当同时炸毁我们的陈旧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传统。”^③

第三节

同民粹主义作斗争的功绩和不足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总是在出现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和初步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是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形成无产阶级和初步工人运动之前，先从西欧传进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与俄国特有的农民公社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05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统相结合，形成了俄国的民粹主义。这种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在俄国工农和进步知识分子中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它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舶来品而严加抵制。这就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把广大工农引向从事个人恐怖或与沙皇专制制度妥协的邪路，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无法建立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法正常开展起来。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是俄国第一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和政论家，而且他是从民粹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反戈一击的猛将。他以如椽之笔捍卫并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适用于俄国的普遍真理；他以雷霆万钧之力驱散了积压俄国思想界长空的民粹主义阴霾，使马克思主义的阳光得以普照俄罗斯大地，使俄国人民获得思想大解放；他以身作则争取了一批原民粹派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了良好条件；他以理服人，给俄国工人阶级指明了解放的康庄大道，提出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列宁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派斗争的历史功绩。他于一九〇二年写道：“普列汉诺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①即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他于一九一一年指出：要是普列汉诺夫“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驳拉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意义，那俄国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形成^②。一九一四年又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57页。

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①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派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包含有错误观点。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派美化农民公社的谬论时，没有充分估计到俄国社会中存在着的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没有深刻理解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未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大意义。所以，他在批判民粹派美化农民、否认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谬论时，有时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忽视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机械地认为：农民由于生活在农民公社中，因而必然保守落后，漠不关心政治革命，甚至对农民阶级觉悟的提高缺乏信心。他悲观地说：“我们的革命家很快地从痛苦的经验里认识到，农民由抱怨土地太少而进到培养出一定的阶级意识这一过程，是无限地遥远；由一百和二百年以前的暴动，还不能得出人民现在也准备起义的结论。”^②普列汉诺夫还把“无产者”同“庄稼汉”看成是政治上相反的两种力量，错误地认为无产者的革命历史作用有多大，庄稼汉的反动作用就有多大。他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是政治上真正相对立的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愈是革命的，而农民就愈是保守的。”“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外，我国再没有什么作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依靠的社会力量。”^③他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和俄国必然发展资本主义着眼，把农民看成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把资产阶级看成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所以才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而否认农民的革命作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86、120页。

用。他不了解农民作为被压迫者是反封建主义的重要力量、作为劳动者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因而他不懂得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决定力量，不认识工农联盟对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其次，普列汉诺夫有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的历史观点相提并论，和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以及黑格尔的历史观混为一谈，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他说：“马克思在领悟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结果之后，完全同意法国的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的上述的结论。他说，我坚信：‘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既不能以其本身的天性来解释，亦不能以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中，这些关系的总和，黑格尔跟着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解剖应该求之于它的经济。’”^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歪曲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上述这段话的原意，硬把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说成是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黑格尔完全一致的，这是不妥的。普列汉诺夫在讲到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时说：“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认识到此一现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拼命挣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拼命挣扎而值得玩味的例子。”^②事实上，一切反动派，由其阶级地位决定，不可能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能够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它们进行垂死的挣扎，是由其经济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的。在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才能认识到历史必然性，自觉地运用历史发展规律。

还有个别问题，普列汉诺夫曾经有过错误的认识，后来他自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45页。

己已经作了纠正。例如，他反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的原则，把它当作蒲鲁东提出的错误观念。他说：

“无产阶级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不能和交换有任何共同之点，这一制度将只知道按照劳动者的需要分配物品。有些不彻底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按照工作者对生产的贡献分配，是更方便些。发现这样的要求的弱点是不难的。”^①他把后者叫做“蒲鲁东所想出的这一交换的观念”^②。直到一九〇五年，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意见分歧》再版的注释中，才改变了看法。他认为按劳分配虽然不是理想，“而作为过渡的措施，它是完全适当的。”^③

最后，普列汉诺夫虽然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但是他并不十分了解民粹派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它所反映的客观社会内容。民粹派在客观上反映了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与思想，因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的民粹派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散布经过农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革命的民粹派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就写文章，在批判民粹派反动理论的同时，又肯定了他们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作用，认为他们是沙皇制度的死敌。普列汉诺夫看不清民粹派理论的阶级实质，看不到民粹派的社会基础是农民，不了解民粹派的理论反映了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革命理想，把民粹派看成是俄国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带有狭隘民族偏见的流派，是一种停滞不变的思潮。列宁在肯定斯拉夫主义同民族主义的历史联系时说：这一论点“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

①②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71、372页和371页注①。

深的地方：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是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民粹派中间也有过一些作家……他们跟斯拉夫派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①在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计划里“含有对中世纪制度的破坏性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空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论从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现实。”^②后来随着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的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才逐渐转化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反动的自由主义的民粹派，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已完全放弃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转而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变成富农利益的代表者。普列汉诺夫未把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对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作用认识不足。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个别的；而他的功绩是主要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不要责备求全，苛求前人。同时，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难理解：正由于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存在着上述缺点和错误，决定了他尽管能够给民粹主义以沉重打击，但不能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这个任务是由一个年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继续完成的。列宁在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民粹主义的论著，比普列汉诺夫更进一步分析了民粹主义的演变历史、阶级实质和政治作用等问题。尤其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列宁全面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他在这部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6页。

著作中有力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哲学观点、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撕破了民粹派的“人民之友”的外衣，暴露出其“人民之敌”的本来面目，指明自由主义民粹派事实上是代表富农利益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联盟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力量，指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是：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促进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俄国工人阶级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道，去从事共产主义革命。列宁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流放期间，又根据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大量材料写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令人信服地驳倒了民粹派的谬论。这样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继续普列汉诺夫的事业，完成了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的历史重任。

第四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 和宣传家

第一节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已零星地个别地陆续被介绍到俄国来。一八四三年，在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刊登了波特金写的对恩格斯《谢林和天启》（一八四二年）的评介，文中曾摘译并转述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一些片断。一八六一年在俄国进步杂志《同时代人》上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谢尔古诺夫介绍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内容要点的文章——《英法工业无产阶级》。一八六九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贝赫尔写的《现代工人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书中，附有译成俄文的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同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主办的《钟声》杂志印刷所出版过巴枯宁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也运销到国内。一八七〇年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成立后，才开始把更

多的马克思的书信和他起草的第一国际的文件译成俄文，发表在它的机关刊物《人民事业》上。一八七一年在日内瓦以俄文出版了同年发表的由马克思执笔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前面曾指出，一八七二年在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本。但是，到七十年代为止，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仍是自发、分散进行的，有的译文质量很差，而且由于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即便被译为俄文出版，实际上并没有在俄国社会生活中起多大作用。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普列汉诺夫由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起，俄国才开始了自觉地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一八八三年建立的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成了在国外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把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运回国内发行。该社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捷依奇等“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亲自动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八十年代起，由于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才具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从此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俄国社会土壤里生根、发芽进而茁壮成长起来。

普列汉诺夫翻译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共产党宣言》。它于一八八二年在日内瓦以《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名义问世。

早在一八八一年底，普列汉诺夫就由于受到《共产党宣言》的深刻教育，而决定着手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名著。拉甫罗夫给普列汉诺夫寄来了《共产党宣言》的一八七二年的德文版本，这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校阅并写了序言的新版本。拉甫罗夫虽然总的说来还是支持普列汉诺夫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但

有时又扯他的后腿，曾劝普列汉诺夫暂时搁下翻译工作，先写点文章。普列汉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宁愿首先翻译宣言。”^①普列汉诺夫在翻译时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哪些词汇保留外国的用法，哪些词汇要变成俄文的表现形式；哪些词汇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已经通用可以继续保留，哪些词汇要重新创造；哪些应该采取直译的形式，哪些必须采取意译的形式。所有这些问题，他都反复推敲，逐一解决。普列汉诺夫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专有名词的俄文译法，例如“无产阶级”、“无产者”、“专政”。普列汉诺夫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是保证了质量。当全书接近完稿之时，他从一八七二年德文版的序言联想到能否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译本写个新的序言。于是他给拉甫罗夫写信请他转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接受，当即于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写出了新的序言，并于二十三日把它寄给拉甫罗夫。这个序言曾发表在同年二月五日出版的民意党人办的《民意》杂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在指出了俄国革命在欧洲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明确阐述了他们对俄国革命者十分关心的农民公社的看法。他们写道：“……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

^①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1967年俄文版，第457—458页。

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批评了民粹派关于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把农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在外因推动下，只有在外因与内因的互相配合下，农民公社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事实上，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大部分农民公社都瓦解了，只有一小部分残存的农民公社后来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八八二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除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这个序言以外，还有普列汉诺夫自己写的简短序言和两条注释。在附录中还列入马克思执笔的《法兰西内战》的片断和《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普列汉诺夫在译者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具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大意义，同时还阐明了它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巨大指导作用。他把《宣言》看成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引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他说：“目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于走上同专制制度进行公开搏斗的道路，而关于我党政治活动的意义和任务问题也成了迫切的实践问题，我们以为，在这个时候来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俄译本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②普列汉诺夫字斟句酌翻译《宣言》的过程，就是理解和消化《宣言》基本原理的过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运用他的观点清除自己头脑中民粹主义余毒、考虑俄国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② 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页。

实际问题的过程。他在《序言》中阐述了他对《宣言》一些原理的理解。他指出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伟大意义，坚信俄国和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他结合俄国革命斗争实际，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要遵循《宣言》的基本精神，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是对政治活动采取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忘却党的未来的利益。”^①他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少数青年学生和先进工人身上转向广大产业工人队伍。他写道：“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习惯于称为青年学生和有思想的无产阶级等等的阶层范围内。我国各个工业中心的工人也在开始‘考虑并竭力争取自身的解放’。尽管有政府的各种迫害，工人秘密社会主义组织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规模。”^②普列汉诺夫强调政治斗争的巨大作用，坚信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看到俄国产业工人大军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关心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这说明他已抛弃民粹主义理论，而要成为一名科学共产主义战士。普列汉诺夫写的这个序言，虽然篇幅不长，但含义深刻。它是普列汉诺夫基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界碑。

普列汉诺夫把《法兰西内战》的片断作为《共产党宣言》的附录，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关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重要结论。他把《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作为《共产党宣言》的附录，是考虑到第一国际是根据《共产党宣言》最先发挥的原理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章程又是对《宣言》的有意义的补充。恩格斯赞扬了普列汉诺夫选编的附录。他在一八八四年一月一日给伯恩

^{①②} 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第2页。

施坦的信中写道：“俄国人做得很对，他们已经把《内战》一书中的这个地方载入自己的《宣言》译本的附录。”^①

普列汉诺夫说到巴枯宁的《宣言》俄文译本时指出：“在六十年代出版的《宣言》俄译本，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珍本书了。此外，我们感到在这个译本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切之处，有碍于正确地理解两位著者的思想。”^②实际上巴枯宁的译本错误严重，很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普列汉诺夫基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为帮助俄国革命者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才着手翻译《宣言》。总的看来，普列汉诺夫的译本忠于原文，文字简练。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宣言》的俄文新译本问世时非常高兴，他们觉得《宣言》的这个译本比其他文种的译本都要好。恩格斯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俄译本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③当然译文不免还有一些错误和缺点。例如《宣言》中说到资产阶级的某些人破产后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给无产阶级带来大量的教育因素”，被译成：“是无产阶级中间的进行教育的元素”；“阶级对立”被译成“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良心的买卖”被译成“毫无思想的买卖”；“资产阶级的灭亡”被译成“资产阶级的失败”；政治权力——这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被译成“政权——这就是有组织的力量”^④。这些毛病大部分是由于他德文水平有限，理解不当造成的，也有是由于他头脑中保留着民粹主义的残余所致。至于说在这些错误中“已经出现了以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的萌芽”^⑤，这种看法未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1页。

② 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6、97页。

④⑤ 见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1976年中文版，第131—132页。

穿凿附会，言过其实。在八十——九十年代，这个译本曾经反复印刷多次，在俄国国内甚至秘密油印和石印，广为流传。

随着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到九十年代末，一八八二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宣言》俄文译本，早已脱销。正如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九年冬天说的那样：“现在，没有一本《宣言》出售。”^①秘密油印和石印的《宣言》数量有限，又多半只是在印刷地区流传。一八九八年是《宣言》发表五十周年，机会主义思想严重的比利时工人党领袖埃·王德威尔得（一八六六——一九三八年）发表纪念文章，攻击《宣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已经“过时”。基于这些原因，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八年初就打算出版《宣言》的俄文新版本，以纪念《宣言》出版五十周年，并着手为新版的《宣言》写一篇新的序言，阐述《宣言》的基本思想，并驳斥对它的歪曲。但《序言》未按计划写完，《宣言》的俄文新版本，到一九〇〇年才在日内瓦由“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出版。这个版本，除刊有普列汉诺夫新写的序言外，第一次全部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所写的六篇序言，但遗憾的是漏掉了他们为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写的序言。到一九〇六年由布尔什维克沃罗夫斯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新译本出版之前，普列汉诺夫的译本是质量最好的，印数最多的，传播最广的，可以说它武装了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宣传家立下的一个不朽功勋。

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以《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捷依奇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一八八三年九月“劳动解放社”成立后，陆续出版了一套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300页。

《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有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八八五年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九二年出版），有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八八四年、一八九二年、一九〇二年三次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一八八六年出版）、恩格斯的著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八九四年出版）。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还分别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写了注释和译者序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这些俄文译本的附录中，还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它一些文章。

此外，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二年“劳动解放社”在伦敦和日内瓦编辑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先后出版过四集。在这些文集中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文和书信。例如恩格斯的名著《论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就是专门为这个文集撰写的。

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推向了新阶段。同俄国以前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团体和个人相比，“劳动解放社”在从事这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时，有其明显的新特点。

第一，“劳动解放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是在恩格斯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进行的。它是受恩格斯委托有权出版他和马克思著作的唯一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团体。它通过自己的成员和其他人，与恩格斯直接通信，求得他对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指导。除上述普列汉诺夫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通过拉甫罗夫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联系外，我们还知道查苏利奇为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同恩格斯进行过多次通信。当恩格斯从查苏利奇的来信中，知道她正着手翻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于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回信说：“您

说，正是您自己在着手翻译我的《发展》，这个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我急切地等待着您的译著问世，并且非常珍视您给予的光荣。”^①此书俄译本出版后，查苏利奇把它寄给了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初，她又告诉恩格斯她正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请恩格斯寄一份马克思为此书的德文版所写的序言，还请恩格斯校阅一遍俄文译文清样并对译文提出意见。恩格斯在三月六日的回信中表示十分高兴并随信给她寄去了马克思为《哲学的贫困》写的德文版序言。还告诉她准备把他为该书新法文版写的注释寄给她，并建议她把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放在卷首。后来《哲学的贫困》一书俄文版于一八八六年在日内瓦出版。

第二，“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不仅种类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同类团体和个人，而且译文质量较高，当时曾得到恩格斯的好评。恩格斯说：“日内瓦的几个俄文本——《宣言》等等，我很满意。”^②他认为查苏利奇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得好极了。”^③恩格斯由于喜欢查苏利奇的俄文译文，在一八九四年曾宣布专门授与她用俄文翻译自己全部著作的权利。“劳动解放社”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最好的译本，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本，也大都是以“劳动解放社”的译本为基础校订的。列宁于一九一四年谈到《共产党宣言》等各种俄文译本的质量时说：“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全文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④“劳动解放社”因为在国外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受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限制，所以翻译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1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0页。

的著作是全文，不是摘录和片断。又往往同时刊有译者的序言、注释，书后并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或书目，这为读者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了方便。

第三，“劳动解放社”不仅是在国外翻译并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团体，而且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机构。它出版的一切书刊都被沙皇政府列入《禁止在俄国流传和翻印的图书目录》之中，因此，“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要把俄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秘密运往俄国，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关卡，表现出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例如：“劳动解放社”曾派其成员、秘密印刷所排字工人萨乌勒·格林费斯特秘密回到俄国，建立了运送路线和联系办法。运送人往往要带着假身份证，乔装成货运客人，把装有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箱子一批又一批辗转运回俄国销售。“劳动解放社”主要成员捷依奇曾为此被捕，流放西伯利亚达十六年之久。“劳动解放社”印刷所主任谢·格·赖钦也为此于一八九二年四月被捕并被流放。“劳动解放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不是企业机构，这些革命宣传品定价低廉，所以经常缺乏经费，普列汉诺夫等还要为筹划资金到处奔走。

第四，“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它开辟了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土地上扎根发芽。以前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团体和个人，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译者巴枯宁，一八七二年出版的《资本论》俄文版第一卷的译者格·亚洛帕廷（一八四五——一九一八年）和尼·弗·丹尼尔逊（一八四四——一九一八年），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有交往，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他们从事翻译只是介绍一种学说，并非要在俄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而

“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为了俄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这种崇高理想使“劳动解放社”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及团体，建立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劳动解放社”输送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小组内传阅；因书少不够用，往往在国内秘密印刷所里翻印，甚至手抄。国内同志经常把情况和要求告知“劳动解放社”。他们彼此学习，相互鼓舞，推动了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

季米特尔·尼古拉也维奇·布拉戈耶夫（一八五五——一九二四年）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建立了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它的成员们学习到“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之后，喜出望外，立即主动与远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普列汉诺夫还为他们出版的《工人报》写了题为《给彼得堡工人小组的信》，发表在该报第二期上。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用工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阐述了工人政党的性质和任务。

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托奇斯基组织了“彼得堡产业工人联合会”，在彼得堡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影响下，反对民粹派的个人恐怖活动。

一八八九年彼得堡工业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布罗斯涅夫建立了包括二十多个工人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个团体于一八九〇年领导了托尔通工厂工人与码头工人的大罢工。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在喀山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即著名的费多谢也夫小组，列宁和高尔基都参加过这个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的创建者尼·叶·费多谢也夫（一八七一——一八九八年）是受到列宁称赞的工人革命家，列宁经常和他通信与会面。这个小组经常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也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可见，包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在内的许多俄国工人革命家，都曾从“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革命理论。这说明“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可以说，它培养了俄国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节

为“劳动解放社”制定纲领

“劳动解放社”除了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外，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便是为俄国社会主义者制订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行动纲领。早在一八八三年秋天，“劳动解放社”刚建立时，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起草“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这个纲领正式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于一八八四年在日内瓦以单行本出版并发行。

纲领开宗明义提到：“‘劳动解放’社所抱定的目的是在俄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培养组织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成分。”^①这表明“劳动解放社”是要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纲领写道：“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将只能通过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转变为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和把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职能组织得符合于社会需要才能达到。”^②这大体上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

纲领中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明确宣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和宣布生产者们的国际团结的原则。”^③尽管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国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0页。

③ 同上书，第411页。

际工人协会”已于一八七六年宣告解散，然而“‘劳动解放’社也承认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原则，而且承认所有文明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①同时纲领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组织“要首先注意在各该国以内由工人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当然，每一国的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清算自己的有产阶级’。”^②

普列汉诺夫在纲领中指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社会条件。俄国社会的具体条件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受“警察专制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压迫”。“当代的俄国所遭受到的——正如马克思关于欧洲大陆的西部所说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痛苦，而且也感到这一发展不够的痛苦。”^③

关于俄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纲领中写明：工人阶级是“作为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们”^④，强调“‘劳动解放’社一点也不忽视构成俄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部分的农民”^⑤，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民的工作，“假使在农民中暴露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力量的分配就应当有所改变，而且甚至在现在的时候，一些和农民有直接关系的人们，也能以自己在他们中间的活动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重要的效劳。‘劳动解放’社不仅不推开这些人，而且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在政纲的基本诸原理上和们一致。”^⑥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纲领中正确地指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不能主动地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纲领写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②③ 同上书，第412页。

④ 同上书，第413—414页。

⑤⑥ 同上书，第415页。

道：“生产的这种落后状态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过去和直到现在都是中等阶级的不发达状态，它在我国就不能负起主动地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责任。”^①

普列汉诺夫在上述这些问题上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这个纲领太抽象，还存在许多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纲领草案出版后，运送到俄国国内征求意见。已经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联系的彼得堡布拉戈耶夫小组读到这个纲领草案后，感到不能令人满意，就在一八八五年一月写信给“劳动解放社”和普列汉诺夫，对纲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共同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普列汉诺夫在拟定这个纲领草案时本来就是要提出来供大家共同讨论的，以便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他在注释中说：“为我们提出来供同志们批判的纲领，我们绝不认为是完全完整的、不得加以任何局部的改变和补充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准备在它里面采纳任何修正，只要它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而且符合于由这些概念所得出的有关俄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实际结论。”^②普列汉诺夫吸取了布拉戈耶夫小组和俄国国内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于一八八七年提出了第二个纲领草案，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它最初曾油印过并送到俄国国内。后于一八八八年刊印在盖得和拉法格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什么》的附录中。

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写的第二个纲领草案，同第一个纲领草案相比，在某些方面观点更正确，态度更明朗，更符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总的看来，无疑前进了一步。新纲领草案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致力于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获得完全的解放。这样的解放只有把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2页。

② 同上书，第410页。

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转变为社会所有才能达到”^①。而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推翻专制主义应当是他们的第一个政治任务。”^②纲领草案中还具体规定了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提出和实现的基本要求。纲领草案写明，工人阶级要想争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人阶级在各该国内的夺取政权”。纲领指出了俄国的特点是“劳苦群众处在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衰颓着的家长经济的双重压迫”^③；纲领具体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和农民公社的解体。它写道：“俄国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资本主义在它里面从废除农奴法的时候起已完成了巨大的成就。自足经济的旧体系让位于商品经济，从而为大工业开放广大的国内市场。农业的家长式的，公社的形式是在迅速地解体，公社变成把农业人口提供国家奴役的手段，而在许多地方它也是富的公社社员剥削贫的社员的手段。”^④而“公社的分化在我国创造着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新阶级。这一阶级是更易感受的、灵活的和更发育的”^⑤。

纲领明确提出了在工人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工人小组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和进一步地在他们中间普及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组织。”^⑥“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第一和主要的职责就是组织革命的工人党。”^⑦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个纲领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这两个纲领草案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第一个纲领草案已说到“工人阶级的政治自我教育和政治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6页。

②⑤⑥⑦ 同上书，第418页。

③④ 同上书，第417页。

治构成它的经济解放的必需的先决条件”^①，第二个纲领草案又写明，工人们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在各该国内的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临时的统治”。^②这已经包含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如果考虑到当时西欧已建立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都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定，那末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错误和缺点来苛求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起草的党纲草案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个纲领草案在谈到首先注意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的同时，曾经指出了“也不忽视构成俄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部分的农民”^③。列宁后来讲到：“还在一八八四年，‘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刊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就十分注意农民问题了。”^④可是在第二个纲领草案中却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俄国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得到他们（指农民——引者注）的任何支持、同情和理解。专制主义的最主要的支柱正寄托在农民的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和智力的落后上面。”^⑤两个纲领草案关于土地问题都是这样写的：“彻底改变我们的土地关系，亦即改变赎买土地和以之分给农村公社的那些条件。对于凡是认为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等等对自己有便利的那些农民，就赋予他们这样做的权利。”^⑥列宁后来于一九〇七年在评论这个土地纲领时指出：“纲领的原则是对的……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说实在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②⑤ 同上书，第417页。

③ 同上书，第415页。

④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页。

⑥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4、419页。

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宣言。”^①普列汉诺夫自己于一九〇二年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说明》一文中也承认，当初这样表述土地纲领是出于“外交式的考虑”^②。就是说，在八十年代中期，工农革命运动尚未深入发展、工人阶级政党尚未正式建立，这种比较笼统的提法带有一般号召性和试探性。

第一个纲领草案曾正确地谈到俄国资产阶级“不能负起主动地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责任。”^③但是在第二个纲领草案中，把这个提法删去了。这表明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摇摆不定，缺乏前后一致的坚定看法，后来反而后退了。

在第一个纲领草案中，“承认反对专制主义政府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必要性”^④。在第二个纲领草案中则换为隐晦一些的说法。说什么“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会停止在所谓恐怖主义活动之前，假使认为为了斗争的利益这是必需的。”^⑤可见，纲领在原则上还是承认个人恐怖手段。列宁在评论“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的这条内容时，针锋相对地提出：“恐怖手段在目前是一种不适当的斗争手段，党（作为一个党）应该摒弃这种手段”^⑥。在对个人恐怖主义策略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反复无常，有时批判它，有时又承认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受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当时想把“民意党”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4—23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21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2页。

④ 同上书，第415页。

⑤ 同上书，第418页。

⑥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9页。

人争取到“劳动解放社”方面来，所以不惜在纲领中对个人恐怖主义作了原则让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一部分民意党人团结过来，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

这两个纲领草案都沿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提出的把“人民的直接立法”作为无产阶级的当前政治要求。两个纲领草案几乎同样写道：“公民们对于一切社会事务管理的直接参加须以废除现代的政治代表制度并以**人民的直接立法**代替它为前提。”^①

列宁于一八八九年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指出：“关于人民直接立法制问题，我们觉得现在在纲领中根本不应该谈。在原则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同人民直接立法制代替议会制这一点联系起来。”^②因为在西欧一些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要求人民直接立法是比选出代表进行代议更彻底的民主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揭露并打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而在俄国，还没有议会制，“在专制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今天，我们只能要求‘民主立宪’”；如果提出人民立法制的话，“更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制’的严重危险。”^③

两个纲领草案中都提出了对于各行业，各部门“所组织的生产组合应当由国家予以帮助。”^④关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由国家帮助合作社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主张，早在一八七五年哥达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纲领时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⑤。列宁于一八九九年指出：“我们认为，应该完全取消‘劳动解放社’纲领提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1、416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14、419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9页。

的‘国家援助生产社’的要求。无论根据别国的经验，无论从理论上考虑，或者从俄国现时生活的特点来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警察政府竭力赞美‘劳动组合’和对‘人民工业’的‘保护’，等等），都不能提出这项要求。”^①当然，列宁也讲到，在十五年之前“把这种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很自然的。”^②

尽管普列汉诺夫起草的这两个纲领草案有这些错误和缺点，但是总的看来，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俄国实际，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纲领作出了最初的尝试。当“劳动解放社”刚成立，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小组才出现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确定最近的革命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这是很可贵的，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对于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列宁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党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人们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自然而然地会把目光集中在‘劳动解放社’社员身上，因为他们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作了许多事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同志，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反映是及时的。”^③

普列汉诺夫起草的两个纲领草案，代表了当时国际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为未来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纲领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后来，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吸收了这两个纲领草案中一切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内容。可以说，它是以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党纲的雏型。列宁在一八九九年曾经肯定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二个纲领草案说，

①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页。

“它大体上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全够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水平。”^①又说：这个纲领草案中的所有正确内容“都是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原理提出来以后，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或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已经不断地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而且应该把‘劳动解放社’的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只要作局部的校正、修改和补充就行了。”^②

对于普列汉诺夫起草的这两个纲领草案中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不能苛求于前人。有些问题是因为处于初创时期，未能展开写得更具体，有些问题则是受当时整个第二国际思潮的影响，有些问题是流露出他自己原有的民粹主义的残迹。列宁后来在一九〇七年谈到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起草的纲领草案时指出：“但是纲领起草人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是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又是初次尝试，因此把这个错误推在起草人身上，当然是很荒谬的。”^③

第三节 和列宁第一次会晤

一八九五年，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发生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和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第一次会晤。

列宁早在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就开始学习马克思和恩格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5页。

斯的著作。他的哥哥当时在彼得堡大学念书，放假时带回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就埋头研读起来。他于一八八七年七月进入喀山大学，继续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因参加革命活动，于同年十二月被开除学籍。一八八八年秋，他加入在喀山的费多谢也夫小组，小组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热烈讨论过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派的论著。一八八九年列宁随同全家迁居到萨马拉，他于一八九二年在萨马拉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他除勤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外，还阅读“劳动解放社”的其他出版物。列宁非常关心工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学习，一位老工人回忆道：“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见我手头有我曾经一读再读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别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的笔名——引者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常见的微笑。”^④列宁于一八九三年八月离开萨马拉，来到俄国首都彼得堡，不久就加入了大部分是由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从一八九三年秋开始与工人革命活动家建立了联系，积极参加工人小组的活动，很快成为彼得堡市涅瓦关卡、彼得堡区和维波尔格区工人小组的领导人。列宁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普列汉诺夫十分敬仰。彼得堡工人小组很想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这促使列宁产生了出国去拜访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它成员的迫切愿望。

九十年代，在列宁会见普列汉诺夫之前，彼得堡的一些革命者已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个人联系。例如，当一八九四年普列汉诺夫住在伦敦的时候，彼得堡的年轻社会民主党人亚·尼·波特列索夫曾去拜访过普列汉诺夫，商谈在彼得堡公开出版马克思

^④ 转引自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第138页。

主义文集的问题。普列汉诺夫答应为文集撰稿，波特列索夫还把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手稿带回国内出版。后来这个文集定名为《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包括有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列宁（用笔名克·士林）的一篇文章^①。沙皇的书籍检查机关原来允许这个文集在彼得堡公开出版，但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当该书印刷完毕时，又禁止出版，结果印出来两千册，除一百本已在一些城市售出外，全部都被销毁。

一八九五年三月初，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等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代表在彼得堡召开会议，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从仅仅在工人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到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还决定出版工人的通俗书刊，并且商定派代表与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取得联系。会议本来拟派一名代表出国，然而由于意见分歧，结果决定派遣两名代表，这就是彼得堡的列宁和莫斯科的叶·伊·斯庞蒂（一八六六——一九三一年）。

列宁因患肺炎，延期出国。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斯庞蒂先来到了日内瓦，会见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向“劳动解放社”转交了一笔用于出版书籍的款项，然而并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他走后，列宁就来到了瑞士，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列宁以肺炎后需出国疗养为名，于一八九五年五月七日启程，坐火车来到瑞士日内瓦后立即去找熟人舒赫特^②，请他安排

① 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是，《悲观主义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彼·雅·恰达也夫的悲观主义）》和《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列宁的文章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② 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舒赫特（1860—1933年），原是民粹派分子，曾被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住在萨马拉时认识列宁，到彼得堡时与列宁也有交往。90年代初他全家迁居瑞士。1917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同普列汉诺夫会面。普列汉诺夫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为了防避沙皇密探监视，他建议在兰多利特咖啡馆会面。

列宁早已熟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尤其是对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刚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赞扬备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也很了解列宁一八九四年春天和夏天写的批判民粹主义的论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为这第一次会面而心潮澎湃。

年已三十九岁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刚刚年满二十五岁的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列宁终于依约于五月中旬在咖啡馆里会晤了。他们亲切热烈地交流了国内外革命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商讨了有关俄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在交谈中突然发现咖啡馆里有一个顾客在旁边窃听，机警的普列汉诺夫就建议列宁去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续谈。

在苏黎世经过几次交谈，普列汉诺夫逐步认识到列宁是能给俄国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好处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会谈后，来到了巴黎，在这里逗留几个星期，认识了马克思的学生、战友和女婿拉法格，亲自考察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于七月间又回到瑞士。他在一家疗养院里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同普列汉诺夫和刚从俄国来的波特列索夫会谈，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沃坚（一八七〇——一九三九年）也参加了谈话，他当时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先来到日内瓦湖畔蒙特勒市近郊的克拉伦，在那里会同波特列索夫和沃坚一起，徒步经过一座小山来到奥尔蒙特的小村子，大家在一起食宿、散步，无人监视，谈笑自如。当沃坚在场时，他们就多谈哲学，当沃坚不在场时，就谈论俄国革命运动诸问题。列宁谈到彼得堡和喀山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情况，而普列汉诺夫则向列宁介绍了民粹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宣传活

动，回忆到“土地与自由社”的主要组织者——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双方兴趣盎然。

普列汉诺夫这位老前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列宁这位俄国工人运动年轻的领导人的会晤，使他们有机会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充分交换看法，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列宁对于在瑞士同普列汉诺夫的会谈感到惬意，对这位“劳动解放社”的主将十分推崇。他从这位俄国老社会民主党人身上学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他对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有了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他对这次出国的收获，感到十分满意。这在他七月十八日给母亲的家书中有所表露。只是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检查，他故意行文隐晦：“从那时起我又跑了好多地方，而现在已经在瑞士的一个疗养院里住下来了……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讨厌的病（胃病）好好治疗一下，而且有人多次向我推荐说，主办这个疗养院的医生是一个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我在这个疗养院里已经住了好几天了，感到很不错，膳宿条件相当好，治疗方面看来也很有办法，所以我想再过四一五天出院。”^①

普列汉诺夫从列宁身上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茁壮成长，这使他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他经过这次同列宁交谈，对俄国国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普列汉诺夫给亲友的几封信中，多次谈到列宁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在致司徒卢威的信里写道：他在国外这么多年，俄国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过，可是，可以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抱过象对年轻的列宁那样大的希望。据当年了解此信内容的老布尔什维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八七二——一九五九年）回忆：“就我所记得的，他在这封信里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3页。

也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人的渊博学识，完整的革命世界观和喷泉般的旺盛精力。”^①普列汉诺夫当时还写信告诉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从未见过象列宁这样一个革命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说这个人在理论素养上以及对当时俄国现实情况的熟悉上都胜过其周围所有的人。深知普列汉诺夫为人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为此感慨地说：“可是普列汉诺夫一生并不轻易予人以好评的。”^②可见这就更为难得了。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交谈中，除了在大部分问题上双方观点一致外，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原则分歧。列宁认为，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是它的主要同盟者，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力。而普列汉诺夫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主张无产阶级应当与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读过列宁送给他的著作之后对列宁说：“你们把背转向自由派，而我们却面向他们。”^③这些意见分歧并未把他们隔开，相反共同的革命理想，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他们结合为革命的战友。他们在长期的阶级斗争风雨中，维持了革命的友谊，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堕落为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列宁也不是把他一脚踢开，而是一有机会就尽力争取他，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将要提到。列宁在离开瑞士时，给普列汉诺夫的助手、“劳动解放社”印刷所排字工人萨乌勒·格林费斯特留下了通信地址，表示要继续同普列汉诺夫联系，以便今后就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继续向他请教并同他交换意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次会谈的一个具体成果就是“劳动解放

① 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译文有修改。

② 同上书，第15页。译文有修改。

③ 转引自波斯别洛夫主编：《列宁传》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5—56页。

社”采纳了列宁关于联合出版工人通俗读物的建议，决定由国内提供稿件和资金，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并出版《工作者》文集，共同致力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列宁于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九日启程回国后，当即向国内的同志们报告他的出国观感。他先访问维尔诺、莫斯科等地，同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并商讨如何支持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彼得堡。当时在彼得堡工人小组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回忆说：“你们很容易想象到这次出国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又多么难耐地等待着他的归来。终于盼到了那一天，我们的‘老头子’（指列宁——引者注）象水银似的灵活而敏捷，又回到我们中间了。他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对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的印象。”^①十月底，列宁就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十二月正式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新的工人政治组织，不论从名称到实际活动都比“劳动解放社”前进了一步，它已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按照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纪律组织起来的各市区的小组，直接同工厂联系，为工人起草传单，组织工人罢工。列宁积极组织这个协会的会员为文集募集资金并写稿。十一月间他就给普列汉诺夫寄来了几篇关于俄国工人运动的通讯稿，还有他亲自撰写的悼念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集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由“劳动解放社”倡议和组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出版，先后共出版六期（三册），在一八九六年春出版的第一、二期合刊上就刊登了普列汉诺夫写的《出版者的话》和列宁悼念恩格斯的文章。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会晤，推动了“劳动解放社”和后来建

^① 《伟大的列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译文有修改。

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革命活动，加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劳动解放社”同俄国国内的联系虽然一再被沙皇政府所破坏，但它还是克服重重困难，躲过警察的搜索，把自己的出版物运到国内，流传到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甚至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列宁及其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战友被捕，并于一八九七年三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仍然设法通过当时住在柏林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一八六四——一九三五年）与“劳动解放社”保持联系。他从流放地把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放在精装书的书脊里寄出去，要经过两三道手续才能到达他姐姐手里，然后再转寄给在苏黎世的收信人。列宁在一八九五年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写了进行政治鼓动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书中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号召工人起来同资本家斗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读了列宁的这个册子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俄历八月十六日）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您和他（指普列汉诺夫——引者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还表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①又如，阿克雪里罗得写了一本名为《俄国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小册子，鼓吹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并结成“联盟”。列宁自流放地发出的一封信中，批评了阿克雪里罗得的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阿克雪里罗得应该把工人阶级运动的阶级性更明确地表示出来，而不能对自由资产阶级讲仁慈。他说：“利用”这个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词比“联盟”要恰当的多，因为胆却而又无定见的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程度^①。

自从列宁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普列汉诺夫全家时刻关心着他的情况。当他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帮助他们照料孩子的克拉西科娃的信中，了解到列宁和赖钦^②身体健康时，就非常高兴。列宁也依然十分关切普列汉诺夫。据老职业革命家彼·阿·克拉西科夫（一八七〇——一九三九年）回忆，他于一八九七年三、四月间赴西伯利亚流放地途中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逗留期间，列宁曾向他打听过普列汉诺夫的情况。他写道：“我说，我知道普列汉诺夫的物质生活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多么不好，几乎没有钱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没有钱维持个人生活。他身患结核病。妻子虽然将要当上医生，但几乎什么钱还没挣到。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已死于脑膜炎。普列汉诺夫一家生活困窘，令人惊讶。我叙述了普列汉诺夫穿戴破旧的情况：他的裤子破了边，大衣和礼帽褪成了红褐色。经常不断的支气管炎和苍白的面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聚精会神听我的叙述，不中断它，但是以一些评语和提问把谈话引向他所需要的轨道。我讲到我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好的，我同他几乎每天会面，在他女儿死亡和安葬的困难时刻，他曾恳切地来找我，我就尽力同志式地帮助他。当我说到这些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可是’你们当然已经知道，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处境有所不同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尽一切努力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争取和保护这样杰出的才子，把这个巨大的写作力量变成我们共同的财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页；凯尔任采夫：《列宁传》三联书店版，第35—36页。

^② “劳动解放社”印刷所主任，他于1892年4月被捕，当时与列宁一起流放在西伯利亚。

富。你看这本书——他指着桌子上那本别尔托夫的书——是了不起的好书，同时它也给予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一大笔法郎。我在一八九五年看见他的时候，裤子再也没有破边的痕迹。而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永远再也不会受穷了。同他建立友谊，其中包括个人的交情，对于我们是很需要的。他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是巩固的，他的个人友谊起着很大的作用。”^①

列宁长期对普列汉诺夫保持着敬意，他永远不能忘记正是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正是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了他。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八六九——一九二九年）在回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时，如实地写道：“他对普列汉诺夫是很敬爱的。普列汉诺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展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他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在他眼里是荣光遍体的，他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任何最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非常难受。就在分裂以后，他仍然密切地注视着普列汉诺夫所发表的言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把自己同普列汉诺夫对立起来。”^②

第四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对它的介绍和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运动领导人十分关切的问题。列宁一生

^① 彼·阿·克拉西柯夫：《开诚布公的谈话》，见1963年4月20日《消息报》。转引自恰根、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63—64页。

^②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4页。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的革命实际，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除列宁之外，还有德国的奥·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威·李卜克内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卡·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年）、罗·卢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年）和弗·梅林（一八四六——一九一九年）；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法国的保·拉法格（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年）和茹·盖得；美国的弗·阿·左尔格（一八二八——一九〇六年）；奥地利的维·阿德勒（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年）；意大利的安·拉布里奥拉（一八四三——一九〇四年）等等。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无法跟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相比，但同欧洲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考茨基、梅林等相比，却有其独到之处。

普列汉诺夫一生写下了大量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也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方法和范畴的见解”^①。又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哲学，正如它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一样。”^②可见，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7页。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他没有象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时那样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①。

普列汉诺夫还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说明。他说：“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指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是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②他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写道：“马克思的那个据说是宿命论的理论，正是在经济学史中第一次使经济学家们的那种拜物主义宣告结束的那个理论，这种拜物主义，是通过物质对象的性质，而不通过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来说明各种经济范畴——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详细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贡献。我们只是要提一下，他在这门科学里是运用了同样的方法，在处理这门科学时是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和他说明历史时所取的一样：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的观点。”^③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熟练地运用了革命的辩证法^④。他还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基础。”^⑤

普列汉诺夫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妄图割裂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进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的作法，强调指出马克

①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③④ 同上书，第208—209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60页。

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构成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读了《反杜林论》就很容易理会这一点。这个世界观的每一方面，都同其余一切方面极密切地联系着，并且每一方面都在阐明其余的一切方面，从而有助于对其余一切方面的理解。不能从中割裂出某一方面而只承认这一方面，取消或者忽视其余的方面。这样做，就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逐出它的灵魂，而把这一生气勃勃的理论变成了思想僵尸，甚至进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集中在这具僵尸的某一个器官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正在于此，许多一心想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以如此错误地理解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①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驳斥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诬蔑、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写下了《反杜林论》这本光辉著作，它分为三篇：第一篇哲学、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第三篇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其二，普列汉诺夫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十分强调这一学说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认为它是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剥削制度、争得解放的理论。他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革命的代数学’。凡是要想同我们现存秩序进行自觉斗争的人们，都必须了解这种学说”^②。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深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它争得解放的精神武器。他说：“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的学说对文明人类的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正如某个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所说的——先进的德国哲学之对于德国解放运动的关系一样：他们的学说是它的头脑，正如无产阶级是它的核心。”^③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6页注①。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82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0页。

才能掌握它。他在谈到马克思学说的强大革命作用时，指出：“这样一个学说在‘权贵’们那里受不到欢迎，完全是自然的事。资产阶级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反动的阶级：它正在努力‘逆转历史的轮子’。它的观念形态已经完全不能了解马克思的发现的巨大科学价值。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却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作为它的解放斗争中最可靠的指南。”“这个理论，这个由于它的所谓宿命论把资产阶级吓坏了的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以无比的干劲！”^①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历史和哲学的思想，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才有可能接受这些思想的全部革命的内容，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是要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要进行社会革命”^②。

普列汉诺夫从批判民粹派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俄国开始，就坚决捍卫和努力宣传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反沙皇制度斗争胜利的锐利武器。他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历史时，指出：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从前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视若洪水猛兽，到今天他们也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它，“在某一个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成了彼得堡所有的办公室里的时髦东西。”^③他认为，敌人已经从公开诽谤马克思主义，到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这一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他说：“马克思理论的命运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不仅在俄国是如此”^④。

其三，普列汉诺夫是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是为了回击各种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而求教于马克思主义。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12页。

② 同上书，第825—826页。

③④ 同上书，第823页。

时就是射向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一连串炮弹。他的这些著作，充满了战斗气息，对于当时和以后革命者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批判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面。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机会主义者的实质是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他说：“‘批评家们’的思想方式正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他们起来反对‘教条的盲目信仰’时，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反对马克思理论的社会革命内容而已。”^①普列汉诺夫指明机会主义者是打着批判教条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学说。他说：“现在我们也要说，并不是每一个喊着‘批判、批判’的人都能够超过教条主义的水平。现在‘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们比海底的沙还要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各国知识界的某些集团中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但时髦和批判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越是时髦，那末这种批判就越会丧失一切批判的内容。批评家先生们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得出的结论过时了，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们，仅仅限于一方面空洞地和枯燥地重复‘批判’这个名词，另一方面就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甚至早一时代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很清楚，这样的批判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没有任何帮助，这样的运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叫做前进的运动。”^②显然，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已提出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必须反对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

其四，普列汉诺夫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不仅限于重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十分重视在参加现实斗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823页。

② 同上书，第514页。

中发挥并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生气勃勃的革命学说，它理应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普列汉诺夫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时，指出：“被无知之辈认为‘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的发展的合法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比它们在盛行一时的时代所拥有的基础坚固得多。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最发展的、最丰富的、最具体的。”^①他说：

“所谓对马克思的批判，它所暴露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而是马克思的批判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为了真正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办法：正确掌握它的唯物主义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及其朋友和战友恩格斯很少研究过或根本没有研究过的历史发展的那些方面——例如研究思想史。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发现一切科学方法的弱点，如果真有这些弱点的话。当然，进行这样的批判，比掌握目前有学问的和受过简单教育的资产阶级中间颇为畅销的各种理论——康德主义，内在论哲学，布伦坦诺主义，‘纯经济学’，诸如此类——是需要认真地多动动脑子才行。”只要坚持贯彻到底，我们**“终于能看到这样的批判蓬勃开展起来，这也将是马克思主义极其伟大的理论胜利”**^②。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通常采取的手法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或者用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和无知。对于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9页。

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才能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批不倒的，如果能够批倒，那就不是科学；另一层意思是：告诉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下苦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着重探讨那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或没有研究的领域，去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弱点，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这是普列汉诺夫七十多年前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本人也正是这样从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探讨。可惜，后来他自己也未能言行一致，贯彻到底。

总的说来，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在某些问题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前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其一、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杰出的哲学著作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战斗风格。他喜欢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话，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称作是“革命的代数学”。他喜欢把唯物主义称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后来他又把“战斗唯物主义”作为他于一九〇八年写的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文章篇名。普列汉诺夫写的优秀哲学著作都是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他把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作为自己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他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考茨基写信说：“……我保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要是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究一攻击就投降屈服，对我们说来是不可原谅的……您说，你们的读者对哲学不感兴趣。我认为，应当促使他们感兴趣。”^①普列汉诺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之前，保持马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283页。

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典范。

其二、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敌人，如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各个方面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有的鼓吹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有的硬说八十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即只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与影响；只承认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不承认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因此，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的发展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唯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哲学领域里斗争的焦点。而对这些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作过一般的概括论述，没有来得及详尽地分析和发挥。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污蔑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具体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例如，他透彻而细致地分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在一八九三年写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概括：“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我们不愿意说，这个‘公式’是无所不包的——还离得很远！——，但是我们觉得它有无可争辩的优点，觉得它更好地表现了存在于不同的‘一系列环节’之间的因果联系。”^①后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6—187页。

他在一九〇七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五个方面，他写道：“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 (一) 生产力的状况；
- (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 (四) 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 (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①

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五项内容比较准确、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整个看来，这样归纳，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容易理解和掌握，因而应算做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发挥。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把“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单独作为社会结构序列的一项，这是他的独到见解。所谓“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心归向，尤其指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志向、愿望、要求等等。这是社会意识的初级形态，而他所列的第五项“思想体系”可谓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前者是后者的直接依据，后者是前者的系统概括。普列汉诺夫把社会结构的序列概括为这样五个层次，据此我们分析社会现象和确定方针政策时就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独立地位和特殊作用，就要充分估计到它是连接生产力状况、经济政治制度同思想体系之间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是反作用于生产力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

经济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形成思想体系的直接依据。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正确指出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必须经过中间环节，才能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因此，普列汉诺夫对这个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他正确指出：“任何民族的法律、国家体制与道德都直接为其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这些经济关系同时也决定着——不过是间接地——思维与想象的一切创造活动：艺术，科学，等等。”^①这就防止了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还有力地批判了把历史唯物主义污蔑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论调。他对这种论调的批判，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是比较早的。普列汉诺夫指明，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的同时，又为发挥个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写道：“当人们说，按照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借用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污蔑的名称，此处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引者注），一切事情都只能自然而然地发生，那就完全是在歪曲这个理论的实质。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看来，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就是人的关系；没有人的参加，没有大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的历史要向前迈进一大步也是不可能的。”^②如前所述，他在批判民粹派的英雄史观时曾经深刻论述了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此外，他还具体论述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实现与人们的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全面地指出：“社会发展规律，如果没有人的中介作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234—235页。

很少能够实现，正如同自然规律如果没有物质的中介作用也是很少能够实现的一样。但这完全不是说‘个人’就可以忽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了。如果忽视的话，他将至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即变成可笑的唐·吉珂德。”^①普列汉诺夫明确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普列汉诺夫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充分阐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原始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他指出：“自然界本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但是人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并不是不变的：人的生产力越是增长，社会的人跟自然界的联系就变化得越快，人也就能更加迅速地使自然界服从自己的控制。”^②他详细分析了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精彩地评述了地理环境对原始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他还指明，社会发展有它自己的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客观规律。他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③，当然，普列汉诺夫有时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说得过头，这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不是主流。理论界过去夸大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把他说成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这是不全面、不公正的。从整体来看，普列汉诺夫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和发挥。他自己也曾批评过俄国著名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列·伊·梅奇尼柯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年）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并强调指出：“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进程。”“研究社会关系的内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4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50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在逻辑，而且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不应当少于研究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①

其三，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实践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很赞赏“实践到处和永远先于科学”这一观点，他认为法律的信念应是“从生活的实践中产生”，“而不能先于生活的实践”^②。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可贵地谈到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他认为“真理的标准不在我身上，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上。正确地表象这些关系的观点是**真理的**；曲解它们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正确地把握着自然现象的互相关系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是**真理**；那些正确地描写那存在于被描写时代中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描写是**真理**。”^③普列汉诺夫在后来的著作中再次谈到实践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他说：“原始人的生产力很不发达；他们控制自然的能力是很低的。而在人类思想发展中，**实践**在任何时候都先于**理论**；人作用于自然的范围越广阔，他对自然的了解也就愈广阔，愈正确。”^④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时说：“当时是一个革命时代，哲学家们所宣传的那些‘真理’（这些‘真理’常常是彼此矛盾的）都有一个直接的实践目的。”^⑤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时，写道：“恩格斯说过，对康德主义的最好驳斥，就是我们每天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工业。”^⑥可惜后来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轻视了并且脱离

① 普列汉诺夫，《评列·伊·梅奇尼柯夫的书》（王荫庭摘译），《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第4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99页。

③ 同上书，第745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73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3—54页。

⑥ 同上书，第176页。

了革命实践。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比，力量没花那么多，成果也没那么大，但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八八五年）、《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一九〇一年）和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用一定篇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一些重要原理。他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还评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年）和亚当·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的经济观点，论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强调了马克思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的重要理论意义，批判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市场交换的谬论。他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工资基金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力图压低工资和工人通过斗争反对降低工资的工资变动方向。他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痛斥了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资产阶级的“土地肥力递减律”的理论。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三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说到“工人阶级不仅是日渐相对地、而且也是绝对地贫困”^①；而到一九〇一年在《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这篇文章中，指明马克思是把工人状况的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分开的，马克思只是说到“工人阶级相对的贫困化的理论”，而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②。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写的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中，指出马克思从未谈到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8页。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60—664页。

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正是机会主义者硬要把这个理论加在他的头上。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可以举出人所尽知的所谓‘贫困化的理论’作为例子。有人把这样一个观点强加在马克思身上：无产阶级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是**相对地**恶化，而且还**绝对地**恶化。只要读一下《哲学的贫困》中的下面一段话，就可看出这样的论调错误到何等地步。……可见，这个‘大问题’和马克思的‘批判者’通常所强加于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还是相距很远的。而在《资本论》中，肯定地发展了无产阶级状况**相对**恶化的理论。”^①普列汉诺夫后来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论文《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又谈到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而只字未提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②。关于如何评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的问题，这有待于以深入的研究来解决，有待于依靠实践作出科学的判断。

第二，普列汉诺夫深刻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得出了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灭经济危机的科学结论。他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中用专门的一章论述经济危机。他在分析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时，既反对“祸害的根源在于商业”的谬论，强调“商业危机总是同工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③；也反对“‘祸害的根源’就在于大工业，在于生产力的过于巨大的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他指出：“资本家陷入了这样一种荒谬的、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竞争迫使他应用尽可能更完善的生产方法；而另一方面，应用这些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8页。

② 参见上书，第619、623页。

③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98、496页。

法却有使市场充溢、发生危机、失去利润、遭到破产的危险。这种矛盾表明，生产力已经发展得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这种关系，乃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关头的最重要的‘迫切问题’。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位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不再引起‘经济地震’，它们将成为人们的顺从的奴隶，成为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源泉。”^①他关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根除“经济地震”的精彩论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第三，普列汉诺夫精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科学地预见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未来社会里能够控制人口增长。他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人口理论归纳为三个基本观点。他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人口问题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说，首先，抽象的人口律只有对动物和植物来说才存在，而且这也仅仅是在这些规律尚未由于人的活动而有所改变之前。”“其次马克思说，对历史上每一种生产方式来说都存在着自己特殊的人口律，它的作用局限于这个历史时代。”“此外，马克思还判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律，这个人口律可以表述如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相对地过剩的（即没有工作的）人口、工人后备军（恩格斯早在四十年代就这样称呼这种人口）的形成和增长。这个规律是否合乎实际情形呢？统计表明，是符合的。”^②普列汉诺夫的表述准确、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要点。他在谈到未来社会的人口规律时，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确表示：“怎么能表述未来社会的人口规律呢？暂时还无法表述。我们不可能去发现还不存在的社会所特有的人口律。想要这样做的任何尝试都是为时过早的，因而是空想

①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498—499页。

② 同上书，第462—463页。

的，而不是科学的。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有充分的把握这样说。而假如有人根据这个理由想用人口过剩来吓唬我们，因为根据马尔萨斯^① 主义者的意见，在一个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里人口过剩是不可避免的，那末我们就回答说，第一，现代的生产力状况已经为文明国家远远地扩展了繁殖的实际的限度，而第二，如果人类总有一天要和人口过剩进行斗争的话，——这种可能性极少，——那末，他们在存在着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生产和全面地发展的生产者的情况下和人口过剩作斗争，将比在以对工人群众的压迫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为基础的现存制度下和人口过剩作斗争，要方便得多。”^② 普列汉诺夫虽然未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要有计划调节人口再生产和合理使用劳动力，但是他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为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普列汉诺夫还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主要在如下四个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

其一，普列汉诺夫正确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他重点分析了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认为英国的空想主义者欧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年）具有代表性，所以他细致地论述了欧文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他的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肯定了“他提出的制定工厂法的要求，根本没有任何空想的因素。他指出对工厂中的童少年工人至少必须给予小学教育，这也完全没有任何空想的因素。”^③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时，主要阐述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观点，并时常把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立了一种反动的人口理论。

②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463—46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660页。

他们的观点和英国空想主义者的理论相对照。他正确地指出：“读者自己会了解，为什么法国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观点不象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那样明确。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在英国要比在法国明显得多。”^①

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圣西门、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两位伟大奠基人”^②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的思想时，对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原因、基本观点、历史功绩和局限性，作了比较正确的评述。他认为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热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矛盾。”^③“重要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上传布了一种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一深入工人的头脑，便成为十九世纪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思想的传布几乎可以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功绩。”^④普列汉诺夫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他们不停地谈论着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他们痛恶这种斗争的存在，力求阶级调和。他们的各色各样体系，就其实践部分而言，无非是结束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和平的种种措施。”^⑤

其二、普列汉诺夫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和作用。

他在一八九八年写的讲演提纲《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很赞赏奥地利社会党人维克多·阿德勒对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论述。他写道：“正如著名的奥国社会党人维克多·阿德勒说得很适当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经济的学说，也是无所不包的学说；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只是构成我们世纪特点的思想革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8卷，第671页。

② 同上书，第601页。

③ 同上书，第673页。

④ 同上书，第678—679页。

⑤ 同上书，第616页。

命的一个方面。”^①可见，当时普列汉诺夫已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内容广泛的理论。

普列汉诺夫后来在一九〇二年为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俄译本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和艺术这两个方面的对象和彼此关系。他指出：“作为一门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与条件，而作为一个学说或政治的艺术，则社会主义力求依靠已获得的知识来实现上述的变革。”^②普列汉诺夫也是俄国最早指出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在一八八三年就提出：“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在一九〇二年《怎么办？》一书中着重阐发的一条重要原理，以后并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理名言，这句名言最初还是出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之口。

其三、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第一个指明：工人阶级在未来的俄国革命中应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在俄国最早地提出：工人阶级要争得解放，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在一八八三年就指出：“幸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他们能够而且应当首先依靠工人阶级。工人的力量，也正如任何别一个阶级的力量一样，顺便说说，是取决于它的政治觉悟的明确性，取决于它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页。

子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初期，使我们的工人阶级能作为一个带有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特殊政党而出现。”^①

其四、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〇年的《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对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观点的歪曲，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争得解放的道路的理论时，举出恩格斯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著作《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②，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事实上恩格斯在这个序言中，只是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具体情况，建议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不要马上采取暴力革命的行动，而要积极开展合法斗争，为未来的革命斗争积蓄力量，做好准备。普列汉诺夫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一革命主张。他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建议是根据三条理由提出的：（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工人群众觉悟的高度发展，而这需要时间。（二）德国的保守派正在竭力设法引诱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起义，企图粉碎它，从而使它不断取得的胜利中途夭折。（三）由于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街头起义的任何尝试都是没有希望的。”^③普列汉诺夫进一步着重分析了第三条理由之后，认为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出论断：德国社会民主党马上同军队发生冲突，采取暴力行动，不但对革命没有好处，反而容易上敌人的圈套；他们会以此为借口摧毁革命力量。普列汉诺夫认为，恩格斯的这番话主要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讲的。他指出：“这一论断，似乎带有一般性质，然而现在却具有独特的、局部的意义；读者现在会开始觉得，恩格斯指的仅是德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13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4页。

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①普列汉诺夫认为，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的说法，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与《共产党宣言》中是有不同的，但这不是表明恩格斯已放弃了暴力革命的理论，而只是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当时要夺得暴力革命的胜利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说：“恩格斯这一新的观点当然完全值得我们重视和尊重，但是它与刚才我们在上面所说到的关于暴力行动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可能意义并不发生任何矛盾。他只不过说明了为使这种行动获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②普列汉诺夫举出历史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必须采取暴力，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时更不敢担保不使用暴力。他正确地指出：“正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可能预见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己的统治权时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所以它在原则上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手段。它应该铭记着那条金科玉律：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③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起来驳斥了对恩格斯逝世前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的歪曲，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这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可惜，后来他自己也背离了暴力革命的理论。

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与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一些缺点和错误。

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很不平衡，过于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都取得辉煌成就。但是不论研究哪一个组成部分，最终都要用以解决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普列汉诺夫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6页。

② 同上书，第568页。

③ 同上书，第564页。

尽管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就使得他的哲学著作中带有学理主义的倾向，使他未能解决好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未能为俄国无产阶级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这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弱点。

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未注意阐明辩证法是哲学科学的体系，未把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起来。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指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文章，但是“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①他还未明确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研究上，没有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出科学的概括，没有把辩证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没有很好论述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二年为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的一条注释中首次使用“象形文字”这一术语。他写道：“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②普列汉诺夫使用“象形文字”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可知论，捍卫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这一术语，不符合唯物主义学说，这就为二十世纪初俄国新马赫主义者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口实。可能当普列汉诺夫本人发现这个问题时，便在一九〇五年恩格斯的这部哲学名著出俄文第二版时，补写了一段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60页。

话，承认自己用词“不确切”，并将注释中的“象形文字”的术语删去。可是后来苏联学者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保卫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是“事实上对不可知论的让步”^①等等。显然这种看法是只抓住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放，没有全面反映他后来已经有所改正的情况。但也应指出，普列汉诺夫删掉“象形文字”的术语，并不意味着他完全纠正了在哲学问题上的错误看法，例如，他对什么是“经验”还持有“糊涂思想”^②。就是说，他还认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对立，实际上还认为人们的“经验”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

普列汉诺夫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述，对无产阶级在俄国人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阐述不够，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基本上没有提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夸大了自由资产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斗争中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他有时把商品生产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而忽视了剩余价值问题，从而未能充分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他不仅曾确信拉萨尔所臆造的“铁的工资规律”，而且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

尽管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上，存在着这些缺点和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① 见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7—17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1—152页。

第五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第一节

同恩格斯以及欧洲各国社会主义 政党领导人的交往

普列汉诺夫于一八八〇年侨居国外后，很快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从一八八二年拉甫罗夫请求他们为《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信中，知道了普列汉诺夫其人。普列汉诺夫从这篇序言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以至渴望能够早日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未能如愿，马克思竟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不幸病逝。普列汉诺夫以未能亲聆教诲而悲痛万分！三月十五日由拉甫罗夫签署发出挽词，“谨以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名义向当代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告别。”^①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表明：“在社会革命原则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们决不终止这一斗争，在热烈同情我们斗争的愿望的人的墓前，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②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

^{①②} 《俄国社会主义者挽卡尔·马克思词》，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5页。

日，普列汉诺夫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一起，代表俄国社会主义者出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他们在向大会致词中，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们说：“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对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我们的同志彼·拉·拉甫罗夫，在这位伟人的墓前所表示的高度的崇敬和景仰，也充分地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还深信，这位聪明的无产阶级的富于才智的领袖的不幸早逝，是先进国家工人运动的损失，同样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①他们还建议由大会发起世界性的募捐运动，为马克思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怀念。他们说：“我们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作出努力，为这位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发起国际性的募捐，以建立一座纪念碑来表达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他的崇敬之情。我们希望这笔基金也用来出版他的文集的普及版。”^②

马克思逝世后，普列汉诺夫盼望早日会见马克思的战友、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

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于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巴黎召开的标志着第二国际成立的国际代表大会，本以为能见到恩格斯，可是恩格斯由于在伦敦正埋头悉心整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三卷，未能与会。于是他在大会闭幕并参观了国际博览会后，为拜访恩格斯专程来到了伦敦。

在一个星期天，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来到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一二二号恩格斯家。恩格斯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在这里遇见了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威林（一八五一——一

^{①②} 转引自菲利普·丰纳编：《马克思逝世之际》，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译文有修改。

八九八年)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一八五五——一八九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著名有机化学家卡尔·肖莱马(一八三四——一八九二年);还遇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年),此时伯恩斯坦正住在伦敦,他参加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后刚从巴黎返回。恩格斯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开诚相见,谈笑风生。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从恩格斯的谈话中,感到这位将近七十高龄的老人,很谦逊、诚恳而又有风趣。殷勤好客的恩格斯留他们一起便饭。这一天,他们在恩格斯家呆到很晚才在雨中告辞。恩格斯在送别时表示欢迎他们随时再来。

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伦敦逗留的几天中,几乎每天都要到恩格斯家里作客,同他一起探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诸问题,畅谈对国际和俄国工人运动各个问题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如何看待巴枯宁和拉萨尔,如何评价荷兰著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一六三二——一六七七年)等人。后来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八年回忆起同恩格斯第一次会晤的情景时,写道:“一八八九年,当我参观了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以后,我曾到伦敦去拜访恩格斯。我很高兴我能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他就各种实际和理论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①他认为:在伦敦恩格斯“集体里度过的日子在自己生活中留下了最幸福的回忆。”^②

这永志不忘的深刻印象促使他以后时常给恩格斯去信或拜访他,不断向他求教;甚至介绍、催促俄国其他革命者拜见他。例如,民粹派革命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流亡国外后以斯捷普尼亚克笔名闻名)自一八八二年起便定居伦敦,可是从未去看望过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4页。

② 普列汉诺夫1893年3月25日致恩格斯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1年俄文版,第325页。

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得知后当即写信请这位当年同他一起创立并领导“土地和自由社”的老战友赶快去拜谒恩格斯。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你住在伦敦。但是你怎么搞的呢？你知道不知道恩格斯也住在那里？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我要求你务必和他认识，并把经过情况告诉我。你直到今天还没有到他那里去过，简直令人气愤，一定要到他那里去。”^①克拉钦夫斯基接到信后，和妻子在一个星期日去拜会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三年四月还介绍俄国文学家、翻译家、社会主义者阿·米·沃坚去伦敦拜见恩格斯。他亲笔给恩格斯写了信，让沃坚带在身边。

一八九三年八月第二国际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亲临指导。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也都出席了大会。大会闭幕后，恩格斯曾多次来到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看望俄国革命者。经过普列汉诺夫介绍，查苏利奇在这里第一次拜见了恩格斯。虽然自一八八一年以来，她已同恩格斯保持通信联系，但始终未曾谋面。后来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四年八月底至十一月底，住在伦敦时期，又经常去恩格斯家。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回忆说：“俄国人斯捷普尼亚克也常常去拜访恩格斯，而维拉·查苏里奇则从到英国时起，就成为一位常去瑞琴特公园路这所房子的不速之客。她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党内有才干的理论家和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害怕他也许甚于害怕任何一个现代作家，他在英国作短期逗留时，自然也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②。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时，恩格斯答应他可以利用自

^① 芬·马·克拉夫钦斯卡娅：《回忆录的片断》，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90页。

^② 爱德华·艾威林：《恩格斯的家庭生活》，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64页。

己藏书室里的书籍。在恩格斯的藏书中有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著作的稀有版本。恩格斯多次给普列汉诺夫讲述马克思的战斗生活，并且给他看马克思的手稿。普列汉诺夫曾于一八九四年十月间向恩格斯提出要借他保存的全套《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恩格斯当即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为他“提供方便”，并且请他放心，“凡是我能找到的您感兴趣的专门著作——书籍、报刊等，将统统提供给您。”^①还有一次普列汉诺夫去恩格斯家里拜会他，恰好未遇；普列汉诺夫便写了个便条留下，在上面真诚地写道：“我认为宣传您的和马克思的思想是我一生的全部任务”^②。

普列汉诺夫同恩格斯除了一八八九、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三度相聚、多次会面外，还时常保持通信联系。可惜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普列汉诺夫从一八九三年三月至一八九五年六月给恩格斯的书简十四封^③和恩格斯于一八九四年五月至一八九五年二月给他的复信五封^④。普列汉诺夫虚心请教，开始时称恩格斯为“最尊敬的导师”、“亲爱的导师”，并且表示“我的全部愿望就是成为象马克思和您这样导师的不完全够格的学生。”^⑤然而恩格斯从不好为人师，而是平等相待，共同商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恩格斯在复信中曾经诚恳地向他提出：“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只是叫做恩格斯。”^⑥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9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266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俄文版，第324—346页。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38—240、241—242、291、382—384、393—39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俄文版，第325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38页。原译文是“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恩格斯是姓而不是名，译文似乎欠妥。

来普列汉诺夫在去信中就称呼“亲爱的公民恩格斯”、“亲爱的将军”、“我的将军”^①。

普列汉诺夫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出版一部著作，恩格斯都要很快找来阅读，并且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在本书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曾经提到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十分赞赏。一八九〇年四月，当恩格斯收到二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内载有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读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一定十分愉快”^②。他还及时读了一八九一年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一八九〇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恩格斯曾引用了他文章中关于俄国大力创建民族工业的论述，并且赞扬他关于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几篇文章好极了”^③。普列汉诺夫把恩格斯对他的表扬看作是最高的奖赏。他在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中写道：“有人转告我由于我的关于黑格尔的文章，您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了一些称赞我的话。如果这是真的，我就无须希求其他的赞扬了。”^④当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四年表示要把即将由德国狄茨出版社以德文出版的他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的和历史的研究》相赠的时候，恩格斯在复信中高兴地说：“预先感谢您将大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赠我一本，我急切地等待着。”^⑤恩格斯也时常把新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馈赠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俄文版，第329、333、334、337、339、342、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3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39页。

普列汉诺夫。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和一八九五年出版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两部新版的马克思著作都附有恩格斯的序言），恩格斯都亲笔题字送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一直作为珍品收藏并细心拜读^①。

恩格斯积极支持并且热情赞扬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当普列汉诺夫奋起批判民粹派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虑到要加强俄国反沙皇专制政府力量的团结，曾经建议双方各派代表到伦敦恩格斯家里会谈建立暂时联盟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还准备出席斡旋。可是，到一八九二年春天，按约定的时间，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都没有赴会。只有民粹派的代表尼·谢·鲁萨诺夫（一八五九——一九三九年）一个人去了。恩格斯曾经当面批评民粹派“对本国社会的发展还认识得很差”，“资本主义的齿轮已深深嵌入俄国的经济……可是你们在很多场合还没有放弃陈旧的观点”^②。恩格斯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活动”^③，并且詰问民粹派“为什么还没有和普列汉诺夫在一起呢？”^④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指出：同民粹派“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⑤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民粹主义这一套谬论正是这

① 有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题字的这两本马克思著作的扉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插图。

②③④ 尼·谢·鲁萨诺夫：《我认识了恩格斯》，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74、376页。

⑤ 俄罗斯帝国在9世纪至15世纪称为罗斯。

些古怪的思想家“离群索居以及知识零散无条理所引起的”，“也是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希望破灭感到绝望所引起的。事实上，曾经是恐怖主义者的民粹派，最后完全可能成为沙皇制度的拥护者。”^①恩格斯临终前半年，还表示要积极参加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他在信中向普列汉诺夫表明：“为了能够参加这场论战，我必须阅读全部著作，仔细研究再作回答。这将占去我整整一年的时间……”^②。恩格斯还希望普列汉诺夫除了写论战性的文章之外，应该主要从事于写科学著作，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他不满意俄国记者丹尼尔逊等人写的这方面著作，认为最好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普列汉诺夫亲自来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③。

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直保持着革命的友谊和良好的关系。他从多年的交往中，对普列汉诺夫的卓越理论才能深有所知。他在致拉法格、伯恩斯坦等人的函件中，时常提到普列汉诺夫的成就和品德。据俄国社会主义者阿·米·沃登回忆，当一八九三年四月他到伦敦拜访恩格斯时，在交谈中，“恩格斯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并且询问他（指普列汉诺夫——引者注）的著作计划，认为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美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④恩格斯曾夸奖普列汉诺夫的才能“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⑤。据罗·马·普列汉诺娃回忆，恩格斯还对查苏里奇说过：“我知道只有两个人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⑥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4页。

③④⑤ 阿·沃坚：《和恩格斯的谈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81页。

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俄国同时代人》，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118页。转引自恰根·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47页。

普列汉诺夫自从一八八〇年侨居国外以后，逐渐认识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一八五七——一九三三年），还认识了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以及让·饶勒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亚历山大·埃蒂耶纳·米勒兰（一八五九——一九四三年）、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菲力蒲·屠拉梯（一八五七——一九三二年）、比利时工党领导人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一八六六——一九三八年）等。普列汉诺夫长期保持着与瑞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普列汉诺夫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交往，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参加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及各种群众会议，同各国党的领导人保持通讯联系，在欧洲各国党的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他通过这些方式，与欧洲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斗争问题的看法，交流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结果，增强了俄国无产阶级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九年参加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以前，结识的欧洲各国党的领导人还不算多。普列汉诺夫全家从一八八〇年十一月至一八八一年八月住在巴黎。普列汉诺夫于一八八〇年的除夕首次同茹尔·盖得见面。盖得这天来到普列汉诺夫家里，为的是感谢普列汉诺夫的夫人罗莎丽亚·马尔科夫娜不久前为他的妻子治好了病。盖得和普列汉诺夫边喝茶边交谈，探讨了工人运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展望了俄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前景。从此，普列汉诺夫和盖得在第二国际一些代表大会上尽力互相支持，虽然有时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俩一直保

持着亲密的革命友谊。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捷依奇于一九二二年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回忆说：“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在肩负的任务、个人气质，甚至在物质条件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因此毫不奇怪，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两位很亲密和杰出的人物毕生亲近友好。格·瓦在逝世前不久极其热情地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刚开始活动时就遇见盖得的情景。”^①

普列汉诺夫在巴黎侨居的这一年，还认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及《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福尔马尔和其他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听过福尔马尔给侨居在巴黎的德国工人作的报告。一八七八年德国政府颁布了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迫侨居法国和瑞士。普列汉诺夫正是从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开始熟悉德国工人运动。

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还同侨居在瑞士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人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他们在瑞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普列汉诺夫曾经给他们讲解过政治经济学。这群大学生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书房里长年挂着这些保加利亚大学生的照片。

普列汉诺夫自一八八九年在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之后，很快被欧洲各国党的领导人所认识。普列汉诺夫同欧洲各国党的许多活动家，甚至同亚洲、美洲的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都广泛建立了联系，以便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和斗争经验。波兰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于一八八九年从华沙流亡到瑞士的苏黎世，进苏黎世大学学习。她在到达苏黎世的第三年，也就是一八九一年，这位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在苏黎世认识了普列汉诺夫。当时团结在卢森堡周围的一些革命青年组成了苏黎世小组，他们贪婪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普列汉诺

^① 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俄文版，第118页。

夫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支持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反对俄国的民粹派。卢森堡很尊敬比她大十四岁的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普列汉诺夫。后来她每逢来日内瓦时，都要到普列汉诺夫家里来。普列汉诺夫的言行和神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九年出席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是他的几篇批判民粹主义的优秀哲学著作发表以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约请他写稿，或者请求允许翻译他的著作。对此，他总是热情许诺，从不拒绝，无论是发行量很大的法国报纸《社会主义者》，还是刚刚创刊的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他把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刊物写稿，看作是自己的革命职责和国际主义义务。

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〇年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再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则和策略》。考茨基自一八八三年起担任《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九十年代以后他们经常约普列汉诺夫写稿。普列汉诺夫为了自己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同考茨基常有书信来往。一八九一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第十年卷第一册第七、八、九期上，就连载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组题为《黑格尔逝世六十年》的文章。

普列汉诺夫有些著作第一次是以外文写作并出版问世的，例如，一八九四年用法文写成、随即由伯恩施坦译为德文第一次在柏林出版了他写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八九六年一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城的狄茨出版社又以德文出版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这部著作曾是他自一八九二年六月起，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分析和研究法国唯物主义者大量作品的基础上，用法文写成的。

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用俄文写作和出版的著

作，有的被译成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匈牙利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出版，在欧洲广泛传播。这对于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有益的作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列汉诺夫除了同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并为社会主义报刊撰写文稿外，还十分注意引导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加强互相支持。为此他作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例如，在一八九六年春天，彼得堡、莫斯科和明斯克的工人们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五周年而募集了一部分钱，打算买花圈敬献给埋在拉雪兹墓地的巴黎公社烈士。彼得堡工人把一百卢布的款寄给了普列汉诺夫，请他转寄给保·拉法格供购买花圈之用。普列汉诺夫接到这笔钱后，立即转寄给拉法格，拜托他代办此事。花圈虽小，凝结着俄、法两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友谊。

又如，在一八九六年五月至六月，由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在首都爆发了三万织布、纺纱和机械工厂工人的大罢工。普列汉诺夫为了使这次罢工获得胜利，而先后给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信，积极寻求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的援助。

一八九四年八月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一起来到英国伦敦，普列汉诺夫是被法国政府驱逐不得不移居伦敦的。查苏利奇在英国发动募集捐款，以支援俄国的罢工工人。英、德、法等国工人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了俄国彼得堡工人的罢工。

第二节

参加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活动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着横广方面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相继建立，工会组织遍布于欧洲、美洲和

大洋洲，各国工人运动中成长起一批才能卓著、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各国工人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纷纷要求成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以便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经过恩格斯和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积极筹备，于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新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个组织后来通称第二国际，追认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先后共召开过九次代表大会，即：一八八九年巴黎代表大会，一八九一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八九三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一八九六年伦敦代表大会，一九〇〇年巴黎代表大会，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一九一〇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九一二年巴塞尔代表大会。

普列汉诺夫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属于参加过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活动的极少数活动家之一，又是一九〇〇年巴黎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第二国际的常设机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我们在这里先叙述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活动，有关他参加第二国际后五次代表大会和国际执行局的活动情况，我们将按历史顺序分别在以下有关章节加以评介。

正当恩格斯和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拉法格、盖得、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积极筹备建立第二国际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于一八八九年三月，因被诬告为无政府主义者，竟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被迫迁居到离瑞士较近的法国边境村庄莫纳克斯。经过交涉，他的妻子仍被允许住在日内瓦。普列汉诺夫在法国这个小村庄一直住到一八九四年七月，达五年之久。普列汉诺夫自一八八七年得了肺结核病，长期不愈。妻子怀孕已接近分娩。这时他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没钱支付房租，

甚至连牛奶也买不起。普列汉诺夫刚到莫纳克斯村不久，就给住在瑞士苏黎世的巴·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让他寄钱给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一八八九年五月，马尔科芙娜生了个女儿，名叫玛丽娅。母女俩都生了病，身体孱弱。尽管家庭困难重重，但普列汉诺夫听到筹备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消息，还是精神振奋，决定要参与其事。为了筹备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二月二十八日在海牙先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国际代表会议，有德、瑞（士）、比、荷、法五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会上决定于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每一个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都有权派一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将讨论国际劳动立法、对工厂和作坊实行监督等问题。为了号召各国工人积极选派代表、加强国际联系，“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会上还决定向欧、美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发布有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签字的倡议书。结果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字的有欧洲十六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八十个负责人，代表俄国社会主义组织在上面签字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斯捷普尼亚克。恩格斯收到这个倡议书后曾亲自把它译为德文并协助在报刊上发表。所以普列汉诺夫理应属于第二国际倡始人之一。

决定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之后，普列汉诺夫还要进一步为争取得到作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的委托书而努力。按照规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必须要有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的工人组织的委托书，否则即使参加大会，也没有表决权。为此普列汉诺夫就想到，让查苏利奇以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名义给他签发一张委托书。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拿着查苏利奇签发的委托书，作为正式代表一起去巴黎参加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

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攻克巴士底监狱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

开幕了。二十二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恩格斯因为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未能莅临。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等都出席了会议。

俄国代表团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包括拉甫罗夫在内的四个民意党人，共六个人组成。普列汉诺夫和拉甫罗夫几年没见面了，虽然理论上他们是论敌，但想到他们最初的友谊，能重新见面，也颇为高兴。

拉甫罗夫在代表大会上先发表了演说，赞扬了俄国民粹派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也报名要发言。他考虑应该批驳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让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好地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但他又想到，“劳动解放社”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刚成立，在欧洲还不十分出名。虽然恩格斯、盖得、拉法格认识他，而更多的人连他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因此在这些闻名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面前发表演说，的确有几分胆怯。阿克雪里罗得鼓励他走上讲台。

普列汉诺夫时年三十三岁，风华正茂，是一个眉宇轩昂的英俊青年，他终于鼓起勇气，沉着地登上讲台，以简短有力的演说，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阐述得一清二楚。他首先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并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光明前景。他说：“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革命的俄罗斯不仅不应该站在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①他谴责“俄国沙皇是戴上皇冠的宪兵”，明确地指出：“俄国专制制度的崩溃等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全欧洲的胜利”^②。

^{①②}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1—12页。

他批驳了民粹派作家把俄国描写成象中国那样在经济结构上与西方国家毫无共同之处的论调，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工厂大工业已成长起来，由于农民公社的瓦解而形成的无产阶级，将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最后，他为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他说：“我国革命思想家的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反对沙皇个人，但对战胜沙皇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就显得非常微弱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应该掌握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工人中加以传播，利用工人的力量攻克专制堡垒。俄国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出路。”^①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这一段话，后来被称为著名的“普列汉诺夫公式”^②。当普列汉诺夫演说时，大家聚精会神聆听，他的演说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喝采与赞扬。在休息厅里，不少代表围住他打听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但是却引起民意党人的不满。恩格斯根据刊登在德文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的会议记录，了解到普列汉诺夫的演说内容。后来俄国侨民阿·米·沃坚于一八九三年访问恩格斯时，曾向他提起民意党人如何仇视普列汉诺夫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普列汉诺夫对吉荷米洛夫的观察。恩格斯说他和许多同志都很喜欢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演说，但是他认为普列汉诺夫“把吉荷米洛夫和民意党人，即使是和格·洛帕廷混为一谈也是不应该的”^③。恩格斯的看法是对的。象吉荷米洛夫这样的民意党人已堕落为君主派分子，而多数民意党人还坚持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象格·洛帕廷（一八四五——一九一八年），在一八七〇年时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一八

① 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1—12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82页。

③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82页。

八七年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苦役。看来普列汉诺夫当时对民意党人还不善于区别对待，争取分化。

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成立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取得斗争胜利的大会。大会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为纪念美国工人阶级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的罢工斗争，而第一次把“五月一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中写道：“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八小时以内，并实现巴黎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议。”^①这个决议成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锐利武器。

会后，普列汉诺夫从巴黎来到法国边境的小村庄莫纳克斯，住在这里继续写作。“劳动解放社”从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二年出版了四期文学、政治评论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在该刊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八九〇年‘五一’节》一文，真实地报导了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盛况以及各国统治阶级所受到的震动。五月四日星期天，伦敦海德公园人山人海，工人们簇拥在这里举行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盛大游行，很难说参加者有多少，有人估计二十万人，有人甚至估计有五十万人。普列汉诺夫热情洋溢地写道：“这些社会主义新兵，队列整齐，持着旗，奏着乐，进入海德公园，他们必将给整个英国工人运动带来全新的面貌。”^②他在文中还深刻揭露了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一致行动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9—10页。

② 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2—304页。

面前何等胆怯、惊慌，同时又竭力施加恐吓和威胁。没有一种武器不拿来使用：步兵、骑兵、炮兵都一概参加保卫“秩序”。但是这一切完全是妄费心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团结战斗的节日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在传播五一节思想和鼓舞工人阶级奋起斗争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一八九一年八月第二国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弃权，不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向大会提出了一份近万言的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书面报告并申述了不参加大会的原因。这个报告阐明了俄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指出：“这种专制制度把过去西方专制制度的最黑暗的方面同东方专制制度的一切恐怖手段结合为一体了。”^① 报告批判了民粹派的“巴枯宁主义的偏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策略，其中写道：“‘民意党’由于几乎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征集党员，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人数众多的大党。它的力量足以进行光辉的小规模战斗，但要进行决战的话，就显得不够了。”“我国这个党的名称同我国所谓恐怖斗争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恐怖斗争就是谋杀包括沙皇本人在内的沙皇制度的官方代表。”“这个斗争方法不是‘民意党’发明的，但是，它被这个党最顽强而有效地加以应用了。”^②

他们在报告中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推翻沙皇制度并使我国能够加入文明民族大家庭的革命力量。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俄国今后的整个发展都将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③ 报告论述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理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论的关系，指出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才能取得胜利。报告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只是‘无产阶级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哪里没有无产阶级，哪里社会主义就没有根基。”^① 报告又指明：“在俄国以及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够蓬勃发展起来。”^② 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向大会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总的说来，是一个革命的文件，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报告贬低了农民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报告错误地说：“整个旧时代的俄国农民是同欧洲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们的愚昧无知是沙皇专制制度最好的基础。”^③ 这个报告虽然正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从来没有积极地同政府进行斗争，他们从来不敢越出‘和平的’和‘合法的’反对派的狭隘界限”^④；但却又认为：“自由派，这个反对我国现制度的派别，显然是我国的进步力量。”^⑤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出于偏激，有时不加区别地贬低了民意党人，但是表现在这个报告中却是夸大了民意党在反对沙皇政府斗争中的革命作用。报告写道：“‘民意党’对俄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意党’的努力下，反对政府的斗争以空前未有的声势开展起来。”^⑥ 这是对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每况愈下的状况作了过高的估计。

报告说明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拒不参加这次国际社会主义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④ 同上书，第28—29页。

⑤ 同上书，第28页。

⑥ 同上书，第27页。

者代表大会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在俄国工人中的影响和力量还不够大。“我们向自己提出了使工人协会布满全俄国的任务。不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会议。在此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代表权都是有名无实的。”“而我们不愿意徒负虚名。”“我们深信，不久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缺席了。很可能在下届国际代表大会上你们会看见俄国工人的真正代表。”^①看来这时普列汉诺夫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

一八九一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正值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一八七九年在一八八二年德、奥、意三国组成军事同盟，俄、法两国于一八九三年缔结了结成伙伴的军事协定，军国主义迅速膨胀，战争危险与时俱增。普列汉诺夫为波兰代表团草拟了声明。这个声明指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防止战争的爆发。”“一个强大到足以防止战争的政党，同时也就能够进行革命。”^②普列汉诺夫起草的这个声明，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声明公开提出：“如果沙皇制度有好战的表现，我们波兰人就决心不惜牺牲一切来使沙皇制度丧失活动能力，可是，我们不是用罢工而是要用更有效的手段做到这一点。”^③就是要爆发革命的意思。

一八九三年八月六日至十二日第二国际在瑞士的苏黎世城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彼得堡小组和设在纽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出席了这次大会。俄国只有普列汉诺夫一人是正式代表，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作为来宾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被选入战争问题委员会，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艾威林一起，在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35页。

②③ 同上书，第21页。

上，坚决反对荷兰代表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纽文胡斯提出了一旦战争爆发，立刻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拒绝服兵役”的决议案。普列汉诺夫就大会争论的战争问题，代表战争问题委员会作了题为《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的报告。他的这个报告论理充分，感情激昂。他指责纽文胡斯的提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反动的空想”。他说：“当我们还不够强大，当军队还不属于我们的时候，按照荷兰代表建议的精神制定的任何决议都是空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普列汉诺夫举例说，如果德国和俄国发生战争，因工人运动和文化发展水平截然不同，其后果是俄国军队征服中欧，“我们看到的将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哥萨克鞭子的胜利。因此，荷兰代表的建议已不是一般的空想，而是反动的空想，这种空想如果付诸实现，那对自由事业是极为有害的。”^①后来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追忆了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战争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情况。他写道：

“曾经积极参加过这届代表大会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多美拉·纽文胡斯建议：如果发生战争，社会主义者都要力求在各自的国家中号召进行军事罢工。当时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坚决起来反对他的建议。作为战争问题委员会报告人的本文笔者在反驳纽文胡斯时这样说过：

‘试设想两个交战国家。其中一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某种原因处在社会主义者的强有力的影响下，于是响应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并且实现军事罢工的思想。’

‘在另一个国家里，人民群众却冷淡地对待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并且否定罢工的思想。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社会主义者对人民有强大影响的国家，在同群众不会跟着社会主义者走的那个国家进行斗争时，会变得没有防御能力。这将是军国主义的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38页。

胜利。既然国际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军国主义，所以他们一定要无条件地否决多美拉·纽文胡斯的建议。’这项建议也真的被苏黎世大会否决了”^①。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已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者，他回顾这次发言的目的，在于攻击布尔什维克，为其主张“保卫祖国”的反动立场辩护。但他所回忆的发言内容，同保存下来的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相对照，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可帮助我们理解他在这次发言中所持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代表战争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的提案，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革命的理论，强调必须以革命观点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去对待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在报告中把沙皇俄国痛斥为国际反动派的战争的策源地，他希望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人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主张埋葬沙皇制度。他说：“很早以前就已经到了结束俄国沙皇制度，即结束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结束对欧洲和平和文化进步的经常威胁的时候了。我们的德国朋友越起劲地抨击沙皇制度，我们越应该加倍感谢。好！我的朋友们，请您们狠狠地打击它，经常地尽可能地把它放在被告席位上，利用您们的一切手段向它开战！至于说到俄国人民，那末他们知道，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希望他们获得自由。”^②他还谴责了法国政府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纵容侵略的政策。他在报告中号召说：“各国的国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意图；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巩固各国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应当坚决摧毁把人类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并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随着阶级统治的瓦解，战争也就会消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274—27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164页。

灭。资本主义的崩溃就意味着世界和平”。“议会中工人政党的代表有责任否决军事拨款。”^①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回忆起他这次发言时说：“而且我的这篇发言不仅得到上述国际社会民主党著名代表们的衷心支持，而且还得到当时来到苏黎世的、众所周知的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弗·恩格斯的衷心支持。”^②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说这些话，是企图以此掩盖他在一九一七年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但他说他的发言当时受到了欢迎，确属事实。

代表大会就普列汉诺夫的报告，通过了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提出的德国代表团的提案。这个提案基本上是正确的，重申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战争根源，世界上才会消灭战争，实现和平。但这个提案未提出具体的反对战争的革命纲领，简单地否定了群众性政治罢工这一重要斗争方法，这些是提案的不足之处。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恩格斯逝世。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俄国国内真正有组织的工人选派了八个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委托普列汉诺夫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并且为他提供了旅差费。他的夫人马尔科芙娜以及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分别代表国内各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还有一个叫做拉帕泡特的青年大学生，被瑞士伯尔尼的俄国“革命者社会主义联盟”推举为代表，也要作为俄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代表大会。遭到普列汉诺夫严词拒绝。在大会审查代表委托书时，普列汉诺夫指出：拉帕泡特的委托“来自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4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8页。

伯尔尼的五个年轻的空想主义学生”，这些人实际上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极少数人，不能代表俄国广大工人的组织。他说：“这里的代表应该代表真正的组织，而这位拉帕泡特先生则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他的代表资格会成为极其危险的先例。在将来的代表大会上，只要有几个青年绅士就可以宣布为代表，那时这样几个青年学生就能够轻易得票超过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代表”^①，这将是多么危险的情景。普列汉诺夫呼吁大会支持俄国代表团的决定。拉帕泡特在会上还进行申辩，硬说他所代表的小组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而且与国内的社会主义工人小组有联系。他还联络了八个人联名写信给大会，表明他们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联盟”已存在几年，与国内工人小组不断保持联系，并且证明“拉帕泡特博士是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确能代表本组”^②。普列汉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并不妄想接近任何在校的大学生。我们认为正是在校的大学生甚至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没有理由代表俄国工人阶级讲话。为了公正地对待工人阶级，公正地对待那些从俄国而不是从瑞士的几个学生中获得委托书的代表，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强迫我们代表团接受一个我们有义务加以拒绝的人。”^③他的声明被大会高声赞同和热烈鼓掌所通过。从此，民粹派的代表最终被拒之于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门外，应该说这也是普列汉诺夫坚持斗争的战果之一。

这次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等八项议题。继续反对无政府主义，仍是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他和波特列索夫起草了关于俄国工人运动成就的报告，叙述了俄国地下社会

①②③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记录》，见《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伦敦二十世纪出版有限公司英文版（出版年代不详），第15—16页。

民主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而把民粹派作为旧时代的残留加以抛弃。这个报告以英文和德文刊印并在代表中散发。大会通过了《向俄国无产阶级致敬》的决议，决议写道：“大会认为有必要指出俄国工人组织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这个极其重要和前所未有的事实。大会祝贺俄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走向独立生活，并代表所有战斗着的各国祝俄国兄弟们在他们反对政治和经济暴力的艰苦斗争中更加刚毅勇敢，坚定不屈。大会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反对作为欧洲反动势力最后支柱之一的沙皇政权的最好保证。”^①

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见到了查苏利奇，她向普列汉诺夫介绍了恩格斯逝世前几个月的生活情况。那时她经常到恩格斯家里去，常常为恩格斯得的不治之症——喉头癌而流泪。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恩格斯病逝，她感到无比悲恸！她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参加了八月十日在伦敦举行的恩格斯的葬礼，并在恩格斯的灵柩前敬献了花圈。追述往事，她不免忧伤难抑，余痛未消。普列汉诺夫听后也是哀思盈怀，感慨万千，深切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开会期间，普列汉诺夫还多次会见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通过上述可看出，普列汉诺夫同欧洲各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在第二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无政府主义者，作了坚决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促进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推动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他同其他各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滋长警惕不够，斗争不力。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64页。

第三节

同第二国际前期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第二国际的成立，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工人群众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组织和领导各国工人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讲坛，依靠工会组织，进行了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合法斗争。通过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积蓄了革命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扩大了，影响加强了。在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两股思潮：一股思潮是以各国党内的“议会迷”和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为代表，他们陶醉于议会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迷恋合法斗争的成果，主张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只要走“和平改良”与议会斗争的道路，工人就能获得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另一股思潮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反对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对组织合法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味追求毫无组织的罢工，煽动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在这个时期，以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为标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未到来，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立刻同各国资产阶级决战，而是要通过组织合法斗争，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为未来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因此，尽管不能忽视崇拜议会斗争与合法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但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无政府主义。恩格斯在晚年，在注意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用主要精力从事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在第二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的

主要矛头对准了无政府主义。

在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于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就同意大利、法国等工会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大会讨论的两个中心议题：即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和国际劳工立法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声称劳工立法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花招，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劳工立法的决议中指出：“在所有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里，都极其需要旨在保护劳工利益的强有力的立法。”^①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中指明，“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②，还必须开展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

在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无政府主义者不甘心他们在大会遭到的失败，除继续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和竭力阻止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以外，在一八九一年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猖狂反扑。威·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号召各国工人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企图与沙文主义立场，以社会主义的胜利来反对军国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者、荷兰代表多美拉·纽文胡斯疯狂反对威·李卜克内西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案，并提出了一旦爆发战争，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的决议草案。威·李卜克内西指出，反战总罢工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经过激烈的斗争，代表大会拒绝了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的决议案，通过了威·李卜克内西拟定的正确的决议^③。这次大会再一次挫败无政府主义的进攻。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5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参见上书，第20页。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大肆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刺杀个别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往议会和公共场所投掷炸弹，似乎想以这种行为表明他们也赞成政治斗争。个人恐怖主义的活动是同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政治斗争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上决定：只有承认必须建立工人政党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人的政党和团体，才有资格参加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不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但是在一八九三年八月第二国际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时，无政府主义者仍坚持要参加大会，他们认为他们搞个人谋杀也是“政治活动”。为此，倍倍尔对“政治活动”作了解释，相应地对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条件作了修改。通过的决议指出：“‘政治活动’一语的意思，就是说工人政党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取得政权而行使或争取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器。”^①根据这一决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无理要求。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被赶出大会，但打着反议会主义斗争旗号的暗藏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留在大会，纽文胡斯就是一个。如前所述，普列汉诺夫在战争问题上，批判了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经过尖锐斗争，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的决议案，通过了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代表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正确的决议案，打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但是在会下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活动频繁。法国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分子奥古斯特·瓦扬（一八六二——一八九四年）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九日向法国议会厅投掷炸弹，被判处死刑。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让·格拉弗（一八五四——一九三九年）在一八九三年出版了重要理论著作《垂死的社会和无政府状态》。他因这本书而被法国政府以煽动民众作乱的罪名逮捕入狱，书被销毁。法国政府的严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40页。

厉镇压，却抬高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价，有些人以尊敬的口气谈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格拉弗的这本书被说成是内容深刻的社会哲学著作。有些人还说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家人，由于内部争执而分裂。普列汉诺夫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专著，从根本上阐明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系统清算无政府主义，划清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以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革命的本质，澄清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糊涂认识。

普列汉诺夫写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专著时，生活上的不幸事件正接连向他袭来，他的五岁的女儿玛丽娅，于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得脑膜炎死去。法国政府扬言要把他驱逐出境。正在这时，一八九四年二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的《前进报》图书出版社约他撰写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他抑制悲痛，抓紧写作，利用在法国的几个月时间，很快以法文写成了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爱·伯恩施坦立即把它译成德文，于一八九四年六——七月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上，接着出版了德文单行本。很快它又被译成意大利文。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还把它译成英文。后来法国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报纸《青年社会党人报》发表了法文原稿，并于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印成了法文单行本。这篇著作还用欧洲其他种文字刊印过。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很重视这部著作，曾热心帮助它出版。这部内容丰富、文风泼辣的著作，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读这部著作时，说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文风，就想起他父亲的文风。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写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专门在第六章写了一节“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正确地评价了普列汉诺夫这本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著作。

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小册子，共分五章。前三章占全书的近四分之三的篇幅，用来分析和考察了德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麦克斯·施蒂纳（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年）、法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比·约·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俄国无政府主义始祖米·亚·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及其信徒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论述了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普列汉诺夫首先考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渊源。克鲁泡特金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在法国里昂刑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无政府理论的始祖是不朽的蒲鲁东，他在一八四八年第一次叙述了这个理论。”^①普列汉诺夫认为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不准确。他指出：蒲鲁东虽然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或者关于权利原则和政府原则之研究》一书中，第一次谈到无政府主义理论，但此书涉及到这个理论的不多，后来蒲鲁东在一八四八年才系统地论述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而在此以前，施蒂纳早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唯一者及其财产》中，已阐明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普列汉诺夫认为施蒂纳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他把“我”当作世界的本质，当作观察事物的出发点。他把“我”看得高于一切，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得服从“我”。他认为一切国家“都是专制的国家”，都使“我”变成了奴隶，失去了自由。他提出“我”、“唯一者”、“利己主义者”应当起来反对限制我的绝对自由的一切人。他公开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乞求富人和有产阶级来“解放”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页。

穷人，他主张穷人起来造反，从有产者和富人手中把财产夺过来。“施蒂纳就用这种道理宣扬阶级斗争”^①。

但是施蒂纳又大肆攻击共产主义。他说：“按照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公社应该是财产所有者。恰恰相反：‘我’才是财产所有者，也只有我才会就自己的财产同其他的人达成协议。如果公社的作法我认为不公平，我就会起来反对它和保卫自己的财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施蒂纳看来，“一旦共产主义消灭了个人的财产，就会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纯粹的‘乞丐’”^②。所以施蒂纳主张组织独立的“利己主义者联盟”，作为公共生活的最好形式。

普列汉诺夫对施蒂纳的世界观作了个总结：“‘我是我’——这是他的出发点。非我不等于我——这是他的结论。我+我+我+等等——这是他的社会乌托邦。这是用来进行社会和政治批判的简单而又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唯心主义思辨的自杀。”^③

普列汉诺夫指出，施蒂纳已把个人主义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蒲鲁东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加以系统论述。他认为施蒂纳的理论奠定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蒂纳有权享受无政府主义之父的桂冠，“他是最英勇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④。

普列汉诺夫接着从分析蒲鲁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发表的主要理论著作入手，阐述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普列汉诺夫认为蒲鲁东在哲学思想上效法康德。康德对上帝是什么和最好的宗教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不给予正面回答，而去阐述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4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37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④ 同上书，第38页。

上帝观念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蒲鲁东遇到政府的权力是什么和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两个问题时，也照样先不做正面回答，而首先去考察政府的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来源。他经过一番考察，得出结论说：“人类之外没有上帝，因此神学观点没有任何意义。同样，自由之外没有政府，因此政治观点没有任何意义。”^①普列汉诺夫认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是从他这种哲学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普列汉诺夫着重分析了蒲鲁东的经济理论。他指出，蒲鲁东并不想消灭私有制，也不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幻想用“社会契约”把分散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尽管生产资料私有，但可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从而根除了在交换领域产生的剥削。他想通过“社会契约”来解决个人的“绝对自由”与应负担的一定义务之间的矛盾，以维持社会秩序。普列汉诺夫批判了蒲鲁东维护小私有制的这种反动幻想。他说：“小私有财产和作为其经济基础的小生产是蒲鲁东一贯的梦想。现代的大型机械厂始终使他感到深刻的厌恶。”^②

普列汉诺夫指出，蒲鲁东在政治观点上，主张消灭国家，代之以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他写道：蒲鲁东“把自己从‘国家’那里夺来的东西交给‘各个公社’和‘各省’。代替一个大国家的是许多小国家；……于是无政府变成为‘联邦制’”^③。普列汉诺夫追溯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的理论来源。他写道：“有趣的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者’并不是别的什么人，恰恰是圣西门。这个圣西门说过，社会组织的目的是生产，所以，政治科学应当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管理人’的艺术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

应当让位于“管理物”的艺术。他把人类比拟为个人，个人在童年时服从自己的父母，成年以后就只听自己的话了。蒲鲁东接受了这个思想和这个比拟，并利用价值构成‘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理论。”^①

普列汉诺夫指明，蒲鲁东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反对工人建立工会，摒弃罢工，诬蔑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蒲鲁东宣称，“从今以后，不要政党，不要权力，而要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请看，我们的全部政治信条和社会信条就包括在这区区几个字中。”^②在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蒲鲁东就竭力煽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调和，他于同年四月三日向法国杜省的选民发表了一篇文告。他在文告中写道：“工人们，向自己的主人伸出手吧，而你们，企业老板们，不要推开向你们迎面走过来的你们的雇佣工人”^③。

普列汉诺夫揭露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矛盾：一般说来蒲鲁东反对国家，但又主张建立联邦制，总的看来，蒲鲁东摒弃政治斗争，但又鼓吹通过选举实现等价交换的“互惠制度”。普列汉诺夫说：“总之，当问题说到阶级斗争时，就‘不再要政党！不要政治！’而……当问题涉及实现蒲鲁东的平淡无味和空洞无物的乌托邦时，就‘政治万岁，竞选宣传万岁，国家干涉万岁！’”^④

普列汉诺夫认为蒲鲁东的观点充分表明了他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始祖的本质，“蒲鲁东正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的代表人物。”^⑤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对国际工人运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55—56页。

②⑤ 同上书，第46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55页。

动的恶劣影响。他写道：“有个时期蒲鲁东派的个人主义在拉丁语区诸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斯拉夫语区诸国（特别是在俄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发展的历史就是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的现代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历史。”^①

普列汉诺夫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在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破产后于六十年代末出现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变种——巴枯宁主义。普列汉诺夫把巴枯宁主义与施蒂纳、蒲鲁东的观点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施蒂纳依据‘我’的原则，蒲鲁东依据‘契约’的原则。读者后来也已看到，这两个‘创始者’——蒲鲁东和施蒂纳——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②普列汉诺夫指出巴枯宁同蒲鲁东一样，以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国家和共产主义，主张消灭国家，反对政治斗争。巴枯宁和蒲鲁东一样不理解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巴枯宁写道：“我敌视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自由，而我不能设想任何人类的事业可以离开自由。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全部社会力量集中在消耗这些力量的国家手中，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中，而我却希望废除国家，希望彻底铲除权威原则和国家监督原则，因为这种原则借口人民的开化和完善一直在奴役他们，压迫他们，剥削他们，并且使他们的道德败坏。”^③巴枯宁认为工人没有闲暇时间，缺乏物质条件，因此不可能利用政治自由进行活动。他认为，参加议会斗争会腐蚀工人议员，参加争取和扩大政治自由为目的的运动，只会为资产阶级帮忙，起不了别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指明，巴枯宁与蒲鲁东不同的是：其一、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扩大，巴枯宁开始把关于共产主义思想体

^{①②}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57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58—59页。

系中的集体主义观点与个人的“绝对自由”理论硬捏合在一起。他在道德观念上鼓吹“团结一致的原则”，在经济原则方面，“力求通过自由的结合从下而上地，而不是在任何政权的帮助下从上而下地组织社会和集体的或社会的所有制。”^①其二、巴枯宁主张废除个人财产权。他说：“我要求废除国家，因此我要求取消个人的财产权，因为它不过是一种国家制度而已，不过是国家原则本身的一个产物而已。”^②他认为，国家创造资本，国家产生了阶级和贫困，由国家规定的私有财产继承权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剥削与不平等的根源，工人要获得经济解放，就必须废除继承权，以此作为社会改革的出发点，只有消灭国家，工人阶级才能争得经济解放。其三、巴枯宁在一八六八年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同盟”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以盟员资格，要求把“各个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观点，列入同盟的章程之中。其四、巴枯宁鼓吹流氓无产者和农民要不顾主客观条件举行暴动，来废除国家。他认为工人和农民举行暴动和起义，即使遭到镇压，对他们革命精神的发扬也会产生良好影响。普列汉诺夫认为：巴枯宁的这些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谬论”^③。

普列汉诺夫认为具有折中主义特点的巴枯宁主义是对施蒂纳、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指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彻底个人主义的。巴枯宁‘不愿意’要个人主义，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他只‘愿意’要个人主义的一个方面。因此他就发明了无政府主义的集体主义。”^④普列汉诺夫认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比其前辈更腐朽、更反动、危害更大。他明确指出：“巴枯宁——这是空想主义的颓废派。”^⑤

普列汉诺夫还分析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演变过程，指出无政

①②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59页。

③④⑤ 同上书，第72页。

府主义自巴枯宁主义产生后，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外，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开始宣扬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一派在巴枯宁之后的理论代表就是俄国流亡者彼·阿·克鲁泡特金，以及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让·格拉弗、埃·邵可侣、埃蒂凡等。普列汉诺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巴枯宁的“徒子徒孙们”。他主要分析批判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克鲁泡特金硬把无政府主义观点与共产主义捏合在一起，声称他的理论既同空想主义根本不同，也同依靠自然权利、国家义务之类的形而上学观念有原则区别。普列汉诺夫通过分析，指出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绝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急进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本质上仍没有超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范畴。他说：“在我们看来，不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观念掌握了多么丰富的人类知识，它丝毫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它把自己的知识暗暗地藏起来，而让贫乏的‘同伴们’继续处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中。克鲁泡特金可以尽量地向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高唱赞歌，但他绝对不能证明他的朋友格拉弗能够超过毫无价值的形而上学的水平，即使超过一点点也好。”^①他在分析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观点时，又指出：“人所尽知的‘十九世纪的倾向’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个主要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使无限的个人自由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需要符合起来。既然这一种‘倾向’构成我国这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全部科学装备，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他之向科学求援不过是一句简单的空话罢了；不管他怎么鄙视空想主义者，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无远见的空想主义者，一个对‘最好的理想’的平凡的猎逐者。”^②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85页。

总之，普列汉诺夫在这本小册子中，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露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观点，并对他们之间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从而挖了无政府主义的老根，从根基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所说，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中的这一部份，“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①。这部份为我们研究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小册子的另一部份中，用后两章，即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普列汉诺夫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②他指出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无政府主义已成为阻碍和破坏工人运动发展的策略。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反对暴力行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只主张进行以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为目标的经济斗争，后来又对自己的策略作了补充：组织工人骚动，烧毁财产证书和国家文件。骚动屡遭失败，工人难于组织，又使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走向个人恐怖主义道路：捣毁公共建筑物，杀害个别人物，侵犯个人继承的财产等。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希望有‘议会主义’，因为议会主义只会麻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不希望进行任何‘改革’，因为改革表示和富有者阶级同流合污。他希望的是革命——充分的、完全的、直接的，而且有直接经济意义的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装满炸药的瓦罐武装起来，并且把它扔到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

②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89页。

戏院或者咖啡馆的顾客群众中去。他宣布说这就是‘革命’；但我们只觉得这是‘有直接意义的’癡狂病。”^①普列汉诺夫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不会给工人运动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一些无辜的牺牲，给资产阶级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提供了口实。某些个别的无政府主义者暗中充当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间谍。因此他愤怒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宝贵的顶天柱”^②。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实际上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犯有盗窃行为，就充分说明这种道德的腐朽性。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青年迷醉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从幻想、淫逸放荡的生活中，解除苦闷，寻求快乐。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策略与道德的反动实质。他说：“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以革命名义为反革命的事业效劳；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赞扬最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以个人自由的名义蹂躏自己邻人的一切权利。”^③

普列汉诺夫这本小册子，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考察相比较，他对无政府主义策略的论述显得过于简略，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有理有据的批判。列宁非常不满意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他严肃地指出：“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④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谈到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态度，指出了无政府主义主张消灭一切国家，但对此没有作深刻的分析。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

普列汉诺夫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这一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一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极力歪曲和篡改的问题；从实践上看，这一问题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面临急需解决的问题。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①普列汉诺夫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没有指明无产阶级革命对这两种不同性质国家应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用革命暴力把它打碎；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立刻建立和不断巩固这种新型的革命政权。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对待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不同态度的伟大实践。马克思继《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之后，为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又写下光辉的著作《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深刻论述了以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经验。普列汉诺夫写作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马克思的上述著作已出版多年，普列汉诺夫批判无政府主义却闭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这是十分错误的。无政府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一切国家，尤其是反对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要害问题一言不发，这就决定他不能彻底粉碎无政府主义。对此如果坚持不改，那末他以后在国家问题上必然要滑到机会主义观点上去。正如到一九一七年，当普列汉诺夫已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

家问题，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①

但我们应当承认，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深挖了无政府主义的老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是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有助于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在青年时期，曾一度信仰过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当普列汉诺夫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站出来批判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清算无政府主义观点对自己的毒害，这对于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起了推动的作用。因此，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指出其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应当肯定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1页。

第六章

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 理论家

第一节

摧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体系

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时代初期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巨额垄断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和豢养了一小撮工人贵族。工人贵族就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当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各国统治阶级在加强反革命暴力的同时，变换统治手法，大力玩弄“和平欺骗”的一手，为了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限度地扩大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这就为一小撮工人贵族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供了口实。马克思主义自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大多数欧洲国家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已由一个“幽灵”，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这就使

得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公开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改变为钻进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①由于上述原因，修正主义思潮就在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迅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②，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开始歪曲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伯恩施坦在这些著作中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叫嚣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要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人们就把伯恩施坦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冠以伯恩施坦的名字，称之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就成了修正主义的开山始祖。伯恩施坦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出版，标志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诞生。列宁指出，伯恩施坦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②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他的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本人受过中等教育，后任银行职员，于1872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78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在瑞士期间，曾组织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苏黎世三人团；在英国期间，和恩格斯有密切交往，同时经常接触改良主义的费边派分子，深受其影响。从1881—1890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从1890年起，常为《新时代》杂志写稿。

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在伯恩斯坦登台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彼·伯·司徒卢威（一八七〇——一九四四年）、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年）、谢·尼·布尔加柯夫（一八七一——一九四四年），打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这种经过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被沙皇政府允许在合法的报刊上推销，人们把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叫做“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稍晚一些时候，在俄国还出现了一味追求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的经济派。几乎同时，法国社会党人中则出现了以追求资产阶级政府中的高官厚禄为目的、不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内阁主义派。八、九十年代英国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自由派（费边社和独立工党）。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一出现，上述各国的机会主义流派，都麇集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这面旗帜周围，“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②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成了国际现象，象洪水一样，在各国工人政党内部迅速地泛滥起来。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振动。但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立刻认识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威廉·李卜克内西说伯恩斯坦主义是智力的发展过程，是“儿童的愚蠢”和无害的“哲学邪说”，没有必要化费时间去批判它。拉法格认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理智的疲劳过度”的结果。梅林说：“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来未能站稳脚跟，它对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4页注①。

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由于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①。当时作为《新时代》杂志主编的考茨基，起初只允许刊登伯恩施坦贩卖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文，不允许发表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在要不要马上起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也表现得谨小慎微，犹豫不决。从他在1898年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可以看出，他还没有认清伯恩施坦这个修正主义头子的本质和下决心对他宣战。他在信中说：“当然，我并不鄙视伯恩施坦，象我鄙视沃龙佐夫^②那样，他是一个有功绩的同志……而且，我还远没有下定决心要对他进行反击……在这件事情上，我应当极其谨慎和机智。”^③但是，普列汉诺夫同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相比，他还是比较早地、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伯恩施坦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以及开展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这场斗争的重要性。他在1898年五月二十日给考茨基写信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他认为：“这是关系到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学生的普列汉诺夫，绝不允许别人任意歪曲他们的伟大学说，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47页。

② 瓦西里·巴夫洛维奇·沃龙佐夫（1847—1918年），19世纪80—90年代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许多文章中严厉批判了他的谬论。

③ 转引自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第112页。译文有修改。

他坚定地表示：“我的意图是替恩格斯的思想辩护”^①。同一天他在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又说：伯恩施坦文章中的“庸俗议论是那样多，简直使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宣告：“开战了！开战了！唯物主义者万岁！”^②他于一八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又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再次严正指出，伯恩施坦和他的信徒康拉德·施米特^③“这些先生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及他们慢慢孵出来的东西（‘辛苦的劳作’）时不能没有愤怒。”但对于是否马上站出来批判伯恩施坦，他又考虑到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的深厚交情，再三征求考茨基的意见。他在同一封信中又说：“如果您对于允许我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哪怕是有一点点（不愉快）的话，那我就不能这样做。……而且是极尊重您和伯恩施坦之间的深交的。”^④可见，这时他思想上还有所顾虑和畏缩。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考茨基的回信。考茨基表示要想办法刊载他的文章，因为“您有权发表意见”，但他希望普列汉诺夫应主要批判伯恩施坦的经济理论。考茨基的信消除了普列汉诺夫的顾虑。德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呼声，又给普列汉诺夫站出来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以巨大的推动。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的称赞，从反面告诉普列汉诺夫，他再不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退让和投降了。他终于在一八九八年春末夏初，先后在日内瓦和罗马作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讲演，第

① 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450页。译文有修改。

② 同上书，第452页。译文有修改。

③ 康拉德·施米特（1863—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新康德主义者。

④ 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451页。

一次正式对伯恩斯坦主义公开宣战。他说：“现在资产阶级所高兴的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和康拉德·施米特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①所引起的论战。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把这两位作家宣扬为有理性的和勇敢的人，说他们懂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谬妄，而且不踌躇地抛弃它。”^②资产阶级教授们如获至宝地借此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学派遇到了危机。普列汉诺夫深信，“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高兴是过早了。”^③因为伯恩斯坦之流在哲学上是贫乏的、无知的，所以“从哲学的观点看，这种所谓危机是并不危险的。”^④他深信，所谓“马克思学派的危机是很容易根绝的。”^⑤

普列汉诺夫随即根据《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篇讲演提纲的第一部分，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底写成了第一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并于五月三十日把它寄给了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又在回信中要求将文章批判的口气放缓和些。普列汉诺夫于七月二十二日在去信中坚定地答复道：“我的批判不是温和的，但是它不具有私人性质。其实，应该承认，现在我非常不喜欢伯恩斯坦：这是敌人，而如果我爱敌人，那就是基督教的爱”^⑥。考茨基不得不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第十六年卷第十一册第四十四期《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这

① 指伯恩斯坦发表于1898年5月27日《新时代》第16年卷第11册第34期上的文章《社会主义的现实的和思想的因素》和施米特发表于1897年10月17日《前进报》上的文章《康德生平和学说》等。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6页。

③ 同上书，第377页。

④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384页。

⑤ 同上书，第388页。

⑥ 同上书，第267页。

是出现在欧洲社会主义刊物上的第一篇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文。接着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十七年卷第一册第五期《新时代》杂志又发表了普列汉诺夫根据他的《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讲演提纲的第二部分写成的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另一篇论文——《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施米特在一八九六年发表的《一本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书》和一八九七年发表的《康德的生平和学说》两文中所散布的谬论。施米特在同年第十一期《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对普列汉诺夫最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论文的几点意见》，进行反扑。普列汉诺夫为批驳施米特，又写了《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把它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并给考茨基写信表示要坚决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考茨基回信要求他把文章中争论的尖锐词句改得缓和些，普列汉诺夫严词拒绝，表示要“痛骂”“诽谤我们的导师”的伯恩施坦的信徒施米特。普列汉诺夫的这篇论文终于在一八九九年二月《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了。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写了一些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文，这些论文未能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一八九八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斥责伯恩施坦主义的决议，考茨基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却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且使得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普列汉诺夫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于是以致考茨基公开信的形式写了题为《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的文章，发表在一八九八年十月至十一月第二百五十三至二百五十五号《萨克森工人报》上。文中提出：“伯恩施坦一点也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信心”，这是对的，这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说到他使我们思考，“我以为很难这样说。”“为了启发人去思考，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

恩施坦两样都没有作到，所以他不能启发任何人去思考。”^① 一八九九年三月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普列汉诺夫立即针锋相对地写了分析批判文章；但是，不论《新时代》杂志或者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予刊登。一九〇〇年，当伯恩施坦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俄文译本时，他又重写批判文章，仍未能发表。到了一九〇一年在彼得堡以俄文出版了伯恩施坦的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新译本时，普列汉诺夫第三次改写了批判伯恩施坦的前两篇文稿，又新写了一部分，构成一篇新文。此文最后以《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为题，发表在一九〇一年《曙光》杂志第二至三期合刊上。一八九九年二月施米特在《新时代》杂志上又发表了《什么是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立即写了文章《再论唯物主义》予以答复，可是《新时代》杂志编者考茨基竟决定结束争论，而未发表此文。到一九〇六年，这篇文章才第一次在他的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中问世。普列汉诺夫写的一篇篇论文，都是射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阵地的一发发重型炮弹。

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来源于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他说，伯恩施坦之流抓住资产阶级敌人对马克思的理论所作的一些歪曲，“并借助于从这些敌人那里抄袭来的论据，得意地进行自己的‘批评’。”^② 例如伯恩施坦提出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口号，就是抄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一八六四——一九四三年）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的《论社会和平》一书。该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由此就丧失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6页。

② 同上书，第410页。

自己的尖锐性，只被用作论证立法要求的根据。因此，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是被接受或被否决，实质上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一要求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说来固然是必需的，但对于那些把近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说来就不是必需的了”^①。伯恩施坦把舒尔采-格弗尼茨这段话加工简化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②这句修正主义“名言”，最全面最生动地反映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反动实质。普列汉诺夫说：“伯恩施坦把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理’端来给我们，而且还自以为是在把马克思的理论从伟大思想家所业已达到的地方向前‘发展’。这是多么奇怪的妄想！”^③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来源就可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传播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普列汉诺夫深刻地阐明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腐蚀和破坏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中接受修正主义观点的党员越多，党的战斗力就越削弱。他说：“我们的党的力量的削弱是和拥护伯恩施坦的人的增加（虽然是暂时地）成正比例的。”^④他进一步尖锐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是不可调和的，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而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变质的关键问题。他说：“我们必须记住我所引用过的李卜克内西的话：如果伯恩施坦是对的，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的纲领和自己的整个过去都埋葬掉。我们必须坚持这点并向我们的读者们公开解释，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1页。

②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9页。

④ 同上书，第417页。

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①普列汉诺夫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腐蚀无产阶级队伍、解除无产阶级思想武装的反动作用。他指明，伯恩斯坦“鼓吹那种专为安慰资产阶级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一手法在如下的意义上是成功的，就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都清楚地懂得了伯恩斯坦先生所‘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比起旧的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来对他们是何等有利。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把伯恩斯坦先生当作一种救世主来欢迎。”^②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引用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利乌斯·沃尔弗（一八六二——一九三七年）夸奖伯恩斯坦的话，证明伯恩斯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是资产阶级的救世主。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露骨地说：“对于他（指伯恩斯坦——引者注）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③普列汉诺夫揭穿了伯恩斯坦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面目，他把伯恩斯坦称之为：“一个给了社会民主党理论以沉重打击并力图（不管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埋葬这一理论以博得勾结在一起的‘反动邦伙’的欢心的人”^④。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斯坦时，明确指出修正主义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中迅速滋长所造成的危险。他提醒说：“机会主义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得到了很多的拥护者。这种机会主义思想的盛行是现时威胁它的一切危险中的最主要的危险。继续忠于自己政纲的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党人——幸而他们几乎到处还是多数——如果不及时地采取坚决的手段和这一危险作斗争，他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8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413页。

④ 同上书，第418页。

就会做出不可挽救的错误。”^①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号召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起来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作斗争，剥掉伯恩施坦的“假面具”，“重重地斥责”他所贩卖的修正主义理论，保卫马克思主义^②。

普列汉诺夫深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伯恩施坦等篡改马克思主义，首先从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打败修正主义的进攻，也要针锋相对，首先从哲学入手。他说：“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以自己的所谓批评攻击整个的现代社会主义。我们且跟着他们检查一下他们的全部论据，让我们从根本问题，即哲学问题开始。”^③伯恩施坦及其信徒施米特，在哲学上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大肆吹捧新康德主义，肆意抹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攻击唯物主义是“宿命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宣扬庸俗进化论，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否认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以大量篇幅，用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实例，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哲学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之流提出“回到康德”的反动口号，就是要以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使唯物主义‘归宿于’（这是何等的笨拙和幼稚！）唯心主义。”^④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年）尽管是个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然而他还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有“自在之物”。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产生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从右边篡改康德哲学，抛弃了康德承认的“自在之物”，继承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3页。

② 同上书，第377页。

③ 同上书，第132页。

④ 同上书，第432页。

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观点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一八四〇——一九一二年）首先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们按照康德的唯心主义观点，鼓吹“思维就是一切”，认为科学是“纯粹思维”凭空“构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是一堆偶然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伯恩施坦主义者就是新康德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他们翻来覆去只是拣拾新康德主义者的牙慧，以此论证社会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时进一步指出：伯恩施坦的“哲学知识如何少得可惊，他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一般地说，是如何错误”，“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如何欠缺。”^①他还“不惜为反对辩证法而胡说八道，并对它施行最无聊的攻击。”^②普列汉诺夫嘲笑道：“本文的笔者看到伯恩施坦先生和恩格斯一起生活几年而对于他的（因此也是马克思的）哲学还这样不懂，确实是很惊异的。”^③他深刻指出伯恩施坦及其信徒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斗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说：“如果说伯恩施坦先生抛弃唯物主义是为了不要‘威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利益’之一的宗教，那末他抛弃辩证法就是由于他不愿意用‘暴力革命的惨象’来吓坏资产阶级。”^④

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还批判了伯恩施坦及其信徒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谬论。伯恩施坦美化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卡特尔、托拉斯、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将得到很大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不断增多，无产者将逐渐变成有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4页。

② 同上书，第441页。

③ 同上书，第432页。

④ 同上书，第440—441页。

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矛盾逐渐缓和，使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的“适应性”，经济危机会根除。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论”，即“灾变论”是没有根据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这套修正主义经济观点，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例如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早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的《论社会和平》和一八九二年出版的《大生产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二书中就已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使财富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里，而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小积蓄所有者分沾大工业企业的利润，有一个新的中等阶级开始兴起，这就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道路。“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他以前几年所说过的话。”他“反复咀嚼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①普列汉诺夫认为，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核心，就是妄图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伯恩施坦最近几年来一般是在进行反对他所说的革命空谈的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反对‘灾变论’的斗争。他反对这一理论的中心论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发表的许多见解无疑地没有为后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证实。”^②普列汉诺夫考察了德国、英国、比利时和北美洲土地集中的情况，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和有产者人数的减少。”^③这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信不移的真理。普列汉诺夫还以正在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铁一般的事实，驳倒了伯恩施坦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会根本消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日益缓和的谬论。普列汉诺夫指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406页。

③ 同上书，第444页。

出：“生活回答了这一问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文明世界正经历着一个工业总危机，而某些资产阶级的实业家甚至在伯恩斯坦先生写自己的书的时候便已预见到了这次危机的来临。”^①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要想争得解放，必须按《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正确方向去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能大为改善的时候，马克思也认为他们的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他又说：“而要从这一没有希望的状况中拯救出无产阶级，就只有靠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靠社会革命。”^②伯恩斯坦否定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

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还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诬蔑与攻击。伯恩斯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篡改，就是在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提下，炮制出一整套“阶级合作”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诬蔑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③，是“无谓的生存牺牲”。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是政治上的“隔世遗传”（意即封建专制的复活）。他诽谤《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国际共产主义口号，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普列汉诺夫驳斥了伯恩斯坦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攻击。他写道：“伯恩斯坦先生用阶级专政是很低级文化的特征的意见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② 同上书，第449页。

③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为首的一个派别的理论主张。布朗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幻想以少数人的密谋起义去争得革命的胜利。

恐吓革命家是徒劳的。我们今天的伟大的社会问题，即消灭人对人的经济剥削问题，正如以往的伟大的社会问题一样，〈只能用强力来解决。固然，强力还不是暴力的意思，暴力只是强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无产阶级对于表现自己革命强力的形式的选择，不是取决于它的善良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环境。能更可靠和更快地导向对敌人胜利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而假使‘暴力革命’在某一国和在一定情形下竟是最便利的行动方式，那末，谁要是提出在原则上反对它的意见，正如伯恩施坦先生提出的‘低级的文化’、‘政治上的返祖现象’等等那样，谁就是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假如不是叛徒的话。……〉”^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说明了三层意思：第一、以往的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第二、无产阶级争得解放的道路究竟采取何种形式，不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善良意志；第三、伯恩施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攻击暴力革命就是叛徒。普列汉诺夫这段论述十分精彩，既以辩证法的发展观阐明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基本看法，又揭露了伯恩施坦的叛徒面目。普列汉诺夫指明了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指出：“伯恩施坦先生为了不以‘暴力革命的惨象’来‘威胁’资产阶级，就反对辩证法并奋起反对他自己制造的‘灾变论’。”^②

普列汉诺夫还指出了伯恩施坦反对“工人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的反动实质，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说：“为了不‘威胁’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就反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原理，并用‘现实政治学派’的真正‘国家要人’的口气侈谈德国的外交政策”^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② 同上书，第441页。

③ 同上书，第436页。

普列汉诺夫的锐利的批判从理论上摧毁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体系。不仅如此，而且他还要求把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开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十月他在致考茨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我们的党无宁说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们在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辰到来之前离开党的队伍。”“如果伯恩斯坦本人不再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还更快乐些。”^①后来他更明确要求开除伯恩斯坦的党籍。列宁非常称赞普列汉诺夫的这一主张。他在一九二〇年还指出：“请注意，普列汉诺夫还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间就要求开除伯恩斯坦的党籍，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②

普列汉诺夫不仅自己口诛笔伐批判伯恩斯坦主义，而且还写信给第二国际各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写信，请求他们一起向伯恩斯坦主义开战。虽然遭到好些人的拒绝，例如英国的海德门以“忙于本身的事务”为借口不予过问；但是，他向伯恩斯坦主义猛烈开火的实践还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查苏利奇当即从苏黎世来到日内瓦拜访他，表示完全支持。列宁在流放所以极其喜悦的心情阅读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的文章，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满意地一再阅读了《唯物主义史论丛》，读了这位作者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一八九八年——一八九九年《新时代》第五期，以后各期没有见到），……我坚决地站在一元论者这边。”^③一八九九年下半年，他又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赞扬了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他说：“俄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7页、879页，注释439。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页。

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①。列宁后来还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对他在文章中写到农户所占土地平均面积问题时的疏忽，提出修改意见。普列汉诺夫诚恳感谢列宁对他的支持与帮助。他于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给列宁写信说：“非常感谢您对我驳斥伯恩施坦的文章提出的意见。”^②一九〇八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功绩。他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③列宁甚至这样说过：“伯恩施坦主义是被普列汉诺夫摧毁的”^④。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新时代》杂志发表了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施坦的第一篇论文后，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人的热烈欢迎，以至每天都有人向编辑部询问什么时候继续发表他的文章。党的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当即写信支持并鼓励他。普列汉诺夫在接到他们来信后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高兴地说：“倍倍尔因为我的反对施米特的论文而致我以‘热情地握手’，……并且很愿意我继续进行反对他们的论争，……李卜克内西写道：‘继续吧，打击得厉害些，打击得结实些’”^⑤。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发表第一篇批判文章《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之后，德国社会民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②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第68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④ 《列宁文集》，苏联列宁研究院1929年俄文版，第5卷，第87页。

⑤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886页注释179。

主党内杰出的女革命家卢森堡，随即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在《莱比锡人民报》上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为题，发表文章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一八九九年四月增订后进而出版单行本。她同蔡特金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三日至八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党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开始起来批评伯恩施坦的错误言论。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九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①为我和伯恩施坦的论战而热烈地同我握手。”^②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理论家梅林在普列汉诺夫开始批判伯恩施坦之后不久，也发表了题为《新康德主义》等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考茨基在经过严重动摇之后也不得不写《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等的批判文章。法国的拉法格于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四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说：“您最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非常出色，既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写的技巧也好。”^③同时，他也写了《进化——革命》、《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等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著。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在《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一年第十一——十一册上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一文，文中曾多次直接提到或引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④。总之，普列汉诺夫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之中，从时间上来看，他是第一个发表演说和文章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从数量和质量

① 保尔·辛格尔（1844—1911年）——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之一，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

②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298页。

③ 见上书，第286页。

④ 见布拉戈耶夫：《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7、8、11页。

上来看，他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文章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可见，他在国际上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确实起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模范作用。他不愧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摧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和能手。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他虽然批驳了康德所谓世界上存在“不可认识之物”的不可知论，但是又认为在康德的原理里面“所包含的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为法国唯物论者在康德以前说过了：物质的本质是我们所不能认识的，我们之认识物质，只凭它对我们所发生的那种影响。”^①这是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并且把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也看成是存在着不可知论。他在论证现代辩证唯物论哲学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的继承关系时，过于强调两者的联系和一致，而忽视了两者的区别和对立。他在《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说过：“实在说来，现代唯物论只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②普列汉诺夫集中力量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哲学观点，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政治观点驳斥得不够充分，对其抹煞新时期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谬论没有根据大量事实予以有力批驳，甚至避而不谈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83页。

② 同上书，第38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5页。

第二节

谴责米勒兰的修正主义的实践

普列汉诺夫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反对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斗争，是他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七月，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亚·埃·米勒兰（一八五九——一九四三年）参加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联合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部长，推行阶级合作的路线。这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列宁说得好：“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们能够立刻转到有其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①。从当时的革命形势看，法国工人运动正逐步高涨，而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府，社会主义者参加这个政府就要对这个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负责，这同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可以利用这个讲坛揭露资产阶级显然不同。所以，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是掩饰了资产阶级政府镇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本质，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使无产阶级看不清资产阶级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忘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目标。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一方面提出软弱无力、微不足道的改良性建议，如规定十小时工作制和对劳资争议实行仲裁等；另一方面却容忍资产阶级政府枪杀马丁尼克和夏龙两地的罢工工人，并且执行了扩军备战的措施，惩办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战士。所以米勒兰入阁事件及其所作所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页。

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机会主义者拍手叫好；而一些工人运动的革命领袖，如普列汉诺夫、盖得、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则严加谴责。

普列汉诺夫在米勒兰入阁三个月之后，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即于一八九九年九月在《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报〉向各国人士所提问题的答复》中，就指明：从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考虑，应该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他写道：“要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积极和坚决，就必须逐步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剥削者的利益相对立意识愈来愈多地灌输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手中的可怕的爆炸物，它能够粉碎现代社会。一切能够说明白这种意识的，都应当被认为是革命的工具，因此社会主义者就可以采纳。而一切足以蒙蔽这种意识的，都是反革命的，因此我们必须谴责和否定。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策略所根据的主要原则。”“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可能害多利少，因为参加的结果，将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①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个包括有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德·柯尔佐夫（一八六三——一九二〇年）等二十三人的俄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米勒兰入阁事件成了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心，会上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以法国社会党人盖得为首的左派，站在正确的革命立场上，坚决反对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背叛行为；以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让·饶勒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坚持修正主义立场，认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无产阶级当前利益所允许的；第三派是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采取了调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6页。

主义立场，以狡猾、隐蔽的形式为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辩护。他在自己起草的被称谓“橡皮性”决议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案中宣称，米勒兰入阁不是原则问题，只是策略问题，不必由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一年三月在《曙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谈谈最近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文中，追述了他对米勒兰事件的看法。他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对米勒兰事件的基本观点是：“我觉得，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会议必须更坦率、更坚决地表示对这个人（指米勒兰——引者注）的意见，这个人顽固地不愿放弃部长的软椅，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法国社会党人的统一事业。我深信，如果代表大会用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达方式谴责米勒兰，它对于统一所做的贡献就会比大会的参加者就互相友爱的乐趣以及和解的甜蜜发表漂亮的、但没有结果的演说所做的要多得多。而且我过去和现在都觉得，关于米勒兰不受国际代表大会管辖的理论是大有问题的，甚至在这一场合是完全错误的。”^①他还联系伯恩斯坦提出的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公式，指出：“……米勒兰借口特殊情况迄今仍旧留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犯下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反对工人阶级的罪过。”^②

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批判了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案，认为考茨基在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诬蔑为“布朗基主义”的情况下，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始终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个重要原理。他指出：“考茨基却不是这样行动的。他想到，‘批判者’（指修正主义者——引者注）指

① 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217页。

责我们是‘布朗基主义’，为了防御自己受到批判者的攻击，他请求代表大会表示反对那些以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暴力行动就能够夺取政权的人。”^①但是他又考虑到专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倾向考茨基的决议草案，于是便对大会决议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案：“即使在社会党人可能被迫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非常情况下，**只要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②这个修正案被饶勒斯修改得面目皆非，普列汉诺夫对此非常不满意，要求在大会上发言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因会议日程紧、要求发言的人太多，未能如愿。普列汉诺夫经过深思熟虑，断定盖得提出的决议案“比加上了我的补充案的考茨基决议案**更接近真理**”^③。所以，在带有普列汉诺夫修正案的考茨基的决议案付诸表决时，普列汉诺夫本人却陡然决定改变态度，他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柯尔佐夫一起又投票赞成盖得谴责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决议案。然而大会终以二十九票对九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决议案的通过很不满意。他写道：“而米勒兰的行为不能不对工人的自觉起十分有害的影响。除了**有意识的机会主义者饶勒斯、福尔马尔、伯恩施坦、安塞尔之流外**，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因此巴黎代表大会不能满足于抽象地回答生活本身向它提出的问题；它必须寻找能够明确表示对米勒兰策略的否定态度的表达方式。它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个职责。它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模棱两可和不彻底。”^④普列汉诺夫期待下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能对这个问题，给予圆满解决。

① 《米勒兰事件》，第219页。

② 转引自同上书，第222页。

③ 同上书，第225页。

④ 同上书，第308—309页。

一九〇四年八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①。“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即如何对待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这个议题，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为修正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提供了口实。因此重新讨论和统一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有重要意义。在大会上，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提案。一个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盖得的提案，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加入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是由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和奥地利的阿德勒联合提出的提案，它表示支持各国社会党人参加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讨论这两个提案时，以法国的饶勒斯、奥地利的阿德勒、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和安塞尔等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同以倍倍尔、卢森堡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批驳了阿德勒和饶勒斯的论据，号召各国代表投票赞成盖得的提案。他认为盖得提出的“新的草案则勇敢地接触实践问题，毫不动摇地作出唯一堪称为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回答，采取不调和的反对立场和进行不断的革命鼓动的回答。新的草案直接了当地要求国际代表大会谴责修正主义。”^②在一次会议上，安塞尔为米勒兰主义辩护时，竟公然诬蔑俄国、保加利亚、波兰、西班牙和日本等国的社会党人，声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不对政府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要过许多年才会被邀请参与行政管理”^③。他主张建立欧洲大国社会党同盟来解决诸如参加

①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共45人，其中社会民主工党6人（布尔什维克2人），社会革命党31人，崩得分子8人。

② 转引自《米勒兰事件》，第312页。

③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07页。

资产阶级政府这样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而尚未强大到能够参政的小党的代表对此可以消极地弃权，而不必积极地干预。他妄想用这种办法迫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支持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提出的联合提案。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个联合提案“给机会主义造成一个缝隙，通过这个缝隙它可以重新把自己的全部私货塞进社会党的实践中来”^①。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普列汉诺夫召集被安塞尔点名攻击到的那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代表团团长一起开会，并起草了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和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抗议这种企图把大会代表划分为积极代表和消极代表两部分的办法，抗议据说想要成立一个唯一有权解决国际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欧洲大国社会党同盟的做法。”^②这个声明给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的提案以沉重的打击。最后大会，以二十五票对五票通过了盖得提出的决议草案。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利亚多夫、克拉西柯夫都投了赞成票。

代表大会闭幕后，普列汉诺夫回到家里，写了长篇文章《在阿姆斯特丹·观感和评论》，记述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斗争的情况，嘲笑了比利时鼓吹合作社改良运动的头子安塞尔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他写道：“至于说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我们可以对安塞尔同志说，这个运动是俄国的进步因素，而通过俄国，是全欧洲的进步因素，同他由于过分热衷于合作社而企图用来‘轰炸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土豆和大园面包相比，更重要得多。”^③

整个看来，普列汉诺夫比较早地对米勒兰主义采取了严厉批

① 转引自《米勒兰事件》，第320页。译文有修改。

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09页。

③ 转引自《米勒兰事件》，第321页。

判的态度，最终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投票，这是主要的；但他提出的修正案又适应了考茨基决议案的机会主义精神，表现出某些动摇，这是次要的。

第三节

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 变种——经济主义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宁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一些年轻人夺取了这个协会的领导权。他们提出以争取满足工人的眼前经济利益为斗争目标，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主张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做。这些年轻人被称为“经济派”。经济派自称是伯恩施坦的追随者。伯恩施坦曾公开宣布，许多俄国人支持他^①，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②。其实经济主义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新变种。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最早觉察到经济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版的全俄性的秘密报纸《工人报》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出版了第一号^③。该报编辑部把这一号报纸寄给了普列汉诺夫。他在给编辑部的回信中，就提醒他们要经常牢记马克思关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当前各地方小组正埋头热衷于局部实际利益的时候，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2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83—184页、393页注释67。

③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在《普列汉诺夫传》一书中把《工人报》第1号的出版时间误写为在1898年3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见三联书店1980年中译本第190页。

更要注意防止产生忽视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

普列汉诺夫反击经济派的斗争，首先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中开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是一八九四年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建立的，以便团结在国外、特别是在瑞士的“劳动解放社”之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其任务是“力所能及地支持已在俄国无产阶级中间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

“劳动解放社”把自己的印刷所和财务交给了联合会，但是保留了编辑联合会出版物《工作者》杂志和领导联合会的权力。后来，以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一八七一——一九五五年）、叶·德·库斯柯娃（一八六九——一九五八年）^①、康·米·塔赫塔廖夫（一八七一——一九二五年）等为首的年轻人（人们把他们叫做“经济派”）开始攻击“劳动解放社”的这批“老头子”，说他们已脱离了工人运动，已不了解工人运动的需要，要把他们赶走。“年轻人”还背着“劳动解放社”出版著作，盗用联合会的名义鼓吹机会主义观点。联合会里出现的这种新动向引起了普列汉诺夫的密切注意。当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中蠢蠢欲动的时候，正是联合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的时候。

一八九八年三月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普列汉诺夫很快收到了大会代表阿·约·克烈美尔（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年）写来的信，得知大会已胜利闭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宣告成立，他所在的国外联合会已

^① 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于一九〇六年同别人一起在彼得堡组织出版《无题》杂志，组成无题派。公开声称自己是修正主义的拥护者，表示支持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无产阶级坚持独立的阶级政策。后来他们成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二年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成了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的骨干。

被接受为党的成员并被指定为党驻国外的组织。他还收到了大会发给他的贺电，祝贺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建立的功绩。他在国外得到了刊登着大会宣言和决议的传单以后，立即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作者》上加以转载。以便让欧洲各社会主义报刊登载这些重要文件，使欧洲各国革命者都能知道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进展。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地方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让经济派分子夺取了联合会的领导权，经济主义势必象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波及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危害俄国革命事业。因此，及时地在联合会内同经济派作斗争，就成为一件关系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命运的大事。普列汉诺夫果敢地在联合会内向经济派开展了不调和的斗争。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年轻人”即经济派分子当时已占据了联合会的多数。普列汉诺夫因病未能参加大会。出席大会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未能对经济派分子给予还击。普列汉诺夫对此很不满意。但“劳动解放社”在这次大会上曾发表声明，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会后机会主义分子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劝普列汉诺夫参加经济派的机关刊物《工人思想报》^①。普列汉诺夫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并揭露了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的机会主义观点。

一九〇〇年初，普列汉诺夫编辑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文集《供〈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参考的袖珍指南》，并为此文集写了序言。文集中转载了列宁于一八九九年在流放中写的批判经济主义

^① 《工人思想报》是经济派办的报纸。它从1897年10月至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版16号。该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过一本宣扬经济主义观点的小册子——《〈工人思想报〉附刊》。

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一九〇〇年四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派采用奸诈手腕，疯狂攻击和排斥“劳动解放社”，致使普列汉诺夫退出了会场，他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退出了《工人事业》杂志^①编辑部，创立了独立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九〇一年九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起来。出席大会的有《曙光》杂志、《火星报》、“劳动解放社”和经济派、崩得^②分子等组织代表，共三十三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出席了会议。

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见到经济派在联合会上占据优势，为争取同经济派分子建立一个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外组织，曾一度主张同经济派妥协。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揭露了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及《工人事业》杂志的机会主义实质，并且坚决反对同经济派联合。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曙光》杂志、《火星报》和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劳动解放社”等组织的代表，发表声明，离开了代表大会，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组织，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

① 《工人事业》杂志，被经济派控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

②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的成员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它要求承认其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被拒绝后它便退出了大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

动解放社成员随即另外成立了“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列宁十分赞赏普列汉诺夫很早就起来批判经济派。他说：“起先同经济派斗争的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整个‘劳动解放社’（《工作者》杂志等），后来同他们斗争的是‘火星报’（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八月，即到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①

普列汉诺夫为批判经济派，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写了许多篇论文，其中主要有：《供〈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参考的‘袖珍指南’序言》（一九〇〇年二月）、《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笔记摘录》（一九〇〇年）、《再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九〇一年三月）、《泛论策略、兼论尼古拉也夫的将军莱阿特的策略，特别是专论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策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以后怎么办？》（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等。他在论文中指出，经济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他把经济派斥之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和伯恩施坦与日列索夫的忠实信徒”^②。他揭示了俄国经济派与伯恩施坦主义的联系，他说：“我们运动中的狭隘的和粗鲁的经济主义的代表们，在西方，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派’的观点中为自己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伯恩施坦则是那些‘批评派’的旗手和喉舌”^③。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于一九〇〇年在伦敦出版的俄译本《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注释中，曾公开承认：“我必须指出，有很多（假使不是大部分）在俄国工作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坚决拥护与我接近的观点的”^④。普列汉诺夫说：“伯恩施坦先生显然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5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519页。

④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51页。

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所谓‘经济’派。”^①

普列汉诺夫批判了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经济派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自发产物，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尾随工人运动之后作记录。著名的经济派分子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科娃坚决反对把实现社会主义列入党纲，他们硬说，社会主义是“连上帝本人也不知道的顶峰”。经济派妄图把无产阶级政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降低为工人运动的尾巴。普列汉诺夫指出，经济派“他们只看着我们无产阶级的‘背后’”^②，他们是尾巴主义。普列汉诺夫针对经济派否认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观点，强调指出，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认清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任务，并且向工人加以宣传。普列汉诺夫回击了经济派篡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把实现社会主义列入党纲的谬论。他认为，必须把工人团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不应当充当工人运动的尾巴，而应该成为群众的革命思想的助产士，应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经济派否认建立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表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使工人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使资产阶级支配工人的政治活动。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必须“指出消灭（而不仅是缓和）资本主义剥削和使一切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变为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这个意义上，‘将来的制度’乃是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目的，而说什么它不应列入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意味着丝毫不理解这个纲领的意义或彻底地放弃了社会主义”^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5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普列汉诺夫批判了经济派主张搞经济斗争，反对搞政治斗争的谬论，经济派说什么，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首先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工人们现在还似乎不理解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才能争得解放。经济派叫嚷：“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①。他们又宣扬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②。普列汉诺夫指出：经济派把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俄国工人阶级在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会不断提高政治觉悟，逐渐认识到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他着重批判了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炮制出来的先进行争取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后进行点滴社会改良的自发性的“政治斗争”的所谓“过程策略”论。这一策略降低了工人群众自觉活动的意义，阻碍工人运动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诱使工人阶级放弃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斗争任务。经济派提出的这种策略，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偏见。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经济派时，是把经济派分子当做政治敌人看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提议，将著名的经济派分子普罗科波维奇开除了党籍。

列宁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反对经济主义斗争中做出的贡献，他在一九〇七年一月回忆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一八九八年建立的。一八九九年，库斯柯娃女士和普罗科波维奇先生都是党员，是这个党的国外组织的党员，当时国外组织的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那时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现在一样，库斯柯娃女士那时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她维护社会民

①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253页。

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坚持伯恩斯坦主义，也就是说，最终要使工人阶级服从自由派的政策。库斯柯娃女士在著名的《Creao》（读作‘克勒多’，意思就是信条，纲领，世界观）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她的观点。《Creao》中写道，工人应当进行经济斗争，而自由派应当进行政治斗争。‘工人事业派’（当时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称呼）实质上就是倾向这种观点的。普列汉诺夫同这种观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组织分裂了。普列汉诺夫出版了一本题为《Vademecum》（工人事业派的‘同路人’）的小册子反对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反对库斯柯娃女士。”^①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在批判经济派的论文中，没有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大作用，没有指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彻底揭示出俄国工人运动的迫切政治任务是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和经济主义中，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不了解经济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于当时工人运动还缺少马克思主义政党强有力的领导和崇拜自发性，错误地认为经济派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年轻人政治上幼稚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肤浅造成的。后来，普列汉诺夫等“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不满意列宁对经济派的尖锐批判。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〇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俄国小组会上，多次发言，要求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所有派别妥协。这件事说明普列汉诺夫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不彻底。列宁在这个时期写的大量批判经济主义的著作，特别是他在一九〇二年发表的光辉著作《怎么办？》，胜利完成了粉碎经济派的历史任务。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433页。

第四节

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追随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伯恩斯坦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以前，就已经在沙皇批准的合法书刊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他们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伯恩斯坦主义出现以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欣喜若狂，认为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头子司徒卢威^①自己供称：他在一八九九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小册子的鼓舞下写成的。这是他集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的代表作。“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谢·尼·布尔加柯夫（一八七一——一九二七年）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日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至于您和施米特的论争，那么您知道，我持着和您不同的哲学观点……关于您和伯恩斯坦在《萨克逊工人报》上的论争，应该坦率地说——我不站在您的一

^① 彼·别·司徒卢威（1870—1944年），90年代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90年代末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首领。1900年末到1901年曾以“民主反对派”代表人物的资格同《火星报》派合作，不久脱离社会民主党。1902至1905年在外国主编出版自由资产阶级刊物《解放》杂志。编辑、出版《解放》杂志的这些人后成为1905年10月成立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骨干。司徒卢威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参加了邓尼金组织的反革命政府，后又在弗兰格尔的反革命政府里担任部长，后又编辑在布拉格出版的白俄刊物《俄国思想》杂志。从1925至1927年编辑白俄在巴黎出版的反动报纸《复活日报》。

边。”^①这表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是完全站在一起的。

普列汉诺夫进行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比较晚，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一年以前，他对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长期保持沉默，一直处在动摇之中。列宁在一八九五年就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战。这一年他发表了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头子司徒卢威的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群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列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激战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一声不响。列宁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四日致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对普列汉诺夫不起来批判司徒卢威表示惊奇。他在信中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过去既不在俄国著作中反对新康德主义，而现在又不坚决反对它，却让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争论这种哲学的枝节问题，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的观点的一部分了。”^②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虽表示“在俄国，同伯恩斯坦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应该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去同讲坛马克思主义者（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的影响相对抗。”^③但却不

^① 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所存文稿（档案编号：73.7）。转引自布·恰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9页。

^③ 《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通信录》俄文版第2卷，第81页。转引自布·恰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第193—194页。

公开站出来写文章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九日在给波特列索夫写的一封信中，对普列汉诺夫长期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缄默再次表示诧异。他在信中说，他不明白普列汉诺夫为什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在《新语》杂志上攻击恩格斯的论文，不给予批判^①。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夏天会见普列汉诺夫时，又催问普列汉诺夫为什么不对司徒卢威刊载在《哲学与心理学论丛》杂书上的论文《论自由与必然》进行驳斥。后来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八年夏季曾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由于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本质还认识不足，所以没有起来批判他。可是同时又为自己辩护说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已开始批判司徒卢威。普列汉诺夫写道：“还在司徒卢威先生出版自己的著名的《评述》（即《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述》——引者注）的时候，我的某些个〈当时是为数不多的〉同道者，在正确地看出这些札记只是一个还没有彻底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人的著作的时候，就劝我出来反对他。当这同一个司徒卢威先生在《哲学与心理学论丛》中发表自己的《论自由与必然》的论文时，象这样的劝告就更加绝对必要了。我记得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夏季和我会见时，还问我为什么没有注意这篇论文。我对列宁的回答很简单：司徒卢威在《论自由与必然》的论文中所发表的思想，早已为我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驳斥了。”^②

列宁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批判民粹派的暂时协定，共同出版过载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司徒卢威论文的文集《关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征的材料》。普列汉诺夫长期被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清“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实质。他

① 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400页注释106。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27页。

当时不但看不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已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反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沙皇制度的同盟者。他低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把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癖嗜”，认为这是“不很重要的”。他认为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述》一书，仅仅在理论上有些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由于司徒卢威年轻和思想不成熟造成的，是“粗枝大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仅仅在认识论上存在着分歧。他曾为自己迟迟不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之流的错误态度辩护，说他是奉亚·尼·波特列索夫之命，不要向司徒卢威开火的。列宁在一九〇〇年九月初写的《‘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中，指出普列汉诺夫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列宁写道：“为什么要自欺欺人，说什么在一八九五年他格·瓦·是‘奉命’（??）‘不向’（司徒卢威）‘开火的’，而他又很习惯于遵命行事（是这样吗？）。为什么要自欺欺人，硬说什么在一八九七年（当时司徒卢威在‘新语’杂志上说，他的目的是想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他格·瓦·没有起来反对，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并且永远也不能了解）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一个杂志上进行论战。格·瓦·这种不诚恳的态度简直令人气愤到极点，他竟在争论中竭力把事情说成似乎我们不想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战争，似乎我们想‘调和一切’等等。”^①普列汉诺夫后来在他写的《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发表）中，才承认了他最初对“合法马克思主义”采取的迁就姑息态度是错误的。他说：“而对司徒卢威先生寄予期望的人们却希望这一资产阶级的理论将逐渐为存在于他的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成份所战胜。本文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94页。

作者是那些期望他的中间的一个。……我们只有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①。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给马尔托夫的信中，再次承认他最初不想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之流的错误。他在信中说：“我可惜，在以前，当司徒卢威先生冒充为我们的人的时候，我没有如象他应得的那样攻击他。我没有这样做。是由于对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坚持让了步”^②。在这件事情上，普列汉诺夫终于知错认错，表现出了一点儿自我批评精神，但是，没有深挖自己长期对合法马克思主义保持沉默的原因，却又把责任推到波特列索夫身上。由此看出，他所做的自我批评是不彻底的。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长期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保持沉默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他多年侨居国外，不十分熟悉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因而也就必然认不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工人运动造成的实际危害；另一方面，是他思想上时常把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同盟者，因此他也就必然不能正确看待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对“合法马克思主义”长期持调和态度的根本原因。

在列宁的屡次督促和强烈影响下，普列汉诺夫很晚才认识到在俄国进行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重要性，于一九〇一年写了题为《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判者的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这篇长文分为三篇论文，公开批判发表在资产阶级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文库》上的司徒卢威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长文，于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以《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为总题刊登在《曙光》杂志上。他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86页。

② 同上书，第903页。

事前曾把论文寄给列宁，征求意见。他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

“现将我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二篇文章寄给您，我早就为此感到忐忑不安了。文章终于还是写得太长。但是您不要害怕。第一，文章写得非常奔放，所以与其说它显得太长，不如说是内容充实。第二，您读了该文之后就会发现无法写得再短，因为题材就是这样嘛，恐怕连考茨基也没有好好研究过。……我保证我结论中总的思想是正确的。”^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三篇论文中各有侧重地、有力地批判了司徒卢威之流的修正主义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篇论文中，批判了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歪曲。司徒卢威以偷天换日的手法，说什么：“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不相适应乃是矛盾。它迫使法律适应于经济。”^② 以此取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为他宣扬取消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制造理论根据。普列汉诺夫指明司徒卢威这一谬论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他说：“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已经多次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不得不再重复一次），准备着社会革命并使它成为不可避免的乃是社会生产力与该社会的法律所依据的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完全是另外的而且是危险得多的一种矛盾；从这一矛盾出现的时候起，就开始了革命的时代。把这一矛盾淹没在关于经济现象和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关于法律对经济之适应一类的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无内容的高谈阔论中，——这就等于不弄清楚问题，而把它弄得糊涂和混乱之极。”^③ 普列汉诺夫指出了司徒卢威这一谬论的理论来源。他指明，司徒卢威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硬把在大学讲坛上鼓吹资产阶级改

①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9辑，第63页。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78页。

③ 同上书，第588页。

良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路约·布伦坦诺(一八四四——一九三一年)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捏合在一起,阉割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灵魂。普列汉诺夫生动地揭穿了司徒卢威这一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他指出:“但是在这里,我们的批判者又把‘完全荒唐无稽的教条’强加于‘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而且他的叙述又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异常可贵的理论谷粒变成‘一半还是毒草的大麦’。”^①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揭露了司徒卢威歪曲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罪恶目的。司徒卢威既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篡改为法律与经济的矛盾,那末就象一双鞋挤脚就换另一双鞋一样,只要不断制定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律,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万世长存、并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按司徒卢威这一反动逻辑,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没有必要了。普列汉诺夫指出司徒卢威歪曲社会基本矛盾的反动实质,就在于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说:“他们天真地说,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如果被理解得正确,就没有为社会革命留下地位,而是设定‘法律对经济的不断的适应是它们共处的常态’。”^②普列汉诺夫无情地扯下了司徒卢威这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画皮,他嘲笑道:“批判者先生们,你们算了吧!你们是些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呢!马克思撒下了龙种,而你们只是……你们只是……,总之,你们完全是另一种规格的有机体!……”^③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一篇论文中,在批判司徒卢威的谬论的同时,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分析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特别是法律与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矛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② 同上书,第591页。

③ 同上书,第617页。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二篇论文中，集中批判了司徒卢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趋于缓和的理论。司徒卢威之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富者变穷，穷者变富，工人在国民收入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日趋改善；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实行，工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社会上的不平等逐渐消失。这样工人与资本家的距离越来越小，从而“大约在下一个地质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不知不觉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①这就是司徒卢威鼓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趋缓和的修正主义谬论的主要内容。普列汉诺夫指出，司徒卢威为了证明他的这一谬论的“正确”，一方面，他拚命攻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如：“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彼此是成反比例的”原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原理；另一方面，他求助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贩卖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鼓吹的“不声不响的社会主义”、“自动的社会主义”等黑货。普列汉诺夫指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的‘缓和’，现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的一个最时髦的主题。”^②司徒卢威所作的事情，只不过是把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凯里（一七九三——一八七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一八〇一——一八五〇年）和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所鼓吹的这—时髦主题，贩运到俄国而已。他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用英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资本家攫取的社会财富急骤增加，工人生活极端恶化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司徒卢威这一谬论。他严正指出：“那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末关于社会矛盾缓和，关于财富的分散，关于资本家‘变穷’和工人‘变富’的一些论调，都是对于特别感到社会不平等的痛苦的那一阶级（即无产阶级——引者注）的辛辣的嘲笑。”^①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资本家在加强对男子成年工人剥削的同时，“越来越企求使妇女和儿童从属于自己。而妇女和儿童对资本日益增长的从属无疑地意味着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恶化。”^②事实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原理，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规律。而司徒卢威之流否认这一事实，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辩护士。普列汉诺夫讽刺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我们的‘批判者’是根本不批评资产阶级学者的。他们的专业正是‘批判’马克思。”^③司徒卢威大肆宣扬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妨碍无产阶级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在合作社等经济机关基础上获得“有组织的力量”。普列汉诺夫揭穿了司徒卢威这种论调的改良主义实质，他认为司徒卢威混淆了流氓无产者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区别，前者是腐蚀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后者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贫困化虽然能产生少数流氓无产者，但更主要地是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象指靠革命的力量那样指靠着无产阶级的退化成份。……尽管劳动群众中某些成份的犯罪、卖淫和精神颓废的其他征兆在迅速增长，工人阶级，就整个阶级来说，是越来越自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46页。

② 同上书，第658页。

③ 同上书，第630页。

和越来越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无产阶级社会状况的恶化完全不等于创造一些妨碍它的阶级自觉发展的条件。”^①至于司徒卢威提出无产阶级在未夺取政权前，要想逐步取得“有组织的力量”，必须办合作社一类经济机关等理论，不过是重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普列汉诺夫形象地指出了司徒卢威这种论调的反动实质，他说：“不过，关于逐步取得有组织的力量必然性的说法，只是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向着他所仇恨的社会革命概念开火的理论炮垒中与许多很大的攻城炮并列的小炮之一。”^②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三篇论文中，集中批判了司徒卢威否认事物发展由量变引起质变的革命辩证法，鼓吹庸俗进化论，宣扬通过社会改良，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普列汉诺夫把司徒卢威这个谬论称之为“为反对社会革命概念而建筑的炮垒”^③。司徒卢威认为事物的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只有渐进性没有间断性，他把这看成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普列汉诺夫对司徒卢威的观点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就理论方面说，司徒卢威先生所拥护的进化论，如我们所知道的，有一种根本的缺点，就是在它里面只有为已发生的物的变化留有地位，而没有为新物的发生留地位。”^④普列汉诺夫引证了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变化的实例，证明了“数量转化到质量时，飞跃是不可免的”^⑤。历史上经历过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和今后即将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间断性的中断，是飞跃，是质变。司徒卢威以否认事物发展有质变的庸俗进化论为依据，认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80—681页。

②③ 同上书，第682页。

④ 同上书，第697页。

⑤ 同上书，第687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无穷无尽的稳固性和适应性，鼓吹进行社会改良，通过“织补资本主义的‘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导致（哪怕是**通过最缓慢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和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它们。**”^①普列汉诺夫揭露说，司徒卢威之流通过“织补”资本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出**，使“他们在实践中开始了一个**自觉的机会主义的时代**”^②。普列汉诺夫讥笑道：“于是他们愉快地让自己相信，补丁再加上补丁，就得出新的‘社会组织’”^③。他说：“这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理论**，是提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④普列汉诺夫进而揭穿司徒卢威反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飞跃，鼓吹庸俗进化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司徒卢威先生负责向我们表明，在自然界没有飞跃，而且理智也不容忍它们。为什么是这样呢？或者他所说的只是自己的理智，它确实**不容忍飞跃**，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所谓他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⑤无怪乎司徒卢威这种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出笼，便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情欢迎。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一年），“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洞悉利害的学者”，他在极为动听地高谈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的同时，赞扬司徒卢威，对司徒卢威“寄予很大的希望”^⑥。“合法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成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这样，我们的‘新马克思主义’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我国为精神的支配而斗争中的最可靠的武器。”^⑦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01页。

②③ 同上书，第702页。

④ 同上书，第701页。

⑤ 同上书，第686页。

⑥ 参见上书，第700页。

⑦ 同上书，第716页。

而司徒卢威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已“成为我们的自由派的领袖”^①。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三篇论文中，明确指出了包括伯恩斯坦、司徒卢威在内的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他们的罪恶目的。

他指出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本质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阉割其革命灵魂，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他说：“我们的‘批判者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修正’马克思，消除他的理论中的一切社会革命的内容。为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革命无产者所津津乐道的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以暴力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的马克思，……这一马克思是不为我们的有教养的、其思想家是‘批判者’先生们的小资产阶级所同情的。……应当把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者’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于是‘批判的’工作就沸腾起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把一切那些足以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用为精神武器的原理都一一的丢掉。”^②普列汉诺夫把伯恩斯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等修正主义叫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讽刺。”^③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一切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实质。一切修正主义者都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而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普列汉诺夫对一切修正主义者这一阶级实质，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而‘批判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17页。

② 同上书，第715页。

③ 同上书，第452页。

的’武器愈起劲地工作，我们的‘批判者们’和资产阶级的职业辩护人之间的一致就变得愈完全和愈牢固。诱惑‘批判者’先生们的‘批判’恶魔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家神’。”^①

普列汉诺夫在瑞士的伯尔尼的一次批判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谬论的讲演中，指明了修正主义已成为国际性的反动思潮。他说：“在全欧洲，从喀山到伦敦，从巴勒摩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那时都发生了所谓修正主义的运动，其目的就如名称本身所表明的，在于修正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他在讲演中还指明了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关系，他说：“在我们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在伯恩施坦先生背叛以前就已存在，修正主义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就已猖獗起来，为伯恩施坦的思想侵入俄国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②。

由上述可见，普列汉诺夫批判司徒卢威的三篇论文大体上主要是批判司徒卢威对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按照他的计划，这三篇论文只是他批判司徒卢威专著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准备集中批判司徒卢威的一般哲学思想，可惜这一部分没有完成。普列汉诺夫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除了在刊物上发表之外，于一九〇六年还作为文集出版了俄文单行本；另外，还被译为保加利亚文等其他欧洲文字出版。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在论文中流露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和纯理论的考察，往往用讽刺、挖苦的俏皮话代替了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认真、严肃的分析批判；没有详细分析俄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现状；对于司徒卢威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把国家说成是“秩序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避而不谈。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14页。

^② 同上书。第912页注释595。

第七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创始人和领导人

第一节

协同列宁创办并主编《火星报》 和《曙光》杂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一八九八年创立的。这一年三月十三至十五日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仅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列宁没有参加，他正被流放。大会通过了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选出了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巴·卢·屠查普斯基提请普列汉诺夫起草党的成立宣言。但崩得代表克默雷不同意^①，他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经准备承担这项工作。实际上，会后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是由彼得

^① 克默雷于1897年10月同普列汉诺夫会晤时曾坚持不许“劳动解放社”干预俄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坚决反对。

堡“斗争协会”交给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起草的^①。这个宣言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大会选出的三个中央委员中有两个在大会闭幕后不久就被沙皇政府逮捕了。这样中央领导机关已不复存在。于是经济派随即趁机在各地工人组织中大肆活动，妄想把追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当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任务。由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活跃，妄图把俄国工人运动纳入沙皇政府允许的轨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她应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俄国各地的工人小组和团体，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这些工人小组和团体如一盘散沙似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彼此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没有统一的纪律。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想迅速结束这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纪律松弛的严重状态，就必须创办自己的全俄政治报纸和理论刊物。以便通过编辑、出版党的报刊，从政治思想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从组织上加强各地工人小组和团体的联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疯狂迫害，当时在俄国国内无法出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因此，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就仔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这种报纸的计划。一九〇〇年二月列宁流放期满后，立即为实现这个计划四处奔波，商量办报的地点，物色报纸的编辑和通讯员，安排发行报纸的代办员。列宁考虑到，普

^① 参见理查德·金德斯利：《俄国最初一批修正主义者》，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第197—198页。

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已有丰富经验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俄国工人和革命家之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办党报一定要想法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俄国工人运动。一九〇〇年五月，列宁带着一封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从普斯科夫来到彼得堡。这封信是用隐形墨水写在一张账单上，其中提出了出版党报的计划。列宁本来准备把信寄给普列汉诺夫，但是还没来得及寄出，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这封信曾从列宁的口袋里被搜去，好在没有引起怀疑。如果他们将这个账单用药水去洗，就会发现列宁密写的致普列汉诺夫的信。拘留十天获释后，八月下旬他和波特列索夫一起，专程来到日内瓦会见普列汉诺夫。接着，在日内瓦郊区的科尔斯耶和维津，列宁、波特列索夫同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就党报和党刊的编辑、出版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磋商和热烈的讨论。最初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对创办党报、党刊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后来，他们又在如何办党报的问题上同列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在谈判结束一个星期以后，列宁追忆了谈判的情况，写了笔记；后来，列宁又对当时还留在俄国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讲述了谈判的经过。列宁关于谈判过程的笔记，在列宁逝世之后，才以《‘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为标题公布于世。根据列宁的记载，我们可以真实而生动地了解到谈判的曲折过程和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如何对待经济派。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春在国内拟定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就严厉地谴责了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指出了它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

害，号召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列宁考虑到，某些工人革命者虽然暂时处在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但他们还是真心实意为使工人摆脱经济贫困而斗争；只要对他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是可以使他们放弃错误理论，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做有利于俄国工人运动的团结。所以列宁主张对那些处于经济派思想影响之下的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者，“决不放弃还有可能共同工作的希望”^①。列宁在各种不同观点可以论战的基础上，“保留了和平结束同‘经济派’争论的可能性等等。”^②普列汉诺夫由于“劳动解放社”受到经济派的疯狂攻击，并且在一九〇〇年四月因被经济派把持领导权而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所以非常痛恨经济派。他就心列宁会迁就经济派。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对经济派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对于如何讲究斗争艺术，把深受经济主义影响的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考虑甚少，远不及列宁深谋远虑。至于他怀疑列宁会迁就经济派，显然是一个误会。

第二，关于如何对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张彻底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他早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评述我国经济发展资料》中就已经开始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但在此以前，列宁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团体达成协议，共同公开出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民粹主义的文集。列宁鉴于这个历史经验，打算在国外出版党报时，要利用“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于是，列宁、尤·奥·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年）和斯·伊·拉德琴柯（一八六八——一九一一年）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代表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于一九〇〇年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97页。

四月在俄国普斯科夫举行会晤，商谈了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动笔写文章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比列宁晚，长期对之持缄默态度，现在却忽然无条件地反对起列宁这个打算来了。尽管列宁再三对普列汉诺夫解释，“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宽容司徒卢威，因为他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我们自己，包括格·瓦·在内，在应当起来驳斥的时候（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七年）没有起来驳斥。”^①可是普列汉诺夫不听劝告，仍猜疑“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奸细，责备他们是投机商人、无耻之徒。他宣布将继续坚决地向这些“叛徒”开火。他甚至错误认为，列宁不愿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斗争，想“调和一切”等等。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这是正确的。但他不懂得，在不放弃革命原则的条件下，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对于受合法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还是要尽量教育、争取。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崩得（“犹太工人总同盟”）。普列汉诺夫对之表示深恶痛绝。他宣称：这个组织简直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剥削俄国人的剥削者的组织；犹太人全都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俄国的政党就应该是俄国人的党，而不要受“坏种”的“迷惑”；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崩得驱逐出党，等等。列宁等人坚决反对这些不成体统的话，然而普列汉诺夫一味固执己见，并且说列宁对犹太人根本不够了解，缺乏同犹太人打交道的经验，等等。实际上反映了普列汉诺夫自己存在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不善于对犹太人进行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

第四，关于是否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考茨基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建议约请他的“盲目崇拜者”柳·伊·阿克雪里罗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94页。

得^①，写一篇哲学论文批判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只允许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而不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充分的篇幅（普列汉诺夫是指不刊登他的长篇大论），所以他要批判考茨基。考茨基袒护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刁难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无疑问是错误的。但列宁认为，考茨基当时基本上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所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考茨基，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种泄私怨的报复行为。为此，列宁坚决反对这样办。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这些不同看法给谈判带来了争论的气氛。在开始讨论办报刊的策略问题时，普列汉诺夫顽固坚持对经济派分子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偏激态度，既不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不亲自动手处理一些问题。例如，普列汉诺夫看了交给他的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后，在本质问题上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只表示在文字上要进一步修饰润色。可是他自己又不动手修改，便退还给列宁。列宁修改后，他仍不亲自修改，又让查苏利奇去推敲。在商谈涉及到列宁主张有条件地邀请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财政上和物质上支持党报的工作的问题时，普列汉诺夫冷冰冰地坚决表示反对，直至提出了最后通牒：或者是要他参加编辑部，或者是要司徒卢威参加编辑部，二者必居其一。但列宁以大局为重，对

^① 柳波芙·伊萨柯芙娜·阿克雪里罗得（1868—1946年），女，笔名为奥尔托多克斯。孟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文学研究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初任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以后加入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从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在高等学校任教。20年代曾鼓吹机械论的哲学观点，晚年致力于艺术理论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作了让步，表示希望他能够参加编辑部。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约请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批判考茨基的哲学文章的问题。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作法。普列汉诺夫绷着脸，阴沉沉地坐着，很不高兴，直到列宁、波特列索夫送他坐轮船回日内瓦城。关于对待崩得问题，争论也毫无结果，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八月二十六日在普列汉诺夫的住宅里，继续进行谈判。普列汉诺夫本想掌握编辑部的大权，可是当他发现在诸如上述好些问题上与国内的列宁等人看法不同，难以合作共事时，他就表示由列宁等人做编辑，他只当撰稿人。列宁等人还是尽力争取普列汉诺夫参加编辑部。经过一番讨论，普列汉诺夫终于同意担任编辑，但在策略问题上他要拥有两票的表决权。这充分显示了普列汉诺夫唯我独尊的性格。

普列汉诺夫想自己控制党报的企图，使列宁、波特列索夫非常生气，因为这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列宁在俄国国内时设想，由他、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担任编辑，不让普列汉诺夫等“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担任编辑，但吸收他们参加《火星报》的工作。列宁之所以这样设想，是因为他和波特列索夫考虑到，普列汉诺夫这些“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能认真地担负起繁重的编辑工作。但是列宁和波特列索夫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思想领导。列宁生动地描述了和波特列索夫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回家去的心情：“我们刚一下轮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简直愤慨极了。我们真的发火了，沉闷的空气终于爆发成了雷雨。我们在村子中来回走着，一直走到深夜，夜是漆黑的，雷雨交加，电火闪闪。我们一边走一边发脾气。……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普列汉诺夫早晨的不愿共同编辑的声明，不过是为天真的‘少爷们’设下的圈套，预先想好的一着棋，一个陷阱。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假如普列汉诺夫真的怕共同编辑，

怕妨害事业，怕在我们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转眼就暴露出（毫无顾虑地暴露出）他所说的共同编辑完全等于他一个人编辑。我们想同一个人密切地共事，同他亲密无间地交往，而这个人却用预先想好的一着棋来对待同志，这个人无疑不是好人，实在不是好人，他的个人的渺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烈，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这个新发现——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新发现：——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很爱慕普列汉诺夫，像对待宠爱的人那样原谅他的一切缺点，故意不去注意这些缺点，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缺点是不存在的，这都是一些小节，只有那些不重视原则的人才来注意这些小节。而现在我们自己不得不深深相信，这些‘微不足道的’缺点能够使人离弃最忠实的朋友，任何对正确理论的信念都不能使人忘记他的恶劣品质。我们无比地愤怒：理论人物被打垮了，我们愉快地践踏他这个被推倒的偶像，最尖锐的责难无休无止。我们认为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愿意、不会、也不能够在这种条件下一起工作。别了，杂志！我们要抛开一切回到俄国去，在那里再从头做起，只办一个报纸。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的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的关系。”①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散步到很晚的时候，才以沉重和不安的心情回到房间去睡觉；决定第二天把不在这里而到别处去办报纸的决定告诉普列汉诺夫，并且和普列汉诺夫永远断绝私人关系。

八月二十七日当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说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对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不公道，又说普列汉诺夫对此也很难过，如果现在分手，将会感到遗憾和内疚。查苏利奇恳求列宁和波特列索夫不要离去。当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普列汉诺夫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302—303页。

之后，他显然有些不高兴，责备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凭印象办事。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建议共同出版一些小册子，普列汉诺夫生气地说：“我没有想过搞小册子，现在也不想搞。别指望我了。你们就是走了，我也不会没有事做，在你们回来以前我可以做别的事情。”^①列宁和波特列索夫默不作声。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还是愿意在国外办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的。经过几天的谈判，他深深感到列宁、波特列索夫对他还是很尊重的，他也乐意同他们合作。但是他骄傲自大，孤芳自赏，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唯恐即将创办的报纸为别人所控制。所以在讨论中几经反复。当他看到列宁、波特列索夫真要同他分手，酝酿中的报纸将要流产时，他又很难过；终于回心转意，表示愿意同列宁、波特列索夫合作。他对他们解释说：对他来说，同他们分裂，无异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而投身于纯粹的学术工作，他不愿意这样做。

八月二十八日列宁、波特列索夫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普列汉诺夫同意出版文集。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提出关于编辑工作的三个方案：一、列宁、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是编辑，普列汉诺夫是撰稿人；二、大家都是编辑；三、普列汉诺夫是编辑，列宁、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是撰稿人。普列汉诺夫表示赞同前两个方案，坚决拒绝第三个方案，因为这时他已不想独揽编辑部大权。于是大家还暂时决定，在提出新的编辑制度草案以前，仍保留旧的制度：六人都是编辑，而普列汉诺夫拥有两票表决权。

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在九月初从日内瓦去慕尼黑的路上经过纽伦堡时，列宁拟定了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草案：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是编辑，而“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是在一切编辑工作问题上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卷，第307页。

都有表决权的撰稿人。但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六个人都成了编辑。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竭力主张报纸和杂志在瑞士编辑出版，以便由他们掌握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使报纸同俄国国内的一切联系都得经过他们。列宁考虑到，“劳动解放社”长期脱离了俄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如果让“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领导报纸和杂志，势必使它们不能同俄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保持血肉的联系；它们很可能缺少战斗气息，充满迂腐空洞的议论，对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不了指导作用。因此，列宁决定把报纸与杂志的编辑、出版机构，设在他和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居住的德国慕尼黑城，而不设在“劳动解放社”的所在地——瑞士日内瓦市。

当时，普列汉诺夫已四十四岁，列宁才三十岁。普列汉诺夫有些瞧不起这个年青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会谈创办报纸和杂志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任性，想在编辑部里占据领导地位。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老战士，这样对待非常尊敬他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十分错误的。这也表明，普列汉诺夫缺少一个善于团结一切革命同志共同工作的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普列汉诺夫长期侨居国外，不太了解俄国国内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他虽然在商谈创办党报和党刊的问题时，对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的看法并没有错，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创办党报和党刊的困难估计不足，没认识到列宁的主张实际上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办好党报的革命策略。在这方面，列宁比普列汉诺夫高出一筹。普列汉诺夫经列宁劝说，同意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出版杂志的谈判，并且负责起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出版由《火星报》主编的《曙光》杂志的副刊——《现代评论》的协议。但后来在会谈中发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妄想把这个副刊办成同《曙光》杂志分庭抗礼的另

一个刊物，最终并未签订协议。尽管在如何创办党报党刊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夜不能寝，甚至想断绝一切私人关系，“火星”几乎要熄灭了；但这种争论还是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同志式的内部争论。列宁关于这次谈判的追忆文章《‘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是在气愤中写成的。虽然真实地记载了谈判的经过，但也往往带有偏激情绪，说了一些过头话。例如说，普列汉诺夫“实在不是好人”等等。后来列宁可能也觉察到文章中有的用词不妥，因此在他生前，即使当普列汉诺夫变成了机会主义者以后，也从未拿出来发表。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非常尊重普列汉诺夫在创办党报和党刊工作中的历史功绩。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列宁十分注意顾全大局，他回顾说：“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将来而不要追究过去，可能要好些。”^①列宁在耐心说服普列汉诺夫的同时，最后作了些让步。普列汉诺夫后来也对自己的固执己见有所觉察，他由于不愿意同列宁分裂、放弃政治活动，也主动作了一些让步。创办党报、党刊的协议终于达成了，“火星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②历史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报纸《火星报》和理论刊物《曙光》杂志创始人和主持者之一的重任，落在了普列汉诺夫的肩上。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份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创刊号，在德国莱比锡城出版；自第二期起移到慕尼黑城出版。后来由于警察的迫害，委托的印刷所不敢承担印刷任务，又必须另选新地址。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主张迁往瑞士，而多数人赞同迁往英国，于是该报从一九〇二年四月起在伦敦出版。后因“劳动解放社”又提出把《火星报》迁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309—310页。

② 同上书，第311页。

移到瑞士，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只有列宁一人反对，所以《火星报》自一九〇三年五月起又迁到日内瓦继续出版。在编辑部的六个编委中，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实际上是主编。编辑部长期分设两处：慕尼黑或后来的伦敦分部由列宁领导，日内瓦分部由普列汉诺夫领导。前期列宁是第一把手，普列汉诺夫是第二把手；后期编辑部迁到日内瓦后，尤其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普列汉诺夫已成为第一把手。加上他当时的声望比列宁高，影响比列宁大，所以长期以来，国外一直有人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火星报》的主编^①。当然，从创办和主编《火星报》的全过程来看，列宁起的作用比普列汉诺夫要大，我们认为说普列汉诺夫协助列宁办报是符合实际的。

普列汉诺夫住在日内瓦，除了亲自先后去过慕尼黑和伦敦的《火星报》编辑部外，主要通过频繁的通信同编辑部的其余成员交换意见。其中多数信件是寄给列宁的。说来也很有意思，“列宁”这个名字最初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一九〇一年一月三十日从慕尼黑给普列汉诺夫写信时第一次使用的，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起才成为他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普列汉诺夫对于寄给他审查的那些稿件，认真地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当列宁因此写信感谢他时，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初回信给列宁诚恳地表示：“您不用谢我，因为我把您的事看作自己的事。”^②普列汉诺夫在给列宁的另外的信中，曾赞扬《火星报》“是一份很好的报纸，我百看不厌”^③，又指

① 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于一九五二年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写的“题解”中还提出“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参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版，第63页）。

② 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8辑，第131页。

③ 见上书，第138页。

出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刊载的经济方面的文章太少”^①，他积极建议把报纸办得更好。

他还很注意《火星报》编辑和通讯员的任用。列·达·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自一九〇二年十月到达伦敦后积极为《火星报》撰稿。列宁鉴于这种情况，于一九〇三年三月曾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报纸的编辑部，任第七名编委。普列汉诺夫表示反对，他认为，托洛茨基的文章“讽刺性并不强，很少实质的东西，更多的是哗众之声。”^②结果只允许托洛茨基参加编辑部会议，没有表决权。

除了主持编务外，普列汉诺夫还不断亲自为《火星报》撰稿。从一九〇一年二月出版第二号起，至一九〇三年十一月第五十一号为止，即在旧《火星报》上，共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三十八篇文章^③（列宁发表了五十七篇），有的长篇文章是在报上连载的。列宁曾把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论文，例如《连环保的废除》、《沙皇制度的最后一张牌》等，作为报纸的社论发表。普列汉诺夫在为《火星报》写的社论中不仅激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而且也坚决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正是他在为《火星报》第二号写的社论中，第一次把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两个派别，比做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到一九〇七年，列宁还特别提到“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④。

普列汉诺夫把部分精力花费在为《火星报》审稿和写文章的同时，把主要心血用在《曙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上。在他看

①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9辑，第72页。

②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1辑，第197页。

③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说是37篇（见俄文本第174页，中译本第212页），我们据《普列汉诺夫全集》等统计应是38篇。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8页底注①。

来，“创办《曙光》杂志就是为了保卫正统思想”^①，“《曙光》杂志所具有意义不比《火星报》小”^②。该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在德国斯图加特城出版，先后共出版了四期（三册）。普列汉诺夫不仅审阅了全部文稿，而且为它撰写了十七篇论文^③。列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五篇著作。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篇数首屈一指，而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则遥遥领先。普列汉诺夫还为办好这个杂志，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他建议杂志要多刊登些关于各国社会党人活动的述评，以利于各国社会主义者交流革命经验。

在创办《火星报》不久，普列汉诺夫就以《火星报》为阵地积极投入了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斗争。社会革命党是一九〇二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拼凑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把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与修正主义的谬论杂烩在一起，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联邦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政治自由，口头上还声称要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地位。但是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民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绝对拥护者，而看不到农民中间的阶级分化。他们拒绝开展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搞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冠冕堂皇的词句，加上谋刺沙皇官吏的恐怖行为，迷惑和吸引了一部分缺乏革命斗争锻炼和社会经验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大学生，甚至工人。为促使俄国革命斗争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冒险主义的策

①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8辑，第144页。

②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9辑，第72页。

③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说是20篇（见中译本214页），我们据《普列汉诺夫全集》等统计为17篇。

略。以批判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闻名的革命战士普列汉诺夫，很快认清了社会革命党这个民粹派无能后裔的反动实质。他早在一九〇二年六月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就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已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敌人。《火星报》编辑部一致决定出版批判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小册子。列宁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请他写一本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小册子，彻底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革命事业的危害。他写道：“其次是关于批驳社会革命党人那本小册子的事。列·格里·（即捷依奇——引者注）给我说过并写信告诉过您，最好由您来写，因为您除了给予‘教条主义’的批评外，还能与七十年代加以历史对比。我完全同意列·格·（即捷依奇——引者注）的意见，这种对比非常重要；我对写这本小册子当然无能为力。总之，如果您能写这本小册子我是非常高兴的。”^①列宁并希望普列汉诺夫给予答复。

普列汉诺夫在写作上有个习惯，在发表长篇论文和著作之前，先以所著的提纲为线索作公开讲演，了解听众的反映，以便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为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他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和一九〇三年一月在日内瓦作了三次题为《无产者和农民》的报告，以后在瑞士其它一些城市又作了同一内容的报告。

一九〇三年二月初他给列宁回信说：“小册子，我在写。现在正写‘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一章，我想将其一部分以小品文形式登在《火星报》上。”“（我想给小册子定名为：《我们的分歧》。第二部分。）然后出第二部分：第一章：农民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章：恐怖主义；第三章：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第四章：结束语。”^②可惜小册子没有写完，但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15页。

② 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1辑，第198页。

长文《无产者和农民》却在《火星报》上连载了。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他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作出的又一贡献。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期间，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观点趋于一致，但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在编辑部讨论列宁揭露与批判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反动性的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时，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订立暂时联盟时，普列汉诺夫主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认为语气应该缓和些，以便于读者接受。他于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四日给列宁写信说：“我极其仔细地阅读了您的文章，现在说说我的意见。您对P·H·C·先生（指司徒卢威——引者注）的批评完全正确。但是，……，语气还得再缓和点。理由如下。在您的批评中有我们非常了解的那种愤激情绪。但是读者对这种愤激情绪可能不理解。我的意见，批评时不要激动”^①。总的看来，这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还是合作共事得很好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还谈到：“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间，在……老《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订立过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②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根据列宁的建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和法国的巴黎等许多城市，举行集会纪念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前，普列汉诺夫作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8辑，第14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

为一个二十岁的民粹派革命青年，参加了在彼得堡喀山广场的集会游行，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在庆祝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之际，从俄国和欧洲各地纷纷给普列汉诺夫发来了贺信和贺电，庆祝普列汉诺夫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击民粹派、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修正主义、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等方面，为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列宁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自德国慕尼黑城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名义写了贺词。贺词写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深湛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视野、丰富的革命经验”，“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劳动解放社’的联系”^①。

在瑞士日内瓦的庆祝会开得特别隆重。会议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汉德维克大厅举行，普列汉诺夫应邀莅临。会场里坐满了俄国的革命者、大学生和一些外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好些人在大会上发言，强调了普列汉诺夫为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当邀请普列汉诺夫讲话时，会场里长时间掌声雷鸣。普列汉诺夫走上讲台，环视了寂静下来的会场，开始说：

“我是平生遭到很多咒骂的那种人。……但是，今天在我参加的大会上，不仅没有人骂我，而且如此过分地夸奖我，以至于使我愧不敢当。”“别人的支持，特别是青年人的支持，对每个社会活动家都是必需的。每个社会活动家都知道，都会感到欣慰，因为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年青的同志们将在他的岗位上继承他的事业。我不想先说好话，后说坏话。请你们记住，用李卜克内西的说法，当说到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我不是四十五岁，而是两个二十二岁半。”“在喀山广场上，除了我，还有好几百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288页。

人，其中有很多人在当时遭到了异常严厉的惩治……。自豪感和对敌人的藐视，使我们倍感心满意足，并且把我们每个人变成顶天立地的巨人”“而当人们受到这些思想鼓舞的时候，那末这成为与众不同的幸福。”^①

普列汉诺夫在讲话中批判了经济派的谬论，展望了俄国革命的美好前景：“根除这些病害（指的是修正主义——引者注）的唯一良药就是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样就易于弄清问题。只有科学能帮助弄清问题。但是不要只停留在科学上，应该面向生活和实际。科学和工人相结合就能办成一切事情并扫清所有障碍。俄国沙皇不必学会算卦，便能知道自己死辰将至，在劫难逃。”^②

普列汉诺夫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大会把一个皮包献给普列汉诺夫留念。他深情感激地接受之后，饶有风趣地说：“在座诸位可以相信，这个皮包永远不会成为部长的皮包。”显然这是向大家表示，他绝不会象米勒兰之流，覬覦资产阶级政府部长的肥缺。

庆祝会结束之后，人们还长久地在日内瓦大街上散步，议论俄国革命的问题。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创办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把它们称之为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它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把搭起架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广大党员。它们通过遍布国内各地的通讯员，加强了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高兴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64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而认真地阅读每一篇反映工人状况的通讯。仅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二年三月，报上就发表了一百一十篇关于工人状况的通讯稿。它们通过各地的代办员，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之间的联系，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逐渐摆脱了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成长为有坚强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充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指导者和组织领导者。

第二节

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俄国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引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于一八九八年宣告成立，但没有制定出正式的党纲。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竭力歪曲和篡改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要把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后卫队。因此，当时能否在俄国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出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的适合俄国国情的纲领，不仅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奋起批判修正主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正确的建党路线，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普列汉诺夫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为“劳动解放社”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但是他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思想涣散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抓紧制定党纲的工作。列宁对这项工作则十分重视。一八九五年底和一八九六年初列宁在彼得堡狱中时，就先后写了《党纲草案》和对党纲草案的解释——《党纲声明》，并转送给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一八九九年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

时，又起草了第二个党纲草案——《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并将这个草案转送给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在他写的这些党纲草案与文章中，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初步勾画了轮廓。列宁认为，应该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式的党纲。这个党纲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对1891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等著作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于一八九一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它要反映俄国的特点，要科学地分析俄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和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等。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拟定的两个纲领虽然存在某些缺点与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拟定党纲的可贵尝试。所以这次《火星报》编辑部面临起草党纲的任务时，列宁首先想到他一向很敬重的普列汉诺夫。为了发挥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保证新拟定的党纲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列宁的建议，《火星报》编辑部委托普列汉诺夫起草党纲的理论部分，列宁起草党纲的土地问题和结尾部分。一九〇一年列宁多次自慕尼黑给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普列汉诺夫担当起这项工作，并将刊有恩格斯的文章《对1891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的《新时代》杂志寄给了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因为忙于写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二篇长文，而未能马上动手。到一九〇一年十月他便开始起草党纲。一九〇二年一月初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一个党纲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①。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根据列宁的提议，《火星报》编辑部在德国慕尼黑城集体讨论了普列汉诺夫所拟定的第一个党纲草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他们俩之间在党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3—9页。

纲草案的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火星报》竭力工作着，它的影响不断增长。它为代表大会拟好了党纲。为了讨论党纲，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到慕尼黑来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起草的党纲初稿中的几个地方进行攻击。查苏利奇不十分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也不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阿克雪里罗得在某些地方也同意列宁的意见。会议进行得很沉闷。查苏利奇想反驳普列汉诺夫，但普列汉诺夫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交叉着两手注视着她，把查苏利奇弄得不知所措。问题弄到非进行表决不行了。表决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赞成列宁意见的阿克雪里罗得声称头痛而要去散步。”克鲁普斯卡娅接着又回忆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他和普列汉诺夫的任何争吵都感到非常难受，夜里睡不着觉，焦急不安。而普列汉诺夫则又生气又发火。”^①

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草拟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呢？我们认为，它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第一，它指出了俄国社会经济的特点。纲领草案在提到“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中占统治地位”^②之后，写道：“我国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可怕地压在全体劳动居民身上，是俄国工人运动胜利途中一切障碍的最大障碍。”^③

第二，它指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纲领草案写明：俄国社会民主党“追求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目的。它向工人揭露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向他们解释即将由无产阶级完成的那个社会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6卷，第8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8页。

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并组织他们的力量来同他们的剥削者进行不断的斗争。”^① 纲领草案还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君主制度。”^②

第三，它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纲领草案写道：“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和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完成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自己掌握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他们能够无情地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③

第四，它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纲领草案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做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④ 纲领草案还指出：“由于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伟大的目的只有靠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力量才能达到。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⑤

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和缺点。

第一、没有指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只字未提工农联盟在俄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第二、错误地断定，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已占居民的大多数。

第三、纲领草案的用语，“说得太不大众化，太抽象。”^⑥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6卷，第7—8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9页。

③④⑤ 转引自上书，第7页。

⑥ 同上书，第4页。

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整个看来，应该说还是一个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革命的纲领草案。但鉴于有上述毛病，列宁认为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党纲草案，需要对它做进一步修改。一九〇二年一至二月间，列宁亲自动手起草了一个党纲草案。这个新的党纲草案，理论原则部分是由列宁根据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第一个党纲草案修改后写成的，而实践部分是由整个编辑部的五个委员提出的^①。一九〇二年二月七日，列宁把这个新的党纲草案分发给编辑部的五个委员，准备和普列汉诺夫的党纲草案一起讨论。普列汉诺夫自尊心太强，他对此极为不满，甚至扬言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为了避免《火星报》编辑部的分裂，在对普列汉诺夫的党纲草案全面地、详细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之后，主动要求不再讨论自己起草的党纲草案，让普列汉诺夫重新修改他起草的党纲草案。

普列汉诺夫在修改自己的党纲草案时，接受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中的实践部分，拒绝采纳其理论原则部分。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二日，普列汉诺夫拟定出第二个党纲草案。列宁随即对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第二个党纲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党纲草案同第一个党纲草案相比，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列宁认为，这个党纲草案从形式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缺点。

第一，许多地方写得非常抽象，不是为战斗的党准备的党纲，“而是一般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教科书的提纲”^②，“并且是教授一年级学生用的教学提纲，其中所谈的只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还不是俄国的资本主义。”^③由于这个主要缺点，还造成了大量重复，叙述冗长，使纲领变成了说明。这个批评很重要，它

① 这个纲领草案的全文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10—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42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正说明了普列汉诺夫脱离实际的书生气。

第二，对无产阶级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关系叙述得不正确。例如，在草案中只写小生产者的革命性，而没有指出他们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更没有强调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用“‘无产阶级在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其他居民阶层的支持下即将完成的革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还用‘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斗争’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

第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果的说明写得特别抽象，只提到“增加争取生存的斗争的困难和一切与此斗争有关的困难和苦难”。列宁认为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特别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身上的“各种屈辱”，诸如卖淫、把知识分子变成普通的雇佣工人，使工人鬻妻卖儿等等。同样列宁还认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列宁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穷苦和贫困，但是完全赞同在党纲中应该把反对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群众的贫困化作为党要求的内容^②。

第四，党纲草案没有指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普列汉诺夫在党纲草案中提出的“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的说法，模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列宁指出应当用“工人阶级”一词去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应阐明党不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般组织，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③。

第五，党纲草案用“剥夺剥削者”代替“消灭（或废除）私有制”是不恰当的。其中关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的提法，“也不恰当。这还不够”^④ 列宁主张应明确写上：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生产，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3页。

② 参见上书，第31页。

③ 参见上书，第33页。

④ 同上书，第37页。

“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①只有这样才正确说明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

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草案由于存在这些缺点，列宁认为“它根本不能被采用。”^②

列宁自己另拟定了党纲草案的土地问题部分。他在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三月上旬，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阐明了对党纲草案的土地问题的基本观点。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斗争开始时，必须提出把“割地”（即在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时地主从农民份地中割去的那部分土地）归还给农民。在推翻沙皇统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完全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列宁指出只有实现土地国有化，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才能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化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特点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它有利于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利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普列汉诺夫主张容许农民去赎买土地，提出了以向大地主征收的特别款项去赎买土地的方案。他错误地认为：归还“割地”的土地纲领已完全地和充分地表达了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求，如果把土地国有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则是反动的，因为土地国有化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才能实现。列宁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初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自慕尼黑寄给了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和《火星报》编辑部其他成员都反对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这突出表现在编辑部讨论列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42页。

宁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发生的激烈争论上。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此篇著作中关于土地国有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论点，要求列宁缓和同马克思主义敌人论战的气氛，按照他对土地国有化的错误观点去修改文稿。列宁发言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主张，严词拒绝修改文章，坚持土地国有化的观点。因《火星报》移到伦敦出版，列宁于四月初到达伦敦。当他得知普列汉诺夫在编辑他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过程中，以粗暴的口气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时，于五月十四日自伦敦写信给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严重抗议。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火星报》编辑部还是删去了有关土地国有化部分以及其它某些段落。后来，当普列汉诺夫读到刊登有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文章的一九〇二年八月出版的第四期《曙光》杂志时，“他在文章的空白地方写满了脚注，在这些脚注里发泄了他的愤懑，然后把杂志还给了查苏利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见这些脚注以后，十分激动不安。”^①

为了制定一个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能同意的党纲，《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新党纲的协商委员会。为此，通过了“协议案”，它指出在新的党纲草案中要写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是，结果协商委员会起草出来的党纲，又重犯了普列汉诺夫第二个纲领草案中的错误。列宁希望起草一个正确、完整的党纲草案。列宁认为，实在没办法，就建议发表他和普列汉诺夫分别拟定的党纲草案，供大家对照讨论。由于列宁坚持斗争的结果，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二至十五日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的《火星报》编辑部会议上，委员会提出了与以前根本不同的新的党纲草案。列宁先后提出百余条的修改意见。新的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54页。

党纲草案采纳了近九十条^①。新的党纲草案明确写上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彻底革命的纲领，这是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纲领的新党纲。这个新的党纲草案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一号《火星报》和一九〇二年八月第四期《曙光》杂志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视。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制定党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意见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时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普列汉诺夫拟定党纲草案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长期的侨居生活使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的国情了解得不透彻，因此在他起草的党纲中，就不能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作出正确的论断，不能对俄国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只能写一般的原则。普列汉诺夫这次起草的党纲，同八十年代初为“劳动解放社”起草的纲领草案相比，虽然除了在农民问题这样一些个别问题上有所倒退外，基本上坚持了八十年代初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的观点。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革命斗争在发展。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初为“劳动解放社”制定的纲领草案，是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马克思主义纲领作了最初的尝试，那末在二十世纪初制定的党纲仍停留在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那就显得太抽象、太落后了，其缺点、错误就十分明显。但也不能说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一无是处。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列宁在拟定党纲草案时还以普列汉诺夫的党纲草案初稿为基础呢？我们还应看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党纲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毕竟还是两个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可以说是两位俄国

^① 这个新的党纲草案的全文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55页。

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虽然这种意见分歧几乎断送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革命友谊关系，但终究由于彼此尊重、互相谅解，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他们二人继续团结在一起，献身于俄国革命事业。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普列汉诺夫在拟定第一个党纲草案时，就已明确写上。在第二个党纲草案中，由于疏忽而偶然地漏掉了^①。在后来的党纲中写上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绝非象过去所说，仅仅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列宁自己在一九二〇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也开诚布公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拟定党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道：“如果要谈理论的话，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由《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拟定并且经过这个编辑部订正、修改和定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在俄国范围内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党纲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反对伯恩施坦、反对机会主义才提出这个问题的。”^②

第三节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

《火星报》自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德国莱比锡城出版以来，已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列宁、普列汉诺夫等利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已逐渐紧密地团结在《火星报》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编辑部的周围。通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撰稿、出版和发行工作，密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之间的组织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思想动摇、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得到了克服。经过《火星报》所做的大量周密的准备工作，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从一九〇三年四月起，《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们就首先来到了日内瓦，为大会做准备工作。接着代表们也陆续到达日内瓦集中。普列汉诺夫夫妇忙着接待来自俄国的客人，安排他们的食宿。后来负责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决定把代表大会移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七月间，代表们云集布鲁塞尔。比利时社会党人为了保密起见，便向俄国的战友们建议，大会不要在人民宫召开，而要把会场设在一个装面粉的仓库里。

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秘密开幕了。临时搭了个讲台，讲台旁边的大窗户用红布遮着。代表大会在开了最初的几次会议之后，由于比利时警察局的干预，于是不得不移到英国伦敦继续举行，直到八月二十三日结束^①。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十三名代表，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②，代表着俄国各地的二十六个组织，其中包括：“火星报”组织、“俄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在《普列汉诺夫传》第二章中说：“代表大会一直开到8月6日”（中译本第233页），在第三章中又说：大会8月23日结束（中译本第245页），前后不一致，前说不对。

② 代表大会的43名代表，拥有51票表决权。其中：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坚定的火星派，拥有24票表决权；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不坚定的“温和的”火星派，拥有9票表决权；3个经济派分子和5个崩得分子组成的反火星派，即机会主义派，拥有8票表决权；还有拥护“南方工人社”、动摇于火星派与反火星派之间的中间派，列宁把它叫做泥潭派，拥有10票表决权。

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南方工人社”，十四个地方委员会，四个社会民主主义同盟以及彼得堡被经济派控制的工人组织。

普列汉诺夫登上讲台，庄重宣布大会开幕，并豪情满怀地致了开幕词。他说：“同志们，组织委员会委托我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开幕。我自己这样解释给予我的这个崇高的荣誉：组织委员会想通过我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老战士们的那个团体表示同志般的支持，这个团体（指“劳动解放社”——引者注）在二十年前，即一八八三年在俄国革命书刊上首先开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于这种同志般的支持，我以所有这些老战士的名义，向组织委员会表示真诚的同志式的感谢。我相信，至少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注定会更长久地同新的、年轻的、越来越多的战士一起战斗在红旗下。”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革命的前程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他为当时俄国出现的革命大好形势欢欣鼓舞。他在开幕词中继续说到：“我说过，形势现在对我们党非常有利，这些话好象有些夸张，因为在最近五年中，自己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混乱现象，不团结和意见不一致。这些混乱现象、不团结和意见不一致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是严重的和令人痛心的。但是它们不妨碍我们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在俄国所有现有的革命的和在野的政党中，成为最强有力的政党。尽管在我们中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和不团结，我们仍然不仅已经取得了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且已经获得了很多巨大的实际成就。二十年前我们微不足道，现在我们已经是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当然，我说到这点时，指的是在俄国范围内。”普列汉诺夫最后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他说：“我们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的力量是由对我们有利的局势形成的。这是自发状态的力量。我们应当使这种自发的力量得到

自觉的表达。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正如你们见到的那样，我们的代表大会面临着许多重大和艰难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重大和艰难的工作将会顺利完成。而这次代表大会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构成一个时代。我们是有力量的，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将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我宣布大会开幕，并建议选举主席团。”^①

为了领导大会的工作，选举了大会主席团，普列汉诺夫当选为主席，列宁和彼·阿·克拉西柯夫（一八七〇——一九三九年）当选为副主席。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②。代表成份复杂，政治倾向不一，决定了大会必然要在党纲、党章等重大问题上，展开马克思主义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

普列汉诺夫担负起主持大会的工作。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他却精神焕发，不知疲倦。他除主持大会外，还在大会上就如下问题做了发言：关于党纲，关于党纲的意义，关于党章，关于党的纪律，关于不妥当的行为和民族狂热，关于革命的利益是最高法律，关于免费教育，关于割地和赎金，关于边区，关于自由派等。他同列宁一起提出并通过了关于自由派的决议。他和列宁还提出了《关于宗派主义者的机关报的决议案》。他和捷依奇等十人提出并被通过了《关于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决议》。他自己单独提出了《对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决议的修正案》。普列汉诺夫每天很晚才回到宿舍，累得长久不能入睡。普列汉诺夫这种饱满的革命热情，受到代表们的赞扬。但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有时摆老资格，孤芳自赏，使人难以接近。他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411—4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

的这种举动，和列宁那种无拘束地同代表们倾谈，互相探讨要解决问题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在大会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旗帜鲜明地坚决同列宁站在一起。在大会上，他们俩思想上互相接近，工作上彼此配合。这也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会最重要的事情是讨论党纲。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同意以《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为基础。但具体涉及到在党纲中应写明那些问题时，斗争就非常激烈地展开了。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一八七二——一九二一年）和亚·萨·马尔丁诺夫（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年）、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一八八〇——一九三七年）等，主要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条文写入党纲。他们把专政看成是同民主原则不相容的，主张基本民主原则具有绝对价值，要求党的政策服从基本民主原则。普列汉诺夫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他说：“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每一个民主原则，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末不去进行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制的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可以设想，可能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不是过两年解散它，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①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时还把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二大上的上述精采发言概括为“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68—169页，转引自《列宁文稿》第3卷，第11—12页。

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①他当时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②。又说：“他在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纲的时候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③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精辟论断当年在党的二大上曾引起机会主义者发出“反普列汉诺夫的叫嚣”^④。可惜普列汉诺夫后来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十月革命后他叫嚣，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反对解散立宪会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在讨论党纲问题时，经济派首领马尔丁诺夫还掐头去尾地引用列宁的名著《怎么办？》，反对此书中所论证的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鼓吹工人阶级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尽管认为，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在某些地方论述得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出面维护列宁的著作，批驳马尔丁诺夫的攻击。他说：“马尔丁诺夫同志引用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须知恩格斯的话是一般原理。问题是谁第一次表述了这个理论用语。列宁不是写了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而是写了反对经济派的论战文章。经济派说：我们应等着瞧：工人阶级自身如果没有‘革命霉菌’的帮助，将会得到什

① 《列宁文稿》第8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1页。

④ 见《列宁文稿》第1卷，第251页。

么。‘革命霉菌’被禁止向工人谈论什么，因为它是‘革命霉菌’，也就是说在它那里存在有理论觉悟。但是如果你们消除了‘霉菌’，那末就只剩下一个没有觉悟的群众。应该从外面向没有觉悟的群众灌输思想。如果你们想公正地对待列宁并精心阅读他的全部著作，那末你们会看见，他正是说到这点。例如，他说到工会斗争时，发挥了这种思想：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为改善劳动力出卖条件的直接斗争的范围以外去灌输。”^①普列汉诺夫斥责马尔丁诺夫没有认真阅读、全面掌握列宁的著作《怎么办？》。他针对马尔丁诺夫妄图摘引片言只语来全盘否定列宁的作法，饶有风趣地指出：“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监察官。这位监察官曾经说：‘给我一本《我们在天之父》并允许我从那里摘出一句话——那末我就能向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本该被绞死。’”^②他的这个发言，受到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分子的热烈欢迎，同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最后，大会除一票弃权外一致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党纲，并对制定这个党纲的《火星报》编辑部表示感谢。大会所通过的党纲，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制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分别规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基本任务。这个党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③。普列汉诺夫为坚定的火星派在党纲问题上取得的斗争胜利感到高兴，他在大会上对党纲的讨论做了总结。他说：“同志们，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从今以后有了自己的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415—416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125页。

③ 全文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41页。

纲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自豪地说，我们所通过的纲领，为我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同敌人斗争的可靠的和坚固的武器。”

在代表大会上，另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党章。在确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党员的党章第一条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有两个互相对立的条文：一个是由列宁提出而为普列汉诺夫和坚定的火星派支持的党章条文，一个是由马尔托夫提出、由一切机会主义分子支持的党章条文。列宁的党章条文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②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虽认为每个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但却未把参加一个党的组织作为一个党员的必要条件，认为不参加组织而只是用某种方式（例如在财政上）帮助党的人也可以成为党员。按照列宁的党章条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的组织、钢铁般的纪律、坚强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能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只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变成为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成分复杂，因而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一般工人群众组织。正象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变成党员！”^③。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发言，坚决批判了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他指出，马尔托夫的饶勒斯主义条文是给那些只渴望既在党内又置身于组织以外的机会主义者敞开大门。在发言中，阿克雪里罗得援引“土地和自由社”和“民意党”为例子，为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辩护。普列汉诺夫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指出：“我们无需仿效七十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是要摆脱那种状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425—426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1—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457页。

态。”^①他高度评价了列宁的党章条文，说：“关于这一点谈得越多，我越注意深入研究双方的发言，就越使我坚信，真理是在列宁一边。”^②普列汉诺夫阐明，只有列宁的党章条文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他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列宁的提案一通过就会对多数工人关上我党的大门。希望入党的工人并不害怕加入组织。纪律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许多从头到脚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倒是有些害怕加入组织。但这倒是个好现象。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都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倒是应该使他们离自己远些。列宁的提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侵入我党的保证，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们都应该投票赞成这一提案。”^③但是在最后表决时，因为经济派分子、崩得分子、“温和的”火星派分子和中间派都支持马尔托夫，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以二十八票通过，而列宁的党章条文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二十二票，未被通过。但是列宁提出的党章的其余条文，均以多数票通过。《火星报》编辑部第一次分裂了。“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也第一次在原则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了：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的党章条文，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支持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

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关于对待自由派态度的决议：一个是波特列索夫拟定的，另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提出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提出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决议阐明了无产

^{①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发言记录(摘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见《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第42、41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发言记录(摘译)》，见《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第42页。

阶级政党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应持的正确立场。决议指出：“考虑到：

（一）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革命的，或仅仅站在反政府立场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资产阶级；

（二）因此社会民主党就应该欢迎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应该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不论这些局限性和不充分性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定期代表大会坚决劝告全体同志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使工人们注意彼·司徒卢威先生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趋向所具有的反革命性质和反无产阶级性质。”^①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站在一起，强烈反对波特列索夫提出的关于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临时协定的决议案。波特列索夫在这个决议案中企图美化自由资产阶级，模糊无产阶级意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提出的对待自由派态度的决议中，对于司徒卢威的“解放社”的政治立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团体后来构成了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代表大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前，在代表的成分方面，发生了有利于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的显著变化。因为大会否决了崩得分子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要求，于是五个崩得分子的代表退出了大会；又因为代表大会拒绝承认经济派分子把持的那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作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于是两个经济派分子的代表也退出了大会。因此，在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力量的对比上，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占据了优势。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0页。

代表大会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认为，必须把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选进党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等人则竭力想使不坚定的“温和的”火星派分子和中派分子把持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大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部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总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无形中形成为一派；而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则是另一派。列宁建议增选克拉西柯夫进编辑部，以打破僵局，但这只是临时措施。在大会选举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编委前，列宁根据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不经常参加报刊的编辑工作并很少给报刊写文章的情况，为了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他提议把《火星报》的编委由原来的六人改为三人。列宁拟定了“代表大会选三人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并在大会前通知了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他们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他们认为，这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为了对付普列汉诺夫的。列宁也把这个计划交给了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一句话没有说，读完后默默地放到口袋里去了。他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同意了。既然是个政党，那就需要切实的工作。”^①可是到大会要选举《火星报》编委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已经完全站在列宁一边，而马尔托夫则已与列宁分道扬镳，所以如果编委会还是只选三名编委，那末马尔托夫在编辑部中必然陷于孤立；只有把原来的六名编辑都选上，拥护他的人在编辑部里才能占多数。因此，马尔托夫改弦更张，由原先同意选三名编委，改为提出维持原来六名编委的方案。托洛茨基也附和这个方案。于是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在八月二十日的大会上，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马尔托夫的计谋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79页。

终于破产了，他就拒绝担任编委。于是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委托已被选为《火星报》编委的两名成员——列宁、普列汉诺夫，在他们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加聘之为编委会第三名成员。

代表大会还选举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一八七八——一九一三年）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都是拥护列宁的。

按照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设立党的总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解决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之间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党章规定，党的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除第五名委员由大会选举外，其余四名委员由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各提出两名，不必经大会批准。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五名委员和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则代表《火星报》编辑部参加了总委员会。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成立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和经济派分子执行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一起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驻国际局的代表。但是后来，克里切夫斯基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委任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撤销了原先由普列汉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共同担任代表的决定。

从这时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拥护列宁的人因为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获得多数，于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即多数）；反对列宁的人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意即少数）。布尔什维克坚持和逐渐形成的理论体系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孟什维克主张和逐步系统化的理论观点称为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划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两个对立派别划分在俄国的继续与发展。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普列汉诺夫也是站在列宁一边的。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他提醒代表们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一切党员都必须遵守的。

捷依奇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劳动解放社”发言。鉴于大会的召开，该社已无存在必要，所以正式宣布解散。

“劳动解放社”自一八八三年成立以来的二十年间，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俄国制定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纲，选举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对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胜利闭幕，标志着在俄国开始建立了一个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有原则区别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在列宁的督促下参与了党纲的起草工作；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列宁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谬论。可以说，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功勋卓著。列宁早在一八九九年就称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①。斯大林后来也仍然把普列汉诺夫列为“党的几位老的首领、党的几位创始人”^②之一，称他为“列宁的战友”^③。可惜在二大后不久，他就同列宁分道扬镳了。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

第八章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陷入 机会主义

第一节

从支持布尔什维克到转向孟什维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会后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根本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张把俄国党建设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孟什维克则主张以受了机会主义熏染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为榜样，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政党，在党内容许各种思潮和派别组织的存在。这些就是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两条建党路线斗争分歧的实质所在。这些分歧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党纲和党章问题上，在会后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孟什维克不甘心于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遭到的失败，背着党暗中成立了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托洛茨基为头子的反党派别组织。他们想

以其控制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为据点，在组织上大肆进行分裂活动，恣意践踏党的二大所通过的决议，妄图进而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明目张胆地要挟布尔什维克，硬要把在党的二大上落选的原《火星报》编委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三人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并提出要把孟什维克的代表补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使他们的人在《火星报》编辑部里占据多数，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与布尔什维克的人数相等。孟什维克在理论上拼命鼓吹机会主义的组织观点：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反对民主集中制。他们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污蔑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把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攻击为奉行“农奴制”，把党员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如果按照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去建设党，就会使党组织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的差别消失，使党成为工人运动的尾巴。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反映了那些不愿意参加党的组织和活动、不愿意受党的纪律约束而只想挂上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反映了当时第二国际中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社会党的共同弱点：没有统一的纪律，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原则，否认党对工会等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因此，几乎所有的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一些著名人物，都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在他们的报纸上歪曲地报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与尖锐斗争，反对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俄国侨民亚·拉·帕尔乌斯（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公开煽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们同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接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于一九〇四年五月亲自为孟什维克的报纸《火星报》写文章，诬蔑列宁把孟什维克的三个编委开除出（实际上是在党的二大上落选）《火星报》

编辑部，掩盖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为孟什维克阴谋篡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权帮腔。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激烈斗争要求普列汉诺夫作出抉择。一方面，他心里清楚，是他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是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制定了党纲，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如果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就离开了曾和他一起并肩战斗、而又互相尊重的战友列宁，就等于践踏自己亲自投票同意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如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就意味着抛弃共同工作多年的老朋友马尔托夫等人。因此他时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不能同马尔托夫等人调和吗？普列汉诺夫“脚踩两只船”，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好，思想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是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八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直到十一月发表文章《不该这么办》时为止这三个月之间思想活动的特点。但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基本上还是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留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定期开会。在这些会议上，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最不调和的立场。他愉快地谈笑并鼓励大家。”^①可见这时普列汉诺夫还是坚持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火星报》编委由三人组成的方案，本来是为了提高党报的工作效率，使编委更精干些。但是原《火星报》编委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也是老一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属于党报创始人之列，在党员和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工作量比不上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然而他们为办好党报也是出了大力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84页。

的。现在改为只设三个编委，结果使他们三人落选，这在当时是不利于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团结的。

为了保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结，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准备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尔托夫等人作些让步。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员诺斯科夫商量，在保证《火星报》编委有两人（其中有一人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参加党的总委员会的条件下，主张把原《火星报》的四名编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都补选上。可是这个方案刚一提出，就被马尔托夫等人拒绝。九月二十五——二十八日，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代表唐恩谈判两派缔结和好协定的条件，然而毫无进展。十月四日，列宁、普列汉诺夫、林格尼克再次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谈判争取达成和好协议，会议开了三个多钟头。这时普列汉诺夫的主张有变化，他在会上反复说明把落选的原《火星报》的四个编委都补选上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提议只补选其中的两人，以便少数派和多数派在编委会中取得平衡，马尔托夫等人也不同意这个提议，结果谈判以失败结束。列宁、普列汉诺夫又代表《火星报》编辑部邀请四名旧编委为该报撰稿，仍遭拒绝。接着他们于十月六日给马尔托夫写信，还给《火星报》旧编委及托洛茨基写一封信，建议他们参加《火星报》的工作。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敬爱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得不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工作一事正式表示惋惜。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一闭幕立刻就邀请你们，之后又多次邀请你们参加工作，可是我们始终没有从你们那里收到任何一篇作品。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参加工作丝毫不是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

我们之间有某种意见分歧，那我们认为详细说明这种意见分歧对于党是非常有好处的。不但如此。我们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意见分歧的性质和深度。”^①

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等人接到信后，写了不到三行字的回答，表示他们不愿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马尔托夫给《火星报》编辑部复一封长信，信中声明：“我认为用不着再来协商我们在一个机关报共同工作的问题了”^②。布尔什维克为了两派和好，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均因孟什维克没有诚意而未奏效。孟什维克胃口越来越大，不但想把《火星报》的编辑大权夺到手，还想控制党中央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激烈、僵持不下的形势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开幕了，会议一直继续到三十一日。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由列宁发起在一九〇一年十月为反对经济派而成立的，包括《火星报》、《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份以及“劳动解放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它的成员大部份是旅外的知识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孟什维克在同盟的领导机构中已占据多数，这次大会就是由他们策划召开的。他们想借着讨论列宁在会上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机会，攻击布尔什维克，进而全面控制同盟。布尔什维克准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揭露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期望：通过这次同盟代表大会，消除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昔日是同经济派决裂的产物，今天却变成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战场。列宁在同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7卷，第346页。

② 同上，第347页。

盟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在大会会上发言，诽谤列宁实行“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坚持“官僚主义”等等。克鲁普斯卡娅描绘了孟什维克在会场上围攻列宁的疯狂情景。她写道：“在‘同盟’代表大会行将召开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骑自行车上沉思，因而撞到电车上去了，几乎把眼珠撞出来。他扎着绷带、脸色苍白地出席了‘同盟’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怀着仇恨心疯狂地向他进行攻击。我记得一个野蛮的场面——唐恩、克罗赫马尔等人的怒气冲冲的面孔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跳了起来，疯狂地敲打着会议桌。”^①

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坚决支持列宁，有力地驳斥了马尔托夫、托洛茨基诬蔑列宁搞“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等谬论。他说，“托洛茨基同志建议不要滥用象‘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这样的词。无论这个建议可能是坏的或者是好的，他都应当尽量避免象‘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官僚主义’和其他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同我使用的那些说法相比，是更不适当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使用‘无政府主义’，而却可以使用‘官僚主义’和‘昏聩刚愎的大官’。哪种说法更坏些、更尖锐些呢？在这种场合不由地使人回忆起这样一个野蛮人，这个野蛮人在回答辱骂谁的妻子好的问题时回答说：‘辱骂我的妻子不好。而辱骂别人的妻子才好’。”^②

当捷依奇竭力攻击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时，普列汉诺夫马上给予抨击，并指出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说：“我不怀疑，捷依奇同志善于猜测。尽管他从来也没滥用这些本领。我不知道他心里猜测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材料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8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368页。

无法加以审核，甚至我也没法断定它正确与否。不乐意使用‘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乐意使用‘侮辱陛下’、‘昏聩刚愎的大官’……党应该是统一的和不分离的，如果我说出的这个意思使捷依奇同志惊奇，那末这证明，他没很好用心猜测。我主张采纳科尼亚金（即列·叶·加尔彼林——引者注）同志的决议案。以便再次确认我们的统一。为了表现出我们的统一，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作为一部份应该从属于整体。”^①

由于在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占绝对优势，所以大会在孟什维克操纵下，很容易通过了有利于孟什维克的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把同盟变成了孟什维克控制的一个桥头堡。章程规定同盟自己有个出版社，使得同盟能够脱离党中央领导而独立存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于十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退出了大会。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列宁等十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兰多利特咖啡馆开会，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孟什维克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动。普列汉诺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默默地听着大家的不同意见，特别注意观察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同他建立了联系的自己的年轻的朋友尼·厄·鲍曼（一八七三——一九〇五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一八七三——一九五五年）的神色。

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改变原先补选二名的主意，又退回到最初补选四名的方案。他在会上提出：如果不把《火星报》的四名旧编委补选上，党就会分裂为两半。他这样做，显然是屈服于孟什维克的压力。

一些布尔什维克在会上耐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想法。他以专制制度有时也会让步，为他主张向孟什维克让步的意见辩解。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了这次会议的情形。她写道：“在布尔什维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368—369页。

克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宣称应当让步。他说，‘有时候，专制制度还被迫让步呢。’——‘那时人们也就会说专制制度动摇了’，丽莎·克奴尼安茨反驳道。普列汉诺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①

普列汉诺夫不听布尔什维克的良言相劝，决定向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做最大限度的让步，主张把《火星报》的四名旧编委都补选上。他认为，党内两派必须和好。他一再声明：“我不能向自己人射击。”^②他当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面声明，不按他的意见办，他就准备辞职，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普列汉诺夫提出这种向机会主义让步的主张，并非偶然。他已被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人的气焰嚣张的破坏活动所吓倒，看不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他只顾考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式上的团结和统一，说什么“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③，而忘记了党的团结与统一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单纯害怕党的分裂，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德国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以对机会主义流派的妥协与让步求得统一的历史，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普列汉诺夫错误地认为，既然这些党内容许各种派别合法存在，那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应允许各种思潮和派别存在。所以他主张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持调和主义立场。

列宁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这种以向机会主义者妥协让步来求得党的团结与统一的主张，又惋惜又气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尽管从前在起草党纲、创办《火星报》时，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甚至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最后这些意见分歧通过谈心、协商，都正确地得到了解决，消

①② 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85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62页。

除了隔阂，继续团结一致，并肩战斗。为什么今天不能通过推心置腹的商谈，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来再次消除分歧呢？列宁想到这些，心潮起伏，决心再次争取昔日的战友，不能眼看着他滚入机会主义泥潭。列宁于十一月一日心情沉重地给普列汉诺夫写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我非常非常了解您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的动机和想法。但是我深信，在目前让步是最下策，它的后果很可能是引起风波和吵闹，而不是和马尔托夫派斗争。这不是奇谈怪论。”“为了统一，为了党的巩固，请您不要承担这一责任，不要离开，不要把一切交给马尔托夫派。”^①

但是列宁并不对普列汉诺夫抱有幻想，他作好了和普列汉诺夫决裂、同马尔托夫斗争下去的准备。在给普列汉诺夫写信的当天晚上，即十一月一日晚，列宁写好了《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的职务的声明》，并立即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信中写道：“党总委员会委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马尔托夫派让步和补选六个人有利于党的统一，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因此我声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的职务。”列宁还表示不拒绝为党报写稿。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拒绝用自己的工作给新的党中央机关以力所能及的支持。”^②列宁为了争取问题的妥善解决，不要求立即在党报上公布他的这个声明。普列汉诺夫不顾列宁的意见，开始和孟什维克谈判。

十一月三日，普列汉诺夫收到波特列索夫交给他的同布尔什维克派和议条件的通知书。其条件是：（一）谈判的双方是中央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0—1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75页。

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二）恢复《火星报》的原编辑部；（三）补选中央委员，人数在谈判中确定。谈判开始后停止补选中央委员；（四）党的总委员会里占二席（指孟什维克占二席——引者注）；（五）承认同盟代表大会是合法的^①。普列汉诺夫接到这个书面通知后，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让步，否则，他将辞职。

列宁看到普列汉诺夫对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分子作出的原则性让步，可能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造成严重后果，于十一月四日给党中央委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信。列宁在信中指出了普列汉诺夫因害怕分裂、忍让妥协所造成的恶果。他写道：“问题的中心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争吵之后，普列汉诺夫突然转变了，这样就使我、库尔茨和我们大家万分尴尬。现在他（没有我们参加）去和马尔托夫分子讲价钱了。马尔托夫分子看到他害怕分裂，就加一倍甚至加三倍地提出要求，不仅要求六个人，而且要求接受他们的人到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说出人数和人名），接受他们的两个人到总委员会，还要求否认中央委员会在同盟中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完全得到普列汉诺夫的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太害怕分裂和斗争了！情况坏透了。敌人欢天喜地、蛮横无礼，我们的人全都大为愤怒。普列汉诺夫威胁要马上抛掉一切，而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②列宁深感党内局势严重。他又在第二天（五日）给弗·亚·诺斯科夫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呼吁道：“应该让扁角鹿（即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引者注）和尼尔（即诺斯科夫——引者注）尽快到这里来，现在是决定关头，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准备坚决斗争，不准备斗争到底，倒不如干脆把一切都交给他们。容忍这种败坏行为，参预这些勾当，就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190页。

^② 同上书，第182页。

是毁灭全部事业。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无论如何请你们立刻来，以便共同决定该怎么办。”^①当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诺斯科夫正在国内基辅，他们接到列宁自日内瓦写来的信，很快就来到国外。他们回国后向党的各委员会发了一封信，但是信却抹杀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主张对孟什维克持调和主义立场。列宁对此感到很惊讶。

十一月五日，普列汉诺夫为了给马尔托夫分子补选进党的总委员会创造条件，要求中央委员加尔佩林辞去党的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扬言，否则他辞去党中央领导职务。列宁于十一月六日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因此我只得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切正式关系和全部材料交给您，用特别的包裹给您送去。”^②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普列汉诺夫的让步使反对派更加嚣张了，普列汉诺夫坚持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代表卢（科尼亚加，真姓是加尔佩林）退出总委员会，以便给孟什维克腾出位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的让步犹豫了很久。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科尼亚加和我——傍晚站在波浪汹涌的日内瓦湖的岸上，科尼亚加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他的辞职。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了——他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说，卢退出总委员会。”^③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篡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权的野心愈来愈大。他们想先控制《火星报》，再控制党中央委员会，最后逐步占领党的总委员会的席位。

列宁当时受到马尔托夫分子与普列汉诺夫的双重压力，于是，他一方面揭露马尔托夫分子践踏党代表大会决议、分裂党的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86页。译名有修改。

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又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调和主义立场，争取他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列宁在十一月一日至十八日短短半个月中，就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三封信。列宁为避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完全分裂，促进党的团结，曾设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一些必要的让步。例如，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他从日内瓦往国内寄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针对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和好条件，提出了两个让步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一）补选三人到编辑部；（二）同盟中维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状况；（三）总委员会里有一票。这个方案，如果马尔托夫分子不接受，还有另一个方案：（一）补选四人到编辑部；（二）经过中央委员会选择补选二人到中央委员会；（三）同盟维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状况；（四）总委员会里有一票^①。但由于马尔托夫分子野心太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又都持同孟什维克调和的立场，因而列宁的方案未能付诸实现。事实充分说明，列宁在不违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前提条件下，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让步完全是从顾全大局出发的。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被马尔托夫分子违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所吓倒，另一方面又有私心杂念。他心里很清楚：一旦把《火星报》的四个旧编委都补选上，他实际上在编辑部里就可以拥有三票（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一般都支持他）表决权，进而可以控制《火星报》。因此，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与劝告，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不仅在《火星报》编委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补选上，为孟什维克帮忙，而且还要在理论观点上，为孟什维主义辩护。他的这种“行为是破坏党的代表大会、背叛它的多数派。”^②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3页。

② 同上书，第191页。

第二节

第一篇机会主义作品《不该这么办》的发表

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从一九〇三年八月至十月，普列汉诺夫在主编《火星报》第四十六号至五十一号期间，本来还是支持布尔什维克并反对孟什维克的。可是经过考虑、动摇之后，他就转向在两派之间搞调和。在由他一人编辑的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五十二号《火星报》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不该这么办》。如果说以前，他对孟什维克分裂活动的看法，只是在党内同列宁、布尔什维克进行同志式讨论的话；那末从现在起，他则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公诸于世。如果说在此以前，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的认识，只是零星的、琐碎的看法，那末现在则形成了系统的观点，露骨地表述了他对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所持的调和主义立场。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抹杀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重要性，他否认这种分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机会主义建党理论的分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与机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原则的分歧，是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反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是偶然的，是无关紧要的，不必为此争论下去。他在文章中写道：“现在这些意见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不值得为着这些分歧而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再说一遍：如果这些并不重要的意见分歧继续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这对我们的事业将是很有害的。”^①普列汉诺夫公开鼓励要容忍破坏党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上册，1964年中文版，第5页。

的纪律的行为。他说什么：“同样非常明显，为了支持纪律和巩固纪律，有时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闭着一只眼睛是有益的。”^① 如果按照普列汉诺夫这种论调去行事，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变质。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指挥机关，而只能成为自由散漫的俱乐部。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揭露了孟什维主义实质，反对普列汉诺夫向机会主义者妥协让步。普列汉诺夫就咒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集中制的空想主义者”^②，“暴露出不可原谅的迂腐和骇人听闻的近视”^③，有“排他性的宗派精神”^④。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坚决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基本精神的目的，主要不在于《火星报》的补选问题，主要在于使党沿着正确的路线不断前进，而不致于向右转。列宁指出了这点。他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徒然地期望读者不细心，竟说多数派根本反对在补选方面做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的左派转到右派方面去。”^⑤ 普列汉诺夫只看到现象，未看到本质。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不要永远仇视修正主义，否则就容易简单化、绝对化，即保持有“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他自问自答地说：“试问，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都要仇视修正主义，随时随地都必须仇视修正主义者呢？有‘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这个思想特点的人一定会说，是的。我们则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实际策略都应当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7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④ 同上书，第6页。

⑤ 《列宁全集》第7卷，第368页。

况。”^①他主张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用个人让步的方法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所谓的斗争的经验，以温和的手段，清除马尔托夫分子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列宁在一九〇四年二至五月概括性地揭露了普列汉诺夫这篇机会主义著作的基本思想。他说：“《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太不让步的莽撞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即那些和我们接近或者态度不一贯的分子中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②普列汉诺夫对修正主义忍让、妥协的主张，助长了孟什维克头子马尔托夫等人的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罪恶活动，为他们篡夺《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打开了通道。列宁形象地讽刺道：“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她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应该用宽恕敌人的态度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应当用温和办法使无政府个人主义就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个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请帖上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③

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称之为“划时代的文章”^④。这篇文章确是一块界碑，在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历程中，以这篇文章发表为标志，他开始逐步堕入机会主义的泥潭。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表面上是在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头脑非常灵活”，实际上鼓吹可以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362页。

③ 同上书，第369页。

④ 同上书，第475页。

则。他公开宣扬说：“政治，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头脑非常灵活；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规则。”^①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死的教条，它需要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但它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必须永远坚持的。否则，就是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名为要“头脑非常灵活”，实际上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讽刺为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中不管天气如何始终穿着套鞋、棉大衣和拿着雨伞的“套中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热烈欢迎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机会主义者的这一转变，俄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司徒卢威主编的《解放》杂志把普列汉诺夫的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不该这么办》的发表，评价为意义“重大的转变。”^②

第三节

帮助孟什维克夺取《火星报》编辑部 和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

列宁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本想巩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的阵地。可是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发生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变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直接被选进党中央委员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弗·维·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头两个人当时正在国内，是缺席当选的。诺斯科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主张对孟什维克持调和主义立场，而后来完全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从俄国国内来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51页。

到国外以后，没经过调查研究，就认为应该同孟什维克谈判。一九〇三年十月，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一八七六——一九四七年）、列·波·克拉辛（一八七〇——一九二六年）、玛·莫·埃森（一八七二——一九五六年）、费·瓦·古萨罗夫（？——一九二〇年）等四名布尔什维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十一月，列宁加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加尔佩林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加尔佩林又劝说列宁要对孟什维克让步。一九〇四年七——九月，中央委员会里进一步发生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变化。比较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林格尼克、埃森被捕。倾向同孟什维克调和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古萨罗夫辞职。愿意同孟什维克调和的克拉辛、诺斯科夫和加尔佩林，不顾列宁的反对，把赞成同孟什维克调和的布尔什维克阿·伊·柳比莫夫（一八七九——一九一九年）、列·雅·卡尔波夫（一八七九——一九二一年）、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八七七——一九一三年）补选为中央委员。

在列宁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妥协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独掌了《火星报》编辑部大权。他为了讨好孟什维克，进一步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违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擅自把以前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波特列索夫、巴·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在党的二大上被选进编辑部、但声明不参加工作的马尔托夫，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后来为自己这种践踏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行为辩解说：“我所进行的补选并不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准许编辑部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补充自己的成员。”^①这样，《火星报》编辑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就都被孟什维克夺取去了。

列宁后来总结了与马尔托夫分子作斗争的历史经验。一九〇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0页。

五年三、四月间，老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弗·维·阿多拉茨基（一八七八——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士日内瓦会见列宁，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阿多拉茨基回忆说：“在谈话中他（指列宁——引者注）告诉我他认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是错误的。不知怎的，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他讲这点是为了我和其他同志吸取他的经验，一次也不要再犯这种错误。”^①列宁当时认为，退出《火星报》后，可用主要力量巩固中央委员会这个阵地。事与愿违，由于孟什维克的得寸进尺，普列汉诺夫的一味迁就，布尔什维克的一些中央委员逐渐倾向同孟什维克调和，结果《火星报》最后完全被孟什维克所控制，中央委员会里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人也占据了多数。

在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普列汉诺夫自己编辑了《火星报》第五十二号。于是，《火星报》从这一号起，便由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变成了孟什维克鼓吹机会主义的喉舌。新、旧《火星报》有本质的不同：“旧《火星报》曾教人领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领会处世妙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新《火星报》‘聪明起来了’，很快就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赞扬它为耻了。”^②十一月下旬，列宁被补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后，立即向党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抗议普列汉诺夫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委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列宁在声明中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分子补选到编辑部里去的行动，表明普列汉诺夫已直接转到党代表大会少数派方面，而这个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曾不止一次

① 《阿多拉茨基选集》，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3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8—509页。

地公开评论过，说它倾向于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又指出：“中央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违背党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①。普列汉诺夫在第五十七号《火星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俄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没有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只受到一半代表的信任，无权领导全党。他写道：“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属于多数派，这个多数派（这从刚刚出版的代表大会记录中可以看出）也进行了党中央的选举。但是这个多数是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多数。……结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一半所选举的人要领导全体。我当初就感到这是不正常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会导致怎样的实际困难。后来我发现这些困难大得厉害，于是企图尽力消除它们。我进行了同志们都知道的补选工作（指把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引者注）。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中央必须这样做，因为它应当采取措施成为我们全党的代表，而不只是它的一部份的代表。从党章的观点看来，这自然是不必要的，但这无疑是符合事业利益的要求的。只要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是（可以说是）偏离中央的，那些‘该管辖’的人就不会执行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实际上成为中央的。”^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实际上在给党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和威胁：如果不把孟什维克的代表补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就不服从党中央的“管辖”。普列汉诺夫明明知道，这样补选中央委员是违背党章的，但他还是破釜沉舟地这样做了。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他把持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列宁、林格尼克、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会议不顾列宁的反对，通过了他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把孟什维克补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列宁把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97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40—41页。

普列汉诺夫这种分裂党的活动，痛斥为“卖淫式的恋爱”^①。

列宁在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五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这部有名的著作，详细分析了俄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会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过程，批判了孟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系统地阐述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观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完整理论。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成长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成立之后，粉碎了经济派的进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前进了一步；但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机会主义条文，在会后孟什维克又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践踏党的决议，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从而她又倒退了两步。列宁指出，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宣传机会主义观点；进行分裂党的破坏活动，其目的是要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倒退到组织涣散、充满小组习气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任务是：“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②。

列宁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谬论；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批判了马尔托夫主张“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愈好”的谬论；指明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痛斥了马尔托夫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述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否认党必须领导一切工人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与广大群众联系的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2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398页。

体现，揭露了把党变成狭小的秘谋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说明了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组织起来，揭穿了马尔托夫拥护自治制、攻击集中制的机会主义主张；阐明了党必须有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批判了马尔托夫反对以党章约束党员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列宁的这部著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结合国际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经验，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列宁的这本书彻底批判了孟什维克所坚持的和流行于第二国际各国工人政党中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在第二国际各国工人政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列宁的这部著作首先遭到了孟什维克的猖狂攻击。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火星报》上发表题为《现在不能沉默（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文章，硬说：“列宁出版了一本在我们的内部纠纷史上会起火上加油的作用的小册子。”^①要求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划清界限。普列汉诺夫还在文章中，诽谤列宁利用党中央国外代表的权力“继续竭尽全力地把我们党直接推到分裂的边缘”^②。从而他要挟党中央委员会撤销列宁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力。一九〇四年七月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缺席的情况下，由普列汉诺夫操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七月宣言》，撤销了列宁的中央国外代表权力；《宣言》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规定不经党中央批准不许出版列宁的著作，确认普列汉诺夫把落选的孟什维克的原《火星报》编委塞进编辑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部完全合法。由于这次中央委员会强行补选了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布尔什维克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从而使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在中央委员会里占据了多数。这样，普列汉诺夫就帮助孟什维克在夺取了中央机关报之后又进而夺取了中央委员会。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几乎都站在孟什维克方面，攻击列宁在其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在这方面特别积极。一九〇四年八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各国社会党统一问题时，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个歪曲事实、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报告。出席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由列宁起草一部份、并校对过全文的报告，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意见分歧的真相，揭露和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但大会最终仍然通过了“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根据历次国际代表大会规定的原则并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全力促进社会党的统一，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是要对分裂活动的惨痛后果负责的。”决议还指出：

“为了达成这种统一，社会党国际局以及一切在党内已经实现统一的各国政党愿听从他们的吩咐，为他们效劳。”^①普列汉诺夫在这个决议通过不久，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二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会议上发言，对它赞不绝口。他说：“要知道，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称：在每一个国家里只应当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正象每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我们维护无产阶级的观点的人应该尽我们的能力所及使我们俄国只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0页。

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正象其中只有一个工人阶级一样。”^①

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各国党袒护孟什维克的错误，抵制了第二国际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原则斗争的粗暴干涉。列宁于一九〇四年九月在给弗·亚·诺斯科夫的信中，揭穿了孟什维克破坏党的决议、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并决心同孟什维克斗争到底。他说：“少数派（包括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是：控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在这些中央机关中，口头上代表整个党的利益，而实际上，却在想方设法不通过代表大会，按照少数派的利益来改组中央委员会；我不能认为，这种策略是正派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同主张这种策略的人达成任何协议。”列宁坚定地表示：“我想，我应当尊重的不是某些政客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②。

列宁采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保持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而孟什维克，则在普列汉诺夫的庇护下，在机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它由在俄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机会主义的建党理论，发展为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制定机会主义策略。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主义持调和立场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恶果。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孟什维克的让步，同倍倍尔和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德国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让步，性质和后果一样严重。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颖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新颖的处世格言：勿因小节而乱大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不大的无政府主义词句高于党内的大分裂。”又说：“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462、463页。

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①。

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主义持调和主义立场的另一恶果，就是丧失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命。他从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建党理论辩护到积极宣传孟什维主义，成为孟什维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由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堕落为孟什维主义者深表惋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伊里奇（指列宁——引者注）最感到难受的是跟普列汉诺夫彻底分手。”^②

第四节

“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

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③。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发表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不该这么办》之后，至一九〇四年九月，又在新《火星报》上连续发表了《对列宁同志的信的答复》、《略论‘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者’》、《答尼·列宁同志关于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情况的信》、《可悲的误会》等十多篇文章。普列汉诺夫通过这些文章，为自己的调和主义立场辩护，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建党路线上的分歧实质，颂扬孟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千方百计地美化孟什维克，指名道姓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普列汉诺夫成了“热烈的孟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在这些文章中，恣意歪曲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63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8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60页。

在建党问题上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他硬把这种不可调和的两条建党路线的斗争，说成是“芝麻琐事和闲言冷语”^①。列宁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曾给《火星报》编辑部写信，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弄清分歧产生的原因和分歧的实质，但均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拒绝。他认为，这样做，“正是充满‘小组习气’精神的‘宗派分子’特别喜欢喋喋不休地把各种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残酷的内部争吵告诉群众。”^②

普列汉诺夫在这些文章中，竭力美化孟什维克，赞扬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组织原则。他把坚持修正主义立场的孟什维克称之为“继续保有自己的智力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③，“他们不仅任何时候都不曾沉溺于修正主义，而且相反，始终都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最有能力的人物之列”^④。他把孟什维克的头子马尔托夫称之为“是修正主义的不可和解的敌人，地地道道的正统派”^⑤。他还宣称，“要说象巴·阿克雷里罗得、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即波特列索夫——引者注）等这样一些同志有机会主义，那无异于不懂得这个名词的意义”^⑥。他就是这样积极为这些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头子辩解。孟什维克继承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被粉碎了的一切机会主义的腐朽观点。普列汉诺夫为了向孟什维克献媚，不仅美化孟什维主义，而且为过去他曾反对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理论翻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章第一条时，普列汉诺夫曾支持列宁所起草的马克思主义党章条文，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机会主义党章条文，但大会却通过了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会后不过几个

①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70页。

④ 同上书，第62页。

⑤ 同上书，第64页。

⑥ 同上书，第83页。

月，普列汉诺夫却背叛了自己过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说什么，俄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个党章并非没有巨大的缺点。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具有这样一个虽然是消极的，然而却是无可怀疑的性质：它不会给广泛的工人组织造成任何障碍。”^①他还宣扬列宁和马尔托夫在党章条文上的原则分歧“是细节问题，如果据此把我们的同志分成山羊和绵羊，分为不可和解的人和温良柔顺的人，则是绝对荒谬的。”^②普列汉诺夫这是公开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组织原则辩解。过去，普列汉诺夫曾批判过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而今天，当孟什维克同经济派已开始和解、共同进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又矢口否认经济派的修正主义实质。他公开声称“‘经济主义者’当时也是属于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之列的，不过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误会造成的。”^③他又说，经济派已经“放弃了他们一个时候由于误会而同情过的修正主义，那末，如果我们继续把他们叫做修正主义者，我们就会是诽谤者。”^④普列汉诺夫甚至此时又把他过去批判过的经济派观点，搬出来作为武器，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普列汉诺夫从前讲的是一套，现在讲的又是一套，自相矛盾。”^⑤他在一九〇四年写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等文章中，否认党和革命理论在工人组织中的领导作用，怀疑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不依赖于工人运动而产生的观点的正确性，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他错误地把自发性和自觉性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63—64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同上书，第66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1页。

的问题归结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攻击列宁关于工人运动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述。他说什么：“当我读了小册子《怎么办？》的手稿时，我立即对列宁和我们编辑部其他成员说过，我认为其中有相当多的理论错误。”^①他又声称：“我指出列宁对‘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关系的观点错误，接着我又揭露他的理论错误同他的组织计划的联系。”^②他认为列宁提出的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的观点，是忽视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对革命理论产生和传播的巨大作用。因而他认为列宁对经济主义观点的批判是片面的反动的。他狂叫什么，“我所谓旧瓶新酒也者，是对‘经济主义者’片面的和不合理的观点的不合理的和片面的反动。它在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得到了自己最鲜明的反映。”^③列宁的《怎么办？》是普列汉诺夫在过去反对经济主义斗争中努力捍卫过的著作，今天却成了他攻击的目标，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斯大林在读过普列汉诺夫攻击列宁的《怎么办？》之后，指出普列汉诺夫只不过是重复经济派的陈词滥调，而不懂得社会主义理论不会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必须从外面去灌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斯大林说：“普列汉诺夫分析《做什么？》（即《怎么办？》——引者注）的几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此人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和敌意。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有的。我觉得普列汉诺夫是落在新问题的后面了。他以为在他面前的还是旧时的论敌，所以他总好唱老调，说‘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好象列宁说过马克思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87页。

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时期便能出现似的。现在就连那些中学生也知道‘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而现在所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自发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依赖自发运动的增长’，甚至是违背着这个运动而创造的，然后才从外面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依照自己的内容，即依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客观要求而纠正这个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结论）就是：我们应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认识真实的阶级利益，认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把这个理想琐碎化，或者使它去适应自发运动。这个实际结论正是建筑在列宁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面。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前提，任何机会主义都沾染不上你。列宁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之所以称它为列宁思想，是因为在俄国文坛上没有人象列宁把它说得那样清楚。普列汉诺夫以为自己仍然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咀嚼着已经咀嚼过十七八遍的道理，说什么‘二二得四’。他居然不以重复马尔丁诺夫的思想为耻……”^①。

斯大林进一步指出普列汉诺夫用“英雄和群众”的词句混淆应该回答的基本问题：“究竟是谁制定纲领，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或者说，“究竟是谁把谁提高到了解纲领的水平，是领导者提高被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提高领导者？”所以在《火星报》第七十号和第七十一号上的文章《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进行的论战，是十足的唐·吉珂德式的举动，是同风车搏斗，因为列宁在自己的书里是始终一贯地遵循着马克思关于意识起源的原理的。至于普列汉诺夫在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7—49页。

策略问题上所进行的攻击，则是转到机会主义者阵营去的‘个人’所特有的彻头彻尾的糊涂观念。”^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些文章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咬牙切齿地对他们进行攻击、谩骂。他企图以此威逼布尔什维克停止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建党理论的斗争，在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组织上向孟什维克作出让步。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言咒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重视分裂工人运动的“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者”^②、“顽固派”^③。他把布尔什维克坚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诬蔑为“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④。普列汉诺夫胡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点有最后使他们紧紧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的危险”^⑤。他把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建党理论的批判与斗争，说成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⑥，是“继续奉行所谓‘多数派’的政策，就意味着在党内组织接连不断的而且对我们的事业极端有害的内战，在几乎相等的两种力量之间组织斗争。”^⑦他诬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是“希望追求指挥棒”^⑧。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听普列汉诺夫这一套，他就恶狠狠地叫嚷要把布尔什维克“连根拔掉，从而大大有助于保证内部的和平和我党一切力量的实际的团结”^⑨。布尔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的谩骂无比愤怒，他们纷纷写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2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7、38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④ 同上书，第69页。

⑤⑥ 同上书，第44页。

⑦ 同上书，第112页。

⑧ 同上书，第38页。

⑨ 同上书，第75页。

信质问和驳斥普列汉诺夫。例如，在一九〇四年六月侨居在日内瓦的三十七个布尔什维克就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这样的信。

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维护孟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实践上帮助孟什维克进行夺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这些事实证明他已成了“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完全站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当然在一九〇四年三至四月，普列汉诺夫因为《火星报》刊登了他反对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而同编辑部的其余成员马尔托夫等人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几乎要退出编辑部。但是就在此时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的组织观点并没有丝毫改变。到一九〇五年他又粉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分歧的实质，要求“互相敌视的弟兄”言归于好，实现无原则的团结。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听任两派“互相厮打和咬架”，结果就会使“两者一条尾巴都不留下，就象著名神话中两只互相厮打的猫一样。”^①

列宁正确地分析了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堕落为孟什维克以后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活动的特点。他写道：“但是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一）一九〇三年八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二）一九〇三年十一月（‘火星报’第五十二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三）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四）一九〇五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五）一九〇五年年底到一九〇六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六）从一九〇六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七）一九〇八年同取消派决裂；（八）一九一四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②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38、2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360页。

以列宁的这个正确论断为指针，在我们分析普列汉诺夫的后期活动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堕落为孟什维克起，直到他一九一八年逝世时止，在对待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上，都坚持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同其他孟什维克是一致的。但他在对待马赫主义和取消派的政治态度上，又采取了同一般孟什维克显著不同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立场，并多次接近布尔什维克。这对于已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让普列汉诺夫完全放弃机会主义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是难以办到的，他两脚陷进机会主义泥潭里已不能自拔。

第九章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 特殊立场

第一节

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对待日俄战争

二十世纪初，俄国和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争霸亚洲，矛盾日益激化。沙皇政府在这以前，已从腐朽的清朝手中割去了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在我国东北修筑了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北半部，又把魔掌伸向朝鲜，妄图在亚洲建立“黄俄罗斯”帝国。当时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对我国的东北和朝鲜也垂涎欲滴，它还想侵占俄国的库页岛，控制远东。两条狗争抢一块肥肉，只有决一死战。日本对沙皇俄国内部空虚的情况了如指掌，决定先发制人，于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不宣而战偷袭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由于武器装备低劣，军官昏庸无能，军队训练不佳，难以对付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接连败北。日军占领旅顺之后，在沈阳附近歼灭俄军十二万多人，从波罗的海赶来支

援旅顺俄军的二十艘军舰被日本击沉十三艘，俘虏四艘。沙皇政府不得不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同日本签定和约，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了我国的旅顺，占领了已于一八七五年划归俄国的南库页岛并出兵侵占了朝鲜。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侵略、掠夺而发生的非正义战争。怎样对待这次战争？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俄日两国的无产阶级在战争爆发后，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个问题明显地分为两派：孟什维克鼓吹要保卫地主资产阶级的沙皇“祖国”。他们堕落为可耻的沙文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公开声明，沙皇政府的失败，有助于削弱专制制度，为革命的爆发创造有利条件。布尔什维克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普列汉诺夫在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上，与一般孟什维克不同，没有站在沙文主义立场，而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是因为，普列汉诺夫自一九〇三年十一月起才成了“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①。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刚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不久。他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上。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孟什维克。所以他在成为孟什维克以后，在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又不同于其他孟什维克。日俄战争爆发后，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四年二月中旬和经济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一起，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的例会。会议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提议，通过了谴责日俄战争的宣言。

普列汉诺夫参加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后，从比利时回到瑞士途中，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二月二十七日出席了法国社会党人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60页。

为欢迎他而召开的群众集会。拉法格等人致欢迎词。普列汉诺夫在欢呼声中致答词。他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痛斥了沙皇政府进行的日俄战争，表示俄国工人坚决同法国工人团结一致。大会最后还通过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谴责沙皇侵略政策的决议。

普列汉诺夫返回日内瓦后于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应法国社会党人主办的《社会主义运动》编辑部的请求，写了《致〈社会主义运动〉编辑部的信》。文中论证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崩溃才会出现普遍和平的时代，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定将给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深信俄国社会主义者终将和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获得胜利。

从一九〇四年六月起，普列汉诺夫接受医生的劝告，离开日内瓦到阿尔卑斯山南麓风景幽美的贝亚腾贝格矿泉疗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治疗肺结核病；当他回到日内瓦的时候，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被推选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大会的代表团。

在八月十四日开幕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万-柯尔（一八五一——一九二五年）被选为大会主席，被选为大会副主席的有普列汉诺夫和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日本社会党的领导人片山潜（一八五九——一九三三年）。日俄战争交战国双方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被选为大会副主席，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决心和意愿。普列汉诺夫和片山潜两个人在大会主席台上，热烈地紧紧握手，高大的普列汉诺夫还特意搂着矮小的片山潜，并且亲吻了他一下。这象征着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交战的日俄两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显示了对日俄帝国主义政府的蔑视。这一举动博得了代表们的一片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片山潜首先发言，他说：“能够和俄国代表相见，使我非常

高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掀起屠杀我们弟兄的残酷战争”。普列汉诺夫在答词中明确指出，俄国政府是最凶恶的敌人，只有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才会给俄国革命造成有利的条件，他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对待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他说：“我荣幸地同最年轻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片山潜一起参加主席团。我想在这里指出，这次罪恶的战争的责任不应由俄国人民承担，而应由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承担。即使俄国赢得这次战争，那末真正被打败的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人民……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将替我们砍掉专制政府这个庞然大物的一只脚。专制政府面临自己应得下场的时日即将到来。而当俄国失败的消息陆续传来的时候，沙皇政府在任何地方也得不到同情，它在道义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在俄国一切争取进步和自由的人，期待地注视着社会主义运动，注视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

在大会的第一天，就一致通过了法国代表提出的决议，其中谴责俄国和日本政府进行的掠夺战争，并且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国际主义团结。会后，法国有一个机会主义者在《小共和国报》上猛烈攻击片山潜，说他不应当到阿姆斯特丹去，而应当参加日本的作战部队去同俄国人打仗。普列汉诺夫对这种露骨的沙文主义言论十分愤慨！他当即在《在阿姆斯特丹（观感和评论）》中痛斥了“这种难以置信的谬论”，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畸形的再版”^②。

一九〇五年七月，普列汉诺夫又写了一篇坚持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军国主义战争的重要论文《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国巴黎出版的《社会主义生活》双周刊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发起，提出了四个有关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向各国著名的社会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37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335页。

主义者进行调查，请给予书面答复。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它刊登在同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该刊第十八期上。随即又用俄文发表于八月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自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二号上。后来还被译为保加利亚文，并出版过俄文单行本。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在“工人无祖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等问题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并论述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思想。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和法国右翼社会党人饶勒斯都认为：《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当时工人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而发出的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词，因此随着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工人政治权利的扩大，这一口号的作用就会日益缩小。普列汉诺夫批驳了这种谰言，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原意，“是为了回答那些责备共产党人要‘废除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因此很明显，《宣言》的作者所说的‘祖国’是从完全确定的意义上，即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赋予的意义上理解的。”^①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产生“工人无祖国”这个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他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一切‘祖国’的范围，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工人没有祖国”这一原则在当时、在今天，而且在将来“也仍然是正确的”^②。

普列汉诺夫驳斥了饶勒斯认为承认“工人无祖国”就等于“向工人阶级说，它可以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③的谬论。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参见上书，第97页。

析了“工人无祖国”与“爱国”的关系。他认为，“工人无祖国”并不意味着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宣言》的作者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就是过问同“祖国”有关的事；问题在于当过问与“祖国”有关的事情时，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认为在工人受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同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当“祖国”的利益与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该国工人阶级，应当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出发，使前者服从后者。他写道：“在祖国利益同革命人类即同现代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也就是同进步的利益发生矛盾的地方，它同维护祖国的决心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个运动的利益，是不愿意背叛自己观点的现代社会主义者在估计一切国际关系（不管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是关系到一般贸易政策特别是其中的‘殖民主义’）时所应该具有的最高观点。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说来，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①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从理论上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其次，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指明了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和军国主义应持的正确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既不是反对任何战争，也不是同情一切防御性的战争，而是支持革命的进步性的战争。他写道：“而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彻底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情一切可以清除社会革命道路上任何重大障碍的战争——不管是防御性战争也好，进攻性战争也好，都是一样。”^②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的现状，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现在文明民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01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族之间的战争，在许多方面严重危及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阶级的觉悟了的成员都是最坚决最可靠的和平拥护者。”“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祖国’的殖民措施也已经给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对它加以坚决的谴责。”^①他认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好手段，就是开展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说：“必须承认，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好手段，不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或假定可能的——行动，而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成就的全部总和**。我们的反军国主义的斗争根本不可能安排在某一个别行动的时刻。这是个完整的过程。”^②正值日俄两国交战和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普列汉诺夫对反对军国主义根本途径的论述，确实是从理论上武装了无产阶级，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俄国国内以至国际社会主义舆论界的重视。九月二十一日“公益”出版社就曾给他去信，要求他就《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题出版文集。一九〇六年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出版社没有通知他本人就把他的论文作为小册子单独印行。

第二节

抛出机会主义策略 退出孟什维克组织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保持有农奴制残余的沙皇专制制度，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当时，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革命危机笼罩全国。沙皇政府妄图通过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日本的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防止革命的爆发。然而适得其反，由于战争，更加剧了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而政府在战争中的惨败，则充分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败。结果，战争引起了革命，俄国人民趁日俄战争之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斗争热潮。“流血星期日”事件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旧历一月九日）是个星期天，彼得堡工人们带着家属，抬着沙皇的象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歌，奔向冬宫去递交请愿书，要求沙皇政府给予出版自由、组织工会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所有，召集立宪会议等。彼得堡各街道上聚集了十四万多人。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打伤约五千人，工人的鲜血洒遍了彼得堡街头。沙皇军队的刺刀制造了“流血星期日”。血的教训使工人们开始认识到沙皇政府的反动本质，他们深有体会的说：“沙皇揍了我们，那我们也要痛揍他一顿！”工人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工，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在某些地方同沙皇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历史上著名的俄国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了。革命斗争发展迅速，工人的政治罢工很快席卷全国。农民也起来了，开仓济贫，捣毁了地主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时，普列汉诺夫正住在日内瓦。他从瑞士的报纸上看到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很受鼓舞，立刻注意从报纸上搜集有关这次俄国革命的一切资料。他从报上看到“彼得堡一月九日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和其它地方的血腥惨状消息之后，对沙皇政府屠杀人民的暴行怒火万丈，深切同情和关心俄国人民的遭遇。他在《火星报》第八十七号发表的文章中万分愤慨地写道：如果我们“对于君主专制的吃人生番们所有这些血迹斑

斑的罪行不感到义愤填膺，那是多么可悲啊！如果拥护政治自由的人们现在不奋发起来同一切进步运动的死敌进行殊死的斗争，那该多么可悲啊！对统治俄国的匪帮们的血腥暴行的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大声疾呼，号召俄国一切敢作敢为的人、一切敌视沙皇专制制度的人武装起来，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进行反抗。过去，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表示我们属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以另外一个战斗口号：‘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武装起来！’”^①这个口号“应当从我们的队伍中发出来，并且作为坚决的革命号召嘹亮地响彻整个俄国。”^②普列汉诺夫还明确表示：“武装反抗的思想在自己的逻辑发展中必然会变成武装起义的思想。”^③他说：“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党说来，俄国的现实无论如何不会使它对‘合法性’产生偏好。”^④

除了读报外，他还注意从来访的客人中了解俄国革命的进展情况。可惜由于他架子大，主动来访的革命者不多。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后，各个阶级都在制定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策略。沙皇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妄想绞杀方兴未艾的革命。资产阶级玩弄着狡猾的两面派手法，妄图与沙皇妥协，窃取政权。无产阶级坚决要求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刚一爆发，普列汉诺夫就出版了他写的第一本阐述他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的著作，这就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部于一月间在日内瓦秘密出版的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他在这封长信中，除了继续为孟什维克的组织观点辩护，攻击列宁提出的组织原则之外，主要是提出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①②③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189—190页。

中无产阶级要不惜一切地“及时地关心使唯一能参加斗争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都参加这个正在进行的斗争”^①，即主张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共同完成革命任务，反对由无产阶级独立完成，并且把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布尔什维克斥之为“假急进派”^②。

接着在半个月之后，普列汉诺夫于二月二十三日在第八十七号《火星报》上，又发表了他在策略观点上的代表作《分开走，一起打》^③，为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制定了机会主义策略：俄国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要平行领导革命，“分进合击”，“互相亲善和彼此协调”^④，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迫切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出革命策略，以争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这紧要的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积极筹备并向孟什维克建议迅速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来制定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组织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革命策略。孟什维克忧心他们在这次大会中将占据少数，因而通过的决议，必将对他们不利，于是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常务局单独于一九〇五年四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同时也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但因为他们的代表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所以不得不改名为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按照机会主义精神重新审查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⑤，制定了两条根本

①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31页。

③ 我们认为译成“分进合击”更简明些。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42页。

⑤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0页。

对立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主张：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农结成联盟，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主张：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用和平的方法改变沙皇制度，召集杜马一类的代表机关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半途而废。

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这两个代表大会持什么态度呢？

自从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转到孟什维克一边之后，在编辑、出版《火星报》问题上，与其他孟什维克也有矛盾。随着这个矛盾的发展，到了一九〇五年初，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新《火星报》里已陷于孤立，其余的编辑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等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他。于是他就自己出钱从一九〇五年三月起在日内瓦创办了只刊登他自己文章的不定期杂志——《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以下简称《社会民主党人日志》），前后共出版了十七期。普列汉诺夫在创刊号上写了《关于我的〈日志〉的几句话》，他写道：

“这个刊物的名称充分地说明它的性质。这将是一个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对现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有热烈兴趣的人的日志。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国际大军中的一支队伍；因此我在自己的日志中也要叙述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使我产生的各种印象。”^①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外创办新杂志，实际上是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成立第三党或者新的集团”^②。但他在当时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这一方面从他发表在《日志》第一期上的鼓吹机会主义策略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9卷，第154页。

观点的文章《农夫们在暴动》中可以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从他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召集的代表大会所持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

布尔什维克为适应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向党的总委员会提出了尽快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因为，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由总委员会召开。但以普列汉诺夫为主席、孟什维克占多数的党的总委员会，屡次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合理建议。布尔什维克常务局为了制定出革命策略，促进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斗争的发展，只好决定单独召开代表大会，发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普列汉诺夫担任主席的党的总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并正式通过了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决议，决议认为即将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命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组织要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并宣布：参加者，将被开除党籍。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八日第九十六号《火星报》上，发表了他的《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振振有词地声称，“假如我不起来反对在某些人的发起下非法召集的代表大会，我就没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总委员会委员的义务，我就辜负了党代表大会的信任”^①。他还诬蔑布尔什维克“搞那些卑鄙可笑、毫无价值，然而却是有害的小组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在上述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恰恰会达到自己的最高峰。”^②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绝不是什么搞“阴谋活动”，而是光明磊落的。按照一九〇三年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总委员会“尽可能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如果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159页。

占代表大会总票数一半的党组织提出要求，党总委员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①。现在时隔两年，又有许多地方组织要求，而党总委员会拼命反对召开党代表大会，可见公开违背党章的正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党总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只好向党内各地方组织发出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指出：

“如果还有人仍然怀疑不通过中央机构而召开代表大会是否合法，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就要回答一点：革命事变会产生革命权利，而这种权利则否定实际上不适用的机构。”^②普列汉诺夫想以不经他批准就宣布“不合法”来束缚布尔什维克的手脚，让布尔什维克跟着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跑，那是办不到的。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斗争实践证明，布尔什维克召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革命策略，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当孟什维克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他们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时，他为了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标榜“中立”，同时也不同意孟什维克召开这种参加者为数不多的单独的会议，因此最初表示拒绝，但因为他们的观点一致，所以他最终还是参加了。可是他又非常不满会议通过的建立分裂主义的中央领导机关——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因为他本来还力图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破镜重圆，现在看来，似乎已成泡影。于是他愤然决定辞去《火星报》编委和党的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写了《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致〈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六月十四日第一百零一号《火星报》上。列宁在谈到普列汉诺夫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这件事时，指出：“的确，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这些倒戈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他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到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泥潭派’分子经过常期的动摇决定追随我们，我们是不能责怪他们的。”^① 列宁为普列汉诺夫向布尔什维克靠拢而高兴。后来，列宁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在明确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组织原则与革命策略观点上，继续顽固坚持孟什维克立场的同时，也肯定了他谴责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裂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指出：普列汉诺夫本人“在原则上从来不能同新火星派取得完全的一致”^②。列宁在1914年5月把普列汉诺夫从组织上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这件事，看成是普列汉诺夫脱离孟什维主义的举动，明确指出：“一九〇五年春天，普列汉诺夫脱离了孟什维克”^③。

一九〇五年六月，停留在敖得萨城附近海面上的沙俄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铁甲舰上的水兵们，受敖德萨城内工人罢工的影响，为抗议对他们的生活的虐待和处罚，而杀死了一些军官，宣布起义，舰上升起了革命红旗，在黑海上飘扬了一周。

在“波将金”铁甲舰起义失败以后，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短评，肯定这次被镇压下去的起义的重大意义，提出为使革命战胜旧制度至少需要争取一部分旧军队到人民方面来，但是又流露出他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过高。在同一期《日志》上，他还发表《与友人通信选录（致〈无产者〉编辑部的信）》，于同年十一月第三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又发表《我们的处境》等文章，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6页注③。

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他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

美化资产阶级、贬低无产阶级，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提出机会主义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他说，俄国资产阶级“它本身的利益在于专制制度的崩溃”，它对沙皇制度“总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对于俄国革命事业是大有利益的”^①。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不会背叛革命，背叛是将来的事^②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比西欧无产阶级落后，还没有贯彻“欧洲主义”精神^③。

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还胡诌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应当关心的正是这些利益，并且要为了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保存自己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虽然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落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利益毫不相干，但并没有由这些论据直接作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的结论，而是摆出一副和事老的姿态，一本正经地说，在革命中，如果要求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那就“等于给社会民主党签署了死刑判决书”；如果要求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等于向壁清谈，毫无意义”。两者既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愿望放弃领导权跟着对方走^④，那末无产阶级就只有同资产阶级“分开走，一起打”，平行领导革命。普列汉诺夫提出“分进合击”策略的含义和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在资产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59、248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446页。

③ 参见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9页。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58—259页。

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同正在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自由资产阶级‘并肩行进’”^①，不要保持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不要“肤浅地了解‘把自己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这句话”^②，不要揭露资产阶级背叛行为，不要“吓跑”资产阶级，不要奉行“恫吓”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要以不使“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作为“指导”思想^③。如果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分开走，一起打”，那末农民去干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回答。

普列汉诺夫有时也承认农民的革命作用，但他同时又认为农民的革命性具有十分短暂的性质^④。他甚至把农民说得连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如，说什么，只有资产阶级“反政府的情绪”“消失”的时候，农民才会“代替资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⑤。普列汉诺夫还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利益的很多方面彼此都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可能被农民在政治上的惰性所阻碍”^⑥。

普列汉诺夫由此得出结论威胁无产阶级说，如果它与农民结成联盟，就会吓跑资产阶级，革命规模就会缩小^⑦，“这样做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⑧，就不能同资产阶级一起打击沙皇专制制度了。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254页。

③ 参见上书，第125—127页。

④ 参见上书，第176页。

⑤ 参见上书，第261—262页。

⑥ 参见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第259页。

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9页。

⑧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58页。

普列汉诺夫采取历史类比的形而上学方法，照搬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公式，对各个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和判断。

实际上，俄国资产阶级是在沙皇专制政府卵翼下孵化出来的产儿，是西欧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它虽然对于妨碍其经济发展的农奴制残余不满，但由于它在经济上同地主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对内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这一根本利益上，与沙皇专制政府还是一致的。害怕沙皇的残暴统治会引起人民革命，危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对沙皇制度的主要不满所在。因此，它施展一套口头支持革命，实际支持沙皇的阴险手腕，来扑灭革命，谋求同沙皇妥协。“处在两团烈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①是软弱的反动的阶级，而决不是什么力争“专制制度”“崩溃”的革命阶级。这从俄国资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前后的政治实践可以得到证明。一九〇四年俄国资产阶级成立了名为“解放社”的自由保皇派组织，主张君主立宪制，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结。到一九〇五年十月，以“解放社”为核心，进而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仍然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俄国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的主张，它怎么能对沙皇制度进行打击呢？俄国资产阶级不象普列汉诺夫所吹捧的那样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也绝不象普列汉诺夫所贬抑的那样落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已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具有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完全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优点。它的集中程度超过美、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身受封建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等三重压迫，特别是它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政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12页。

党——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它比被修正主义腐蚀的西欧无产阶级，更成熟，更革命，更先进，它不但有资格担任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且还将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是工农共同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灭农奴制残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根本一致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西欧农民相比，俄国农民深受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俄国无产阶级同破产的农村保持着及其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俄国农民不但能够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而且易于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唯一最可靠最强大的同盟军。列宁深刻指出：“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所采取的全部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列宁还认为：“普列汉诺夫根本弄不清楚，在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竟是什么。”^②

普列汉诺夫不懂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③。

普列汉诺夫在“分进合击”的漂亮外衣下，一不让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二不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行为作斗争，三不让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把农民这个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推给资产阶级。所以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8、331页。

③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义上是平行领导，实际上是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自由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发明创造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进合击”、平行领导革命的提法本身，就是妙不可言的无稽之谈。在这点上，深刻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社会上阶级斗争和军事上组织进攻是有所不同的。军事上进攻可以兵分两路，分进合击；而社会上阶级斗争则是各阶级错综复杂，浑为一体，激烈争夺领导权。所谓革命的领导权就是一个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依据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前途，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积极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所以，任何革命，只能有一个阶级而不能有两个阶级充当领导者。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就是资产阶级领导，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两个阶级平行领导的事例。但是两个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一个阶级要想领导革命，就必须把另一个与自己争夺领导权的阶级驱逐出领导者的舞台，否则其领导权就会落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是如此。俄国无产阶级要想在民主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把资产阶级驱逐出革命领导者的舞台，无情揭露它背叛革命的行为。这是无产阶级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条件之一。普列汉诺夫在“分进合击”的动听词句遮盖下，取消了这一条件，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化为泡影。

普列汉诺夫的策略观点同孟什维克的策略观点，在原则上是相同的，都是美化自由资产阶级，贬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都是鼓吹无产阶级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把领导权拱手交给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确定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但不是同他们合并，必须领导农民反对旧政权和旧制度，麻痹在人民自由和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

自由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孟什维克不了解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时期的这些策略原则。普列汉诺夫同志也不了解这些原则。”^①不过，普列汉诺夫开始提出机会主义策略观点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出版的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而孟什维克制定出机会主义策略路线则是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因此，普列汉诺夫形成机会主义的策略观点，比其他孟什维克早。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五年一月开始，写了许多篇文章，引经据典，对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理论论述，因此，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集其他孟什维克策略观点之大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他孟什维克都露骨地宣称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必须由自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普列汉诺夫则是在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分开走，一起打”平行领导革命的漂亮口号的伪装下，使无产阶级放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此，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同其他孟什维克相比，更隐蔽，也更富于欺骗性。从上述这些方面看，可以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的理论代表。列宁于一九〇六年曾指出：普列汉诺夫是“目前我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②。但是普列汉诺夫想竭力掩盖这一点，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自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吹捧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比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好得无法比拟”^③，以蒙蔽国内外人民群众。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4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7页。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92、193、203页。

曾多年担任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十六日还给社会党国际局写信，信中完全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历史，把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诬蔑为是“擅自行动”，把代表大会诽谤成只有“一半左右的‘全权的’组织”参加的“极端集中主义者和泥潭派的结合体”^①，乞求社会党国际局来干涉俄国党的内部事务。社会党国际局听信其言，向欧洲工人隐瞒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的分歧实质，在一九〇五年六月打着“调停”的旗号，组成仲裁委员会，妄想采取组织干涉的办法，强迫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并接受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与此同时，考茨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著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面孔，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列宁和他的朋友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的攻击”^②，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慕尼黑党内出版社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企图用抵制这本小册子的粗暴办法，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听到布尔什维克的声音。

无论是社会党国际局的组织“仲裁”也罢，无论是大名鼎鼎的考茨基的理论“攻势”也罢，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老资格的“领袖”的谩骂也罢，都没能吓倒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既然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大旗，彻底粉碎了伯恩斯坦主义及其俄国变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那末他们就一定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绝不容孟什维克沾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两次写信给社会党国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9卷，第319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8卷，第499页。

际局，逐条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在同年六月十六日给社会党国际局信中所散布的谬论，并指出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该执行局的代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拒绝了社会党国际局的“仲裁”，用德、法等国文字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原原本本地公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报和决议。列宁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在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年）的信中，坚定地表示：“我现在正着手答复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期）。必须把它痛骂一顿，因为他也有许多卑鄙行为和毫无价值的论据。但愿我能成功。”^① 列宁在这时期先后写了许多篇义正词严的理论文章，主要有：《论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六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九〇五年七月）、《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九〇六年五月）等。列宁在这些文章中，彻底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

第 三 节

起义前号召工人学会掌握武器 失败后又说本来勿须拿起武器

一九〇五年秋，俄国革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十月政治罢工席卷全国，参加这次政治总罢工的产业工人就有一百多万。小职员、学生、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也参加了罢工。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口号，推动了革命运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农民运动在占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32页底注^①。此处所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即《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蓬勃展开。在普列汉诺夫家乡唐波夫省和他青年时期从事过民粹派革命活动的萨拉托夫省，以及切尔尼果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等省，都发生过农民起义。在许多城市发生了士兵骚动。沙皇政府迫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只靠武力马上难于把工农革命运动一下子镇压下去，于是在磨刀霍霍的同时，大肆玩弄和平骗局，以便麻痹人民群众，争得时间，加强武力，准备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于是在十月三十日（旧历十月十七日）颁布了宣言，承认“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宣言还许诺让各阶层居民参加选举，召集有立法权的杜马（国会的俄文音译名——作者注）。

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地主阶级在沙皇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颁布宣言之后，建立了“十月党”，又叫“十月十七日同盟”。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沙皇颁布的“宣言”，暗中还与沙皇政府勾结，组成了“黑色百人团”，它囊括了反动的地主、商人、神甫和地痞流氓。这个匪帮式的警察团体，在警察的协助下，殴打和杀害革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破坏群众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些人象夜老鼠似地专在暗中干罪恶勾当，所以人们又把他们叫做“黑帮”。

在沙皇政府十月三十日颁布“宣言”之后，为了更好地参加和组织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时住在日内瓦的列宁决定立刻回国。列宁考虑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又看到普列汉诺夫同孟什维克其他首领有些意见分歧，并已开始向布尔什维克方面靠拢，于是劝说普列汉诺夫加入即将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新生活报》的编委会，为此，列宁于十月底给当时也住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邀请他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工作。列宁在信中诚恳地说：“我清楚知道，所有的布尔什维克

往往把同您的分歧看作是暂时性的，是特殊情况引起的。是的，斗争常常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如发表声明和演说，这不能不给将来的统一造成某些困难；但是我们一直渴望统一，一直感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力量离开工作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直感到整个运动极需要您的领导，您的热心的、直接的参加。同时我们大家坚信，尽管目前还有不少困难和障碍，我们和您的联合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反正是要实现的。”^①列宁在信中一再表示“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致的信念：我们认为同您共同工作是有益的、重要的和必需的。”^②列宁并希望同普列汉诺夫在最近会晤、面谈。列宁在这里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不顾忌自己的尊严，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以革命事业、以党的团结和统一为重，对已陷入机会主义泥潭并三番五次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伸出了热情的手，希望和他一起共同作好革命工作。但是普列汉诺夫并未同列宁会面，也拒绝为《新生活报》撰稿。看来，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自恃甚高。

列宁在十一月回到了俄国。在列宁回国的前前后后，许多流亡在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也纷纷回国参加革命。普列汉诺夫也渴望回祖国去，但这时，他因结核病加重而未能如愿以偿。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当列宁回到俄国时，革命斗争已发展到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之势。列宁躲开沙皇警察们的监视，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在工人、士兵和水兵中展开了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在工人中组建战斗队，搞军事训练，筹集武器。

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怎样对待即将爆发的武装起义呢？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在普列汉诺夫发表的机会主义策略代表作《分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8—369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开走，一起打》中还曾经号召：“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武装起来！”^①但是现在他又错误地把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重点仅仅放在制造起义胜利的心理条件上。他说：我们只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坚持不懈的革命宣传工作，这就必然会使群众同政府发生决定性的冲突”^②。普列汉诺夫赞成孟什维克《火星报》提出的口号：“用进攻专制制度的迫切需要”把群众武装起来。宣传武装起义的必要性是应该的，但到了行动的时候，还停留在口头宣传上，那就落后于革命斗争的形势了。列宁严厉斥责了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这种尾巴主义论调。他说，当所有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拿起武器”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和“《火星报》却大言不惭地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武装，而在于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难道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毫无生气的说教吗？”“难道这些人不是把党拖向后退，使党离开革命先锋队的迫切任务，只看无产阶级的‘后背’吗？”^③

普列汉诺夫在《分开走，一起打》这篇文章中还居然制造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武装起义的胜利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和沙皇军官身上。他认为武装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两个“完全必要的条件”：第一、无产阶级起义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社会人士’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尽可能瓦解敌人的力量”^④。他认为：“起义的成功完全系于军队的行为”、“军官的行为对士兵的行为会发生强大的影响”，而“军官到底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社会人士’会比我们更好地向自己的身着军官制服的儿子说明，向人民开枪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38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第148页。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40、142—143页。

即使从誓词的狭隘概念的观点看来也是一种罪行”，军官“要为祖国服务，他在道义上没有权利为了沙皇的利益而去做祖国的刽子手”，“因此武装起义的拥护者应当接近”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人士”^①。

沙皇军官不是铁板一块，争取部分军官特别是下层军官转到革命人民方面来，也是可能而且完全必要的。如果能做到这点，对革命是有利的。但是普列汉诺夫让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主要从沙皇军官那里寻求对武装起义的“巨大帮助”，那是异想天开。他没看到沙皇军官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眼中的“道义”就是枪杀革命群众，他们耳中的“社会舆论”就是执行沙皇和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命令。至于让无产阶级从反动的自由资产阶级那里寻求对武装起义的支持，更是白日作梦。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论调叫做“市侩机会主义的看法。”^②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俄国革命从总政治罢工发展到了武装起义的阶段。布尔什维克认为，组织与号召无产阶级立刻举行武装起义，是势在必行的迫切任务。此时，无产阶级政党工作中的主要弱点不是过分迷恋于武装起义的号召，而是在这方面显得落后。在这武装起义一触即发的严重关头，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他主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三期上发表了论述其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文章——《我们的处境》。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正确指出：“同黑帮分子作斗争使武装问题变成了最迫切的实践问题之一。并且不只是武装问题而已。”“获得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应当学会掌握它们。”^③他并且强调要“武装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41—1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02页。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64—265页。

得好”^①；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认为武装起义时机不成熟，主张要“更加审慎地谈论武装起义”^②。布尔什维克同他看法不一致，他就不厌其烦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硬说布尔什维克对武装起义“暴露出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轻率态度。他们的头脑变成了专弹武装起义调子的特殊的‘自动机械乐箱’。”^③他还用陈旧的唯武器论吓唬工农群众，他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火枪（以及左轮手枪）的自动射击对我们的事业可能有直接致命的危害。”^④可见，普列汉诺夫对即将爆发的武装起义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革命运动的发展突破了普列汉诺夫的陈旧教条。十二月十八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号召莫斯科工人立刻组织总政治罢工并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前，莫斯科无产阶级拥有两千个战斗队员。二十日开始总政治罢工，二十二日开始武装起义。但在起义前夕，因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被沙皇政府破坏，而使这次武装起义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未能及时地同已经开始组织骚动的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取得联系。沙皇政府在把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骚动镇压下去之后，从彼得堡、特维尔和西部边防地区调来了超过起义者几倍的部队进行镇压。几千起义工人与沙皇军队浴血奋战了九天，但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受莫斯科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影响，其他一些城市和各被压迫民族聚居区也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最后也都遭到沙皇的血腥屠杀。

莫斯科无产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普列汉诺夫立刻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四号《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266页。

③ 同上书，第267页。

④ 同上书，第266页。

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文章《再论我们的处境》。他在这部“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①中，教训俄国无产阶级说：“开始得不合时宜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索尔莫夫、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所以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②他还胡说，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证明，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在于“过份迷恋于武装起义的主张”，无产阶级的“错误”在于“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全部冒险性”，走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今后“我们必须掌握”和平的合法的“新的策略手段”，“应该立刻加强对工会运动的注意”，“依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获得新的力量”^③。

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武装起义所持的立场，实质上是对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历史证明，各种社会革命都是经过反复较量，不断斗争，走从失败直至最后胜利的曲折复杂道路。这是人类社会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当在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与反动统治阶级失败的本质差别，看到革命必定胜利的光辉前景，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迎接新的革命斗争。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也要敢于承担革命的暂时失败，经受住失败的锻炼和考验，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个不敢于去夺取革命胜利又未能经受住革命失败考验的人。他被革命的暂时挫折吓得惊慌失措，转而诬蔑武装起义，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同国内外资产阶级一起唱诬蔑武装起义的反调。自由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4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82页。

③ 同上书，第278、282、283、278页。

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写道，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证明了，武装起义的成果总归要被反动势力清除掉的^①。德国资产阶级学者麦克斯·维贝尔（一八六四——一九二〇年）教授把莫斯科起义当作人为的把戏加以嘲弄^②。普列汉诺夫也跟着叫喊“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有力地回击了普列汉诺夫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对十二月武装起义的诬蔑。他斩钉截铁地说：“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③普列汉诺夫公然把自己这种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说成同马克思一样，他不自量地说：“也许您会对我说，我想阻挡运动。我不会争辩，也不会反驳。为什么不阻挡它呢？阻挡的角色并不是永远应当受到谴责的”，“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扮演过这种角色，它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的呼吁书中曾经警告巴黎无产阶级不要进行不合适宜的发动。”^④确实，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秋，曾经劝告巴黎工人不要急于推翻政府。但到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巴黎工人开始起义时，马克思立刻旗帜鲜明地站在起义工人一边，充当他们的“实际的顾问”^⑤，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欢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成立。后来，马克思也没有被巴黎公社的失败所吓倒，得出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结论。相反，他正确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击溃了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6—25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66页。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82页。

⑤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3页。

则。马克思没有说过半句象普列汉诺夫教训革命群众的那种学究式的言论。列宁一言说穿了普列汉诺夫这位庸夫俗子和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对待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所持的态度的本质差别。他愤慨地说：“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天上，一个地下吗？”^①普列汉诺夫处处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自以为按照马克思的榜样办事；实际上他往往教条式地生搬硬套，显然和马克思有天壤之别。

第四节

在主要问题上充当孟什维克的 “思想领袖” 在个别问题上又 同孟什维克有分歧

沙皇政府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它在用武力镇压的同时，也玩弄和平欺骗的把戏，谋求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散布立宪幻想，妄图使工农群众放弃武装斗争。早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九日，沙皇政府就公布了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一八五一——一九一一年）领导的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召集谘议性机关国家杜马的法案和选举条例。由于规定杜马的选举权只限于有产者，工人连一个席位也没有，地主的代表占据了国家杜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席位，其余席位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们把这个杜马称之为布里根杜马。地主资产阶级热烈欢迎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认为它是“解放运动的转折点”，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并在选举中同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2页。

自由派合作。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如果支持杜马就会转移人民革命视线，所以布尔什维克积极抵制这个反人民的杜马，主张建立革命军队，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主张在城乡都应积极支持布里根杜马，坚决反对抵制。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章《我们的处境》中，阐述了他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他虽然基本上与孟什维克相同，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但是对城乡又有不同主张。他反对在农村抵制布里根杜马。基于低估农民的革命性，他声称，“农民的政治觉悟非常低”，在农村如果抵制这个杜马，就不利于在农村形成一个“自觉的反政府派”，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他建议起草告选举人的农民委托书，向杜马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同时，他又承认“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在城市人民特定的情绪的条件下的确是最好的策略。”^①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反对在农村抵制布里根杜马是对农民散播幻想，不利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因此是错误的；而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抵制策略则是正确的。沙皇政府十月三十日公布的宣言中，被迫许诺召集立法杜马，就意味着谕议性的布里根杜马不召开了。列宁说得好：“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②。

沙皇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颁布了召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法令中强调这是“立法”的杜马，以区别于“谕议性”的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是沙皇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谢·尤·维特（一八四九——一九一五年）制定的，故又称之为维特杜马。根据这个选举法，包括妇女和二百多万工人在内的半数以上的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选民被分成地主选民团、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选举是多级的，而不是直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263、2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3页。

接的。这种限制重重、极不平等的选举法，足以保证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杜马中占据优势。在维特杜马召开的前三天，沙皇政府公布法令，规定沙皇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有权修改国家的宪法，有权不经过杜马公布重要法令，连杜马通过的法令也要最后经过沙皇批准。可见，维特杜马也不是什么“立法”机关，实际上也同布里根杜马一样是沙皇政府的谄议机构，是沙皇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是沙皇政府为平息革命而玩弄的民主骗局，是沙皇政府“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①，是“人民公敌的国会”^②。

尽管如此，但是沙皇政府召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一出笼却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欢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法令也积极拥护，他们对工农群众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经过杜马，人民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立宪制度，农民就可以得到土地。布尔什维克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代表会议。会议认为，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加强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两派的团结，必须戳穿沙皇玩弄的民主骗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革命策略，坚持武装起义是俄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的正确方针。

普列汉诺夫在维特杜马的法令公布之后，陆续发表了《论杜马选举》（一九〇六年三月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论策略和不策略的——致工人们的信》（一九〇六年五——七月）等一些文章，竭力粉饰国家杜马的阶级实质，颂扬国家杜马，散播立宪幻想。他说国家杜马“成了人民注意的中心”^③，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72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8页。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下册，1965年中文版，第15页。

它的“一切工作都是好的”^①。他认为不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国家杜马就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说什么“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马”^②，“应当在群众性的革命鼓动的文火上把官僚制度妈妈烤熟”^③。他和孟什维克主张对第一届国家杜马采取半抵制的策略（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普列汉诺夫诋毁布尔什维克抵制选举的策略，说是“一个错误”，是建立在“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的“心理错觉的基础上”，它“所捍卫的策略包含着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假革命性的标记”，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④。

布尔什维克认为，反动的杜马选举制度使人民群众控制不了杜马；即使控制了杜马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的装饰品，也不能触动沙皇的国家机器、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绝不是靠杜马内的辩论和清谈，而是靠杜马外面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

普列汉诺夫追随立宪民主党头目米留可夫，卖力地美化国家杜马，想通过国家杜马推翻专制制度，号召“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马。”在没有议会制的俄国，他居然玩弄起议会把戏，真是笨拙而又十足的议会迷。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马”，成了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活动中所遵循的主旨，从而“把孟什维克主义发展到了顶点”^⑤。列宁斥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同上书，第26页。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19、321、325底注③、320页。

⑤ 《列宁全集》第12卷，第2页。

责了追随立宪民主党、美化国家杜马的普列汉诺夫。他说：“跪拜在米留可夫膝前的普列汉诺夫竟看不出这种粗暴的、肮脏的被立宪民主党人用文明外衣装饰起来的民主骗局，他该近视到什么程度！”^①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由于他和孟什维克奉行半抵制策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结果，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威信下降，使立宪民主党骗到大量的工农选票，成为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资产阶级报刊欣喜若狂，纷纷感谢普列汉诺夫。列宁讽刺地描写道，“正象当时德国自由派对伯恩斯坦关怀备至以及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把他捧上天一样，现在俄国没有一家自由派报纸，甚至没有一篇自由派报纸上的文章（直到《言语报》为止，对、对，直到十月党人的《言语报》为止！）没有拥抱过、吻过、爱抚过这位英明的、有远见的、谨慎小心的、头脑清醒的、敢于起来反对抵制的普列汉诺夫。”^②普列汉诺夫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给一位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竟厚颜无耻地说：“您好象责备我，说‘自由资产阶级’现在都在夸奖我。但是这种责备一点也不会使我心怀内疚。恰恰相反，只要无改于初衷，丝毫没有背叛自己的世界观，然则在我们应当孤立反动派的这等重要历史时刻，我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称赞，那倒是一件美事。”^③

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沙皇政府颁布召集维特杜马法令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还住在瑞士离洛桑较近的蒙特尔治病。未等病治好，他就于一九〇六年一月初回到了日内瓦。他弄到了护照，整理好要带走的书籍和文稿，准备马上动身回俄国去。但很快收到查苏利奇自彼得堡来信，暗示捷依奇已经被捕，俄国反动派开始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0—171页。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27页。

疯狂迫害革命者，劝告普列汉诺夫暂时不要回国。于是普列汉诺夫全家迁居到意大利离热那亚城不远的小矿泉疗养地鲍利亚斯科。他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一方面养病，一方面从事写作，为自己主办的个人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五期撰写文章，并为一九〇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的理论》校阅了俄文译文并撰写了序言。普列汉诺夫做完了这些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好定于四月底在瑞典召开，他就决定动身去参加这次会议。

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联合召开的一次统一的代表大会。本来两派已各有自己的中央，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党。但是广大工人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强烈要求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倡议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工人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一百一十二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出席大会的还有二十二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如何统一党的组织；二、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围绕这两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和失败后遭到破坏，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拉入党内，所以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有六十二名，布尔什维克才四十六名，孟什维克占据了多数。还有一部分代表态度暧昧。因此，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了具有孟什维主义观点的决议。普列汉诺夫出席了大会。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副报告，即《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在大

会上，他还作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发言》，拟制了孟什维克的杜马决议草案。他又是大会武装起义问题委员会主席，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是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主要制定者。他在会上还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工会中起领导作用的决议草案。“他是代表大会上的孟什维克的真正的思想领袖”^①，系统地表述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拥护土地市有化，指责俄国无产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美化沙皇导演的民主骗局——国家杜马等，鼓吹工会中立论。

列宁出席了大会，作了关于土地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问题、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对武装起义和其他问题作了发言。列宁在报告和发言中，批驳了在这些问题上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主义观点。

土地问题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主要讨论土地纲领：会上提出了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市有化三种方案。列宁代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土地国有化。他认为在推翻了沙皇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应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没收，归国家所有，然后分配给农民使用。实行土地国有，可以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铲除农奴制残余，消灭绝对地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促进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也为将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前提是号召农民胜利完成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另一部分从事地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有小私有观念，土地国有化不易为农民接受，他们主张平分地主土地，归贫苦农民私有。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8页。

孟什维克主张土地市有纲领。孟什维克基于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否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主张把地主的土地不交给国家所有，也不交给农民所有，而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即市政局所有，农民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再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这些土地。这种土地纲领，对农民散布幻想，似乎可以在保存反动的旧政权的条件下用和平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它不但不能消灭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是变相保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为掌握着地方自治局大权的是地主和富农，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地主的“管家”。所以，土地市有制只不过是披上伪装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孟什维克拥护的土地市有化纲领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更不能动员农民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种土地纲领是破坏工农联盟、诱使农民同地主妥协、从而使革命半途而废的纲领。

大会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一共有五个报告人：列宁是第一个，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决议草案。第二个是孟什维克彼·巴·马斯洛夫（一八六七——一九四六年），提出了土地市有化决议草案。普列汉诺夫是这个问题的第三个发言人，拥护马斯洛夫的土地市有化决议草案。第四个是彼·彼·鲁勉采夫（一八七〇——一九二五年），他基本上支持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方案。第五个是谢·亚·苏沃洛夫（一八六九——一九一八年），他维护分配土地归农民的方案。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对土地问题作了两次发言，他的发言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普列汉诺夫的中心论据就是，土地市有化纲领能够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土地国有化必然导致反动势力的复辟。他说：“我们的纲领应该力求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① 普列汉诺夫还搬出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32页。

彼得大帝以前十七世纪俄国实行的土地国有化的结果、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后出现的复辟，作为历史根据，说如果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必然要导致反动势力的“复辟”，反之，如果实行土地市有化就能防止反动势力的“复辟”。他声称：“市有化则是另一回事。万一复辟，它决不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相反，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这将是一种很强大的支柱。”^①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实现土地国有化、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条件。普列汉诺夫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错误地认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否则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他露骨地表示：“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但只有在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是必须的。既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那我们就必须拒绝夺取政权。恩格斯说，谁在一八四八年的经验以后认为社会党人可以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那他就或者格外地愚蠢，或者只是用革命的空谈来对付革命的事业。”^②他把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诬蔑为“在复辟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③。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攻击说：“列宁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待国有化。”^④他甚至引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一七六九——一八四四年）寓言《杰米扬的鱼汤》的故事：杰米扬屡次请客人喝鲜鱼汤，使人吃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33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③ 同上书，第338页。

④ 同上书，第331页。

得不想再吃，纷纷离席而去。普列汉诺夫说，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什么结果也不会有，除了杰米扬式的鱼汤以外，我们大家早就对这些争吵腻烦了。”^①他还冷嘲热讽地说列宁是为最糟糕的案子辩护的“出色的律师”^②。孟什维克代表在会上听到普列汉诺夫说这些攻击列宁的俏皮话时，令人作呕地狂笑，得意忘形地鼓掌。他们以为普列汉诺夫理由充足，辩驳巧妙。其实，这只能暴露出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根本没有理解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的真实含义。列宁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之后，才把全部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而且列宁当时是预计到，俄国民主革命将要引起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土地国有化会导致反动势力的“复辟”，岂不是无稽之谈吗？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等人“制定土地纲领不是为了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一最重要的农奴制关系的残余进行斗争，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为了实现小市民可怜的企图：把新旧事物‘和谐地’结合起来，把分配份地所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同革命没收来的农奴制大地产结合起来。”^③这样做正是适应了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保存沙皇专制制度、求得妥协的要求。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承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即不是把无产阶级引向彻底胜利，而是要它同旧政府勾结。”^④列宁把土地国有化纲领称之为“立宪民主党的纲领。”^⑤

由于孟什维克在会上占多数，列宁眼看没有可能通过土地国有化的草案时，就转而投票赞成土地私有化的草案。但是最终大

①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0页。

④ 同上书，第147页。

⑤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5页。

会还是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发言中，继续鼓吹“杜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不应当绕过它。”^①

普列汉诺夫拟定的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的决议中，主张“有计划地利用政府和杜马之间以及杜马内部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便扩大和加深革命运动”^②。这显然是对杜马作了过高的估计。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武装起义发言的中心内容，就是惧怕武装起义，主张放弃武装斗争。真是“一旦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他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问题委员会的领导人，亲自把孟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决议草案第一条中的“争取政权”的字样，改为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③，公开放弃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把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个条文斥之为“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条文”^④。

关于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鼓吹工会中立论，我们集中到本书第十章第一节来写。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在德国的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一个星期，在瑞士的苏黎世和伯尔尼，他以孟什维主义观点作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然后他回到日内瓦家里。由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卖力过度，旅途又劳累，再加上原来病体孱弱，只得移居到日内瓦湖畔的小村子莫纳克斯休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41页。

② 参见上书，第343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70—271页。

④ 参见上书，第271页。

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刚闭幕，沙皇政府就于一九〇六年五月十日召集了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认为可以把农民争取到沙皇政府周围，就允许农民代表占杜马代表全部名额的百分之四十，答应杜马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也竭力散布立宪幻想，农民代表更加相信经过杜马可以得到土地。可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教育，由农民代表组成的劳动派，要求杜马制定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土地实行国有的土地法。这一举动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全国一半县份展开的农民运动。沙皇政府一看，大事不好，召集杜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平息革命，反而事与愿违，助长了农民运动，威胁着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在七月二十一日下令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撤销了维特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

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二百名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在杜马解散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维波尔格集会。在集会上发言的议员，认为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被解散是“共同的悲痛”。会上通过了《告人民书》，号召人民以不纳税和不出壮丁进行反抗，要求沙皇政府尽快召集新杜马。普列汉诺夫针对这一情况，及时地于八月在他主办出版的第六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发表了题为《‘共同的悲痛’》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立宪民主党对国家杜马的幻想。他正确指出：“业已夭折的杜马本身是微不足道的。”^①又说：“‘解散’国家杜马是一课生动的教训，它清楚地告诉人民，十月‘宪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②因此，他奉劝立宪民主党人，不必因为国家杜马解散而“悲痛”，只要召集立宪会议，就可以把“共同的悲痛”变成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79—80页。

“共同的欢乐”。他宣称：“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制定真正的宪法。”^①他分析了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不同态度，尖锐指出立宪民主党由于害怕农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而“将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②。他还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阶级局限性。他说：“立宪民主党对待人民中间宣传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的否定态度清楚地告诉所有有眼睛的人，立宪民主党人保卫全民的利益只有一定的范围，只是在这种利益不同他们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下，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让前一种利益牺牲于后一种利益。”^③他主张各个革命的政党实行协商，来为立宪会议而斗争。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便专门写了《策略上的动摇》，对普列汉诺夫文章中的这些与孟什维克完全不同的观点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第六期《日志》上，抛弃了他（和拉赫美托夫同志一起）在杜马时期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极右翼的立场。他仍然根本反对孟什维克用补充‘通过杜马’、‘拥护杜马’等等字样来削弱‘争取召开立宪会议’这个革命口号的意图。普列汉诺夫公正地指出，革命口号只能是召开立宪会议，并且公正地批评了维波尔格宣言没有提出这个口号。普列汉诺夫同时仍然根本反对孟什维克一定要把‘发动’同杜马联系起来的意图，尽管是部分的发动，而不是总的发动，尽管是仓促的和没有准备的发动，而不是比较迟缓的和比较成熟的发动。最后，普列汉诺夫这回不但没有拿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来迁就立宪民主党的口号，不但没有把立宪民主党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同看待，反而直接地公开地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怪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84页。

②③ 同上书，第83页。

不得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也闭口不谈普列汉诺夫了！），并且极其坚决地拿‘劳动’农民同他们对立起来。”“这一切都使我们非常高兴。但失望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有许多地方还讲得不透彻，在策略上还有一些动摇。”^①列宁后来肯定地指出：“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之后，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②。从列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普列汉诺夫在《‘共同的悲痛’》一文中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但文章中也有错误观点。主要的错误观点是继续鼓吹：“我们大家都承认‘分开走，一起打’这个策略公式是正确的。”^③他不知道在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只能同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联合，而笼统地提出“齐心协力地、有计划地、不倦地、广泛地在人民和军队中间宣传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乃是对驱散国家杜马唯一适当的回答。”^④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还继续攻击布尔什维克。所以，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进步并不怎么大”^⑤。

沙皇政府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之后，于一九〇七年二月至六月，又召开了第二届国家杜马。此时革命已经走向低潮。列宁及时总结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教训，认为抵制布里根杜马是正确的，它有利于打破立宪幻想，促进无产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成熟；但十二月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失败以后，革命运动已走向低潮，布尔什维克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虽然极大地损坏了它的威信，却未象扫除布里杜马那样把它搞垮。所以，列宁认为“一九〇六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160—1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6页注①。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82页。

④ 同上书，第84页。

⑤ 《列宁全集》第11卷，第164页。

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① 布尔什维克决定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以便在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使革命群众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中只要坚持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同沙皇相勾结的阴谋，捍卫工农利益，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准备和积蓄力量。但布尔什维克并不对国家杜马抱有任何幻想。

孟什维克也参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他们把国家杜马看成是可以限制和削弱沙皇政府的立法机关，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联合起来，共同在国家杜马中进行“立法”工作。孟什维克对第二届国家杜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虽然都主张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但出发点和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后，曾一度对杜马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当第二届国家杜马召开的时候，他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又开始颂扬第二届国家杜马。他硬说第二届国家杜马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代表的信任为依据”^②，所以“人民欢迎杜马”^③。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七日第一百二十二号资产阶级的《同志报》上具体提出了“全权杜马”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可以接受它，并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内容。他说：“全权杜马！”“这是一般公式。每个党派都将用它所中意的确定的算术值来取代公式中的代数符号。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设想全权杜马。不过无论这个党或者那个党都需要它。因此，它们必须共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279页。

③ 同上书，第262页。

为它而斗争。”^①普列汉诺夫想以此口号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建立选举联盟。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七年三月八日出版的《俄国生活报》第四十六号上以《关于新杜马》为题，发表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议员们的公开信，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接受“责任内阁”的口号，以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共同组成一个同情人民、对人民尽义务的“责任内阁”。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论是进行革命决战的时候，还是进行革命退却的时候，“责任内阁”都能起到良好作用。他说：“或者迅速增长的革命力量现在已经超过政府力量，那末，责任内阁的要求便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与反动派决战的信号。或者革命力量还未超过政府的反抗力量，那末进行决战还不合适；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要求仍然应该加以支持，因为它是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使人民为未来的胜利战斗作准备的最好的教育工具。”^②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发表鼓吹“责任内阁”的文章当天，即一九〇七年三月八日就动笔写了《论机会主义的策略》的文章，专门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责任内阁”的谬论。“责任内阁”既不是政权归人民，也不是政权归资产阶级自由派，而是维护沙皇政府的反动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勾结的产物。所以在革命决战的时刻提出“责任内阁”的口号，只会松懈革命人民的斗志，忽视以武装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目标，或者延缓革命人民群众同沙皇的决战，或者使已经爆发的革命中途流产。而在准备决战的时候提出“责任内阁”这个口号，只能是模糊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认识，制造对立宪民主党的幻想。列宁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276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揭穿了“责任内阁”口号的机会主义实质。他说：“这个口号会牺牲民主派和我国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教育群众认识人民为实际的政权而斗争的实际任务，会放弃这种根本利益而迁就那种暂时的、偶然的、枝节的和不明不白的自由主义的口号、任务和利益。”“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也正是这样：放弃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而迁就自由派不彻底的、不明不白的任务。”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全权杜马”这个口号太空洞，而不理睬普列汉诺夫。立宪民主党人也不买普列汉诺夫的帐，他们害怕同意“全权杜马”的口号就意味着承认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革命要求，而不敢接受这个口号，轻蔑地嘲笑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落得孤家寡人，狼狈不堪。于是他在文章中，大骂一痛，发泄不满，诬蔑布尔什维克是“布朗基主义者”，责备资产阶级《同志报》“不够谦虚”，批评孟什维克不够机智等等②。列宁生动地描绘道：“可怜的孟什维克，可怜的普列汉诺夫呀！他们写给立宪民主党人的情书已经被满意地读过了，但是还不允许他们越过前厅一步。”③

在沙皇召集第二届国家杜马之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已明显地走向低潮，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和研究俄国革命斗争的形势，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三日——六月一日在英国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以梯弗里斯的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三百三十六名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着十五万党员。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代表九十七名，崩得代表五十七名，波兰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6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2页。

③ 同上书，第298页。

民主党代表四十四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二十九名，无“派别”代表四名。布尔什维克因为争取到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拥护，而在大会上占了稳定的多数。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就一些主要讨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几个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老党员，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大会并致了开幕词（尽管他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都未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由于他当时正在生病，身体不好，没代表孟什维克作报告，只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讲了话。

他在开幕词中，感谢包括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的全体与会代表让他主持大会开幕，但是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同他打过官司，又说布尔什维克已经“认识到我们都站在一个旗帜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红旗下”^①。显然，普列汉诺夫这是想粉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他在开幕词中还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党内几乎完全没有修正主义者”^②。

在讨论大会议程时，普列汉诺夫竭力反对布尔什维克提议把对时局问题和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阶级任务问题列入日程。他在发言中表示为保卫孟什维克的观点，要同布尔什维克论战到底。他趾高气扬地说：“有一次俾斯麦在德国国会同李卜克内西争论时说过：‘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谁也不怕！’李卜克内西回答他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连上帝也不怕！’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还更要勇敢些：我们不但怕上帝，甚至也不怕比上帝更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至于我们的论敌也谈到的鄙人，尽管我身体不好，我还是到代表大会来了，这不是因为我避免同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07页。

② 同上书，第308页。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见面，而是因为我喜欢同自己的论敌碰碰头。”^①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杜马党团工作报告的长时间的发言中，认为他提出的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建立“全权杜马”、“责任内阁”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重弹“杜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②的老调，指名道姓地辱骂列宁是“冒牌预言家”^③，诬蔑“布尔什维克正在沿着革命冒险主义的道路前进”^④。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一再为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洗刷。他说：“有人把我们的同志们的策略观点称为机会主义的。这对不对呢？根本不对！它们没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影子。”^⑤实际上，这一套主张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⑥。

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大会上争论异常激烈的重要问题。普列汉诺夫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了言，顽固坚持俄国资产阶级是俄国民主革命动力的孟什维主义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著名的女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向大会致贺词中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这个机会主义谬论，把普列汉诺夫比作“可敬的化石”，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地为自己辩解。

大会还讨论了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并得到其他孟什维克支持的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孟什维克主张召开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孟什维克想建立这样一个由它控制的、以小资产阶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18页。

③④ 同上书，第322页。

⑤ 同上书，第312页。

⑥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35页。

级思想为指导的“广泛的工人党”，来同布尔什维克相抗衡。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严厉批判了孟什维克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责备布尔什维克对工人代表大会所持的反对立场妨碍了无产阶级主动精神的发挥。他说：“如果工人代表大会是工人运动合法道路上的新步骤，那末害怕这个大会就意味着陷入无政府主义。”^①

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的演说博得了与会的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狂呼乱叫和热烈鼓掌。而布尔什维克在会场上当众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谬论，布尔什维克代表们有时喊：“这不对！”“这不严肃！”有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站起来质问他。当普列汉诺夫谈到农民时，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力地回击他道：“您没有看见过农民！”^②

斯大林代表梯弗里斯党组织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后来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文中谈到了罗莎·卢森堡在这次大会上的两次演说。他写道：“关于无产阶级起革命领袖的作用、关于自由资产阶级起反革命力量的作用等问题，卢森堡完全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她批评了孟什维主义的首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③。普列汉诺夫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一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仍然充当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的角色。他在这次大会上，抱病为孟什维主义辩护，发言攻击布尔什维克，颂扬孟什维克。当然在个别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还同其它孟什维克有意见分歧。例如，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上，他就谴责了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他虽然赞成召开“工人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28页。

② 参见上书，第314、316、32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63页。

代表大会”，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孟什维克所抱目的有所不同。正如列宁后来说的：“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即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六日（旧历六月三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六十五名代表，被扣上策划“叛国阴谋”的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经法庭审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内阁总理彼·阿·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年）对工农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历史上把沙皇政府的这一反革命举动，称之为“六三政变”。“六三政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了，反动的斯托雷平统治时代开始了。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爆发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它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俄国无产阶级后来在一九一七年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充分的演习。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也是普列汉诺夫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之后，遇到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是普列汉诺夫面临的一个新考验。自从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严肃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问题上散布的机会主义观点，并郑重指出了他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与帮助，希望他放弃机会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却执迷不悟，反而在机会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但是普列汉诺夫在对待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波将金”铁甲舰起义、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国家杜马等重大问题上，又采取了不同于一般孟什维克、而接近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立场。这又说明，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同一般孟什维克是有矛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3页。

盾的，是有所不同的。

列宁指出，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孟什维克是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①普列汉诺夫也是如此。如果说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话，那末到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他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上全面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列宁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及时地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指出：“至于说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②。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们必须向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③。

普列汉诺夫以他的机会主义策略，全面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自然完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受到了资产阶级异乎寻常的欢迎。资产阶级的《同志报》，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言论报》，甚至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人的《言语报》，都对他异常恭维，**大加吹捧**。资产阶级不惜金钱翻印它的著作。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伊兹加也夫特别赞扬他的“明智冷静”^④。因为资产阶级心里明镜似地知道，普列汉诺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399页。

③ 同上书，第398页。

④ 参见萨谢里雅：《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6页。

夫把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伯恩施坦观点，悄悄运到俄国来了。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解，说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的原因，同称赞他的原因不一样。列宁给予有力地反击，他说，“资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承认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资产阶级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缓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承认‘议会’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指责了十一月——十二月斗争，特别是指责了武装起义。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问题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①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自由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大肆恭维，把他们捧上了天，替他们大肆吹嘘，翻印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给资产阶级帮了忙。”^②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0页。

② 同上书，第442—443页。

第十章

对工会中立和工团主义的不同态度

第一节

坚持工会中立论的错误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爆发，给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以巨大的推动。欧洲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状态。各国工人运动在开展合法斗争、议会斗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没有重大的革命发动。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影响之下，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开始向高潮发展。

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创造了群众政治罢工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它是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沉重打击敌人的有效手段。它在时机成熟时易于转变为武装起义。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这个创造很感兴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领导人中，曾经就可否把这种斗争手段运用到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争论。而与群众性政治罢工有关的工人政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也成了争辩的焦点之一。

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西欧长期以来流行一种所谓工会中立论：主张工会不属工人政党领导，工会应对工人政党守中立。工会中立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时间长，影响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欧洲，工会多半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以前出现的。以近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英国为例，英国工会最早建立于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三四年成立全国大团结工会。由一八三六年成立的伦敦工人协会发起，英国工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展开了要求政府承认普选权等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到一八四〇年七月建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最初的英国工人政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宪章运动衰落后，一八五一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工联的一些领导人后来积极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工作。一八八四年在英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同盟，其领导人是个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富翁的儿子亨利·迈尔斯·海德门（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后来他成了第二国际著名的机会主义者。这个党对工会影响很小。在英国工人中影响巨大的是工联。在法国，工会在第二帝国时期（一八五二——一八七〇年）已在全国较普遍地建立起来。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是于一八七六年在巴黎召开的。一八七九年以茹·盖得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在马赛创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法国工人党。德国工会萌芽于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当时出现了印刷工人工会和烟草工人工会等行业工会。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工会组织很快被取缔。后来，一八六三年六月建立了全国性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倍倍尔领导下于一八六八年加入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九年八月它在爱森纳赫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并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

派)。德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

从英、法、德等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会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以前产生的。因此它一开始就没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没有成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把持工会领导权的一小撮官僚政客，逐渐被垄断资本家所收买，他们为了帮助资本家维持对工人的剥削，便竭力鼓吹工会“摆脱政治倾向”。继工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在其领导集团被机会主义腐蚀之后，对于工会中立论，不但未予以制止，反而加以纵容。再加上各国反动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客观上妨碍了工人政党与工会之间建立组织联系。各国社会党中革命派的领导人又忽视工会工作。这就使得工会中立论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流行。

工会中立论在德国影响尤大。十九世纪末，随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滋长和传播，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逐渐把持了德国工会的领导权。德国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召开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由机会主义分子卡尔·列金(一八六一——一九二〇年)担任主席，于是工会成了列金等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桥头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形成为腐朽透顶的工会官僚集团，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所说的，这些工会官僚已“象行会会员般呆痴”，甚至公开嘲笑党，嘲笑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①。他们在领导工会运动中，把工会的活动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政治罢工，认为政治罢工是“过时的野蛮的斗争手段”，主张同资本家进行和平协商。以列金为首，这些工会官僚在党和工会的关系方面主张工会中立论，是德国工人运动中鼓吹工会中立的代表

^① 参见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1页。

人物。他们认为党和工会是“平等的组织”，党不能领导工会，工会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应采取中立态度。工会中立论，实际上是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取消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世纪初，不仅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翼领导人列金等机会主义者，狂热地鼓吹工会中立论，而且象倍倍尔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散布过工会中立的错误言论。从而，工会中立论统治了西欧工会，成为西欧工人运动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随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工会中立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拒绝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明显。因此彻底批判和清除工会中立论的历史任务，已提到当时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议事日程。

工会中立论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工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便成了当时德国党和工会的代表大会上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一九〇五年五月在科伦城召开的德国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列金为首的工会官僚，为了保持工会“中立”，使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独立行动，进而控制社会民主党，竭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利用政治罢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操纵大会通过了反对宣传和组织群众政治罢工的决议。此时，德国工会中的官僚集团，不仅仅是宣传工会要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而且得寸进尺，要控制社会民主党，使党听从他们的摆布。德国工会中的机会主义官僚集团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〇五年九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城召开了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是否支持工会中立和政治罢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上拥护工会中立论的粗木工工会的代表勃林曼，反对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工会会员群众，说什么：“在当前条件下工会是争取改善工人境况的唯一手段”^①。有些代表还以党的主席倍倍尔也是支持工会中立作为根据。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工会中立思想的声明。他指出：“诚然，倍倍尔也讲过有利于中立的话，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倍倍尔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赞同的不多几次情况中的一次。”^②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赞许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讨论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时，虽然遭到了以列金为首的工会官僚集团的疯狂反对，但由于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左派奋起斗争，由于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进程中工人进行的政治罢工取得了显著成就，所以在这次大会上拥护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占绝大多数。大会通过决议，肯定群众性政治罢工是工人斗争的有力手段之一。这就沉重打击了工会中立论者的机会主义气焰。

在一九〇五年底柏林工人决定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旧历一月九日），即俄国彼得堡工人“流血星期日”一周年这天，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是德国党领导人（包括左翼领导人倍倍尔在内）害怕这次游行示威遭到德国反动政府的镇压，背着工人群众，同工会领袖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达成以下协议：非经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列金是主席）同意，不能擅自宣布群众罢工。这就使得党要听工会的指挥，从而成为工会的附属品。这是以列金为首的一小撮工会官僚排斥党对工会的领导，进而控制党的重要步骤。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对于工会是否需要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问题，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与尖锐的斗争。俄国的具体情

①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9卷，第277页。

况与西欧不同，俄国工会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在十九世纪末，由于沙皇政权的血腥镇压，不允许成立合法的工会，只有一些秘密的革命工人的政治组织，如一八七五年在敖德萨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一八七八年在彼得堡建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还有在二十世纪初由沙皇宪兵上校祖巴托夫组织的被沙皇的警察所操纵的假工人组织。在十九世纪末一个时期，出现了以单纯搞经济斗争为目标的经济派控制的工人组织。到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俄国各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领导的规模空前的罢工运动，这时工人才开始组织工会。一九〇五年九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全国工会会议。到一九〇五年底，俄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工会。一九〇六年二月，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工会会议。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九八年早已宣告成立，一九〇三年在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所以俄国工会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以后出现的，大多是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有接受党的领导的好传统。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火星派斗争的结果，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工会斗争》的决议中，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作用。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并进行要求废除俄国专制制度的法律给工会运动设下的一切障碍的鼓动，总之，就是将各部分工人的局部冲突联合成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①在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斯得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就工会是否要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工会的决议草案中，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页。

应当在“工会中起领导作用”^①。但这个决议草案却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代表的拒绝。孟什维克代表团在大会上占多数，因此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浸透了孟什维克主张的工会中立论，只字未提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②。列宁对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非常不满。他指出：“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③

正好于一九〇六年九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曼海姆代表大会。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向修正主义者妥协，在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党与工会都是平等的”组织，不经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同意，不许举行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机会主义的工会中立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接受，党屈服于一小撮工会官僚。以列金为首的工会官僚实际上凌驾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上，可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为所欲为了。所以，曼海姆大会，也可以说是列金等一小撮工会官僚篡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闭幕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就在一九〇六年第九—十期《现代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曼海姆》一文，进一步颂扬工会中立论。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关于工会和党的论述，正确地说明了工会和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们各自承担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任务，但是他却错误地作出了“马克思曾经主张工会中立”^④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37页。

② 参见上书，第158—159页。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71页。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10页。

的结论。他在谈到党的纲领对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时写道：“强迫工会接受社会主义纲领恰恰会削弱这种影响，使一部分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才主张这些工会中立。”^①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普列汉诺夫妄想以此为工会中立论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所引证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都是说明西欧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没有一处表明马克思主张工会中立。相反，马克思一向主张共产主义政党要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工会和广大工人，当然这要讲究工作方式和方法，而决不能强迫工会接受社会主义纲领。

《曼海姆》一文的中心思想是称颂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鼓吹工会中立、反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认为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是考虑到摆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十分严重的冲突以后才制订的十分严肃的实际行动纲领。”^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曼海姆决议的好处在于它不强迫工会会员们接受社会主义纲领。他认为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就会强迫会员接受社会主义纲领，其结果势必大大地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工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二者在纲领的内容上应有所不同。但是工会作为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工人群众组织，应该争取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工会会员，努力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而要做到这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重要的保证。因此工会应该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虽然工会在宣传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上，要根据工人运动形势发展的变化和需要，灵活运用。但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这个主要方向却是不容改变的。离开了这个主要的方向，谈论“不要强迫”工会会员们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11页。

② 同上书，第121页。

纲领，那就会取消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长此下去，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就会蜕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会组织，蜕变成资本家维护自己统治的御用工具。事实上，工会不是跟着无产阶级政党走，就必然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努力争取使工会跟着自己走。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德国曼海姆九月二十六日的会议讨论情况时说：“克瓦尔克^①说道：‘党不应当说：我们走在前面，而工会则应当跟在我们后面。’他是对的：不应当说这种话，因为这是很不策略的；而这其所以很不策略，是因为这可能使那些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者离开工会。”^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是借口“不策略”而不赞成工会跟着无产阶级政党走的。

普列汉诺夫声称曼海姆决议值得称赞的地方，就在于它以“温和的精神”对待“工人的机会主义”。他别出心裁地强调“工人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区别，主张对其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说：“工人的机会主义是一回事，‘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又是一回事。工人（我指的是聪明的工人）之接受机会主义，主要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的全部深刻程度。知识分子（我指的是聪明的知识分子）之成为机会主义者，主要是因为看见这种对立性的全部深刻程度而本能地耽心它的社会政治后果。一种人仍然是可能性上的（‘自在的’）急进派；另一种人只在自己身上保存着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向后运动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宽恕前

^① 麦克斯·克瓦尔克（1860—1930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法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14页。

一种人；他必须同后一种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将有助于使机会主义的无产者变成急进主义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只会加强这个后者对工人的影响，从而延缓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提高。”^①普列汉诺夫根据这种观点，认为一九〇三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一九〇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对机会主义的妥协，都是正确的。他说：“在德累斯顿，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们向它进行了无情的全线攻击。在曼海姆，他们不得不同工人组织的机会主义打交道。于是他们显示了很大的温和精神。这只是表明他们懂得了自己导师的策略。”^②机会主义是腐蚀和破坏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工人出身的机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机会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效劳。他们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也很难说有多大差异，前者并不比后者小。普列汉诺夫如此用心良苦，但实际上仍然是为机会主义辩护。

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宣扬：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因为它拒绝了群众性政治罢工这种斗争形式。他认为，“在曼海姆就总罢工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具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保证了德国各工会对决议的同情。”^③实际上这个决议只片面强调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冒险性，而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和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指明这种斗争形式的不可避免性和党要积极为此作好准备。这是党向工会官僚的原则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12—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

③ 同上书，第119—120页。

性让步。普列汉诺夫如此赞赏曼海姆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正是符合德国党右翼领导人和工会官僚们的心意，也暴露了他自己工会中立论的宿见。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六年宣扬的工会中立论，是他在一九〇三年宣传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继续和发展，矛头都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至于普列汉诺夫反对群众政治总罢工，这同他半年前对莫斯科工人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态度，如出一辙。他在这篇文章中也不加掩饰地说：“而且俄国的经验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规模的罢工’是一种必须极端谨慎地加以使用的武器。”^①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已被莫斯科工人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吓坏了，一提起群众性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就心有余悸。所以，普列汉诺夫攻击群众性政治罢工、主张工会中立，是他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制定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继续和发展，是他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后的失败主义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一九〇七年五——六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清除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的工会中立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工会的原则，被写进了大会决议。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写道：“工会中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以及努力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联系”^②。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鼓吹的工会中立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彻底的摒弃，但他们并不甘心，还力图在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使工会中立论原则得到确认。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了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120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04—205页。

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五大洲二十五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八百八十四人。列宁第一次参加了这次大会。中派和右派在大会上占多数，而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处于少数。出席这次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包括两个分团：社会民主工党分团有三十七名代表，社会革命党分团有二十一名代表，此外，还有俄国工会的七名代表。在社会民主工党分团中，又分为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孟什维克小组，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小组。

在代表大会开幕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涅卡尔河畔举行了隆重的露天群众大会，庆祝这一次大会的召开。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倍倍尔、蔡特金、卢那察尔斯基、王德威尔得、饶勒斯等发表了演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叙述了俄国革命的情况，阐明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博得了与会者的欢呼。

“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这次大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与会的八百八十一名代表中，有二百六十六人是直接代表各国工会组织的；更主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工人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坚持工会中立论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吹鼓手之一。他在这次大会上把主要精力化费在宣传和维护工会中立论上面。他代表孟什维克参加了大会的“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他在委员会内发言宣传工会中立论，拟定工会中立草案；又在俄国代表团会议上同反对工会中立论的布尔什维克激烈地进行争辩。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暴露得最充分。

列宁因参加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便委托布尔什维克代表卢

那察尔斯基（在大会上的名字是沃依诺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就批判普列汉诺夫等人鼓吹的工会中立论、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工会的原则等问题，对卢那察尔斯基谈了自己的看法。列宁还经常召开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研究对策。但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当时也存在工团主义思想，未能在会上坚决而彻底地贯彻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会中立论的主张，所以会上出现复杂的情况。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代表团的预备会议上，就提出工会完全中立的主张。“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于八月十九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预先提出的八个决议草案。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过错，他未把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伦敦代表大会彻底摒弃工会中立原则的决议提交委员会讨论。普列汉诺夫在这次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工会完全中立。他宣称，反对工会中立的路线“对工会是致命的危险”。向会议提出的八个决议草案中，除了以法国代表团中的多数派名义提出的决议案赞成工会中立外，其余七个提案都程度不同地反对工会中立，主张在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工人之间建立联系。蔡特金写道：“在原则上已经没有人（在斯图加特）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密切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孟什维克的代表，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大会的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行动的坚决的政策……”^①。

普列汉诺夫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上，鼓吹工会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745—746页。

中立原则的结果，除了得到法国代表团中的多数派拥护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备受冷落。因此，他企图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以前，把八名俄国工会代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八月二十日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赞成工会中立的孟什维克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反对工会中立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卢那察尔斯基，在俄国工会代表面前，展开了争论。结果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在俄国工会的代表中，只有两个本来就是属于孟什维克的代表拥护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其中还有一个表现动摇），其余代表（包括所有工会代表）都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反对工会中立。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代表团会议上，为了替工会中立论辩护，屡次引证被曲解了的马克思的一次谈话作依据。这次谈话是一八六九年九月三十日马克思接见以约·哈曼为首的拉萨尔派五金工人工会代表团时进行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歪曲地报道了这次谈话。普列汉诺夫在以后写的一些宣传工会中立的文章中，一再引用经过《人民国家报》歪曲的这段话。他认为马克思在谈话中指出：“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联在一起或依附于政治团体。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说，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①普列汉诺夫引证了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以后，错误地断定：“因此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②列宁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论调。他说：“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这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49页。

② 同上书，第350页。

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这种论据是从曲解马克思的‘一段话’而来的，忽略了马克思的整个的声明和他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因此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①

八月二十日傍晚，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普列汉诺夫再次鼓吹工会中立的滥调，跟着普列汉诺夫走的只有法国代表团中多数派代表瓦扬。但是委员会根本没有理睬他们的主张，未予以讨论，而集中讨论了到底选择哪个反对工会中立的提案作为委员会草案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委员会上宣扬工会中立的主要论据，就是强调俄国情况特殊。他说：“在关于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正如在其他各问题上一样，俄国人的观点彼此有分歧。提出来的一些决议西欧可能接受，而俄国则不能。俄国存在着十一个革命组织，试问，我们的各个工会应当同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发生组织关系呢？可以想象得到，工会运动的统一会给政治运动的团结作好准备。在俄国，大约有二十四万三千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在他们中间传布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会对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反响。”^②他又说：“我们俄国的工会运动还处在萌芽时期，而且考虑到我刚才指出的种种情况，我认为俄国的工会组织应当是中立的。”^③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言论称之为“蠢话”^④。他认为，普列汉诺夫制造的这种论据，无论在事实上和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普列汉诺夫拿十一个政党做借口，这也是不聪明的。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3—444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31页。

③ 同上书，第330页。

④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2页。

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为把各民族的政党混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①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即是争夺对工人阶级群众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阶级群众。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者不去占领，就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没有中立的余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以后，普列汉诺夫还竭力宣传工会对党中立，这只能把工会中的工人阶级群众，引向拒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错误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受到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批判之后，觉察到大多数代表不同意工会中立的观点，于是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暂时停止鼓吹工会中立论，转而支持法国少数派的提案。法国少数派的提案中写明，建议工会“和党达成协议并向阻碍这种协议的分子作斗争”。后来这个提案被合并到奥地利人比尔提出的反对工会中立的提案中。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由比尔提出的并得到德国代表团支持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写明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它反对工会中立论，主张在党和工会之间建立极密切的相互关系。布尔什维克对这个提案作了些修改，主要有：谴责机会主义的“劳资协调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号召工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并向工会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些修改时，说：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把比尔从普列汉诺夫向前推进了一些”^②。大会最后以二百一十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2页。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转引自克鲁吉柯娃，《列宁在国际舞台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第153页。

二票半对十八票半^①，通过了经布尔什维克修改了的比尔的提案。俄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投票赞成这个提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决议中写道：“大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极力在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并保持诚挚的相互关系。”“党和工会进行工作时应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斗争中只采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所必需的手段。”^②这个决议虽然未写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工会，但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应保持诚挚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否定了在西欧广泛流行的、普列汉诺夫再三鼓吹的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原则。

列宁对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决议，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出：“斯图加特的决议正是按照伦敦决议（指一九〇七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引者注）的意思，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解决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③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各国工人政党的左派同主张工会中立的俄国普列汉诺夫、德国列金和法国多数派瓦扬等机会主义分子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是对在工人运动中长期流行并造成巨大危害的工会中立论的否定。列宁指出，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工会中立论已失去存在的基础。他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了在原则上对工会

① 第二国际从这次大会起开始按照参加单位的大小分配不同的表决票数。美国代表团在会上拥有14票，其中社会党9票，社会主义劳工党3票，世界产联特劳特曼派1票半，产联谢尔曼派半票。在通过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提案时，特劳特曼派投反对票，谢尔曼派投赞成票，所以出现半票的情况。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布鲁塞尔法文1908年版，第369—370页。

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5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38页。

中立的承认。阶级矛盾大大发展，近来各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德国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在那里，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丝毫也没有能阻止特殊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的成立），要求工会同政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具有的形式的榜样）愈来愈扩大，——这一切使中立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①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写成的《我们和他们》的小册子中，歪曲大会的决议，借机吹嘘说：“我想对伦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说几句热情的话。可是篇幅不允许。况且由于不久以前在斯图加特经过我修正后所通过的决议，就使这项决议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②事实是：普列汉诺夫对奥地利比尔提出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的第三节结尾，补充了一句话：“不得损害工会运动的必要的统一”^③。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决议的第三段末尾，并未照搬普列汉诺夫的原话。只是写道：“必须把工会组织的团结一致时刻牢记在心。”^④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这个修正案虽然是必要的，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它根本没有触及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关于工会是否中立问题的实质，也没有接触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工会应否中立的意见分歧的本质。它更不能成为普列汉诺夫掩盖其鼓吹工会中立错误观点的遮羞布。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不仅未否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而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37—438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43页。

③ 同上书，第331页。

④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55页。

且恰恰是吸取后一个决议的精神解决了政党与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这种庸俗的论调“只会把读者引入迷途，使他们不去注意工会运动中真正有争论的问题，从而掩盖了中立主义的思想在斯图加特遭到的失败。”^①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上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机会主义手法，十分气愤。他指出：“自由派十分敬仰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放荡不羁的典型人物。”^②

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还继续为工会中立论辩护。他在一九〇七年《现代世界》杂志第十一和十二期上发表了《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吹嘘自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对“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作了修正，歪曲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同拉萨尔派五金工人工会代表团的谈话，重弹俄国政治团体太多等老调之外，又制造了修正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占上风，因此工会必须中立的谬论。他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指出，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也坚持工会中立。这是完全正确的”。普列汉诺夫进一步解释说：“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他得出结论：“取消工会中立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隶属于党，可是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占了上风，那末，取消工会中立只会是‘马克思的批判家’的一个新的胜利。”^③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玩弄的是偷梁换柱的诡辩论手法。当时争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领导工会，通过工会这种形式不断地用科学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48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47页。

社会主义理论去武装工人，促进工人运动健康发展。如果修正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占了上风，那就变成了修正主义政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次，德国工人运动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沉痛教训，不是证明了工会中立理论的正确，而是证明了工会中立论的荒谬。由于工会中立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大肆泛滥，阻止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从而才把德国工人运动引上了机会主义的邪路。“结果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于机会主义，甚至象考茨基这样对这个问题小心谨慎的人也公开地承认了这种倾向。”^①列宁概括地揭穿了普列汉诺夫这种维护工会中立理论的诡辩术。他说：“这种议论就是普列汉诺夫最惯用的逃避问题和撇开争论实质的手法的典型例子。”^②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七年第十一和十二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和一九一三年第八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等文章中一再申明，他所主张的工会中立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谓的中立，而是倍倍尔所主张的中立。倍倍尔曾主张工会中立，认为工会不应把自己看成任何政党的附属品，工会不要强迫工人接受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以倍倍尔主张工会中立的这些错误观点为借口，为他鼓吹的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开脱。列宁认为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领袖，他虽然提出过一些包括工会中立在内的错误理论，但可贵的是他能在他失足的地方，重新爬出错误的泥潭，改正错误。普列汉诺夫以倍倍尔主张工会中立为自己鼓吹工会中立寻找借口，这就等于重蹈复辙，再陷泥潭。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仿效倍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7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3页。

尔。”^①

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三年这六年中，一直鼓吹工会中立的理论。时间之长，态度之顽固，论据之纷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少有的，列宁尖锐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并不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只是社会民主党三十三个代表中的一个。他所代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现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伦敦代表大会决议的孟什维克的观点。”^②他又指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出来维护中立思想的，在我国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普列汉诺夫，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可是，他们维护得很不成功。”^③社会革命党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于一九〇七年七——十二月在其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工会中立论，歪曲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决议”。他们还在文章中公然撒谎，说普列汉诺夫不是代表孟什维克而是代表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了拥护工会中立的发言。他们还引用普列汉诺夫发言中以俄国有十一个革命组织，主张工会加强同党的联系只会导致工会组织四分五裂的错误观点，作为他们主张工会中立的论据。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维护工会中立论时，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喊着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杜撰出一套机会主义理论的话；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宣扬工会中立论时，则只会单纯重复普列汉诺夫的那些已被驳倒了论据，显得异常笨拙、愚蠢。所以列宁才认为社会革命党维护工会中立论维护得很不成功。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4页。

② 同上书，第440—441页。

③ 同上书，第438页。

普列汉诺夫宣传工会中立论的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取消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工人，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种理论，适应了资产阶级妄图阻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维护自己腐朽统治的要求。列宁指出：“问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使工会同社会主义发生任何联系，所以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总是会这样或那样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① 列宁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普列汉诺夫长期鼓吹的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实质。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会中立论，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在工会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早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就明确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首先注意使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只是消极地迁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派（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无派进步人士、社会革命党人等）最喜欢的‘中立’立场，而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观点，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并且同工会建立经常的实际的组织关系。”^② 当然，这并不是要把工会当作党的下属机构，随意发号施令，党要通过工会密切联系本阶级群众，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并接受其监督，同时还要尊重工会组织本身的权益，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善于根据工人的觉悟程度开展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3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第二节

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中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是把无政府主义移植到工会中而产生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于一八三四年成立全国大团结工会时，提出了工会应取得对社会的统治权，然后直接管理工业的纲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直接来源是巴枯宁的工会理论。无政府主义首领巴枯宁坚决反对一切国家政权，但是他却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工会的作用。他追求的最终理想是在摧毁一切国家政权后，由“人民”管理社会，“把土地移交给农业协会使用，把资本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移交给工人的工业协会。”^①他认为罢工是达到“人民”管理社会目标的初步斗争形式，它能发展成为武装暴动。因此他把工会领导的罢工叫做小型的革命。他就这样把工会捆在无政府主义的战车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以第一国际为阵地，无情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并把无政府主义头子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这就给了无政府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无政府主义有时就不得不改头换面，另寻出路。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相混合的产物。法国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源地。在法国，工会又称作工团。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从一八九五年无政府主义者被邀请加入法国工团开始出现的，而到一九〇六年法国总工会在亚眠召开的年会上达到成熟阶段，第一次公开

^① 参见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2页。

亮出旗帜。这次年会通过的决议，就是有名的亚眠宪章，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纲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组织，主张工会中立；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张只要依靠工会组织，通过总罢工的道路，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由工会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各种生产团体的自愿联盟。亚眠宪章公开宣扬，工团（工会）“今天是抵抗性的团体，明天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组的基础”^①。一言以蔽之，工会高于一切，工会领导一切。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动基地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因为这些国家曾经是巴枯宁派的活动基地，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一直有较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大量存在；政府反动腐败，社会民主党逐步为右倾机会主义所腐蚀，而工人又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这些都为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无政府工团主义成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因此，批判日益蔓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便成了二十世纪初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无政府工团主义也传播到了俄国。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有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十四部著作被译成俄文出版，主要有阿·拉布里奥拉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恩·列昂奈的《工团主义》和亚·奥·奥里威蒂的《现代社会主义问题》等。其中某些作者还为俄文版写了新的序言。社会革命党人如获至宝地阅读这些著作并加以宣扬。当时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安·卢那察尔斯基和弗·巴扎罗夫（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年）一度曾同情无政

^①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第105页。

府工团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甚至为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写了跋。

为着欧洲和俄国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起来同无政府工团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列宁在一九〇七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认为为了防止和清除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的腐蚀，“一方面，必须加强组织工会的工作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会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越来越多地吸收工人阶级群众参加党的各种组织。”^①列宁还揭穿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机会主义面目，他把无政府工团主义看做是“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②。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在《现代世界》杂志和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文章，其矛头是对准这些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头面人物。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祖师主要是法国人，普列汉诺夫又精通法文，为什么他反而把主要锋芒对着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呢？看来不外两个原因：其一是当时意大利人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著作在俄国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其二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人附和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并为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著作作跋。所以普列汉诺夫这时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包含有批评布尔什维克、显示自己正确之意。不过，总的说来，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批判是系统的、深刻的。他写的文章有些是从横的方面剖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体系，例如：他发表的组文《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中的第一篇文章《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诺埃·波诺米》以及《评亚·奥·奥里威蒂的书》，就是属于这一类。另外一些文章，例如：《格·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页。

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保尔·路易》、《评恩·克里茨卡娅和恩·列别捷夫》，则从纵的方面，追溯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历史。这样从理论体系和历史演变两个方面，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机会主义实质，使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有一个全面的透彻的了解。

普列汉诺夫在二十世纪初发表的这些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文章中，驳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明了党和工会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不同任务。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多余的，工会已成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工具。普列汉诺夫针对这个谬论，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是不同性质的工人组织。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担负的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它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工会是工人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而同资本家斗争的堡垒，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组织因素，它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因而，“任何别的工团或工团联盟都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政党。众所周知，这个党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它的事业正好应当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而不是变为工团所有制）。”^①他说：“正是因为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亦即确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党的使命，而不是工会的使命，所以运动的领导者不应当是工会，也不应当是工会联盟，而应当是党。”^②这就指明了党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54—55页。本节凡引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6卷的引文，均摘自王荫庭同志的译稿：《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的译文有修改。

② 同上书，第58页。

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同时，应不断发展和壮大工会组织，把更多的工人吸收到工会中来。他说：“只能对党要求‘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工会则一定要吸收各种工人参加，即使他们还没有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还不明白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暂时还只是进行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的斗争。不这样做就不合理，因为那就会分散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削弱他们反资本的阵地。”^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重要问题上，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说：“其实我们和列昂奈（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引者注），先生都十分清楚，现在国家权力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冲突不可避免，那末我们就只有：或者用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了解冲突，即把冲突了解为破坏国家，或者象《成立宣言》（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引者注）的作者那样来了解它，即了解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它‘作为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的‘最终’经济目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出路。”^②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武装暴动打碎一切国家机器，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主张革命以破坏国家为目的，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监狱、军队和法律的社会；通过工会领导的总罢工，夺取生产资料，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是由工会来管理生产。可见他们二者都反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恩·列昂奈时，揭穿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说：当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同它的生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110页。

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当改变生产关系，为此就需要把政权从旧阶级手中转交到新阶级手中。“可是政权这样转交到先进阶级手中就意味着这个阶级的‘专政’；巴枯宁一想到这个专政，就觉得是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卑鄙背叛，而继巴枯宁之后，恩·列昂奈又如此坚决地谴责追求专政的意图。真可谓一脉相承！”^①普列汉诺夫告诫各国工人阶级不要听信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谬论，并且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组织为工会的工人应当去建立**政党**，这个政党要完成的任务同工团主义者推荐工人去做的工作是截然相反的，就是说，提到首位的并不是‘破坏国家’，因之也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将是夺取这个政权。仅此一点就已包括了对工团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谴责。”^②他还指出：“工团主义的目的……在于把生产资料变为工团（即工会）所有制；社会主义的要求则是变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制。”^③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学说唯一正确的解释者和发展者，实则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工资的提高，阶级矛盾的缓和等，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陈旧了，过时了。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恩·列昂奈公开说：“一切东西，从价值理论开始到辩证方法，从资本集中化规律到周期性危机的学说，从剩余价值体系到对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经济唯物主义证明，——一句话，在这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和得到普遍承认的社会主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组成要素，现在都遭到了无情的破坏。”^④他认为，只有工团主义者才能正确解释马克思主义，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同上书，第134页。

④ 转引自上书，第68—69页。

批判马克思主义中过时的东西，“工团主义有可能不断地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灵魂。”^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样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他们是拾起无政府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破烂武器，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说：“工团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恰恰就是当年无政府主义者用来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政策和策略作斗争的那个东西。这种情况对于理解‘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本性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②无政府工团主义还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它的理论依据来“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初写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所谓革命工团主义者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这是非常错误的。其实这是在这个学说的幌子下倒退到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上去了。”^③他还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和歪曲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他说：“最近十年来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对马克思进行的所谓批判，恰恰就是这样。这种批判只是不加批判地重复现今资产阶级思想家为着比较认清了的辩护目的而说的一些话。如果说这种批判是一种什么促动，那末它就是促退，而决不是促进。”^④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原来是现代资本主义辩护士的门徒。”^⑤他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修正主义称之为“互相敌对的兄弟”^⑥。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82页。

② 同上书，第81—8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7页底注。

④ 同上书，第217页。

⑤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28页。

⑥ 同上书，第62页。

到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世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成就。在这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企图用自己的左的修正主义代替它，这只能阻碍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从而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普列汉诺夫详细论述了革命工团主义妨碍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危害性。他说：“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第一，向无产阶级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第二，向它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固有的那些倾向；第三，使它懂得，为了（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固有的倾向）用消灭这些关系的办法来解放自己，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我们看到，拉布里奥拉所宣扬的理论在所有这三方面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这些理论（即一般说来工团主义，具体地讲就是我们的作者所宣扬的这种工团主义）一旦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传播，就必然会使它的阶级觉悟模糊起来，而无助于提高这个觉悟。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象同类似于它的改良主义理论作斗争那样，坚决地同它进行斗争。”^①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使无产阶级势力四分五裂的危险，他们在每一个适宜的、甚至不适宜的场合都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势力最凶恶的敌人。”^②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普列汉诺夫大声疾呼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说：“假如我对工团主义的批判得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赞同，那我是极为高兴的。工团主义在工人头脑中确实造成了不少混乱，现在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开始同这种学说进行理论斗争的时候了。我们那些认为工团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同志是大错特错了。其实真正的工团主义，即彻头彻尾的工团主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义，跟真的社会主义，即跟同样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①他还说：“只有在工人阶级面前揭露‘革命的’工团主义这种自以为是用革命的观点解决‘工人问题’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才能彻底战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②

普列汉诺夫还探讨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来源。他在一九〇九年第三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昂利·柏格森》中，在分析了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哲学观点时，认为它来源于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反动资产阶级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代表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年）。他写道：

“但是，法国工团主义的某些理论家醉心于柏格森，这却是只有充满误解的哲学思想史中才有的最滑稽可笑的误解之一。这一误解表明，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处于多么低下的理论水平：**低得难以再低了！**”^③柏格森是诡辩能手，即使错误的观点，经过他一番论证，也仿佛有几分道理。他的格言是：不喜欢走旧路，总想开辟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其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使他对哲学的研究不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学习柏格森的诡辩术，发誓不走马克思主义的老路，而要走他们自己的新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非常崇拜柏格森；但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也是唯心主义的，最终也象柏格森一样，不免被历史所抛弃。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一年为他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还分析了“‘革命的’工团主义同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密切的血缘关系”^④，指出欧洲拉丁语诸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过去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20—121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54页。

④ 参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9页。

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工团主义的策略与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由此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理论是工团主义学说的基础^①。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有助于我们弄清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渊源。

普列汉诺夫这时虽然已在机会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但是在理论上，他基本上还是坚持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坚持在世界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所以他能够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进行批判。他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这些文章，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开展的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起了较好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应当肯定的。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文章发表后被译成意大利文，并同意大利工人读者见面，给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首领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在意大利的杂志《自由之篇章》和法国的杂志《社会主义运动》上，曾发表一些文章，大发雷霆，回答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这也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是有力的，以至对方理屈词穷，只好报以谩骂。

但是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在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文章中，根本没有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拥护工会中立论。不仅如此，而且普列汉诺夫在其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一篇文章中，例如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发表的《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中，一方面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鼓吹工会中立论。也就是一只手要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打倒，另一只手又要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扶起来。因此，他在谈到工会与党的关系时，往往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在第一篇文章中，一方面说俄国政党太多，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10页。

又没有象西方那样的党，所以工会应该中立，不能依附于任何政党；另一方面又说，“但是，这自然完全不是意味着党本身在对待工会的关系上应当守中立”，“它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在组织为工会的人中间传播自己的思想。”^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普列汉诺夫不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反对这种左的机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议会迷，揭露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主张通过罢工这一有效的武器，同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以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行动，而赞成工会会员群众的集体行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工人阶级蓬勃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有促进作用。这些主张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中“有生气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时，恰恰忽略了这点。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时，也没有放弃攻击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主张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必须抵制国家杜马，认为必须充分肯定群众性政治罢工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他居然把布尔什维克诬蔑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主张摒弃议会斗争、都坚持发动罢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发言中，公开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在用自己的策略为无政府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不过他们自己却没有看出这一点。如果他们的队伍中间出现工团主义者，我是丝毫不感到惊奇的。”^②布尔什维克代表当场予以反击。他在一九〇八年写的文章中硬说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恩·列昂奈的策略思想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相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61—62页。

②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322页。

类似^①。普列汉诺夫自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滚入机会主义泥坑以来，时常同布尔什维克对立，在对待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会中立论，他就拥护工会中立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时自相矛盾的根源。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派性早给普列汉诺夫戴上有色眼镜，使他已经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辨别是非的能力。此外，普列汉诺夫在他处于马克思主义时期写的著作中就对国家学说重视不够，而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对待国家杜马问题又产生机会主义观点，这都使普列汉诺夫不能彻底完成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历史任务。

这个历史任务最终是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完成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做是最容易最自然的，因为革命斗争中最坚决反对议会迷和普列汉诺夫式的机会主义的正是我们。也只有我们才能以革命的观点而不是以普列汉诺夫之辈的学究观点来驳倒引起无数混乱思想（这种混乱思想对俄国特别危险）的工团主义。”^②列宁在一九一〇年发表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九一二年发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等文章中，深刻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③，都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祸害，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大敌。列宁形象地指明：“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亲兄弟。”^④列宁更深刻地揭示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页。

第十一章

护党联盟的卫士 反取消派的援兵

第一节

同布尔什维克建立护党联盟

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俄国。在政治战线上沙皇政府疯狂地镇压和迫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革命的工农群众，逮捕和监禁革命者，取缔无产阶级组织，收买革命的叛徒充当内奸，重新剥夺工农群众在革命年代争得的一切政治权利。在经济战线上，资产阶级采用同盟歇业、集体解雇、降低工资、增加工时等办法，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与剥削。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野蛮的反攻倒算，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加快了广大农民的破产。在思想战线上，反动派纠集御用文人和一些曾是革命“同路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贩卖资产阶级哲学，推崇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赞美颓废思想，歌颂背叛行为。

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政治动摇、思想混

乱、组织瓦解的严重危机。以费·伊·唐恩（一八七一——一九四七年）、尤·奥·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年）、亚·尼·波特列索夫（一八六九——一九三四年）、亚·马尔丁诺夫（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年）为代表的大部分孟什维克，适应反动阶级的需要，堕落为妄图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他们在政治上，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在俄国有必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认为沙皇专制制度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君主专制制度，沙皇政府和国家杜马在反政府派的压力下完全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要无产阶级放弃革命斗争，同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妥协，搞立宪改良。他们在组织上，否认有保存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必要，主张建立公开的合法的工人党。此时，还有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年）和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年）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被反革命的疯狂进攻所激怒，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否认党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利用国家杜马等展开合法斗争，坚决要求把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来，走上了盲目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道路，这部分人被称为“召回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小撮所谓“非派别”分子，打着“反派别主义”的旗号，实则支持取消主义立场。这些机会主义派别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但在当时，召回主义的影响一来不大，二来很快被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所清除。因此，以取消党组织、取消革命斗争为宗旨的取消主义，适应了沙皇政府勾结自由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工农革命斗争、取缔无产阶级政党的反革命要求，成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列宁充分地估计了取消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明确指出，取消主义“是一个对工人阶级危险的致命的和离开无产阶级道路的资产阶级倾向。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才能隐藏或回避党所作

的这个估计。”^①

取消派为了替他们在政治上取消党、放弃革命制造理论根据，便在思想战线上猖狂向马克思主义进攻，鼓吹修正主义哲学，宣扬马赫主义，妄图摧毁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在政治战线上粉碎取消派，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出一条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在思想战线上击溃马赫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指出：“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度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②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了胜利完成粉碎取消派、批倒马赫主义的历史任务，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列宁考虑到俄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领导布尔什维克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了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这个护党联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在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巴库、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乌法等地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中，有许多受孟什维克影响的工人。他们虽然不很了解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但是并不赞成取消党、取消革命，因而纷纷站出来反对取消派。这些孟什维克工人就形成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基本队伍，他们不断要求普列汉诺夫站出来批判取消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64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取消派有一个认识过程。早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就同一部分有取消主义情绪的孟什维克代表在组织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批判这些人鼓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事情过去两年后，他回忆道：“可惜，‘取消主义’的倾向，在孟什维克中间不是新鲜事，早在一九〇七年我们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我就曾经同它相遇。但是当时，它还是很软弱的。”^①

最初，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分子还力图掩饰自己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秘密工作的主张。当时和普列汉诺夫联系较多的取消派分子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极力向普列汉诺夫解释，他们不是主张取消党，而是在别的名称下恢复党。普列汉诺夫当时住在日内瓦，他常常通过和阿克雪里罗得通信，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和组织状况。但这样了解到的情况往往是被阿克雪里罗得曲解了的。所以，当由马尔托夫任主编，由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一八六七——一九四六年）等孟什维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拟定编辑出版五卷本文集《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时，普列汉诺夫还不知道这些人已成为取消派分子，便参加了这个编委会。他在这个编委会中，对分配给他写的文章很感兴趣，并打算先着手写文集第一卷中的有关文章。编委会中的其他取消派分子竭力拉拢普列汉诺夫，对他讨好说，整个文集的编辑，都要在他指导下进行，没有他，文集就不能按时出版。

早在一九〇七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独自一人，费尽口舌，坚持孟什维克要创办自己秘密的党的机关报，然而遭到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宁愿要办公开的、事实上并非党的机关报。到一九〇八年二月他们才勉强同意了，并由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唐恩和马尔丁诺夫组成了秘密的孟什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0页。

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这个报纸先在日内瓦出版，后改在巴黎出版，直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才停刊。普列汉诺夫一开始就同意加入这个报纸编辑部。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八年五月至六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以《战斗的唯物主义》为题，发表了他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第一封信。普列汉诺夫于同年九月写成第二封信，又寄给了该报。编辑委员马尔丁诺夫看完这篇文稿后，想让他压缩篇幅，遭到拒绝，不得不于十月份全文发表。普列汉诺夫自此开始同盘据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里的取消派分子，发生了磨擦。更尖锐的矛盾发生在如何评价波特列索夫为文集《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所写的文章上。

列宁说：“在一九〇八年因波特列索夫的论文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消派分裂的导火线”^①。波特列索夫于一九〇八年十月，把他为文集写的文章《革命之前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寄给了普列汉诺夫。文中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理论观点叙述得很详细，而只字不提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篡改与歪曲。普列汉诺夫读完这篇文章后，非常不满，认为只有加以修改，才能采用。可是波特列索夫拒绝修改文章，并得到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支持。

更为严重的是，波特列索夫在文章中宣扬取消主义观点，认为党的秘密活动与合法活动相比较，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普列汉诺夫向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指明，波特列索夫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容忍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看到说服不了普列汉诺夫，就让波特列索夫对文章作了某些修改，他们也帮助润色一番。但文章中的取消主义观点丝毫没有改变。

于是，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八日给马尔托夫写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3页。

信，声明他不得不退出《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五卷本文集编辑委员会。他在信中严正指出：“我知道，这将会造成很大的不便。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可是主要的不便不在于我拒绝参加五卷本文集的工作。而在于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指波特列索夫——引者注）坚持和真正的伯恩斯坦主义一样的漠视理论的观点。这不只是不便，而且完全是灾难。但是我看到，它是无法纠正的，并且我认为，今后我不便于同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一起发表文章……请相信，这不是任性。您自己很快会看见，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将陷入什么样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泥坑里。”①

普列汉诺夫当时看到波特列索夫已陷入取消主义泥潭不能自拔，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取消派分子，因此他下决心同这些取消派分子断绝关系，而唐恩却以为普列汉诺夫只是在枝节问题纠缠不清。普列汉诺夫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唐恩写信，坚决表示要批判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观点。他在信中说：“我读了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的文章之后，在我的住宅里马上对他本人说，他在以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国思想史。”“我以前确实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实际上这样危险。须知，以前我甚至连想也没想，他的司徒卢威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没有被您和尤利·奥西波维奇（指马尔托夫——引者注）所觉察。既然如此，那末波特列索夫确实很危险，必须抓住他不放。”②

这时，有些人劝说普列汉诺夫留在《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文集的编辑委员会内。柳·依·阿克雪里罗得从彼得堡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解释说，“波特列索夫是忠诚的社会主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231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普列汉诺夫的妻子马尔科芙娜，说《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成员要来日内瓦会见普列汉诺夫。但是普列汉诺夫反对在《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活动》文集中刊登波特列索夫文章的要求，仍未被采纳。这件事使他清楚地看到该文集编辑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均被顽固的取消派分子所控制。他便在十二月宣布停止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工作。一九〇九年一月五日，普列汉诺夫写了退出该编辑部的公开信，声明由于根本意见分歧无法消除，才退出编辑部，以表示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一切传统观点的抗议。他在信中说：“我同尤·马尔托夫同志在评价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尽管这篇文章在文字上和理论上存在有很大的缺点，但同时它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怎样才能解释这种意见分歧呢？依我看，只能这样解释意见分歧：我们对亚·尼·波特列索夫文章中所涉及的那些根本问题，看法完全不同。因此我们感觉到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里工作是困难的。当然，编辑部的其余成员的影响会缓和我同他的意见分歧。但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确信，在我同尤·马尔托夫出现意见分歧的问题上，编辑部这部分成员对马尔托夫比对我更加接近。因此我仍旧提出辞职。不必说，我采取这个决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认识到了自己应完成的义务。我相信，以自己的退出表示对传播那些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传统观点的抗议。”^①

普列汉诺夫在同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巴·阿克雪里罗得这些取消派分子，也就是同他昔日的孟什维克老朋友决裂时，在思想上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他由烦闷、苦恼，到痛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七日和二月十八日先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236页。

后写给妻子的两封信中，真实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他发表了告读者的信，正式退出编辑部，同盘据在这里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一刀两断。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这一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高兴地写道：“孟什维克派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退出了该报编辑部，并且不再担任所有这些刊物的撰稿人，他向他们宣战，并号召孟什维克护党派起来支持和巩固革命的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①

普列汉诺夫在正式退出取消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之后，在许多孟什维克护党派工人的建议下，公开站出来批判取消派，成为孟什维克护党派的首领，并向列宁建议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取消派，为了把工人群众从孟什维克影响下争取过来，在一九〇九年六月巴黎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顾布尔什维克少数调和派的反对，提出了在不抹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的条件下，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捍卫党组织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还严肃地批判了召回派，并把拒不接受批评的召回派分子波格丹诺夫等清除出党。列宁认为护党联盟的根本任务，就是反对取消派，批判马赫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无产阶级政党。他说：“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②布尔什维克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结成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1—262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护党联盟这件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取消派对此非常害怕，他们一听到这个联盟的建立，就气得发狂，并诽谤普列汉诺夫“变幻莫测”，“朝三暮四”，“反复无常”^①。同时，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人极力攻击这个护党联盟。例如波格丹诺夫站在极“左”立场，在上述《无产者报》编委扩大会议上和会后散发的文件中，责备列宁等人同普列汉诺夫接近是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形成“新的派别中心”。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切真诚坚持革命、热爱党的人则热烈欢迎和拥护建立护党联盟。当时正在被流放的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这个护党联盟的建立。他写信给列宁说：“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真正符合俄国国内工作的利益，即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分子团结起来的利益；（二）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能在孟什维克工人和取消派之间挖掘一道鸿沟，驱散并歼灭取消派，使合法组织赶快从取消派的挟持之下解放出来。”^②

第二节

参加反取消派的斗争

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四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取消派斗争的时期。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参加了这一斗争。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在政治战线上反对取消派，另一方面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及其同伙造神派和寻神派的反动哲学。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的斗争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他对取消派的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1）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99页。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他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同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他一面反对取消派，另一面又谴责布尔什维克；（3）从一九一四年七月起，他停止反对取消派并进而同取消派勾结在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二年一月期间，坚决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无情地批判了取消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要用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手段来反对取消派。”^①

为了批判取消派，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九年八月恢复出版于一九〇六年九月停刊的由他独自编辑的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九期。他在出版前言中说：“我们经历着威胁我们党本身存在的危机。在这个时期沉默是不应该的，因此我恢复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②

列宁为团结普列汉诺夫共同反对取消派，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自巴黎写信寄往意大利圣勒摩，向他建议恢复中断五年的个人联系。信中写道：“敬爱的同志！您在‘日志’第十一期上谈到，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紧密真诚地联合起来，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很想亲自跟您谈谈目前党内的情况。如果您也认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您的健康允许的话，请写信告诉我（或电告），什么时候我可以在圣勒摩和您见面。我愿为此前往。

致同志的敬礼。

尼·列宁”^③

一九一〇年四月二日普列汉诺夫自圣勒摩回信说：“亲爱的

① 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6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9页。译文有修改。

同志，请原谅，回信迟了，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也认为，解决现在我们党所遭受的危机的唯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与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之间接近。我也认为，我应当亲自和您谈谈。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会谈稍微推迟一些，等到两派情绪更加明朗化的时候再举行，那末我们的会谈将是有益的。现在事态发展神速，时间会很好地教育人们，孟什维克越来越趋向回击取消主义。我希望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回击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且也应拒绝以过分生硬的态度对待合法的工人组织。老实说，这种做法只会有力地促进取消派获得成功。

暂且，我们每个人在自己范围内为相互接近起来而扫清道路吧。

忠实于您的格·普列汉诺夫”①

从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可看出他同布尔什维克在政治问题与策略原则上仍存在着分歧。但列宁在保留原则分歧的同时，从同取消派斗争的大局出发，仍努力同普列汉诺夫合作。他在一九一〇年多次同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护党派商谈创办反对取消主义的合法报刊。例如，同年八月至九月，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尼·古·波列塔也夫②、伊·彼·波克罗夫斯基③商议过创办一些合法报刊问题。经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于一九一〇年陆续出版了三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十一月在巴黎出版了《工人报》，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了《明星报》并在莫斯科出版

①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151—152页。

② 尼·古·波列塔也夫（1872—1930年），职业是旋工，布尔什维克，曾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的工作。

③ 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生于1872年），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医生，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接近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1910年他以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明星报》编辑部。

了《思想》杂志。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了这些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抨击取消派的文章。此外，普列汉诺夫从一九一〇年四月起开始积极为一九〇八年创刊并秘密发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①撰稿，批判取消主义，他在这个报上共发表了七篇文章和短评。据初步统计，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出版的报刊上，共发表二十多篇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用来批判取消派的。

普列汉诺夫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批判了取消派所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取消派分子在他们盘据的《我们的曙光》、《复兴》等合法杂志上发表文章，否认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存在的必要。他们诬蔑说，主张恢复并巩固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即经过多年考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宣扬“反动的乌托邦”思想^②。《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竭力为这一宣传辩解，并且提出了“为合法的地位而斗争”的取消主义口号。取消派出版的文集《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宣扬叛徒学说，篡改社会民主工党在纲领方面和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说什么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等^③。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指出，取消派在书刊中所鼓吹的这些论调，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用机会主义的口吻，诬蔑党的“地下工作”，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1908年2月创刊到1917年1月停刊。根据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组成。列宁在编辑部内坚持反对取消主义的立场，在该报上发表了80多篇文章。担任编辑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为取消主义辩护，在编辑部中消极怠工，并于1911年6月退出编辑部。该报自同年12月起由列宁任主编。

^{②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1页。

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否定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抛弃了无产阶级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普列汉诺夫严厉批判取消派诬蔑俄国工人运动、妄图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调，并号召孟什维克护党派起来支持和巩固革命的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九年八月第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彻底揭穿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实质。他指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的文章，包含了取消主义的全部思想。他认为，取消主义引导人们走进“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泥潭”，“他们（取消派）所制的酒变成了只适合于酿制小资产阶级酸醋的馊玩意儿”，取消主义“使小资产阶级倾向易于侵入无产阶级队伍”，“取消主义径直走向机会主义和敌视社会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陷人的泥潭”^①。普列汉诺夫把波特列索夫称作为“坚定的取消派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会主义者。他写道：“我坚信，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是难以纠正的。”又指出：“我已经看到，波特列索夫在曼海姆发表的取消主义思想在他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完全失去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生活的能力。”^②普列汉诺夫指出了取消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险。他说：“这种影响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按实质说，这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敌对的一种影响。”^③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切革命的党员，必须起来同取消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尖锐地指出：“在这里必须有所抉择：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当然我这样说是指那些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追求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6卷，第6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4、5、6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2页。

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的同志。对于那些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些只想到自己怎样靠革命飞黄腾达的人（要知道，真有这样飞黄腾达的人！），当然是有第三条路的。”^①他进一步指出：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看风转舵的人，“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随风倒’。”^②普列汉诺夫号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取消主义划清界限。他高兴地欢迎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划清界限，高呼：“‘主要分界限’万岁！”接着说：“我们孟什维克应当同取消派划清界限。”^③列宁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期《日志》在反对取消派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最近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九期（一九〇九年八月）极有价值，因为一个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在这本杂志里彻底揭穿了取消派。”^④普列汉诺夫的这期《日志》，给取消派以沉重的打击。十六个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因为这期《日志》的出版，而给普列汉诺夫写公开信，暴跳如雷地咒骂普列汉诺夫是“取消孟什维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分子。”^⑤列宁认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宣传普列汉诺夫对取消主义的批判，以争取孟什维克工人。他说：“普列汉诺夫讲的话，就足以使孟什维克工人离开波特列索夫和‘随风倒’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那些难于接受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充分知道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九期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现在认真地弄清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和‘随风倒’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思想基础。”^⑥

①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6卷，第3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5页。

④ 同上书，第1页。

⑤ 参见上书，第158页。

⑥ 同上书，第4页。

一九一〇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五日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这次全会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违背列宁意愿的情况下策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和各种派别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为了同列宁、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共同反对取消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这些一向主张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解的调和派，要求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统一合并为一个政党。调和派代表在会上占多数，列宁处于少数。由于列宁的坚持和斗争，才通过了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但全会在调和派的把持下，违反列宁的意旨，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宣言》，决定停止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解散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把它的财产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把现金转交给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即“保管人”梅林、蔡特金、考茨基。由于列宁的坚持和斗争，这次全会又在决议中补充了一个条文：在取消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机关报的同时，也取缔“呼声”派、前进派^①的中央和机关报。全会还通过了给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主办的孟什维克的《真理报》拨款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想把这个报纸变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全会还不顾列宁的反对，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选进了党中央机关。

普列汉诺夫一九一〇年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十一期上发表了题为《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全体会议》的文章，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些地方“华而不实”、含糊不清、笼统统统，给取消派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他支持全会封闭取消派《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他写道：“宣

^① “前进派”是1909年12月成立的一个反党集团。他们因出版《前进报》而得此名。倡议者是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列克辛斯基（生于1879年），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和俄国马赫主义者组成。

传反对停办‘呼声报’”，就是“宣传反对消灭派别组织，也就是要使中央全会可能获得的最主要的成绩之一化为乌有。”^①列宁肯定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对这个全会的评价。这个评价清楚地表明，他现在想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真诚的愿望，战胜了想利用呼声报派机会主义者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渺小浅薄的愿望。”^②

一九一〇年四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二号上第一次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保卫‘地下工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取消派分子是逃避革命斗争、毁灭党的庸夫俗子。他写道：“现在完全失去革命能力的那些人经常攻击革命的‘地下工作’；他们厌倦了，他们想要休息。他们无法忍受奋不顾身的‘地下’工作者所具有的重大的和坚忍不拔的自我牺牲。他们急于变成和平的庸夫俗子，他们自己很象从前在某个时候吃完橡树果后、捣毁橡树根的人们；他们逃避‘地下工作’，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虽逃避地下工作但却没有背叛事业，而只是把事业置于更广泛的基础上……现在该是向那些嘲笑恢复革命‘地下’组织的企图的先生们大喝一声的时候了：‘愚蠢的人们想嘲笑什么，就把什么感情庸俗化’”^③。一九一〇年五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三号上又刊登了普列汉诺夫的另一篇反取消派文章，题为《论小事，特别是论波特列索夫先生》。文中十分激烈地批判他的老友波特列索夫，指明反取消主义斗争的阶级实质。他说：现在俄国存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两种世界观你死我活的斗争，只不过是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意图同自觉的资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6卷，第157—1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34页。

产阶级的意图在思想领域的反映。”^①他指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②一九一一年一月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九、二十号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文中讽刺地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报》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月刊》”^③。

普列汉诺夫批判取消派的文章，击中了取消派的痛处。取消派分子在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他们于一九一〇年还出版了名为《对普列汉诺夫日志的补充》的论文集。一方面自我洗刷，拼命掩饰、甚至否认取消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恶毒谩骂普列汉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是普列汉诺夫由于纠缠小事、由于性格不好而轻易地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断绝关系后散布的胡言乱语；甚至进行诡辩，硬说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才是取消派，因为他拼命要“保持已经陈旧”的秘密党的形式，其结果必然是阻止党的自由发展。但是取消派的谩骂没有吓倒普列汉诺夫，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斗争精神。他继续著文驳斥了取消派的种种诡辩。他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给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法国社会党人沙·拉波波特（一八六五——一九四一年）写信说：“我为我的文章激怒了取消派分子而高兴。……我焦急地期待着取消派分子的回答。我对他们也严阵以待”^④。从一九一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一一年，他还继续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和《工人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回击取消派的反扑。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〇年还写了一篇抒发了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51页。

② 同上书，153页。

③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集，第753页。《社会主义月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办的刊物。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1卷，第211页。

他同布尔什维克携手进行反对取消派斗争的愉快心情的文章。他写道：“最近我们越来越经常在一起为……党的存在而斗争。这是很好理解的，为了一个对全体俄国自觉的无产者说来具有巨大意义的实践原则，共同的语言不能不导致我们之间的某些互相接近，但完全不明白的是，除了那些在国家警察机构供职的人以外，怎么也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①这篇文章当时未能发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才以《普列汉诺夫走向布尔什维克》为题发表。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仅在报刊上合作，共同批判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而且在第二国际的舞台上一同揭穿取消派的阴谋诡计。

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三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出席了大会。在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两个老战友再次会面，格外感到亲切。这与他们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相见时的心情和景象大不相同，那时彼此只是寒暄数句而已，此外，别无余言。这次大会召开之前，普列汉诺夫专程来到巴黎，会见列宁，一起商量了俄国代表团的组成和他们对大会议事日程的看法等问题。列宁率领由三十九人组成的俄国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合作得较好。

普列汉诺夫参加了工会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在委员会上作了发言，并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的意见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工会运动统一的报告》。工会运动统一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捷克代表反对各国建立统一的工会，主张在各国内部按民族组织工会，扬言捷克工会要从奥匈帝国的统一工会

^① 《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档案材料》，苏联《旗》杂志1956年第12期。转引自《俄苏文学》，1980年第3期，第75页。

中分裂出去。这种主张表现出分裂工人运动的狭隘民族主义。普列汉诺夫和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发言反对捷克代表的主张。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工会运动的统一对工人运动的重要作用。他说“每一个国家的工会运动都应该在组织上保持统一，这是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①在报告中，他还谴责了任何破坏工会运动统一、“想把国际的统一的工会分裂成分立的民族组织的企图”^②。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统一的决议中，谴责了工会组织上的民族主义，强调了工会组织的统一与团结的必要。

普列汉诺夫还就别的一些问题发了言，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对自己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工会运动统一的报告感到惬意。他于一九一〇年九月三日给马尔科夫娜写信，谈到了他喜悦的心情。

普列汉诺夫、列宁还多次同盖得、卢森堡等第二国际中的工人运动的革命领导人一起，单独举行会议，并曾同桌就餐。在这次大会上，因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与机会主义派代表的政治分野泾渭分明，所以革命派代表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既然机会主义者互相支持并一致行动，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也必须齐心协力。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照此身体力行。他不仅同布尔什维克结成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而且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又同其他革命左派一起捍卫工会运动统一的主张。这说明，普列汉诺夫虽然自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踏上机会主义道路，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又放弃机会主义，回到马克思主

^{①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70页。

义立场上来，这是很可贵的。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参加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还团结一致地共同挫败了托洛茨基离间和破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联盟的阴谋。这是普列汉诺夫同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痛击机会主义的又一事例。托洛茨基这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①，当时表面上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取消派之外，实际上打着调和主义的招牌，暗中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他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组织了一个著作家集团，创立了外表上是“非派别性的”、实际上推销取消主义的报纸——《真理报》。在一九一〇年第二国际召开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于八月二十八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以“本报俄国通讯员来稿”为题，发表了匿名文章，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激进主义”，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状况，诬蔑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联合组成编辑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以狭隘的派别精神进行工作”。他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只有一个光明点，那就是他在维也纳出版的无派别性报纸——《真理报》。他声称这个报纸绝不参加派别争论，以进行政治宣传为宗旨。实际上这个报纸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采取取消主义立场，并支持召回派。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实质就是为取消派辩护，妄图破坏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的护党联盟。这表明，托洛茨基已公开倒向取消派。当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正在参加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当他们得知托洛茨基匿名发表文章为取消派鸣冤叫屈时，普列汉诺夫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会同波兰同志发表书面联合声明，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为了巩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1页。

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护党联盟，列宁于一九一〇年九月二日给社会党国际局写信说，根据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的决议，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二人同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局的代表。托洛茨基控制的维也纳作家集团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间跳出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护党联盟所执行的路线。他们狂叫：“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进行的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基础”^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有力地回击了托洛茨基之流的这种无耻狂言。后来列宁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回忆往事时满意地写道：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观点接近起来，我们友好地交谈；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呼声派分子谈话了，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特别是在信（即指托洛茨基的匿名文章——引者注）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指普列汉诺夫答应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引者注）。我们两人共同拥有一票。直到最近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②哥本哈根大会闭幕后，列宁、普列汉诺夫、盖得、卢森堡等六人，曾共进晚餐，并联名给保加利亚工人运动活动家、紧密派社会党领导人蒂娜·基尔科娃（一八七二——一九四七年）写信致意^③。

布尔什维克鉴于调和派对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干扰和破坏，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建议召开新的中央全会。布尔什维克事先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商量，后者完全同意和支持前者的这一正当要求。

列宁对一九一〇年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7卷，第15页。

②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46页。

③ 见《列宁文稿》第5卷，第343页。

尔什维克一起进行的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同年十二月写道：“在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无论在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中，或者在哥本哈根和俄国的合法机关报刊中，都是如此。”^①列宁并指出，这种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②。

随着反取消派斗争的深入，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逐渐增长，它在工人中间的影响日益扩大。于是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也日益暴露。如果说在一九一〇年，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在同取消派斗争中还能做到同心协力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一一年，步伐就开始不一致了。

一九一一年六月布尔什维克在巴黎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的问题。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控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要召开他们的代表会议。双方都向普列汉诺夫发出参加他们代表会议的邀请，但都遭到无条件的拒绝。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样的会议只会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终分裂。

虽然如此，但是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停止同取消派的斗争。他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自苏黎世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在此之前，即七月，他在苏黎世同马尔托夫一起出席了侨居在这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一次群众集会，二人展开了辩论。马尔托夫先发难，普列汉诺夫后辩驳。尽管会场上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占多数，但普列汉诺夫有力地批驳了马尔托夫的取消主义谬论，结果马尔托夫“被击溃”，显出很不高兴的神态。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页。

② 参见上书，第19页。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取消派分子的同时，却又开始责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他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十五期上发表文章《给所有的姐妹每人一副耳环》，硬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要分裂党。尽管文章语调不象对取消派那样尖锐，但毕竟是在建立护党联盟后又向布尔什维克打了第一枪。他貌似公允，标榜一视同仁，鼓吹“给所有的姐妹每人一副耳环”，实则“各打五十大板”。从此，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与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护党联盟开始动摇了。

从一九一一年十月起，到一九一四年六月，是普列汉诺夫对取消派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同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护党联盟日益松弛，他虽然仍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取消派，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也与日俱增。

一九一二年一月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除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委员会。从此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存在于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开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名称从此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这是反对取消主义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取得的胜利成果。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的胜利召开，沉重地打击了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此，这些机会主义流派不约而同地拼命攻击这次会议。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属于召回派的前进派、孟什维克护党派等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在巴黎召开了旨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诽谤和攻击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异口同声地谩骂布尔什维克是“骗子”、“篡夺者”等等^①。同年三月二十六日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6页。

表了一篇匿名文章《俄国党内生活所见》，继续攻击、咒骂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

普列汉诺夫拒不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会后，他又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十六号上，发表文章《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问题》，表示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开除除党，诬蔑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但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正确地谴责了一九一二年一月由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等取消派组织举行的所谓代表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奉行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原则”，通过的是“取消派的决议”^①。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一二年四月用自己的钱办起《护党报》，到一九一四年二月为止，此报共出版过五号。他在这个不经常出版的报纸上共发表过八篇文章，继续批判取消主义，同时又强调要把彼此敌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即所谓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

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组织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别的联合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报刊把它称之为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建立了反党的八月联盟。这是一个由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组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取消派和召回派也在这个联盟中相互勾结起来了。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并揭露批判了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动伎俩。他把八月代表会议称作“可鄙的”取消派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在玩弄“外交手腕”，搞欺骗行为，违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②。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无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502—503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1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0页。

情揭露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他写道：“分裂分子的代表会议无论就其成员，还是就其悲惨的和毫无价值的结局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代表会议，令人愤怒地破坏了党的法规，是恢复党的统一的新障碍。而党的统一是必要的。”^①

列宁坚决反对普列汉诺夫硬要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捏合在一起的调和主义立场，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对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谴责。他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写道：“大家也知道，就连调和派分子普列汉诺夫也把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称作‘可鄙的’、取消派的会议（不管‘我们的曙光’杂志怎样赌咒发誓地否认），把这次会议的决议称作‘外交手腕’，更直率地说，就是称作欺骗。”^②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著名领导人，在第二国际国际局整个存在时期（一九〇〇——一九一四年），又一直是社会党国际局的委员。因此无论是第二国际中的左派，还是第二国际的办事机构——社会党国际局，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他想利用自己在第二国际中的这种特殊地位，让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著名活动家和社会党国际局，帮助他吧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硬捏合在一起。普列汉诺夫希望，至少党的统一问题能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做到的那样也好，即：尽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彼此不信任，相互争论不休，但毕竟能坐在一个礼堂里开会，都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由于孟什维克的欺骗宣传和虚假汇报，在社会党国际局中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仿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责任在于布尔什维克。当孟什维克向社会党国际局控告布尔什维克分裂党时，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曾写信征求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普列汉诺夫于一九一二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4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1页。

年三月二十七日给胡斯曼回信，他在信中分别谴责已经闭幕的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和取消派等正在酝酿的代表会议（即后来的“八月代表会议”），认为双方都是要“分裂”统一的党。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我相信，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不会赞成以这种方式实行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社会党统一的决议。而我要问，社会党国际局能否以自己的干预防止产生威胁我们的灾难。”

普列汉诺夫在信的末尾签上名。并附言道：“请您注意，亲爱的公民，说的不是为了归罪于谁，而只是为了既不偏向这一方面，也不偏向另一方面，不偏不倚地同分裂作斗争”^①。

普列汉诺夫的这封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各打五十大板、从中进行调停的信，无疑地在社会党国际局和第二国际各国党领导人中间起了作用，甚至连倍倍尔、卢森堡等左派也站出来责备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想迫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社会党国际局接到普列汉诺夫的信以后，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在伦敦召开了会议，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所谓“俄国人的统一问题”的决议，要求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各派参加的会议，就实现统一问题“交换意见”。

在一九一三年三——六月，普列汉诺夫为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创办的公开报纸《真理报》撰稿。继《关于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分裂问题》之后，他在这个报纸上又连续发表了一组批判取消派的文章，总题目为《在弹雨下》，包括五篇短评，其中有的文章题目直接点出了取消派分子的名字。例如，《作为我的起诉人的波特列索夫先生》、《查苏利奇·取消派分子们和分裂狂》。普列汉诺夫的这种作法，激怒了取消派，他们疯狂地诽谤普列汉诺夫。已堕落成为取消派分子的查苏利奇于一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416—417页。

九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给捷依奇写信，诬蔑普列汉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胡作非为”。捷依奇回信谈到，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取消主义文章的连续发表，使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选举区获得了胜利。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仍希望通过交换意见，消除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看法，共同团结起来，把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进行到底。列宁于是年六月受六位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的委托，写信邀请普列汉诺夫在夏季到扎科帕涅来小住几个星期，就他选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问题做些讲演。列宁诚挚地提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活动对于巩固同工人的联系、加强党的工作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有观点不同的护党分子参加，我们也认为是很有益处的。”^① 列宁还告诉他：准备举行讲演会的地点是在离加里西亚最好的山区疗养地扎科帕涅七公里的波罗宁镇，有铁路相通；关于所需旅差费如有必要，可以另行商议。最后叮嘱：

“您是否接受邀请，请来信告知。”^②

可是列宁没得到普列汉诺夫的回答。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底，给普列汉诺夫写信，邀请他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十五周年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普列汉诺夫曾复信表示同意。那末列宁为什么没有收到普列汉诺夫的回信呢？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回信，也可能是普列汉诺夫虽然回了信，但信在途中因警察局的暗中检查而被扣留了。

列宁虽然没得到普列汉诺夫的回答，但是仍旧希望同普列汉诺夫见面谈谈。他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自伯尔尼给巴黎的加米涅夫写信说：“听说普列汉诺夫在巴黎。如果可能，请去看看他。这件事极为重要：我曾就办校的问题给他写了一封信（绝

^{①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83页。

密——只给他本人）并且邀请他来。这个骗子，伊格纳修斯·洛约拉式的人物，耍滑头的将军，现在却装聋作哑。瞧吧，他们这样会更糟。”列宁在同一封信中，还说：“对土利亚科夫的期望极大，对其他人（不是我们的人）的期望则较小。他们渴望‘学习’，要求普列汉诺夫来。如果不来，他就是个傻瓜。”^①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三年，不仅在文章中，而且在群众集会上拼命鼓吹“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的错误思想。例如，一九一三年八月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倍尔逝世了。德国和瑞士的工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苏黎世为倍倍尔举行隆重的葬礼。普列汉诺夫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参加了倍倍尔的葬礼。当他脱下帽子登上主席台讲演时，难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首先指出了倍倍尔对国际工人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论述了倍倍尔同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友谊。普列汉诺夫说：“他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我国革命运动的每一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俄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德国政府对自己的东方邻国宣战，德国工人阶级应该采取什么原则。”普列汉诺夫接着就把话题转到：要学习倍倍尔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让步的精神，促进俄国党内“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他说：“使我们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他作为德国党的统一的竭尽全力的捍卫者。但愿他能成为我们的榜样，以使俄国党内同志们中间这样令人遗憾的意见分歧得到消除。”^②

列宁还是希望普列汉诺夫放弃无原则的“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的错误思想，他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给格·李·什格洛夫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七年）写信说：“唉呀，要向普列汉诺夫解释，最好不做糊涂事，不玩弄同死人结成联盟的

① 《列宁文稿》第6卷，第43—4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俄文版第2卷，第76页。

游戏。”^①

过了几个月，列宁为同普列汉诺夫恢复联系，以布尔什维克《启蒙》杂志的名义给普列汉诺夫写信，约他为纪念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逝世十周年写一篇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普列汉诺夫没有答复。

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俄国和国外一部份地区仍继续合作，批判取消派和俄国马赫主义者^②。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不接受他的“争取敌对兄弟的统一”的主张越来越不满意。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给属于布尔什维克的调和主义者阿·伊·柳以莫夫写信，公开表示他不是无条件地拥护同布尔什维克和好。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四年由于看到无法实现取消派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便想不偏不倚地站在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中间。他于一九一四年五月给安·法·布利扬诺夫（生于一八八〇年）写信。布利扬诺夫是以齐赫泽为首的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七人孟什维克取消派党团的成员，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退出了这个“七人团”。普列汉诺夫在给他的信中公开表示对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双方都不满意。在他的蛊惑下，布利扬诺夫也倒向普列汉诺夫。列宁指出过：布利扬诺夫“当取消派已有很长的历史，现在却‘动摇’到普列汉诺夫那边去了。”^③

普列汉诺夫主办的《护党报》，因为缺乏读者不得被迫停刊。但他又改头换面筹办《统一报》。从一九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创刊，至同年六月，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报纸共出版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116页。

② 指波格丹诺夫等人，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76页。

过四号。以《统一报》为基础，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国家杜马代表布利扬诺夫等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派”。它是动摇在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之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多大影响。列宁在谈到普列汉诺夫组织的“统一派”的政治特征时，指出：“在取消派（他们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情中汲取社会力量）和‘真理派’（他们从那些由黑暗中醒悟过来走向光明的大多数俄国工人的觉悟和团结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两个互相斗争着的派别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集团。它们没有社会力量，不能对工人发生广泛的影响，它们在政治上等于零。这些集团没有坚定的、明确的、能吸引工人的以及为经验所证实的路线，它们只有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同群众没有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群众性派别（从一八九五年的罢工以后，俄国的社会民主派就成为群众性的组织了）中没有历史根源，没有坚定、完整、鲜明、彻底的以及受过多年经验检验的路线，也就是说，不能回答策略、组织、纲领等等问题，——这就是耍手腕的小组活动滋长的土壤，这就是它的特征。”“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作为一个政治集体，完全符合这些特征”^①。

普列汉诺夫虽然企图站在布尔什维克与取消派中间，但又继续在报刊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从事“派别活动”、“分裂活动”^②。

一九一四年六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机会主义者埃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双方报纸的编辑部，歪曲双方分歧的实质，力图劝说双方“调和”统一。普列汉诺夫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机会主义主张的影响下，以西欧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75—476页。

^② 参见上书，第321、308、487页。

民主党容许派别组织存在为理由，要求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取消派、波格丹诺夫等“一切派别”统一起来。为此，他甚至硬把取消派的报纸说成是工人的报纸。取消派对此幸灾乐祸，取消派分子古姆美曾公开吹嘘普列汉诺夫要同他们统一。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早已预见到这种前景。在普列汉诺夫还反对取消派时，该报就写道：“当**重大的**”“政治行动时期重新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将会和我们一起。”^②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旧历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的策划下，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执行局为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而“交换意见”的会议。俄国党内各派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普列汉诺夫在会上坚持无论如何要实现“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的错误主张。普列汉诺夫还把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他为首的孟什维克“统一集团”、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附和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等等，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七三联盟”（因布鲁塞尔会议是在俄历七月三日召开而得名）。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主张还得到了第二国际的活动家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印涅萨·阿尔曼德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派统一问题的发言，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态度，提出了进行谈判的条件。这个发言稿事先是由列宁拟定的。阿尔曼德发言后，普列汉诺夫立刻猛烈地加以抨击，说这不是“统一的条件”，而是“新的刑法条文”。会议本来只限于“交换意见”而不作出硬性规定，结果却以多数票强行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切派别统一的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6页。

决议。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即“已经联合了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的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是不允许别人破坏它的意志的。”^①列宁同时指出，在能否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统一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这不是组织问题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于党的**存在问题**上的分歧。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协议或者妥协。”^②布尔什维克拒绝执行这个决议。虽然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符合普列汉诺夫口味的决议，但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和会后所持的严正立场，给了普列汉诺夫的调和主义立场以不小的打击。普列汉诺夫从布鲁塞尔扫兴而去，郁郁不乐。他表示对党内斗争已感到力不从心和十分厌倦，于是又回到巴黎，深居简出，埋头著述。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就曾指出：“普列汉诺夫糊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③他气愤地说：“该摘掉假面具了，不然工人也许会不客气地把它扯下来！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这个地方是一片混乱和涣散的状态，是进行派别活动的场所，他们想破坏团结了两年的真理派（即布尔什维克派——引者注）的数千个工人团体的统一。”^④七月间，列宁又说：“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行为是典型的**瓦解行为**。”^⑤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普列汉诺夫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标志着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与布尔什维克结成的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的彻底瓦解。普列汉诺夫不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38页。

② 同上书，第503—504页。

③ 同上书，第309页。

④ 同上书，第311页。

⑤ 同上书，第511页。

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取消派一起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而且在行动上、组织上同取消派同流合污了。

第三节

同取消派斗争的功过

回顾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一四年反对取消派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斗争中，经过了高潮、低潮、停止三个阶段：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是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高潮时期；从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六月，是他反对取消派的低潮阶段；从一九一四年七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他批判取消主义的斗争基本上停止的时期。从政治上看，普列汉诺夫相适应地经过了三个阶段：坚决站在反对取消派的立场上；在取消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动摇；转而同取消派同流合污。从组织上看，普列汉诺夫相应地也经过了三个阶段：坚决与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集中力量批判取消派；对护党联盟动摇，在继续批判取消派的同时，开始较多地谴责自己的朋友——布尔什维克；护党联盟瓦解，同取消派和各种反党派别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前两个阶段反对取消派的历史功绩，他把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比做一只帮助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斗争的援兵。列宁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形象地指出：“不错，护党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赶来做了布尔什维克的‘援兵’，他是‘赶来’同取消派作战的”^①。一九一二年七月他在回顾反取消派斗争的历程时又写道：“事实证明，一年半以来（一九一〇年一月——一九一一年六月）为党进行斗争的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35页。

是在布尔什维克和某些波兰人领导下的党中央机关，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竭力帮助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①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立场，不仅超出一般孟什维克，而且比某些动摇的布尔什维克也高出一头。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以后，列宁仍看到普列汉诺夫坚持反对取消派的一面，依然强调要团结他同取消派作战。列宁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底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信说：“我不主张对普列汉诺夫下最后通牒：为时尚早！可能有害！！如果写信给他，要客气些，温和些。他现在还值得重视，因为他在和工人运动的敌人作战。”^②

具体说来，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中有哪些功绩呢？

首先普列汉诺夫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谬论，捍卫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党路线。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以他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成了党的路线的**实际执行者**”^③。他们揭发了取消派的内部真实情况，他们坚决批判了取消派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在政治上，是对同取消派作战的布尔什维克的**最大支援**，有利于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取得**主导地位**。列宁早在一九〇九年就高兴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的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在党内已取得主导地位了。”^④

其次，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取消派的斗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8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6页。

④ 同上书，第47—48页。

争，有利于从组织上粉碎取消派瓦解党和分裂党的阴谋，促进了广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客观上为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壮大扫清了道路。列宁把捍卫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存在看成是反对取消派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于一九〇九年谈到布尔什维克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达成反对取消派的协议时，说过：“协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在符合党的路线这个范围内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①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所以取消派要清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另以他们的取消派组织取而代之时，例如，当一九一二年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的反党的八月联盟出现时，普列汉诺夫就坚决表示反对并无情地加以揭露。他屡次坚决地表示：妄图取消党的人不能留在党内。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瑞士和法国的七个小组，于一九一〇年在党的一月中央全会后，坚决要求停办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普列汉诺夫“通过号召坚持党性，通过谴责分裂行为和取消主义，来配合了布尔什维克清除召回派-最后通牒派^②。”^③取消派和召回派对此异常不满，诬蔑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个人主义’的态度”，是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根源。列宁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想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存在的愿望是真诚的。他说：“孟什维克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96页。

② 最后通牒派：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内形成的一个以革命词句作幌子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利用杜马、工会、合作社等合法组织，主张先向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让他们退出杜马，如不接受就把社会民主党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所以最后通牒派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派。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91页。

中的普列汉诺夫派，护党派，工人等都致力于认真的统一（虽然不完全是自觉地、缓慢地、动摇地，但总算致力于统一，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能不致力于统一）”。^①列宁曾设想，“如果全党的统一不可能，是否可以做到那怕是我们同普列汉诺夫派的统一”^②。虽然由于取消派的破坏，由于普列汉诺夫最后同取消派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列宁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布尔什维克团结在一起，确实打击了取消派在组织上的分裂破坏活动。在结成护党联盟的时期，这个联盟曾“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形式上主持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工作”^③。这件事情本身就在广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取消派，提高了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些党员纷纷脱离取消派，甚至脱离孟什维克护党派而转向布尔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成长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清了道路。

最后，由于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坚决反对取消派，加之布尔什维克执行正确的政策并与它结成护党联盟，这就有利于把当时处在孟什维克影响下的工人争取到布尔什维克的周围。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孟什维克工人中间影响较大，布尔什维克与它结成反取消派的联盟，就使处于孟什维克思想影响下的工人有机会并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教育。第一步使他们认识到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实质，坚决反对取消派；第二步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逐步靠近布尔什维克。这就有利于把他们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3页。

② 同上书，第427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0页。

来。列宁在一九一〇年就写道：“我深信，在俄国，孟什维克工人中有十分之九是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主义在革命中的全部历史证实，普列汉诺夫派是孟什维克无产阶级部分的最好产物（因而最有生命力）”。^①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六月指出，经过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真理派在两年半内团结了五分之四的工人，我们认为必须照原路继续前进，以便达到更完全的统一，从五分之四提高到十分之九，然后再达到十分之十。”^②到一九一四年，普列汉诺夫因同取消派勾结，他在广大工人中间已失去了影响，只有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去寻找支持者。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六月《论冒险主义》一文中，满怀信心地说：“根据这十年的经验，我们敢保证，普列汉诺夫只能搅起一些浪花，他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组成一个‘流派’。”^③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对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斗争的历史功绩，作了全面的概括。他说：“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动荡时期（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的巨大功绩。他歌颂地下组织，坚决拥护党的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决议。他指出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和他们所恢复的‘经济主义’（一八九四——一九〇二年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流派）。他证明取消派背叛了党，因为他们否定了地下组织。他公正地阐明，‘波特列索夫先生’等于犹太，圣徒们没有犹太要比有犹太更强大些。”^④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他于一九〇八年以奋起批判取消派开始，经过左右摇摆，忽而批判取消派，忽而攻击布尔什维克，最后到一九一四年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74页。

③ 同上书，第360页。

④ 同上书，第308页。

以同取消派合流的悲剧而告结束。他在反对取消派斗争中充当了一个“反复无常的人”^①。普列汉诺夫对取消派的斗争从高潮逐渐走向低潮；与此同时，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却从低潮走向高潮。他对布尔什维克从旁敲侧击，经过正面谴责，到参加了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和各种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合唱。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以悲剧结局。这不是偶然的，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普列汉诺夫长期坚持机会主义观点的必然结果。他在一九〇三年堕落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一九〇五年提出机会主义策略。既然他在革命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仍持有机会主义观点，那就很难想象他能把反对当时俄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更危险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其次，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目的，最初是为了维护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那怕形式上的统一也好。可是当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正式宣布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等拼凑了取消主义的反党“八月联盟”以后，普列汉诺夫看到连保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式上的统一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了，便想竭力维护孟什维克的存在。他自己毫不掩饰地写道：“我诚心诚意在准备高喊：没有取消主义的孟什维主义，即革命的孟什维主义万岁！”^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为了批判取消派，才同普列汉诺夫以及以他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的，团结他、教育他，也是为了使他能坚决地同取消派斗争，从来没有对他能转变为布尔什维克抱有幻想。列宁于一九一〇年三月明确指出：“至于讲到我们，那我们完全有理由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7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20页。

说：在普列汉诺夫‘反复无常’的时期，他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现在不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并且将来也永远不会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却把他以及一切能起来反对独立派—合法派集团^①和能同他们作彻底斗争的孟什维克，看作是护党的孟什维克。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被提到斗争日程上来的，就是在理论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维护党，因此我们认为竭力同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接近，是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无条件的义务。”^②

再次，普列汉诺夫在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时期，他同布尔什维克之间仍然存在着原则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党的组织原则、革命策略等老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如何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等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目的，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普列汉诺夫则更多地追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式上的统一。普列汉诺夫错误地把孟什维克内部由于取消主义的产生而造成的分裂，单纯地描绘为组织上的分裂。更错误的是，他在批判取消主义同时，又诬蔑布尔什维主义是“理解得比较狭隘、比较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美化孟什维主义已成为“比较广泛、比较细腻的”马克思主义^③。

最后，普列汉诺夫自从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① 指孟什维克取消派波特列索夫等人在1908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之后，拒绝回到党里来的号召，完全离开了党，结合成为一个自称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单纯为争取合法地位而斗争。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只是对社会主义独立而不是对自由主义独立”。（《列宁全集》第16卷，第2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6—257页。

^③ 参见上书，第8页。

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有一种政治上的动摇症。他一直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摆来摆去。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一方面曾经变成“热烈的孟什维克”，同时，又对孟什维主义的某些观点有过动摇，或者坚决不同意，或者持有保留意见。列宁曾谈到：“因为普列汉诺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有好多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一）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反对过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二）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主编‘星火报’第四十六至五十一号，也反对过孟什维克；（三）一九〇四年，普列汉诺夫为阿克雪里罗得的那个地方自治运动方案作过辩护，他这样做，恰恰是用沉默避开了这个方案的主要错误^①；（四）一九〇五年春天，普列汉诺夫脱离了孟什维克；（五）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之后，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六）据切列万宁说，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反对过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要了解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这样长久、这样坚决地反对取消主义，揭露取消主义，就应当知道这些事实。”^②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动摇症已成为沉痾宿疾，所以一旦气候变化，他又故态复萌，旧病重犯了。

把上述原因综合在一起，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一四年在反对取消主义斗争中的立场和表现，就容易看清：正因为普列汉诺夫与一般孟什维克有所不同，所以在孟什维克取消派跳出来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时，他能从维护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存在出发，站出来反

^① 1904年末，阿克雪里罗得已经滚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面去，他提出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方案。宣布对地方自治派表示支持就是“最高形式的支持”。普列汉诺夫并不同意阿克雪里罗得这种委曲求全的改革方案。但是他为了挽救阿克雪里罗得，对其上述的主要妙论避而不提。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6页底注^①。

对取消派，并愿意同布尔什维克结成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这时，普列汉诺夫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虽然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仍坚持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观点，但因此而产生的他同布尔什维克的矛盾，已下降为次要地位。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采取了保留意见分歧，结成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取消主义的正确政策，所以普列汉诺夫欣然同意与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坚决同取消派作斗争，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虽然在其文章中谈到与布尔什维克存在有某些理论分歧，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恶意攻击。而从一九一二年一月布尔什维克宣布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后，再加上同年八月取消派的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建立，普列汉诺夫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式上的统一的幻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就开始在他的《统一报》上，攻击布尔什维克从事“派别活动”和“篡夺”^①。他同布尔什维克早已存在的矛盾由次要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但是普列汉诺夫仍要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所以他对妄图取消党组织的取消派仍然不满，照常反对他们。而他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之间在攻击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召开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又找到了共同点。因此在这点上，又缓和了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分子的矛盾。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内，他既指责取消主义是反党的犯罪行为，又主张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统一，劝告布尔什维克不要以“胜利者的口吻”同取消派谈话，不应当要求少数人尊重多数人通过的决议^②，强迫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合并为一个党组织。“觉悟的工人将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普列汉诺夫在十年前得的政治动摇症又旧病复发了。”^③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怎样对待这次战争成了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08页。

②③ 同上书，第475页。

提到俄国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派别面前的首要任务。这时，普列汉诺夫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堕落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拼命叫喊要保卫沙皇的“祖国”。由于普列汉诺夫在对待战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上，同取消派立场一致，所以他们很快便勾结在一起。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国内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局面和革命的新形势，使得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此，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结成的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宣告结束了，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的论战又开始了。事实表明，破坏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统一的不是别人，正是取消派，正是同取消派合流的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一九一四年五月指出：“‘派别活动’、‘分散’、‘分裂’这一类的字眼，用在普列汉诺夫和他现在的朋友们的身上正合适。”^①但是列宁坚信俄国无产阶级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他满怀信心地说：“取消派领袖、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同民粹派结成资产阶级联盟也好，自由派报刊竭力要‘正直的’人们把工人同工人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也好，马尔托夫和唐恩干诽谤的勾当也好，这些都不能阻挡无产阶级在‘真理派’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的周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②

我们应对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反取消派斗争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评价。我们认为尽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功绩还是主要的。列宁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在谈到应当摘掉普列汉诺夫的假面具的同时，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对普列汉诺夫表示惋惜，因为凭他同机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取消派的斗争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的。”^③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0页。

② 同上书，第490—491页。

③ 同上书，第311页。

第十二章

同马赫主义和宗教神学 战斗的哲学家

第一节

揭露马赫主义的唯心论实质

在波澜壮阔的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在以沙皇政府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猖狂进攻面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发生了动摇。一方面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等取消派分子在政治上主张取消党、取消革命，同时孟什维克巴·索·尤什凯维奇（一八七三——一九四五年）、尼·瓦连廷诺夫（一八七九——一九六四年）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动摇分子亚·亚·波格丹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一八七四——一九三七）、雅·亚·别尔曼（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年）等俄国马赫主义者也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哲学论著中，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为名，贩运马赫主义的哲学，企图以经验批判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波格丹诺夫则把马赫主义“发展”成为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波格丹诺夫等人于一九〇八年出

版了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把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泛滥推向高峰。列宁认为这个文集是马赫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卢那察尔斯基、尤什凯维奇等人，妄想把社会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宗教，硬说“社会主义就是宗教”，形成了所谓“造神派”。而以谢·尼·布尔加柯夫（一八七一——一九四四年）、尼·亚·别尔嘉也夫（一八七四——一九四八年）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标派”（因一九〇九年在莫斯科出版反动的《路标》文集而得名），则鼓吹实行“宗教改革”，力图把宗教、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寻求“精神上理想的”神，形成了所谓“寻神派”。列宁气愤地指出：“《马赫主义哲学概论》=别尔嘉也夫主义和僧侣主义。”^①

马赫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同取消主义密切相关。取消派以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寻神主义等为理论基础，用这些学说为他们取消党、取消革命的主张辩护；马赫主义者、造神派和寻神派宣传修正主义哲学的根本政治目的，也是旨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列宁分析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的阶级斗争的形势，认为向工人和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鼓吹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篡改，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当时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全部生活的一个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失败之后，各个社会阶级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对于我们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6页。

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情况下，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①

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的时期，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一起果敢地担负起了这个历史任务。他们一方面在政治战线上同取消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俄国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一九〇七年第七号《生活通报》上发表了《一封给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这就迫使普列汉诺夫必须回击波格丹诺夫的挑战。他于一九〇八年初开始着手写作以《战斗的唯物主义》为题的三篇论文，计有十万字，以三封公开信的形式回答波格丹诺夫。第一篇论文发表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出版的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六——七号上。六月间他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哲学讨论会，当着波格丹诺夫的面，指出：“我认为，无产阶级的哲学已经建立，而波格丹诺夫还在马赫那里寻找哲学的要素。”^②普列汉诺夫以这次会上的发言要点为依据，接着于九月间写完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第二篇论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马尔丁诺夫嫌长，要作者加以压缩。普列汉诺夫认为既然已经开始动手“歼灭这一骗子”，就象嘴里衔着耗子的猫，既“不能缩短，也不能延搁”^③。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坚持，第二篇论文全文刊登于该报十月出版的该报第八——九号上。一九〇八年末普列汉诺夫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之后，他新写成的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第三篇论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25页注释309。

③ 同上书，第820页。

文已不能在该报继续发表。为了批判俄国马赫主义，他把此文连同以前的两篇一起收入他的论文集《从防御到进攻》，于一九一〇年出版。

普列汉诺夫在这三篇文章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老师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恩斯特·马赫（一八三八年——一九一六年）是奥地利物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他把感觉说成是纯主观的东西，否认感觉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马赫宣称：“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①马赫为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自吹他发现了“世界要素”，并把“感觉”叫做“要素”。他把“要素”分为物理的和心理的两部分，又说二者是一起存在的。马赫认为，物或物体是由颜色、声音、味道、压力、时间、空间等人的感觉（即要素）构成的，“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②马赫把他这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标榜为“最新哲学。”波格丹诺夫的另一位老师理查·阿芬那留斯（一八四三——一九二一年），是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另一个创始人。他同马赫的哲学观点完全一致，只是表述上有所不同。马赫、阿芬那留斯的学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职业是医生，早在九十年代就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九〇五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了机会主义“召回派”的头子之一，也是喀普里党校^③的组织者之一。早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波格丹

① 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召回派、造神派等于1909年8—12月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办了党校，从党的地方组织中招来13个学员，形成反布尔什维克的新的派别组织。

诺夫开始接受德国化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威廉·弗里德里希·奥斯特瓦尔德（一八五三——一九三二年）的哲学观点，奥斯特瓦尔德企图把自然科学上的唯物论同实证主义的唯心论结合在一起。后来波格丹诺夫把马赫主义搬到俄国，创立了马赫主义的新变种——经验一元论。波格丹诺夫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成了修正主义的哲学思潮——俄国马赫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妄图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认为：世界最初是“要素”的混沌的世界；然后出现的是人们的“心理经验”（指意识、表象、感觉等等）；再从“心理经验”派生出“物理经验”（即物理的东西、物质世界）；最后才产生出人的意识。它把物质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公开宣称心理的东西先于物理的东西。波格丹诺夫为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面目，用“人类”的经验代替马赫主义的个人经验。经验一元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①，因果规律“仅仅是使经验协调的一种形式”^②，否认时间、空间和因果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经验一元论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③。波格丹诺夫还攻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旧公式”，“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主张用他胡诌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④。

普列汉诺夫在论文中批判了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老师马赫所宣

① 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第2卷，莫斯科1905年版，第34页。

② 波格丹诺夫：《社会心理学》，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169页。

③ 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28—329页。

传的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谬论。马赫把物质当作感觉的复合。波格丹诺夫认为物质不存在于单个人的意识之中，而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认识中，把真理看作是人们的经过社会组织和约定俗成的思想经验。波格丹诺夫写道：“一般说来，物理世界是社会地协调了的、社会地谐和了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①普列汉诺夫指出波格丹诺夫的意识决定物质的见解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他对波格丹诺夫说：“您吸收了马赫对物质的见解。但是您甚至天真得没有想到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②又说：“您对于物质，和对于物理界的一切的看法，我重复地说，都彻底浸透了唯心主义。”^③普列汉诺夫认为，波格丹诺夫这种对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解释只会走向唯我论，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指出，按波格丹诺夫的认识论，先有人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后有地球，这就会得出荒谬绝伦的结论：“如果人的存在先于地球的存在，那末，有一个时期人仿佛是悬在空中。但是波格丹诺夫先生，我们都了解，这是一个‘误会’，是不重视逻辑要求的结果。”^④普列汉诺夫在指明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是站不住脚的同时，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除了通过物体所给予我们的那些印象而得到的知识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知识的。所以，假使我承认物质只是通过它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感觉才为我们所知，那末，这完全不等于说我是在宣布物质是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相反，这是说，第一，它是可认识的；第二，人类认识它的程度取决于人类通过在其动物生存和历史生存的长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01页。

② 同上书，第251页。

③ 同上书，第330页。

④ 同上书，第301页。

期过程中由人类得到的印象而熟悉它的各种属性的程度。”^①

普列汉诺夫在论文中批判了波格丹诺夫的主观主义的时、空观。波格丹诺夫把时间、空间看作人们意识的产物，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由人类经验的社会组织过程创造出来的。波格丹诺夫声称：“人把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协调起来时，就创造了时间的抽象形式”。他又说：“由此，空间和时间的抽象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们表现经验的社会组织性。”^②普列汉诺夫在论文中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时间与空间的科学论述，指出：“按照唯物主义，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直观的形式，而且也是存在的形式。”^③又说：“离开时间的存在是和离开空间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④普列汉诺夫指着波格丹诺夫的鼻子说，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上，“您是在重复杜林的错误”。“您真是一个最顽固不化和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⑤。

普列汉诺夫在论文中揭穿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的实质，断定它实际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马赫主义的恶劣变种。他指出，波格丹诺夫曾以马赫等人的“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学生自居，实际上，他不过是笨拙地抄袭了马赫主义的谬论。他对波格丹诺夫说：“就是甚至连您自以为不依赖您的老师而有独立见解的地方，您也只是糟蹋了他那里剽窃来的学说。您虽然糟蹋它，而仍然完全忠实于他的精神的，所以您的整个的‘经验一元论’不过是把您的老师的潜在的荒谬（黑格尔说是自在的荒谬）引导为明显的荒谬而已。”^⑥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普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57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304页。

③ 同上书，第308页。

④ 同上书，第305页。

⑤ 同上书，第309页。

⑥ 同上书，第293页。

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波格丹诺夫“发展”了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他对波格丹诺夫说：“您把他的哲学变成了从头到尾的唯心主义哲学。就这一点说，不能不夸奖您一番。”^①在这一点上来说，波格丹诺夫不愧是马赫等人的“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学生。波格丹诺夫之流的经验一元论比他的祖师爷马赫主义高明之处，就是给自己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欺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普列汉诺夫说，波格丹诺夫“不假思索地就给自己的‘经验一元论’举行了一个洗礼，给他命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学说。”^②这是欲盖弥彰，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号的经验一元论，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对波格丹诺夫说：“您，波格丹诺夫先生可以称自己的唯心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然而您并不因此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您越是热心运用自己的新‘策略’，则越显得您的哲学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完全不可调和，而且——更糟糕的是——更显得您简直不能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③他斥责波格丹诺夫说：“您是反对恩格斯的观点的。凡是知道恩格斯和《资本论》的作者在哲学中也是完全一致的那些人，也很容易理解到您在反对恩格斯的观点的同时也在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并且应该归入后者的‘批评家’之列。”^④普列汉诺夫有力地痛斥波格丹诺夫说：“您既然是马赫哲学的拥护者，就决不应该冒充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信徒。”^⑤

普列汉诺夫指明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对俄国革命事业的危害。他认为经验一元论是破坏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反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29页。

②③ 同上书，第231页。

④ 同上书，第222页。

⑤ 同上书，第244页。

阶级维持腐朽统治效劳的理论。他说：“波格丹诺夫先生，您所铸造的武器对于先进的人们是什么用都没有的，它保证他们不能赢得胜利而只能招至失败。更坏的是，他们如果用这种武器战斗，就连自己也要变成反动势力的骑士，给神秘主义和各种各色的异端邪说开辟道路。”^①

普列汉诺夫在指出波格丹诺夫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一元论对俄国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之后，公开声明经验一元论的鼓吹者波格丹诺夫，不再是革命同志，而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说：

“不承认的理由既简单又明了，就是**您不是我的同志**。您所以不是我的同志，因为**您和我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的代表**。既然我要拥护我的世界观，您对我说来就不是同志，而是最坚决的和最不可调和的敌人。”^②普列汉诺夫认为，必须坚决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及各种唯心主义者划清界线。他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同这些唯心主义者在理论上划清界限，在现时比任何时候更其必要，于是我把自己的这一坚定的信念毫不客气地说出来。我知道，这一点对于这个或者那个唯心主义者来说，有时会是不愉快的，特别是那些假借马克思主义旗帜，想贩运自己的唯心主义货色的人更会感到不愉快了。”^③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费·伊·唐恩的信中，明确表示要同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之流“划清界线”^④。

普列汉诺夫不仅自己坚定地表示要同俄国马赫主义者划清界线，而且严肃地批判了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中的某些领导人对俄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34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③ 同上书，第221页。

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89页。

马赫主义所持的调和立场。当时，第二国际中的多数社会党，已受到机会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因此，它们长期对马赫主义持沉默态度^①。考茨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接连发表马赫主义者的文章，却不组织批判马赫主义的稿件。考茨基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联合起来，是可能的。为此，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给考茨基写信，表示自己对他这种态度十分不满。考茨基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十日给普列汉诺夫的回信中，极力为自己辩解，仍把马赫主义列为“严肃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信中说：“至于说到马赫，那末我对他不抱任何成见；应当承认，我还没有准备读他的不论哪一种著作。鉴于他的发言的重要性，我准备在《新时代》上给他的拥护者以发言的机会，因为《新时代》是讨论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机关报。而就我所知道的马赫说，对他是应当严肃对待的。”^①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〇年出版的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第三篇论文中，批评考茨基忽视了马赫主义对俄国革命的破坏作用，指出考茨基对马赫主义持调和主义立场是十分错误的，他号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同马赫主义斗争。他指出：“我们的许多外国的同道者，如象我的朋友考茨基，以为不值得为您（指波格丹诺夫——引者注）及类似您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在我国所传播的那种‘哲学’而争吵，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考茨基不知道俄国的情况。他忽视了现在在我们先进知识分子队伍中起了十足破坏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反动，在我国是在哲学的唯心主义旗帜之下进行的，因为这个关系，那些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冒充是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前提的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哲学学说，对我们就特别有害。同这样的学说斗争，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完全应该的，正如抗议反动派‘重新估价’俄国先进思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31页注释372。

想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是应该的一样。”^①

第二节

反对俄国马赫主义斗争的 成绩和缺点

普列汉诺夫认清并起来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哲学，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要算是最早的一个。早在一九〇一年他阅读到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对自然的历史观点的基本原理》（一八九九年圣彼得堡版）时，就看出他的哲学观的错误，并要求对之进行批判。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他在致《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分部的信中写道：“刚刚开始阅读波格丹诺夫的书，我就立即感到，如果要评论它，就得写一篇长文，短文是不行的。他的哲学就是坚决否定唯物主义。可是因为我想捍卫唯物主义，所以我建议您在下一号上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②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回忆往事时还这样提到：“我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曾几次谈到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向我解释波格丹诺夫观点的错误，但他认为这种偏差决没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清楚地记得，一九〇三年夏天我和普列汉诺夫以‘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同《实在论世界观论丛》编辑部的代表（即波格丹诺夫等人——引者注）在日内瓦谈过话，双方同意合作，我负责谈土地问题，普列汉诺夫负责在哲学上批判马赫。普列汉诺夫提出把批判马赫作为合作的条件，‘论丛’编辑部的代表完全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普列汉诺夫把波格丹诺夫看做是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然而是一个由于追随奥斯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34—335页。

②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9辑，第78页。

瓦尔德和马赫而犯了错误的同盟者。”^① 列宁自己在一九〇四年春夏之交也曾写信告诉波格丹诺夫说：你的著作使我更不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更相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正确的。”^② 但是为了共同对敌，列宁和波格丹诺夫也“订立了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做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③ 而普列汉诺夫当时虽然由于认识不足和联合斗争的需要，没有出面批判波格丹诺夫，但是他对马赫主义的态度还是鲜明的。一九〇五年他为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文第二版写序言时，其矛头就曾明确指向马赫主义。他说：“尽管马赫坚决地反对把他的哲学和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同起来，但这只是表现了他的不彻底性。”^④ 列宁虽然曾经就此批评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过于“轻微”，但还是承认：“从实质上讲，我觉得普列汉诺夫对马赫的批判是正确的”^⑤。到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当俄国的马赫主义已成为阻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危险时，普列汉诺夫就在一九〇八年初最早着手写批判波格丹诺夫的论文，六月间便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公开指名进行批判。^⑥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观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6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2页。

⑤ 《列宁文稿》第5卷，第202页。

⑥ 列宁也是从1908年2月开始写清算马赫主义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0月写完，1909年5月出版。顺便指出，苏联学者福米娜在50年代的文章中曾指责普列汉诺夫起来批判马赫主义太晚。她说：“1902年，列宁最初注意到马赫主义的危险时，就号召普列汉诺夫出面批评马赫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并不是马上就开始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内容，马上提出马赫主义哲学对唯物主义的仇恨，而只是从1909年起才开始的。”（见《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29—

点系统地揭穿了马赫主义的反动哲学，阐明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是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恶劣变种，公开指明马赫主义是修正主义哲学，俄国马赫主义者是修正主义份子，分析了马赫主义在俄国思想界造成的危害，谴责了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中的某些领导人对马赫主义所持的妥协立场，号召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同马赫主义划清界限。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除了列宁以外，普列汉诺夫的表现是突出的，成绩是卓著的。所以列宁于一九〇八年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列宁在这里指的正是波格丹诺夫。他和巴扎罗夫等合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书中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五年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策略为幌子，实则偷运、贩卖马赫主义的私货。所以列宁有意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同包括马赫主义在内的一切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功绩，同时指明不能以普列汉诺夫在策略观点方面的机会主义错误，来抹杀他在哲学上批判包括马赫主义在内的一切修正主义思潮的功绩。列宁

830页) 观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大公正的。况且波格丹诺夫在1903年党的二大后还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并且曾是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在1905年党的三大、1906年四大、1907年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还参加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列宁并无意过早地对他进行公开批判。普列汉诺夫曾在1901年对《火星报》慕尼黑分部提出,要写文章批评波格丹诺夫,结果并无反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页。

于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在谈到普列汉诺夫时，涓涓分明地指出：“我在认真阅读我们党的哲学家的著作，认真阅读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和经验批判论者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而他们迫使我完全倾向于普列汉诺夫！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象普列汉诺夫那样！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我赞成唯物主义，反对‘经验……’之类的东西。”^①后来到了九一四年四月，列宁在《关于论爱尔兰问题的文章》中，再次强调说：“应当对普列汉诺夫说：他在瓦解时期同取消派的斗争和在马赫主义盛行时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有巨大的功绩，但可惜，他现在的说教正在糟踏着他的功绩。”^②列宁并没因为普列汉诺夫当时已同取消派合流，共同攻击布尔什维克，而否认他在过去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列宁曾经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时，带有孟什维克的宗派主义。他说：“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③我们认为，这是对普列汉诺夫的误解。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写的著作中，也多次批判过孟什维克中的马赫主义者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等。俄国马赫主义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只因为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最有代表性，所以普列汉诺夫才从他身上开刀。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理论，也就是对整个俄国马赫主义的批判。普列汉诺夫早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唐恩的信中就批判了孟什维克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的马赫主义观点。他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3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6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2页底注①。

在信中写道：“我从不以为……我们可以在合法刊物上同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以及其他半马克思主义的卑鄙家伙携起手来（请勿责备我过去没有这样尖锐地骂过他们，我一直确是这样想的）……您想往哪里写可以悉听尊便，但是先要跟那些给马克思主义带来异端因素的人划清界线。在我看来，必须同半马克思主义者瓦连廷诺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划清界线。我认为不能根据波格丹诺夫是布尔什维克而尤什凯维奇是孟什维克这一点就对前者严，对后者宽……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异端学说并不比孟什维克阵营中的异端学说更要坏些……二者我都要回避”^①。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批判取消主义和俄国马赫主义时，很少涉及到与布尔什维克有分歧的策略观点，谈到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时，语气也缓和得多。

可见，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功劳是主要的。

同时应当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马赫主义的修正主义实质，揭露得不充分，没有深入分析其产生的根源。他对波格丹诺夫等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批判，主要局限于哲学观点，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不够紧密，而更多的，只是指出他们在哲学问题上不合逻辑、矛盾百出、“只是坐井观天罢了”^②，或者嘲笑和挖苦他们是“蹩脚的思想家”^③，“说了许多最不可饶恕的胡言乱语”^④等等。普列汉诺夫在分析俄国马赫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时，

① 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档案。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44页。

③ 同上书，第282页。

④ 同上书，第237页。

没有把马赫主义的出现同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反动学派——新物理学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唯心主义物理学家借口电子的发现，宣扬“物质消灭了”，剩下的只是“没有物质的运动”，等等。这种哲学观点，被称为新物理学，是一种新的唯心主义的思潮。列宁指出：“呵！普列汉诺夫不提这个‘新思潮’，不知道它。”^①普列汉诺夫不懂得新物理学与马赫主义的有机联系，不懂得马赫主义者以新物理学为依据，把“经验批判主义”标榜为“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普列汉诺夫看不到马赫主义还有大肆泛滥的市场，尚有广为流传的余地。他只是嘲笑说：“主观唯心主义即使在十八世纪已经是哲学中的死胎儿了，现在更是这样。而在现代的自然科学的空气里它已完全不能呼吸了。”^②列宁严肃地指出：“另一方面，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云云。这些引证是不是有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些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③列宁的这一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

第三节

戳穿造神派和寻神派的邪说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同时，也戳穿了它的同伙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54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8卷，第28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7页。

造神说和寻神说。他在这个时期写了《评安·潘涅库克的一本书》（一九〇七年）、《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一九〇八年）、《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一九〇九年）、《评爱·布特鲁的一本书》（一九一一年）等，批判了“造神派”和“寻神派”的反动理论，论述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

普列汉诺夫批判了造神派卢那察尔斯基宣扬的创造“无神的”新宗教的谬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九十年代初参加俄国人民革命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曾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〇年起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他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但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思想混乱时期，卢那察尔斯基犯了严重错误，不光彩地充当了俄国造神派的代表。他认为，人就是神，另外的神是没有的，他决心要创造一个“没有上帝”的新宗教^①。这个新宗教是什么样的呢？他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宗教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对他要创造的这个新宗教，有一个露骨的表述。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新的宗教，它是人类为了使自然完全服从理性，为了取得胜利，为了集中力量而进行的同自然的有组织的斗争。”^②他扬言要创立“在宗教意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③，即臆造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新宗教。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01页。

② 卢那察尔斯基：《宗教和社会主义》，圣彼得堡1908年俄文版，第28页。

③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23页注释301。

普列汉诺夫指出，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特别是他的宗教观，是卢那察尔斯基创造“无神的”新宗教的依据。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理性、爱和意志力是人的本质，因此他不主张废除宗教，而是使宗教更加完善化，企图创造一种以“爱”和“理性”为基础的没有神的新宗教。他把宗教说成是人生的基础，是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宗教的历史。费尔巴哈说：“我把神学降低到人类学的水平，从而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的水平。”^①卢那察尔斯基以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歪曲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硬说马克思也主张用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他说什么：“我认为，从宗教哲学观点来看，马克思光辉地继承了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水平的事业，也就是说，最终地帮助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宗教。”^②普列汉诺夫指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嘲笑了费尔巴哈创立无神宗教的企图（这个企图曾使卢那察尔斯基先生非常兴奋）。”^③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对宗教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凡是认真读过他的名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人，都容易相信这一点。”^④他在引证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揭露宗教本质的有关论述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卢那察尔斯基篡改和歪曲了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批判宗教，反对宗教，对宗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卢那察尔斯基却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结合起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15—416页。

② 卢那察尔斯基：《宗教和社会主义》，俄文版，第31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0页。

④ 同上书，第416—417页。

来，创造“无神”的新宗教，即所谓社会主义宗教。普列汉诺夫嘲讽道：“这个把自己的学说宣布为‘由犹太人表述出来的第五个大宗教’并扮演着这个‘第五宗教’的新先知角色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是多么奇妙地了解马克思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说的话与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由颠倒了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颠倒了的世界观。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推断说，因此，甚至在社会关系不再是颠倒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力求颠倒人的世界观。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而我们这位能说善辩和神经过敏的作者推断说，因此，即使当人‘获得’自己的时候，宗教也必须存在。”①

普列汉诺夫阐明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卢那察尔斯基创造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宗教，就是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他揭穿了卢那察尔斯基创立所谓“无神的宗教”的弥天大谎。他尖锐地指出：“无神的宗教是没有的；那里有宗教，那里就一定有神。”②说着“娓娓动听的话”的卢那察尔斯基，“越来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背道而驰”③。他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根本不了解自己在俄国社会主义著作界中的作用。他借口前进和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而醉心于自己的臆想。但是，我已经指出，他对待宗教的态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根本相反的。现在我再补充一句：他为了给社会主义裁制宗教外衣，象虾一样向后退，退到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宗教观点上去了。就拿法国来说吧。圣西门和他的追随者在法国宣扬‘新基督教’。卡贝臆想‘真正的基督教’。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17—418页。

② 同上书，第420页。

③ 同上书，第421页。

傅立叶激烈反对现代人的非宗教精神。”^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造神派的世界观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卢那察尔斯基等造神派虽然“假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②，但他们信奉马赫主义哲学^③，他们是马赫主义的同道者^④，他们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普列汉诺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出了卢那察尔斯基造神说的特点。他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一切‘色彩鲜明’的预言，目的都在于医治患烦恼症的全俄‘知识界’的精神创伤。这就是他的宗教探寻的特点。我们的先知喜欢谈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观点、无产阶级斗争等等，但是，他同无产阶级本身，同自为的无产阶级，同达到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共同之点’。他是俄国最善感的、最肤浅的，因而也是最不稳定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知识分子’。”^⑤在俄国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产生了逃避革命斗争、追求个人精神安慰的消极情绪。卢那察尔斯基宣扬创造社会主义新宗教的理论，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反映。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是由近年来俄国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引起的。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对任何先进社会理想即将胜利的信心。当人们失去对社会理想的胜利的信心时，他们对自己的宝贵个人的‘关怀’就提到了首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⑥普列汉诺夫辛辣地把造神派首领卢那察尔斯基讽刺成为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4页。

② 同上书，第420页。

③ 参见上书，第424页。

④ 参见上书，第225页。

⑤ 同上书，第432页。

⑥ 同上书，第431页。

满足当时悲观厌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要求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他说：“由于许多社会性的原因，我国对‘宗教’有巨大的需求。而在有需求的地方，也就会有供应。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总是很关心需求。……对宗教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扮演‘第五宗教’的先知的角色。如果读者表现出对宗教的否定态度，他就会很凑巧地想起，他的宗教按原来计划是无神的宗教；而且很及时地想到，无神的宗教实际上根本不是宗教，而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说实在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好象是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他什么东西都想喜欢。”^①普列汉诺夫指出，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对造神说是完全不适用的。凡向我国现代‘知识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让步而从事造神的人，必然会背弃辩证唯物主义，犯一些理论上的错误。”^②这就分析了卢那察尔斯基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普列汉诺夫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创造“无神的”新宗教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倒退理论。普列汉诺夫认为，造神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一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主张倒退。他说：“我国现在的造神派还不知道西欧思想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许多极宝贵的成就，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就在内。这是使他们同‘马克思的批评家’相类似的一个特点。……‘马克思的批评家’和我国现代造神派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接受的‘进步公式’是：不要对人说，站在这里（马克思这里），而要说，从这里往后退，退到马克思以前甚至黑格尔以前的人类思想所处的地方，在那里你将作出一系列的光辉的发现。”^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0页。

② 同上书，第449页。

③ 同上书，第450—451页。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派时，也谈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他在承认“高尔基是一位杰出的卓越的艺术家”^①、“大文豪”^②的同时，也批评了高尔基曾一度受骗追随造神派的错误。普列汉诺夫指出，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忏悔》中扮演着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第五宗教’的宣传家”，“他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宣传着同样的东西。但是他知道得更少（我不想因此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知道得很多）；他更幼稚（我不想因此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不幼稚）；他更不了解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决不是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很了解这种理论）。因此，他想给社会主义披上宗教法衣的企图失败得更惨。”^③普列汉诺夫深刻分析了高尔基这个无产阶级艺术家的“高山”，之所以受卢那察尔斯基这个造神派的“干草堆”影响很深的原因。他说：“在理论方面，他（指高尔基——引者注）落后于时代太远了，说得好听点，他还没有赶上时代。因此，他的心灵中还有神秘主义的地盘。……正是由于这一令人遗憾的重大弱点，小小的干草堆才能使巍巍的高山受它的影响。”^④

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俄国马赫主义的另一个同伙——德米特里·谢尔盖也维奇·梅烈日柯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一年）尼·明斯基（一八五五——一九三七年）等寻神派。梅烈日柯夫斯基，俄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敌视现实主义原则，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二〇年旅居国外，继续反对苏维埃政权。明斯基，俄国诗人，宣扬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唯我主义，写了两本宣扬寻神主义的著作——《在良知感召下·对人生目的的思考 and 幻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444页。

③ 同上书，第437页。

④ 同上书，第452页。

想》（一八九〇年）、《未来的宗教（哲学谈话）》（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流亡国外。梅烈日柯夫斯基把神看成是幸福的来源，自由的源泉。他认为，道德是以相信神的存在为基础，如果这种信仰丧失，道德也就会随之而丧失^①。因此，人们要追求幸福，就必须追求神。他认为否认神是大逆不道的事，从而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他说：“否认神、否认绝对的神的个性，人就必定会否认自己的人的个性。为了聊以充饥的扁豆汤而否认自己的神的饥饿和神的优先地位，人就必然会沾上绝对庸俗的习气。”^②普列汉诺夫指出：“梅烈日柯夫斯基先生的确害怕死，所以希望不朽。而由于科学绝不能保证永生不死，因此他就求诸于宗教，从宗教观点看来，永生不死是毫无疑问的。”^③他还指出寻神派“明斯基先生要使人们相信，只有接受他的‘未来的宗教’，才能驱散由‘虚无主义的快乐’所引起的烦闷无聊。”^④寻神派极力标榜自己与造神派不同。梅烈日柯夫斯基竭力装作“极端的革命者”^⑤，“把自己列入精通欧洲文化的人的行列”^⑥，表示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等造神派的欺骗宣传。普列汉诺夫指出，寻神派与造神派在美化宗教，妄图造神等理论观点上是相同的。造神派宣传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寻求“精神上理想的神”，使人变成神，即创立神化的人类，创立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寻神派打着“宗教改革”的幌子，力图把宗教、科学和哲学综合起来。寻神派实际上也是在“造神”。普列汉诺夫说：“我国现代的寻神派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说法：他们正是按预先想好的意图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60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466页。

③④ 同上书，第482—483页。

⑤ 同上书，第455页。

⑥ 同上书，第454页。

‘建造’神，好象建筑师建造房屋、板棚和火车站一样。”^① 尽管寻神派和造神派彼此都表示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他们都在颂扬和捍卫神的观点。如果说寻神派和造神派有不同的话，也只是颂扬宗教和创造神的方式不同。普列汉诺夫指出，梅烈日柯夫斯基宣扬寻神主义，这“不等于他本人在宗教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的观点。不，他犯的错误一点儿也不比卢那察尔斯先生的轻。但是，他犯错误的方式不同”^②。

普列汉诺夫指出寻神派的政治目的：就在于通过攻击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理想，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寻神派头目梅烈日柯夫斯基声称，科学社会主义“不由自主地包含着永远中庸和庸俗习气的精神，包含着实证论这种宗教的必然的形而上学的后果，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建立在实证论之上”^③。另一个寻神派头目明斯基则攻击说，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把我们引诱到物象崇拜的密林中去。我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就是使物质福利继续降低到大家都能享受的最低水平的庸俗理想。”^④ 明斯基歪曲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把工人诬蔑为同资本家一样是目光短浅的物质享受者。他说什么：“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工人社会主义者和衣着讲究的资本家的生活目的是同样的，他们都崇拜消费品和生活设备，力求增加消费品的数量吗？只不过一个站在梯子的下一级，另一个站在上一级而已。”^⑤ 普列汉诺夫驳斥了寻神派这种资产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攻击工人阶级的陈词滥调，揭穿了资产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8页底注②。

② 同上书，第454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168页。

④ 转引自上书，第470页。

⑤ 转引自上书，第169页。

级道德的虚伪本质。他说：“我们知道，在现代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的资产阶级法则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① 寻神派反对工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诬蔑工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等于精神自杀。明斯基叫嚷说：“我们俄国知识分子如果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全人类理想，完全接受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及其全部哲学论据和心理内容，就是精神自杀。”^② 寻神派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与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认为经济斗争会使人类道德堕落，助长庸俗习气，是同“人类爱和忘我精神”对立的^③。寻神派更反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破坏人们完善的道德，增长人们的仇恨心理和精神自杀^④。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寻神派赞美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真面目。普列汉诺夫指出，寻神派赞美西欧的无政府主义者，诬蔑马克思主义太“好权”，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⑤。明斯基把无政府主义者吹得天花乱坠。他说：“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原来是十分激进的，他们既否认私有制同时又否认有组织的政权，因此他们有权认为自己根除了庸俗生活观和庸俗生活方式的毒素”^⑥。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明斯基在这里就是吹捧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这些如此适合我们这位作者心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67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470页。

③ 参见上书，第494页。

④ 参见上书，第470—471页。

⑤ 参见上书，第492—493页。

⑥ 转引自上书，第493页。

们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即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① 寻神派颂扬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状态。梅列日柯夫斯基宣称，无政府状态是俄国革命的潜在的灵魂^②。普列汉诺夫认为寻神派赞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反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因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他说：“现代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反对少数剥削者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参加者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的团结。他们的成功要以他们能为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自我牺牲是这一斗争中的高尚感情。”^③

普列汉诺夫揭示出寻神派这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反动的高蹈派^④诗人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颓废派^⑤ 艺术家那里搬运来的历史垃圾，“是已经陈旧不堪的原本的新抄本”^⑥。他说：“他们这些真诚地仇视‘庸俗习气’，‘自以为’正直崇高的人，把他们当时的整个文明人类都列入庸俗范围，以真正可笑的愤怒心情指责那个旨在结束庸俗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而根除道德领域的庸俗习气的伟大历史运动，说它庸俗不堪。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所谓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93页。

② 参见上书，第494—495页。

③ 参见上书，第492页。

④ 高蹈派：是1866年在法国巴黎出现的资产阶级诗人的文艺团体，因出版过诗集《当代巴那斯》，故又称为巴那斯派。这个文艺流派在诗歌创作中反对现实主义原则，宣扬悲观颓废情绪，鼓吹“为艺术而艺术”。

⑤ 颓废派：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流派。这种文艺思潮最初出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年）的诗歌中。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找不到出路的消极情绪。其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在文艺创作中，鼓吹个人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宣扬“为艺术而艺术”。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72页。

庸俗习气所抱的这种可笑的轻视态度，从高蹈派传给了颓废派，先传给法国颓废派，后来传给俄国颓废派。”^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寻神派与造神派产生的社会根源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颓废情绪的反映。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白色恐怖吓倒，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处于烦闷与苦恼之中，

“有一些人，他们身上的烦恼使他们狂饮。有一些人，同样的烦恼——确切地说是另一种烦恼——使他们在某种旧的宗教中寻找安慰。最后，有一些人，另一种不同的烦恼使他幻想某种新的宗教。”^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指的是寻神派，后者指的是造神派。他更具体生动地指出，寻神派实际上是一群被革命失败吓得丧魂落魄而迷了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妄图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洒上“新宗教的圣水”，“并点起自己‘新的’神秘主义的神香”^③。他说：“这些人士所以寻找上天堂的道路，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上迷了路。在他们看来，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运动就其性质来说是极其‘庸俗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些运动漠不关心，甚至采取敌对态度，而另一些人，虽然同情这些运动，仍然认为必须给这些运动洒上圣水，以便从他们身上洗刷掉它们的‘物质’经济起源的烙印。”^④普列汉诺夫形象地指出，这些迷了路的寻神派“他们在宗教中寻求安慰，正如另外一些人——有时候也就是他们这些人——在酒中寻求安慰一样”^⑤。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72页。

② 同上书，第423页。

③ 同上书，第481、492页。

④ 同上书，第475页。

⑤ 同上书，第489页。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九年发表的《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中谈到，“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制造的无神的宗教和颓废派的福音，远没有把我国现代宗教‘探寻’的一切变种包罗无遗。按照我原来的写作计划，除了一系列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以外，我还要详细分析那些曾出版一本轰动一时的《路标》文集的著作家给我们的宗教启示”，“来研究我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唯心主义’……然后又倒退到‘路标’派。”^①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打算，后来未能实现。关于批判布尔加柯夫、别尔嘉也夫等路标派的寻神说的文章，只写了一个提纲。但他明确指出路标派是“我国宗教探寻”者的“变种”，是“我国资产阶级欧化的精神工具”^②。

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造神派和寻神派宣传的各种谬论，并分析了造神派和寻神派出现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了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的危害，从而澄清了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造成的混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了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迅速向前发展。

普列汉诺夫对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的批判，是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在造神说和寻神说出笼以后，俄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对宗教传染病的不断蔓延，越来越感到忧虑和焦急不安，他们纷纷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要求他写作关于宗教理论的文章。他正是在群众的要求下，才欣然命笔。但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说的文章中，曾以孟什维克的派别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作了完全错误的评价。他说，高尔基“他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的作品也都是失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96页。

② 同上书，第496页。

的，例如美国生活特写和长篇小说《母亲》。怂恿他扮演思想家和宣传家的角色的人们（指布尔什维克——引者注），给了他很坏的帮助，他不适于扮演这些角色。”^①列宁对高尔基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追随造神派的政治错误，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同时，却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文学艺术创作，认为他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很多杰出的贡献。列宁非常称赞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的巨大教育作用。一九〇七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同高尔基见面时，就赞扬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②列宁也认为这本书还有缺点，然而并非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政论因素强烈”，而主要在于“把革命知识分子理想化了。”^③

尽管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的斗争中还有缺点，但是他做出的贡献还是主要的。可以说他同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的斗争功绩卓著。

第四节

剖析宗教的起源和本质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主义和寻神主义的斗争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依据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为指针，分析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普列汉诺夫在《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6页。

② 高尔基：《弗·伊·列宁》，《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页。

③ 参见玛·费·安德烈也娃：《列宁和高尔基》，《回忆列宁》第2卷，第274页。

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中，给宗教下了个定义：“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观念是宗教的神话因素，情绪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①普列汉诺夫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仔细地考察了宗教的起源问题。他正确地指明宗教是自然压迫的产物。他认为，宗教产生于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当时，社会经济非常落后，人类不能对自然和人类本身做出科学的解释，更无法控制自然，便开始把这些自然现象人格化，崇拜为神，产生万物有灵论，即认为世界上各种东西都有灵魂。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知道，原始人相信有许多精灵存在。但绝不是所有的精灵都是神。”^②原始人为了生活的需要，经常同动物、植物打交道，便逐渐产生了对植物和动物的图腾崇拜，认为某种植物和动物是他们的祖先，是神，它会降福灭灾。普列汉诺夫叙述了图腾崇拜产生和灭亡的过程：“我们已经知道，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不仅不把自己同动物对立起来，反而在很多场合下愿意承认动物高人一等。这就是图腾崇拜产生的时期。后来，逐渐地到了另一个时期，人意识到自己比动物优越并把自己同动物对立起来。这个时期，图腾崇拜就必然地消失了。”^③普列汉诺夫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图腾崇拜灭亡的根本原因。他说：“图腾崇拜究竟为什么瓦解了呢？这是由于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了变化”。“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首先在于原始人的生产力的增长，换句话说，在于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的加强。而这种能力的加强，改变着人对自然的态度的态度。马克思说，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的时候，也就改变着自己的自然。”^④普列汉诺夫接着指出，随着家庭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387页。

③ 同上书，第391页。

④ 同上书，第390—391页。

出现，出现了家神和家祭，“父权制家庭的神就是祖宗的神灵。”^①到了奴隶社会，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产生了国家，奴隶主为了加强对奴隶的压迫与剥削，便创造了象征奴隶主的至高无上的神，“人们之间所有这一切关系也在宗教中得到了虚幻的反映。神变成了天国的统治者和天国的法官。……这样，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就同道德牢固地结合起来。”^②把信神同遵守奴隶主规定的道德结合起来，产生了所谓灵魂转生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含意是：人们死后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他们在世的行为，人的灵魂在死后要受到审判，根据他前世的善恶而受到赏罚，决定灵魂以后的命运。灵魂转生是人们对社会压迫不满而无力摆脱这种压迫，找不到斗争出路的虚幻反映。普列汉诺夫还考察了宗教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他指出：“随着社会权力的发展，这些关系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们越来越认为自己隶属于神。这种隶属关系在君主制国家中达到了顶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随着限制王权的愿望，产生了‘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的倾向；自然神论是这样一种观念体系，它用自然规律从各方面限制神的权力。自然神论是天上的议会政治。”^③普列汉诺夫还论述了道德和宗教的关系。他强调指出：“在道德的观念同神的存在信念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以前，道德就已经产生了。宗教并不创造道德。它只是把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道德规范加以神圣化而已。”^④他在阐述了道德和万物有灵论的关系之后，分别驳斥了寻神派和造神派的谬论。寻神派认为万物有灵论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取消了万物有灵论，消灭了宗教，人类道德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96页。

② 同上书，第397页。

③ 同上书，第402页。

④ 同上书，第401页。

就会堕落。普列汉诺夫认为寻神派就是以拯救道德为借口来复活万物有灵论。他说：“我们在研究这些探寻的时候看见，其中一些探寻是企图复活现在垂死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布尔加柯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司徒卢威和明斯基等先生的探寻就是这样。”^①而造神派认为，只有创造一个排除万物有灵论，即没有神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人们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普列汉诺夫批判造神派说：“其他探寻的代表人物企图排除宗教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念，而保存它的其他因素。卢那察尔斯基就是这样”^②。普列汉诺夫指出卢那察尔斯基要创造无神的宗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反动空想。他说：“没有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宗教是从来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宗教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万物有灵论性质。”^③

普列汉诺夫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之后，对于自己给宗教下的定义，做了较正确的说明。他说：“宗教中的观念具有万物有灵论性质，它是由于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这样产生的观念，后来同人们借以把自然现象间的关系人格化、并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万物有灵论观念结合起来。”“至于宗教情绪，则根源在于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人们的感情和愿望，并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不论观念或情绪，都只有借助于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加以说明。”^④他又指出：“宗教仪式是由于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同一定宗教活动的结合而产生的。”^⑤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说和寻神说，论述宗教的本质和起源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03页。

③ 同上书，第411页。

④ 同上书，第401页。

⑤ 同上书，第366页。

时，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想意识、心理、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重要原理，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人的道德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社会关系的发展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他又说：“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运用于人类发展时，就是说，不是社会人的‘心理’决定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决定他的‘心理’。”^②

普列汉诺夫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宗教的起源和本质的深刻剖析，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宗教应持的态度，就在今天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08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第十三章

学术成果丰硕的著作家

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学术研究方面，领域宽广，著述丰硕。他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又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好些领域钻研深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他对民粹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分析等等，我们已在本书有关章节中作了评述。在这一章，我们拟简要评介他关于欧洲哲学史、俄国社会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我们把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集中在这里来写，是考虑到他在这些领域的学术专著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第一节

欧洲哲学史的宏儒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欧洲哲学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人。他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和列宁之前，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位贡献重大的马克思主

义欧洲哲学史专家。他对欧洲哲学史有精湛的研究，写下了大量出色的著作。除了早期写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八九一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八九五年）和《唯物主义史论丛》（一八九六年）之外，还有这个时期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九〇八年）、《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等等。他的这些关于欧洲哲学史的著作都是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写成的。他为了批判民粹派的谬论，而论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的观点、十九世纪法国空想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他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时，评价了康德的哲学，批判了新康德主义；他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同时，揭露了贝克莱的哲学观点和马赫主义。普列汉诺夫写的这些哲学史著作很少有迂腐的学究气，而是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精神。他在这些著作中，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评价各派哲学。他的这些著作，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欧洲哲学史时必须认真阅读的杰作。普列汉诺夫在研究欧洲哲学史时，对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的直觉论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时髦”流派的分析 and 批判，仍然是我们今天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他于一九一〇年在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各种资产阶级流派时，写道：“不管舒里雅齐柯夫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如何可笑，不管他们如何歪曲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学说仍然是正确的。不管这个或那个‘低能儿，短命科学的胎儿’如何滥用无产阶级理论、资产阶级哲学这类名词，这些名词本身仍不失其理论上的正确性；无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哲学在现实中是作为‘日益发展的文明生活的自我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存在的。对这点是毫无办法的。人们非考虑这一点、遵循这一点不可。”^①普列汉诺夫在七十年前说的这段

话,今天对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普列汉诺夫关于欧洲哲学史著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研究哲学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一些基本原则,探索了欧洲各种哲学流派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阐明哲学观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的发展规律。普列汉诺夫把欧洲哲学史看成是一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他说:“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立面。”“所有那些在他们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营垒;而所有那些认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则是唯心主义者。”^②他认为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战胜了以前的唯心主义,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战胜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③,近代欧洲哲学史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各种哲学观点产生和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把哲学观点的产生和演变,单纯看成是各种思想体系的继承和演变,看不到哲学观点同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同阶级斗争的联系。普列汉诺夫批判了哲学史研究中的这种唯心主义理论,认为要使哲学史成为科学,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导,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去阐述哲学观点的产生和发展。他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证明,存在的历史是怎样决定思维的历史的。”^④他又说:“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⑤他对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0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69—570页。

③ 见:同上书,第626页;第2卷,第508—50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6页。

⑤ 同上书,第157页。

场去研究哲学和社会思想史有一个解释。他指出：“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去研究观念的历史，就必须下一番功夫去说明一个时代的观念怎么样以及以何种方式为它的社会情况所造成，亦即归根到底怎么样为它的经济关系所造成。作出这样一个说明，是一种巨大而有意义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使观念形态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①这就是说，要阐明哲学观点的实质及其发展过程，就必须从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变革中找出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就是“以经济史来说明观念的历史。”^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欧洲哲学史中进步哲学学说的产生及各种哲学流派的斗争，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每个转折点都要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他指出：“在人类的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道路上，有许多重大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可能说：自然而然地活动。不，永远不会自然而然，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经济关系的表现。但是这种为经济所决定的政治制度要成为现实，必须先以某种概念的形式通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如果不先经过自己的概念的一系列变革，就不可能从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过渡到另一个转折点。”^③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主义的每个新的发展阶段，往往就是意识形态转折点的组成部分。他把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革命学说”^④，认为它的产生常常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237页。

④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39页。

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自然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例如，他说：“资产阶级最进步的代表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①他又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是精通自己时代的自然科学的。”^②普列汉诺夫指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他写道：“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把十八世纪同十九世纪截然分开——这就是法国革命这个名副其实的暴风雨之降临到法国。它破坏了旧秩序、扫清了旧制残余。它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能不对历史哲学也发生影响。”^③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就是伴随着欧洲历史上这个转折点而在欧洲哲学史上出现的。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就抛弃了原来宣传的唯物主义，而求助于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写道：“在大革命以后，法国哲学史异常清楚地表明：革命中的反唯物主义倾向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的保守的本能，资产阶级总算战胜了旧制度，因此就抛弃了自己旧日的革命立场，变成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害怕唯物主义，因为后者是一种革命学说，能很好地帮助无产阶级撕破它的麻醉者们为了阻碍它的精神发展而绑在它眼睛上面的神学的绷带。”^④于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很快在欧洲取代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而在哲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普列汉诺夫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等原理，断定一个哲学流派取代另一个哲学流派，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写道：“我们知道，从一种哲学体系或者从艺术中的一个派别过渡到另一种体系或派别，有时是很快地完成的，在几年内就完成了，有时却需要一整个世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37页。

②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71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33—734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39页。

纪。”^①

他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在欧洲哲学史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对思想意识形态有深刻的影响。他说：“阶级斗争在观念形态的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且事实上，这种作用是那样重要的，所以如果不考虑到在社会内部起大作用的阶级斗争，人们就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兴趣和观念的历史；只有原始的社会是例外的，因为在这种社会里还没有阶级存在。”^②这就指出，不同的阶级，由于其阶级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受阶级斗争制约和影响的。他认为正是由于在欧洲历史上阶级斗争异常复杂激烈，所以各种哲学观点才丰富多彩。他说：“社会各阶级的相互斗争，是西欧丰富的精神发展的源泉。”^③他指出哲学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写道：“实际上哲学家们的党派是一个战斗的党派。”^④

普列汉诺夫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欧洲哲学史时，发现不同的哲学观点既反映了时代要求，又继承了前人的哲学观点。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同。他说：“在任何时代里，每一种‘优越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真理”^⑤。他又指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努力；不同的努力，有不同的哲学。”^⑥这说明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受时代的限制。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要首先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任何时代的某一个阶级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是在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9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24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24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2页。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84页。

承前一个时代某种思想体系，拒绝另一种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普列汉诺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①他还阐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也有继承性。他写道：“虽然在一个一定的时候的一个阶级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从它们的内容上说，是由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可是从它们的形式上说，它们却与那些过去在同一阶级或较高阶级内占过统治地位的观念，是有密切联系的。”^②普列汉诺夫认为，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局限在一国内，而且涉及到世界各国之间。他举例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的唯物主义观点。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思想上之所以比洛克更彻底，是因为法国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比十七世纪英国高。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力量上比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更强大。他还指明，在欧洲哲学史上外国哲学观点对本国的影响，只能通过本国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首先是通过经济关系起作用。他以文学的相互影响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的时候，影响便完全不存在。例子：非洲的黑人至今没有感受到欧洲文学的任何影响。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不论在形式上亦不论内容上不能给别人以任何东西的时候。例子：前世纪的法国文学影响了俄国的文学，可是没有受到任何俄国的影响。最后，这个影响是互相的，当由于社会关系的类似及因之文化发展的类似的结果，交换着的民族的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4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91页。

方，都能从另一民族取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例子：法国文学影响着英国文学，同时自身亦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①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强调哲学观点的内容和性质依赖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特别是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批判了俄国哲学家弗·米·舒里雅齐柯夫（一八七二——一九一二年）把哲学理论同生产、阶级斗争关系庸俗化的观点。舒里雅齐柯夫直接从生产中寻找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令人可笑地认为一切哲学家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公式，如“概念”、“观念”、“表象”、“物质”、“精神”等，都反映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普列汉诺夫嘲笑道：“够了！说得太好了，以致我们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舒里雅齐柯夫先生是不是在开玩笑呢？或许他写的是讽刺马克思主义的摹拟文吧？作为讽刺性的摹拟文，他的书是很厉害的，甚至是有才气的，但是，显然是十分不正确的。”^②普列汉诺夫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切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是有意歪曲现实、杜撰哲学、愚弄群众。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等，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科学的、正确的，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不过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他们不能发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的一般规律，创造出真正科学的哲学理论。当然，走向反动没落的哲学家，会故意伪造现实，胡编哲学体系，借以欺骗群众，为巩固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效劳，从而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家。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哲学观点和社会思想同生产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谬论时，提出了研究哲学史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要把哲学理论同政治观点简单等同起来，不要简单地、庸俗地去评价某一种哲学观点。他只承认：一般说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8卷，第360页。

进步的哲学思想同持先进政治观点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腐朽的哲学理论往往来自反动没落的阶级，但并非每一个革命家在理论上都是进步哲学的代表，每一个坚持反动政治思想的人在哲学上都必然抱住反动腐朽的哲学理论不放。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一年发表的《无的放矢》一文中，阐明了他这个观点之后，强调指出：“所以像**反动分子或进步人士**这类的形容语根本没有说明这个哲学家的**理论上的功绩或错误**。谁要想用思想家的见解来毁灭这个哲学家，那他就应该驳倒这个哲学家学说的**理论部分**。只有在驳倒这一部分以后，他才有权指出引起思想家**曲解真理或妨碍思想家获得真理**的那种实际意向或那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遵守这个条件的情况下指出思想家（反动分子、进步人士等等）的政治同情，将有助于阐明思想家的错误的来源（起源）。在没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批评就变成了非难**，而非难即是单纯的**责备**。责备本身可能有其最高尚的背景，但它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批评**。”^①这启迪我们在开展学术批评时要谨慎从事，以理服人，不可简单粗暴，以势压人。

普列汉诺夫认为研究哲学史时，不仅要阐述各种学派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而且要论述它们的社会政治思想、历史观点等。他说：“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和每个近代哲学体系一样，必须对两类现象有所说明：一方面是自然界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现象。”^②他指出在欧洲哲学史上，各种哲学流派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研究比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进展得快。他说：“但是，当科学在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当中以较快速度前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却发展得远为缓慢。”^③因此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75—776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③ 同上书，第721页。

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上，往往忽视了对各派哲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探索。他提醒说：“至于马克思，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不管是写一般哲学史的历史学家，还是写唯物主义专史的历史学家，对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都是不愿意提起的。”^①这就告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必须使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在哲学史中占据它应有的重要地位。

普列汉诺夫关于欧洲哲学史著作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正确地评价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论述了唯物主义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他把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追溯到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五三〇——四七〇年）和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四六〇——三七〇年）。近代唯物主义发展的序列是：荷兰唯物主义哲学斯宾诺沙（一六三二——一六七七年），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德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年）。他重点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分别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概括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共同特征。

他指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只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僧侣、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②他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最进步的代表。

普列汉诺夫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哲学发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42页。

展到新的阶段，他们不仅以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自然界，而且注意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其中有一些人，如爱尔维修，有时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机智和成功地解释了若干个别的历史现象。”^①

普列汉诺夫认为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终究还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又认为社会环境是由“公共意见”造成的，即由人性、人的理性造成的。他们不懂社会发展规律，蔑视人民群众，反对阶级斗争，把人类历史当成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史。

普列汉诺夫指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法知道究竟‘公共意见’造成社会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造成‘公共意见’的。事实上，对于不知道抛弃形而上学立场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是最困难不过的事。”^②他又指出：“我们将会看见十九世纪的辩证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个任务。”^③

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十八世纪法国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是革命的。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就开始走下坡路。他说：“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只有一半是革命的。革命对于他只是一个手段（而且是不得已的和平手段），借以一劳永逸地达到一个安全而平静的港口。”^④

普列汉诺夫研究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的哲学观点与社会思想。法国复辟时代的三位历史学家基佐（一七八七——一八七四年）、梯叶里（一七九五——一八五六年）和米涅（一七九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8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8页。

③ 同上书，第80页。

④ 同上书，第137页。

六——一八八四年)都用财产关系来分析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都认为研究财产关系是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这是前进了一步。但一涉及到财产关系是怎样形成的这一要害问题时,这些历史学家又都离开经济关系,而从法律关系中,从“人的天性”中去寻找答案,重新陷入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堕入的圈子中。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个矛盾亦没有为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们所排除;在他们那里,它只不过采取了新的姿态。”^①

普列汉诺夫认真研究了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研究了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他说:“不懂得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无法了解十九世纪西欧哲学史和西欧社会科学史。这是不言而喻的。”^②他对这两位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论观点的论述,言简意赅,深刻有力,对黑格尔哲学观点的评论,尤其是如此。

普列汉诺夫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不能正确地阐明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陷于死气沉沉的困境。正在这时,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以辩证法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哲学思想推到新的阶段。普列汉诺夫说:“黑格尔较之他的前辈中的任何人都要善于利用辩证法。辩证法在这个天才的唯心主义者手中成为认识一切存在物的强大工具。”^③

普列汉诺夫着重考查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他认为黑格尔在坚持以辩证法去研究人类历史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说:“黑格尔在社会科学里的地位首先决定于他对一切社会科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9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27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4页。

的现象是从生成的过程的观点、即从这些现象的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观察的。”^①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最终地解决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二律背反。他指出说，我们只有在认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服从这些规律、依靠这些规律的限度内，才是自由的。这一点是在哲学方面、也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可是，只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才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成果。”^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每次以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时，常常不自觉地求助于经济关系，不自觉地按经济发展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观点去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的这种不自觉的观点，就给在黑格尔之后出现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方向，要解释历史，必须求助于经济关系。“如果不这样——就意味着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比起来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了。”^③普列汉诺夫因此说：“黑格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浸透着最精巧的唯心主义的。”^④

普列汉诺夫指出：“作为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一切现象的主要的和最深刻的动因”。^⑤正是这种唯心主义体系，损害了黑格尔哲学的价值，使黑格尔对现实作了歪曲的反映，他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曲解（当曲解时）事实，决不是因为他坚持那种要求对事物的现实关系异常注意的辩证方法。对于黑格尔说来曲解事实之所以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贯串于他的哲学体系中的那种唯心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1页。

② 同上书，第493—494页。

③ 同上书，第488页。

④ 同上书，第476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90页。

主义的缘故。”^①

整个说来，对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普列汉诺夫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当黑格尔还信仰辩证法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又说：“当黑格尔说严肃地把握辩证法并对之作清晰的理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时，他是完全正确的。”^②

普列汉诺夫评述了继黑格尔之后出现的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黑格尔的哲学为费尔巴哈的哲学所代替。费尔巴哈的哲学又让位给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③他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看成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时，指出：“马克思不是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一人。起义之旗是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举起的。”^④普列汉诺夫认为，费尔巴哈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三棱镜；他用唯物主义者的清醒眼光来看现象。这是前进了很大一步。”^⑤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费尔巴哈那里“已具有严整的外貌”^⑥，费尔巴哈在自己的认识论中“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⑦。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的唯物主义”，他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一般的人，生物学上的人，而不是生活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8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41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69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54页。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28页。

⑦ 同上书，第320页。

社会之中的人。普列汉诺夫又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叫做“生理学唯物主义”^①，这种唯物主义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为历史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在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中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仍然是唯心主义者。”^②

普列汉诺夫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积极作用。费尔巴哈认为，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不过是摆脱了个别人的局限性的本质，即某一社会整体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指出：“费尔巴哈这样想，就为把宗教看作社会发展产物的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③普列汉诺夫也指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说：“费尔巴哈用来解释‘宗教的本质’的那个‘人的本质’的概念，缺点在于抽象。”^④

普列汉诺夫分析了费尔巴哈“利己主义”的道德观。费尔巴哈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与幸福是对的，不过个人的幸福不能妨害别人和集体的幸福。他表示反对纯粹的利己主义，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幻想建立一种“爱的宗教”，来促使人们彼此相爱，人人幸福。他以为只要对利己主义加以种种限制，并辅之以爱，就可以消除利己主义将要产生的一切恶果。强调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在反对神权统治和贵族特权方面固然有其历史进步性，但是，它毕竟是奠基于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之上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普列汉诺夫肯定了费尔巴哈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的进步意义，而对其资产阶级本质却缺乏深入的批判。尽管费尔巴哈对利己主义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44页。

② 同上书，第59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8卷，第769页。

④ 同上书，第776—777页。

以限制，力图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起来；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不可能找到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途径。只有建立在共产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原则才是最合理、最高尚的道德原则，才可能在社会大发展的前提下充分照顾到个人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弱点是忽视了辩证法。他说：“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费尔巴哈，对于它的辩证性质太不注意了。因此，他自己的哲学获得了很明显的启蒙运动者的色调。这是缺点。”^①但是他仍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应占据重要地位。他说：“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直接的前辈，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②但是总的看来，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社会政治观点评述得太少，对其局限性和错误批判得很不够。

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悟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结果之后”^③才创建的科学理论。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④他认为“创造现代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功绩，无疑应当属于马克思和他的友人恩格斯。”^⑤他又把马克思称之为“近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⑥。辩证唯物主义是怎么创立的呢？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永远地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资产阶级唯物主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5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3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6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7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34页。译文有修改。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55—156页。

义。好吧。但是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这两者——德国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成果。保持着辩证方法的德国哲学，完全浸透了唯心主义，而‘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则几乎完全忽视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拒绝了唯心主义，而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这并不等于拒绝唯物主义，正象端正了辩证法（也就是说，使辩证法成为唯物辩证法）决不等于取消辩证法一样。”^①他又说：“马克思最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后来才转到费尔巴哈的观点。他从黑格尔承袭了辩证方法，而从费尔巴哈承袭了唯物主义。”^②普列汉诺夫说的“承袭”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批判地继承，他不止一次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本质区别。

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说：“黑格尔哲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是在现象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一切现象的，也就是说，是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的。但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通过唯心主义的三棱镜来看现象，把它们看作是某种类似应用逻辑的东西；在他看来，现实的运动归根到底是受绝对观念的运动制约的。”^③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使辩证法摆脱了神秘主义的外壳与唯心主义体系，并把它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他正确地指出：“不过唯物主义不能在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貌之下来利用辩证法。必须首先使辩证法摆脱它的神秘主义外壳。”“卡尔·马克思，这个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个在天才的智慧方面绝不下于黑格尔的人，是这个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1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6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54页。

大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完全有权利说到他自己，说他的方法是与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①普列汉诺夫还指出：

“在马克思的哲学里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完全相反的。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和一切有限物的辩证法一样，最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原因，即无限者绝对精神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辩证法归属于一些完全实在的原因：归属于社会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的发展。”^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已指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后者是不彻底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出版的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著作《神圣家族》，认为马克思这部著作“在全世界文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最新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首次坚决的发动。”^③普列汉诺夫论述了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和卢格出版的《德法年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马克思办的《新莱茵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指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理论是通过批判的途径来自费尔巴哈的哲学的”^④。而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时，却抛弃了他的辩证法。普列汉诺夫说：“费尔巴哈集中他的全力去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要素，以致他很少重视和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要素。”“这个空白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填补起来了，他们知道，如果只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忽视他的辩证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76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03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15页。

法，那是错误的。”^①正因为费尔巴哈忽视了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贡献，所以他的唯物主义带有直观性并且在历史领域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这些缺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纠正。普列汉诺夫写道：“然而，早在一八四五年二月，马克思以洞察事物的天才看出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他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或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这一批评成为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的起点，并导向唯物主义历史观。”^②他又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能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辩证观点。辩证法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他们两人破天荒第一次把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③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已指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以发展和补充”^④，“做了天才的修正”^⑤。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批判地利用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黑格尔，特别是法国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某些正确观点，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马克思证明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基础，用这个基础的进化可以解释社会进化的一切其他方面。这就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甚至比他在《资本论》中对现代社会所进行的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5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3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9页。

④ 见上书，第145页。

⑤ 同上书，第147页。

可反驳的批判更为重要。他的关于历史的理论第一次给了我们理解人类进化的钥匙。我们从马克思那里第一次得到了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①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在人类社会思想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推翻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十九世纪理论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③。

普列汉诺夫关于欧洲哲学史的著作，虽然有很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

普列汉诺夫有时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估价过高，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例如，他认为：“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④。他没有把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同费尔巴哈从人本唯物主义出发谈的“实践”区别开来，前者指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后者指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交往。不仅如此，他还责备说：“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⑤他还抹杀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经验”这个概念看法上的本质区别。他写道：“有一位德国著作家说，在经验批判主义看来，经验只是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认识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那末把经验批判主义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会失去意义，关于经验批判主义负有替代唯物主义的使命的议论也就是十分空洞无物了。”^⑥列宁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错误观点。他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10页。

② 同上书，第187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47页。

⑤ 同上书，第776页。

⑥ 同上书，第73页。

说：“这全是糊涂思想。”^①又进一步指出：“总之，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同样也可以隐藏着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路线，但是不论对经验所下的定义如何，研究对象也好，认识的手段也好，都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任何问题。”^②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九〇五年俄译本的注释中写道：“休谟说过，人应当行动、推理和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我们唯物主义者只要加上一句就行了，即：这样的‘信仰’是含义最好的**批判的**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拚命跃进。”^③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美化了休谟的不可知论，把不可知论的概念‘信仰’用来当成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用语。列宁对此指出：“‘信仰’这个字眼，虽然是重复休谟的话，并且加上了引号，但无疑地表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④

普列汉诺夫关于欧洲哲学史的著作，虽然有个别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他是正确地详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欧洲优秀哲学遗产之间继承和创新关系的第一个硕学宏儒。

第二节

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巨匠

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在普列汉诺夫毕生的学术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有四个明显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43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1页。

特点：时间长，著作多，功夫深，战斗性强。

时间长是指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贯串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他从参加民粹派的革命活动时起，就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一八八三年的《夏波夫》一文中，他第一次分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观点。后来写成了多种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的专著。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九年十月起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为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花去了他七、八年的漫长岁月。

著作多，是指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论文和专著，在他全部著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苏联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二十四卷中，有关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专著占七卷。其中第五卷和第六卷是关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述，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二卷是《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第一至三卷。此外，第二十三、二十四卷是普列汉诺夫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文章和资料汇集。

功夫深是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科学地分析了俄国思想家的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联系以及社会思想本身的发展，还考察了俄国社会思想如何受外国文化的影响，说明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明确指出他们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同时也严肃指出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局限性，认真地分析了这些局限性产生的历史根源。

战斗性强是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驳斥了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歪曲和篡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等人，竭力歪曲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谬论混为一谈，他们自己冒充为别林斯基、赫尔岑和

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通过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的分析，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可耻伪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六十年代优秀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缺点。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优点，则成为‘主观主义’的唯物主义敌手们的观点的基础。”^①普列汉诺夫嘲讽取消派说：“他们号召读者前进，而他们自己却向后退，大炒其哲学的冷饭。”^②普列汉诺夫把他们这伙人叫做“‘反乌的’的哲学家”^③。可以说，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是他反对民粹派和反对取消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是对俄国先进文化和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和其他著作中，就谈到了俄国先进文化遗产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中各流派对待先进文化遗产所持的态度。他写道：“在目前我们对革命思想史很感兴趣……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对过去数十年以来作为遗产而给予我们的所有的那些社会政治观点作一总结。”^④普列汉诺夫批判地继承了俄国先进文化遗产和革命传统，是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继承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革命传统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如果说赫尔岑、别林斯基是在俄国最早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那末普列汉诺夫则是在俄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过程中，坚决反对维护沙皇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31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③ 见上书，第241页。

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33页。

专制制度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尽力维护俄国民族的进步文化，特别是以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先进文化，驳斥了自由主义民粹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学者对俄国先进文化的篡改。这是他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功绩。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论述与发挥。他在评述俄国社会思想史中一些人物的理论观点的同时，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普列汉诺夫是应莫斯科世界出版社的请求着手撰写《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他在一九〇八年十月给这个出版社提出了写作计划。为完成这部著作，他和妻子给国内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的亲友写信，请他们代为收集有关资料，同时还充分利用了克拉伦当地的图书。该书于一九〇九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第一卷于一九一四年六月问世，第二卷于一九一五年底出版，第三卷于一九一六年底刊行。这三卷巨著总共为五十七印张，合中文约一百三十多万字。他原计划还要写第四卷，不幸未竟而终。

《俄国社会思想史》是普列汉诺夫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从九世纪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过程的专著，重点是写十七——十八世纪社会思想的发展。

第一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言：俄国社会关系发展概论；第二部分，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

普列汉诺夫在《著者序言》和《俄国社会关系发展概论》中，阐明了他对俄国社会制度和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总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明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的发展过程及

其规律。

普列汉诺夫在《著者序言》一开头就指明了他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出发点。他写道：“在提出专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时，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出发的，即：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我首先要考察那些决定俄国社会生活发展过程的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条件。”^①遵循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为阐明彼得大帝改革前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规律，而考察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和特点。他在分析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时，首先又着眼于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他说：“实际上，政治因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会走在经济因素的前面；政治因素始终受后者所制约，然而这一点也不妨碍政治因素给予经济因素以反作用。”^②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从空间条件考察了俄国社会，正确论述了俄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他写道：“我持有这种信念：地理环境只有借助于社会关系才影响本民族的气质。社会关系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要看地理环境是延缓还是加速该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对俄国历史过程中的地理环境的分析，使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俄国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同我们见到的在地理环境方面更幸运的西欧民族相比较，进行得很缓慢。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比较缓慢性——因而经济发展全部过程的比较缓慢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特点，当然这些重要特点是相对的，而不是象斯拉夫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绝对的。同时，对历史环境的分析向我表明，它长期地加大了以地理环境为条件的这些特点；所以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方面，日益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远离西方，而接近东方。这不可避免地理所当然地给所谓俄国民族精神打上了深刻痕迹。”^①

普列汉诺夫另一方面从时间条件考察了俄国社会，即从分析俄国历史发展过程入手，指明俄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与东方相似：地主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无地的农民受着残酷的剥削，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农民处于无权地位。他指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同巴甫洛夫——西利凡斯基教授一样，只限于将俄国与西欧做片面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如果他弥补这个片面的比较，将我们祖国与东方作一比较，那末立刻就会看到，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同西欧社会发展过程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越多，那末它对东方国家的发展过程来说具有特殊性就越少。相反也一样。”^②普列汉诺夫认为，从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实行改革起，资本主义才逐渐在俄国发展起来，俄国才逐渐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相似之处。他说：“俄国历史过程毕竟不同于法国历史过程，它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是同法国历史过程不同。它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点，这些特点把它同西欧所有国家区别开来，又使之相似于一些东方专制大国的发展过程。同时，——问题非常复杂化了——这些特点本身经历了相当特殊的发展过程。这些特点有时增多，有时减少，因为俄国似乎动摇于西方和东方之间。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公国时期（十四至十五世纪）同基辅罗斯时期（九至十二世纪）相比，这些特点更加突出。但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后，这些特点又在减少，——开始很缓慢，以后越来越迅速。俄国社会发展的这个新阶段，——起初使俄国缓慢地和表面地，而后越来越迅速地和深刻地欧化的阶段，——至今远未完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结。所有这些对于全面弄清我国的历史过程，是再重要不过了。”^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他正确地以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为界，把俄国社会思想史划分为两大时期。他又把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以后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贵族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新时期。

贵族时期，自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到十九世纪上半期，青年贵族思想家反对农奴制，要求废除农奴制。普列汉诺夫赞扬了青年贵族中先进分子的革命精神。他写道：“你们这些来自贵族的先进人物有时提出一些社会政治要求，实施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完全取消贵族阶级的特权，并为资产阶级在济经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发展开辟了道路。只要回忆一下十二月党人就够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某些贵族出身的思想家甚至转到劳动群众的观点上，因为这种观点是亚·伊·赫尔岑、尼·普·奥格辽夫及其小组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②

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自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平民知识分子最初力量还很小，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力量有所增强。俄国社会思想界从此出现了新局面。普列汉诺夫说：“第一、现在争论俄国是否应走西欧发展的道路，已经是可笑的了。在这方面已经很清楚：不仅是应当走，而且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第二、很明显，不是象赫尔岑在某个时候绝望地扬声说的那样‘我们’完全置身于‘人民需要之外’，俄国在经济上的欧化是应该的，随之而来是它政治上的欧化。而这件事在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面前展现了广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

阔的、可喜的前景。”^①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第三个时期时写道：“这样，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继贵族的和非贵族的时期之后，随着出现了一个新的、现在还在继续着的时期”^②，即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从一九〇五年以来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只限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思想领导权，已经不那么明显了。现在已经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现在思想力量主要分布在两端：一端是无产阶级，另一端是资产阶级。”^③

普列汉诺夫把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俄国近代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列宁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发表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写道：“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一）贵族时期，大约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六一年；（二）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三）无产阶级时期，从一八九五年到现在。”^④可见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几乎同时各自作出的对从十九世纪上半期起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的结论，是十分近似的。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在分析俄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但是他对于第三时期的划分和概括显然不如列宁准确、鲜明。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其思想影响正在日益增强，从发展趋势来看，它必将压倒资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论述了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对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29页。

②③ 同上书，第13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影响。他认为，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社会政治制度还是封建专制制度，与东方各国相似，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当时一些人把西欧资产阶级的理论运用到俄国，未能被人们接受，往往因行不通而陷于空想。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西欧的资产阶级理论才有了活动的市场。但是在平民知识分子把西欧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向俄国介绍时，时常忽视了西欧资产阶级已经由进步的阶级变成了反动的阶级，因而把资产阶级进步时期的理论与反动时期的理论混在一起。普列汉诺夫说：“当时在我们这里，和西方的先进的社会学说并行的，是在批判主义的名义下开始传播这样一些哲学学说。这些哲学学说在西方取得的成就导致了正是上述的一八四八年以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衰落。自此，在整整数十年中，先进的俄国作家——当时最先进的俄国社会阶层，即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世界观，时常有折中主义的毛病。他们把按其本质互不相同的一些观点掺合在一起，这些观点表现了完全相反的、因此相互不能调和的社会思潮。这自然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弱点。”^①

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完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总的看法之后，便来论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他在分析这个历史时期各种政治思想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时，提出了下述正确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他研究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他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时遵守的基本原则。

首先，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阶级间的相互斗争愈尖锐，社会思想向前发展愈迅速。但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相互斗争，归根结蒂是由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的，所以一切延缓这个过程的情况，也阻碍社会思想的发展。”^② 普列汉诺夫在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俄国社会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在沙皇政权、教会、大贵族、军功贵族等各方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考查了一些人物的政治思想主张。例如，在教会同沙皇政权的斗争中，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出现了国家权力论的理论家约瑟夫·萨宁，即沃洛茨基（一四四〇——一五一五年）。教会需要沙皇保护其财产，保护其对为他耕种土地的农奴的剥削；而沙皇政权需要教会帮助它从精神上麻醉人民，维持其统治。因此，便出现了沃洛茨基“将世俗政权的最高代表人物崇拜为神”^①的理论。沃洛茨基在著作中写道：“沙皇按他的本性说，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样的，但按他的权力说，是和至高无上的神是一样的。”^②他宣扬沙皇的权力是神授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沃洛茨基又告诫沙皇政权不要侵犯教会的财产，否则，“不是神的仆人，而是恶魔，因而不是沙皇，而是暴徒”^③。普列汉诺夫也注意从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考察反映农民利益与要求的代表人物的主张。例如，他颂扬了十七世纪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斯杰潘·拉辛的起义。他说：“人民群众把拉辛看成是他们的一切恶棍的征服者，在莫斯科公国全国一切地区，都准备好面包和食盐迎接自己的‘老兄’，对他比对自己寄予更多的希望。”^④又说：“劳动人民群众跟着斯切潘·拉辛的‘助手们’走，听信‘暴乱’的思想。”^⑤普列汉诺夫赞扬拉辛在暴动中英勇果敢、蔑视宗教。但是他又指出，拉辛仍求助于宗教。这是缺乏科学文化素养的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其次，普列汉诺夫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认清了延缓俄国经济发展并导致国家长期奴役一切社会力量的情况。鉴于这些情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43页。

②③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集体编著：《政治学说史》上册，法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186、187页。

④⑤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362页。

况，可以预言，俄罗斯的社会思想运动同经济发展条件更为优越的西欧国家相比，进行得较为缓慢。俄国人的社会观点落后于西欧人的社会观点，同时它开始接近东方专制国家居民的观点，因为俄国的，特别是莫斯科的社会关系已开始具有东方的特点。”^①普列汉诺夫在评介俄国各个时期的各种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时，常把这些人物与同时代的西欧的某些有类似主张的人物相比较，从而看出俄国每种社会思想主张的特殊性，而又从俄国与西欧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加以说明。显然，这种比较的方法，是有利于深刻了解俄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评述到十六世纪俄国杰出的政论家伊凡·谢明诺维奇·佩列斯维托夫^②的政治主张时，就曾把他与十六世纪法国维护专制制度的思想家让·鲍登（一五三〇——一五九六年）加以比较。普列汉诺夫评介了佩列斯维托夫的政治主张：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供养制度，实行司法改革和军队改组，压制大贵族，奖励有军功的贵族，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指出：“佩列斯维托夫非常憎恨‘达官贵人’，他不断复述，国内的一切灾难都来自他们那里。”^③当时鲍登主张国家是最高的主权，拥护君主专制，但是他又认为应当把暴君制与“合法的”君主制区别开，对于暴君制，人民有权推翻它。他还认为在政府组成上可以保留国民议会。这说明鲍登主张限制王权的统治。但是佩列斯维托夫却没有提出限制沙皇政权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在这一方面，他的功劳远不如上边已指出的他的同时代的法国人让·鲍登。”^④这是由于俄国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法国，因而佩列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35页。

② 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32卷（1955年版）第455页和第8版第19卷（1975年版）第400页，都说“生卒时间不知”。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53页。

④ 同上书，第164页。

斯维托夫与鲍登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普列汉诺夫写道：“著名的让·鲍登是孟德斯鸠的先辈，他是法国捍卫王权法律的最优秀的政论家。在彼得以前的俄罗斯，莫斯科专制制度的最杰出的理论家，是让·鲍登同时代人的年长者，沙皇的‘奴仆伊·谢·佩列斯维托夫’，他坚定地维护小官吏阶层的观点。”^①

普列汉诺夫在把俄国的政治思想家与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家对比的时候，绝不忽视俄国政治思想家自己的特点，而且更突出了这些特点。他对俄国每个政治思想家的主张，尽可能给予全面评价，那怕其主张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也一一指出。例如，他在论述到十七世纪社会政治学家、作家尤利·克里扎尼奇（一六一八——一六八三年）的政治主张时，写道：“读者看到，克里扎尼奇所拟定的改革计划，其目的在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东方的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西欧式（法国式）的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国家。”^②他又指出克里扎尼奇有严重的排外情绪，这又不利于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与先进技术。

再次，普列汉诺夫写道：“为了表达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自觉地研究唯物主义或者不自觉地把立足点转向唯物主义的时候，科学地解释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不局限于经济一面。它不仅包括，而且一定要包括全部‘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经常或多或少地对经济基础给予有力的反作用。如果唯物主义者不想注意这种反作用，那末他便背弃了自己固有的方法：从自己的视野中取消‘上层建筑’，完全不意味着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它的产生和它对后者的反作用。”^③他就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俄国历史上各种改革纲领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301卷。

③ 同上书，第256页。

的出现与实施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就是因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而产生的，结果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指出：“换句话说，邻国由于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拥有更强大的军事技术。落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并非因此而不具备邻国的那种形式。执政者开始兴办工厂，采取措施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以便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该社会的军事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所谓基础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促进的作用。从某些西欧国家的实例上也很清楚地看到这点。”^①他又指出：“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是：彼得改革按其最初的打算，目的仅在于改造武装力量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逐渐地扩大自己的计划，同时激荡着俄国生活中的一切长久停滞不前的陈腐的东西，激发了社会的所有阶级。”^②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第三卷中，都是继续以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评述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

普列汉诺夫全面分析了彼得大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的进步改革，充分肯定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完全赞成把彼得大帝称为“有学问的开明的专制君主”^③。但又指出，彼得是运用君主的无限权力以强硬残暴的手段推行这种改革的，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异常残酷。他说：“为使俄国欧化，彼得将居民在对待国家关系中的无权地位扩大到极点，居民的这种无权地位是东方专制国家特征的写照。”^④

普列汉诺夫把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制造舆论、深得彼得大帝信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257—258页。

② 同上书，第25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34页。

④ 同上书，第37页。

任的思想家称之为彼得的“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包括很多人，他选择其中三个人为代表进行评述。这三个人就是：费奥凡·普罗柯波维奇（一六八一——一七三七年）、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且夫（一六八六——一七五〇年）和安乔赫·德米特利也维奇·康捷米尔（一七〇八——一七四四年）。普列汉诺夫详细分析了这三个人的政治思想，并把三者加以比较，正确地概括了“智囊团”的政治思想的共同特点。他们从理论上论证君主制的合理性，主张巩固农奴制，批评某些神甫的不法行为与宗教使人民陷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但又尊重宗教的权利。他们是彼得改革的忠实的积极的推行者。普列汉诺夫指出：“普罗科波维奇、塔季且夫、康捷米尔可算是俄国绝对君主专制的第一流的思想家。”^①“彼得的心腹们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始祖。大家知道，那时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沙皇、改革家身上。当这位沙皇、改革家死后，这些心腹们感到自己处境维艰。当彼得二世继承王位时，看来这种困难的处境已几乎没有指望维持了。”^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波索什科夫和罗蒙诺索夫是两位预见到彼得改革将给俄国面目焕然一新的思想代表。

他指明，伊凡·季霍诺维奇·波索什科夫（一六五二——一七二六年），主张改革税收制度，使农民免于破产，发展商业，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促使俄国经济发展赶上外国，制定人人都遵守的法律，改进军事装备与军事训练。普列汉诺夫说，波索什科夫“是工商业阶级的思想家”^③，“他所获得的声誉不但是一个大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勇敢的革新家。”^④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121页。

④ 同上书，第104页。

普列汉诺夫指出，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一七一—一七六五年），是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子弟，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为一个智者和伟人”^①。罗蒙诺索夫曾提出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纲领，其核心是拥护专制君主制，目的在于增强彼得大帝的统治。普列汉诺夫认为：“罗蒙诺索夫的志向是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他研究得深刻并有独创。相反，在社会问题上，他没有很好的研究，因此‘致力于增加共同利益的思想’既不深刻，也无独创。”^②普列汉诺夫为罗蒙诺索夫一生中未把全部精力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而深表惋惜。罗蒙诺索夫还遵循伊丽莎白女皇的指令，编写了《俄国古代史》。后来苏联的许多学者都对这本书倍加赞扬，而普列汉诺夫却早就公正地指出这本书“有许多幼稚的东西和很少可供借鉴之处。”^③因为罗蒙诺索夫硬要“人人在俄国的传说中看到类似希腊和罗马的同样业绩和英雄”，旨在“好好地粉饰我国历史”^④。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评价是合乎实际的，表现了他能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观点评价俄国历史上的论著。

普列汉诺夫指出，自彼得改革后，农民因遭受的压榨日益沉重而不断爆发起义。他特别着重评述了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期间由叶·尼·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他指出，普加乔夫亲自宣布解放农民，取消各种赋税与徭役，给农民以土地与自由。因此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一些城市的市民甚至远道来到郊外迎接。最后起义军因力量弱、军事训练差而失败。他指出，普加乔夫曾伪装成真正的沙皇，希望出现一个“善良的沙皇”，提出的纲领也有很大的空想成分。“普加乔夫及其同事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③④ 同上书，第156页。

虽是坚决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他们本身，却深受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形成的那种农奴制关系的精神的薰染。”^① 皇权主义也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表现。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彼得改革后的十八世纪的俄国社会思想发展时，充分估计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指出：

“我国十八世纪先进的社会思想受法国的影响比其余整个欧洲的影响大得多。”^②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曾经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因为当时在俄国开始兴办的学校中，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中，聘请了不少法国人当教师，以至于到十八世纪中期，法语竟取代俄语成为俄国贵族的第一语言。这也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在青年贵族中的迅速传播。

随着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在俄国各阶级和各阶层面前，便提出了对西方的态度问题。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关于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本身包括两个问题：一）俄国自己能否，——如果能，又在何种程度上，——吸收、消化欧洲的文明？二）这样的吸收、消化是否必要？曾使俄国十九世纪知识界极为注意的这两个问题，早在十八世纪已经提出来了。”^③ 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社会政治思想，在俄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彻底摧毁农奴制。普列汉诺夫围绕对农奴制态度这个主题，详细考察了十八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状况。

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贵族，所以在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28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5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他们之中真正接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完全抛弃贵族等级观点，坚决主张摧毁农奴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处于彷徨、动摇状态。他重点评述了“十八世纪俄国的先进知识界的两个最高的代表人物：拉吉舍夫和诺维科夫。”^①

尼·伊·诺维科夫（一七四四——一八一八年）是杰出的启蒙学者、社会活动家和作家。他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编辑和出版讽刺性杂志《雄蜂》、《闲谈》、《画家》和《钱袋》等，陆续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地主和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充分暴露了农奴制的反动本质。他幻想废除农奴制，主张由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组织和领导人民反对大贵族，但又不承认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普列汉诺夫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可贵与不足。指出：“说到诺维科夫时代本身，那末我们已经看到，他虽然扮演了敌视‘名门贵族’的反对派的文化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未能（即使他也愿意）捍卫关于必须进行认真的社会改造的思想。”^②从整体考虑，普列汉诺夫对诺维科夫的社会政治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而诺维科夫则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思想家。”^③

普列汉诺夫颂扬了十八世纪末的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先驱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年）的社会政治思想。拉吉舍夫虽出身贵族，但后来接受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观点，成为俄国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反对农奴制，他没有对“开明”沙皇抱任何幻想，号召农民以起义推翻专制制度，建立革命政权，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他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而是对普加乔夫的起义深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233页。

② 同上书，第301页。

③ 同上书，第321页。

表同情。所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与要求。普列汉诺夫指出：“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国当时启蒙者的思维工作，——就其本身来说是有益的和可敬的，——是在贵族视野的限度内完成的。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放弃了贵族观点，并且较坚定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的启蒙者所持有的第三等级的观点上来。亚·尼·拉吉舍夫便是这不多人之中最杰出的人物。”^①普列汉诺夫还指明拉吉舍夫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他说：“在我国后来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占有显著地位的先进生活导师的行列中，拉吉舍夫是排头第一名。他的实践原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所拟定的实践原则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作为依据的理论前提，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哲学前提有许多共同之处。”^②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彼得改革后的十八世纪俄国的社会思想发展历史时，也指出了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七二七——一七九六年）的“敕令”维护农奴制的实质，还评述了主张巩固和扩大贵族等级特权的思想家米·米·舍尔巴托夫公爵（一七三三——一七九〇年）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评论十八世纪后期俄国对西方的态度时，意味深长地写道：“当时，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已成为我国前进发展中可设想的方向和可实现的希望。这是在我国知识界面前曾经出现的所有问题之中最重要、最折磨人的问题。一些在文明道路上超过我们的外国人，以损害我国自尊心的优越感评论俄国，这种评论至今仍然继续着。当然，自尊心并不是不合理的。可以容忍外国人对其持蔑视态度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353页。

也是不想存在的。诺维科夫和其他一些讽刺作家反对我国的法国崇拜者的言论，就是对外国人欺负俄国民族尊严应持有完全正当情感的提醒。失去了这种尊严的民族是不好的！但是这种情感在寻找出路时，几乎经常同其他一些情感结合在一起，依赖于其他一些情感的性质，本身具有这种或那种色彩，具有这种或那种的社会心理作用。如果说，在我国讽刺作家的作品里对模仿外国人的抨击有时具有保守的——不说反动的，——味道，那末在鲍尔京^①那里，这种抨击则表现为有意的和公开的保守。”^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明，俄国人民既要反对不向西方学习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崇洋媚外、维护民族尊严。他的这个正确论断至今仍可供各国人民，特别是经济上落后国家的人民深思。

由上述可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俄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阐明了西欧社会思想史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密切联系，批判了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出现的唯心主义和折中主义。此书还为我们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部鸿篇巨著是普列汉诺夫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此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接连再版，深受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普列汉诺夫原来准备继续撰写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第四卷的内容，是评述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其中包括：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观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等。他为此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集在《普列汉诺夫全集》第二十三、二十四卷内。

① 伊万·尼基季奇·鲍尔京（1735—1792年），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174—175页。

普列汉诺夫按他对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的看法，把赫尔岑作为贵族思想家的代表，而把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很多论著中认真地研究和评述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

普列汉诺夫关于研究赫尔岑社会思想的专门文章，主要有：《赫尔岑与农奴制》（一九一一年），《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一九一二年），还有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而在法国尼斯城赫尔岑墓前发表的演说等。

普列汉诺夫指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①就应当被认为是俄国民粹主义的鼻祖”^②。赫尔岑由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得出了结论：西欧虽制订了社会主义理想，但没有能力实现，实现它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俄国的头上。“赫尔岑把俄国看作是能够通过特殊的和西欧社会发展不相像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国家。”^③他把废除农奴制当成“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步”^④。他把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俄国，主张由“积极的”青年贵族起来，巩固和发展农民公社，在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他定居伦敦后，于一八五三年创立了第一个不受书报检查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印行了《北极星》文集（一八五五——一八六九年），出版了《钟声》杂志（一八五七——一八六七年），撰写文章，从事解放农民的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他为解放农

①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格辽夫（1813—1877年）是贵族革命家、政论家、诗人，赫尔岑的挚友，曾与赫尔岑共同主编在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746页。

③ 同上书，第758页。

④ 同上书，第757—758页。

民，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向贵族呼吁，向沙皇呼吁，都失败了，最后又向平民知识分子呼吁。普列汉诺夫分析了赫尔岑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与民粹派理论的关系。他说：“至于说到基本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于俄国经济的独特性以及关于它应当走的发展道路的看法——那末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整个是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那里剽窃来的，那怕不是完全自觉的。所以，我们有完全的权利说，早在‘自由的伦敦印刷所’刊载的初期论文中，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就已经作为俄国民粹派的奠基人出现了。他们以这种俄国民粹派的奠基人的资格，对农奴制举行了政论家的讨伐。”^①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赫尔岑为废除农奴制低三下四地写了多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呼吁的错误立场。

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赫尔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赫尔岑力图用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人类历史，看到了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他使辩证法成为革命运动的精神杠杆。”^②普列汉诺夫引用了赫尔岑的下述名言：“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不同寻常地使人得到解放，并彻底打破基督教的世界，打破过时的传说的世界”。接着赞扬了赫尔岑的这个正确论断。他说：“这说得非常好，非常鲜明。”^③普列汉诺夫指出：“赫尔岑也是从黑格尔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④但又指出，赫尔岑害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因此他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但是赫尔岑对这种唯物主义却全然不知道，而且他在我们所考察的他的发展时期，还是修养很差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708—709页。

②③ 同上书，第790页。

④ 同上书，第775页。

赫尔岑没有预感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①后来列宁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赫尔岑“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②

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着手研究俄国另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社会思想。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〇年他先后发表过关于别林斯基的四篇论文。他把别林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启蒙主义者时期，黑格尔主义时期，坚定的革命家时期。在第一时期，当别林斯基还是莫斯科大学学生时就写出了五幕话剧《德里特里·卡里宁》，“这个悲剧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抗议，虽然它的艺术水平并不高。别林斯基完全站到农奴一边。”^③一八三四年秋天，二十三岁的别林斯基发表了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指出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教育，他宣扬通过普及教育事业来救国。一八三六年八月他从巴枯宁那里接受了德国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年轻的别林斯基同情农奴，怀有抽象的社会理想，但是还无法解决他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恶常常战胜善，武力往往战胜法律，虚伪总是战胜真理。从一八三七年他研究并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之后，别林斯基的思想进入了第二时期。这时他对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作了错误的理解，所以他同自己以前所坚决仇视的现实妥协了，“于是别林斯基成了形势的热心的评论家；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是在把现实这一概念和存在这一概念等同起来。”^④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是在相信俄国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789—7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7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60页。

④ 同上书，第529页。

史会向前发展的前提下才同现实妥协，他暂时容忍农奴制是考虑到俄国民族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享受自由的程度，因此“如果有人把同俄国现实‘妥协了的’别林斯基看作是守旧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即使是在那时也离保守主义很远。”^①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自从同黑格尔所谓决裂以后，就开始了别林斯基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阶段上，别林斯基是这样一个坚决的革命家。”^②他已经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成为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此时实际上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其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抛弃了黑格尔的保守主义倾向，以黑格尔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俄国现实。“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回到对现实的否定以后，以他特有的热情埋头研究社会主义。”^③别林斯基力图解决十九世纪最卓越的思想家不断探索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普列汉诺夫正从这个意义上指出：“在这一场合俄国的社会思想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第一次以天才的勇敢精神着手去解决那个如我们所已看到的吸引了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任务。”^④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通过研究，认识到使他们苦恼的俄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永恒的，以后必然被革命运动所扫除。别林斯基轻视依靠农民公社能过渡到高一级社会的观念。

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评述了别林斯基在逝世前三个月，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在重病中口授的寄给巴黎的安年柯夫的一封信^⑤。他认为，这封信表明“别林斯基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69页。

② 同上书，第530页。

③ 同上书，第535页。

④ 同上书，第479页。

⑤ 同上书，第500—501页。

十分蔑视的；看来，他也准备把他们当作虔信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那样看待。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①。这说明别林斯基已经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而宣布同它告别。别林斯基在信中认为，人民在俄国“只能起消极的辅助作用”，“俄国现在需要彼得大帝”^②。他对沙皇寄托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应当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这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是不同的。普列汉诺夫说：“这当然是一个错误。”^③但是别林斯基看到俄国社会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同迷恋于空想、企图阻止俄国历史前进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也是完全不同的。普列汉诺夫对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的分析是相当细致而深刻的，有它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指出别林斯基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说：“别林斯基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是个中心人物。”^④他在谈到别林斯基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关系时正确地指出：“别林斯基在许多方面是他们的先驱。”^⑤列宁在对别林斯基的评价上同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写道：“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⑥。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二年连续发表了四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在一九〇八年为了迎接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他又扩充成为专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①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02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501页。

④ 同上书，第503页。

⑤ 同上书，第542页注①。

⑥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于一九〇九年出版。

普列汉诺夫正确、全面地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主义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五〇年在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毕业之后刚走上社会，就向往批评家和政论家的活动。谁是他的最早的思想先驱呢？不是别人，正是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怎样热爱并深深尊敬这位作家。因此，他希望循着别林斯基的足迹前进，以便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来继承他的事业”^①。同时，德国哲学曾经是当时俄国青年的最重要的教材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解到黑格尔的发展学说的巨大重要性，他甚至用有力的、充满感情的言辞阐明了这个学说，把黑格尔的发展学说称为“伟大、永恒而普遍的规律”。但是在他思想发展的关键年代里，“哲学已经永远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变种。”^②所以比他早一些的别林斯基最初接受的是费希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普列汉诺夫最早发现并且论证了“他对费尔巴哈抱着最深挚的崇敬。在他看来，费尔巴哈不比黑格尔差，而这一点就说明许多问题，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黑格尔是最有天才的思想家之一，这样，我们这位作者的哲学观点就被我们找到了。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唯物主义者。”^③普列汉诺夫这个看法当时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却被人们所公认。

费尔巴哈虽然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巢臼。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想用地理环境的作用来进一步说明社会历史的作用，但是从总的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车尔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0—31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表述了不少重要的新的意见，“但是，这些天才思想的闪光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没有形成体系”，“归根到底，他未能补救和纠正对他具有最大影响的那位思想家的哲学的缺陷和缺点。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观点中，他的导师没有很好地加以发展的那个方面，也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在他靠了自己的智慧力量接近于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地方，则往往赋予这种历史观以十分幼稚的形式。”^①接着，普列汉诺夫分析批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扬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前面已经论及，“合理的利己主义”本来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加以发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甚至最英勇的自我牺牲行为也只不过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他的话来说，“只须稍加留意那些表现为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情感，我们便可看到，它们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福利的思想，即依然是称作利己主义的情感”^②。他曾经举例说，一个妇女被人玷污之后自杀了，她是打算以此赢得她丈夫对她的纯洁的爱。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论断“有点令人奇怪”，这个妇女在自杀之前“能否作这种有根据的打算”，“极其令人怀疑”^③。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人的情感和习惯通常是适应于现存的社会关系的，以致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所做的行为有时看来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出于利害打算的。”^④车尔尼雪夫斯基力求从理智中寻求道德的基础，于是就在“必须用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地方，用有意识的利害打算去解释这些事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6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47页。

④ 同上书，第47—48页。

件。”^①这种解释骤然看来好象完全站在最新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实际上“远没有理解经济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意义。”^②“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道德习惯和一切思想倾向，都是在经济发展的这种盲目力量的间接影响或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人的各式各样的利害打算，人的利己主义的一切表现，也都是由这种盲目力量决定的。因此，决不能把有意识的利害打算说成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这样的历史观是与最新的唯物主义学说相矛盾的；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非常幼稚的。”^③这是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很中肯的批评。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产品全是劳动创造的果实，尝试创立“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深刻批判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杜·穆勒（一八〇六——一八七三年）摒弃劳动价值论、把价值看成就是生产费用的谬论。同时，普列汉诺夫深刻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交换价值、商品价格、资本、工资等问题上都还受穆勒的影响，而且他“用空想主义者的眼光去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不认为有必要去仔细地、冷静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看做只是离开‘自然秩序’的一种可悲的偏差和‘违背一切理论要求’的东西，——他自然就在有关现存经济关系以及它们未来的前途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④尽管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消灭农奴制度，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公社使用，实行土地国有化，尖锐批判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理论，鲜明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质和必然灭亡，这些都是应该给予很高评价的。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8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在政治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了现代欧洲历史上获取地租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普列汉诺夫把他的这个观点称为“一个关于现代欧洲史的内部动力的极为卓越的见解。”^①他在研究西欧的社会关系时，“可以说是无意之中得出了后来成为第一国际纲领基础的那个结论，即宣称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业。”^②他认为雇佣劳动者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但是他还没有把无产阶级从一般受苦受难的被压迫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所以他仍然把西方工人阶级称为“平民”。他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无产阶级应自求解放，“有时却倾向于采取一种极其奇怪的改善无产阶级命运的实际计划。”^③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是肯定：“实际上（如果不从理论方面来说）他是主张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的人，而且对斗争的渴望几乎在一八六一年、特别是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一八六二年所写的每篇文章的每一行里都表现出来。”^④

普列汉诺夫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伟大俄国社会主义者”^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十分遥远的事情，是人类进行局部性经济改革“长期试验”的结果。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认为农民公社的存在，会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而导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他主张通过交赎金买回土地的办法使农民得到解放。后来他看到即使农民赎买了土地也避免不了破产。这时，他又认为自己对农民公社的观点“是愚蠢的”，并为此“感到羞愧”^⑥。这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321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139页。

⑥ 参见上书，第107页。

时他开始对农民运动的兴起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完全站在农民方面的激进党派可能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普列汉诺夫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农民解放问题的观点的转变。他说：“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第一个理解到俄国政府在农民解放事业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伪善角色的俄国作家。”^①

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急进党派的公认的领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宣传者。人们把他看成是革命青年的‘魁首’”^②。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民革命的爆发上。一八六一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短评，驳斥沙皇政府和反动报刊对学生运动的恶罪诬蔑，告诫青年，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他形象深刻地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难行，时而沼泽满地，时而丛莽密布的荒野中通过的。谁怕满身尘土，沾污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人们的福利的人来说，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③这句关于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名言，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引用过，马克思在普列汉诺夫之前引用过^④，列宁在普列汉诺夫之后也多次引用过^⑤。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时，写道：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1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8页。

⑤ 《列宁全集》第11卷，第432页，第28卷，第19页，第31卷，第53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文章里从不放过嘲笑俄国自由派的机会，并且在刊物上声明，无论他或急进党派都与自由派毫无共同之处。胆小如鼠、缺乏远见、目光如豆、懦弱无能和自吹自擂——这就是他在当时自由派身上看到的那些突出的特质。”^①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鄙视俄国自由派，而且毫不留情地鄙视欧洲的自由派，因为他们在欧洲的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说：“自由派自己做得很少，却经常阻挠别人的努力，攻击那些比他们更为勇敢和坚决的人。可是，后来当由于这些坚决的人的努力，斗争将近结束并且胜利看来已毫无疑问的时候，自由派又力求挤上首要地位，坐享‘狂信者’从火中取得的栗子。”^②普列汉诺夫在正确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自由派的态度时，明确地表述了他自己对自由派的阶级地位、阶级特点和对革命的态度观点，坚决反对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身上，坚决反对把革命政党变成自由主义的政党^③。普列汉诺夫对自由派如此正确而又精彩的分析，在他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中少见，在他堕落成为孟什维克以后的著作中几乎绝迹。

普列汉诺夫在阐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时，也说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斯拉夫主义派的态度。斯拉夫派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在俄国政治思想舞台上的一个反动派别，他们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精选”的民族，美化俄国“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认为西方经历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可恨的，俄国根本上不需要革命，可以利用农民公社土地所有制，走独特的发展道路，经过某些改革后可以继续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斯拉夫派还提出了各个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统一由俄国沙皇政府保护的反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100页。

③ 见上书，第98—99页。

动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活动初期，尽管看到这个派别有着一切明显的错误，但认为他们是“启蒙运动”的真诚的朋友，热烈地同情他们对待俄国农民公社的态度。但是他以后越来越坚决反对斯拉夫派。

普列汉诺夫也指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局限性。他总结性地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社会主义问题也象对所有其他历史发展的一般问题一样，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的。”^①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合乎人性的、真正合理的东西”。“虽然他完全不认为各种不同的空想主义体系的创始者们醉心于幻想是正当的，虽然他力图把一切看作出于利害打算，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仍然是在朦胧的空想主义抽象概念中进行这种利害打算的。因此，……他也不能不对关于未来正确地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论断，赋予过分夸大的意义。”^②他不仅在一个时期内对俄国的农民公社的前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始终不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当然更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任务。

普列汉诺夫认真地分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形成唯物史观，没有转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原因。首先他指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备受压制的西欧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方面毫无表现的时期。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从旁观察无产阶级，同时没有机会通过亲身观察来了解前一个时代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以自然无从考虑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③其次，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经

①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70页。

② 同上书，第279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79页。

济、政治和哲学思想都不发达的俄国，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期被流放，使他闭目塞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无所知。这就限制了他的活动舞台和视野，使他不能摆脱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软弱方面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他不了解西欧哲学思想的最新派别，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①

普列汉诺夫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性的同时，没有超越历史阶段苛求前人，而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第一次确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终究是出现在我国文学界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②“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政论家，有几分是一个文学史家”，“一个哲学家”^③。

以上我们概述了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史专著的特点、成就和他对俄国历史上主要社会思想家的看法。

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探讨，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

最主要的是：没有充分分析当时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在把一些思想家的学说同当时俄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方面做得不够，这就不能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他们的学说的阶级实质。例如，他在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时，和当时俄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形势联系得不够紧密，没有具体说明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反映了农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要求。虽然他论述到赫尔岑坚决反对农奴制，为农民的解放而斗争，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286页。

③ 同上书，第287页。

未指出赫尔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农民革命愿望的代表者。他也忽视了别林斯基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农民运动的观点叙述得过于简略，更没论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站在农民立场、捍卫农民利益的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只看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伟大的空想主义者，而没有看到他们同时又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只是在一个地方提到“作为民主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嘲笑过俄国贵族的软弱^①。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出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组织“黑色百人团”的阶级实质，也作了错误的判断。他写道：“无论是在彼得之前，还是在彼得之后的长时期内，俄国商人们尽管实际上干着归根到底使旧莫斯科生活方式必遭破坏的事情，但他们却显露出保守的情绪和不愿意欧洲化。这种保守情绪至今还显露在我国一些省城的很大部分小市民阶层的‘黑色百人团’观点中。小市民阶层被资本主义的最新胜利吓破了胆。”^②

普列汉诺夫在研究赫尔岑的著作时，低估了唯物主义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他在一九一二年发表的《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一文中，说：“还在一八四四年四月，赫尔岑本人就持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或者至少他自身还没有形成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怀疑。”^③他又说：“下面我要指出赫尔岑的晚期著作，在那些著作里，他似乎完全和唯心主义决裂了。”^④事实上，赫尔岑早在一八四四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第一封信中，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101—10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32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761页。

④ 同上书，第777—778页。

就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观点解决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普列汉诺夫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列宁仔细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并把它同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〇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加以对照，然后在该书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并划了许多记号。普列汉诺夫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论’活动上，因此智力发展在他的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①列宁在普列汉诺夫这句话旁边严肃地写了如下批语：“普列汉诺夫所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缺点也是这样”^②。列宁的批评是切合实际的，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中只是局限于叙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观点，而很少结合当时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际，没有指明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对当时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现实意义，理论脱离了实际。列宁还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差别，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的和阶级的差别。”^③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完全删去了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论文中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鄙视资产阶级自由派并加以无情揭露的内容，而只在二、三处不痛不痒地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态度。他这样后退显然是由于他自己已成为孟什维克之故。

但是，我们认为：苏联一些学者在五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巨著《俄国社会思想史》和其他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的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595页。

③ 同上书，第611页。

价是不公正的，带有片面性。如说，“普列汉诺夫往往把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看做是一种从西欧思想家们那里抄袭来的‘思想继承关系’的独特的过程。”“他没有考察到俄国哲学体系中所反映的俄国生活的民族历史的条件，把俄国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在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反映搁置在一旁，没有注意到俄国哲学传统的继承性。”^① 欧洲社会政治思想发展史表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了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俄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国家，当然不能例外。在上述这些思想体系形成的时候，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限制，在俄国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想观点，显得十分幼稚、落后。因此，在俄国新出现的一些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必然要向西欧学习，并受西欧影响，继承西欧思想家已有的先进主张，这是完全合乎欧洲社会思想发展规律的，也是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的实际情况。普列汉诺夫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西欧先进社会思想对俄国思想家的影响，是完全正确的。某些苏联学者为了夸大俄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先进性，就故意贬低或者否认西欧社会思想对俄国思想家的巨大影响，显然这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出发的^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

① 见约夫楚克：《论俄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基本阶段》，《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18—19世纪的俄国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不很发达时说过“无论哪一个俄国的学者都还没有说过一句对欧洲的思想科学的前途具有决定影响的话。”（《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5页）这个论断本来是合乎实际的、公正的，可是苏联学者却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的注释中指责他“对于俄国科学对世界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有些估计不足。”（同上书第892页）接着苏联学者列举了罗蒙诺索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在世界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并不曾否认俄国学者的世界地位和影响，他强调的是俄国学者都还没有说过一句对欧洲的思想科学的前途具有决定影响的话。

看到，普列汉诺夫在评述俄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想时，不仅考虑到西欧社会思想对它们的影响，而且还分析了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例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存在有农民公社这一特殊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从而他们成了民粹主义的先驱。当然，我们也认为，普列汉诺夫在研究和论述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社会思想与社会阶级斗争的关系，分析得还不够充分。但是如果认为他“把俄国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在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反映搁置在一旁”，那也是过了头。

整个看来，普列汉诺夫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过程中存在着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同他为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作出的伟大贡献相比，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深入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巨匠，他是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俄国从十七世纪封建时代中期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这样整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想史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专著卷帙浩繁，材料翔实，观点新颖，分析细腻，堪称史论结合的杰作。他在这个领域内开创性的丰功伟绩是不可泯灭的。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否定态度固然不对，即便是过分挑剔也是缺乏历史观点。当然，我们也不应讳言其中的缺点错误，尤其是书中的某些孟什维主义观点，更是应该加以批判。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大师

普列汉诺夫毕生酷爱文学艺术，写了多种关于文学艺术的名著，其中有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写的关于文艺理论的不朽著作——《没有地址的信》（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也有他成为机会主义者以后写的关于文艺理论的佳作——《无产阶级运动

和资产阶级艺术》（一九〇五年）、《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等。普列汉诺夫在后期写的大量文艺理论著作，对他以前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普列汉诺夫不会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完整体系。普列汉诺夫在后期写的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所以应当给予肯定。这些著作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俄国文学史、阐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大师。他在上述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美学是研究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也是研究艺术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的科学。美学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年），后来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年）、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年）和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美学；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基础。他们把美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指明了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阐发了艺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预见到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艺术将取代日益末落的资产阶级艺术。普列汉诺夫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理论，吸取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精华，研究了人类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史，揭示了艺术的起源与本质，指出了功利主义是审美活动的

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所以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普列汉诺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具体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理论，揭露了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这是普列汉诺夫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普列汉诺夫还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针，评述了世界和俄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正确见解，尽管也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但终究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学史的可贵尝试，今天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仍有重要的启示。

和普列汉诺夫同时代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和弗兰茨·梅林，也有好些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论著。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痛斥了自然主义的美学原则。但是他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及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不愧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之前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师。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

普列汉诺夫对什么是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想起和反复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①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看法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指明艺术是社会现象，而不单纯是个人的产品；艺术是形象的表现，而不是逻辑的推

^①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页。以下简称：《论艺术》。

理。当然他没有明确说明艺术形象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在表述上是有缺陷的。但是应该考虑到，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强调指出艺术是用形象表现感情和思想，这是针对列·托尔斯泰的。因为后者认为人们使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使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普列汉诺夫不同意列·托尔斯泰这种把语言和艺术截然分开的看法^①。他说：语言既表现思想，也表现感情（诗歌正是以语言为工具）；“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②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见解是全面的、深刻的。

普列汉诺夫在考察和分析大量艺术史料的基础上，指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科学地回答了艺术的起源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说明艺术起源问题时，首先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有审美活动和美的概念，动物是没有的。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批判了艺术起源于动物本性的谬论。他指出这种谬论来自达尔文，但是达尔文所举出的一些事实并没有充分说明审美趣味起源于动物。他考察了一些原始民族的装饰，指明他们之所以用动物的皮、爪、牙装饰自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打死了凶猛的动物，标志着自己心灵手巧强壮有力。有一个部落以拔掉上门牙为美丽，是竭力想模仿反刍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反刍动物是自己的祖先。普列汉诺夫经过大量考证，提出美的概念、审美趣味，“它的起源必须在观念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联想中寻找，而不要在跟它显然没有一点儿（直接的）关系的生物学规律中寻找。”^③他确信上述关于美的联想和复杂的观念

① 列·托尔斯泰并非一贯主张艺术只传达感情，他在其他言论和艺术实践中也认为艺术可以传达思想。

② 《论艺术》，第4页。

③ 《论艺术》，第13页。

“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经济所制约和创造的”^①，指明了只有人，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才有美的概念和审美趣味。

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和研究一些原始民族艺术产生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结论。他说：“原始狩猎者的艺术活动的性质十分明确地证明了，有用物品的生产和一般的经济活动，在他们那里是先于艺术的产生，并且给艺术打下了最鲜明的印记。楚克奇人的图画描绘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狩猎生活的各种不同场面。很明显，楚克奇人最初从事狩猎，后来才在图画中再现了自己的狩猎。同样，如果布什门人描绘的几乎完全是动物，如狒狒、象、河马、雁等等，这是因为动物在他们的狩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最初人同动物发生一定的关系（开始猎取它们），后来——正因为同它们发生了这样的关系——他才产生了要描绘这些动物的冲动。究竟什么在先：劳动先于艺术，还是艺术先于劳动呢？”^②普列汉诺夫认为“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③。他既批判了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的唯心主义理论，也反对把艺术看作是对动物的简单模仿和自然现象单纯再现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着重批判了艺术起源于游戏的理论。他举例说：土著部落之一巴戈包人，“男女都从事农业。在种稻的日子里，男人和女人一大早就聚集在一起，着手工作。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把铁镐插入地里。妇女跟在他们后面，把谷粒撒到男子们所挖的坑里，用土把它盖好。”“在这里我看到游戏（舞蹈）和劳动的结合。然而这种结合并没有掩盖现象的真实联系。”“在这里劳动先于游

① 《论艺术》，第13页。

②③ 同上书，第92—93页。

戏，而游戏是由巴戈包人播种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游戏是劳动的产儿，劳动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①普列汉诺夫还举出一些类似例子，从中得出结论：“这就是说，在人们那里，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换句话说，维持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先于游戏，而且决定着游戏的内容。”^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明游戏起源于劳动，劳动决定着游戏的内容。进而可见文艺来源于劳动，文艺的内容决定于劳动。

普列汉诺夫在探讨艺术的起源时，指明了艺术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在原始社会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生产斗争和生存服务的。他主张以功利目的去看待审美活动的目的和艺术的本质。他说：“但是必须记住，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③例如，原始人用油脂、某些植物的汁液或者彩色粘土来涂抹身体，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保护自己免受昆虫的侵害，后来才注意到身体涂抹之后可以变得更美丽，于是才开始为了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身体。据此，他认为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功利究竟是存在的；它究竟是美的欣赏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这里指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它，对象就不显得美了。”^④他阐明了功利目的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任何艺术都为一定的功利目的服务。

普列汉诺夫还以唯物史观论述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艺术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⑤艺术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

① 《论艺术》，第75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译文》1956年12月号，第158页。

⑤ 《论艺术》，第51页。

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但是能说这些话的人，从而也就说出了唯物史观”^①。普列汉诺夫批判了认为艺术与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无关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他也反对那种把艺术与社会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艺术直接同经济关系发生作用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艺术直接受社会物质生产的影响，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艺术往往是通过政治、法律、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通过阶级斗争等这些中间环节，间接地同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所以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原始社会的艺术发展时，就指出了艺术直接或间接受生产力状况制约的两种形式。他说：“如果任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间接地或直接地——甚至制约着他们的艺术活动，那末很明显，我在谈到原始民族的时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的生产力状况，然后再弄清楚这种状况和艺术之间所存在的关系。”^②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强调指出了阶级斗争对艺术的直接地影响作用，他写道：“在文明民族，阶级斗争是生活机构中最重要原动力之一。唯有考察了这个原动力，唯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阶级斗争的种种不同变化，我们才能多多少少令人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社会思想的行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③ 普列

① 《论艺术》，第47页。

② 同上书，第170页注释74a。

③ 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译文》1956年12月号，第157页。

汉诺夫认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他说：“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需求，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有所不同。”^①他还深刻指出在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也必然要在艺术中占统治地位，以便为其阶级利益服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不同，为他们服务的艺术作品也有所不同。这就揭示了艺术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他写道：

“人们的美的概念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不同社会阶级的美的概念很不相同，有时甚至恰好相反。某个时期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也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统治地位。它把自己的观点和概念带进文学和艺术。但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不同阶级在不同时期内占有统治地位。同时，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它发展起来，达到鼎盛时期和统治地位，最后则趋于衰亡。它的文学观点和它的美学概念，也与此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各种不同的美学概念：在一个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观点，到另一个时代就变为陈旧的了。”^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旧的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统治阶级所代替，新的进步的艺术就要取代陈旧的艺术。他写道：“艺术作品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和事实。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人们的美学趣味也改变了，也就是说，艺术家的作品也随着改变了。一定社会时代的人总是喜欢表达这一时代趣味的艺术作品的。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某个时代所特有的趣味，依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地位为转移而常常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艺术批评家本身就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连他的美学判断也始终是由这一环境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他永远不能避免在文学中或艺术中的一个学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365—366页。

和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个学派中偏爱一个。”^①普列汉诺夫曾考察了法国戏剧的历史。他指出，中世纪主要演滑稽戏，“滑稽戏是为人民而写而且是演给人民看的。”^②到了十七世纪中期，封建贵族迅速兴起，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的古典主义悲剧就取代了滑稽戏，“这里获得胜利的实际上是高尚的贵族趣味。”^③到了十八世纪末，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强大起来，他们要利用戏剧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于是流泪喜剧风行一时。“流泪喜剧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肖像。”^④火热的革命斗争，往往使艺术开出绚丽的花朵。普列汉诺夫说：“至于革命时代的法国艺术，‘长裤党’（指第三等级——引者注）也把它引上了上层阶级的艺术所不会走的道路：它成了全民的事业。”^⑤

普列汉诺夫还指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所以我把它同宗教、哲学、法律等其它种意识形态一样看待，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每一种都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⑥他分析了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区别。他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⑦他在文章中既谈到了艺术与哲学的区别，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艺的指导作用。他认为：“艺术也服从于辩证发展的规律。”^⑧他在谈到哲学与美学的关系时说：“哲学并不消灭美学，而相反地，为美学开辟了道路，哲学力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07页。

②③④⑤ 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译文》1956年12月号，第133、135、139、157页。

⑥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3卷，第154页。

⑦ 《论艺术》，第4页。

⑧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05页。

为美学找寻巩固的基础。关于唯物主义的文学批评也应这样说”^①。他指出文艺批评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写道：

“我深深地确信，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我也认为，批评在自己过去的发展中，它的代表者们愈加接近于我所捍卫的历史观点，它就获得愈加牢固的基础。”^②

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社会政治标准和艺术审美标准，并且全面说明了这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他在一九〇八年写的《〈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中重申他多次阐述过的观点：“批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该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语言翻译成社会学语言，以便找到可以称之为该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等价物。”^③他的这个看法曾被人误会为只重视艺术的社会政治标准，而不顾及艺术审美标准。所以他在这篇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忠实的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个步骤自然应当是对所分析的作品审美价值作出评价。如果唯物主义批评家以他所发现的该作品的社会学的等价物为理由，而拒绝作出这样的评价，那不过是暴露了他对自己要据以立说的见解并不理解。”^④这就是说，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如果把艺术的社会政治标准同艺术审美标准割裂开来，只讲社会政治标准而无视艺术审美标准，那也就是不懂艺术。他还正确地指出了这两个标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性。他说：“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一个步骤不但不排除第二个步骤的必要性，而且正是要引出作为必要补充的第二个步骤来。”^⑤

普列汉诺夫还阐述了衡量一切艺术作品的标准是健康的内容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89页。

② 《论艺术》，第40页。

③④⑤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86、189页。

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在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史时就指明：“如果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一致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第一个主要的标志，那就不能不承认原始民族的战争舞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艺术东西。”^①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衡量一切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他指出：艺术创作的一切规律“最终不过归结为一点：形式必须和内容相适应。然而这个规律对于一切流派——不论古典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等等——都是重要的。”^②普列汉诺夫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认为错误的思想损害了艺术形式，拙劣的艺术形式也不能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

普列汉诺夫指出作家创作艺术作品时，必须遵循内容健康和形式完美相统一的原则。他说：“艺术家用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政论家则借助逻辑的推论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如果一位作家不运用形象而运用逻辑的推论，或者如果他虚构出形象来论证某一论题，那末他已经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了，即使他所写的不是著述和论文，而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或剧本。这一切的确就是如此。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在艺术作品中是不重要的。我还要进一步这样说：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那些只重视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③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指出，思想内容同艺术技巧相比，还是占首位的。他说：“那就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取决于它的内容的比重。”^④

① 《论艺术》，第101—102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注释24a。

③④ 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6页。以下简称：《艺术与社会生活》。

普列汉诺夫具体地指出，作家创作出好的艺术品取决于作家对事物的观察的深度与表现事物的艺术技巧的高低。他写道：“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观察能力和手的灵巧。”^①

普列汉诺夫阐明了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创作首先要从社会的现实出发，真实地反映现实，以达到教育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他指出：在艺术创作中，对待艺术是否需要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他写道：“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在所有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文学中总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论过去和现在，这一问题常常是以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解决的。”“一些人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说：不是人为星期六而存在，而是星期六为人而存在；不是社会为艺术家而存在，而是艺术家为社会而存在。艺术应当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善。”“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把艺术变为手段以求达到某种别的、即使是最崇高的目的，那就等于降低艺术作品的价值。”^②

普列汉诺夫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六十年代俄国先进文学派别坚持了第一种观点。他特别称赞俄罗斯伟大的人民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逼真地反映俄国社会现实的诗篇。他指出，涅克拉索夫在诗篇中以描绘人民为主，带着愤怒和仇恨的感情揭露了专制制度对人民的迫害。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体现了时代的脉搏，标志着平民知识分子走上诗坛。

普列汉诺夫指明进步的艺术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促进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说：“艺术是人与人之

① 《论艺术》，第139页。

②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15页。

间的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一部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愈是崇高，它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就愈加容易显出它作为上述手段的作用。”^①他认为，进步的艺术作品能够加深人们对剥削阶级和旧社会的憎恨，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他在谈到诗歌的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时指出：“诗歌应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对人们进行教育，它应该唤起人们的朝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②他在谈到歌颂革命战争的诗篇时说：“战争的诗歌表达了对敌人的憎恨，同时也歌颂战士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歌颂他们准备为自己的乡土、为自己的国家等等而献身的决心。”^③

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评论七十年代民粹派作家开始，就着手研究现实主义问题。他对现实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重要问题，大胆地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同恩格斯的观点近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的是德国伟大作家席勒（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年）。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致斐·拉萨尔的信，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次使用这个术语。后来，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进一步论述了现实主义原则。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有关文艺理论的书信，未能及时发表。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和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致斐·拉萨尔的信、恩格斯于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致斐·拉萨尔的信，到一九二二年才首次问世。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德国女作家敏娜·考茨基（一八三七——一九一二年）的信和一八八八年四月初致英国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3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99页。

③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37页。

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于一九三二年初次同读者见面。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六月五日致德国剧作家保·恩斯特(一八六六——一九三三年)的信于一九三一年才第一次发表。所以普列汉诺夫在世时未能读到这些论述。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八年八月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一册上，发表了文章《格·依·乌斯宾斯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初步阐述了对现实主义的见解，后来又深入研究，进一步阐明了他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看法^①。

普列汉诺夫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分析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强调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他说：“假使文学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末批评对它可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真实性。”^②他又指出：“艺术创作最伟大的任务就在于描绘现象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要尽可能接近现实。”^③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提出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首先就要真实地描写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他说：“文学作品对人民群众的特性再现得越正确，那末它就越能促进那些在顺利条件下倡议重大决定的人们的事业。”^④他又从反面着重指出：“而艺术作品要是歪曲了现实，它就不是成功的作品。”^⑤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应当是多方面的。他说：“但是生活在自己的表现中是异常多样化的，我

① 关于普列汉诺夫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参见吴元迈：《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3页。

③ 同上书，第652页。

④ 同上书，第398页。

⑤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88页。

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家对它采取完全一样的态度：一个人从一方面来看待它，另一个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待它。”^①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在参观意大利威尼斯第六届国际艺术展览会时，深深感到：被人们赞不绝口的各种艺术品，虽然形式不一，体裁各异，风格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例如，他认为，从瑞典画家卡尔·拉森的水彩画《开着的门》、《拿草莓的女孩子》、《晚餐》等作品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活生生的’，不是假造出来的生活。”^②荷兰画家阿维尔曼的石版画，“它们几乎没有一点点追求效果的倾向，它们一切都真实到了极点。”^③

普列汉诺夫认为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努力表达人民群众的进步愿望与要求。他说：“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象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④他继别林斯基之后，再次重申艺术创作的名言：“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的工具和表达者。”^⑤普列汉诺夫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成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作者抓住了人们当时正在思考的俄国应走向何处去这一重要问题，为人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生活的远景。他说：“《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这是文艺作品获得成功的一般秘密，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4页。

②③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第129、138页。

④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386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81页。

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①

普列汉诺夫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艺术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和反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

普列汉诺夫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之后，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艺术的谬论。他认为，艺术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他说：“我曾经说过，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品是不会有。我还补充过一句：并不是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作为艺术作品的基础。只有那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东西，才能给予艺术家以真正的灵感。这种交往的可能的范围并不取决于艺术家，而是取决于他所属的那个社会整体所达到的文化高度。但是在阶级社会中，问题还要以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个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为转移。”^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明了艺术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并指出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决定其交往范围的大小。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在阶级社会里，反映了某些阶级的意志与要求。无论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都持有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他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可是由于政权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因此不该认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象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③他举出生动事例，说明反动统治阶级也是抱有功利主义的艺术观的：法国路易十四宣扬艺术要促进人们的道德修养，其目的是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209页。

②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50—851页。

③ 同上书，第830页。

了维持专制政体的统治。拿破仑一世也口称艺术为培养道德服务，但在他举行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描绘他执政时代的战功的作品。拿破仑三世也宣称艺术为道德服务，但当里昂的一位教授拉普拉德写了一首反对他的这种文艺主张的讽刺诗时，却被撤销了教授职务。普列汉诺夫由此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①普列汉诺夫仔细分析了拥护为艺术而艺术论的人各有不同情况：有的由于革命失败，而对革命斗争失去了信心，丧失了斗志；有的由于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末落而又找不到出路，认为除了绘画和写诗以外，什么也没有价值。普列汉诺夫指出：“**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②这种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引人深思的。当然还应当指出，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艺术家也可以用笔揭露和批判现实，这样才更全面。普列汉诺夫断定，为艺术而艺术论反映了一定社会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阶级要求。他说：“老实说，没有一种文学不是产生它的社会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表现。甚至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居于独占统治的时代，在看来艺术家对与社会利益有关的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时代，文学也仍然表现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趣味、观点和意图。上述理论在文学中取得优势的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在统治阶级中间，至少是在艺术家所面向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分子中间，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占着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只不过是社会的（或阶级的，或集团的）情绪、即意识的一种变形。”^③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34页。

② 同上书，第82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51页。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揭穿了当时很时兴的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末落的文艺流派——颓废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弊病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思想上发展到失去任何信仰，精神危机日益严重，对人类的未来悲观失望，从而在艺术上形成了所谓现代派。现代派艺术家标榜要摆脱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轻社会现实，重自我表现，轻客观实际，重主观想象，以暗示和联想为主，用直接诉之于感官的象征手法，甚至荒诞的手法来表现作者自我的主观感受。普列汉诺夫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批判现代主义思潮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深刻揭示了这些腐朽末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的拥护者的世界观，是唯我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指出，这些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末落，但又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把工人和人民群众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诬蔑为乌托邦。于是他们悲观厌世，在“自我”的世界中寻找安慰，陶醉于“自我”就是“唯一现实”，主张用“自我”去看待世界，只要艺术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这样就不免歪曲客观事物，把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否定加以理想化。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从客观现实出发，而只从“自我”出发，只会陷入虚无缥缈的境界，创作不出什么好的艺术作品来。他说得很中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旦到了把自己的‘我’看作‘唯一的现实’的地步，他在思想方面就必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①一个思想贫乏、精神空虚的人在其灵魂深处往往注入肮脏、低级、荒诞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这些人时，指出他们留着长发，穿着离奇古怪的服装。他还举出法国颓废派诗人齐奥菲勒·戈底叶（一八一——一八七二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75—876页。

年)为例,此人曾经表示,为了看到拉斐尔的圣母象真画或裸体美女,乐于放弃作为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

现代派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虽有所创新(如心理状态的描写、作品结构的变化),从而使艺术的表现能力有所增强,然而它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崇尚形式主义,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把一些艺术观点推向极端,因而破坏艺术创作规律,把艺术创作引向绝境。普列汉诺夫写道:“看来,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为艺术而艺术不会结出什么美好的果实来。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极端个人主义把艺术家的真正灵感的一切源泉全给堵塞住了。它使艺术家完全看不见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使艺术家无谓地纠缠于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验和荒诞到病态地步的臆造。这种纠缠最后带来的东西,不但与任何的美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显然荒谬的东西,只有借助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诡辩的歪典才能为之辩解。”^①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各种艺术流派,因为具有唯我主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来的根本不是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而是些非驴非马的荒诞离奇的东西。例如,立体主义者弗·雷泽在一次秋季画展上,展出了一幅立体主义的代表作《穿兰衣服的女人》,画面上出现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堆兰颜色的立体几何图形,使欣赏者们看了发笑。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幅画是“立体派的荒谬,色调显得可怕。”^②他说:“不管他画的是什么,但不是一幅很好的画。”^③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资产阶级各种腐朽反动的艺术流派的影响下,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艺术家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另一方面另一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愈来愈露骨地站在反对工人运动、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379页。

②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3卷,第284页。

③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387页。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被其反动的思想内容所损害。他指出：“新浪漫主义者从心底憎恨‘浑浑噩噩的人’，所以希望有一个运动。但他们所渴望的运动，是与现代的解放运动相对抗的保守运动。他们心理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他们中间甚至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写出他们能够在另一种对社会的同情和另一种思想方式之下写出的优秀作品来，其秘密也就在于此。”^① 普列汉诺夫为此举出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一八五九——一九五二年）的剧本《皇宫门前》，剧中歌颂了一个劝人们仇视和反抗无产阶级的年轻作家。法国剧作家弗朗沙·德·居莱尔（一八五四——一九二七年）的剧本《狮子的宴席》，把工人同企业主的斗争歪曲成妒嫉的豺狼与强大的狮子的斗争，“在这种思想里却找不到一点真理的影子。”^② 法国小说家保尔·布尔热（一八五二——一九三五年）的剧本《街垒》，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全体成员团结起来同无产阶级战斗。这些例子不仅说明了：“当谬误思想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时候，它就给这部作品带来内在的矛盾，因而必然使作品的美学价值受到损害。”^③ 而且更主要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内部矛盾愈是尖锐，那些仍然忠于资产阶级思想方式的艺术家要保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用众所周知的法国话来说，要隐居在象牙之塔里，也就愈加困难了。”^④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尖锐指出：“像德·居莱尔、布尔热和哈姆生之类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所捍卫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资产阶级借以获得大量五法郎金币的那种社会关系。”^⑤ 名曰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为巩固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857页。

③ 同上书，第852页。

④ 同上书，第858—859页。译文有修改。

⑤ 同上书，第858页。

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普列汉诺夫正从这个意义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看到：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金钱而艺术。”^①

通过这些分析，普列汉诺夫宣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这一阶级日益接近灭亡而逐渐失去它的内在价值。由统治阶级的体验所创造的艺术正在衰落下去。”^②

普列汉诺夫在描绘了资产阶级艺术一幅衰落悲惨的情景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将成长起来，取而代之，开出灿烂的花朵。资产阶级美学家胡说什么，“当大炮轰鸣的时候，诗神沉默不语”。普列汉诺夫响亮地回答说，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无裤党人把艺术领上了“上层阶级的艺术所不能走的道路：它成了全民的事业”^③。普列汉诺夫于一八八五年在为《劳动之歌》写的序言《对工人读者们说几句话》中，指出：“在你们身上，除了不满现状而外，还将增强对伟大的未来的信心，它现在正展现在一切文明国家工人阶级的面前，而这种信心也将在你们的诗歌里反映出来；它将使你们的歌曲变成宏亮的、雄劲的和自豪的，变成普遍自由、真正平等和无私博爱的胜利吼声。”^④普列汉诺夫就是以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满腔热忱去欣赏一九〇五年威尼斯第六届国际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反映工人和渔民生活的艺术作品的。他看到比利时雕刻家比斯白鲁克的《两个青铜少女——工厂女工像》，认为这两个女工“营养不良；贫血，穿得很苦；面容消瘦……这毫无疑问是件很好的、简直是杰出的作品。青铜在这两个女孩子身上出色地‘吟咏’出了一首描写贫苦和早

①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884页。

② 同上书，第851页。

③ 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译文》1956年12月号，第157页。

④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6卷，第282页。

年受难的诗篇。不过在这首诗里听不到一点点抗议的声音。”^①可见，他在赞赏之余还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从白雷克的石膏群像《渔民的妻子们》，“看得出她们是为在海上遇到风暴的丈夫胆战心惊。站在全体群像前面的一个女人紧紧握着自己的手，显出恐怖和驯顺的哀求的表情。”^②在梅尼叶的青铜浮雕《下班回来的矿工》里，“八个工人在一起，步履艰难，给非人的劳动累垮了。他们也低着头，低低的前额上没有一点思想的影子。”^③艾米尔·祖瓦尔的铜版画《白奴》里，一个工人走着，“不过单是他全身的姿态就说明了他的卑屈地位。”^④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仅仅逼真地描绘了工人们的苦难生活，激起人们的同情，是不够的，还应当刻画出工人们对于资本家的反抗精神，歌颂他们准备以革命斗争去迎接美好的未来。他写道：“我们的历史时期已经提出了一种‘第四等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引者注），这种思想具有着使‘白奴’翻身的惊人的特质，它能在他们的心里激起斗争的渴望，在他们的头脑里烧起觉悟的火光。”^⑤他高兴地指出：“黑夜即将过去，‘真正的白昼’正在开始到来……”^⑥。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无产阶级成为文艺的主人的时代也即将到来。

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艺术。他在评论德国伟大诗人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年）的作品时，强调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给予诗篇以最高尚的内容，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劳动和理性的思想的真正代表者。”^⑦普列汉诺夫把无产阶级看成艺术发展的主人。对无产

①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第141页。

②③④⑤⑥ 同上书，第142、143页。

⑦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6卷，第284页。

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问世的作品，普列汉诺夫及时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把高尔基的《马特威·柯席米亚金的一生》与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他认为如果不读高尔基的作品就不懂得俄国。他充分肯定了高尔基的文学作品的丰富的革命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他在一九〇六年赞扬高尔基的剧本《太阳之子》时，称高尔基为“人民心理的大师”^①。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当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叫嚷高尔基作为作家“消失了”的时候，他为《现代世界》写了赞扬高尔基的剧本《仇敌》的文章《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称高尔基是“多才多艺的无产者的艺术家。”^②

普列汉诺夫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他对世界和俄国的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他在一八八八年曾经设想与别人合写一部俄国文学史，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在他的艺术论文和其他政论文章中，却对俄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和艺术思想，作了评述。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这些作家的评价上，有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还研究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史，探讨了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波兰的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精辟地论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艺术。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世界闻名的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席勒、歌德、雨果、海涅等的创作，分别给予评述，并曾多次引用他们创作的艺术形象和运用的生动语言。普列汉诺夫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研究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52页。

②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集，第590页。

俄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当然，对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影响最大的还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指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最早把美学理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大师，他们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坚持了批判的现实主义原则。

普列汉诺夫非常赞赏别林斯基的“美学规约”，他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规约”的具体内容：“这一规约的第一条法规是，诗人应当表明而不是证明，应当用形象来思考而不是用三段论法来思考。这一法规是从下列的关于诗的定义中得出的，按照这条定义，诗是真理的直接直观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维。

假使诗的对象是真理，那末真实就是艺术创作的第一个条件，而美就在于真实和淳朴。诗人应当如实地描写生活，不粉饰它也不歪曲它。这是别林斯基的艺术规约的第二条法规。

他的第三条法规的意思是，作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思想应当是具体的思想，抓住整个的对象，而不是它的某一个方面。

由于第四条法规，艺术作品的形式应当符合它的思想，而思想应当符合形式。

最后，思想的统一应当符合形式的统一。这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各部分应当构成一个谐和的整体。假使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别林斯基美学规约的第五条法规，也是最后的基本法规。”^①普列汉诺夫叙述完这个能代表别林斯基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观点的“美学规约”之后，满意地指出：“我们很难提出什么实质上的东西来反对这一规约。”但他接着又强调说：“应当记住，别林斯基在制定自己的规约时，是站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上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83—584页。

的”^①。

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在晚年把文学与文艺批评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猛烈地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了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传统，早在一八五五年二十七岁时写的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就开始向唯心主义美学开战。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美学的一次有意思的、独特的尝试。”^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学位论文中，已指明，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主要标志，后来他又补充道：“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美学理论——美就是生活，就是客观存在，现实是第一性的；艺术、美感是对现实的“说明”与“判断”，是第二性的。所以文艺创作必须尊重现实，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文艺批评就应当阐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揭示艺术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指出：“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多么珍视生活的再现，主要把这当作解释生活和评判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的材料。”^③

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理论上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出，人们的美学概念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的。这证明他的看法极有远见。但要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巩固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他需要更详细地研究他所看出的美学和经济的因果联系，并且至少要通过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84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③ 同上书，第398页。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最主要阶段来探索这种联系。如果这样做，他就会完成美学理论方面最伟大的变革。”^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的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未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学活动中坚持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他指出：“但假如无论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坚决地建议文学艺术去如实地描写现有的东西，那末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信：文学艺术愈是如实地描写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就会愈加迅速地看出这些关系的不正常，他们也就能够愈加迅速地按照自己本性的要求，即更正确地说，按照‘启蒙运动者’的主观理性的指示，去改造这些关系。因此不足为奇，无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眼里，或是在别林斯基眼里，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人们说明文学艺术所描写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中的不正常的东西。”^②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是针对专制制度统治的黑暗俄国讲的，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也指出，文学批评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阐明文学艺术所歌颂的美好生活和理想。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继承和发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是普列汉诺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革命的进步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66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

日丹诺夫代表联共（布）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作家会议上作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文学艺术史上的杰出作用。他说：“在文学领域中，我们党从列宁和斯大林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伟大俄国革命民主派作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普列汉诺夫的巨大意义。”“苏联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继续，是我们的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创造的、普列汉诺夫所继承的，以及列宁和斯大林所科学地发挥和论证过的传统的继续。”^①

可是，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苏联文艺界长期以来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学艺术著作成就的评价是偏低的，甚至轻率地片面地对他任意指责。例如，五十年代出版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单位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就是如此。这部书没有全面考察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体系，随意摘来只言片语，就孤立地武断地加以责备。此书在谈到普列汉诺夫承认环境强烈影响艺术家的立场这一观点时，指责说：“普列汉诺夫倾向于把艺术家看作是他所处的环境的盲目产物。这样就很难断定，哪一个艺术家是正确的，哪一个艺术家是错误的，对世界作了不正确的描绘。因而关于客观标准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②事实并非如此，前面已经提到，普列汉诺夫曾经明确提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衡量一切艺术家的创作，这怎么说评论艺术家没有客观标准呢？我们前边引用过的普列汉诺夫

^① 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6—57、59页。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上册，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5页。

对于什么是艺术的看法，尽管有缺陷，但无原则性的错误，此书竟牵强附会地说：“这个定义会使人认为：形象不是现实的反映，而似乎是摹写的摹写。”^①这显然是作者自己加以引伸和发挥的看法，并不符合普列汉诺夫的原意。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到人们的审美活动时，曾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直观性问题。他说：“原始部落艺术的研究曾经表明：社会的人最初是从功利的观点来看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在他们对待某些事物和现象上才转到审美的观点。这使得有可能用新的观点来阐明艺术史。自然，并非任何有用的事物在社会的人看来都觉得是美的；但是毫无疑问，能使他们觉得美的，只能是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在他们同自然界和别的社会的人进行的生存斗争具有意义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对于社会的人，功利的观点是和审美的观点一致的。绝对不是！功利是凭借理性来认识的；美是凭借直觉能力来认识的。前者的领域是打算；后者的领域是本能。同时，——这一点必须记住——属于直觉能力的领域比理性的领域广阔得不知道多少；在享受他们觉得美的对象的时候，社会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认识清楚那同他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功利。”^②《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的作者们，认为普列汉诺夫“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这又是普列汉诺夫对康德美学的让步”^③。我国学术界至今也仍有人持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一个有使用价值的对象在人心目中又有审美价值之后，审美价值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在追求审美价值的时候，就不会事先考虑使用价值。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首先从直观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上册，第197页。

② 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见《译文》1956年12月号，第158页。译文有修改。

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上册，第199—200页。

形式上衡量美不美，然后再从内容上去思考其教育意义。如果不从直观形式上衡量事物的美，只着眼于功利，例如喜欢一幅画，仅仅是考虑把它卖掉可以赚钱或者把它作为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那是庸俗的功利观。普列汉诺夫所阐发的内容上的审美的功利性与形式上的审美的直观性的辩证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了审美活动的全过程。这种审美观突出了艺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性，在美学领域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功利观与庸俗的功利观的界限。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一观点，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作出的新发挥。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是在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阐明了艺术的功利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康德认为艺术同科学、道德、政治不同，它同人的利害无关，因此审美享受不带任何利害关系，否则就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普列汉诺夫并不完全同意康德的观点，他只是批判地吸取了康德美学中的审美直观性的合理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观，这是无可非议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产生的。

当然，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著作，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普列汉诺夫由于没有做到彻底坚持辩证法，因而在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中，有时出现反复，有时出现片面性。他划清了艺术与游戏的界限后，有时又把这两者混淆。他肯定了只有人才有审美能力和美的社会性之后，又认为在某一社会或某一社会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审美标准部分地起源于人种发展的生物学条件。他有时强调了阶级斗争对艺术的深刻影响，而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艺术的互相继承、互相影响有所忽视。讲到无产阶级艺术时，他忽视了党性的原则。对现实主义原则他虽然作了深刻的论述，但他对某些外国和俄国的著名作家的评价上，有时又离开了这些原则，作出了一些带有片面性的评价。

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所作出的新贡献，成了革命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事艺术创作、批判资产阶级艺术的锐利武器，推动了进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起了良好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也被后人加以利用，在艺术发展史上起了不好的影响。例如二十年代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为中心形成的拉普派以及庸俗社会学学者，口喊维护普列汉诺夫的正统文艺思想，实际上用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中的错误部分，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给苏联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当然这不能归罪于普列汉诺夫，但这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对此，我们也不应忽视。

尽管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著作有缺点和错误，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贡献，还是极其巨大的。普列汉诺夫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大师。

第十四章

社会沙文主义的首领

第一节

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谬论

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同德、奥、意“三国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对峙局面。到了一九一二年，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世界大战面临着一触即发之势。欧洲的德、英、俄等国工人和人民群众到处举行集会、游行和罢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普列汉诺夫在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盖德的公开信中（发表于十一月二日法国《社会主义者报》）曾强调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保卫和平。他说：“对于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而战争是和他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是的，我们赞成和平，……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只存在一种能够保卫和平的力量，这就是组织起来的世界无产阶级。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为这种奇怪的论调哭泣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只有阶级之间的

战争才能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①

在战争危机加重的情况下，第二国际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五百五十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三十六人，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

大会集中讨论了一个议题：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并一致通过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有名的巴塞尔宣言。

巴塞尔宣言分析了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危险局势，揭穿了德、奥、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指出了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宣言写道：“工人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王朝的野心或是外交密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②《宣言》号召各国社会党人为防止和反对战争、保卫和争取和平，“要在一切地方通过一切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意志！尽一切力量在议会中提出你们的一致抗议，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运动”^③。《宣言》强调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指出：“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同时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的每个支部都用无产阶级的抵抗对付本国政府，并发动舆论反对一切好战的狂妄企图。”^④《宣言》响亮地提出：“大会要求世界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威力来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抗衡。”^⑤《宣言》严肃警告各国资产阶级：“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想一想，普法战争引起了巴

① 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18页。

②⑤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82页。

③ 同上书，第183页。

④ 同上书，第179页。

黎公社的革命爆发，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①一旦各国政府这些战争“疯子”，胆敢燃起战火，那将“迫使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采取极端行动”，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

《巴塞尔宣言》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纲领，列宁高度评价了它。他说：“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②

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名，表示遵守和履行《宣言》。

第二国际巴塞尔大会闭幕以后，世界形势日趋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濒临爆发的边缘。各国社会党人都关注着世界时局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正在英国伦敦的时候，酝酿已久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七月二十八日爆发了，这一天奥国以其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死为借口对塞宣战，接着德国于八月一日对俄宣战、三日对法宣战。英国于八月四日对德宣战、十三日对奥宣战。于是英、法、俄等组成“协约国”集团，德、奥、意等组成“同盟国”集团，双方大打出手，先后卷入这次战争的包括全世界三十六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以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国际市场、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非正义性质的战争。后起的德国想把英国在近东、法国在北非、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地据为己有，还想占领被俄国控制的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奥匈帝国想迅速实现它对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首先占领塞尔维亚。英国则企图打败新对手德国，占领土耳其的美索不达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8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15页。

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想乘机收回早被并入德国版图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进而占领煤产地萨尔。俄国则想击溃德国，称霸巴尔干，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俄国，想借发动战争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转移革命人民的视线，镇压国内的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

怎样对待这次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大战？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者，特别是那些机会主义头子，公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巴塞尔宣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外叫嚷“保卫祖国”，积极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对内打着“国内和平”的旗号，诱使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放弃革命斗争。于是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相继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①，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机会主义的大背叛。列宁说：“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背叛巴塞尔宣言，树立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榜样**”^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八月四日在会议中投票赞成德国政府的军事预算，支持本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议会党团主席胡果·哈阿兹（一八六三——一九一八年）在议会党团赞成军事拨款的声明中，以反击沙皇俄国的侵略为借口，为他们

① 沙文是拿破仑一世手下的一个士兵，此人狂热鼓吹并积极支持拿破仑的侵略扩张计划，在战争中多次负伤，曾得到拿破仑的奖赏。从此，人们就把宣扬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人，称之为沙文主义者。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

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辩解。他振振有词地说：“敌人的入侵正在威胁着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①。法国社会党于八月四日在会议中投票拥护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预算，党的领导人茹尔·盖得出任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不管部长，党的另一个领导人马塞尔·桑巴（一八六二——一九二二年）就任公共工程部长。他们因害怕工人谴责他们重犯米勒兰主义的错误，便赶紧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人道报》上发表了《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宣言》声称，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法国的生存，因而党再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了”^②。英国工党主席阿·韩得逊（一八六三——一九三五年）就任教育部大臣和不管部部长，积极宣传、组织为战争征兵。作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的王德威尔得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当上了司法部长。意大利的比索拉蒂，瑞典的卡·亚·布兰亭（一八六〇——一九二五年），荷兰的彼·耶·特鲁尔斯特拉（一八六〇——一九三〇年），丹麦的斯陶宁格，美国的伯尔格等，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的领导人，也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在大战爆发后，也很快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他自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长期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发展结果。那末，他为什么赤裸裸地同英、法等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不同德、奥、意等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为什么公开为英、法、俄等“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不为德、奥、意等“同盟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辩护呢？这主要因为他是俄国人，表面上他是捍卫俄国民族利益，实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91页。

② 同上书，第206—207页。

际上他是支持沙皇政府对外争霸。此外，还与下列情况有关。

大战爆发时，他正在伦敦，后于八月初来到巴黎，一直住到月底。他从报纸上看到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时制造的暴行，听见有关德国军队使用新式武器的传闻，还知道了德国议会党团主席胡果·哈阿兹关于赞成政府军事预算的消息。他亲眼看见一些法国居民笼罩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居民尖锐指责德国政府的侵略。他在同已滚入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决心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甚至盖得和桑巴已担当起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普列汉诺夫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形而上学地对待大战爆发时的所见所闻，相信过去同他交往甚密的盖得等人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便得出了德、奥、意等“同盟国”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而英、法、俄等“协约国”坚持的是防御的正义战争的荒谬结论。后来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谈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时，正确指出：“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①普列汉诺夫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还会见过德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克斯·夸克，这次短暂的会谈使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异常反感。因为夸克曾向他宣扬：德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进展，并且抱怨比利时人对德国军队的欢迎不够热烈、隆重。普列汉诺夫听到这里简直义愤填膺，据他女儿回忆，他父亲曾反驳说：“你们难道还希望人家用啤酒和椒盐卷饼来欢迎吗？”^②

普列汉诺夫于八月底回到瑞士，十月初在日内瓦发表了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战争辩解的演说，这是他在公开场合首次宣传社会沙文主义观点。

接着在十月十一日，他应邀出席了由侨居洛桑的孟什维克小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 见巴伦前引书，第326页。

组举办的专题报告会，作了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谬论的专题讲演，报告的题目是：《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

列宁那时正住在瑞士的伯尔尼，当十月十日从洛桑来电告知：普列汉诺夫将于十一日在那里发表讲演时，列宁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阐述革命者对待这次战争应持的态度，便坐下来写发言稿。在十月十一日普列汉诺夫作报告的那天，列宁和侨居洛桑、伯尔尼、鲍日等地的许多布尔什维克，按时来到了会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专程来听普列汉诺夫的报告。

从普列汉诺夫开始报告起，列宁就聚精会神地倾听，仔细分析他的论点和论据。

普列汉诺夫在报告的前半部分，严厉地谴责了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行径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机会主义立场。参加报告会的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赞成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看法，并且向他鼓掌。

普列汉诺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谴责，虽然是对的，但他批判的出发点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是为了给法国社会党人的社会沙文主义辩解。在他报告的后半部分，彻底暴露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他认为，无论从比利时方面来看，还是从法国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受攻击的国家，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它们的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

列宁听完了普列汉诺夫的报告的后半部分，对于他公然宣传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感到义愤填膺。在普列汉诺夫作完报告之后，唯有列宁一个人报名登记，要求讲话。他端着一杯啤酒走到桌子跟前，气得脸色发白，但讲起话来却很镇静。他认为，现在爆发的战争绝不是由于某种攻击而偶然发生的，而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切条件造成的。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了

社会党人对当前战争应持的态度，社会党人只有同本国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算履行自己的义务。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不应当忘记马克思提出的“工人无祖国”这句名言。列宁严厉批判了法国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①。

列宁的讲话虽然只有十分钟，但却击中了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观点的要害。普列汉诺夫在列宁讲话后，又硬着头皮上台狡辩，在会场里占绝大多数的孟什维克发疯似地给他鼓掌。

在普列汉诺夫在洛桑作报告的当天，即十月十一日，列宁就从洛桑给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维·阿·卡尔宾斯基（一八八〇——一九六五年）写信说：“亲爱的朋友！今天我在这里普列汉诺夫的报告会上发言反对他的沙文主义。我准备星期二在这里作报告，星期三在日内瓦作报告（欧洲大战和欧洲的社会主义）。”^②后来，列宁于十月十四日在洛桑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十月十五日在日内瓦作了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列宁在这些报告中既批驳了普列汉诺夫在这两个城市散布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这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观点。列宁于十月十七日在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一八八五——一九三七年）的信中，明确指出：“普列汉诺夫成了亲法的沙文主义者。”^③

普列汉诺夫十月十一日在洛桑作完宣传社会沙文主义理论的报告之后，来到意大利的圣勒摩。他收到不同国家的一些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来信，表示欢迎他在洛桑作的报告，并请他进一步阐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8—290页；克鲁普斯卡亚：《列宁回忆录》，第2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2页。

③ 同上书，第145页。

述对战争的态度。普列汉诺夫以在洛桑作的报告为基础，经过修改和补充，于十月二十七日以致保加利亚社会党人扎哈里·彼得罗夫的公开信形式，写成了第一篇宣传社会沙文主义理论的文章《论战争》，同年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以后普列汉诺夫又陆续写了一些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文章，并把这些文章收入到小册子《论战争》中。这本小册子经过增补又先后在彼得格勒出版过两种版本。一种版本包括他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和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写的两封公开信；另一种版本包括他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写的《两条路线》等九篇文章。他于一九一五年八月间，在国家杜马召开之前，给孟什维克议员布里扬诺夫（生于一八八〇年）写公开信，鼓动后者投票赞成沙皇政府的军事拨款。他在信中说：“投票反对拨款是叛变（就对人民来说），而投弃权票则是懦弱；投赞成票吧！”^①列宁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谈到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论战争》时指出：“这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和谎话的大杂烩，把沙皇政府进行的掠夺的和极端反动的战争说成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等等！”^②普列汉诺夫通过他先后出版的两本《论战争》的同名小册子，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这两本同名小册子，是他社会沙文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担任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号召报》的撰稿人和编辑，这是一个狂热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报纸。当时已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阿·伊·柳比莫夫（一八七九——一九一九年）、尼·伊·约尔丹斯基（一八七六——一九二八年）成了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报纸编辑部中的亲密伙伴。

① 普列汉诺夫：《论战争》，第67页。以下简称：《论战争》。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4页。

一个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叛徒的格·阿列克辛斯基以欺骗的手法把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沙皇政府国防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一八六六——一九一八年）办的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报纸《俄罗斯意志报》上。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理论上为“协约国”进行的战争辩护，而且在行动上为“协约国”搜罗炮灰效劳。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在巴黎的一些俄国侨民受沙文主义思潮侵袭，曾经组成俄国志愿兵小组，并且联合发表宣言，主张以提供志愿兵与法国军队并肩作战，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方法。当时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的大多数人都斥责这种愚蠢的企图。且不说这种行动完全是出于沙文主义目的，毫无社会主义内容；即便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是输出革命，强加于人，必然伤害别国的民族感情遭到别国人民的反对。可是竟有普列汉诺夫独自一人拥护这个方案。他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竭力煽动住在国外的俄国侨民踊跃参军，誓把战争进行到底。据一位目击者说，普列汉诺夫甚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如果不是年纪大了，他自己会亲自上前线保卫俄国^①。普列汉诺夫煽动侨民作为志愿兵上前线为帝国主义卖命，这在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践中，还是一个“创造”。列宁谈到这件事时指出：“以提供志愿兵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企图……，只有普列汉诺夫一人拥护。”^②

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③的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同立宪民主党人、取消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一起组

①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发表在《文艺与社会生活》上的回忆录曾提到此事，见巴伦前引书，第3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5页。

成了俄国社会沙文主义的“杂牌军”。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是普列汉诺夫在“劳动解放社”时的老同事、后成为取消分子，因此当时普列汉诺夫曾同他们断绝了关系，现在他们都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因其机会主义立场相同而再度和好，恢复了中断数年的关系。普列汉诺夫、捷依奇和查苏利奇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出版的《统一报》上，发表了联合宣言，重弹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的陈词滥调。宣言写道：“……每个民族都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德国的威廉和奥地利的卡尔是绝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和他们作战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和别人的自由。俄国不能背叛自己的盟国。这样作是可耻的……”^①。历史嘲弄人，昔日“劳动解放社”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战友，今日成了推行社会沙文主义为沙皇政府效劳的伙伴。

在俄国的各色各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最完整最系统，因此列宁在说到“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时，强调“以普列汉诺夫为首”^②。又因为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普列汉诺夫最露骨最全面地反映了各协约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所以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四个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③。列宁于一九一七年把他叫做“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先生”^④，这个称号全面地概括了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大战时期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 and 实践活动。

列宁指出：“如果拿考茨基、盖得、普列汉诺夫（‘甚至’这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4卷，第1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7页。

③ 同上书，第4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82页。

样的人！）作借口，把问题归结为个别人物的问题，那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可笑的。”^① 社会沙文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思潮。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已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他们互相传授“神机妙法”，彼此吹捧“丰功伟绩”，合伙包庇罪恶，共同充当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普列汉诺夫亲自出马为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盖得、桑巴和王德威尔得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则鼓吹：象“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当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已经成为欧洲和俄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如果任其泛滥，就会造成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从而葬送大好的革命形势，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所以，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同以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引向康庄大道。世界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列宁担负起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重任。

当社会沙文主义在欧洲各国党刚出现的时候，列宁就注意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写成了文章《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后来，在国内党组织同意的条件下，列宁于十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指出了第一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批判了欧洲各国社会党机会主义头目的背叛行为，为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③的唯一正确的革命方针。

① 《列宁全集》21卷，第421—422页。

② 考茨基：《又一次我们的幻想》，1915年《新时代》周刊。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4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两个多月，在普列汉诺夫于瑞士洛桑作社会沙文主义报告刚刚二十天之际，即一九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列宁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就明确表示，“现在我们的事就是同（用保卫‘祖国’之类的谰言）打掩护的沙文主义，特别是同普列汉诺夫、盖得、考茨基（这伙人当中最卑鄙的伪善者！）及其一伙的‘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进行无情的战斗”^①。后来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再次强调指出：“如果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不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者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②列宁除了发表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讲演，当面驳斥普列汉诺夫的谬论以外，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了《以后怎么办？》、《俄国的休特古姆》、《社会主义与战争》、《论革命的两条路线》等许多著作，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谬论，撕下了普列汉诺夫这位第二国际“理论权威”的漂亮外衣，向全世界人民揭穿了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

除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以外，欧洲各国社会党中的一些左派领导人也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待这次战争，以实际行动回击社会沙文主义思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等左派革命活动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天起，就按巴塞尔宣言原则，进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革命宣传。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卡尔·李卜克内西独自一人投票反对德国政府第二次军事拨款，博得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中的革命派的热烈赞扬。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欧美其他党内的革命左派也都坚持

^① 《列宁全集》35卷，第1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8页。

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主义原则。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原来第二国际中的左、中、右三派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出三种态度，分别采取三种方针。而且这三派的队伍局部也发生了变化。右派以普列汉诺夫、盖德等人为代表，公开鼓吹社会沙文主义，主张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坚决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中派以考茨基等人为代表，是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方面赞成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在表决军事预算时弃权，口头上标榜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上的让步。左派以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坚决反对这次战争，投票反对军事预算，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表面上是三派，实际上是两派，即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国际主义派。列宁曾经明确指出：“现在有两个国际：（一）普列汉诺夫派的国际，即普列汉诺夫、盖得、谢德曼、桑巴、托马、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比索拉蒂等等转到本国政府方面的社会主义叛徒的国际。（二）革命国际派的国际，他们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到处进行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①普列汉诺夫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头面人物，成了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什么列宁得出了这个结论呢？要想弄清列宁这个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就必须认真剖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

第二节

为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列宁认真剖析了当时在各国社会党内存在着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沙文主义谬论，把它们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普列汉诺夫、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页。

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露骨的、无耻的、因而也是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另一个是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劳动派’，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其他‘独立工党’的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① 普列汉诺夫式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一个明显，一个隐蔽；一个笨拙，一个精巧，相互配合，暗送秋波，一起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麻痹革命人民斗志。他们虽然色彩不同，但本质是一个：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说得好：“普列汉诺夫笨拙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较为精细的、迁就调和而又花言巧语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②

普列汉诺夫通过三本《论战争》的小册子，所宣扬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沙皇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另一方面反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

普列汉诺夫为沙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一个理论就是臭名远扬的“祸首论”。他说，为了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发动战争的祸首予以惩罚；对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去解决。那末祸首是谁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战前就在自己的刊物上承认了德国和奥地利是祸首。他抓住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说的一句话：“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都一致地激烈谴责战争和承认奥地利是战争的祸首”^③，兴高采烈地说：“谢天谢地幸而没有这种远见的人们，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8页。

^② 同上书，第626页。

^③ 伯恩施坦：《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1915年德文版，第15页。

——全世界社会党人，——从伯恩斯坦的证明中可以很好地知道祸首在哪里。”^①普列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的荒谬的理论辩护，竟求助于他当年曾经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头子，十分可卑可笑！

“祸首论”绝不是普列汉诺夫的新创造，而是重复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陈词滥调，但经过这位“理论权威”的转播就变得甜蜜起来，更能迷惑群众，因此倍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赞扬。

普列汉诺夫这一谬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性质的基本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手段”（即暴力）的“继续”，不分析各帝国主义列强几十年的经济史和外交史，运用永恒的道德、法权等范畴，抽象地唯心主义地考察战争，掩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其实，这场战争是在很久以前就由各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好了的，它是帝国主义战前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政策继续。列宁说得好，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②应该说俄、德、英是一条道路上的三个大强盗，都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沙皇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不是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是“神圣的”、“卫国的”战争。沙皇政府参战的罪恶的目的在于：企图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在欧洲打败德国，夺得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区和瓜分土耳其，占据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同时图谋夺取波斯和中国的蒙古地区。沙皇政府还妄图借助于战争转移人民视线，镇压国内自一九一二年连纳金矿工人罢工以来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以维持面临崩溃的统治。可见，沙皇政府的参战，是

① 《论战争》，第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0页。

经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精心策划的，是为了推行这种战前的掠夺、奴役、压迫的政策，绝不是为了什么惩办“祸首”。“沙皇政府比其他各国政府更明显得无可比拟地表现了战争的反动性、掠夺性和奴役性。”^①因此“祸首论”只不过是普列汉诺夫给沙皇制作的遮羞布。列宁嘲笑道：“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②这种谬论实际上为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粉饰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制造了口实。他们可以把别的帝国主义国家称之为“祸首”，把自己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正义战争。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菲力蒲·谢德曼（一八六五——一九三九年）就一再叫嚷：“目前这场战争的主要罪过应由俄国来负”^③。无怪乎有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国文学家读了普列汉诺夫鼓吹“祸首论”的小册子《论战争》以后，也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为德帝国主义充当了炮灰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路·费朗克是一丘之貉^④。

普列汉诺夫为沙皇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二个谬论是：“防御战争论”。他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一八七〇年德国的民族战争的言论，作为替沙皇政府辩解的依据。他说什么，“以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的领袖们”，“彻底地划清了防御战和进攻战两者之间的界线”，“正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作出明白的判断”，为什么“一九一四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却作不出来呢？”^⑤显然，他言下之意，就是认定德国、奥国是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2页。

② 同上书，第626页。

③ 参见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5页。

④ 参见《论战争》，第39页。

⑤ 《论战争》，第12页。

侵略“好战”的“进攻者”，沙皇进行的却是“自卫”、“防御”的“人民”战争。

首先，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谬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一基本原理。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这种“防御战争”的谬论，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议论则不同：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①根据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进步政策的继续，这是正义的战争；另一类是反动政策的继续，则是非正义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玩弄“防御战”的概念游戏，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是从战争是政策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原理出发来分析普法战争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当拿破仑第三投降以前，因为他同沙皇共同支持德国封建割据，阻碍德国的统一，所以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来看，具有进步意义；但当拿破仑第三投降以后，德国转而要兼并法国的亚尔萨斯与洛林时，德国方面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就转化为侵略战争。普列汉诺夫却无视战争的阶级内容，单纯从进攻或防御来确定战争的性质。他硬把作战的方式同阶级的概念扯在一起，说“剥削者要压迫，所以要进攻；被剥削者力求使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要防御”。“怎么会区别不出自卫和进攻呢？”^②列宁尖锐地揭穿了普列汉诺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指出：“普列汉诺夫先生嘲笑马克思主义，一股劲地抓住谁对谁宣战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先生忘记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战争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一定政府所实行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② 《论战争》，第36页。

政策的继续。”^①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不管“进攻”，“还是防御”，都是正义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即使一方采取“防御”方式，也丝毫不能改变其战争的反动性质。如果按普列汉诺夫这种谬论行事，被压迫者就不必向压迫者进攻，不必打破奴役的枷锁，从而永远得不到解放。列宁说：“让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扮演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的奴才或小丑角色的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先生们拼命去证明‘德国的罪过’和俄国进行战争的‘防御性质’吧！觉悟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听这些小丑的话的。”^②

其次，普列汉诺夫不顾时代的变化，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从而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言论的原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是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战争，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没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因此还不可能象巴塞尔宣言那样制定出革命策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把考虑问题的重点放在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获得战争胜利，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害处较少或较为有益等问题上。所以列宁认为，把反对封建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的资产阶级政策拿来对比，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荒谬。针对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荒谬的历史类比，列宁愤怒地写道：“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恰恰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垂死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③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77页。

列宁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普列汉诺夫为沙皇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护的反动实质。他说：“无耻地大肆造谣，掩饰尼古拉二世的掠夺政策（李沃夫之流并没有改变这种政策，他们甚至承认了沙皇签订的条约！）——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先生的全部智慧。”^①

第三节

抵制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关于争取 和平与加强国际主义团结的倡议

战争给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伤亡、贫困、饥饿、流离失所等灾难，战争开初几个月的盲目的“爱国”热情消失了，群众中反战和渴求和平的情绪越来越增长，许多地方出现了反战运动。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战争。好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都想恢复国际联系，为推进反战运动和和平运动出力。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美国社会党就建议召开包括所有国家社会党人的国际会议，但是由于各国党的分歧太大，尤其是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社会党人的对立情绪，会议根本无法召开。到一九一五年上半年，终于召开了五个局部性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即一月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二月间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三月间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反战代表会议，四月间在维也纳召开的德、奥、匈等同盟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四月间在伯尔尼还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其中妇女代表会议和青年代表会议虽然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关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路线，但还是通过了开展反战鼓动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妇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92页。

女和青年加强国际团结，呼吁各交战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也是劝说交战国双方实现和平，消弭战祸。而协约国和同盟国社会党人的代表会议则仍然各执一端，都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互相指责，互不退让，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普列汉诺夫顽固地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他支持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多数人采取的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方针，反对布尔什维克代表马·马·李维诺夫（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在会上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其中谴责了右派社会党人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的背叛行为，并要求社会党人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决裂。

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的反战运动和要求团结的强大洪流势不可挡。由站在反战立场的意大利社会党和瑞士社会党发起，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在伯尔尼郊区的齐美尔瓦尔得村终于召开了战时第一次有较为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的有法、俄、德、意、波、罗、保、瑞典、瑞士等十一国社会党的三十八名代表（英、美代表未取得护照，未能到会）。代表包括了协约国、同盟国和中立国三方，但是其中左派只有八名，中派和半中派占了多数。俄国代表团中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三部分人。会议主要议程是经过讨论通过关于反战与和平的宣言，选举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会上，左派坚持自己的观点，同中派展开了斗争。左派提出了由列宁起草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其中明确指出：这次战争就交战国双方来看，都是“奴隶主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 “工人阶级如果不坚决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法国、德国、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工联主义者，俄国的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曙光》等等），如果不坚决反对

把马克思主义阵地奉送给沙文主义者的所谓‘中派’，他们就不能达到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① 决议草案认为：只有用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政府才能迅速取得“没有民族压迫的相当持久的民主的和平”，“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开辟一条通向和平和民族自由的道路。”^② 社会党人的责任在于努力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③ 可是会议以十九票对十二票否决了左派的决议草案。

由于左派努力争取，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包含了一些左派观点，谴责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肯定了过去第二国际领导人在反对战争方面的失败，重申拥护战前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总方针，要求交战国双方立即停战并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但是宣言拒绝了变帝国主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则含糊其词。会议的多数代表虽然不同意建立新的“国际”，但是都承认旧的第二国际国际局已经无力维持各国党之间的联系，都表示要加强社会党人的国际团结，因此选出了由每个国家社会党的一至三名代表组成的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要重新举起国际主义的旗帜，为重新团结国际无产阶级而努力。

以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为起点，由这次国际会议所建立的国际组织通称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由于中派势力占优势，尽管它通过的宣言还极不彻底，但毕竟“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④

普列汉诺夫对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恼羞成怒，他从根本上反对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与同盟国的社会党人坐在一起开会。他大骂齐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5页。

②③ 同上书，第326页。

④ 同上书，第366页。

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参加者为“假国际主义者”，而自命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认为：只有同德国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才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才算是真正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只有把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行到底，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他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写的《国际主义者，只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一文中曾驳斥了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对于国际主义的看法。刊登在比利时《伯尔尼哨兵报》上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报告指出：“实践与理论相反，它证明不能同时兼做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这个原理是和第二国际的基础针锋相对的。”^①普列汉诺夫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引述上面这一段话之后立即加以批驳。在他看来，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兼做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说：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所提出的“这个所谓新论据，其实和从前的国际主义基本原理毫不相干。我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第一国际伟大的领导者马克思力求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第二国际严格地遵循了他的榜样。……假国际主义者先生们背叛了这一切。但是既然他们背叛了这一切，从而也背叛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遗训。”^②如前所述，普列汉诺夫所谓马克思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云云，完全是抹煞了战争的阶级内容和时代背景，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垂死时代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混为一谈。不论在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时期，多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都是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王朝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真正背叛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遗训的，真正充当假国际主义的，只能是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为了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号召各国无产者自相残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① 转引自《论战争》第93—94页。

② 《论战争》，第94页。

不顾普列汉诺夫之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伯尔尼郊区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参加者有九个国家二十五个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四十三名代表，俄国代表团仍然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三部分人。会上左派分子虽然增加到十二人，但是中派和半中派分子仍占多数。会议主要议程是争取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议会活动、群众斗争的态度等问题。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起草了向会议提出的提案。其中除了重申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观点之外，着重揭露并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这两种和平主义都是利用群众渴求和平的情绪，引诱群众离开革命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推翻各交战‘强’国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那就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和平，而只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较长时期或者较短时期的休战，这种和平将会加强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弱小民族的奴役，增加准备新战争的燃料等等。”^①列宁联合各国左派提出了以布尔什维克的提案为基础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会议虽然没有全部采纳左派的草案，但是在通过的决议中还是申斥了社会和平主义，表明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批判了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的机会主义立场，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努力争取立即停战，争取“没有兼并的和平”。尽管会议仍然回避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和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但是总的看来还是比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前进了一步。

普列汉诺夫仍然坚持反对召开新的社会党人的国际会议，更反对昆塔尔会议。他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九日给原俄国社会民主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91页。

工党党中央国外局委员、极端护国派分子阿·伊·柳比莫夫（一八七九——一九一九年）的信^①中就表示反对第二国际国际局召开会议。他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十六日发表在《号召报》第四十三号和第五十六号的文章中还极力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关于实现和平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决议。^②他认为争取没有兼并、没有赔偿的和平的迅速到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根本做不到。在他看来，协约国并没有要兼并他国的意图和迹象，所以无须由协约国做出不兼并他国的保证。如果“受害”国（即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确实渴求和平，那他们就应当全力以赴地支持驱逐侵略者。至于同盟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当拿出行动而不是发表诺言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他当时是竭力要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支持本国政府把“保卫祖国”的战争进行到底，所以他坚决反对和平倡议；认为对交战国双方施加压力毫无意义，而且会瓦解协约国的斗志；他需要的只是同盟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他们本国的政府。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写的《比利时的呻吟》一文中对德国政府大规模强制比利时人迁出的措施表示愤慨，而对于没有单方面谴责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则表示不满。他讽刺“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说“他们都习惯于编撰种种满纸尽是最善良的意图的决议。他们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战争，他们也同样坚决地要求和平，——并且是一种空前美妙的和平，这是不割地的和平，这是不要军事赔偿的和平，这是不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委屈而大家都只会感到满意的和平。既然如此，可以希望，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善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社会

① 此信尚未发表，保存在他的三女巴托-普列汉诺娃处，参见巴伦前引书，第333页。

② 参见上书，第334页。

民主党人，都会响应王德威尔得同志的号召（指前第二国际国际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道报》上发表的呼吁全世界社会党人谴责德国政府强制比利时人迁出的号召——引者注），并且作出决议，在决议中他们会对比利时人说：“祝君万事如意”，就象某些文雅君子结束自己的书信时所说的那样。悲哀也就在这里。人们希望自己的收信人万事如意，这种客套在绝大多数场合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情形，齐美尔瓦尔德派和昆塔尔派在自己的决议中所表示的善良愿望，只不过证明他们有练习写字的热情（如谢德林所形容的一样），而绝不保证这些人能够哪怕稍微使得公正的和平早日到来。”^①更有甚者，普列汉诺夫认为：“齐美尔瓦尔得派和昆塔尔派的言论不仅无助于公正的和平早日到来，反而会推迟它的到来。”^②他举例说，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在议会中高呼“打倒战争！”这样就会瓦解“法国抗战的精神力量”，并“准备在领土方面和其他方面作一些严重的让步”，其结果就会“大大增加”德国“在领土兼并方面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要求条件”。^③普列汉诺夫不仅反对“打倒战争”，而且也反对任何和平谈判的倡议。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他女儿的信中写道：“关于德国提出的建议（指和平谈判的建议——引者注）就同威尔逊（当时美国总统——引者注）和瑞士联邦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一样，我们决不能同践踏我们领土的敌人进行谈判。”^④在他看来，和平谈判决不能达到和平，要实现和平就只有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坚决支持本国政

① 《论战争》，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15—116页。

③ 同上书，第116页。

④ 见巴托-普列汉诺娃保存的未发表信件，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34页。

府把战争进行到底，而同盟国的社会党人则要坚决起来反对本国政府。既然同盟国的社会党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坚决反对协约国社会党人同同盟国社会党人坐在一起开会，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因为他们是根本联合不起来的。沙文主义迷住了普列汉诺夫的心窍！使他只看到德国等同盟国的沙文主义，而看不到俄国等协约国的沙文主义，以致使他不仅在战争问题上而且在和平和国际团结问题上也犯了颠倒是非的错误，并且继续玩弄诡辩的手法。

第四节

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普列汉诺夫不仅抵制任何和平倡议，而且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日臻成熟。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随着大战的爆发，进入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的行动阶段。反对“国内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罢工与示威的浪潮日益高涨，席卷欧洲各国。德国的优秀的国际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工人和士兵调转枪口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俄国第二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积极展开了反战革命宣传。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适应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竭力主张国内和平，拼命扑灭正在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普列汉诺夫作为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也不例外，他反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谬论很多，主要包括下列五点：

第一，他宣扬战争问题上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①，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974年版，第18页。

诱骗俄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沙皇战争的胜利上面。普列汉诺夫一本正经地宣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认为经济归根到底始终比政治强大有力”，只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才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当德国向俄国宣战的时候”，“俄国的失败会大大地阻碍它的经济发展”，“从而会大大地推迟俄国政治解放时刻的到来。”^①普列汉诺夫非常推崇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固有的政策”^②，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政策”^③。他还说，帝国主义愈来愈表现出“生命力”、“适应性”，仿佛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这样一来，在普列汉诺夫的眼中似乎只要发展生产力，用不着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就会自然垮台，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自然胜利。为此，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必须积极支持沙皇战争取得胜利。

这种论调根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从奴隶制生产方式进到封建生产方式，从封建生产方式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都不是自发长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才实现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产生，因为它是与以前一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根本不同的，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创建。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谬论，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也违背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人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战争

① 《论战争》，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所造成的危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起来推翻反动透顶的沙皇专制制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所以普列汉诺夫谈论什么沙皇取得战争的胜利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等等，就是有意抹煞这种事实。而且这种说法也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人民群众相信这种谎言，帮助沙皇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会使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使其反动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化，结果只能给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造新障碍，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普列汉诺夫散布这种谬论，表明他不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先生就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分析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即现代高度发达的、成熟的和衰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体系”^①。这种谬论还暴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诡辩论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列宁说：“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权威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②

第二，普列汉诺夫以机械的历史对比的方法，为俄国革命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不要去争领导权，而把领导权交给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上升的路线”。普列汉诺夫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在《号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条路线》的文章，侈谈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煞有介事地援引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关于法国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论述作为他立论的根据：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的，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的。在前一场合，政权由温和派的政党逐渐转归左的政党：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在后一种场合恰巧相反：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拿破仑第三。普列汉诺夫说：如果俄国革命者希望俄国革命“沿着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社会运动曾经沿着的”“上升的路线行进”，就必须使“最初政权落在我们的‘立宪派’手里，即落在左派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手里。然后它为劳动派所得。最后，只有经过了这些预备阶段，只有在运动采取最广大的规模以后，政权才由最极端的左派（即社会党人——引者注）掌握。”他威胁革命者说，如果“竭力妨碍立宪派”“从旧制度的保卫者手上夺取政权”，“破坏立宪派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信誉”，就会使革命“朝着下降的路线前进”^①。

普列汉诺夫这种论调是一种拙劣的诡辩。列宁说：“普列汉诺夫先生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对比。”^②他以机械的历史对比代替对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具体阶级分析。他重犯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时犯过的机械历史对比的错误。所以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五年为俄国革命制定的所谓“上升的路线”，只不过是他在为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制定的机会主义策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新翻版。

① 《论战争》，第61—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5页。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处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迫切需要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还是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还愿意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盟。法国的无产阶级当时大部分还是手工业工人，人数少、力量弱，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并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去推翻主要的敌人。所以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尽管由资产阶级领导，但以工农为骨干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浪潮，能不断冲垮保守妥协的派别，把革命事业一步步推向了顶峰，取得了比较彻底的胜利。列宁指出：“对于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普列汉诺夫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闭口不谈，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伪造为‘司徒卢威的模样’。”^①

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虽然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这时已进入资本主义没落的帝国主义时代，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相当尖锐。早已形成的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拥有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这两个强大的同盟军，它是俄国革命性最强、力量最大的阶级。而自由资产阶级，它既需要专制制度保护，又害怕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已成为软弱反动的阶级，已不是革命的动力，更不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因此，俄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由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不但不会象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那样沿着上升路线前进，而且一定会以自由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的妥协而告终。所以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不是什么上升的路线，而是引导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路线。列宁愤怒地说：“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这个‘理论’论断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典型。”^②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4—395页。

② 同上书，第394页。

第三，普列汉诺夫拼命反对列宁为各国人民制定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列宁提出的这两个革命口号，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自身解放的康庄大道。普列汉诺夫却咒骂列宁提出的这个方针是“革命的高调”，是“冒险”，是“可笑的空想”，谁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谁就是走“失败主义”的道路。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同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沙文主义头子唱的是一个腔调。德国社会沙文主义首领爱德华·大卫（一八六三——一九三〇年）叫嚷：“力求把世界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就是胆大妄为”^①。考茨基则把宣传与组织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国内战争，诬蔑为害人的“空想”^②。实际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两个革命口号，是列宁遵循巴塞尔宣言、科学分析当时形势、总结巴黎公社和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两个伟大口号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深刻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统一。所以它绝不是“空想”，更不是什么“失败主义”。后一个口号是实现前一个口号的前提，两个口号有机地结成为一条完整的路线。这条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并不是单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让外国来奴役本国人民，而是要利用战争造成的革命危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要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话，也应该说是革命的失败主义，即是推动人民群众利用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还故意歪曲列宁制定的这条革命路线，玩弄了割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0—111、135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74页。

裂两个口号并孤立地考查后一个口号的恶劣手法。普列汉诺夫从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这两个口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反而得出俄国无产阶级如果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必然会使本国领土被德国占领的奇怪结论。实际上，这两个口号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准则，它并不是为了帮助一个帝国主义打败另一个帝国主义，而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分别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如果各国无产阶级做到了这些，那时，这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野心而驱使各国人民相互残杀的罪恶战争，就必将以社会主义在各国的胜利而结束。没有必要的流血牺牲，工农群众就不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政权，开创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何况为革命流血牺牲，远不能与为帝国主义战争卖命造成的重大牺牲同日而语。列宁揭穿了普列汉诺夫等社会沙文主义者只关心各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胜败，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命运的反动本质。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等“资产阶级的帮凶”反对交战国士兵在战壕中联欢的主张时，指出：“机会主义者的奴仆考茨基附合盖得、普列汉诺夫之流说：‘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是的，如果忘掉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忘掉社会主义，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是做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死于奴隶主的战争中呢，还是冒生命的危险，举行奴隶之间的‘联欢’以推翻奴隶制呢？”“事实上这才是‘实际’问题。”^①

普列汉诺夫为了维护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还极力反对人民的革命行动，并为沙皇政府出谋划策。他在一九一七年初还给美国一个报刊写文章，说工人在战争中举行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将是犯罪，同时他也反对沙皇政府逮捕军事工业委员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

会^①的成员。他认为这些人都是非常忠实地促进军事工业的工人联合并有利于提高军事工业生产的，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反而会使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激化^②。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他给法国社会党人盖德写信，表明他担心沙皇政府逮捕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的举动将会引起严重麻烦，他还要求盖德敦促法国政府出面反对其俄国盟友的这种蠢举^③。普列汉诺夫被沙文主义迷了心窍，以致由当初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勇士堕落为诚心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谋士，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四，普列汉诺夫恶毒攻击一九一六年爱尔兰人民的起义，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土耳其、伊朗、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直接冲击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是积极支持这些民族解放战争呢，还是极力反对这些民族解放战争呢？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水岭。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这股革命洪流面前，普列汉诺夫对处于沙皇的盟国——大英帝国压迫下的爱尔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不仅装聋作哑，而且指责一九一六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血腥镇压而失败的爱尔兰人民“盲目无知”，“曾经同德国缔结了同盟”，具有“‘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观点”和“狭小的政治眼界”等等^④。对待这次起

①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策划建立的一个机构，参加者除工业和银行资本家以及上层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外，还有工人代表，旨在鼓动工人群众千方百计提高军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为沙皇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效劳。它成立于1915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废除。

② 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英文版第227页。

③ 见普列汉诺夫女儿巴托-普列汉诺娃拥有的未发表书信。见巴伦前引书第341页。

④ 《论战争》，第111—112页。

义，他还是拿出那副人们所熟悉的对待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群众运动的老爷架式。不过多少学乖了一点，他在口头上也说：“刚刚镇压下去的爱尔兰运动，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斗争中最有戏剧性也最有教益的一段插曲。”^①但是，这终究掩盖不住普列汉诺夫仍然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事实，因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也骂这次起义是“都柏林盲动”。实际上爱尔兰人民是因为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宣布延期实行地方自治法案，并要在爱尔兰招募军队而被迫举行起义；在起义中相当明确地提出要争取民族独立，甚至要建立工人共和国，决非盲动、无知。爱尔兰人民在杰出的革命家詹姆士·康诺利（一八七〇——一九一六年）^②的领导下，尽管敌我力量悬殊，但仍与英帝国主义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血战，表现出惊人的革命勇敢精神。这次起义标志着爱尔兰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已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列宁高度地估价了这次起义的意义，认为这次起义用事实驳倒了“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经消耗净尽，它们不能起任何反帝的作用，支持他们纯粹民族的愿望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等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谬论^③。爱尔兰人民起义是欧洲被压迫民族奋起争取解放斗争的信号，它生动地证明了“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④，而且它“比遥远的

① 《论战争》，第110—111页。

② 康诺利早年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宣传，1896年建立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党，1903—1910年在美国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返回爱尔兰，积极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1916年都柏林起义中是公民军首领，受伤被俘后被判处死刑，慷慨就义。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48页。

④ 同上书，第352页。

殖民地的日益发展的起义更加无限有力地‘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①爱尔兰人民起义的领导者考虑到势单力薄确实准备在必要时求助于德国，但是他们对于德国帝国主义并未抱任何幻想。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既不为英国服务，也不为德皇服务，而是为爱尔兰服务”。事实上，七天的浴血战斗就是爱尔兰人民自己进行的，并没有求助于德帝国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爱尔兰人民起义的指责，表明他不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普列汉诺夫还竭力挑拨爱尔兰人民同英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他一方面诽谤爱尔兰人民起义犯有“民族利己主义”，“没有权利援引工人阶级的利他主义”，另一方面又劝诱爱尔兰人民“同民主的英国建立联盟”，“会比站在中央帝国一边时强得多”^②。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唆使英国工人阶级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引诱爱尔兰人民向英帝国主义投降并为其战争去卖命吗？无怪乎普列汉诺夫对于英国工党的领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的罪恶行为连提也不敢提，因为他自己也在扮演这种角色！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普列汉诺夫在对待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是与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

普列汉诺夫反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上述种种谬论，表明他已经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做到两件事：第一，高举革命大旗，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1页。

② 《论战争》，第111—112页。

在国内坚持不懈地进行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第二，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出发，坚决支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同他们团结一致，结成亲密的兄弟联盟，反对正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普列汉诺夫从战争爆发之初起，就在上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站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不仅反对世界人民沿着列宁为他们指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自身解放的康庄大道前进，而且极力破坏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他咒骂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巴塞尔宣言是“幻想”^①。他忘记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共同的，即在世界上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也就是忘记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他认敌为友，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引诱各国无产阶级到战场上为帝国主义充当炮灰。他认友为敌，把德、奥等国的无产阶级说成是“同容克地主和资本家结成了联盟，以便剥削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并煽动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应当立刻武装起来”^②，去枪杀德、奥等国的阶级兄弟。他还恬不知耻地为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厮杀拍手叫好，说：“这种阶级斗争多么伟大啊！”^③在普列汉诺夫的眼中只有一个问题，即“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一八九三年他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说过，“各国的国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意图；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巩固各国工人之间的紧密联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08页。

② 《论战争》，第98页。

③ 同上书，第99页。

系；应当坚决摧毁把人类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并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①。现在他自己却挑拨英、法、比等国民族进攻德、奥等国民族，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布尔什维克诬蔑为“亲德派”，讽刺列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最最最革命的人”^②。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的普列汉诺夫，现在竟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置之脑后。一九〇三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主张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坚决承认民族自决权；现在他却把民族自决权同“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口号联系在一起，只承认受德、奥等同盟国压迫的民族有自决权，不承认受俄国和英、法等协约国压迫的民族有自决权，把民族自决权糟蹋为掩盖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幌子，从而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了一句空话^③。总之，他说过的话可以不算，他签署过的文件可以撕毁。普列汉诺夫就这样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列宁痛斥普列汉诺夫道：“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抛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④

列宁鉴于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已经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建议无产阶级政党不用“社会民主党”这个不恰当的名称，而采用“共产党”这个响亮的名字。他说：“关于党的新名称。‘社会民主党’一词是不恰当的，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承认过这一点。但是，他们‘容忍了’这个名称，这是因为在

① 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44页。

② 《论战争》，第96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0、391页，第23卷，第25—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4页。

一八七一年以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势，要求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民主制也是一种国家制度，然而巴黎公社已更进了一步。目前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实际问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全世界的其他社会沙文主义者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叫做‘共产党’。”^①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对待战争、和平与革命，这是摆在国际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三位一体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持久的和平。而普列汉诺夫则深陷社会沙文主义泥潭，主张为“保卫祖国”而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抵制任何和平倡议，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普列汉诺夫为了制造各种社会沙文主义的谬论真是煞费苦心，备受折磨，以致精神悠忽，形骸变样。他不但在社会主义者当中越来越孤立，而且人也越来越显得苍老颓丧，越来越失去自信。他在民粹派时期的老战友阿普杰克曼于一九一六年访问他时对他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阿普杰克曼只有不到两年时间没会见他，没有料到他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不禁使他大为惊讶！“天啊！怎么成了这般模样！看起来深受烦扰，痛苦忧心，……阴沉的脸……深陷的双眼黯然无光。一个备受疑惑不解和内部分裂折磨的受难者，已经迷失了道路，丧失了甚至背离了他的本性……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这并不是肉体上的痛苦，也不是一般精神上的苦恼，而是一些深厚的沉重的灾难性的东西压抑在他那颗强劲而炽热的心灵上。‘是什么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撕碎了他的心？’……当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身影时，这个想法隐约掠过我的脑际：他受了创伤，这位不屈的战士无疑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1页。

受了重伤！”^①阿普杰克曼曾经跟随普列汉诺夫在彼得堡工人中生龙活虎地进行过宣传鼓动。当年人们把普列汉诺夫视为暴风雨中矫健翱翔的海燕，如今他看到的却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老鹰。”^②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言行，是他公开、完全地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始；后来他极力反对十月革命，则是他反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与发展。

^{①②} 阿普杰克曼：《格·瓦·普列汉诺夫》，列宁格勒1925年俄文版，第52、95页。奥·瓦·阿普杰克曼（1849—1926年），原为革命民粹派骨干分子，“土地和自由社”活动家，“土地平分社”创立人之一，在普列汉诺夫引导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到瑞士，与孟什维克有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历史档案馆工作。

第十五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者

第一节

二月革命后返回祖国

沙皇政府自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天起，就在经济上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在政治上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战争暴露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和沙皇政府的政治腐败。这一切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愤恨。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各种形式，在工人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了反对战争、推进革命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从一九一五年秋天起，全国革命形势逐步高涨，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士兵逃跑陆续发生。

一九一七年初，首都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布尔什维克党抓住这个革命时机，积极组织领导，及时把政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三月十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全市工人进行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党散发了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传单。三月十一日（旧历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工人开始武装起义，三月十二日彼得格勒驻军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推翻了沙皇政府，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官吏。当天晚上，彼

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隆重开幕，宣告了二月革命的胜利（三月十二日为旧历二月二十七日，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二月革命）。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革命策略的正确，宣告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策略的彻底破产。这次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绝不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是“空想”、“革命高调”，而是无产阶级争得革命胜利的正确方针。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给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正住在意大利圣勒摩城郊的维多利亚疗养院养病，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拉吉舍夫这最后一章。三月十四日，当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这里后，住在这个疗养院里的许多人都兴高彩烈地跑来向普列汉诺夫祝贺。他兴奋得呆不住了，急忙驱车进城看最新的报纸。最初他并不拟立即回国，还想继续把书写完。但是十天之内就改变了主意。因为电报和书信，象雪片似的从俄国国内飞来，希望他早日回国，襄理政局。这时普列汉诺夫是什么想法呢？一方面，早在一八八〇年当他还是一个刚二十四岁的民粹派革命青年的时候，就因参加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屡遭迫害，不得不亡命国外继续斗争，至今已历三十七个冬春。他虽然在革命的征程上几经曲折，但是反对沙皇制度的信念在他头脑中并未动摇。如今，他已经成了六十一岁的老人了，万恶的沙皇制度被推翻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目标实现了，回国的障碍扫除了，他怎能不心潮起伏、激动万分呢？萦怀故国，乡思悠悠，他急切希望回到祖国看看革命胜利后的情景。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时刻关心着俄国在大战中的胜败，思念着英、法等“协

约国”的战局。他认为沙皇制度被推翻，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可以更好组织人民群众参战，为打败德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为此，他迫不及待地要回俄国去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同德国作战。

正因为这样，普列汉诺夫尽管染病在身，但在—位法国社会党人的建议下，仍决定马上回国。三月二十五日，他和妻子动身先到巴黎，同—些法国社会党人—起去伦敦，同英国社会党人会合。这些社会党人是想亲自到俄国，鼓动他们的“协约国”盟友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战友捷依奇。他们—起于四月八日乘—艘法国轮船北返，不幸受寒，病情加重。捷依奇曾劝他待身体康复后再走。他坚决表示：“我必须走，—个革命老战士当被召唤时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①他想起—九〇五年革命时也因身体欠好未赶回国而深感遗憾。他妻子也明知有危险，但无法拦阻。出发前，她在伦敦曾买了—罐氧气以备途中急需^②。途经挪威、瑞典，最后到达德国边境上的芬兰的车站托尔尼欧，然后坐火车去彼得格勒。

四月十三日（旧历三月三十一日）夜间，普列汉诺夫—行到达彼得格勒之前，芬兰站台上已经聚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工人、士兵、大学生和社会群众团体的代表，支持临时政府的各政党的代表以及协约国的外交官们，还有纠察队、铜管乐队和难以数计的人山人海的居民。当普列汉诺夫走下火车时映入眼帘的是在灯光照耀下闪烁的红旗的海洋，两耳回旋着人群中迸发出来的欢迎的呼声。在马赛曲的激昂旋律伴奏下，普列汉诺夫由他的《统一报》的同事们护送到火车站休息室，在那里举行了欢迎仪式，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首领尼·谢·齐

^① 德·舒勃：《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43页。

^② 罗·马·普列汉诺娃：《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岁月》。参见巴伦前引书，第343页。

赫泽（一八六四——一九二六年）致欢迎词。其中提到：“我们希望您将在我们中间占据一个本来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您的神圣位置”^①。随后他来到人民大厦，受到广大群众更为热烈的欢迎。在他致了简短答辞之后，人们把他举上肩膀，一直抬到车站门外的汽车上。汽车很难在人群中行驶，许多人都想看看这位当年颇有影响的老战士。普列汉诺夫在简短的答词中虽然曾经表示：“我要把自己的余年贡献给革命胜利的事业”，但是由于他立场错误、理论荒谬，所以回国后还抱病积极办报、写文章，出席会议、发表演说，这一切却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是为了保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制造舆论。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消耗在阻止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终于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演出了最后一幕悲剧！

前往彼得格勒芬兰车站欢迎普列汉诺夫的人们，各有自己的打算。一部分工人、士兵、学生来欢迎普列汉诺夫，是考虑到：他曾经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家，所以迫切地希望他在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之后能够给群众指出革命继续前进的出路。从不少的工人、士兵和学生前来欢迎的情况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当时在群众中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孟什维克是把普列汉诺夫作为自己的思想领袖来欢迎的，他们想借助普列汉诺夫这块“金字招牌”，加强与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社会革命党虽然过去曾经遭受过普列汉诺夫的猛烈批判，然而现在双方在沙文主义的泥潭里已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因此，他们也想取得普列汉诺夫这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普列汉诺夫回到祖国以后，遇到俄国革命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正当俄国人民在同沙皇政府搏斗的时候，资产

^① 见巴伦前引书，第343页。

阶级却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旧历三月二日）成立了以大地主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临时政府。在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烈火中，虽然也产生了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但领导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敢掌握全国政权，仅仅在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中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对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和“监督”。实际上，全国的政权主要由临时政府掌握。临时政府的重要职务，除司法部长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外，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分子。临时政府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对外，确认与协约国订立的条约，主张继续把对同盟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对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积极策划阻止和镇压社会主义革命的“阴谋”。

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后，如何估价俄国二月革命、怎样对待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呢？

尽管他已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但由于仍然憎恨沙皇制度，所以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表示高兴，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表示欢迎。在选举苏维埃代表时，他尚未回国，所以未被选为代表。可是他刚一回国，就经常应邀参加苏维埃的会议。普列汉诺夫回到祖国的第三天，即四月十五日（旧历四月二日），就去参加在塔弗里达宫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历史，表示向在俄国二月革命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俄国无产阶级致敬。他说：“在这欢乐的‘今天’，我要向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在解放了自己之后还解放了整个俄国的阶级致敬。”^①他还以有机会“第一次对解放了的、自由的俄国无产阶级讲话”而感到非常荣幸^②。普列汉

①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页。以下简称：《在祖国的一年》。

诺夫说的这些话，表达了他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四月十六日（旧历四月三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闭幕时，孟什维克首领马·伊·斯科别列夫邀请普列汉诺夫抱病出席并讲话。会后因重感冒，病倒在床上。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还是坚决拥护和支持苏维埃的。当然这种支持是和孟什维克控制着苏维埃的领导权分不开的，但毕竟表明了他对新生的工人政权的积极态度。

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恢复出版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刊的《统一报》，在彼得格勒每日发行。普列汉诺夫回国后担任该报主编，于是在普列汉诺夫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统一派”孟什维克。他于四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先后在报上发表《反动的阴谋》和《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现象》等文，愤怒谴责了黑帮分子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建议临时政府“现在应该用严刑峻法对付他们。必须无一赦百。”^①他从春暖气爽的意大利乍回到严寒的北国，因气候不适，时常闹病。但是他抱病坚持工作，除了办报之外，还领导了铁路职工经济状况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机构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经过他两个月的努力，从政府和企业主那里为工人争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例如，职工的工资有所提高，被称为“普列汉诺夫的津贴”。在革命高潮之中，他不是积极领导工人进一步为夺取全部政权、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却不惜时间精力，局限于这种改良性的活动，这只会把工人引入迷途。当时有觉悟的工人已经起来反对并揭露这个委员会。四月十九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上，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讨论了“普列汉诺夫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善工资的提案。有一位与会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管普列汉诺夫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信有多高，他所拟定的那套残缺不全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10页。

的‘改良主义’纲领的每一步，都遭到了工人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事情闹到这般地步，我们公开指责‘铁路职工经济状况改进委员会’是在继续执行‘寄生虫和吸血鬼’的政策。”^①可见，尽管普列汉诺夫主观上是关心工人阶级，但是由于他对形势和任务判断错误，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普列汉诺夫在回国以后，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他声嘶力竭地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在《统一报》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号召群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普列汉诺夫回国后，发表文章揭露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他就恼羞成怒，诬蔑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②，是“列宁的说谎话的机关报”^③。

普列汉诺夫回国之后，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在打他的主意。

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他的历史威望、理论才能和同布尔什维克坚决对立的立场，以巩固他们在苏维埃中的阵地，并把他作为阻挡左派势力增长的屏障。为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曾向他提出要给他在执委会中安排一个席位。他最初表示接受，但是要求还安排他的统一派的拥护者担任第二把手，执委会没有答应，所以他终于拒绝了出任执委^④。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妄想把普列汉诺夫拉过去，利用他过去在俄国工人和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招摇撞骗，达到消灭苏维埃，取

① 弗·安·日格门特：《在伊里奇那里》，载《会见列宁——铁路员工回忆录》，人民铁道出版社1960年版，第28—29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8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据逃亡美国的前社会革命党首领、临时政府总理亚·克伦斯基1962年2月1日给巴伦的信，见巴伦前引书，第349页。

缔布尔什维克，独掌全国政权的罪恶目的。当普列汉诺夫还在意大利圣勒摩时，就收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邀请他回国的电报。而且报纸上曾报导过他将担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的消息，为此他还收到很多贺电。但这终究是谣传而不是事实。普列汉诺夫在报纸上宣布只有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授权的前提下，他才担任临时政府中的部长职务。普列汉诺夫鼓吹的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使他在俄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一落千丈，以至连孟什维克控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也不敢授权他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因固然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由于普列汉诺夫拒不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然减轻了他敌视十月革命的罪过。

普列汉诺夫的顽固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和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引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他的兴趣。沙皇政府的将军、保皇派的反动政客，如：最高总司令米·瓦·阿列克谢也夫将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保皇派的反动组织黑帮集团的首脑弗·米·普里什凯维奇、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等，接连不断地登门拜访他，妄想借助于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阻止革命继续向前发展。这对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采的事情。

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官员、被推翻的反动官僚与将军，都在想方设法拉拢普列汉诺夫。而好些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如全俄教师代表大会、全俄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电工营委员会、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等，又都争先恐后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他们的活动，希望他给群众指明出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决心率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和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等待着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作出抉择。

第二节

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旧历四月三日）夜间，流亡国外十年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受到了成千上万工人、士兵、水兵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晚到三天。他在芬兰车站同样被欢迎的群众抬起来举到车站大厅，但是他却没有理会在大厅致“欢迎”词说“希望”列宁同他们采取“一致步骤”的孟什维克首领齐赫泽等人，径直向群众发表演说，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列宁在回国后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旧历四月四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和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列宁起草的这个报告的大纲就是有名的《四月提纲》。列宁的这个提纲发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旧历四月七日）第二十六号《真理报》上，其中系统地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四月二十七日（旧历四月十四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表示赞同列宁的《四月提纲》，并把它作为指导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首先指出，“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即使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地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战争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①其次，列宁认为，既然沙皇专制制度已被推翻、政权已经归资产阶级掌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3页。

握，那末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和平、土地与面包问题，就必须及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①为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根据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结合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创造出“苏维埃”这种革命政权的新形式，认为在俄国“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②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还论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方针。当时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拥有一部分武装；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虽然本身只控制部分旧军官和少数反动武装，没多大力量，但一部分群众还相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控制着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这种特殊历史情况，决定争取实现革命的和平发展，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③的口号。同时列宁预计到“也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④，并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做好武装斗争的一切准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4、15页。

④ 同上书，第293页。

普列汉诺夫意识到列宁《四月提纲》的重要性，所以他下决心要集中力量攻击列宁的这篇讲演。他说：“既然列宁在他那篇的确是梦话式的演说中涉及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他的提纲进行剖析。”^①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旧历四月九日至十二日）第九一十一号《统一报》上专门发表了逐条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文章，题目叫做《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并为此在以后又发表了一些文章。

普列汉诺夫文章的基调，就是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既不符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在说“梦话”。他主办的《统一报》的一个记者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听了列宁关于《四月提纲》的演说之后，竟诬蔑列宁是在说“梦话”。普列汉诺夫居然附和说：“《统一报》的记者把列宁演讲叫做梦话是完全正确的。”^②

普列汉诺夫首先攻击列宁《四月提纲》的第一条，即列宁指出的当时的战争，从俄国方面来看，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他说：“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是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然则从德国方面来说又是怎样呢？对这一点列宁只字未提。”^③实际上列宁从来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大集团双方进行的都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可是普列汉诺夫偏用形而上学观察问题。他认为：“如果两个人发生冲突，其中一人表现了掠夺的意图，那末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假定，另一人有被掠夺的危险。”^④如果承认战争在德国方面是掠夺的、侵略的，那末在俄国方面就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18—19页。

一定是自卫的、反侵略的。他还以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借口，为俄国当时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狡辩。他说：“现代帝国主义的政策，是那些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高阶段的国家的产物。俄国不是那样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按照马克思著名的说法，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因此俄国的资本绝不可能扮演最大的和最危害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那种角色。”^①普列汉诺夫忘记了，早在十三年前，即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期间，他曾经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论证了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谴责了俄国资产阶级参与掠夺的罪恶行径。而今天，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他却堕落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立场，为俄国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辩护。列宁在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真理报》上及时地发表文章《跟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谬论，指出临时政府正在继续奉行着沙皇的掠夺政策的事实。他嘲笑道：“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一模一样）已经堕落成庸俗不堪、非常平凡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他不想知道（也许向来就不知道）：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战争和政策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应当分析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无耻地大肆造谣，掩饰尼古拉二世的掠夺政策（李沃夫之流并没有改变这种政策，他们甚至承认了沙皇签订的条约！），——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先生的全部智慧。”^②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文章中，集中力量攻击了列宁《四月提纲》的灵魂，即：主张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92页。

普列汉诺夫疯狂反对列宁提出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条路线的出发点，就是顽固坚持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第二国际“英雄们”断言，民主革命胜利后，农民因获得土地会马上变成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所以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缺少同盟者；只有到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并具有高度的文化教育水平与生产管理技能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说来，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必须经过一个长达几十年以至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等上述条件具备了，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把这个老朽理论称之为“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①。普列汉诺夫早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就积极向俄国推销这一陈腐的理论。在二月革命胜利以后，他仍然认为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太低，经济极端落后，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②。因此首要的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普列汉诺夫认为，目前在俄国只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他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③。普列汉诺夫攻击列宁提出的革命转变方针，是脱离了俄国的具体情况。他说：“我们认为，列宁的提纲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即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④他把列宁的革命转变思想诬蔑为“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⑤他歪曲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22—23页。

④ 同上书，第17页。

⑤ 同上书，第24页。

地引证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列宁的提纲，他曾经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他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①普列汉诺夫把恩格斯的话绝对化、教条化。事实上不是俄国不具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戴着“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的有色眼镜，看不见那些已经成熟的条件。他视而不见：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已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在连年的战争中俄国资本主义不但阻碍而且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久经革命锻炼，已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并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有能力担负起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俄国广大的贫苦农民和人民大众在战争的重压下，只有跟随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争得和平、土地和面包。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科学地分析了俄国的情况，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一九一六年九月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光辉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得出科学结论：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一切国家同时胜利，而首先将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还作出英明战略决策：选择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沙皇俄国作为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的突破口。这个科学结论对于死抱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化的所谓‘生产力’论”的陈腐理论不放的普列汉诺夫是不可理解的。他只会从第二国际的机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24页。

会主义的教条出发，歪曲和割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关系的理论，抹杀人民群众在革命转变中的伟大作用。所以脱离时间和地点，空谈“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列宁在痛斥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理论时，尖锐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议论，是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时代落伍者’的最典型的议论。”^①当初在俄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真理的时代先锋，如今当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却变成为时代落伍者，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悲剧！

至于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诬蔑为无政府主义，列宁有力地回击道：“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高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谁只要愿意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不会而且**绝对不会**滚到布朗基主义的泥潭中去。这样做，也不会滚到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中去，因为无政府主义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到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必需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不过是再次证明他**离开**马克思主义罢了。”^②

普列汉诺夫坚持第二国际腐朽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他在文章中叫喊：“只有坟墓才能治好驼背。当我还能执笔的时候，我就不会放弃这些言论。”^③这充分表明了普列汉诺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页。

③ 《在祖国的一年》，第38页。

夫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至死不变的顽固立场。列宁曾经指出：“不能否认，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贯背叛社会主义，一贯诚心诚意地为资本家效劳。”^①

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极力美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反对列宁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的革命方针。他说：“临时政府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的政府”^②。他为临时政府由于改组而出现的几次危机忧心忡忡，他为“一切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要变为现实焦急万分。他在五月三日至四日（旧历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彼得格勒十万人和士兵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游行示威的第二天，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我们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国内战争”，“如果列宁派控制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将直接导致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他告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必须从这种局势中寻找出路。”“为了避免国内战争，工兵代表苏维埃应该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③当普列汉诺夫得知这个协议已经达成时，立刻在《统一报》上发表题为《但愿一切顺利》的文章，表示祝贺。后来他又进一步把五月十八日（旧历五月五日）组成的联合临时政府说成是革命政府，并号召“每一个人都应该支持临时政府同无政府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④。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谬论，充分说明“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的国家学说。”^⑤他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临时政府的阶级本质。正如列宁所说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91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40、41页。

④ 同上书，第204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30—31页。

的：“米留可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和切列万宁之流造谣，是为了使人民看不到真相，是想不谈**这种或那种政权组织的阶级性质这一主要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①

普列汉诺夫美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方针，说明了他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要想争得解放，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革命政权。列宁在谈到巴黎公社的实质是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时，强调指出：“巴黎公社这一特别类型的国家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之流（‘中派’分子，即摇摆于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子）先生们，以及所有一切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都把这种实质忘掉了和歪曲了。”“他们空话连篇，装聋作哑，推托逃避，千番百次地相互庆贺革命，但是不愿意想一想，工兵代表苏维埃**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的真理：既然这种苏维埃存在着，既然它们多少是一种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②

普列汉诺夫不仅从理论上猖狂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百般美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支持临时政府，首先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十日给电工营委员会邀请他参加在米海诺夫斯基剧场举行的音乐会的答复中，号召军队要把枪口对准国内外敌人。五月间他在皇村养病，仍然继续写作，康复后六月间又几次发表演说并著文，继续鼓吹“革命民主派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他还和查苏利奇、捷依奇一起参加了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德战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9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页。

争的组织“个人模范”小组，一起签名发表战争宣言。这个小组由暗藏的帝制分子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组成。普列汉诺夫还于七月二日(旧历六月十九日)自告奋勇参加了一群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彼得格勒涅瓦大街的游行。这一天，普列汉诺夫从报纸上看到俄国军队已转入进攻，兴奋不已，忘乎所以，便立刻动身去《统一报》编辑部。此时，在这个报纸的编辑部门前聚集着一群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是在听到俄国转入进攻的消息后不约而同来到这里的。捷依奇和安东诺夫在那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他们沿涅瓦大街游行，普列汉诺夫也侧身行列。游行队伍最后来到喀山广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向这群游行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发表了演说。他号召说：“我们保卫自己也就是保卫全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卫自己的祖国，并且力求取得胜利。”^①这群社会沙文主义者对他们首领的讲话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历史真会嘲弄人。一八七六年青年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号召工人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剥削制度，四十一年之后，老年普列汉诺夫又在同一个地方号召人们起来保卫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节

维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如果说七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反对同资产阶级决裂，否认俄国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底；那末七月事变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维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七月事变、八月最高国务会议、九月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等历史事件的态度上。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209页。

七月十七日(旧历七月四日)，临时政府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合谋，调动军队镇压了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死伤四百余人。接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疯狂镇压布尔什维克，查封了《真理报》，解除工人赤卫队武装，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家。七月二十日对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下达通缉令。七月二十七日组成了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新的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这个政府。由这些妥协党把持的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于七月二十二日通过决议，承认临时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宣布把全部政权交给它。

七月事变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独揽大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经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由这两个党把持的苏维埃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和遮羞布。

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布尔什维克党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方针。党组织转入半合法状态，列宁秘密隐藏起来，继续领导革命。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至十六日(旧历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布尔什维克党秘密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通过武装起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鉴于苏维埃已成为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大会决定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代之以政权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在七月事变后到八月上旬，在《统一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的观点出发，歪曲七月中旬人民群众示威游行的革命性质，他把这次示威游行硬说成“是在德国政府的代理人的参与下组织起来的”，“显然是俄国的国外敌人为了达到粉碎俄国的目的而拟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接着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勾结妥协党对革命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并把这种镇压称之为：“革命战

胜了无政府状态。”^①普列汉诺夫当时预见到以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目标的国内战争必然爆发，攻击列宁提出的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是违背客观规律。他说：

“列宁所要求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对我国是很大的灾难，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专政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反革命势力很快就会随之而来。”^②他又声称：“列宁分子的胜利本身又会加速我们国内经济破产的到来，使一切作战地区更快地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会使整个俄国遭到不可估量的灾难。”^③他咒骂：“列宁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家。”^④又说：“列宁在某些方面是从布朗基那里来的，此外他同巴枯宁多少也有亲密的血缘关系。”^⑤后来，他甚至捕风捉影地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同敌人有过勾搭（参看列宁案件的起诉书等等）。敌人的金币使他们富有毅力。”^⑥列宁揭穿了普列汉诺夫诽谤和谩骂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就在于不让布尔什维克党率领无产阶级，以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坚定地表示：“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⑦

普列汉诺夫在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同时，竭力美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为它出谋划策。他附和一家报纸把临时政府的新任总理克伦斯基颂扬为“俄国革命的爱神”^⑧，吹捧克伦斯基“已经为俄国立下了许多意义十分重大的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252、248页。

② 同上书，第244页。

③ 同上书，第247、248页。

④ 同上书，第259页。

⑤ 同上书，第256页。

⑥ 同上书，第280页。

⑦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4页。

⑧ 《在祖国的一年》，第252页。

功劳。”^①他低三下四地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议，一方面要吸收一切不愿意恢复旧制度的政党代表参加，组成“联合政府”^②，各政党要达成“各得其所”的协议；另一方面要严厉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他写道：“七月三日和四日（指旧历——引者注）的事件已经清楚地告诉了甚至没有经验的和眼光短浅的人，列宁分子除了‘实力’以外是不会向任何东西让步的，只有当他们看到革命多数派有这种力量作后盾，并且不怕实际使用这种力量的时候，才会停止他们那种使革命有沉没到浑浊的无政府浪潮中去的危险的‘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行动’。”^③这些事实生动说明，普列汉诺夫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谋士和走卒，而他领导的《统一报》派则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御林军。

临时政府为组织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镇压即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旧历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了所谓“国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军官和哥萨克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用苏维埃名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坚决反对和抵制这次会议。在会上，临时政府总理、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炫耀自己的力量，叫喊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革命运动。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疯狂地叫嚣要“取缔各委员会和苏维埃”。

普列汉诺夫在这次会议开幕前两天和妻子一起仆仆风尘来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的冷遇，与五个月前回国时在彼得格勒受到的热烈欢迎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没有人去车站迎接，而且夫妻俩找了很多家旅馆，到处都没有下榻之所。最后只好住到被他批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253—254页。

② 同上书，第266—267页。

③ 同上书，第249—250页。

判过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孟什维克瓦连廷诺夫^①家中，稍事休息数日。他向主人找来一本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重新阅读书中记述赫尔岑年轻时伙同挚友奥格辽夫（一八一三——一八七七年）在莫斯科郊外雀山上宣誓要为十二月党人革命家报仇雪恨的情节。他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读这些动人的描写，并且想亲自去拜谒这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圣地^②。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星期日，风和日丽，他偕同维·伊·查苏利奇等几个老朋友去漫游雀山。俯瞰远眺，城乡的景色十分迷人。虽然按图索骥，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起誓的地方。普列汉诺夫颇为懊丧，心情沉重。他脸色苍白，思绪万千，蓦然抓住查苏利奇的手，无限感慨地对她说：“维拉·伊万诺夫娜，九十年前，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就在附近这个地方起誓过。大约四十年前，在另一个地方，你记得吗？我同你一起也起誓过：把人民的幸福作为我们毕生最高的准则。现在我们的道路显然已经濒临绝境。这样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那时别人会说我们，更确切地说，会说我们的事业‘全完了’，这样的时刻也许会比我们所预期的更快到来。当我们一息尚存，让我们凝目对视，扪心自问：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吗？我认为我们真正地实现了，维拉·伊万诺夫娜，这是真的吗？是真正地实现了吗？”^③这段话表明普列汉诺夫内心里已预感到自己这一套理论将要破产，但是他还自认为毕生是忠于人民、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

普列汉诺夫在“国务会议”开始的第四天，即八月二十八日

① 尼·瓦连廷诺夫主编过多种孟什维克报刊，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商报》任副总编，嗣后又在苏联驻巴黎商务代办处工作。1930年逃奔西方，长住巴黎。

② 1959年夏天在巴黎访问瓦连廷诺夫记要。见巴伦前引书，第351页。

③ 见瓦连廷诺夫：《同列宁的会见》第288—289页。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51页。

才出席并发表了演说。他在莫斯科“国务会议”召开的前夕，在《统一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重复唠叨因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会导致“灾难”的老调，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全面合作。他写道：“我国得救之道不在于国内战争，而在于两大阶级达成自觉的、全面考虑的、有计划的和诚恳的协议，因为在当前具体条件下，为了恢复俄国的经济，它们的共同努力同样是必需的。”^①普列汉诺夫就带着他这套阶级合作的方案在“国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宣扬二月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接着向坐在会场右侧席位上的资产阶级代表说明：同工人阶级达成协议，进行社会改革，对他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他说：“公民们，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为了全俄国的利益，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设法同无产阶级接近”^②。普列汉诺夫又对坐在会场左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重复“俄国现在正在经历资本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是根本不恰当的”等滥调，劝说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去完成“俄国现在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任务”^③。

普列汉诺夫在演说结束时，对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威胁道：“假使我们不达成这样的协议，那末结果将怎么样呢？结果你们将会完蛋（对着右边说）。——你们也将会完蛋（对着左边说）。全国都将会完蛋。请允许我讲一个爱尔兰的关于两只猫的故事：两只猫打架，打得那么上劲，打得那么狠，结果只剩下两条尾巴。”^④当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原则斗争尖锐时，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303—304页。

② 同上书，第324页。

③ 同上书，第327、325页。

④ 同上书，第329页。

他就鼓吹这种猫尾巴论，而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生死搏斗时，他又重弹旧调。

在普列汉诺夫发表鼓吹阶级调和的演说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面临决战的关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听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套说教，而是认真做好对付反革命叛乱的准备。与此同时，列宁在八月至九月间适应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论述了当时在俄国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列宁严肃指出：由于避而不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态度问题，宣扬阶级调和，“在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①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未全听普列汉诺夫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宣传的那一套。后来，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派”从孟什维克中分裂出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积极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反对两党右派的反革命贩卖政策。

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也没有采纳普列汉诺夫关于阶级调和的献策。在“国务会议”之后，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工厂主和英、法等国代表，纷纷会见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答应在金钱、物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他发动反革命叛乱，消灭苏维埃。经过秘商，科尔尼洛夫还取得了克伦斯基的暗中支持。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一场反革命叛乱正在秘密策划中。

九月七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科尔尼洛夫开始发动反革命叛乱，他把克雷莫夫将军指挥的第三骑兵军调往彼得格勒，名义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

上是“拯救祖国”，实际上是妄想镇压革命，摧毁苏维埃，建立反革命的独裁政权。

这次反革命暴乱一发生，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就向工人和士兵发出了以武装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战斗号令。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指挥部，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严阵以待。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到准备进攻首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反动军队中去，积极做争取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反革命叛乱很快在九月十二日（旧历八月三十日）被粉碎。

普列汉诺夫从莫斯科参加“国务会议”回来，一直病倒在床上。由于他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看待当时俄军在西北战线的溃败与里加失守，这更加重了他的病情。因此，当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爆发后，他不得不躺在床上，向妻子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口授谴责这次反革命叛乱的文章。他当时在《统一报》上为此发表的专门文章就有四篇。

首先，普列汉诺夫认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目的是：反对临时政府，恢复沙皇专制制度，“多少延长一下旧政权的寿命。”^①他说：“科尔尼洛夫将军犯了罪行。他在他本来应该去反对刚刚取得了能给我国造成无数灾难的胜利的国外敌人的时候，却出来反对本国政府。”^②普列汉诺夫谈到了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使彼得格勒受到极端严重的损失，从而使整个俄国也受到极端严重的损失。”^③他表明了对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态度。他写道：“所以，我国居民中间凡是不同情无政府主义、也不企图恢复旧制度的分子，照理都应该坚决彻底和确定不移地谴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349页。

② 同上书，第350页。

③ 同上书，第346页。

责产生科尔尼洛夫将军想用暴力夺取全部政权的罪恶欲望之类的‘误会’。”^①他在谈到科尔尼洛夫时主张：“应该用同样纪律的名义，按照军事时期法律的最严厉的措施来惩处他。”^②

普列汉诺夫谴责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并把它的产生同恢复沙皇专制制度联系起来，并主张对科尔尼洛夫实行严厉的制裁，这些无疑是正确的。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尽管当时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但还是反对恢复沙皇专制制度的，在这点上，他同科尔尼洛夫等这些反动的将军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他认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矛头只是指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片面的，也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科尔尼洛夫企图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不仅要扫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且主要目标还在于消灭苏维埃、彻底取缔布尔什维克。而这一点，恰恰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

其次，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分析了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产生的原因以及应汲取的教训。他认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发生的原因在于临时政府“没有改变自己的成员，没有把工商业阶级的代表们吸引到自己内部来。这是巨大的错误。有理由假定，如果我们的政府由于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变得比较稳定，科尔尼洛夫将军就不敢有夺取政权的想法。”^③他预言“科尔尼洛夫将军可能找到模仿者。”^④他认为防止这类反革命叛乱再次发生的措施是：“只有通过联合政府的努力才能拯救俄国。”^⑤普列汉诺夫又在重弹阶级调和的滥调。他对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产生的原因及教训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①⑤ 《在祖国的一年》，第351页。

② 同上书，第350页。

③ 同上书，第347页。

④ 同上书，第352页。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次反革命叛乱的被粉碎是俄国革命进程中，革命力量超过反革命力量的转折点。从此，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的决战时期。

在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和被粉碎的过程中，暴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情和暗中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反动立场，揭穿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成了资产阶级俘虏的可耻面目。

布尔什维克由于组织粉碎了这次反革命叛乱，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苏维埃政权在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斗争中，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苏维埃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阶段。广大工人和士兵纷纷把布尔什维克代表选进苏维埃。据当时一百五十七个城市的苏维埃的统计，布尔什维克居领导地位的有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内的一百一十八个城市，占百分之七十七，苏维埃从此摆脱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

列宁于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之间，向党中央接连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指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列宁指出了武装起义应具备的条件，告诫全党要严肃认真地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这时，党又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但这不是把政权交给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苏维埃，而是归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这不再是革命和平发展，而是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掌握。

普列汉诺夫在这时虽然看清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将要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仍顽固不化地断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还未成熟，因此立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内只会引起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对外只会招致对德战争的失败，整个说来会导致反革命复辟。他说：“假使事变象列宁分子所希望的

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我国革命政权经历着的、旷日持久的危机就会迅速得到十分确定的解决：尼·列宁会代替亚·克伦斯基的地位。这将是我国革命终结的开始。列宁政策的胜利会造成毁灭性的、极可怕的经济崩溃，以致国内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会离开革命者，并且将或多或少坚决地、或多或少彻底地支持反革命分子。”^① 普列汉诺夫恶毒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诬蔑它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他写道：“现在，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列宁及其同道们的鼓动正在产生多么丰满的反革命幼芽”^②。他肆意诽谤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把参加七月十六日（旧历七月三日）彼得格勒群众性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士兵，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参与者等量齐观。他说什么，“那些因为参加科尔尼洛夫发动而使自己在法律面前名誉扫地的人，和那些因为七月三日至五日（指旧历——引者注）的风潮这个案件而受审讯的人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③ 他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诬蔑道：“在农村中，农民们破坏地主的房屋，烧毁其中收藏的书籍，消灭地主仓库中堆集的粮食，拆毁他们的医院和学校。总之，农民们使自己同地主的阶级斗争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由于这种性质就使得阶级斗争变成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一种野蛮的反动。”^④ 普列汉诺夫劝导无产阶级为了“整体利益”，必须向资产阶级让步，实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他说：“劳动群众有觉悟的政治代表不应该向工商业阶级的代表提出显然是这个阶级的经济本性所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⑤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93页。

③ 同上书，第389页。

④ 同上书，第427页。

⑤ 同上书，第392页。

九月二十五日（旧历九月十二日）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召开了全俄民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妥协派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以及军队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以此把俄国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引向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道路。他们提出以“一切权力归预备议会！”的反动口号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武装起义的计划，积极抵制“全俄民主会议”。

普列汉诺夫在全俄民主会议开幕那天因为有病未能参加，但送去了书面演说词。这个演说词在十月一日（旧历九月十八日）的会议上宣读过，后刊登在十月三日（旧历九月二十日）的《统一报》上。普列汉诺夫向“全俄民主会议”指出：要不使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等联合起来。他写道：“或者同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工商业阶级的政治代表联合，或者让列宁的政策取得胜利。”^①

普列汉诺夫为了维持气息奄奄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寿命，不断奉劝临时政府坚决镇压布尔什维克组织与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他提醒临时政府说：“那伙拥护列宁的人正在公开地积极准备举行发动，以便把全部政权转交苏维埃。我们的执政者死抱住这种碰到危险就把脑袋藏进沙堆里去的鸵鸟政策，这能有什么结果呢？显然，这种政策是决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②他不厌其烦地说：“再说一遍：只有能够坚决地用同样的魄力既对反革命的企图，也对无政府主义的发动实行镇压的政府，才能指望得到胜利和巩固的局面。”^③普列汉诺夫分子，同孟什维克的护国派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416页。

③ 同上书，第417页。

波特列索夫分子、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中动摇于妥协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新生活报》的代表一起，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至八日（旧历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孟什维克的“统一”代表大会，虽然未能实现组织的“统一”，但却一致表示要维护临时政府。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末现在则是毫不掩饰，公开出面了。他完全站到俄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列宁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他说：“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是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式的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倾向。”^①

第四节

否认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激流冲破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不顾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的反动说教，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地在俄国大地上汹涌澎湃。

列宁于十月二十日（旧历十月七日）从芬兰秘密回到了彼得格勒。十月二十三日，在列宁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十月二十九日（旧历十月十六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准备和实现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十一月六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得知临时政府要先动手镇压起义的消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3页。

息后，决定马上举行武装起义。当天晚上，列宁化装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从六日晚到七日晨（旧历二十四日晚和二十五日晨），约有二十万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按照列宁的命令，勇敢迅速地占领了火车站、主要桥梁、国家银行、电话电报局及其它战略要地，包围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十一月七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晚九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当天晚上在斯莫尔尼宫开幕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正式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光荣诞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全俄国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而普列汉诺夫却痛心疾首。他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在十一月十日《统一报》上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他在信的开头说：“同志们！由于种种事变，亚·费·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了。毫无疑问，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这些事变都感到高兴。”“我要坦率地对你们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①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驳倒了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无产阶级虽然不占人口多数，但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②普列汉诺夫在公开信中尽管不得不承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但是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4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5页。

他仍然抱着“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不放，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还没有成熟到掌握政权程度时，“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①他还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农民又不支持它，它的政权不能巩固，只会遭到瓦解，更不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老调重弹：“诚然，工人阶级可以指望得到迄今都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如果工人在这一事业中不能指靠农民，那末他究竟能够指靠谁呢？只能指靠自己。但是要知道，象上面所说的，他现在是少数，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完成‘社会革命’，那末我国的经济本身就会使它遭到惨重的失败。”^②普列汉诺夫既否认俄国无产阶级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又无视俄国农民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公开信中仍顽固坚持沙文主义立场，攻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有利于德帝国主义战胜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他说：“我们颁布了和平法令。可是，要使德国皇帝服从我们的法令，我们就必须比他更加强大。既然力量在他那边，那末，我们‘颁布’和平‘法令’，就无异于颁布让他胜利的法令，即颁布德帝国主义战胜我们、战胜俄国劳动居民的法令。”^③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464页。

② 同上书，第465页。

③ 同上书，第466页。

利弊的危言耸听。事实上《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停战，缔结一个不割地、不赔款、正义民主的和约，这极大地提高了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威望，揭露了德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使它处于十分尴尬的不利境地。

普列汉诺夫错误地分析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工人阶级、农民的阶级地位和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武断地得出结论：

“俄国无产阶级不适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这场内战最后将迫使它从在今年二月和三月间所占领的阵地上撤退到很远的地方去。”^①最后，他端出“使无产阶级防止它很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的灾难”的救世良方：以国内各个阶级的联合取代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掌握的政权。他说：“事变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②

十月革命胜利后，地主资产阶级毒汁四溅地诽谤苏维埃政权，说它是什么“暴政”呀，“混乱不堪”呀，“摇摇欲坠”呀，散布“无产阶级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流言蜚语。他们制造反革命怠工、罢工，组织反革命暴乱，妄图摧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先后粉碎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武装进攻和白卫军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于是，阶级敌人变换了手法，收起了“打倒苏维埃”的旧的反动口号，换上了“不要共产党参加的苏维埃”的新的反动口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465—466页。

② 同上书，第466页。

号，妄图通过取消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一切反动阶级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胜利了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普列汉诺夫污蔑十月革命和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言论，适应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要求。普列汉诺夫也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国内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分子污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带头人。继普列汉诺夫之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另一个头目考茨基接踵而至，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抛出了一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咒骂苏维埃政权“独裁”、“专横”，诽谤苏维埃政权是“没有生命的孩子”，必定要灭亡。法国社会党人马塞尔·桑巴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不能在一个落后国家获得成功，而成功以后要在这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权——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象普列汉诺夫所胡诌的那样，将遭到“最大的灾难”、“最惨重的失败”，反而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激烈搏斗中，越战越强。俄国农民没有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计的那样，在得到地主土地之后朝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在工人阶级国家领导之下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到一九三四年在苏联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一九三七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到三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俄国巩固地建立起来，俄国已由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它又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战胜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百万大军的疯狂进攻。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

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互相呼应，竭力贬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伯恩施坦说：“实际上布尔

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现象，这个可由在俄国长期统治着的关系来作解释。在那里，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之下，极端强制的压迫手段已成为习惯。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非因此就有模仿的价值。”^①考茨基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硬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十月革命实际上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他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落后的产物。普列汉诺夫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否认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开端，说什么：“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能完成这一事业。”^②他还诬蔑十月革命“破坏所有的历史规律”。事实证明，不懂历史规律、违背历史规律的正是他自己。他孤立地把社会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数量看作是历史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决定力量，视而不见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质量上的优势和工农联盟的强大威力。政治理论上的近视使他陷入了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泥潭。历史唯物论阐明了历史进程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十月革命的光辉是任何自命为科学权威的人都阻挡不了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世界无产阶级近七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比正确，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破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开辟了无产阶级领导下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论文选译》三联书店1959年中文版，第30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465页。

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纪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指出了胜利的道路。各国无产阶级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不等待别国的帮助，独立自主地领导广大人民不失时机去夺取政权，并且依靠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基本原则却是共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①

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对十月革命的反对者普列汉诺夫同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在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上展开的一场论战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请回想一下一九一七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②

①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5页。

第十六章

政治悲剧适时终结 学术遗产久远生辉

第一节

既不参与反苏叛乱 又不改变陈旧观点

在革命人民热烈欢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刻，普列汉诺夫已经重病在身，孤独地呻吟在彼得格勒郊区皇村的住宅里。在首都出版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都印有这样的标题：“普列汉诺夫的体温高达三十九度”。虽然他仍顽固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接连发表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但是，列宁依旧十分关怀这位早期和中期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晚年误入歧途的老人。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百废待举，列宁工作异常忙碌，可是当得知普列汉诺夫病重的消息后，大约在十一月十二日就委托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布尔什维克谢·伊·古谢夫（一八七四——一九三三年）派人对他表示慰问，并送去了食品和寒衣。

普列汉诺夫在皇村的家里接待过一位不速之客——波·维·

萨文柯夫（一八七九——一九二五年）。他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结识了普列汉诺夫。二月革命后回到了俄国，先后曾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兼彼得格勒军事总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刻骨仇视苏维埃政权，积极策划并参与反革命武装叛乱。十一月十日，克伦斯基从前线召回一部分哥萨克部队，由彼·尼·克拉斯诺夫（一八六九——一九四七年）将军指挥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叛乱，当天就占领了皇村，并向彼得格勒挺进。翌日，以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就在彼得格勒发动士官生叛乱以为策应。大约就在十一月十二日，社会革命党人萨文柯夫以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高级官吏的身分，代表武装叛乱首领克拉斯诺夫将军登门造访，请求普列汉诺夫出面支持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并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后让普列汉诺夫担任政府首脑为诱饵。普列汉诺夫听完萨文柯夫的这些胡言乱语之后十分气愤。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已经献身无产阶级四十年了，即使当它沿着错误的道路前进的时候，我也不会把它击毙，我劝你也不要这样做。”^①他们不听普列汉诺夫的正确规劝，结果在十一月十三日叛乱被扫除之后都当上了苏维埃政权的阶下囚。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却是他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正确的政治态度矛盾结合的体现。这充分说明普列汉诺夫虽然从理论上、路线上极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错误地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尽管暂时取得了胜利，终究是“沿着错误的道路前进”；但是他又不愿意从组织上站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参加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正是普列汉诺夫的非常可贵之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和他长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① 罗·马·普列汉诺娃：《普列汉诺夫与干涉》。普列汉诺夫女儿巴托-普列汉诺娃保存的手稿。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59页。

理论、组织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分不开的。这件事还告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当把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统一起来考察，不能简单地认为：顽固坚持机会主义理论观点的人必然在组织上发展成为反革命分子。对历史人物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必须作具体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最初的反革命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防备新的暴乱。十一月十三日，工人赤卫队遵照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为搜索暗藏的武器而搜查了座落在皇村的富人们的别墅。这天下午四点钟，三个赤卫队员也检查了普列汉诺夫的住宅。他们询问了普列汉诺夫这位体温高达三十九度、病倒在床上的老人。

赤卫队员们问他：“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

“我是一个革命家，四十年来一直献身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这样回答他们。

一位工人说：“不过，现在你已经把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了！”^①一向自信自负的普列汉诺夫并不以为然。

列宁从报上看到普列汉诺夫的家被搜查的消息后，立即委托秘书古谢夫设法确保普列汉诺夫的安全，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皇村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刻采取紧急措施，选派由阿布霍夫斯基工厂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前来守卫普列汉诺夫的住宅，可是他已住进了医院。

列宁在严肃批判普列汉诺夫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又铭记他的历史功绩，在生活上尽量关怀和照顾他，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

^① 见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怀。

普列汉诺娃为了使丈夫早日恢复健康，于十一月十四日雇马车把他送进了皇村医院。第二天又把他送到彼得格勒市瓦西里岛的一家法国医院。鉴于他病情没有起色，普列汉诺娃劝他出国去芬兰治疗，可是他一直表示不愿意去。

在彼得格勒市住院期间，普列汉诺夫继续主持编辑《统一报》。十一月二十五日，《统一报》出版到最后一号，即第一百八十五号时，曾刊出一则启事，说该报因订户数目太少、无法维持而停刊^①。可见通常流行的关于该报是被苏维埃政府封闭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②然而，普列汉诺夫还是不甘寂寞。几经筹划，他又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改名出版了《我们的统一报》，但也只勉强维持一个月又停刊了。他带病看稿，还同编辑部人员商量组稿问题；经他口授，由妻子记录，亲自为该报撰文。他在《我们的统一报》上共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发表的文稿。一篇是纪念性文章《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追述了四十年前、即一八七八年一月八日民粹派分子为俄罗斯的进步诗人涅克拉索夫举行葬礼的情况，文中没有涉及现状；可是另外两篇文章——《仍然在进展！》和《最简单的道理》，再一次暴露了他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首先，他重弹十月革命

① 参见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347页。

② 早在1921年阿扎也夫编辑出版普列汉诺夫最后一年的论著《在祖国的一年》时就说该报是被苏维埃政府封闭的，见该书中文版第467页编者注。美国学者巴伦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一书中也还认为该报是被苏维埃政府封闭的。该书（英文版）第352页写道：普列汉诺夫写的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发表几天之后，《统一报》的进一步发行遭到了禁止。还有两三篇文章登在另外几期的报头，最后革命当局终于使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缄口不语了。”

的胜利将把俄国引向“灾难”的陈词滥调。他说什么：“我们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错误极为痛心，这些错误严重地损害了整个国家，首先主要是损害了无产阶级自己，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向它说明正确的行动方法。”^①其次，他攻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谈到苏维埃政权时，硬说：“他们的专政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是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得不愈来愈频繁地使用恐怖手段。”“使用这些手段是局势不稳的标志，而决不是有力量的标志。无论如何，一般说来，这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②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权、粉碎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下令解散立宪会议，因为立宪会议拒绝批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法令。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对此事攻击说：“它是促使俄国劳动居民发生毁灭性内讧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③他不懂得劳动人民的专政总要在一定的政治集团领导下才能实现。从十月革命初期亿万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奋起斗争的事实，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确是劳动人民的专政，决不能把它说成只是集团的专政。他也不懂得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初阶级斗争必然异常激烈，为了巩固政权必须严厉取缔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活动。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十月讲到：“大家知道，一九〇三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468页。

② 同上书，第484页。

③ 同上书，第483—484页。

家的选举权，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①可惜现在普列汉诺夫把自己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完全置诸脑后了。再次，他继续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他说：“斯莫尔尼的策略是巴枯宁的策略，而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涅恰也夫的策略。”^②这显然是把巴枯宁、涅恰也夫之流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恐怖混为一谈。普列汉诺夫本来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恐怖观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时指出：“有些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时的恐怖行为，或一般地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因遭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围攻而采取的恐怖手段，那末这种人早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③没想到一旦他自己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也转向谴责革命的恐怖主义，这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以正确的革命策略的代表者自居，并表示至死坚持他那套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他在文章中对孟什维克护国派“工人的旗帜”政治俱乐部选举他担任名誉主席深表感激。他还借着俄国各地在他住宅被赤卫队搜查后给他寄来慰问电之事，在文章中炫耀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得到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他写道：“我从俄国各地收到了相当多批评在皇村对我进行的几次粗暴搜查的电报、信件和慰问书。我趁这个机会也对它们的作者们表示感谢。在这些表示同情的函件的作者中间有不少工人团体和整个组织。我敢认为，这些团体和组织也属于工人知识界。从这里我可以作出结论说，相当大一部分俄国觉悟工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65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4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0页。

都赞成我那些受到各方面严厉攻击的策略观点。”^①他幻想他那一套腐朽的理论以后会在俄国变成现实，妄说什么，“我们的街上将来仍然有喜庆的事。”^②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发表于《我们的统一报》的文章中攻击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且在同亲友的谈话中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措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与加强，赢得喘息时机，以便建立军队，恢复经济，苏维埃政府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向一切交战国提出进行和谈的建议，以签订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在遭到英、法两个盟国的拒绝之后，苏维埃政府只好决定单独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起在俄波边界线上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苏俄方面本来是坚持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但因德国方面力量强大，强行占领了大量俄国领土，并提出最后通牒。苏俄政府在生死存亡关头只好被迫签订屈辱的条约。其中规定，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割让给德国，乌克兰变成了德国的附属国，苏维埃政府还要向德国交纳六十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却赢得了时间，用以集中全力加强自己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为粉碎国内外反革命力量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作好准备。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许多人对此事很不理解，甚至坚决反对。有的人是因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妥协策略，有的人是带有狭隘的爱国观念，有的人是基于沙文主义立场。当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的消息传来时，普列汉诺夫正在芬兰的疗养院里治病，他和妻子都为此事伤心。捷依奇回忆道：“在这里应当说，

① 《在祖国的一年》，第467—468页。

② 同上书，第469页。

照我看来，关于我们同他最后几次谈话的情况，是特别使人感到兴趣并有巨大社会意义的。那时格·瓦已经卧床不起，但是仍然同我及妻子罗莎丽娅·马尔科夫娜回忆了往事（这也是很使人感兴趣的），而且还谈到了对当时在我国和西欧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前后的一些事件的看法。以后许多方面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有惊人的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①捷依奇在这里说到的普列汉诺夫对布列斯特和约持的反对态度，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普列汉诺夫站在极端仇视德国的沙文主义立场上，必然不了解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深远意义。至于捷依奇说到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所谓“预见”被“以后许多方面的事实完全证实”，则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强行为普列汉诺夫这一错误立场辩解。布列斯特和约决非卖国之举，乃是爱国、卫国的权宜之计。在和约签订八个月之后，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爆发革命、德国政府作为战败国向英、法等协约国宣布投降之时，苏俄政府当即宣布废除条约，收回失地。历史事实早已做出公断，普列汉诺夫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

据同普列汉诺夫晚年经常在一起的捷依奇回忆，他在垂暮时多次向捷依奇提出自己脑子里反复思考的一个“深深地折磨着他”的问题：“我们在落后的、半亚洲国家的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开始得过早了呢？”^②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八十年代，相隔四十多年，当时马

① 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俄文版，第1—2页。

② 1922年被苏俄政府驱逐出境的前经济派首领库斯柯娃在其发表于1958年《新学刊》上的回忆录《很久以前》一文中曾摘引了这句话。见巴伦前引书，第358页。

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而俄国无产阶级队伍也已日益壮大。这时，在俄国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切合时宜，并不为时过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迟早，而在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生根、抽枝、开花、结果。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正是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等人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俄国的社会实际和阶级状况，为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几经波折，坚韧不拔，终于引导俄国无产阶级争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这是列宁的主要功绩所在。普列汉诺夫不承认列宁为十月革命制定的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反而诬蔑列宁的策略超越了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是“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因此便把这也归结为自己在俄国过早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所致，对自己早期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也产生了怀疑。可见，“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的机会主义观点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达到了颠倒是非、自我否定的地步。

近些年来，在苏联的期刊上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说是普列汉诺夫在临终时已经反悔认错。他们的论据仅仅是引证了一条普列汉诺娃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一件事，即普列汉诺夫在弥留之际对他妻子说过：“是的，在我们所有的共同斗争中，列宁是正确的，而我，普列汉诺夫，则是错误的。”^①他们在引用这句话时从未注明出处，这样我们就无法判明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写

^① 特拉佩兹尼科夫在《苏联历史科学及其发展前景》、明德林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生涯》中都引用了这句话，分别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73年第11期第81页、1979年第10期第113页。

的。即使此话确有根据，这个孤证也难以令人信服。从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现来看，应该说，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至死不变，这倒是更符合实际的。

第二节

溘然病逝 隆重追悼

到二月十日，普列汉诺夫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由妻子陪同，先坐雪橇，后转乘火车，转移到芬兰捷里奥克市的皮特凯雅尔疗养院治疗。虽然卧床不起，体温很高，他每天还要花几小时读书和做笔记。作为一个学者，普列汉诺夫真可谓笃志嗜学，垂死不懈，孜孜矻矻，日以继夜。白天他为继续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而努力，晚上还要妻子为他朗读古希腊的悲剧作品和历史著述。

可是，从三月十八日起，他开始时常咯血，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当他自己已不能看书时，还要提起精神倾听妻子为他朗诵。逝世前六天，他突然从熟睡中苏醒过来，挥手高声说道：

“看来他们不会承认我的贡献，我要显示给他们看看！”^①三天之后他的脸庞被病痛折磨得变了样，当他看到妻子落泪时还镇静地厉声斥责道：“你有什么心事？罗莎，你不感到羞愧！你和我都是老革命者了，我们必须坚强起来。”^②他还安慰妻子说：“到底什么是死呢？就是物质的转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是视死如归的。他把目光转向窗外，继续说道：“你看到那棵柔弱地依偎在松树身边的小白桦了吗？也许有一天我将变成一棵小白桦，这又有什么不好呢？”^③拖到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他终因多年的肺结核病并发心肌梗死，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一岁。普列汉诺

^{①②③} 罗·马·普列汉诺娃：《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岁月》和1918年6月给女儿们的信。转引自巴伦前引书第353—354页。

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逝世，这可以说是适时终结了他的政治悲剧，至少使他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深切地表示哀悼。

苏维埃俄国的首都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迁到了莫斯科。列宁在莫斯科得知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六月四日，在首都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主要议程是政府代表发表动员群众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当会议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宣布开会之后，首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宣布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①。他在简短的讲话中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他属于俄国革命的那些献身者之一，在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斗争。格·瓦·普列汉诺夫经过了‘土地与自由社’，经过了‘土地平分社’，而在一八八三年同自己的最亲近的同志们组织了‘劳动解放社’这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基层组织。不仅没有一个同志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名

^① 因为托洛茨基后来堕落为反党分子，所以长期以来苏联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传记都避而不提由他宣布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和他在会上对普列汉诺夫一生所作的评价。为了弄清他当时代表俄共（布）中央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评价，本书摘译了他讲话的部分内容。顺便指出，苏联学者约夫楚克和库尔巴托娃在其合写的《普列汉诺夫传》一书中，说在6月4日举行的这一次会议上是“担任会议主席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向会议宣布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并提议与会者起立为悼念他而默哀。”（见该书俄文版第334页，参见中译本第108页）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字，而且在我们中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曾学习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正是他证明，俄国革命只能以工人革命运动的形式取得胜利。他领导的团体证实了这点，这个团体力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作为革命阶级运动的基础。我们要学习他这一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的最初最好时期的全部活动的基础就在于此。迄今我们仍然相信这一点。”接着托洛茨基严肃地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悲剧。他说：“在极端重要的时期——革命时期，他拒绝参加工人阶级的运动，对于政治活动家来说，不会有并且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悲剧。普列汉诺夫陷于这种悲剧之中。他不惜以自己的攻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也反对我们所参加的共产党。而我们针锋相对，给予还击。”托洛茨基最后把话题转到继承普列汉诺夫的精神遗产，号召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前进。他说：“现在纪念的普列汉诺夫，不是我们与之作斗争的那个普列汉诺夫，而是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初步常识的普列汉诺夫。他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无数锐利的弓箭，很多能制胜的武器。在同我们的阶级敌人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我们利用了并且今后还将继续利用他精神遗产的最好部分。他逝世了，但是他黄金时期的思想是永存不朽的，正象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不朽一样。他逝世了，而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我们要把同压迫、剥削、谎言和诽谤作进一步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①他要求大家起立为死者默哀。包括列宁在内的“全体与会者象一个人一样，静默无声地站立着。”^②默哀毕，才由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作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

六月五日，普列汉诺夫的灵柩在他的妻子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和他的老朋友捷依奇护送下，从芬兰运回俄国，并在彼得格

^{①②} 见1918年6月5日《真理报》。

勒市的自由经济联合会的大厅里停放数日，有好多群众自发前去瞻仰遗容。

六月五日，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真理报》在第一版左下角显著位置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加黑框的普列汉诺夫逝世的讣告。讣告全文如下：“电报传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及其最著名的领袖和文化工作者之一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逝世于芬兰的噩耗。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著作作为俄国无产阶级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逝者在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作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战争时期处于右翼护国分子首领的地位，并且明显地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

但是，俄国无产阶级铭记不忘逝者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在近期的《真理报》上将发表文章，用以详尽评价逝者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活动。”^①

从这天起，西欧一些国家的报纸开始刊登悼念普列汉诺夫病逝的消息和怀念他的文章。罗·马·普列汉诺娃先后陆续收到俄国和外国发来的许多慰问信和唁电。

六月七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年）署名的悼念普列汉诺夫的长篇文章，标题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②。季诺维也夫详细

① 见1918年6月5日《真理报》。

② 因为季诺维也夫后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所以长期以来苏联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传记都不写他当时发表的悼念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为了弄清他当时代表党中央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评价，本书摘译了该文的要点。

阐述了普列汉诺夫一生所走过的曲折复杂的政治道路，说明死者从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宣扬沙文主义理论，十月革命时期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他指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最后时期给工人阶级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颂扬了死者的历史功绩。他写道：“普列汉诺夫在国际上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杰出的宣传家。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组织者。普列汉诺夫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起草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同整个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同它的最出色的代表者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斗争中的理论领袖。普列汉诺夫是继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后在我国最有文学才干的人物。普列汉诺夫是一整代俄国社会主义青年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宰。”季诺维也夫指明：“从八十年代到一九〇三年，普列汉诺夫被公认为是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季诺维也夫还以自己同普列汉诺夫交往多年的阅历，指出了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取消主义斗争中作出的宝贵贡献。他写道：“从一九〇九年取消主义事件开始出现时起，普列汉诺夫作为老战士活跃起来。资产阶级走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妄想‘取消’社会主义者的工人政党！普列汉诺夫同我们和好。他是地下活动的歌手。他帮助我们在彼得堡创办秘密的《明星报》，在莫斯科创办《思想》杂志。他为当时在巴黎由以列宁为首的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编辑出版的秘密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写稿。笔者在这些年同普列汉诺夫有过特别亲近的交往。我保存有普列汉诺夫那时写的几十封信。我将公布它们，以便使你们，工人同志们，能够看见，老普列汉诺夫怎样善于憎恨和蔑视现在已成为护国主义者的取消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在文章的末尾表示：“我们从老的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如此多的东西，我们如此热爱他，以致于一切独立思考的工人和每

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对他深表怀念”^①。

在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日子，苏维埃俄国国内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苏维埃政府要整顿国内经济秩序，同饥荒作斗争，镇压不断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六月八日捷克军团占领了萨马拉，成立了立宪会议委员会。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正在积极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尽管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当时还处于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严重威胁之中，但是鉴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不朽功勋，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决定为他安排悼念活动。

六月九日举行普列汉诺夫的葬礼。可是安葬的组织工作被他生前主办的《统一报》的同事们所把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治丧机构。他们想利用安葬普列汉诺夫的机会，发洩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诽谤和仇恨。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真诚悼念这位历史上立过功勋的伟大人物的主流和巨流，终于压倒了一小撮居心叵测分子的支流和逆流。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涌来给普列汉诺夫送葬。莫斯科市工厂管理局还派出代表远道赶来参加葬礼。他们高举着黑色横幅，上面写着：“他虽死犹生”（见本书插图）。自发而来为普列汉诺夫送葬的人们越来越多，在离他墓地有七公里的长途，一直是人山人海，护送他的灵柩入土，向他最后告别。普列汉诺夫的遗体根据遗嘱安葬于彼得格勒沃尔科夫陵园，与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坟墓并列。捷依奇回忆说：“从最早的青少年时代直到自己逝世为止，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一直是被称之为我国两位伟大的批评家和政论家（指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引者注）的热情崇拜者。他以特别虔诚的态度对待‘狂热的维萨里昂’（即别林斯基——引者

^① 见1918年6月7日《真理报》。

注)，逝世前还非常感动地对我谈到维萨里昂，并请求把自己埋葬在他的旁边。”^①在普列汉诺夫的墓碑上，遵照他自己的要求，镌刻有他生前十分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的富于哲理的名句：“他已和自然合为一体。”^②这也表明他至死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六月九日晚上，在普列汉诺夫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彼得格勒市召开了有数千群众参加的追悼会。会议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在彼得格勒人民通常集会的人民宫举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党和政府专程从莫斯科来到彼得格勒参加。这时在俄国西北部的这个大城市白夜已经来临。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进会场。尽管室外朗如白昼，热气腾腾，但是室内人们的心却是阴沉冰冷的。圆柱大厅里挤满了工人、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连走廊、通道和楼梯都站满了人。

① 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俄文版，第39页。

② 这是泼西·毕希·雪莱（1792—1821年）于1821年5—6月间为悼念诗人济慈所写的优美动人、哀婉缠绵的挽诗《阿多尼》中的名句。雪莱认为，济慈之死说明“他已和自然合为一体”，在自然界所有的音乐里“从那雷霆的呻吟直到夜晚甜蜜的鸟鸣，都可以听到他的声息；在黑暗中，明光里，从草木到石磧，到处都可以感觉和意识到他的存在，……”。（见《雪莱诗选》，江枫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写的《托尔斯泰和自然》一文中曾经批评了列·托尔斯泰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所以“在他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自己与自然是一体的时候，……才是最强烈地感到了对死的恐怖。”同时他赞扬了雪莱视死如归的精神，说：有一些人“由于某些印象的影响越是鲜明地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一体感，死的念头对于他们就越不可怕。雪莱大概就是这样，那些悼念济慈逝世的深刻的诗句就是他说出的：‘他与自然合而为一了’（He is made one with Nature）。”（《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集，第720页）

卢那察尔斯基宣布追悼会开始^①。乐队低奏波兰音乐家肖邦创作的流行全球的悲壮哀乐。有人潸然泪下，有人低声啜泣。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格·叶·季诺维也夫^②。他指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是在俄国第一个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当时是“工人只有夺得社会主义胜利时才有祖国”的原理的捍卫者。季诺维也夫还严肃指出，孤独死去的普列汉诺夫的悲剧，是第二国际所有代表的共同悲剧——饶勒斯和瓦尔扬所经历的悲剧。接着，卢那察尔斯基充满激情地发表了长篇讲演。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治家、文学家、著名的苏维埃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以普列汉诺夫老战友的身份，追述了死者在八十年代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功勋。他回忆了一九一一年布尔什维克参加纪念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生动情景，指出了普列汉诺夫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享有的崇高威望。他概述了死者一生走过的曲折的政治历程，批判了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惋惜地嗟叹这个最初宣传社会主义的人竟以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他强调指出：“至于对这个反对者，我们无论在当时或在现在，首先是在政治上尊敬这位为俄国社会主义者铸造武器的巨匠，而我们现在就经常在用这个武器来同他及其信徒们作战。”他代表布尔什维克表示要继承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时期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理论遗产。他说：“我们将珍视这一极其贵重的宝藏，但并不是对它奉若神明，而是把它

①②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一书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加里宁“主席宣布追悼会开始”，并说主席致词后，卢那察尔斯基走上讲台讲话，避而不提季诺维也夫（见该书俄文版第5页、中译本第1页）。但是我们查阅1918年6月11日《真理报》第2版登载的关于普列汉诺夫追悼会的报导，事实上是“卢那察尔斯基宣布追悼会开始，季诺维也夫第一个讲话。”

运用到我们的活生生的革命行动中去。我们就是要这样地尊敬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英雄人物，尽管他在逝世前的几年当中曾经脱离了正确的道路。”^①

达·波·梁赞诺夫（一八七〇——一九三八年）以工会的名义讲话，对这位功勋卓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表示沉痛悼念。他说：“普列汉诺夫象列宁一样，对待自己的学说是坦率直言和不讲情面的。”^②他同时也讲到：“普列汉诺夫的新朋友在他的墓前的丑恶表演，使我感到愤慨。”这指的是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的同事们利用普列汉诺夫的葬仪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反苏维埃政权的煽动性演说。

最后，由彼得格勒市市长、工人出身的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米·伊·加里宁（一八七五——一九四六年）讲话。他早在九十年代在彼得堡当镟工时就研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指引他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道路。他忧伤难抑，声调低沉，句句发自肺腑，表达了工人阶级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感激和景仰。他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逝世，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中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在暗无天日的反动时期，在普通工人要以大量劳动和非凡努力才能学到初步文化的时候，在工人小组中就已经流传着出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手笔的地下出版物。这些著作给工人阶级展示了新世界，号召他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工人阶级理想必然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教育他们相信：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不难清除达到这个理想之路上的一切困

^① 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5—6页。

^② 见1918年6月11日《真理报》。

难和障碍。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失败都只是暂时的失败，它将唤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更强有力的进攻。如果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为六十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而出现的，那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则是为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服务的……愿大地使他的英灵得到安息，他为工人阶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向我们这一代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群众灌输了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①

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六月十一日在第二版上刊登了记者十日从彼得格勒发来的题为《悼念普列汉诺夫》的消息，报导了追悼会的情况。

普列汉诺夫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之后，长期以来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主要政敌。他曾经恶毒攻击甚至咒骂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本人，坚决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不计个人恩怨和党派得失，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正面临国内外敌人围攻的紧急时刻，考虑他早期和中期的巨大功绩，如此隆重地为他举行追悼活动，这足以说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胸怀何等宽阔，评价人物何等全面！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事例，理应作为美谈佳话载入史册，它为我们正确对待为人民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过好事的人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第三节

六十多年来对普列汉诺夫的 纪念和研究

普列汉诺夫这个伟大人物，殊勋不朽，遗著犹存。数十年

^① 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6—7页。

来，广大人民不断纪念他的功绩，众多学者深入研究他的思想。

列宁早在一九一四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就把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著作列入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目录，指出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很好的论述”^①。一九一八年八月，也就是普列汉诺夫逝世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列宁就建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通俗的哲学著作。这一年，列宁还签署了一项命令，在首都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为一批伟大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学者、艺术家建立纪念像，供人民瞻仰学习，名单中就有普列汉诺夫。同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著《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书。

一九二一年一月列宁向全党全民发出号召：“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在这句话后边又加了一个注释，其实是提出了具体措施。他写道：“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②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列宁给正在彼得格勒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写信。信中写道：

“我获悉：

（1）雕塑家金茨堡正塑造普列汉诺夫半身像，需要材料，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3页注①。

粘土等等；

(2) 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墓无人经管。

能否就这两点发个命令，让照料一下，催促和检查一下？”^①

在列宁的关怀下，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墓很快被修整一新。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立即批准将把雕塑普列汉诺夫纪念像所需的石膏如数拨给雕塑家伊·雅·金茨堡（一八五九——一九三九年）。同年七月十六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协助建立普列汉诺夫纪念像，并指示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一八七四——一九四九年）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负责筹办。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著名雕塑家金茨堡的辛勤劳动，一尊栩栩如生的普列汉诺夫的纪念像于一九二五年五月竖立在列宁格勒索韦特工学院前。这尊纪念像凝结了苏联无产阶级对普列汉诺夫的敬意和怀念。在此之前，于一九二三年普列汉诺夫逝世五周年之际，把普列汉诺夫年青时参加革命游行所走过的大街，命名为彼得格勒市的普列汉诺夫大街。此外，还用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城镇——普列汉诺沃^②和两所高等学校：他生前学习过的列宁格勒矿业学院以及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经列宁提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出版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议。决议写道：“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帖尔同志商谈，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③

列宁还建议苏维埃政府搜集存在国外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稿、书信和藏书。为此，一九二二年，苏维埃政府委托捷依奇来到巴

^① 《列宁文稿》第8卷，第579页。

^② 位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拉州列宁区，离土拉市6公里，在莫斯拉市正南。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33卷，1955年版第253页。

^③ 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364页。

黎。罗·马·普列汉诺娃在彼得格勒安葬了丈夫之后，就来到巴黎的女儿那里。她把丈夫保存在瑞士日内瓦和苏黎世的文稿、书信和藏书运到了巴黎。她和女儿会见了捷依奇，为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物的重视所感动，无代价地献给了苏维埃政府，保存在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一九二八年苏联政府通过了在列宁格勒建立普列汉诺夫纪念馆的决议，这个纪念馆设在以俄国作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一八二六——一八八九年）命名的国立公共图书馆内，于同年正式开放。这里保存着已搜集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各种档案文件和大量图书资料。罗·马·普列汉诺娃主持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一九三九年^①。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决议，很快得到了落实。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先后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第一卷至第二十四卷。全集原计划编二十六卷，后来未把一九一四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五月最后这三年半发表的文稿包括在内。这部分文稿也是普列汉诺夫论著中的糟粕，所以尽管这部全集并不全，但仍不失为永久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方式，也为广大人民学习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除了出版普列汉诺夫一些名著的单行本之外，还汇编印行了多种普列汉诺夫的文集^②。这些文集一般都附有权威人士写的序言，以便于读者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例如，一九二二年由新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论艺术》，就附有柳·阿克雪里罗得和弗·弗里切（一八

^① 普列汉诺娃于一九三九年休假来到巴黎看望女儿，不久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返回苏联，一九四九年病逝在这里，骨灰被运回列宁格勒，合葬在普列汉诺夫墓地。

^② 关于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的书目，详见我们合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的附录二第一类。

七〇——一九二九年)分别写的两篇有关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文章,作为序言。前者是普列汉诺夫的忘年交,艺术家;后者是著名的苏联文艺学家,一九二二年起领导语言文学研究所,担任《文学百科全书》的主编。他亲自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文集作序,体现了苏联文艺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重视。

一九二五年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刊有达·梁赞诺夫写的序言。这一年,罗·马·普列汉诺娃在莫斯科以精美的珂罗版刊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与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通信集》,编者是巴·阿·别尔林(一八七七——一九六二年)等,他们为通信集做了注释。

在苏联的出版物中还发表过好多普列汉诺夫同时代人写的有关普列汉诺夫的回忆录、论著和传记^①。尤其是原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普列汉诺夫的老战友捷依奇写的多种文稿和编的六卷本《劳动解放社》文献资料集,影响较大。一九二二年,捷依奇写的《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由新莫斯科出版社出版。捷依奇在《序言》中叙述了他以出版此书来悼念老战友的迫切心情。他写道:“我做为死者的最老的同志和战友,不仅认为叙述我在我们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所知道的那些事情,是自己的义务,而且也决心为搜集和出版关于格·瓦·的资料,贡献出我的一切。这本篇幅不大的文集,也就是我的这一意图的一个开端,尽管它实际上只包括两、三年的时间,而且其间还有不少的中断。我希望很快能够出版我关于格·瓦·的以后的回忆录,一直写到他逝世前。”^②捷依奇的这本书是普列汉诺夫逝世后较早

^① 同时代人有关普列汉诺夫的论著的目录,详见我们合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的附录二第三类和第四类。

^② 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俄文版,第1页。

出版的关于他的传记，虽然篇幅较短，但叙述了普列汉诺夫的家庭和童年少年时代，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怎样由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可惜苏联后来并没有继续出版捷依奇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传记。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先后出版了瓦甘尼安写的普列汉诺夫的两本详略不同的传记，一九二四年还在明斯克出版了沃尔弗松写的另一本普列汉诺夫传记。这是苏联学术界人士写的最早的有关普列汉诺夫的本传记，它们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的功绩，但是对他的错误反映和分析不够，甚至同情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普列汉诺夫著作和有关论著、传记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普列汉诺夫，长期以来在苏联一直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二十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股过高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浪潮。这主要是由原先的孟什维克掀起的。一九二二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发表的一封告全世界劳动者书中曾经提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当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这一提法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当即引起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老战友捷依奇和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抗议。他们二人在五月二十日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普列汉诺夫从未成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明，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在声明中他们认为这一提法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不但侮辱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甚至连带侮辱了我们——普列汉诺夫的朋友和同志。”接着他们“切实声明：普列汉诺夫直到盖棺论定时始终是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学说的。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就已接受这一学说，并且矢志不渝地坚持了四十年之久。”^①孟什维克坚决否认普列汉诺夫晚年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他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俄文），1922年第7期。

们要全面肯定普列汉诺夫，这种看法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说他们还只是比较抽象地从理论上全面肯定普列汉诺夫，那末随后以阿·莫·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年）为首的一批学者则是更具体地抬高普列汉诺夫。德波林，从一九〇三年起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七年是孟什维克，他早就很敬佩普列汉诺夫。他于一九一六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前曾请普列汉诺夫为此书写了序言。十月革命后他退出孟什维克，从一九二〇年起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担负教学与研究的工作，一九二二至一九三〇年领导《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一九二八年加入联共（布），一九二九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德波林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为阵地，联合了卡列夫、史登、卢波尔等人，形成了德波林学派。他们于二十年代在批判苏联哲学界出现的机械唯物论派的同时，写了多篇论述普列汉诺夫哲学观点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还在一九二二年第五、六期出版了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号。德波林等人把苏联学术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热潮引向纵深发展。他们在论述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把普列汉诺夫吹捧得过高。德波林在一九二四年发表了《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革命辩证论者列宁》、《列宁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与现代文化》等文，他虽然称颂列宁为“工人阶级的英明领袖”，但又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杰出的理论家和奠基者，他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确切、最完整的论证，他是苏联哲学界和共产党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理论是俄国哲学“传统的顶峰”。德波林甚至贬低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片面强调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对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估价偏低。在德波林的眼中，列宁仅仅是“纠正

了”普列汉诺夫的“几个论点”的哲学家。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发表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代表不同的时代，“普列汉诺夫首先是理论家。列宁首先是实践家、政治家和领袖。两人为发展和深入我们的世界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两位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互相补充的”^①。德波林学派的另一成员卡列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红色教授学院讲师）则改头换面地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代表不同的时代，“而是工人运动中不同的支流”，“表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两种不同深度”^②。德波林学派甚至提出了“为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而斗争”、“捍卫普列汉诺夫的正统思想”的口号。这些抬高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德波林学派在哲学上还宣扬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一九三〇年在联共（布）中央领导下开展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其中包括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无原则吹捧。随即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另外，一九一七年曾任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中央委员的女哲学家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在二十年代积极鼓吹机械论哲学时还援引普列汉诺夫的一些错误言论作为论据。例如，她坚持并袒护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以此来说明人们的认识同客观世界的非相似性，这实际上是宣扬不可知论。还有，普列汉诺夫不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去看待“经验”，认为如果把经验看作是“研究的对象”就是唯物主义，如果把经验看作“认识的手段”就是唯心主义。列宁曾经批评过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糊涂思想”。^③而阿克雪里罗得到二十年代还坚持并袒护普列汉诺夫的“糊涂思想”，大谈特谈经验论；她还和普列汉诺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俄文），1924年第1期。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俄文），1930年第6期。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

夫一样，不把辩证法同认识论结合起来，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科学经验的哲学”。她所鼓吹的机械论哲学在二十年代也受到了批判。在苏联开展反德波林学派时也一并清算了阿克雪里罗得的错误，认为这些人错误的共同根源都在于普列汉诺夫错误思想之中。在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的关于反德波林派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之间“有结成联盟的企图”，“因为机械论者以及德波林派的许多错误的见解，都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错误之中有着共通的根源，而且是畸形地更加深了这些错误（例如阿克雪里罗得、萨拉比扬诺夫、德波林），甚至可以说它在任何方面都丝毫没有理解和接受列宁主义哲学。”^①此外，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人过高评价了普列汉诺夫。例如，安·谢·布勃诺夫（一八八三——一九四〇年）曾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修正列宁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作用》一文^②，有意抬高普列汉诺夫而贬低列宁。

在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和反对布哈林右倾集团的斗争中也涉及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在他关于俄国历史的著作中被指责为完全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历史观并加以发挥。普列汉诺夫曾认为俄国历史的发展不同于西欧而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点，这种专制主义产生于防御外来进攻的必要。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和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一八六八——一九三二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俄国历史与西欧各国历史的发展相一致，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俄国就已进入商

^① 《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关于反德波林派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附录，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4—365页。译文有修改。

^② 见《布尔什维克》（俄文），1925年第1期。

业资本占优势的时代。一九二二年他在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时严厉斥责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理论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并说：“我们必须用最坚决的态度同这种理论作斗争，其猛烈的程度实际上应不亚于我们目前反对宗教偏见。”^①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权威的身分于次年即一九二三年发起了一场对普列汉诺夫历史观的批判。另外，托季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早在一九二四年谈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区别时曾说过：“普列汉诺夫给我们所作出的对辩证法的学院式的解说，是很精采的。但是……要把辩证法应用于革命的斗争，应用于群众运动，应用于社会的发展，应用于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的解放，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就表现出完全无能。而列宁正是在这方面表现为一个真正的天才。”^②这种说法一般说来是可以的，可是后来季诺维也夫因反党活动受到政治批判，他的上述说法也被指责为抹煞普列汉诺夫在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原则错误，季诺维也夫本人也被说成是“德波林的一个著名的孟什维主义论纲‘普列汉诺夫是理论家，列宁是实践家’的合著者”^③。无独有偶。布哈林在一九二四年时强调过列宁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一九三五年他又说：“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同‘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争论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连普列汉诺夫这样卓越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也不能用对‘预见’的理解来代替对行动的理解，甚至连他也无法理解辩证法的这两个因素。列宁同工人运动的实践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从一开始便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并且是在极丰富的基础上继承

① 波克罗夫斯基：《历史科学与阶级斗争》（论文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俄文版，第135页。

②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1926年列宁格勒俄文第2版，第346页。

③ 参见米丁：《辩证唯物论》，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570页。

的。”^①布哈林的这个看法也被批判为“直接重复旧的、被我党和整个斗争历史批判过的”德波林的机会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列宁只是一个实践家，列宁仅仅在实践上、在‘丰富了’的基础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②随着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和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开展，从二十年代末起至三十年代，整个说来苏联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偏低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作品也较少，肯定他的功绩时一带而过，侧重于批判他的错误，大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是“孟什维克化唯心论”，大批“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中的孟什维主义”，甚至有人在报刊上提出了“打倒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滚出去”的极“左”口号^③。

斯大林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发表的文章中，论述到普列汉诺夫的计有十二篇，其中涉及他的过失的有七篇，涉及他的功绩的有两篇，其余三篇兼而有之。斯大林对普列汉诺夫的论述更多的是把他同列宁对比，肯定列宁并指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对普列汉诺夫评价偏低，肯定较少。在三十年代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苏联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普列汉诺夫》（《文学批评家》一九三五年第七期）和罗森塔尔的《普列汉诺夫论美学问题》（《文学批评家》一九三七年第七、九期，后于一九三

① 布哈林：《列宁及其哲学地位》，见《献给弗·伊·列宁》（文集），苏联科学院编，1935年俄文版，第75页。

② 米丁：《哲学战线的初步总结和工作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俄文），1936年第1期。

③ 例如，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主要理论家尔·阿维尔巴赫就发表过题为《打倒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见《在文学岗位上》（俄文），1928年第20—21期。

九年出版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遗产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哲学界的米丁、西脱考夫斯基等则对普列汉诺夫指责甚多。米丁^①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否认普列汉诺夫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起了中间环节作用,否认普列汉诺夫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宝贵贡献。他写道:“一般看来应该说,是结束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时候了,这种历史哲学原理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普列汉诺夫到列宁。这种‘历史哲学’低估了: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从自己最早的一些著作起就已经是唯一的、彻头彻尾的最好意义上的正统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决不经过普列汉诺夫”^②。米丁还说:“列宁的一切重要的基本理论著作,都跟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作品在同一时期问世。而且象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甚至比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还要写完得更早些。”^③西脱考夫斯基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写道:“普列汉诺夫保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是首先不容曲解历史事实,把普列汉诺夫变为列宁的老师。列宁在一八九四年就写成了这样的哲学著作,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这时候,也正就是普列汉诺夫基本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

^① 马·鲍·米丁,1901年生,出身于犹太手艺人之家,1919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俄共(布),1921年进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短期班学习,毕业后在一个纺纱厂做宣传工作,旋又到红军当政委,1925年退伍,进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学习,1929年毕业,从1930年积极批判德波林学派起,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战线的主要领导人。

^② 米丁:《唯物辩证法的首要问题》1936年俄文版,第56页。

^③ 米丁:《辩证唯物论》,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99页。译文有改动。

史观之发展》正在写作的时候。列宁之出现为哲学理论家，是和普列汉诺夫同时并且不依赖于他。”^① 这些论断是牵强附会的。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大十四岁，他于一八八三年发表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时列宁只有十三岁，他发表这部书比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早十一年。列宁确实是从学习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一八八五年出版）等书中得到教益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否认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影响，否认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起了中间环节的作用，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于苏联理论界当时还有人认为普列汉诺夫根本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艺术理论是“孟什维主义的艺术论”^②，这就走得更远了。

总之，先是在二十年代德波林等人抬高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后是三十年代米丁等人贬低普列汉诺夫、抬高列宁。这两者各持一个极端，都不能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各自贡献，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评价。

尽管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评价偏低，但是仍然继续出版了不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体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政领导仍然重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例如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战斗的唯物主义》，一九三四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两卷本，一九三五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列宁格勒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于一九三八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九四〇年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在革

① 博古编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4分册，三联书店版，第1315页。译文有修改。

② 详见本书第十八章第四节。

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一九三四——一九四〇年，莫斯科的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罗·马·普列汉诺娃等人主编的八卷本的《普列汉诺夫遗著》，汇集了珍藏在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国立公共图书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的著作、文稿和书信。这为研究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观点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在四十年代反击德国法西斯进攻的卫国战争时期，为了激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文化巨人的功绩和遗产特别重视，因之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也有所提高。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的讲话中，愤怒地谴责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他说：

“你们看，这就是希特勒党首领们和希特勒统帅部的纲领和指示，这就是一群丧失人性和堕落到野兽地步的人的纲领和指示。”“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①。斯大林在这里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并列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代表，给普列汉诺夫以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一九四三年苏联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纪念了普列汉诺夫逝世二十五周年。六月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纪念会，由普·弗·尤金院士作了题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的报告。联共（布）中央主办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尤金写的纪念文章，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尤金专为纪念而写的附有肖像的专著《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78页。

奇·普列汉诺夫》。

在四十年代，普列汉诺夫的一些名著，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论历史唯物主义》等，都由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单行本。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的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文学与艺术》。

到五十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学者开始清除个人崇拜在学术界的影响。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一百周年的决议。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是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苏联人民隆重纪念。当天在首都莫斯科举行了学术报告会，米丁作了题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的报告。还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听取了德波林作的学术报告——《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舍尔宾娜作的学术报告——《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美学问题》，并展开了讨论。十二月出版的杂志《哲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组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的文章。一九五六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开始出版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后两卷于一九五八年改由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了普列汉诺夫在各个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九十四篇。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各卷分别由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福米娜、恰根、马斯林、约夫楚克、舍尔宾娜写了评述性的序言。苏联还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论宗教和教会》，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两卷本论文集——《文学和美学》。

苏联人民为了纪念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在一九五六年前后出版了许多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著和小册子。其中有：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福米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恰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他在发展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等；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福米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西多罗夫的《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伊林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先锋》、米丁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波梁斯基的《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特罗菲莫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点》等；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西多罗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与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史问题》，等等^①。

苏联学术界从五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热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三十年代形成的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模式有所突破。最引人注目者厥为早先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各执一端的米丁和德波林，这时他们的看法基本上趋于一致，都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大体上比较公正的评论。还有，例如西多罗夫在《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列宁从来都是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即使在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派别活动最激烈的年代里，列宁在指出作为俄国社会民主派领袖的普列汉诺夫的弱点的同时，仍然把他看成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勇敢批评家”^②。西多罗夫认为，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后仍然批判了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写出了受到列宁称赞的较好著作，这方面需要给

^① 苏联学术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成果详见我们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附录二第四、五、六类。据统计，自1931至1955年苏联出版有关普列汉诺夫的著述共34种，1956年普列汉诺夫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年出版42种，自1956至1972年，每年平均出版7至10种。（见塞·哈·巴伦：《普列汉诺夫主义在苏联历史学中重新取得地位》，《俄罗斯评论》（英文）第33卷第4期，1974年10月出版。）

^② 见《哲学问题》（俄文），1956年第6期。

以足够的估价^①。马斯林在为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写的绪论中就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四——一九一三年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捍卫，作了初步的探讨。波梁斯基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一书中，提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俄国经济思想史学家”^②，并且概述了普列汉诺夫的经济理论。

但是从全局看来，五十年代苏联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摆脱三十年代形成的模式。福米娜写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书，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例如，此书只字不提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论证，过低地估价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没有重视普列汉诺夫在欧洲哲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六十年代在苏联学术界提出了重新全面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呼声。一九六七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哲学史及其发展的列宁阶段的迫切问题》的全苏学术讨论会，布鲁道夫在会上提出应该克服“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对普列汉诺夫哲学理论遗产的轻视态度”，更深入更全面地评价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问题。约夫楚克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六十年代又出版了一些研究普列汉诺夫对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论著，主要有：约夫楚克的《普列汉诺夫及其有关哲学史的著作》，瓦·格·秋马钦柯的《普列汉诺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恰根的《普列汉诺夫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鲁扎耶夫的《普列汉诺夫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① 见《哲学问题》（俄文），1956年第6期。

② 波梁斯基：《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7页。

的批判家》，波梁斯基的《普列汉诺夫和俄国经济思想》，布罗维尔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尼科拉也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等。这些论著从各个不同领域更详细地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在理论方面的贡献。

在七十年代，苏联于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出版了三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一卷：普列汉诺夫和他的世界观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第二卷：普列汉诺夫和国际工人运动；第三卷：哲学史、美学史和社会思想史问题。编者：约夫楚克（主编）、库尔巴托娃、恰根。苏联人民于一九七七年在普列汉诺夫的故乡——唐波夫省利彼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建立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

七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生平的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出版了两本篇幅较长的普列汉诺夫传。一本是一九七三年由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恰根和库尔巴托娃；另一本是一九七七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约夫楚克与库尔巴托娃。这是迄今为止苏联出版的最详细的一本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传记。这两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学术界缺少普列汉诺夫传记的空白，也表明苏联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正在深入。这两本传记挖掘了一些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认为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采取了动摇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特殊立场”，承认普列汉诺夫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但这两本传记都未能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观点给予全面的系统的评价，对于史料的考证和运用，还存在着一些差错（这在本书有关部分已经分别指出）。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苏联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中，充分肯定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是必要的，但有些人又走上了二十年代德波林走过的老路，过高地评价普列汉诺夫，这就必然背离实际，得出荒谬的结论。如，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在参加反对布尔什

维克的派别斗争时，普列汉诺夫始终保持了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①。还有的人竟不顾历史事实，硬说什么，“对普列汉诺夫个人来说，同一切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是他整个一生的事业”^②。

回顾从普列汉诺夫逝世至今的长达六十余年的历史，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苏联对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出版，时多时少；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时热时冷；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时高时低。但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思想：苏联人民在经常怀念普列汉诺夫的功绩，继承和发扬普列汉诺夫的历史遗产。它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人民事业作过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把他忘记的。

普列汉诺夫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的优秀著作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瑰宝。所以，在他一九一八年逝世以后，不仅苏维埃俄国人民不断纪念他的历史功勋，世界各国人民也经常缅怀他对世界无产阶级作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事迹和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专节评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人日渐增多，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先后出现了两次热潮：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另一次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以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为起点，到一九五八年，

① 见罗森塔尔、尤金主编：《哲学辞典》1963年俄文版有关“普列汉诺夫”的条目。

② 弗·布斯塔尔纳科夫：《三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哲学问题》（俄文），1975年第6期。

据我们初步统计，我国报刊上共发表了二十六篇评述普列汉诺夫哲学观点和文艺思想的文章。这包括：翻译了列宁于一九〇八年五月以后写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札记》和八位苏联学者写的十三篇文章，十二篇我国学者撰写的文章。

在六十年代，我国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同五十年代相比，有所削弱。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出版了陈启能同志写的《普列汉诺夫》，它通俗简明地概述了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活动，分析了从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这个时期，我国学者共发表了四篇研究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文章、两篇评述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观点及其演变的文章、一篇分析普列汉诺夫在辩证法方面的弱点的文章，对普列汉诺夫功过的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挖掘。由于联系当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多数文稿偏重于剖析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对他的整个评价也偏低，甚至给他戴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据我们查阅，列宁只说过他“维护修正主义”^①，“保护我们土地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者（指马斯洛夫——引者注）的天使”^②，而从来没有戟指普列汉诺夫是“修正主义者”。因为他当时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不是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到林彪一伙横行时期，更是尽情贬抑普列汉诺夫，还制造了所谓普列汉诺夫事件，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十八章第二节中还要专门评述。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学术界从此重新开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

发,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普列汉诺夫这个政治上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哲学工作者、史学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所注视的中心之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底,经初步统计,我国学术工作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普列汉诺夫的文稿多达九十九篇^①,等于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七年我国学术工作者发表的有关这方面文稿数目(十九篇)的五倍多。文章涉及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活动的各个方面。有的评论他一生思想发展过程和是非功过,有的分析他的哲学观点,有的阐述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有的论述他在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同以前相比,对问题的研究有所加深,文章的质量有所提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所突破。有的同志提出对普列汉诺夫这个历史人物应当重新评价,纵观一生,功大于过。这个看法许多人认为比较公正。有些同志冲破对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的传统看法的束缚,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些同志对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看法未必稳妥,但是不囿旧说,则是有利于弄清是非的。对普列汉诺夫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功利主义艺术观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学术队伍来看,除了有研究多年的老专家外,还有不少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术工作者。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今后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世界上其他好些国家,也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著作,对普列汉诺夫这个历史人物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保加利亚,格奥尔基·巴卡洛夫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在保

^① 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物中有关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成果,详见我们合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附录四。

加利亚共产党的刊物《新道路》上，发表了论述普列汉诺夫对保加利亚人民革命斗争影响的文章《普列汉诺夫在保加利亚》，随后撰写了几篇回忆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章。他于一九二八年将普列汉诺夫给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几封信献给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一九七八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出版了安格尔·维科夫写的学术专著《普列汉诺夫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本著作充分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对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之前对保加利亚人民革命斗争影响最大、在革命人民心目中威信最高的一个人物。在波兰，一九七〇年华沙以波兰文出版了卢卡弗斯基写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内容比较丰富。在南斯拉夫，一九五七年萨格勒布文化出版社以塞尔维亚文出版了佩特洛维奇著《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九六一年萨格勒布前进出版社出版的弗兰尼茨基著《马克思主义史》，普列汉诺夫列有专章。在日本，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藏原惟人、昇曙梦、外村史郎、川内唯彦、平林初之辅、岡泽秀虎等人把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译为日文出版，或者发表了研究普列汉诺夫学术思想的著述。一九七三年日本大月书店还发行了内村有三译的普列汉诺夫名著《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书后附有普列汉诺夫小传和译者注八十六条。西方也不断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例如由普列汉诺夫的女儿巴托-普列汉诺娃翻译的《俄国社会史导论》于一九二六年作为法国斯拉夫研究所历史丛书第三册在巴黎出版法文本。随后还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三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法文本，书中附有富于启发性的长篇导言。一九三八年纽约出版了此书的英译本。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于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后于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重版，又于一九二九年在伦敦出版了埃·保尔和斯·保尔的英译本。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五三年伦敦出版了他的名

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书名改为《保卫唯物主义》）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英译本。他的名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英译本于一九四〇年分别由伦敦的劳伦斯与韦沙特书店和纽约的国际出版社出版。战后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还多次在英、美、法等国重版。西方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成果也颇多。一九四八年纽约出版了伯·沃尔夫著《三个人实现了一场革命》，书中把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托洛茨基三人并列为俄国革命的创始人。一九五四年纽约出版了艾·多伊彻著《权威的预言家》，一九五五年波士顿出版了西德尼·胡克著《历史上的英雄》，一九五八年法国《思想》杂志发表了卡韦安写的《哲学战士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一九六〇年伦敦出版了弗·文图里的《革命创始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塞缪尔·哈谢尔·巴伦（1921年出生）要算是西方研究普列汉诺夫成果最多者。他从1953年以来就在《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俄罗斯评论》、《思想史季刊》、《苏联研究》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过多篇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尤其是一九六三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他所著《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一书，长达四百页，这是西方出版的内容最充实的一本普列汉诺夫传记。在写作这本传记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英文和俄文资料，还于一九五九年走访了居住在巴黎的普列汉诺夫的三女欧·格·巴托-普列汉诺娃，使用了她所保存而未曾发表的手稿、书信和照片。英国和美国的研究生甚至有人以普列汉诺夫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不过，一般说来，好多西方的研究者侧重从纯学术角度研究普列汉诺夫，^⑧很少联系当时国际和俄国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的实际；有的人倾向于支持孟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评价过高，指责布尔什维克不讲民主；还有个别人基于反共立场，更是不可能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至于从苏联逃出或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克伦斯基、司徒卢威、库斯柯娃和孟什维

克头目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唐恩等人，多年来更是在西方发表了许多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辩护的论著和资料^①。对此我们应该有分析地加以批判。

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随着未来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今后世界各国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对普列汉诺夫的功过能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

^① 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都有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学位论文存稿。西方研究普列汉诺夫的论著目录详见我们合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附录二第四、五、六类。

第十七章

瑕不掩瑜 寻根究源

第一节

纵观一生 功大于过

普列汉诺夫的一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政治道路。他以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而闻名于世，又以臭名昭著的社会沙文主义首领、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军师而结束一生。要对这样一个在政治风云中多变的历史人物作出准确、公正的评价，首先就必须把他一生的政治生涯科学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从中看出他在各个阶段的变化，然后纵观一生，评定功过。

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究竟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呢？学术界有三种看法，即三段论、四段论和我们现在提出的五段论。

传统看法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八七五——一八八三年为民粹主义者，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三——一九一八年为机会主义者。这种划分是源于列宁的某些评论。例如，列宁说过：“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

的。在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但是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①。又说：“自一九〇三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多次表现了他的毫无政治气节和投靠机会主义者的典型”^②。列宁虽然没有明确地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但是曾经以一八八三年和一九〇三年为界碑来划分他的历史。较早提出三段划分法的是苏联学者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普列汉诺夫”条目。^③我国学术界大多也持此说。这种划分法从基本方面反映了普列汉诺夫一生思想的重大变化，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如果要对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三年以后的思想和活动的细微变化进一步作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它就显得不够了。

学术界还有人把普列汉诺夫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民粹主义阶段（一八七六——一八八三年），马克思主义阶段（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孟什维主义阶段（一九〇三——一九一四年），社会沙文主义阶段（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④。这种划分比三阶段论进了一步，即把一九〇三年以后又具体分为两个阶段（孟什维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划分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普列汉诺夫一生复杂多变的曲折历程。

与其划分为四阶段，不如划分为五阶段。我们的看法：第一阶段是民粹主义（一八七五——一八八三年），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第三阶段是孟什维主义（一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3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2页。

③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5—546页。

④ 见《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出版说明和陈忠雄：《试论普列汉诺夫》，《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九〇三——一九〇八年），第四阶段是反取消主义（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第五阶段是社会沙文主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我们认为，只有把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划分出来，才更便于看清他复杂曲折的细致变化，从而对他的功过作出准确公正的评价。

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的第一阶段——民粹主义阶段，是应该肯定的。当时俄国工人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马克思主义尚未开始传播。民粹主义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民粹派却是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残余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普列汉诺夫以青年大学生的身分，积极投身于“到民间去”的革命活动。他不惜牺牲学业，旋被开除出校，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后建立并领导了民粹派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与“土地平分社”，在工农中四处奔波，并且开始执笔战斗。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首都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由他组织并领导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揭开了他献身工人运动的光荣斗争史的第一篇章。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期间，他废寝忘食，甘冒风险，曾三次被捕，两次流亡国外。这一阶段，他应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载入史册。

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的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阶段，先后达二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最光辉的黄金时代。这个阶段他在以下五个方面为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第一，他创立了并且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并且基本上粉碎了民粹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开创了基地。第二，他第一个在俄国有组织有领导地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俄国一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愧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奠基人和宣传家。第三，他和列宁一起创办了无产阶级报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草拟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

的党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主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孟什维克，并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他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第四，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参加了第二国际从创立到破产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活动，从一九〇〇年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起，长期担任执行局委员，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在第二国际中经常提出并坚持正确的主张。第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第一个最早起来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接着又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变种——米勒兰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他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在这个阶段他也有好些缺点和错误。

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的第三阶段——孟什维主义阶段，这是他堕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开始。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起他因害怕党的分裂而转向孟什维克一边，随即鼓吹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在土地纲领和对杜马的策略等问题上坚持机会主义观点，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进而抛出“分进合击”的机会主义策略，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责备无产阶级“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

过去往往有这样一种看法：一个人陷入机会主义泥潭后总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一沉到底。这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逾越、一成不变的规律。实际上这是形而上学的凝固化、绝对化的观点。历史的万花筒呈现出各色各样变幻无穷的人物。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重要的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三年底转向孟什维克一边后，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去不复返地完全倒过去，而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独特的立场，同孟什维克时密时疏，若即若离，甚至有好几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一九〇四年他表示不同意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向沙皇政府摇

尾乞怜的只求实行地方自治运动的方案；一九〇五年春天他同孟什维克闹翻了，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独自另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主张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之后，他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出面揭露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的妥协性和局限性；一九〇七年上半年，他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反对过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一九〇七年下半年他独自一人坚持要在国外创办秘密的党的机关报，遭到其他孟什维克的坚决反对。正由于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三——一九〇七年有好几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所以从一九〇八年以后他又一度完全同孟什维克闹翻并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就决非是偶然而不可理解的事。

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的第四阶段——反取消主义阶段。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黑暗的俄国大地；以唐恩、波特列索夫为代表的大部分孟什维克，屈服于反动阶级的压力并适应其需要，堕落为在政治上妄图取消革命、在组织上妄图取消党的“取消派”。这时，孟什维克以至布尔什维克中的马赫主义者，宣扬修正主义哲学，企图摧毁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政治动摇、思想混乱、组织瓦解的严重危机。在这紧要关头，普列汉诺夫毅然决然退出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他恢复《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新办《护党报》，还为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撰稿，写出多篇反对取消主义的雄文。他还在批判俄国马赫主义、寻神主义、造神主义的斗争中撰写了许多杰出的哲学论著和文学艺术论著。总之，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建立了重大功勋。列宁在一九一四年指出：“亚·波格丹诺夫早就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的姿态出现，来维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由于这个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早在若干年以前就认为反对波格丹诺夫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①列宁类似的说法还有多处。可见，列宁把反对取消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看成是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反对取消主义阶段应该作为普列汉诺夫一生中一个独立的阶段加以肯定。

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的第五阶段——社会沙文主义阶段。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同取消派已经同流合污，战争爆发后他充分暴露了沙文主义面目，号召俄国工人“保卫祖国”，公开为沙俄政府的掠夺战争辩护。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仍然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他还以条件不成熟为依据，坚持“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是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

纵观普列汉诺夫一生五个阶段，三个阶段表现好，计有三十四年之长；两个阶段表现坏，共约八年时间。波澜起伏，回流宛转，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在四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革命家的气概和理论家的素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革命民粹派分子遭受沙皇专制政府的残酷迫害之时，其中一部分人妥协投降了，变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另一部分人铤而走险，继续搞个人恐怖；或者坚持民粹主义错误观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顽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时普列汉诺夫犹如鹤立鸡群，从民粹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率先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第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80页。

主义团体的主将，第一个反击民粹主义的先锋。到十九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逆流，马克思主义横遭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所谓危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得、拉法格等对修正主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未能马上起来回击。在这个转折关头，普列汉诺夫带头起来第一个向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开火，旗帜鲜明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回击了修正主义的进攻，接连又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变种——米勒兰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遇到了思想分离、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危机。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普列汉诺夫站在列宁一边，与列宁并肩战斗，挽救并重建了党，成为党的正式领袖。一九〇八年，在俄国第一次革命遭受失败，党遭到严重摧残，党内动摇、消沉、叛变成风的严重时刻，普列汉诺夫基本上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同布尔什维克建立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取消派，批判马赫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保护了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同时也要看到，在另外四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普列汉诺夫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严重失足，逐步陷入机会主义泥潭。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蓄意要分裂党的关键时刻，他竟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助“孟”为虐，这是他失足的起点；及至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后，他进而抛出机会主义策略路线，危害革命匪浅，起义失败后又给革命群众泼冷水。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考验。普列汉诺夫终于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转向沙文主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后，如何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他暴露出迂腐的教条主义的面目，顽固坚持腐朽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坚决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到逝世。

普列汉诺夫的一生就是这样复杂多变，功过掺和。盖棺论定，如何准确而公正地对他进行评价，这需要细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具体分析。历史上一贯有益于人民的正面人物和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面人物，易于判明。难的是功过掺和、瑕瑜互见的大量复杂人物。然而，就是功过掺和、瑕瑜互见的人物，对其前期和后期、正确和错误进行全面综合、具体分析时，基本上不外如下三种情况：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有的人大体上功过参半。从普列汉诺夫一生的五个阶段可以看出，他是前功卓著，中期反复，晚节不终。对他既不能象西方和某些苏联学者那样，鼓吹“前功卓著不计过”；也不能象我国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样，宣扬“晚节不终全勾消”。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政治活动和学术成就综合起来衡量，应该说他是功大于过，理应作为犯过严重错误的正面的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就其功绩而言，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横观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学术成就，可谓精深博大，硕果累累。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对宗教学、伦理学、人种学等，也都有研究。他的学问可谓纵贯千古，横通百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象他这样学识渊博、著述众多的人物可谓寥寥无几。

普列汉诺夫是在恩格斯晚期、列宁前期进行活动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介于恩格斯与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他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之下理论上贡献最多最大的人物之一。

他和列宁以外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人物相比，理论上站得更高，贡献也更大。在国内，“劳动解放社”的其他四位成员的历史地位都不及他。其中伊格纳托夫早于一八八五年病故。查苏利奇和捷依奇可以说大体上是功过参半。这两个人前期的贡献不如普列汉诺夫大，而后期的错误又比他重。他们与普列汉诺夫一

样，都是孟什维克、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反对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但是，他们又是取消派的骨干，而普列汉诺夫却反对过取消派。查苏利奇死于一九一九年，比普列汉诺夫晚死一年，与普列汉诺夫葬在一个陵园。捷依奇晚年脱离政治，但参与了编辑、出版普列汉诺夫遗著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后成为领养老金者，著述回忆录之类，死于一九四一年。“劳动解放社”的另一个骨干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是过大于功。他不仅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且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恶毒攻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鼓吹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一九二八年死于柏林。晚年的罪过盖过了前期的功绩。至于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波特烈索夫、唐恩等人也是无法与普列汉诺夫的贡献相比。马尔托夫主要以组织才能见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倾向于国际主义，这一点比普列汉诺夫好些。但他曾是取消派首领，也顽固反对十月革命，一九二〇年以后侨居柏林，办刊物进行反苏活动。波特烈索夫、唐恩也都是取消派首领、社会沙文主义者。前者在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为克伦斯基主办的《白日》周刊撰稿，攻击苏俄；后者于一九二二年初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死敌被驱逐出国。

在国际上，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在其它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上。如前所述，恩格斯曾经称赞普列汉诺夫的才能“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还把普列汉诺夫和梅林作为“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后起之秀。后来的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表现远不及拉法格和梅林（他们是左派，普列汉诺夫则堕落为右派），然而在理论上的贡献却超过他们，更是远远超过拉萨尔。而政治上的表现则没有拉萨尔坏（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因理论上失足而在政治上犯错误，拉萨尔则是自觉投靠俾斯麦）。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超过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考茨基略高一

筹。他还没有象考茨基那样走到反苏维埃政权的地步。总的看来，在理论上他的贡献高于拉萨尔、拉法格、梅林、考茨基，而在政治上则是介于拉法格、梅林与拉萨尔、考茨基之间。列宁在一九一一年时还认定普列汉诺夫“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唯物主义”^①。除了极其景仰马克思、恩格斯之外，列宁从来没有对其他人给予过这么高的评价。

在我们中国，人们往往把普列汉诺夫同陈独秀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两个确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②这里概括地讲到了普列汉诺夫同陈独秀有三个一样：一样做了启蒙工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变成了孟什维克。我们还可以补充的有：他们都一样冲破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阻力，走上了革命道路，都一样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都一样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过斗争；都一样以他们的雄文健笔深刻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都一样领导党和人民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另外，他们都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不认识农民占多数的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之路的特点，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都一样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害；都一样老大自居，刚愎自用，拒不接受批评；都一样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58页。

② 《‘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政权而终其一生。但是，细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普列汉诺夫理论水平 and 学术成就高于陈独秀，功也大于陈独秀，而过又不及陈独秀。不仅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分量远远超过陈独秀，而且普列汉诺夫在许多学术领域的造诣和贡献也都远超过陈独秀。普列汉诺夫有好几部传世的佳作和巨著，陈独秀实难与之媲美。就对本国工人运动的作用和功绩而言，他也都在陈独秀之上。陈独秀的活动舞台主要限于中国，他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的活动舞台遍于欧洲，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错误文章，危害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和十月革命；而陈独秀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节节退让，给热火朝天的工农革命运动大泼冷水，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致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领导权，把广大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淹没于血泊之中。在一九二七年七月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进而由右倾投降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主张取消革命，力图把党引上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争，并与托洛茨基分子勾结，组成反党小集团。一九二九年他被开除出党后，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基本国策。

总之，把普列汉诺夫与其同时代的以及相似的人物作比较，可以看出：他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仍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论家。

第二节

攀登马克思主义高峰的条件

有哪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促使普列汉诺夫能够攀登马克思主

义科学的高峰呢？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以供后人学习和借鉴。现在把我们的初步看法提供探讨。

第一，他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能靠朴素的感情和虔诚的信念就能掌握它。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是包括好多学科的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理论。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普列汉诺夫早在二十岁之前的学生阶段就贪婪地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广泛阅读各种课内和课外的读物，除俄语外还掌握了法语和德语两种外国语。这为他后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及文学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为他直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八八〇年他流亡西欧之后，仍然十分注意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住在日内瓦和巴黎时，经常听一些教授和专家作人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的学术讲演。还学习了英文和多种斯拉夫文，在他的藏书中竟有十八种语言文字的书籍。当然，他把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刻苦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上，甚至亲自动手翻译、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基本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这促使他比较牢固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当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便于他日后能够披坚执锐，得心应手，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战斗并研究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建树的丰碑，而忽视了他为这丰碑打下的坚实而广阔的地基。关于丰碑和地基的内在本质联系是要充分估计到的。

第二，一个人要能为工农和人民大众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还必须要有热爱人民的思想，服从各个时期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普列汉诺夫在学生时期最初本来也是为了想当军官和工程师、求个人的发迹而学习。后来日益感到在专制制度下陷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工农大众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进行解放斗争，乃放弃了学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和联系中更坚定了他的革命志向。他从革命的工人群众中吸取力量，从工人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受到教育。他在一九〇四年回忆说：“作为过去的‘劳动解放社’的奠基人，我十分肯定地认为，如果说我们这些过去的‘土地平分社’成员从民粹主义过渡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我这个在‘劳动解放社’生命史上起过某种作用的人，在我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并且属于‘土地和自由’组织时，主要是‘同工人们打交道’的。我深信，正是通过这些‘打交道’所取得的经验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打好了基础。”^①与工人的直接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的根本转变。他在晚年曾经讲到：“就我的出身来说，我可能属于压迫者，我可能属于‘寻欢作乐、游手好闲，双手沾满鲜血’之类的人。我之所以转到被压迫者的阵营，是因为我热爱受苦受难的俄国群众，是因为我热爱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②的确，按其家庭出身而言，他可能继承其父兄的事业，成为一名沙皇政府宠信的军官。然而正是由于他对人民大众具有真挚的感情，所以他转向积极参加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

他在一九一七年还回顾道：“凡是了解我的政治活动史的人都知道，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即从‘劳动解放社’建立开始，这种活动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思想，即一般说来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③自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认识到无产阶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119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第5页。

③ 同上书，第462—463页。

级的历史使命之后，就矢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革命活动都是适应各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直接需要而进行的。他深入研究欧洲哲学史和文学艺术理论等，也是适应人民斗争在理论上的需要。可以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是他智慧的根本动力。

第三，人是环境的产物。普列汉诺夫一生最光辉的岁月是在西欧度过的。他在理论上的重大成就是他一八八〇年流亡西欧之后在西欧生活、工作三十多年的结晶。他接受了西欧古代和近代文化的宝贵遗产，饱吸了西欧文化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的雨露甘泉，参加了西欧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同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领袖以及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包括很多报刊、出版社、图书馆）等等都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原来就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进步文化的熏陶，再加上西欧所提供的所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就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真使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文化和理论素养，而且还能受到美的教育。他能带领我们观赏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漫游古罗马富丽堂皇的神庙和雄伟壮观的竞技场，饱览陈列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法国艺术杰作的画廊，欣赏多种民族别具一格的音乐和舞蹈，倾听从普希金到歌德、雪莱的名诗佳句，更重要的是学习欧洲各个哲学家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光辉思想，聆听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切教诲。钟灵毓秀，没有西欧文化的肥田沃土，结不出普列汉诺夫著述的丰硕成果。在他的论著中，即便是纵溯原始社会，横引五洲习俗，主要也都是从当时西欧学者研究历史、研究世界的产品中吸取了营养。由于他的西欧文化根底深，所以执笔时能够左右逢源，采英拮华，融内外古今于一炉，文章写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优秀著作立论高超，旁征博引，说理透辟，富有文采；而非空洞议论，或者堆积材料。

第四，普列汉诺夫能够攀登马克思主义高峰的重要条件在于

他一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勤奋努力，孜孜不倦，而且周密筹划，严于律己，一丝不苟，持之以恒。他早在参加民粹派活动时期就曾经三次被捕，两次流亡国外。为了逃避警察的搜捕，不得不四处躲藏，经常忍饥受饿，面黄饥瘦，衣衫褴褛。专制政府的迫害，物质生活的艰难，没有动摇他推翻沙皇制度的决心。一八八〇年他第二次被迫流亡国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一八八〇年他全家住在瑞士时没钱买面包，只好在食品店里赊欠。一八八一年他全家住在法国巴黎时，为了挣钱糊口，不得不给一家药品商店写信封。一八八九年他被瑞士政府驱逐，一八九四年又被法国政府驱逐，但这并未减弱他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五年《论一元论史观之发展》出版之前，全家生活十分困难，衣服破旧，饮食单调，时常挨饿。但是贫贱不能移，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理想未曾动摇过。他身体本来欠佳，三十岁又得了肺结核病，长期不愈，时常被迫全休疗养，但这并未能阻止他勤奋地学习与写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经常激励着他。他认为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要争分夺秒利用一切时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善于从直接接触的实际生活学习。他小时候父亲的教诲“活着永勉力，死去方休息”也鞭策他自强不息。他在一九〇五年深有体会地写道：“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只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只要利用一分一秒的空闲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不知不觉的空闲有时即使最忙碌的‘实际工作者’也是有不少的，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实际工作者’‘实际上’都在利用自己的不知不觉的空闲。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有时（毋需隐瞒）理论工作者也爱‘聊天’，天晓得有多少宝贵的光阴消耗在无穷无尽的全俄的聊天中！”“不仅可以从书本学习。实际工作者直接接触的生活本身就是学习，而且是了不起的学习！但是生活是用自己特殊的语言说话的，这种语言如果没有理论的帮助，常常是无法了解的，光

凭这一点每一个实际工作者道义上都必须获得理论上的修养。著名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永远记住这句金玉良言。”^①他说的这段话非常诚恳、亲切、切中要害，这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的热切期望，也是对他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自己一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总是尽力与敌人、与困难、与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自强不息，从不懈怠，认真作好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的集会，坚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勤奋写作，挥笔疾书。他曾经对给他治过病的一位医生谈过：“在体温四十度的时候，应该找轻松的、不使脑筋疲倦的工作做，在人种学、绘画史、音乐方面可以阅读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即希腊三大悲剧家——引者注）的作品。在体温三十九度、三十八度半的时候，可以研究更复杂的问题：历史问题，文学批评；而在体温三十八度的时候，我能够‘尽全力’工作”^②。他的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就是在高烧四十度的情况下写完最后热烈争论的那个部分。经常到他家作客的一位朋友费多钦科回忆说：“尽管普列汉诺夫经常要同人们交往，但是在他全部生活安排和生活方式之中仍然纪律严明，井然有序。他每天从不虚度片刻时光，每天都妥为安排，连每个小时都排满一定内容。即便是午休时间，只要他没有生病，就从不卧床休息。在午饭之后，就可以看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家对面的大学小公园的林荫道上散步，边走边读小说，多半是法文小说。在这个时间里，普列汉诺夫喜欢读的是莫泊桑或者埃·左拉的作品”，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60页。

② 波·亚·奇列诺夫：《普列汉诺夫回忆录》，转引自福明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译文有修改。

“俄国知识分子的散漫松懈和他们的‘夸夸其谈’，向来使他怒形于色”^①。直到临终病重时，他还勉力坚持读书和写作。凭着他一生分秒必争的勤劳，才能给我们留下卷帙浩繁的丰富理论和文化遗产。

以上就是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能够攀登马克思主义科学高峰的客观和主观诸条件。

第三节

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原因

象普列汉诺夫这样能够攀登马克思主义高峰的学识渊博的理论家，为什么会深深陷入机会主义泥潭呢？这些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引以为戒。

第一，普列汉诺夫在西欧活动的年代正值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亦即工人运动由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过渡到直接爆发革命的时期。在这历史转折时期，一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由于不认识时代的变化和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革命斗争形式的变化，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把马克思、恩格斯过去的某些论述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削足适履到处生搬硬套，终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在这个时期，适应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需要，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为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而且变成为具有统一色彩的国际现象。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

^① 拉·费多欲科：《格·瓦·普列汉诺夫》，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俄文版，第110页。这句话里的“夸夸其谈”一词在中译文中被译为“忏悔”（见中译本第133页），这样就很费解。俄文 Исповедь 是个多义词，通常当“忏悔”解，又当“夸夸其谈”解。

会产物。”^①普列汉诺夫早先曾经挺身而出，出色地批判过这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然而由于他食古不化，教条主义十足，不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来解决新时代的任务，所以最终不免自己也陷入机会主义泥潭，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列宁指出过：“普列汉诺夫看来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却向我们表明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恶劣最狡猾的教条主义者的典型，他是很惬意地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②长期生活在近代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西欧，这本来是普列汉诺夫得以攀登马克思主义高峰的极其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二重性。由于他认识不到应该如何抵制其不利一面的影响，终于酿成悲剧。列宁也在西欧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他从二十世纪初起就逐步认识到时代在发生变化，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形式也随之在发生变化，所以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相结合。到一九一六年，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写成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而普列汉诺夫直到晚年也还附和考茨基的观点，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工业资本的一种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特殊阶段。他不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自然也就拘守和平发展时期老一套的路线方针。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把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说：这种人“在理论上很强，但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③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2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9页。

第二，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普列汉诺夫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早期参加工农的实际斗争帮助他树立了热爱人民的思想。可是自从一八八〇年流亡国外之后，他脱离俄国实际和工农群众长达三十七年之久。在西欧，他与西欧工人运动也极少直接的联系，主要是闭门读书，悉心研究，埋头写作。所以他虽然在比较抽象的纯理论的领域作出杰出的贡献，而却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他在一九〇三年成为孟什维克之后，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能够作出卓越的贡献，但一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就不免跌斛斗。例如：当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实际问题摆在他面前，需要回答时，他就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抛出了机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一九一四年列宁在论及普列汉诺夫思想上的一个特点是只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错误，而看不到自己的大错误时，深刻指出：“最近十年来，即在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这种特点了。”^①

普列汉诺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如果他思想上重视实际、重视群众的话，那还是可以尽量得到弥补的，例如还可以通过通信尽可能从俄国了解实际情况，还可以通过热情地接待国内来客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并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可是普列汉诺夫由于世界观上的缺陷，嗜好理论与历史的研究，过分自信个人的创造力，轻视实际与群众，结果同实际和群众越来越隔绝。列宁在国外时是多么渴望得到从国内带来的各种消息，他时常因来自国内的通信激动得通宵难以入眠，因同国内来访者亲切攀谈而废寝忘食。而普列汉诺夫则完全两样。克鲁普斯卡娅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82页。

说：“我试着把通讯和信件拿给普列汉诺夫看，他对这些通讯和信件的反应使我惊奇：他好象失去了立足之地似的，在他脸上表现出一种不相信的神色，后来他从没有谈到过有关这些通讯和信件的事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从俄国寄来的信件尤其不信任了。”“起初这甚至使我觉得有些不快，后来才明白这是由于他离开俄国太久”^①。当时到国外来的人是很难见到普列汉诺夫的，即便见到，他也“经常象一个显赫的将军和富有的贵族那对待年轻的同志”^②。所以尽管工人们敬佩他的才华、知识和机智，“但是不知为什么，工人们离开普列汉诺夫时，只是感到自己与这位出色的理论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的心事，他们想谈出来跟他研究的问题终于没能谈出来。”^③高尔基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普列汉诺夫在国外侨居时如何拒绝会见俄国的侨民。文中这样写道：“他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不想见当地移民中的任何人。伊里奇却会见了他们全体。普列汉诺夫从没有问起什么。所有事情他都早已知道，他自己可以告诉你关于它们的一切。有俄国式的广博的才能，再加上受过欧洲教育，喜欢炫耀他的机智；显然祇为了一个恶毒的戏谑，他不惜强调外国的或俄国的同志的弱点。”“照例他待人傲慢，仿佛一尊天神一般。”“他身上‘贵族’气味太重。”^④高尔基还引述了一个工人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截然不同的印象。这个工人感到：“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第三，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也促使普列汉诺夫越来越陷入机会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45页。

② 参见《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69年俄文版，第182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45页。

④ 《和列宁相处的日子》，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33—34页。

主义泥潭。普列汉诺夫虽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只是精通唯物主义，而并不精通辩证法。他对十七世纪荷兰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深有研究，思想上也深受斯宾诺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形而上学的影响。看来他没有清除掉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底。尽管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书面上也能头头是道加以评介，然而并没有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在观察、分析具体问题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具体问题上，往往思想方法片面，离开辩证法，陷入形而上学。他在政治问题上失足、犯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党建、革命和战争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折中主义和机械类比就是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当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因路线分歧需要划清界限的时候，当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对革命采取不同态度需要划清界限的时候，当无产阶级同沙皇专制政府因在战争中利害不同需要划清界限的时候，他三番五次力图调和、折中，百般诡辩。他硬要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无原则地统一于一个党内，硬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去进行革命斗争，硬要人民大众同反动政府一起把战争进行到底。如前所述，普列汉诺夫本人多次宣扬的“猫尾巴论（所谓两猫相斗，最终互相咬掉尾巴，两败俱伤）”，就是形而上学折中主义哲学的形象说明。这种调和哲学使他多次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滚到机会主义立场。在俄国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要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面对着这些问题，普列汉诺夫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体地进行分析，独立地加以解决，而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历史类比法。他背靠二十世纪，面向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非要把历史上法国、德国等国发展的模式硬套在俄国头上。他主张在俄国要建立象十九世纪在德国和其它国家建立的第二国际类型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让党内各个不同派别和平共处一堂。他认为俄国的资

产阶级革命大体上也要与历史上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似，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工业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还把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十九世纪的普法战争等同类比，视防御一方为正义的卫国战争。历史的发展有时是会出现相似之处，甚至是惊人的相近，这是由于事物的内在联系决定的，需要我们细心地加以剖析。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这是由事物各自不同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历史类比是形而上学循环论的表现。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必定使人们目光短浅，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看不到事物发展中新质的出现；在政治上往往成为保守派，甚至堕入机会主义泥潭，普列汉诺夫的悲剧就是这样铸成的。列宁曾经正确地指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典型人物，尽管普列汉诺夫爱夸夸其谈地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自己在具体地历史地论述问题时却摆脱不掉这种形而上学。”^①因此，他作为一个理论家，虽然贡献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②又说：“只有具体分析了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议论问题的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③

第四，思想意识的毛病使普列汉诺夫在机会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在俄国开天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社会民主工党等等功勋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骄傲自满，刚愎自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4页。

② 同上书，第39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第12页。

用，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列宁本来对他十分爱慕景仰，可是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到日内瓦同他商谈创办《火星报》时，就对他那种飞扬跋扈、以势压人的作风感到惊讶和失望。列宁说：“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慕’差不多全消失了，我很难过，我很伤心。”

“他们象吓唬小孩子那样来吓唬我们”^①。后来，列宁在长期与他并肩战斗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对他进行耐心的帮助和争取，他都置若罔闻，拒之门外，甚至反唇相讥，自鸣得意。至于一般群众对他提意见，那更是暴跳如雷，恶语伤人。例如，一九〇三年底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派人到日内瓦见到普列汉诺夫，对他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倒向孟什维克的行为表示不满时，他竟摆老资格，傲慢地说：“你爸爸还没有与你妈妈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是革命者了。”^②或者怒斥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工人：

“你的爸爸妈妈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我就……”^③。普列汉诺夫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尤其是因为他通晓德文和法文，更有条件直接研究尚未译为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于是他竟以满腹经纶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自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拥有最高的解释权。他常常滔滔不绝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教训别人，而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如何。有时他还故弄玄虚并不指明这些言论是在什么场合和什么时间发表的，令人无法弄清其准确含义和精神实质。他自认为可以引经据典，随心所欲地对现实问题指手划脚。当人们向他指出，他的引文有时驴唇不对马嘴，他不仅拒不听取批评，接受意见，反而认为别人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302页。

② 瓦·格·秋马钦柯：《普列汉诺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105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45—46页。译文有修改。

一九〇五年他同列宁争论时曾经这样说过：“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应当每时每刻都记住，哪怕我们只有一次承认，简单地指出马克思的论断如何如何，指出老夫子如此说，就可以说明我们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一切争论，我们就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可怜的学究和可笑的书獐，我们就会根本上背叛自己学说的精神，就会有损于这个学说么？”^①直到一九一七年他又同列宁争论时还象“长舌妇”一样，喋喋不休地搬出恩格斯的语录来阻挡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狂妄自大、高傲自负的个人主义意识使普列汉诺夫变成了他自己不愿充当的马克思主义的可怜的学究和可笑的书獐！这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93页。

第十八章

热情关注东方邻邦 长期影响中国人民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论我国古代社会 和近代革命

普列汉诺夫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不仅认真研究俄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积极投身俄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而且也热情关注东方邻邦，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有所研究，并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猛烈谴责沙皇政府和其它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今天我们重读这些精辟论述和热烈文字，仍然倍感亲切，深受启发。研究普列汉诺夫与中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一总问题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普列汉诺夫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解中国，然而他具体着手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还是在一八八〇年侨居西欧之后。他从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领会了这些大师对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社会特点的独到分析；在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时，他就

时常论及中国社会的结构。在一八八三年写成的第一部反击民粹派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他曾提到东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在一八八四年写成的系统批驳民粹主义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进而多次具体论及中国^①。

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〇年二月发表了《评列·伊·梅奇尼柯夫的书》一文，表示赞同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梅奇尼柯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年）在《文明和伟大的历史河流》一文中所论述的观点。梅奇尼柯夫认为，尼罗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对古代东方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说：“长江的水渠^②和黄河的堤坝^③，想必都是比埃及的金字塔和庙宇更加众多的几个世代人民精心组织起来、共同进行劳动的成果。”普列汉诺夫在引证了梅奇尼柯夫的生动叙述之后写道：“一般说来，在中国，至少在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这乃是专制政权经济意义之所在”^④。这里他肯定了有利的地理环境对于发展古代中国文明的积极意义和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府在治理水利方面的巨大作用。

普列汉诺夫于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发表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这篇纪念文章中，曾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看到了自然界对生产力状况的影响，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从而更加清楚地深刻地阐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在谈到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30、331、353、365页。

② 指诸如都江堰、申浦等人工修建的灌溉兼航运的水渠。

③ 指诸如古代河南原阳西南的八激堤等人工修建的捍御黄河冲波的堤坝。

④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9、20页。

这点时，对黑格爾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按照黑格爾的说法，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一）干燥的高地，同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和平原；（二）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三）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在第一种地区里盛行着畜牧业；在第二种地区里盛行着农业；在第三种地区里则盛行着商业和手工业。由于这种基本差别，居住在这些地区里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各不相同。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就‘历史’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常常大群地集合起来，象暴风雨一般地侵袭文明国家，在遍地造成毁灭和灾难。文化生活是在平原地区开始的，这些平原，由于有河流，所以肥沃丰饶。‘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些国度里都产生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盛行着的是农业，农业成为这些地方居民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农业是适应于严整的四季进行的，因而也就适合于有条不紊的各种工作；这里便有了土地所有权和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法律关系……’^①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人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他们不善于利用自然界供他们支配的各种手段来互相联系。”^②普列汉诺夫受到黑格爾的影响并且发挥了黑格爾的观点，指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指明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具有重大影响。

普列汉诺夫不仅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总特点，而且具体论述了中国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东方社会制度”的产生以及这种东方社会制度国家的特点。他在一八九〇年写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文中，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特点影响了原

① 参见黑格爾：《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5页。

始公社制在中国和希腊解体后产生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同的特征。他写道：“正是由于某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的这种或那种性质，经济发展才以或快或慢的速度进行，并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向。在中国和阿提喀，在北美平原和尼罗河沿岸，发展初期的社会关系形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相同的。研究原始制度的科学到处都发现譬如说民族生活方式。显然，人类有着同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生存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位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进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当然，这里有许多东西也依赖于该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发展的‘地理背景’毕竟无疑地表现出强烈的影响。”^①他在一八九七年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篇文章中，谈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在中国和埃及等地产生了国家。他说：“按照拉布里奥拉^②的说法，国家是一个社会阶级统治另一个或另一些社会阶级的机构。诚然不错。但是这句话很难表达出全部真理。在中国或古埃及之类的国家里，如果没有那些构造极其复杂、规模极其宏大的水利工程来调节大河巨川的洪水、防止泛滥、灌溉耕地的话，文明生活就不可能；国家的兴起，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用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直接影响来说明的。某一种程度上的不平等，无疑曾经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史前时代，既存在于行将形成国家的部落之内——这些部落在人种方面每每是彼此各有截然不同的来源的——，也存在于各个部落之间。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所遇见的统治阶级，正是由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

②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格斯和列宁对他都有很高评价。

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所造成的国家机构，而都据有某种程度上的崇高的社会地位。”^①他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古代就具有管理水利的社会职能的论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点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中早就已论述过，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的。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而写的著名论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第一次明确指出，在中国原始公社制度瓦解后，产生了“东方社会制度”。他写道：“某一事物秩序本性中的逐渐的量变，最后一定要引到质变，就是说，引到旧的生产方式——或者象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旧的社会形态——的崩溃，引到旧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据马克思的见解，东方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大体上可以看做社会经济发展的依次递进的（‘累进的’）时代。但是应该想一下，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一书时，他大概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封建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逻辑，导致标志资本主义胜利的社会革命。但是象中国或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前一种情形是指两个发展阶段而言，其中一个接着另一个，而为另一个所产生。后一种情形我们认为毋宁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末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在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4页。

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所说的“东方生产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最早见于马克思一八五九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马克思在此以前于一八五七年八月至一八五八年三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形态》部分，比较详细地论述到“亚细亚的形态”（或“东方形态”）^③。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到这个问题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于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三年写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八八五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许多相互通信。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以苏联史学界为主在世界历史学界范围进行了一次热烈的争论；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再次发生了国际性的争论。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在争辩之中。主要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原始公社制的生产方式或其残余；有人断定它是东方类型的一种特殊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有人主张它是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2—474页。

过渡的一种生产方式；有人坚持它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有人提出它是一种奴隶制和封建制混合型的社会；还有人把它看成是在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第六种特殊的生产方式。

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就看到东方好些国家在古代存在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等特点，最初他以为这些特点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所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同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列，视之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更多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材料后，发现几乎所有民族都经历过土地公有制的原始社会阶段，所以七十年代以后他们就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态”的术语，也就是说不再把它作为古代奴隶制之前的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继续分析东方国家古代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特点，普列汉诺夫经过研究对马克思的早期观点作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应该说是他有他独到之处的。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从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东方生产方式”是东方的中国和埃及等国度在“氏族社会组织”瓦解后出现的，它和其它国度在氏族社会瓦解后出现的“古代生产方式”是并存的另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普列汉诺夫认为“东方生产方式”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而是同作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古代生产方式”并存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即是说，“古代生产方式”这种奴隶制的特点，是不保留氏族社会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等残余；而“东方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较长期地较多地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土地公有、农民公社等残余。总之，普列汉诺夫把“古代生产方式”和“东方生产方式”看作是氏族社会解体后在西方和东方形成的“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两种经济

制度的类型”，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种理解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早期把东方生产方式看作是先于古代生产方式存在那种观点。普列汉诺夫的新见解给予了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性而是多线性的新启示。这种多线性的解释应该说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并非单调划一的，而是丰富多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有五种生产方式，但是不能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社会的发展都简单地硬套到五种生产方式中去。各种复杂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会使许多民族社会的发展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普列汉诺夫认为“东方生产方式”也是“生产力在氏族内部增长的结果”，其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影响之下形成的”。在这里，他是特别估计到了地理环境的特殊作用。

我国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发表的论文《‘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在谈到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术语的争论时，写道：“自普列汉诺夫以至马扎亚尔学派^①：他们看见在‘古代的’社会以前，不能再有一个国家范畴的历史阶段，而马克

^① 柳·伊·马扎亚尔(1891—1937年)，匈牙利人，中学毕业后学习法律，兼当记者，积极参加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15年徒刑。1922年到达苏联并加入联共(布)，先后在塔斯社和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被派到中国，在汉口、上海苏联领事馆工作，注意研究中国问题，搜集大量资料。回苏联后1928年出版《中国农业经济》巨著(有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中译本)，提出“中国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得到苏联一部分学者的支持，形成马扎亚尔学派。在1929年开始的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中，马扎亚尔当即声明放弃自己的观点。1929年起他在共产国际工作，继续支持中国革命，1930年出版《中国经济概论》，参与批判李立三“左”倾路线，1932年出版《闸北在燃烧》，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罪行。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中被错杀。

思所指的‘亚细亚的’社会又是属于国家范畴的历史时代。普列汉诺夫于无力解决其理解上的矛盾时，便凭着自己的主观推想，说：‘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一书时，他就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从而他认为‘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生产力在氏族组织腹内发展的结果’，在东方和西方孕育出‘两种形式间有很大的区别’的社会制度。他在这里，显然已由‘史的一元论’堕落到多元论，堕落到地理史观。”^①我们认为，吕振羽同志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没有看到普列汉诺夫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独立见解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更没有看出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作用为出发点，来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性质，还是坚持史的一元论，不能说是堕落到多元论。普列汉诺夫重视地理环境对古代东方一些国家社会生产发展的特殊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地理史观而加以全盘否定。至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才合乎马克思的原意，才合乎客观实际，这是学术界正在探讨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根据现在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表明，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无论是马克思于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写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还是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一八八五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确实都是如此。所以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当马克思读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后，“大概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

^① 见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页。

生产方式关系的观点”，这一推断大体上还是可信的。普列汉诺夫在一些文章中，还论述了中国这种“东方生产方式”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具体内容和特点。

他在一八九〇年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征服是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的原因的观点时，写道：“没有人说，在西欧历史上没有过征服、没收和垄断。但是，要知道它们也曾存在于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与现代欧洲的经济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否由于：所有这些征服、没收和‘垄断’都远不能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而相反地，它们本身的形式和以后的社会后果都反而由经济发展方向所决定呢？古希腊、印度或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进程，不同于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的经济发展方向和进程，——因此，在那里，征服及其一切后果也就导致了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制度。”^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已指明，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进程区别于欧洲，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形成的“东方社会制度”也不同于在欧洲先后出现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经济制度，有着其固有的特点。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看法，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东方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由于防止泛滥、灌溉耕地，需要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关来组织人力、物力以兴修“构造极其复杂、规模极其宏大的水利工程”；这种庞大的国家机关产生之后就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集团，它们严厉而残酷地统治农民。不仅中国一国，而且象埃及、印度、波斯以至俄国的社会制度，都具有这种特点。他不同意俄国民粹派认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象俄国农民那样所受过的压迫的观点。他说：“俄国农民的不自由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页。

的生活方式与伟大的东方专制国家的庄稼人的生活方式象两滴水那样相似。尼·安·布拉戈维申斯基^①没有根据地认为，‘除了俄国以外，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某种类似的事情’。在农民被国家奴役的地方：在古代埃及，在加勒底^②，在中国，在波斯，在印度，到处都存在着某种完全类似的事情。自然，这些关系不是到处都达到一样的发展程度。看来，这些关系在中国和在埃及的发展程度要更大些。”^③

普列汉诺夫认为，象中国这种专制制度的形成是同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的。他说：“农业公社的共和联盟，几乎只产生在山区的、或者一般说来自然条件使其与外界隔绝的国家里。但是另一方面，居住在辽阔平原和大河流域的农业民族，却到处形成为专制制度。中国、埃及，可惜还有我们俄国，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④考虑到地理环境同专制制度的联系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从若干国家的历史实际出发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是专制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政治上的专制制度主要是反映了经济上小生产和隶属关系。不然就无法解释好多山国、岛国也长期存在过专制制度；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辽阔平原和大河流域也要由专制制度变为共和制度。

普列汉诺夫这种强调地理环境对于形成专制制度特殊作用的

① 尼古拉·安德烈也维奇·布拉戈维申斯基（生于1859年）统计学家，编了《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第1卷：农民经济》。十月革命后曾在库尔斯克省统计局工作。

② 古代巴比伦南部闪族聚居地，位于波斯湾西北。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0卷，俄文版，第72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56—57页。普列汉诺夫在脚注中强调说明：“虽然在那里，专制政权远不是产生于历史的最初阶段。它的产生要以同原始时期比较起来已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生产力为前提。”

观点，显然是深受黑格尔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来源于黑格尔。除了前面摘引的黑格尔的观点之外，他还引述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如下重要论述，并且深表赞赏。黑格尔指出：“既然在中国平等主宰一切，所以在那里没有任何自由，专制制度在那里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政府形式……中国政府不承认私人利益的合法性，对国家的全部管理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借助于一整批官吏来治理国家。”^①由于个性得不到任何发挥，所以在人民中间个人的自尊心一点儿也不强。“他想，一切都是为使皇帝陛下能驾幸于自己。他把压在身上的重担，看作是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②

普列汉诺夫引证了黑格尔的这一段言论之后，紧接着说：“这位黑格尔极为了解，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农业国家的历史。”又说：“当然，同中国相似并不能够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看来，也没有预示着俄国进步的光辉未来。”^③可见，联系俄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这是普列汉诺夫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正是从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出发，采取比较分析法来研究作为俄国东方邻邦的、与俄国有很多近似情况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基于这个特点，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反击民粹派时，而且也在制定党的土地纲领时，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如前所述，在一九〇六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党的土地纲领时，党内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

①② 《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119页。这一段话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8—170页。我们是直接从普列汉诺夫著作中他自己摘引的俄译文再译为中文的。它与《历史哲学》的中译本在内容上略有不同。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哲学》一书有多种版本所致。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俄文版，第65页。

克主张土地市有（即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市政机关所有），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土地国有（即把地主的土地收归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以后建立的人民国家所有），大部分从事地方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主张土地私有（即把地主的土地分配归农民私有）。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方案，他认为这将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的复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援引中国汉朝的王莽变法和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为例，以此说明由于恢复并且加强了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而产生了一个官僚阶级。他在一九〇六年发表的《论俄国土地问题》一文和同年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中，详细地论述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他以赞同的口吻转述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利泽·邵可倡对王安石变法的论证。他写道：“您（指普列汉诺夫与之进行辩论的马斯洛夫——引者注）是不是有机会读过埃利泽·邵可倡地理学第七卷中关于中国的篇页呢？要是读过的话，您大概记得关于‘在引起革命和朝代递嬗的各种变故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怎样抛弃了公社所有制的思想（‘因为它以前存在过’）和‘企图实行新制度’的有趣故事。一〇六九年，当时中国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颁布了废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变成了唯一的所有者，掌握了一切产品的分配权，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则应当由国家的官吏来管理。这个措施引起了满大人^①和原来的封建大地主最强烈的反抗，但是埃·邵可倡说道，王安石善于把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保持十五年之久。‘但是，只要改朝换代就足以推翻新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根本不符合人民的愿望，也不符合身居显贵者的意图，而且它又创造出变成了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整

^① 满大人一语原是葡萄牙人对清朝满族大员的称呼，后用以泛称中国封建朝代的高级官吏。普列汉诺夫此处指的是宋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官僚。

整个残酷者阶级’。”“邵可倡说，中国大臣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试验是古今各国政府为了社会改革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切企图中最伟大的企图。”^①普列汉诺夫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邵可倡评述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反对国际社会民主党，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邵可倡把王安石变法称之为“共产主义的”试验。他认为邵可倡未能从王安石变法中恰如其分地总结出其中所包含的真理。他补充写道：“从同一个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九世纪就已经颁布过一项宣布一切土地是**国家财产**的法令。这是和王安石宰相的‘企图’一样的‘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据邵可倡说，王安石的‘企图’也包括了动产。但这是极端可疑的。最可靠的是：关于王安石所实现的革命的报道反映着类似我国当局有时用共耕地来平息皇室领地上农民的巨大不满那样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看来是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采取的，而且在这以前大概在全国实行了土地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大触犯根据采邑权经营土地的土地占有者的利益。无论如何，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这个革命只能是**土地革命**，而且只应当看做中国国家经济史中的一段插曲。”^②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要加强国家政权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其目的是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其失败原因是由于触犯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遭到激烈反对。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总的评价是错误的。他看不到王安石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看不到王安石变法在抑制豪强方面的进步作用。从他的“东方生产方式”的模式出发，他认为“中国式的政治变革在于土地从‘亲信的人’手里夺了回去，并且交还给了利维坦^③即国家，接着历史又重演了：产生了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三联书店版，第299—300页。

^② 同上书，第300—301页。

新的‘亲信的人’，引起了新的变革，恢复了旧的中国制度。”^④这种把“东方生产方式”简单地看成是封闭的历史循环圈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中国历代的政治变革总还是不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尽管有时从现象上来看它似乎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就是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承认中国古代存在过封建制度。他说过：“现在我们不但知道俄国同西欧一样，经过了封建社会阶段。此外，我们还知道埃及、加勒底、亚述、波斯、日本和中国，——总之，全部或几乎全部东方的文明国家，在自己的时代也经历了这个阶段。”^⑤只是没有看到他具体说明中国古代的“东方社会制度”如何演变为后来的“封建制度”。至于普列汉诺夫认为：王安石颁布了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土地国有制的法令，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涉及到财政经济制度、军政制度、教育和科举制度等各方面，限制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掠夺，但是并没有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丝毫也没有改变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方田均税法”，那只是要清丈田亩，检查漏赋，均定田税，根本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

普列汉诺夫是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作为反对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纲领的历史依据。他毫不隐讳地说：“社会民主党之丝毫不会被这类‘企图’（指王安石变法——引者注）所吸引，读者可

③ 利维坦是英文Leviathan的音译，源出古欧洲希伯来文Liwyāthān，意为“盘曲”。在《圣经》故事中用以作为一种强大凶猛的海上怪兽的名字。英国学者托·霍布斯（1588—1679年）于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一书，叙述了他的国家观。他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对人象狼一样”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人们建立国家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是为了保障社会和平，因此他给国家起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叫做“利维坦”。

④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04页。

⑤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1页。

以从我们对土地国有化的极端否定态度中看出来。……我们从俄国的王安石的企图中除了罪恶之外不但不期待任何东西，而且要用一切努力使得这些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能实现。”^①显然，他在这里是把列宁看作“俄国的王安石”。普列汉诺夫自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要推进历史向前，反对专制制度的复辟。实际上他不仅误解了王安石，而且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机械历史类比的方法，又一次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列宁于一九〇六年写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当即指出：“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复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谓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能够把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末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②

总的说来，普列汉诺夫在中国古代“东方社会制度”、“东方生产方式”问题上，虽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当时掌握的材料有限，多半又是从联系俄国实际的角度着眼，所以研究的深度还是不够的。他耽心在俄国复辟专制制度的出发点是对的，然而他不懂得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任何一种土地国有制，而是小生产的农业隶属制度。处于隶属依附地位的小生产的农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需要并且希望有强有力的皇权为依托，这才真正是专制制度和皇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古代东方国家在土地国有制条件下出现过君主专制制度，后来我国在土地私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3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注②。

有制盛行的情况下照样保留着君主专制制度，中世纪后期以至近代的西欧国家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也出现过君主专制制度。而那些实现了土地国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复辟君主专制制度。可见土地国有制并不是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任何国家，只要真正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尤其是农业社会化，使农业由个体小生产变为社会化的大生产，那末君主专制制度这种上层建筑就不可能长久存在。只要还保持着处于隶属依附状况的小生产的农业，那末不论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专制制度总还是有它的土壤的。从长远来看，真正防止专制制度复辟的保障在于建立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普列汉诺夫以为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实现土地国有化，只要采取他提出的土地市有制的措施，就能够防止复辟。列宁在批驳这种错误观点时正确地指出：“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制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①

普列汉诺夫还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发展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现象。他在一八八四年批判民粹派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谬论时，说：“吉荷米洛夫先生为了说服那些不懂的人和打击那些‘思想不同’的人，不惜把历史老妪及其‘难以置信的道路’，西欧及其资本主义，最后又是母亲俄罗斯及其中国式的停滞和农民公社都搬了出来，在我们面前炫耀。”^②他在一九〇一年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时，再次指出：“关于中国在至今还未完结的漫长衰败时期内的发展经过，我们知道得不够清楚；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进步的社会里，随着新的社会需要和旧的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16—317页。

制度之间的矛盾增长的，通常总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尖锐化。”^①普列汉诺夫关注的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课题。由于他没有专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进一步的论述。

普列汉诺夫以蒙古族入侵中原为例，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呈现出的一条规律：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侵先进的农业民族居住区的结果，是将逐渐接受经济先进的民族的影响。他说：“中国被蒙古征服的社会结果和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结果极少相似。”^②他又说：“经济发展的进程对于某一民族的性质具有重大的影响，有时会使它的战斗力减少，以致无力抵抗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但却习惯于战争的敌人。所以，**爱好和平的农业部落常常遭受善战的民族的侵略。**拉采尔说，‘半开化’的民族由于采用征服的方法结合农业和游牧这两种要素的结果，便常常有最巩固的国家组织。这种意见一般说来不论如何公正，但是我们还应该记住，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例子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征服者**渐渐地会完全服从于经济比较发达的**被征服民族**的影响。”^③历史事实证明，整个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在经济较落后的民族不断接受经济较先进的民族的影响，各民族在经济上互相合作、文化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融合而成的。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八年时还指出：“征服能够使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尖锐化，并且给社会发展过程增添了许多急剧变动，这是不容争辩的。但并非永远是增添急剧变动。满洲人征服中国没有妨碍这个国家的内部历史直到最近仍旧很少有急剧变动。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8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9页。

会生活中急剧变动程度的大小，要看现存社会制度怎样制造和制造多少引起各社会力量间激烈而又鲜明的冲突的事端。”^①普列汉诺夫对中国清史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并不全面。一六四四年，满族贵族率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不但征服了汉族，而且征服处于边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对居住在蒙古、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满族贵族的统治未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更不能把中国社会拉向后退。相反在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和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促进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封建经济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普列汉诺夫在这里阐明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时，首先要着眼于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能离开这些内部原因，单纯用异族的入侵和被征服来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那样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然而普列汉诺夫却没有看到满族的统治曾经多次引起国内发生“激烈而又鲜明的冲突的事端”。象震惊国内外的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义和团起义等等即是明证。他更没有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几年中国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局势，那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甚高，反满反帝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见，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论断（所谓“满洲人征服中国……直到最近仍旧很少有急剧变动”）是片面的，并不符合事实。

普列汉诺夫不仅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非常关注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同属于专制主义统治类型的俄中两国，近代的历史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俄国走向西方列强那样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23页。

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则备受西方列强的奴役；他深为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担心。他在一八八九年写道：“莫斯科是属于中国的一类，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由此，就有那一重要的差异，就是，正如现在的中国一切的力量都被欧洲所击退，我们的莫斯科的中国还从伊万雷帝的时候就以武器在手努力于为自己打开一个小窗口。彼得一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伟大的任务。他完成了巨大的激变，拯救了俄国免于麻痺。但是彼得皇帝所能做的只是沙皇的权力所能达到的。他建立了常备的、照欧洲样子武装的军队，而且把我们的国家管理的体系欧洲化了。”^①沿着这条道路，俄国后来发展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而在普列汉诺夫说这番话的时候，清朝政府已先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签订了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担负着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双重任务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已被清朝政府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所镇压。“中国的一切力量都被欧洲所击退”，就这样，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仍然在以各种形式继续着。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侵略中国东北，霸占朝鲜。这次战争，从中国人民方面来看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军队向平壤发起进攻。爱国将领左宝贵（一八三七——一八九四年）率清军同朝鲜军队一起守卫平壤北城玄武门，在日军猛烈炮火中鏖战，不幸中炮阵亡。一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55页。

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国北海舰队在黄海与日本舰队激战。邓世昌（一八四九——一八九四年）指挥的“致远”舰，沉着勇敢地同敌舰浴血奋战几小时，后船身中弹，船斜弹尽。他下令向敌人的先锋舰“吉野”号猛撞过去，中途被敌人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踏上中国领土后，残暴地杀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奋起斗争，矢志“宁作中华断头鬼，不作倭寇屈膝人”。但是由于腐败的清朝政府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方针，终于使这次战争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朝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侵占我国台湾后，台湾人民在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年）领导下，与日军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斗争。以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停息。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得逞，然而对于备受中国人民的打击感到十分懊恼和丧气。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出版的哲学名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精神。他在批判民粹派时指出民粹派首领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说的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表示尊敬，实则是反抗、打击。他曾经打比喻说：“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这正是这样一种尊敬，就是现在中国人应该用以对待日本军队的尊敬：它打得不错，并且受到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英、美、俄、法、德、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武装镇压高举反帝大旗的义和团运动，取道大沽口、天津攻入北京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逃到西安，驻在北京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伙帝国主义分子进京后，烧杀、掠夺、奸淫等无所不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沙皇俄国是侵占我国天津的发起人，攻打北京，它又比别的帝国主义先下毒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沙俄军队占领了皇宫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56页。译文有修改。

和颐和园，把这里的珍宝、玉器抢劫一空。一九〇一年清朝政府委派李鸿章和英、美、俄、德、奥、法、意、日及比、西、荷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沙俄独占百分之二十九），从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算起，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清政府下令禁止中国人民建立抵抗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拆毁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天津的各个炮台；允许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兵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处要地。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底在同列宁等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商谈在国外编辑、出版《火星报》时，就谴责了“俄国人在中国的暴行”^①。而到了九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不久，他为《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写的序言——《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发表了。他在这篇序言中，严厉谴责了包括沙俄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他写道：“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他们非常希望不经过流血就占领中国的都城，然而他们却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占领它的念头。”^②普列汉诺夫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占北京的罪行，揭露得非常及时。他不仅鞭挞沙皇政府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而且也谴责当时在俄国境内发生的迫害中国侨民的暴行。他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在第三十九号《火星报》上发表了《时代在变化》一文，其中写道：“不知道我国读者是否注意到我们的‘公开的’报纸所报导的那个事实：正当在基希涅夫市^③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时，在日托米尔^④也有四个中国人险遭一群人杀害。这四个中国人是在地方马戏团谋生，出来观看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30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3页。

③ 基希涅夫现为苏联莫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

④ 日托米尔现为苏联乌克兰日托米尔州首府。

节日游园联欢会的。这群人为什么要杀中国人？很明显，只是为了转移由于生活困苦所引起的动荡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还未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警察局觉察到，在群众中积聚了大量的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它竭力使这种不满情绪不致爆发，而使其反对‘犹太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一句话，去反对所遇到的任何外国人。我们应该阻止警察局开这个绿灯。对于‘杀死犹太人！’（或其他外国人）的叫嚣，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杀死警察！’……这些叫嚣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我们则要使那些想杀中国人的这群人，很乐意去打击警察。”^①普列汉诺夫号召一切受压迫的俄国人，应该把斗争目标指向沙皇专制制度及其走狗警察，而不应该错误地指向侨居在俄国的外国人，其中包括中国人。他的这些言论和主张，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革命的锋芒直指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革命烈火首先从武昌燃起，很快烧遍全国，节节取得胜利。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三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进步人士在法国尼斯市赫尔岑的墓前集会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普列汉诺夫在这次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以充满喜悦的心情兴奋地介绍了中国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在六十年代初，西欧各族人民还只是开始摆脱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暴风雨事件以后所遭受的虚弱。而现在甚至波斯人都要求自由，现在甚至长期蛰伏不动的中国也动起来了，并且宣布成立共和国。关于西欧那就更不用说了。工人国际在这里已成长为强大的军队。”^②普列汉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36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831页。

诺夫当时认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将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的“欧化”过程。他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中指出，象中国这样“最典型的东方国家现在亦转向西方”。他乐观地写道：“在这些东方国家当中，有些国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似乎有可能超过俄国。在俄国还未确立议会制度的时候，中国已变成了共和国。”^①中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变为共和国，虽然比俄国早五年多，然而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未能走上欧化的资本主义道路。看来，普列汉诺夫对于中国所受的外部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重压估计不足，所以他对中国欧化的资本主义前景估计过于乐观。

列宁在辛亥革命后曾发表过《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多篇文章，赞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深信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并建立自己的政党，预计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具有“反转来影响”欧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与列宁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这显然是与普列汉诺夫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机会主义泥坑有关。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的事迹和著作 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开始传进中国。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专制政府加强了高压统治，当时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在国内难以立足，乃纷纷东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31页。

渡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们在日本接触到西方的各种新思潮，并立即向国内介绍。他们主要是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同时也涉及社会主义学说。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于一九〇二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年，梁启超在日本从中国商人中筹款，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名为广智书局的出版机构，陆续发行了好些介绍西方思潮的书籍。翌年，即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三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概述社会主义的新书。其中有一本名为《社会党》，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西川光次郎著，周百高译。此书在日本是一九〇一年刚发行的新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十五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全书约三万字。书中谈及马克思，也谈及普列汉诺夫。在“俄罗斯之社会党”这一章中，概述了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活动情况，然后写道：“以上所述，虽未详细，要之俄国社会党之大势，可知矣。今为之领袖者，为桥旗善来夸脑（即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引者注），皆与二十年前革命有大关系之人也。现居于瑞士而著书，其主义以马克（即马克思——引者注）为师，其著述在俄者极多。”^①这是迄今我们所查到的我国近代出版物中第一次对普列汉诺夫的简略介绍。可见，普列汉诺夫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一起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人开始知道普列汉诺夫，起于一九〇三年；他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开始在中国出版的书

^① 《社会党》，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903年2月22日）发行，第十三页。

籍中出现。

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之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介绍马克思主义。一九〇六年一月，资产阶级著名政论家朱执信（一八八五——一九二〇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比较系统地简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这一时期，《民报》还刊登了多篇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党活动的文章。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发行的第五号上，有一篇题为《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的重要文章，长达一万一千二百多字。此文原为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大杉荣所作，曾发表于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一期，经过译者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年）略为修改，作为自己的文章，署名势斋发表。文中简略追述了第一国际的历史，着重介绍了第二国际前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两派的斗争。文中对一九〇四年八月刚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闭幕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介绍尤为详细。在开列大会确定的各国委员名单时，文中提到：俄国，普勒加罗夫（G·Plekhanoff）、革利吹士克（B·Krelschewsky）（即普列汉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引者注）。文中还评介了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的活动，尤其是他与日本代表握手言欢的国际主义盛举。作者写道：荷兰的万-柯尔担任大会会长（即主席），“俄国之普勒加罗夫、日本之片山潜为副会长。以十四日开会，会长先为开会之演说，次两副会长代表日俄两国之社会党立演坛而握手为礼。片山氏以英语对普氏而言。曰：‘吾兹与俄国之代表共相见，吾正喜。吾日本今也非对于俄国起惨绝之战争者乎，吾日本之社会党则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以来，时时希望日本之社会的革命也。’普氏对之而为答词曰：‘俄国人民非望战争者也。实为俄国人民公敌者之政府，以其冒险的专制的政策，挑发日本者也。今也俄国已陷于困境，实为当然之报酬，所难堪者吾人民耳

虽然若使俄国而得胜利乎，则吾人民之为牺牲者更不知如何矣。日本者，非为吾人除去专制主义之巨象之一足者耶。’”^①一九〇四年一月，日、俄两国政府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两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八月间适当两国拚命厮杀之际，却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握手亲善。这一象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行动，当时曾经蜚声四扬，传为佳话。到一九〇六年六月，普列汉诺夫这一重大的革命活动就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上得到反映，可谓相当神速。作者在介绍普列汉诺夫和片山潜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握手礼之后赞曰：“呜乎！此握手也，实世界社会党发达历史之可大书特书者也。且不仅对于世界之同志而已，实对于世界各国之君主、贵族、富豪、绅士及一切之阶级而表示社会运动为世界一致之运动者也。社会党之主义，为民胞物与^②之主义，为太平大同之主义，无国界、无阶级，只以纯粹之人道与天理为要素不于此益可见耶？”^③作者宋教仁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却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甚表同情和赞扬，从此可以窥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的影响。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曾效法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个人暗杀手段来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报刊上登载过介绍俄国民粹派活动的多篇文章和多幅照片。在《民报》第十一号、十七号上曾连载著名革命家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年）（署名渊实）译的《虚无党小史》，此文原为日本烟山专太郎所著

^{①③} 《民报》，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5号（1906年6月发行），第98—99页。引文的新式标点符号是引者加的，但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民胞物与，语出宋朝张载著《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指民为同胞，物为同辈，犹言泛爱一切人与物。

《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第三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俄国虚无党（民粹派）的历史。其中曾谈及普列汉诺夫在民粹派时期的活动。文中写道：“有普拉哈诺夫者，慨党众之衰颓，甚非，所以图功也。一八六七年，集威古思团^①之残党，另起炉灶。”^②

“其后该党发行一机关新闻，名曰《土地及自由》，遂相传以土地自由党知名。”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京师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冬十二月六日，于卡山行第二示威运动。土地自由党首领普拉哈诺夫大演说，高擎赤旗，大书土地及自由，编定队伍，步伐整齐，警察禁之，不可，捕之，与之斗，宪兵出阵，虏二百六十八人。其中服辜者，男子一百三十一人，女子三十四人，多放之于西伯利亚。”^③这里记述的是普列汉诺夫参加“土地与自由社”革命活动和俄国政治示威游行的事迹。

总之，从一九〇三年以来，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书刊中，已开始零星介绍一些普列汉诺夫的革命事迹，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从日文书刊中翻译过来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亡命日本的知识分子的介绍，最早知道普列汉诺夫也是顺此同一渠道。中国人开始知道普列汉诺夫之时，还不知道列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列宁比普列汉诺夫小十四岁。在二十世纪初，普列汉诺夫已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著名的老活动家，而列宁则是后起之秀。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

^① 威古思是民粹派分子，现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1850—1926年），1872年当学生时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倡导建立了“柴可夫斯基分子小组”（即这里所译的“威古思团”），是俄国最早的名噪一时的民粹派组织。

^{②③} 《民报》，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17号（1907年10月发行），第137—138页。

维克)成为执政党,列宁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人物。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创办了一些革命报刊,开始自觉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事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即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秘密性的党刊。李达(一八九二——一九六六年)以胡炎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一文。他在文中谴责了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他写道:“德国的柯茨基(即考茨基——引者注)、俄国的蒲列哈诺夫一流人,也加入了资本主义战争了。他们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他们已经变成讲国民自由主义的人了。”^①他正确地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主义立场。在这期杂志上还发表了署名无懈(即周佛海——引者注)的《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文中讲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〇三年“分为两派:一是主张直接行动,平民专制的;一是主张议会政治的。”“属于前者的是列宁所领的多数派;属于后者的是普乃哈诺夫所领的少数派。”^②同期,署名A·T·(即施复亮——引者注)所写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历史》两文中都提到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前文写道:“这党的首先发起人,是普列哈诺夫,他起先加入‘国民改造派’到后来他用心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有所觉悟,遂脱离了‘国民改造派’,组织了马克思团,名曰‘劳动解放’。”后来俄国出现了以司徒卢威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和经济派。“普列哈诺夫氏和

①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② 《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1号,第3页。

列宁氏，自始至终，反对斯特鲁约氏和经济主义派。”一九〇三年之后，俄国党又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普列哈诺夫氏，自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内争分裂后，起先联络多数派，后又转而联络少数派，终又由少数派转而联络多数派，如此者数次。”^①后文写道：列宁流放期满赴西欧，“他在欧洲与其他同志，普列哈诺夫、马尔托夫氏、阿克西尔洛得，杂苏里赤等，出了一个报，名叫‘宜斯克雷’。”（即《火星报》的俄文音译——引者注）^②毛泽东当时在长沙组织最初一批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月刊时，就曾经重点学习了记载普列汉诺夫事迹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并把这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这些文章当时还由北京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他们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学习过。李大钊也向他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过《共产党》月刊。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出版的《晨报》在《劳农俄国之一瞥》的长篇连载通讯报导中（日本布施胜治由俄国归来的实录）讲到：十九世纪民粹派的学说“一人二十世纪，就被布列哈罗夫和列宁等的社会民主党打破。”他们预言俄国工业无产阶级必然出现并成长起来，结果“布列哈罗夫、列宁的学说，大行于世，打破黑尔陈、米哈罗夫斯基的旧说了！”^③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期上发表的《列宁》一文中，在系统介绍列宁生平活动时也曾四次提到普列汉诺夫。他在文中尚未用中文写“普列汉诺夫”这个译名，用的是英文Plekhanov。他写道：列宁在彼得堡大学肄业期间，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① 《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1期，第25—27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晨报》1920年11月30日。黑尔陈今译赫尔岑，米哈罗夫斯基今译米哈伊洛夫斯基。

“声誉顿起，那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的Plekhanov读了他的著作说：‘这位青年必有成为危险人物之一日。’”“一八九五年他往Geneva（日内瓦——引者注）与Plekhanov发生关系，旋即返圣彼得堡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与宣传”。“一九〇一年他同Plekhanov, Martov, Zasulich, Axelrod 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Iskra’，译云‘火花’。”（指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创办《火星报》——引者注）“列宁既作了多数派的领袖，许多旧时负有声望的老前辈如Plekhanov亦在其内，都投票选举他。后来他们才转到少数派里去，成了他的反对党。”^①可见，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党刊和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十分重视介绍和了解俄国建党的历史及其领袖的活动。

除以上之外，十月革命后我国无产阶级报刊上对普列汉诺夫的事迹还有一些零星的片断的反映。总之，这时普列汉诺夫在我国已经闻名遐迩，他的主要事迹已为我国革命人士和进步青年所熟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这时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好些著作，用以武装革命者并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普列汉诺夫由于他后期的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他的著述没有很快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注意。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起，才在《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译名为《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一鸿译，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断断续续刊登完毕。这是我们迄今所查到的最早被译为中文的一本著作。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刊登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62—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了“蒲列哈诺夫著、郑超麟译”的《辩证法与逻辑》，全文约七千八百字，此文是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九年九月写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没有更多地译为中文。一九二五年伍国桢译苏联瓦勒夫松的《蒲力汉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由鲁迅校订并写前记，收在《苏俄文艺论战》一书中，这是在我国出版物中最早出现的较全面介绍普列汉诺夫艺术思想的一篇文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文化围剿。革命人民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武装；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先后集中到上海，重整旗鼓，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了革命文化的新进军。从一九二九年起陆续出版了大批革命理论和革命文艺书籍。与此同时，文化界在哲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这就更加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于是，在继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同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才开始较大量地译为中文在进步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广为传播。

一九二九年这一年，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上海一连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三本重要著作：吴念慈（即著名史学家杜国庠）从英文重译的《史的一元论》（即《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书中附有《原著第三版序文》和德·黎耶沙诺夫（即达·梁赞诺夫）一九二三年五月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八卷写的《编辑者序文》；林柏自英文译出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冯雪峰自日文译出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前两本是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后一本是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史的一元论》和《艺术与社会生活》二书，在一九三〇年又重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曾经发表了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撰写的《论文集“二十年

间”第三版序》。冯雪峰还以画室笔名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法兰西的悲剧与演剧》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和十日出版的《朝花旬刊》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二期上。

一九三〇年新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著作又增加了七种，有的甚至同一年出版两种或四种译本。这里开列如下：

一、《近代唯物论史》（即《唯物主义史论丛》），王若水从德文译出，上海泰东书局版。

二、《战斗的唯物论》，杜畏之译自英文，上海神州国光社版。

三、《由唯心论到唯物论》，高晶斋从英文译出，上海新生命书局版；另有王凡西译自英文，上海沪滨书局版。

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有四个译本：成嵩译自英文，上海泰东书局版；李麦麦译自俄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版（同一版本，还以封面书名为《现代经济的基本问题》、封底书名仍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出版过）；李史翼、陈謏合译自日文，上海真善美书店版；章子健译自德文，上海乐群书店版。

五、《唯物史观》（即《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史鲁岩译自法文，社会书店版。

六、《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青锐译自法文，上海辛垦书店版。书中附有亚麦达·杜诺瓦写的《法文再版引言》。

七、《艺术论》，鲁迅译，上海光华书店版。此书是根据日本外村史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此书除包括《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三封论艺术的通信之外，还收入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八年写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鲁迅还在《文艺研究》季刊上发表了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作者注）的第一章。

此外，同年还由春秋书店出版了专题性的文章摘录汇编，除

了收入了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二十年间、艺术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著作的片断外，还刊有马克思、恩格斯、梅林、考茨基、拉法格、布哈林等十一人的文章摘抄。这本汇编名叫《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署名是：普列汉诺夫等著，译者刘侃元。

一九三一年，李麦麦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改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书名为《社会科学原论》，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辩证法和逻辑》、《论自然界和历史中的突变》等论著。书的前面还刊印了：《译者序言》和黎亚赞诺夫（即梁赞诺夫）写的《编者序言》。

一九三二年，出版了《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恩格斯原著、普列汉诺夫注释，杨东尊、宁敦伍合译，上海崑仑书店版。此书即《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年，高晶斋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由唯心论到唯物论》，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再版；青锐译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由上海辛垦书店再版，书名改为《无政府主义批判》。同年，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年）在白区工作期间从俄文翻译了四篇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易卜生的成功》（即《亨利克·易卜生》一书的第九章）、《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同时瞿秋白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等人论文艺的著述，汇集为一本文艺论文集《现实》。这些文稿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瞿秋白牺牲后，收进了一九三六年由鲁迅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该书署诸夏怀霜社校印，夏指中国，霜指秋白，暗示全中国人民都在悼念瞿秋白）。

一九三四年，思潮出版社出版了何畏、克己自日文转译的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作者注）、普列汉诺夫著的论文集《托尔斯泰论》。收入文集的有普列汉诺夫的三篇文章：《从这里到那

里》、《概念的混乱（托尔斯泰的教义）》、《加尔·马克斯与莱夫·托尔斯泰》，此外还有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四篇论文。

一九三五年，上海南强书局第三次再版了吴念慈译的普列汉诺夫的名著《史的一元论》；李麦麦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改名《哲学根本问题》，改由上海辛垦书店再版，附有同年九月五日写的《译者序言》。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了孙静工译自英文的普列汉诺夫的巨著《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和中册，这部著作被收入“中山文库”。同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新译本，为便于在白区传播，改名《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雪峰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这一年改译后由生活书店重版。

一九三九年，上海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统治之下，上海长虹社仍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新译本，由彭康根据德文译本参照日文译本译出，书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其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有关文艺创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好些同志认识并不一致。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出了新方向。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间，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由周扬选编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专著，“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①。书中选录了普列汉诺夫关于原始艺术与劳动之不可分离、劳动早于艺术、艺术形象的特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艺术与政治斗争等言论。这些言论是从

^①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1949年版，第1页。

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艺术与社会生活》和《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与法国绘画》四篇论著中选辑的，译文经过周扬自己重新校订。此书曾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发行，一九四九年由解放社出版。

一九四三年，博古（秦邦宪）在延安从苏联国家出版局一九三八年的俄文本译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此书曾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出版。一九四六年由华中新华书店作为博古丛书之一出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同年，此书也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晨光书店出版。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了张仲实译的《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冯雪峰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作为“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出版的。

一九四八年，唯真译的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第一次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文版，以后又连续重印。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社出版了博古译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老区山东的新华书店和刚解放的上海的新华书店出版了唯真译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三联书店把张仲实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丛书之一出版，附有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写的《译者序言》；同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列夫译的同名著作。同年五月华北大学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等三人著的论文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中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总之，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二十年间，据我们初步统计，在中国各个出版社共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十四部，其

中，包括有普列汉诺夫文章摘录的文集三部，以及在杂志上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论文三篇。这些几乎都是他的优秀的代表作，尤其是哲学著作和文艺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大都是多次再版。其中出版次数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它先后有九个译本，由七个出版社出了九版。从译者队伍看，不仅有著名的革命作家鲁迅、冯雪峰等，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秦邦宪等。^①从出版机构看，不仅有较进步的出版社，而且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的出版机构解放社、新华书店等。这说明普列汉诺夫的优秀著作已引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者的密切重视，受到了中国学术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有的人在报刊上探讨，有的人在案头勤学，有的人在课堂上讲授，有的人在监狱中攻读^②。早在三十年代初，“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就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口头禅，甚至被右翼人物算做新八股，以区别于开口诗云子曰那套老八股^③。普列汉诺夫这些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思想上理论上帮助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毛泽东本人就非常重视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例如他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后，虽然工作很忙，但是第二天就挤时间读了十一页，

① 例如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森然（1894—1984年），早在30年代反动黑暗统治下就敢于在课堂上讲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给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见《北京日报》1982年1月28日报道）。在敌人监狱中读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者，见李逸民：《狱中十年》，《星火燎原》丛刊第2辑第54页，1980年2月版。

② 参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84页。

第三天读到第二十七页，第四天至第六天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仍读了十四页，十二月三十一日读到第四十三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读到第五十九页，四日夜半又读了六页……就这样，一本三百多页的厚书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读完了。^①许多同志在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中都是这样坚持学习的。

普列汉诺夫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也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样，充满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查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同时，也查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例如，一九三一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就有二百二十八种之多。其中有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海泰东书局版）、《战斗的唯物主义》（上海神州国光社版）。查禁的原因是“宣传共产主义”或“鼓吹阶级斗争”^②。前一本书早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就通令全国各省市宣传部门、各邮检所查扣，一九三五年又再次通令查扣；后一本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通令查扣。^③连《文学方法论者蒲列哈诺夫》（何畏译，春秋书局版）这样文学类介绍性的书，也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以“普罗文艺理论”罪名被查禁^④。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电令，曾派员到各书店挨户查禁书籍达一百四十九种，其中有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即鲁迅译的《艺术论》和冯雪峰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⑤。查禁的借口是“内容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诋毁党

① 见邱德新、徐中远：《毛泽东同志的读书生活》，《红旗》1983年第1期，第40—41页。

②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87—188页。

③ 同上书，第210、219—220页。

④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8页。“普罗”即“无产阶级”一词英文（Proletariat）音译的头两个字。

⑤ 同②第193—194页。

国”，“或系介绍普罗文学理论，或系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确意识者”^①。好多进步书店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来销售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为了便于传播，有的书不得不更换书名，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改名《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社会科学原论》、《哲学根本问题》等。

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查禁之外，还有一些文人以普列汉诺夫的信徒自居，打着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旗号，歪曲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妄图以假充真，以售其奸。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首推胡秋原。反动文人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自吹笃信“唯物史观”，实系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在自己主办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阿狗文艺论》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中，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诽谤左翼革命文学，竭力宣扬“文艺自由论”，标榜“永久”的“第三种文学”。为了替这种“第三种文学”寻找理论根据，他于一九三二年编写了一本多达六十二万字的厚书，以《唯物史观艺术论》为名，副标题是“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作为“唯物史观艺术理论丛书之一”，由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刊行。作者不懂俄文，主要是他一九三〇年留日期间从日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几个权威，诸如外村史郎、藏原惟人、升曙梦、川内唯彦等人的著作中编译大量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而成。此书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二十年代外国人对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肯定普列汉诺夫在奠定唯物史观艺术论方面的独特贡献。书中还附有一篇近四万字的《普列汉诺夫传》，主要是根据亚尔柴也夫的作品稍加增删而成。在当时要算是中文出版物中最详尽介绍普列汉诺夫生平事迹的一篇传记了。但是，由于作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仅未能全面地正确地评介普列汉诺夫的一生的功过，而且还多方阉

^①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196页。

割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例如，作者把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本质的论述，只归结为三个原则：即艺术是“藉形象的思索”，艺术是“人生之反映与再现”，“艺术作品之形式必与其思想适合”^①；而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具有阶级色彩等观点，作者在书中只是简单涉及或者避而不谈，始终并未作为艺术的本质来对待。正是因为作者离开了艺术的社会性、劳动性、阶级性，所以他鼓吹一种抽象的人类爱。作者一方面说：“固然没有超阶级的艺术”，另一方面笔锋一转又说：“然而实在说来一切伟大艺术真是多少有超阶级的倾向的——因为广大人类爱正是最高尚的理想。”^②基于这种观点，作者把艺术与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艺术要绝对的真挚，革命一方面是权术底、冷酷的。艺术要爱，革命不可免残忍。艺术表现悲剧，革命要创造一种悲剧去消灭一种悲剧。”^③因此作者以清高的艺术家自居，视革命为狗咬狗的斗争，对革命深恶痛绝，把革命文学斥之为“阿狗文艺”、“狗道主义的文学”。他极力宣扬“文学之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所以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④这一套假普列汉诺夫之名发挥的议论，已经完全背叛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对此，鲁迅和瞿秋白当时都曾予以批判，这方面我们拟集中到下两节叙述。

胡秋原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一书中，还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资产阶级的货色来补充普列汉诺夫的不足。他认为普列汉诺夫

① 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8、44、47页。

② 同上书，第381页。

③ 同上书，第382页。

④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艺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

的艺术理论并非尽善尽美，“我在这里敢提出两个人的名字，是足以帮助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更完成的罢。”^①一个是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另一个是英国的佩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年）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把性爱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进而用性爱来说明心理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历史的进化；他把许多艺术作品看作是“苦闷（尤其是性的苦闷）之象征”。胡秋原认为唯物史观只能说明艺术的社会根源意义与性质，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可以分析作品产生之作者心理过程。所以我说这两种学说不独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而行的。”^②他提出可以补充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人瓦尔特·佩德（一八三九——一八九四年），是十九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文学中唯美主义的代表。他反对反映现实，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所谓极文雅的美，要在“和至高无上的真神和谐相处的真诚持久的愿望中获得灵感”^③。胡秋原要用这一类资产阶级文艺黑货来补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足见他研究普列汉诺夫正是为了歪曲普列汉诺夫。他这部打着研究普列汉诺夫旗号的洋洋数十万字的厚书，是值得我们认真解剖和批判的。胡秋原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官员，还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至今还在那里主编《中华杂志》，他的实践也证明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久”的“第三种文学”、“第三种人”。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从这时起，就可以在全中国的大地上公开、合法、和大量地发行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了。随着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在我国也出版得越来越多。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解放前已出版过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有

①②③ 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第14页。

的重新印发，有的又有新译本。属于重版的有以下四种：《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艺术论》。出新译本的有：《唯物主义史论丛》、《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译为中文问世的普列汉诺夫著作集，有十四种：《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唯物论的历史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传》、《我们的意见分歧》、《论西欧文学》、《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至四卷、《论战争》、《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祖国的一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此外，从五十年代起至一九八三年底，还有八十四篇文稿（包括普列汉诺夫给恩格斯的书信十封、给列宁的书信四十八封）新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各种杂志和有关文集中。

随着普列汉诺夫著作中文本不断问世，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研究他的思想及其前后期的变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九六三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曾经确定三十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高、中级干部学习书目，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十一本，列宁著作十一本，斯大林著作五本，普列汉诺夫著作三本。这三本就是：《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①。这说明我们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优秀著作是给予很

^① 普列汉诺夫的这三本书从1964年起，由三联书店多次重印。《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采用博古的译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采用唯真的译本，《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是采用曹葆华的译本。重印时都重新对译文作了校订。

高评价的，是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珍品。许多干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积极努力学习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

但是，在我国革命胜利后传播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仍然出现复杂的斗争。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一九七〇年在出版界发生的所谓“普列汉诺夫事件”。本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于一八九二年由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出版时，为了帮助俄国读者了解原著，他曾写了一篇说明此书对俄国读者的意义的短序和十一条长注。一九〇五年再版时，他进而又写了另一篇长序，并对原来的注释作了修订和增补。这些序言和注释，尽管有某些严重政治和哲学错误，但是它们对于广大读者理解原著仍有参考价值。如前所述，我国早在一九三二年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时就附有普列汉诺夫的注释。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出版张仲实的新译本时，从一九五七年第三版起收进了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后来重印时一直如此。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骤然发生变化。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出于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需要，处心积虑地美化、神化一些历史人物，丑化、鬼化另一些历史人物，任意割断历史，伪造历史，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他们抡起“晚节不终一笔勾销”的大斧，妄图由全盘否定一系列历史人物进而打倒一大批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砍杀所及，也殃及外国历史人物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陈伯达，借口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序言和注释有严重错误，认为把它与恩格斯的著作放在一起不合适，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在中国“出现这样的事，是不能容忍的”，勒令销毁了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和注释的恩格斯著作的全部存书，进而还要“查看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是否还有这类事”，蓄意迫害编译和出版部门的领导人。从此，连普列汉诺夫的优秀著作也变成禁书，不准出版，不准发售，甚至不许图书馆出借。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决定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毛泽东亲自指明重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要附有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这才撤消了陈伯达一伙炮制的禁令，使普列汉诺夫著作在我国得以重见天日。

早已与林彪、陈伯达结成一伙的“四人帮”，虽然表面上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议，但是阳奉阴违，心怀鬼胎，一有机会又肆意歪曲、全盘否定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窃国的关键时刻，张春桥推行“借批外修来批内修”的反革命策略，曾布置他们在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编写一系列机会主义头子的传记，其中就有一本《普列汉诺夫传》，要突出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的主题，以此影射邓小平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他们公然要篡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全面评价，妄图抹杀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把普列汉诺夫写成混进革命队伍、一贯不干好事的反面人物。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的大头目把这项“政治任务”交给两个对普列汉诺夫并无研究的青年。他们没有很好领会“四人帮”的黑旨意，只是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把普列汉诺夫由民粹派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一生写了个初稿交上去。这种写法根本不符合“四人帮”当时着重强调的“改也难”的基调。因此罗思鼎的两头目审阅之后大发雷霆，把这两个执笔的青年找来大加申斥，骂他们不仅美化了普列汉诺夫，而且歌颂了别、车、杜（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作者注），还气势汹汹地追问他们的这种“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作者搬出列宁和列宁著作作为依据时，这两个头目竟在初稿上写上这样的批语：“列宁的话难道能一成不变吗？观点有问题！！！”原来为着篡党窃国的需要，他们公然明目张胆地要改变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正确评价，要把曾

经最早而又深刻批判过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诺夫的传记写成一部修正主义罪恶史。好在这个阴谋尚未得逞，“四人帮”就垮台了。妄想嘲弄历史的人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弄。普列汉诺夫的革命事迹和历史功绩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即便在十年浩劫期间，仍有许多革命干部在逆境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的一些名著。例如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在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坐牢期间，还认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他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着：“这几天除读主席著作外，开始第二遍读《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就可以读懂了。这说明对事物不钻，不下苦功夫，是不会有结果的。记得这本书是主席指定要读的。我把《反杜林论》也拿来了，准备下功夫啃它。”^①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广大干部在批判这伙人民的罪人鼓吹的英雄史观等谬论时，重新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著作，倍感亲切，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近几年来，我国大学生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就更为普遍了。一九八一年以来，有的大学开设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专题课^②，有的硕士研究生还选定普列汉诺夫的某一方面思想作为学位论文题目^③。

① 郝治平：《深深的怀念》，《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② 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李清崑同志讲授“普列汉诺夫与历史唯物主义”，武汉大学哲学系王荫庭同志讲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研究”。

③ 例如1982年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有：中国人民大学林娅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和复旦大学潘春葆的《从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的研究看他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见《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10、511页。

第三节

鲁迅与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在俄国和中国的境遇正好相反。在俄国，在他生前达到鼎盛，而在他死后则转入衰微。在中国，在他生前几乎不见漪涟，而在他死后则波澜叠起。他的优秀著作和科学理论从二十年代输入中国之后，日益对我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人也有所增多。在解放前我国出版的进步书刊上，发表过不少革命者评介、论述普列汉诺夫言行和思想的文稿。其中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最为密切、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最为深入、论述最为详尽的，要算是鲁迅和瞿秋白。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新军阀统治后，在文化界也实行反革命围剿；同时，在革命阵营内部，在进步文化界内部，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又发生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争论。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转移到上海，以此为新基地开展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年）、成仿吾、冯乃超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先后创办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本来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由厦门到达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四·一二”政变后，他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暴行，奋力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他本来因人事上的不和，已想离开中大；而政治上的刺激更促使他愤然辞职，乃于十月间转徙上海，继续从事译著，先后担任《语丝》、《奔流》等

杂志的主编。创造社的同志和鲁迅等曾经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其中涉及艺术的本质和起源、艺术的阶级性和艺术性、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等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在争论中大家都感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学习还不够，理解还不深，于是就转向埋头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这样，从一九二八年就开始发表或出版一批新译的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论著。鲁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的信中曾谈到：“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①他还热诚地表示：“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同柔石、冯雪峰商议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原拟出版十六种，实际上只印了八种，余下八种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未能问世。这套丛书的目录经商定，第一种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艺术论》的中文本曾由上海南强书局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三十日出版了林柏的译本，本来可以不必再译了；但是鉴于普列汉诺夫这本著作在科学艺术论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丛书的目录早经决定，鲁迅还是费心重译一遍，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译完，一九三〇年七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冯雪峰译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则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二，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在这套丛书中，原计划还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蒲力汗诺夫论》，后因被查禁，未能出版。这个时期，鲁迅还翻译了其它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例如，一九二九年六

① 《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4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月由大江书铺出版了他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著的《艺术论》；同月，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著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发表在七月出版的《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上，因文中有普列汉诺夫自叙对于艺术的见解，所以翌年他又把此文收入他译的普列汉诺夫著的《艺术论》一书，附在卷尾。一九二九年十月由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原著的《文艺与批评》，此书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六。一九三〇年六月水沫书店还出版了鲁迅翻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一书，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十三。如上一节所述，鲁迅早就为伍国桢于一九二五年翻译的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作校订并写前言，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的《文艺研究》季刊上还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观的文章。

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鲁迅本人深入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解决了在论争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促使他彻底肃清了进化论的影响，达到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境地。他自己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为《三闲集》写序言，回顾这一段论争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十分中肯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可见，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正是鲁迅最终清除进化论、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重要因素之一。鲁迅大约在一九〇〇年、二十岁前后在南京学堂读书时，通过学习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赫胥黎原著），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他又受到维新派传播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通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过学习革命理论和长期的实践，他逐步抛弃了进化论和民主主义，服膺了科学社会主义，以至转变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鲁迅本来根据进化论是相信“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后来他耳闻目睹青年中也有人投降了封建主义、投靠了帝国主义，“满脸装出死相”，这就动摇了他的进化论思想。还在一九二五年初，他就发出了“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①的疑问和感慨。是年五月十一日，在《导师》一文中他已明确指出：“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②鲁迅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的反革命大屠杀，眼看到“同是青年，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血淋淋的现实，他的进化论思想乃被“轰毁”^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从此牢固地树立。但是在艺术理论的某些问题上，他一时还有认识不清之处。及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当他翻译并研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乃进一步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例如，原来有些达尔文主义者曾经用生物学观点来说明艺术的起源。他们以达尔文关于动物也有美感的说法为根据，论证艺术起源于游戏或性的冲动。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批判了这些观点，指出了达尔文“是把人类的起源当作动物物种的起源来看待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想“说明这个物种的历史的命运”。可见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普列汉诺夫不仅划清了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界限，而且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原始民族人们的劳动解释了作为

①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70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5页。

社会现象的艺术的起源。这就澄清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从而帮助鲁迅弄清了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关系，最后肃清了进化论的影响，加深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理解，通晓了如何用唯物史观说明艺术的起源，深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可以说，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有普列汉诺夫等助了鲁迅最后一臂之力，使他在艺术观上更臻于成熟。参加现实政治斗争、接近工农和下层人民群众、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往往是促使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重要途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文艺理论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翻译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书籍，尤其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可以说是他登上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峰的最后一个台阶。可见，鲁迅一生是在不断学习中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努力使自己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鲁迅不仅从普列汉诺夫著作中吸取营养，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对美的本质特征作了精当的概括，下了精确的定义。他说：“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这寥寥数语，异常明确地说明了四个问题：美是人类独有的社会现象，并非动物界的自然现象；人的社会功利要求构成美的核心；美和功用一样都是社会客观存在，都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并非认识的结果；美和功用又不一样，其特点在于它的享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07—208页。

乐性和直观性，可以说美是寓功利性于愉悦性之中。鲁迅的这些美学观点是源于普列汉诺夫，但又高于普列汉诺夫。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三十年代起，鲁迅的一些作品显然就有受普列汉诺夫艺术观直接影响之处。例如，他于一九三四年写的《门外文谈》就是运用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创造来自劳动人民的观点，来说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史和发展史，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唯心史观。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等书的传播，也促使很多文化工作者和革命青年转向并熟知马克思主义，这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还因我而及于别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革命阵营内部原先发生论争的两部分同志各自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弱点，思想上渐趋一致，于是各种革命文学团体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原则。为了联合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对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围剿，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中国共产党乃决定发起成立左翼作家的统一组织。结果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说为这个新的联合奠定了思想基础。鲁迅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写道：“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①。

左联建立时，立即组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随后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等七个团体。这些团体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又联合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界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37页。

总同盟。它们创办刊物，翻译和撰写革命论著，开展各种进步文化活动，同各种反动流派和学派进行坚决斗争，努力培养新人以壮大革命文化队伍。“左联”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曾经总结性地指出：

“自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因而更加深入，产生了社会科学书籍的大洪水，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如上一节所述，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左联和文总存在时期，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理论的著作曾经出版十多种，有的还多次重印。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之外，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成为这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的精神粮食和思想指南。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化界的广泛传播，激起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恐惧。除了逮捕、杀害作家，封闭、查禁书刊之外，他们还采取各种卑鄙手法诽谤革命作家，诬蔑鲁迅。例如，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团体“新月社”，这时由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转向投靠蒋介石集团，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办《新月》月刊，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黑货，竭力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国家社会党党员、“新月派”的骨干分子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新月》杂志上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一方面鼓吹“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连革命文学这个名词他都根本反对；另一方面妄说鲁迅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是“硬译”，“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力图以此阻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文中曾直接涉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梁实秋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

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末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①

鲁迅曾著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②等文，针锋相对地据理力加驳斥。

首先，鲁迅幽默地指出：“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③这里后一句话是深刻揭露“新月社”反动本质和软骨头本性的。原来《新月》月刊创刊时曾标榜“严正态度”，对压迫者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一旦遇到其主子不赏脸，对《新月》刊登的文章横加干预，《新月》只限于发表一篇《告压迫言论者》的软绵绵的文章，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警告对方这样搞下去没有好下场。鲁迅异常深刻地指出：“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④这就维妙维肖地刻划了新月派这一伙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① 《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

② 最初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156页。

④ 同上书，第173页。

摇尾乞怜的叭儿狗的丑态。梁实秋之流所谓“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是欺人之谈。

“硬着头皮看下去了”，这是谎言，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恨之入骨的“天书”是决不会硬着头皮看下去的；至于“无所得”，倒是真话，那是由于他们站在敌对立場上，而决非由于读不懂。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刚一出版就销售一空，以至还要重版，当时报刊上发表有读后感和研究性的文章，这即是明证。

其次，鲁迅还指出：“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①例如，梁实秋竟根据当时流行的具有权威性的《韦白斯特大字典》^②，说什么在古罗马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妄图从语源上大做文章，诋毁无产阶级。鲁迅机智地回击他：读者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如果真有人考证出“梁”字原当“独木小桥”解，以此论证梁实秋不会写文章，这岂不是笑话吗？所以梁实秋竟从语源上来显示自己渊博，自命为中国人的精粹，并以此攻击左翼艺术家的翻译论著象“天书”一样，别人读不懂、无所得，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最后，鲁迅讲到，如果梁实秋之流真是感到象“天书”读不懂，那末左翼译者“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糊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③这里要补充说明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156页。

② 美国人诺·韦白斯特（1758—1843年）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1828年初版，后来又多次修订重版。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1页。

是，普列汉诺夫的论著也是早就有英文译本了。作为留美学生、自命精通英文的梁实秋，如嫌别人译得不好，完全可以找英文译本来研读；可是他不知也不找英文译本，却在那里乱发议论、肆意攻击，这岂非是别有用心吗？鲁迅揭露得深刻：“不知其有而不求曰糊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① 经过鲁迅的迎头痛击，梁实秋的所作所为，不仅暴露了他别有用心，而且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批驳梁实秋借口普列汉诺夫等著作的译文难懂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鲁迅还进一步阐发了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殊性的思想。梁实秋鼓吹什么人性都有喜怒哀乐，“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对此，鲁迅以形象的说明和生动的比喻辩驳得透辟入里而令人信服。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② 可见，“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越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③ 这样，鲁迅就撕下了梁实秋的所谓文学无阶级性的画皮，还他以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真面目，而且以梁实秋作为文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166页。

学具有阶级性的标本。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略战术，有力地揭露了新月派，使之无地自容。

梁实秋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即把文艺当作宣传品。他表示“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对此，鲁迅指出：“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①鲁迅认为，文学作品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无产气，才算无产文学。我们不能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些粗劣的宣传品而否认无产文学，更不能否认无产文学具有宣传作用。至于梁实秋所说，象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这样难懂的书，

“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这就纯属恶意中伤，存心踩抑。应该说，鲁迅是殚思极虑、字斟句酌来重译《艺术论》一书的。对于译文有意见，如果出于善意，完全可以提出商榷和批评。瞿秋白不就是对鲁迅的译文提出过意见吗？鲁迅曾表示虚心接受，或者作了解释^②。他还相信将来“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③而对于别有用心的人就要予以反击。鲁迅的译本纵使有一些生硬之处，在当时仍不失为佳本，因此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视为瑰宝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贬之如粪土，这不也是文学阶级性的一种异常鲜明的表现吗？

梁实秋之流黔驴技穷之后，竟血口喷人，谣诼四起，胡说鲁迅等宣传革命文学的人都是得了苏联卢布的津贴。对此，鲁迅曾著文予以彻底驳斥。一九三一年五月间，他应当时在中国赞助革命运动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之约，为美国进步刊物《新群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7页。

② 参见上书，第295—312页。

③ 同上书，第171页。

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迫害革命作家的种种罪行，由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公布。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前年，最初介绍蒲力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①先生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②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劳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报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③鲁迅的批驳入木三分，何等淋漓尽致！从敌人这些离奇恶毒的谣言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异常害怕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我国的传播。所以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的明枪之外，还有这一批御用文人造谣的暗箭。可见鲁迅等革命文化先驱当年呕心沥血的战斗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除了“新月派”这般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公开反对左翼革命文学之外，还有一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胡秋原之流，曾经

① 爱尔·白璧德（1865—1933年），美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提倡“新人文主义”，实即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坚决反对卢梭以后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竭力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他认为浪漫主义为19世纪灌输了叛逆精神，否定了艺术基本规律的价值，艺术应该旨在刻划人的和谐。

② “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都是指反动文人梁实秋。梁实秋著有《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在中国鼓吹白璧德的谬论。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

打着普列汉诺夫的旗号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文艺自由论”，自命为“自由人”。同时，又有苏汶出面袒护胡秋原，标榜不偏不倚的“第三种文学”、“第三种人”。鲁迅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曾写有《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等文，捍卫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理论（包括普列汉诺夫所阐发的），撕破“第三种人”的面纱，揭露胡秋原之流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本质。他说：当时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除了胡秋原等人的“理论”，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①。鲁迅明确而形象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②。“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即使好象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它便会分明的显现。……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以便“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③事实证明，以“自由人”或以“第三种人”自居发出的奇谈怪论，就是从背后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34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③ 同上书，第408—409页。

射来的毒箭。

此外，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人对鲁迅翻译、传播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并不理解，甚至产生误会。例如，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载有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妄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译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鲁迅回答说：“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创造社”的人早已离开日本跑到法国去了，我“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①。可见所谓“投降”云云完全是无的放矢、无中生有的奇谈。还有人在革命刊物上说，鲁迅翻译这本书是“方向转换”，意即在改变思想，改正错误。鲁迅指出：“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②“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③在这里鲁迅表白了他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作的目的在于为了整个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利益，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和光。

鲁迅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不仅是为了教育别人，而且也是自我教育，也是他自己研究普列汉诺夫生平和思想的过程。这种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为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一篇译后附记和另一篇序言之中。

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夜，译完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时，写了一篇译后附记，曾连同译文一起，发表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春潮》月刊上。全

①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70页。

文不到五百字，却对他一生的功过和这一篇序言的文学价值作了非常精辟的评价。鲁迅指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①，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②这里既讲到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又肯定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关于《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鲁迅认为，“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③这一段话，不仅对普列汉诺夫这一篇序言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价值作了精要概括，而且也是针对当时文艺论争中提出的几个原则问题而发的。鲁迅所概括的“简明切要”四个字，可谓含义深邃，异常贴切。正因为切中需要和要害，所以普列汉诺夫这些著作当时在俄国的传播，能够随同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起，起到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的作用。

鲁迅在写完上述这篇译后附记之后不到一年，即一九三〇年

^① 日俄战争起于1904年2月，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起于1903年8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处鲁迅所述，时间与史实不准确。

^{②③} 《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0页。

五月八日之夜，当亲自校毕自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一书之时，又写了一篇约七千二百字的长序，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功过作了全面的较为详尽的评介。这篇序文最初发表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的《新地月刊》上，后来还收进鲁迅自编的《二心集》。他自己在文末特别声明，这篇序言的四节，“除第三节全出于翻译外，其余是杂采什维诺夫的《露西亚社会民主劳动党史》，山内封介的《露西亚革命运动史》和《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教程》余录中的《蒲力汗诺夫和艺术》而就的。”^①鲁迅把他所根据的材料的出处都注明了，以免有掠人之美之嫌，这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但他不是简单地编译、复述别人的意见，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鲁迅在这篇序言中概述了普列汉诺夫一生巨大的历史功绩。

（一）“青年的蒲力汗诺夫”在革命民粹主义盛行时期，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这时“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认为工人是“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普列汉诺夫“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②。

（二）普列汉诺夫流亡国外后，“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于是蒐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底方法”来研究俄国的现状，“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③。一八八四年他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就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同上书，第198—199页。

是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当的名作。”^①他指出：“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②鲁迅接着颂扬道：“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③

（三）普列汉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④。一八八九年他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演说：“不久，他的业绩显现出来了”，一八九五年出版了从哲学上批判民粹主义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全时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论的根基。”^⑤一八九六年，由于他的弟子们同民粹派斗争的结果，终使彼得堡爆发了纺纱厂三万工人的大罢工，“给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⑥。

（四）普列汉诺夫和比他年轻的列宁之间，自然地形成了分工。普列汉诺夫是“理论家”，“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列宁却“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的。”他们“以辅车相依的形态”，编辑发行了《火星报》，它“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层因此而奋起”^⑦，使民粹派知识分子发生了动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组织了“火星派”的团体，“有当时铮铮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加入这团体，“以实行蒲力汗诺夫在报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开的计划。”^⑧

①②③④ 《鲁迅全集》第4卷，第199页。

⑤⑥⑦ 同上书，第199—200页。

⑧ 同上书，第201页。

(五) 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党的受难时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同心”。当取消派气焰嚣张地向布尔什维克党进攻时，他“这时大声叱咤，说取消主义应该击破，以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却是身为门塞维克的权威的蒲力汗诺夫，且在各种报章上，国会中，加以勇敢的援助。”^①

鲁迅在文章中也严肃地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过错。

(1)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观点“不免常有动摇的”^②。自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他成为孟什维克的“权威”，而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指导者”，“从此两人即时离时合”^③。

(2)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迨欧洲大战起，蒲力汗诺夫遂以德意志帝国主义为欧洲文明和劳动阶级的最危险的仇敌，和第二国际的指导者们一样，站在爱国的见地上，为了和最可憎恶的德国战斗，竟不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相提携，相妥协了。”^④

(3) 普列汉诺夫晚年脱离了广大革命群众，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本国，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没有了打动俄国劳动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引者注）后，他几乎全为劳农俄国所忘却”^⑤，孤独地死去。

鲁迅既全面概述了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上理论上的功过，肯定他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⑥；同时又转译罗莎·卢森堡的话，认为他晚年已成为一个“可尊敬的化石”了。

鲁迅还特别专门论述了普列汉诺夫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贡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③ 同上书，第201页。

④⑤⑥ 同上书，第202页。

献。他说：“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①接着，鲁迅评介了普列汉诺夫写的三封关于艺术问题的信札。

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并解决了“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②，这就补正了列·托尔斯泰把艺术看成只是表现人们感情的一种手段的片面观点。普列汉诺夫从唯物史观出发，“申明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艺术观，还评介了达尔文的美学观。鲁迅特别推崇的是普列汉诺夫“解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而站在该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的艺术，又怎样地取了各别的形态，和别社会的艺术显出不同。”^③这是关于艺术起源、本质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普列汉诺夫是从解明尚未产生阶级之前的原始民族的艺术着手，“来担当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中的难题。”^④他引用非洲、亚洲、美洲和澳洲原始民族的大量具体实况材料来说明原始民族“实为共产主义底结合”，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卡尔·毕海尔认为原始民族只是“个人寻找食物”的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进而批判毕海尔认为游戏先于劳动、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生产的唯心观点，“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⑤普列汉诺夫从狩猎、游牧和

①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206页。

③④⑤ 同上书，第207页。

农业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看到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来看待事物和现象。鲁迅特别强调普列汉诺夫关于人与美的关系的正确结论：“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一书的基本观点，给予了鲁迅很多帮助；而鲁迅对该书内容的精要评介，又非常有助于广大读者掌握和领会普列汉诺夫艺术观的要点。这在普列汉诺夫著作刚开始在我国传播之时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事实上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鲁迅虽然对普列汉诺夫有精湛的研究，但是他自己却十分谦逊，从不随意发表议论。他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某些言论，然而却只限于介绍，而不妄加论断。例如，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主编的《奔流》出版了纪念俄国著名作家列·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专号，选登了多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罗喀绥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都曾经把托尔斯泰与法国的卢梭相比。鲁迅当时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卡尔·马克思与列奥·托尔斯泰》一文，看到普列汉诺夫对这种评价有不同的看法。他就在《〈奔流〉编校后记》中引述了普列汉诺夫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说的：“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扎思律支弄明白了。”鲁迅引述这段话之后写道：“三位都是马克思学者的批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08页。

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①一九三三年在现代书局主持编务的杜衡（即苏汶）编就《文艺理论丛书》第一种，其中收入普列汉诺夫的论著。编者拟请鲁迅作序，鲁迅在八月二十日的复信中当即婉言谢绝。他表示“对于此事，不想与闻”，同时又自谦说：“对于蒲氏学术，实在知道得太少，乱发议论，贻笑大方。”^②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鲁迅既热心向中国读者介绍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又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

总之，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文化巨人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给予了中国文化巨人鲁迅以重要的影响。同时，鲁迅以极大的热忱和艰苦的劳动，向中国人民传播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以鲜明的爱憎，排除了各种干扰，捍卫了普列汉诺夫的正确理论；他还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的功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普列汉诺夫和鲁迅为代表的这两股马克思主义文化巨流的汇合，给予了我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以巨大的推动。

第四节

瞿秋白与普列汉诺夫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于二十年代初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激浪滔天的革命岁月中，除了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从事很多革命实际工作之

①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

②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01页。

外，还撰写了大量论著，其中有多篇评介了普列汉诺夫。

据我们已查阅到的资料表明，瞿秋白早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中，就已提到普列汉诺夫。此文作为“莫斯科通信”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北京出版的《晨报》上。文中写道：“社会革命党成立时，即与正派的马克思主义相抗。马克思主义见无产阶级（工人）于革命之中各有欲指导地位之势，而‘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特注重于农民阶级，……而何以‘农民的政党’自负的。当时凡马克思主义派（不论是多数派、少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朴列哈诺夫、马尔诺夫（即马尔托夫——引者注）、列宁、杜洛次基（即托洛茨基——引者注）都早已说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①瞿秋白在这里是从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普列汉诺夫是最早起来批判社会革命党错误理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一。

瞿秋白用“屈维它”的笔名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论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他在文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等人创建的“劳动解放社”。他说：“俄国发生小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五六个人的‘劳动解放社’——朴列汉诺夫、乍苏黎池女士（即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引者注）等，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俄国集中的工业资本已经有五万四千一百万卢布；他们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且还只是民主运动，宣传学理和指导工会组织，绝不敢讲政党。”^②瞿秋白在这里正确指出了“劳动解放社”的性质和作用，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劳动解放社”之所以没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

① 1922年8月14日《晨报》。

② 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第97—98页。

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即当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工人阶级还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还未蓬勃展开。

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上，刊登了瞿秋白阐述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李宁与社会主义》。他在文章中阐明列宁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以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他还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与列宁相比较，正确指出他们这两位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最大弱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平时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一但面临革命斗争实践，则“手忙脚乱”，抛出机会主义策略，陷入机会主义泥坑。瞿秋白很早就提出的这个见解很新颖、很深刻，论述也很精彩。他在文中的论述如下。

“李宁（即列宁——引者注）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他比其余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来，却有几个特点。

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他不仅是坐言，并且还能起行，——他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极伟大的自信力。实在说起来，李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比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许多理论家来，——如考茨基，如吉德（即盖得——引者注），如朴列汉诺夫——并无何特长——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都承认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将来革命中必不可免的阶段，而且必完成为‘无产阶级里特出的人才之统治’（考茨基），大家都承认社会党不免要用强力；大家都决然否认社会主义可以和资产阶级妥协而成。朴列汉诺夫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大会上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胜利是根本大法，为着这种胜利起见，可以剥夺统治阶级的政权，可以解散仇视无产阶级的国会。考茨基在一九〇二年说：‘世界的社会革命要在俄国开始呢。’当一九〇六年（应为一九〇五年

——引者注)的俄国革命时,他说那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及马克思主义的职能,曾经有如此的观点。然而等到社会革命真正开始,要从坐言进于起行的时候,他们大家都手忙脚乱起来,所宣传的策略竟和自己前几年的主张大相刺谬。朴列汉诺夫如此,考茨基亦是如此。

只有一个李宁,——他在一千九百零几年的时候,初上政治舞台,完全和朴列汉诺夫及考茨基是一致的,他后来又和朴列汉诺夫及马尔托夫同办‘火星’杂志,共同宣传后来的共产党的观点,——只有他一个人会联结革命的理论 and 实行的策略,毅然决然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不顾一切。”^①瞿秋白在文中还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和他同列宁等共同创办《火星报》的历史功绩。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五期上,登载了瞿秋白编写的《世界革命运动年表——战壕断语(三)》,文中有两个条目写到普列汉诺夫。其中一个条目写道:“一八七八年——‘土地与自由社’正式分裂成两个团体:一个是民意社,注重政治斗争,专事暗杀活动;一是黑分社,注重经济斗争,主张农民自动平分贵族的田地(朴列汉诺夫也在其内)。”^②另一个条目写道:“一八八三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朴列汉诺夫、萨苏黎赤(即查苏利奇——引者注)等始组织‘劳动解放社’于瑞士(一八七五年南俄工会成立,一八七八年北俄工会成立。)”^③瞿秋白写的这两个条目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政

① 瞿秋白:《李宁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第27—28页。

②③ 屈维它:《世界革命运动年表——战壕断语(三)》,《新青年》月刊第5期,第13页。

治活动中的两件大事。他在文中还正确指明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三年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未把“土地与自由社”分裂的时间弄准确，分裂的时间是在一八七九年，而不是一八七八年。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革命知识分子为了配合党的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向我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以瞿秋白在二十年代写的文章中谈到普列汉诺夫时，主要是评述了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而到了三十年代，瞿秋白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则转向评介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说明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重点不同，各有特色。

一九三一年瞿秋白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打击、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之后，并没有消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他在上海养病期间，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用笔作投枪，积极参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同时，还悉心致力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一九三二年，他根据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一、二期发表的资料，编译了名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文集，收有：恩格斯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两封信，拉法格论法国作家左拉及其《金钱》的一篇文章，普列汉诺夫的四篇文章——《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除了这些译文之外，还有瞿秋白自己根据国外资料和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实际，编写的六篇评论性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等。

瞿秋白在这本文集的后记中，曾谈到这些译文的原文是最近

发现的，“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等四篇，也是最近才找着的原稿，有些是以前发表过而没有收进全集里去的，有些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这里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已经译出的普列汉诺夫著作参看。”^①这里所说的“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材料”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状说的，即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中国文艺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编译这些文稿的。可惜瞿秋白的这些译著直到一九三三年冬他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苏区之前，未能正式出版，手稿保存在鲁迅处。一九三五年他壮烈牺牲后，鲁迅为了悼念战友、传播火种、打击敌人，曾经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抱病亲自编辑、校对和出版了瞿秋白的大量译稿，名叫《海上述林》，分上、下两卷，用佳纸精装，附有精美的珂罗版插图，配以考究的装璜。书的上卷就收集了瞿秋白译的普列汉诺夫的四篇作品。鲁迅还亲自为本书写了介绍，而且高度评价这些译作是“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②。瞿秋白翻译的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著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出版，对于武装当时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推动了革命文学运动走上正确、健康的道路。鲁迅曾把它比作普洛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和运送军火给起义的奴隶。

除了翻译普列汉诺夫的作品之外，瞿秋白在自己的论著中还评述了普列汉诺夫。

他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致鲁迅《论翻译》的书简中，极力赞许鲁迅翻译的《毁灭》（苏联作家法杰耶夫著），主张翻译应该绝对的正确和采用绝对的中国白话文，反对梁实秋、赵景深等的“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观点。当时梁实秋等人曾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93页。

②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鲁迅全集》第7卷，第778页。

经攻击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翻译作品不顺，是“硬译”、“死译”。可是左翼同志中有人认为翻译作品有时“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瞿秋白不赞成这个意见，他认为这只是“防御的战术”，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守为攻。他在信中同鲁迅谈及自己的这一见解时，引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④可见，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给瞿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在书信中都要加以引证。

一九三二年一月，瞿秋白在《论弗里契》（现译弗里切）^⑤一文中，曾论述了弗里切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维奇·弗里切（一八七〇——一九二九年）是出生于莫斯科的德国人，后来成为苏联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艺史学家。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以发表文艺评论崭露头角，二十世纪初参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一九二二年起领导苏联一些文学研究部门的工作，主编《文学百科全书》，著有《艺术社会学》等著作。此书曾于一九三〇年由刘呐鸥译为中文出版（上海水沫书店版），三十年代在我国颇负盛名。瞿秋白当年在弗里切逝世之后撰写此文，意在对我国读者全面评介弗里切在艺术上的功过。瞿秋白给予弗里切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专门研究艺术科学的第一个人”，“是

③ 赵景深当时为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于1931年3月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论翻译》一文，主张：为了替读者着想，“译得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如果译得不顺，“其害处当甚于误译。”

④ 见《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20页。

⑤ 此文最初发表在1932年9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3期上，署名易嘉，见《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564—573页。

唯物论的文艺科学的开创的人”^①。弗里切早年思想上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关于他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瞿秋白写道：“他的理论上的出发点，大半还是普列汉诺夫的学说，虽然他后来已经开始批评普列汉诺夫。”“他在晚年，显然已经开始脱离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在艺术理论的新的发展过程之中，他曾经参加了反对各种错误的倾向的斗争。可是普列汉诺夫对于他的影响是太大了，因此，他常常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几部极有价值的大著作，例如，《艺术社会学》，《欧洲文学史大纲》等等，也不免包含着机械论的错误。”^②

瞿秋白认为弗里切的很多错误，其源盖出于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弗里切认为“艺术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手段”，这种“波格达诺夫式的错误，是由于他所受的普列汉诺夫的影响而来的。”^③俄国学者波格丹诺夫曾经鼓吹文艺组织生活论。实际上，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作用于社会生活，影响着社会生活，然而不能人为地去组织社会生活，所以文艺组织生活论是一种唯心论、唯意志论的错误理论。第二，普列汉诺夫的“象形论”认为艺术的作用等于中国的象形文字，这样就不能够反映现实世界丰富的内容，更不能够去影响现实世界；弗里切“在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影响之下，也常常把文学上的形象叫做‘象征’。”^④第三，弗里切“接受普列汉诺夫的‘生物学主义’。……同时，他对于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加以批评。”^⑤实际上只用地理上的特点去解释艺术。第四，弗里切“在文艺评论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564—565页。

② 同上书，第565—566页。

③ 同上书，第567页。

④⑤ 同上书，第568页。

方面仍旧脱离不了普列汉诺夫的**客观主义**”^①，普列汉诺夫用所谓“科学的文艺批评”来反对“党派的文艺批评”，他认为“‘党派的文艺批评’是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的立场”，其实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就要走到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方面去。而弗里契在这一点上面拥护普列汉诺夫的客观主义的科学的文艺批评，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②第五，弗里契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受普列汉诺夫的“逻辑主义”的影响，这种主义是要想在一般真理的简单逻辑发展之中去找到对于具体问题的答复，所以弗里契总在想找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第六，弗里契“还主张对于人的描写应当是‘合理主义’的。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他受着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太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肃清普列汉诺夫观点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的成分。”^③

总之，瞿秋白把弗里契各种错误的根源都归结为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太大”，未能完全肃清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弗里契在艺术论上并不存在瞿秋白文章中所列举的这么多错误，他的主要错误是持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只停留在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和阶级观点来解释艺术，而忽视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文艺的特殊发展规律。他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也不完全来自普列汉诺夫，还来自德国艺术理论家威尔海尔姆·豪曾施泰恩（一八八二——一九五七年）。此人按照机械的庸俗的观点，离开艺术作品的内容，片面考究艺术的形式，特别推崇欧美形式主义的艺术。瞿秋白在文章中所列举的普列汉诺夫在艺术理论上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569页。

② 同上书，第570页。

③ 同上书，第572、573页。

的多方面的错误，也是被夸大了的，有的甚至并非是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例如，地理环境决定艺术等，这是被夸大了的，普列汉诺夫本人并没有这个观点，他论证地理环境的一定作用虽有过头之处，但仍包含一定的合理性；文艺组织生活论是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把它也算到普列汉诺夫头上是不符合实际的。瞿秋白对弗里切及其与普列汉诺夫关系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苏联文化界的影响。那时苏联文化界正在由所谓“普列汉诺夫时期”进入“乌梁诺夫时期”，文艺界正着力“更加精确更加深刻的揭破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之中的孟塞维克的成分”^①，俄文书刊中发表了很多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论著，瞿秋白精通俄文，他在国内不免受这股北风的影响。同时，他自己这时在文化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他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间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曾否定“五四”文学革命，认为那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甚至把白话文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还提出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②的口号。这种“左”的思想也妨碍了他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全面的评价。

瞿秋白详尽评介普列汉诺夫的专文是他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全文约一万三千字，写作此

① 瞿秋白在1932年1月写的《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一文中，指出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大概经过三个时期：第一、波格达诺夫时期，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隘小团体；第二、普列汉诺夫时期，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这时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已形成，但“革命同路人”在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第三、乌梁诺夫时期，即实行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造时期，乌梁诺夫（列宁）的文艺思想已取得很大胜利，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受到深刻批判。见《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574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867页。

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和价值”^①。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用了较大篇幅写了普列汉诺夫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错误，诸如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影响到他的艺术理论，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政策，主张“象形说”，忽视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割裂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实用的艺术和美感的艺术对立起来，鼓吹艺术论上的客观主义，事实上承认了美感的超阶级性，等等。瞿秋白之所以写了普列汉诺夫这么多方面的错误，一方面如上所述，是源于受了当时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针对当时胡秋原等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美化。他自己在文章的开头就点明了他要批驳苏联的史楚庆和中国的胡秋原等人所鼓吹的“普列汉诺夫正统论”；在《现实》文集的后记中他又声明：他写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人的“考证和解释的论文，而自己编过的；当然，这里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②。

瞿秋白写了这么多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是否要基本上否定普列汉诺夫呢？不是的。他特别强调指出：“中国的著作家特别多心，如果你指出他事实上犯了某种错误，他就会怀疑你是在谩骂他”，“这当然是一种‘误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绝对不应当引起这一类的误会。同时，也的确不应当用那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去对付普列汉诺夫，更不用说真正无聊的谩骂了。”“不但如此，而且还要自己真正把握着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然后才能够用批评的态度去运用宝贵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而不至于自己又去重复他的错误。”“现在我们批评普列汉诺夫，也就不应当再‘蹈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覆辙’。”^③这里，瞿秋白不但正

①②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1193页。

③ 同上书，第1076页。

确地指出了全面评价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类似的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还阐明了对待普列汉诺夫这类人物的错误应该采取的态度。

瞿秋白在文章中曾批评了当时有些人，例如苏联的黑拉普琛珂^①，抓住普列汉诺夫说过“艺术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手段”这一句话，从而认定普列汉诺夫根本就不是一个唯物论者的说法。他认为：“要批评普列汉诺夫，就不应当只批评他的一两句话，而应当批评他的美学理论的根本原则。”^②况且，他在另外的一些著述中还讲过艺术表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之类的话。“可见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观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普列汉诺夫不过在审美观念方面，还不能够完全脱离康德的‘超阶级’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罢了。”^③

瞿秋白在文章中还批评了当时有些人，例如苏联的亚尼西莫夫^④，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是“孟什维主义的艺术论”。瞿秋白指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第一，普列汉诺夫自己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普列汉诺夫；列宁向来认为普列汉诺夫在当初（大概可以说在一九〇三年以前）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普列汉诺夫和其余的孟塞维克不同，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实行过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应当把最后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拥护帝国主义

① 米哈伊尔·波里索维奇·黑拉普琛珂（1904年生），苏联文艺学家、社会活动家，1924年大学毕业，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8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艺术事业委员会主席，1958年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60年为科学院院士。

②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1077页。

③ 同上书，第1078页。

④ 伊万·伊万诺维奇·亚尼西莫夫（1899—1966年），苏联文艺学家，1927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66年任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1960年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战争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当做整个的他的全部的学说。”^①这样具体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无疑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文末，瞿秋白提出了结论性的意见。他说：“我们应当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遗产，而不是盲从，更不是把他一笔勾消，认为他是纯粹的孟塞维克的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的遗产是宝贵的，我们不应当抛弃这种遗产，而应当注意的去研究，审查，采取普列汉诺夫美学之中的有用的材料。”^②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三十年代初期，瞿秋白一方面在受到苏联文艺界贬低普列汉诺夫的思潮的某些影响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善于独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且勇于发表独立见解，敢于指名道姓批评苏联文艺界某些权威人物的错误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遗产，瞿秋白不仅批评了苏联文艺界的一些人物，而且还斥责了国内胡秋原之流的反动文人。如前所述，胡秋原曾以普列汉诺夫的信徒自居，自命为“自由人”、“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第三种文学”。瞿秋白曾和鲁迅并肩战斗，著文揭露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批判了胡秋原的谬论。他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七月）^③一文中写道：“胡秋原先生，据说是从普列汉诺夫‘弗里契’出发的文艺理论家”，“胡秋原先生的理论，据他说，是从普列汉诺夫出发的。他引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说艺术是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1078页。

② 同上书，第1079页。

③ 此文曾发表于1932年《现代》杂志第1卷第6期，署名易嘉，后来收入1938年5月出版的《乱弹及其他》，解放后又收入《瞿秋白文集》第2册。

用形象去思索。”^①他又补充说：艺术的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瞿秋白随即抓住了实质，打中了要害：

“这里，立刻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所谓高下又用什么标准去定呢？用贵族阶级的标准，用资产阶级的标准，还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对于这一点，他是没有说明的。大概是用所谓‘自由人’的立场做标准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他事实上是**否认艺术的积极作用，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②瞿秋白进而说明了胡秋原怎样发展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本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之中，已经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分，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这种理论到了胡秋原先生手里，就掺杂了安得列耶夫的‘学说’^③，和胡秋原先生自己的‘学说’，结果，竟变成了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④“他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胡秋原先生的艺术理论其实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⑤，“是**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⑥。这样，就对披着普列汉诺夫的外衣而区别于普列汉诺夫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51、954页。

② 同上书，第954页。

③ 列昂尼德·尼古拉也维奇·安德烈也夫（1871—1919年），俄国作家。他在早期作品中同情穷人，但带有感伤情绪。后来的作品对人民力量和革命表示怀疑。他曾把“消灭人类间的一切阶级隔阂”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

④ 《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56—957页。

⑤ 同上书，第953页。

⑥ 同上书，第956页。

的胡秋原的艺术理论的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揭露。

胡秋原等人当时是打着唯物史观和普列汉诺夫的旗号，鼓吹艺术至上、文艺自由，诋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妄图把文学引向脱离政治、脱离革命的邪路。瞿秋白和鲁迅一起，对这种所谓“自由人”理论的批判，正是在剔除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中被胡秋原继承和发展的糟粕的同时，卫护了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中的精华，使这些优秀遗产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指导思想。

二十年代末普列汉诺夫著作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使得广大进步知识分子都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至“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已经成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口头禅。有些人对此很看不惯，居然竟把这算做新八股，以区别于诗云子曰那套老八股。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刊登了“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祝秀侠的一篇《论新八股》的文章，其中举“新旧八股的对比”例子说：“（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这种对比显系十分不当。瞿秋白当即于四月十一日写了《透底》^①一文予以批驳。瞿秋白认为，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原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②“开口诗云子曰，算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

① 瞿秋白的这篇文章，是经鲁迅用自己的笔名“何家干”发表在《申报》的《自由谈》上。鲁迅为了使这篇文章流传更广，加之与瞿秋白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又把它编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中。参见丁景唐、文操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0、144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30—431页。

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一通物……。这自然透底之至。”^①这种不相信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人，把任何真理都当作无用的八股的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亲自从头实验的人，实在是愚蠢之极。瞿秋白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有人把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当作新八股为例，反对当时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当中的对革命真理采取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祝秀侠读到此文后，曾给何家干去信表白，说他攻击不在“蒲力汗诺夫说”，“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例如礼拜六、礼拜五派，还有所谓“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瞿秋白立即用何家干的笔名写了回信，他在回信中指出：“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因为出版《礼拜六》、《礼拜五》周刊的这一帮庸俗文人，主要是用鸳鸯蝴蝶、风花雪月为题材，宣扬红男绿女的低级趣味。“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如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②总之，瞿秋白认为：对于象胡秋原之流“歪曲革命学说”的人，要具体分析他们的错误；而不能因为他们在口头上挂着“蒲力汗诺夫曰”的招牌，而竟把“蒲力汗诺夫曰”笼统地一概都当作陈词滥调加以反对。传播并学习普列汉诺夫的科学理论会使人聪明起来，投身革命。

实践证明，鲁迅、瞿秋白等人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传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430—431页。

② 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86页。

播、论述和维护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工作，对于提高中国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统一中国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认识、批判反动的艺术思潮、抵制反动的艺术作品、加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建设、促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繁荣，都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后 记

本书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写作过程。

早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研究普列汉诺夫。高敬增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是怎样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毕业以后，他在内蒙喀喇沁旗党校和昭乌达盟党校担任教学工作期间，仍然坚持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思想，并由原导师高放继续给予指导。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个人的科研工作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匍匐前进，而且难以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九七六年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之后，祖国大地春意复苏。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端正了路线之后，调动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并为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时才真正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们着手合写《普列汉诺夫评传》。由于我们日常工作繁重，大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现在这部书稿就是我们师生几年来断断续续合作的成果。高放指导和参加了全书的撰写，并大力统修定稿。高敬增在准备资料、起草和修改书稿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工作后，又校订了书稿。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关资料我们刻意求索，多方搜集，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许多书刊，吸取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从苏联书刊中采用了较多史料，并冀求有所创新。本来在初稿中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苏联出版的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传》选译了不少新史料。后来考虑到此书已经译为中文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为了避免重复，故在定稿时大部分都删去了。少量必须采用的史料，也是早先我们自己摘译的。经过对照，我们吸取了中译本的优点，但是译文大都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外，我们也从一九六三年美国出版的巴伦著《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一书采用了一些材料。同时，我们发现一九六三年英文本和一九七七年俄文本及其一九八〇年中译本，都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对此，在本书和我们合编的《普列汉诺夫年谱》的有关脚注中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还从俄文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三卷、一九六三年英文版和一九七七年俄文版普列汉诺夫传记中选出八幅照片作为本书的插图，这些照片大多数在我国出版物中还是首次出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内蒙昭乌达盟盟委宣传部和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党政组织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市委党校、中央党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好些同志的热情协助。冯兰瑞、黄枏森、陈启能、王荫庭、马奇、吴元迈、田森等同志分别帮助审阅过部分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董琦、王颖同志对书稿提出过很多具体意见。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楚图南老伯为本书题笺，中央戏剧学院画家周路石老友为本书封面作画并设计（就促进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评述普列汉诺夫富有戏剧色彩的一生来说，请这两个单位的同志题笺和作画含有深刻寓意）。我们一并在此深表谢意！由于

我们水平低，努力不够，有关普列汉诺夫的好多俄文材料尚未卒读，书稿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正。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还编制了较为详细的普列汉诺夫年谱和有关资料，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另行单独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年谱》。

作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完稿，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第三次修毕。